《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丛书涉猎的历史资料纵贯600年，横跨全中国，它整合了自明初迄今600多年来历朝历代专家学者研究建文史事的专著、专论，坊间文人的相关论述，方志域情的相关记载，家谱、族史的真实记录，百姓众口传扬的口碑资料，目的是供后人从中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还原一段真实的明史，还原一个真实的明朝。

ISBN 978-7-89536-751-7



仅配合光盘使用



特别推荐书籍

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下篇）

宁德市明史研究会 编



线装书局

建文帝踪迹
研究资料汇编

下 篇

宁德市明史研究会 编



线装书局

宁德市明史研究会是宁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下属的一个正式注册的具有法人代表资格的群团组织，拥有会员100多人，是福建省第一个研究明史的学术团体。它成立于2019年10月，其前身是成立于2008年的且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十五年来，该研究会以上金贝古墓谜云为发端，以靖难谜案为背景，于史册正伪之外，遍访宁川山野村寨，求证地名，访察古迹，推考谱牒，细研俚语风俗旧约，独僻乡音追索与易学补证之法，研究成果丰硕，并已得到中国明史学会的认可（2020年11月，中国明史学会第十九届年会在宁德召开，对此作了阶段性总结）。

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

（下篇）

宁德市明史研究会 编


线装書局

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下篇）

责任编辑：张梓娆　钏有庄

责任校对：胡广龙

封面设计：张金花

电子出版号 · ISBN 978-7-89536-751-7

书　　名：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下篇）

作　　者：宁德市明史研究会

出版单位：线装书局有限公司

制作单位：北京华夏长鸿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语　　言：中文

载体形态：光盘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B座17层（100078）

邮　　箱：xianzhuangshuju@126.com

网　　址：www.zgxzsj.com

字　　数：334 千字

一般附注：本资源仅配合光盘使用

目 录

卷七 专著类

一、吴晗 · 明朝大历史（节选）......003
二、黄云眉 · 明史考证（节选）......004
三、晁中辰 · 明成祖传（节选）......014
（一）建文帝死于火了吗？......014
（二）寻找建文下落......019
（三）关于建文疑案......023
四、王熹 · 建文帝 · 永乐帝（节选）......027
五、陈水源（台湾）· 杰出航海家郑和（节选）......046
（一）建文帝自宫殿消迹......046
（二）李挺陆上搜索建文帝......048
（三）永乐帝霸气吞天下......049
六、上杉千年（日本）· 郑和下西洋（节选）......051
七、周新华 · 郑和七下西洋（节选）......054
八、商传 · 永乐大帝（节选）......061

九、马渭源 · 破解 600 年第一谜案（节选） 064
十、唐颐 · 二十八个人的闽东（节选） 072
十一、王道亨 · 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选录） 075
十二、王道亨 · 明初大历史——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秘史 109
第一讲　和尚皇帝朱元璋 110
第二讲　皇帝和尚朱允炆 116
第三讲　“靖难皇帝”朱棣 123
十三、王道亨 · 建文帝出亡路线图 127
浙江浦江郑义门——建文帝出亡第一站 132
浙江宁波——建文帝出亡第二站 134
浙江温州——建文帝出亡第三站 134
福建福宁（今霞浦）——建文帝出亡第四站 136
福建宁德（今蕉城）东乡——建文帝出亡第五站 143
福建宁德（今蕉城）西乡——建文帝出亡第六站 149
福建闽县（今闽侯）雪峰寺——建文帝出亡第七站 155
福建宁德（今蕉城）支提寺——建文帝出亡第八站 165
福建宁德（今蕉城）金贝寺——建文帝出亡第九站 176
尾声 183

卷八　专论类

开展建文帝研究的文化意义 198
（一）不同历史时空的道德价值观变迁 198
（二）道德价值观的认定应该放到历史当时的时空中去思考 200
（三）建文帝研究的文化意义 203

建文帝离开南京城的四种传统说法阐析 206
建文帝出亡方向的三种传统说法阐析 210
建文帝入闽入宁新探 216
（一）建文帝入闽新探 216
（二）建文帝入宁新探 218
郑洽归宗有力佐证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 222
上金贝古墓为何被众多到访的专家学者确认为明建文帝陵 229
支提寺珍藏的五爪金龙袈裟被确认为明初御用品 238
明初的大京城堡及其四批移民 242
（一）大京城堡的现状 242
（二）大京城堡的来历 242
（三）大京城堡的沿革与演变 243
明中叶福建省·福宁州·宁德县人口比明初锐减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宁德 247
明永乐二年（1404 年）朝廷在福宁及其周边地区的不寻常军事部署 ... 249
明中叶中国佛教的突然衰微原因分析 256
建文帝选择福建福宁为其出亡目的地原因分析 265
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 272
（一）谁的云锦袈裟? 274
（二）上金贝古墓墓主是谁? 278
（三）宁德郑歧村始迁祖郑岐为何许人? 282
（四）永乐年间宁德三任知县为何有姓无名? 285
（五）永乐帝为何强化对闽东的军事控制? 287
皇太孙朱允炆侧妃陈凤春身世之谜探秘 293
“孝文帝”与“小登基广场村” 295

明建文末永乐初闽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移民潮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 297
“日庙”与“月庵”——兼论建文朝殿前三品指挥使杜华泗身世 308
（一）“殿前三品指挥使”是个什么样的官? 308
（二）杜华泗其人其事考 309
（三）瑞岩村及其周边地区所遗留古迹与流传的民间传说所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 311
皇太孙朱允炆伴读、洪武朝福建都司左卫将军胡护龙身世之谜探秘 ... 313
（一）事情的原由 314
（二）胡廷瑞其人其事 314
（三）胡福（护）龙其人其事 315
郑洽其人考 316
（一）典籍史料证实了郑洽随亡 316
（二）浦江郑义门确有郑洽其人 320
（三）郑洽因随帝出亡而被郑义门削籍 326
（四）宁德郑岐村的郑洽就是随亡的郑洽 331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情况汇报 340
（一）研究历程与主要收获 340
（二）研究局限与研究困难 350
宁德民间故事中的建文帝形像 358
（一）导论 358
（二）建文帝的形像 359
（三）结论 366
建文帝“活化”宁德历史文化现场 368
（一）宁德历史现场的建文帝文化分子 370
（二）故事骨架和重要文化支撑点 373

（三）结论：宁德文化因建文帝而“活”......377
从建文帝部属及永乐帝对闽东地区的监控看建文帝出亡闽东的可能性.378
（一）从黄子澄的逃亡路线推测建文帝的逃亡方向......378
（二）建文帝在闽东地区的部属与支持力量......381
（三）永乐帝对闽东等地所采取的监控措施......385
关于建文帝出亡宁德相关研究的评析与思考......389
云锦袈裟与“建文帝出亡宁德说”......397
（一）关于支提山寺云锦袈裟的误解......398
（二）明代宫廷对支提山寺的恩典......400
（三）结语......402
郑和访支提山与建文帝下落关系考......402
一......403
二......405
三......407
建文帝行踪诸说刍议......410
（一）建文帝行踪诸说及评述......410
（二）关于建文帝行踪诸说的几点思考......415
（三）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建文帝踪迹的意义与价值......417
万历皇帝对建文皇帝的平反......420
一......421
二......425
三......426
明代的建文问题——从南明政权的几篇诏疏说起......428
（一）从“靖难革除”到“靖难是而革除过”......432
（二）建文逊国之说......434
（三）靖难与国家元气......436

结论……438
明代私人著述中的建文帝去向蠡测……439
（一）引言……439
（二）永乐朝官方对建文朝史事的书写……440
（三）明代私人著述中的建文帝行踪……443
（四）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的蠡测……449
（五）结语……451
续破“天书”觅“建文”……451
（一）破解“郑洽（岐）”故居遗址中的三个牌匾……452
（二）探寻建文帝迷踪……458
（三）探究上金贝古墓塔碑文……461
（四）“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465

卷九　报刊文创类

报纸刊文类……472
一、《福建日报》刊载文章索引……472
二、《闽东日报》刊载文章选录……472
三、《宁德晚报》刊载文章索引……473
四、《海峡都市报》刊载文章索引……475
五、《三都澳侨报》刊载文章索引……475
六、《收藏快报》刊载文章索引……476
七、《金陵晚报》刊载文章索引……476
八、《澳门时报》刊载文章索引……476

附 录......478
一、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成员名录......478
二、宁德市明史研究会会员名录......479
三、在宁德市蕉城区召开的中国明史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与会学者名录..479
四、中国明史学会第十九届年会邀请参会的宁德地方党政领导与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员名录......480

卷七　专著类

当代建文典籍




大明帝国
郑和七下西洋记
明朝大历史
建文帝 永乐帝
吴晗论明史
明成祖傳


二十八个人的闽东
郑和下西洋
南京云锦史
明史考证
第一册
（节选）
郑和下西洋与福建
福建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论文集

一、吴晗·明朝大历史（节选）

明成祖从北京打到南京，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建文帝是明太祖的孙子，他做了皇帝以后，听信了齐泰、黄子澄等人的意见，要把他的一些叔叔——明太祖封的亲王的力量消灭掉，以加强中央集权。他解除了一些亲王的军事权力，有的被关起来，有的被废为庶人。于是燕王便起兵反抗，打了几年，最后打到南京。历史记载说燕王军队打到南京后，“宫中起火，帝不知所终”。“帝不知所终”这句话是经过了认真研究的，因为当时宫里起了火，把宫里的人都烧死了，烧死的尸首分不清到底是谁。于是就发生了一个建文帝到底死了没有的疑案。假如没有死，他跑出去了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重新组织军队来推翻明成祖的统治。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建文帝是继承他祖父明太祖的，全国各个地方都服从他的指挥。因明成祖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并没有把建文帝的整个军事力量摧毁，他的军事力量只是在今天从北京到南京的铁路沿线上，其他地方还是建文帝原来的势力。因此明成祖就得考虑建文帝到底还在不在？如果是逃出去了，又逃到了什么地方？他得想办法把建文帝逮住。于是他派了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内务部长）胡濙，名义上是到全国各地去找神仙（当时传说有一个神仙叫张三丰），实际上是去寻找建文帝。前后找了二三十年。《明史·胡濙传》说胡濙每次找了回来都向明成祖报告。最后一次向皇帝报告时，成祖正在军中，胡濙讲的什么别人都听不到，只见他讲了以后明成祖很高兴。历史家们认为，最后这一次报告，可能是说建文帝已经死了。另外，明成祖又怕建文帝不在国内，跑到国外去了。所以他在派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要郑和在国外也留心这件事。这是可能的，但这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二、黄云眉·明史考证（节选）

明史卷四（恭闵帝纪）考证

讳允炆。

沈德符野获编卷一；“唯本朝则此禁稍宽，然有极异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谥号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盖当时已改尊称为兴宗孝康皇帝，犹为有说；而建文年号，音同御名，举朝称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讳也？至建文二子，长名文奎，次名文圭，其音又与炆字无少异，又何也？岂拘于太祖所定帝系相传之二十字耶？似亦宜变而通之。当时方、黄诸大儒在事，纷纷偃武修文，何以不议及此！”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　诏行三年丧。群臣请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阴不言也。朝则麻冕裳，退则齐衰杖绖，食则饘粥，郊社宗庙如常礼。”遂命定仪以进。

按奉天靖难记卷一写惠帝居丧无状，淫纵过于桀纣，与此合看，其矫诬正靡所底止！至太宗实录卷一按目录卷一至卷九，皆称奉天靖难事迹，下略。所述，则顾虑事实，稍矜重矣。然仍谓“遣宦者四出，选女子充后宫，媚悦妇人，嬖幸者恣其所好，穷奢极侈，亵衣皆饰珠绣，荒淫酒色，昼夜无度，临朝之际，精神昏眩，百官奏事，唯唯而已。”举此以例他事，实录之矫诬亦何疑！

七月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

按黄佐革除遗事卷一同，盖本方孝孺御史府记“皇帝嗣位之初，即下明诏行寛政，赦有罪，蠲逋租巨万计，去事之妨民者”文。

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燕阴事。

按革除遗事同卷云，“以张昺为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周齐湘代岷五府相继煽动，故遣昺镇燕，”可与此互证。然录其事于建文元年二月，与此不同。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修太祖实录

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建文元年正月，纂修高皇帝实录，以王景彰充总

裁。自此历朝有成书，无刊本，凡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修撰编修检讨为具名，非尽其笔也。类载琐屑，重大或略之。大率列朝史官无定职，人主动定，邈不相及，政事行止，绝不与闻，惟历一君，追补实录，从前奏牍，分曹抽载，且辅臣兼领，则任情护短，不敢矫异。又分曹未必皆才，或得之传闻，莫睹其实，即据实而不悉其情，或夺乎众，或迫于势，或偏于私，或局于识，故法戒不足。即如国初：御制集载汪广洋有罪，遣人追斩其首，实录曰，汪广洋自缢死；如庚午诏书载廖永忠坐杨宪党伏诛，实录曰，永忠死，上赙遗甚厚，以子权袭爵；如御制集载朱亮祖父子死杖下，实录曰，病卒；如奸党录载李善长坐胡惟庸事逮狱，同其亲弟侄赴九府会审，实录曰，帝抚谕流涕，归乃自缢死，又实录十三年于李有赦罪温旨，若奸党录二十三年又有负恩恨语。后词臣钱谦益作实录辨误，景彰眼见事，尚未能画一也。”

按姜清姜氏秘史卷二：“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敕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景彰即王景为总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读学士高逊志为副总裁官。国子监博士王绅，陕西汉中府学教授胡子昭，齐府审理副杨士奇，江西崇仁县训导罗恢，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等为纂修官。”野获编卷一同，而云监修者则未之闻，史廖昇传亦同，而多一李贯。方孝孺传，“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王艮传，“预修太祖实录及类要、时政记诸书。”程通附传，叶惠仲以知县征修实录。据秘史程本立传，同纂修者，除修撰李贯外，又有礼部郎中夏止善，史官钱唐高让、卢陵吴勤、趙友士、端孝思、張秉彝、唐耕，编修吴溥、杨溥、杨子荣、刘观，侍书刘彦銘等。检史，则端孝思虽见周桢传，而不及修实录事，杨溥传不及修太祖实录事，杨子荣传不及初修太祖实录事，吴溥为与弼父，虽见与弼传及王艮传，皆不及修史事，殆皆以诸传所据原稿有所嫌避，史臣不复厝意补之耳。余并无传。周应宾旧京词林志卷四纪典下所考纂修诸人，尚有陈性善，而传亦不及，黄佐翰林记卷十二言纂修可考者亦有检讨陈性善。又翰林记，国子监博士作王缙，胡子昭作佥事，程本立作左佥都御使，

并与秘史不同。

二月更定内外大小官制。

罪惟录职官志：更制文职：建文中，升六部尚书正一品，设左右侍中各一人，正二品，位侍郎上。司官去清吏二字。改户部四司为民度支金帛仓庾，改刑部四司为详宪比议职门都官。工部增照磨所。兵部革典牧所，户部革赃罚库。罢左右都御史，设都御史副佥都各一人；复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止御史二十八人；寻改诸御史为拾遗补阙。改通政司为寺，通政司使为通政卿，通政参议为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各一人。改大理寺为司，卿为大理卿，改左右寺正为都评事，寺副为副都评事，司务为都典簿。改太常寺卿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增典礼郎二人，太祝一人，诸祠祭署，天坛改为南郊，泗州改为泗滨。宿州改为新丰，置钟山祠祭署及司圃所，增神乐观知观一人。改光禄寺卿为光禄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升少卿从四品，增司圃所，改司牲司为孳牲司，省署丞二人，增监事二人。改太仆寺卿为太仆卿，升五品，增录事典厩典牧二署，设驌騻王世真皇明异典述七作騊駼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隶二署滁阳等八牧监龙山等九十二群。增詹事府少卿府丞各一人，宾客二人，又置资德院，资德一人，资善二人，其属赞读赞书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国子监升监丞为堂上官，增司业为二人，省博士学正学录，增助教十七人。改鸿胪寺卿为鸿胪卿，分少卿寺丞为左右，品皆升一级，革司宾司仪二署，鸣赞序班各升品一级。增翰林院学士承旨一人，学士一人，文学博士二人，异典述作一人省侍读侍讲学士，置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设侍书，即中书舍人，文史馆设修撰编修检检讨，改孔目为典簿。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学士一人，罢文华武英文渊殿阁大学士，但设学士各一人，待诏无定员，文渊设典籍一人。革六科左右给事中。并行入司于鸿胪寺。改五城兵马司指挥副指挥为兵马副兵马。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启忠等十斋各训导二人，以锦衣卫带管武学教授。革左右布政使，设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升一级。改提刑按察司为十三道肃政廉访使。异典述作肃政按察司，与实录同。改广东

监课司为都转运监使司，又有煎监提举司。革儒学，惟河东有之，制如府。罢北平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及江北学校贡士。增设王官：宾辅二人，正三品，伴将伴读伴书各一人，长史一人，左右长史各一人，审理典膳奉祠良医典宝五正，革去正字，五副加官上；郡王宾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记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礼典馔典药五署官各一人，异典述前三署各一员，后二署各二员。典仪二人，引礼舍人一人，仪仗司吏目一人。宾辅三伴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更制武取略。

按罪惟录载建文时所更定之官制，与史职官志同，大抵皆本太宗实录卷十上吏礼二部所上文，然有为史职官志所未及者，故录之于此，以便参证。罪惟录惠宗纪谓“以寿州训导刘亨言，同方孝孺等大改官制”，而其事则书于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国榷卷十一又书于建文元年四月，亦与此书于元年二月者不同，要之非一时事，姑阙疑焉。

三月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

按此事朱睦㮮革除逸史卷一列于二月，文作“分遣右都御史景按：应作暴昭，侍郎夏原吉，给事中徐思勉等凡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巡行天下。”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

按革除逸史同卷言“荆州告变，谓湘王柏私造宝钞，残虐杀人，”解缙湘献王神道碑则言“建文君信谗者，诬之以罪”云。

七月参政郭资、副使墨麟、佥事吕震等降于燕。

按史郭资传，资官北平左布政使，与左参政孙榆，按察司副使墨麟，佥事吕震率先降，此略孙榆而称资为参政，当误。

九月壬辰，吴高、耿王献 、杨文帅辽东兵，围永平。戊寅，景隆兵次河间，燕兵援永平，吴高退保山海关。

按戊寅在壬辰前十五日，高于戊寅败于永平，则围永平又当在戊寅前，成祖纪一及实录皆系高之围永平于九月戊辰朔，而系高之退保山海关于壬辰是也，此误。

十一月燕王棣再上书于朝。帝为罢齐泰、黄子澄官。

按燕王上惠帝书，并载燕王令旨、姜清秘史、奉天靖难记，太宗实录卷四亦载之。惟令旨、秘史所载，肆言斥责，不臣之意显然，靖难记虽加删润，与原文尚未甚远，至实录则但以八事自辨，而不复以太祖之死故入惠帝罪，语气温顺，若出两人，靖难史实之愈后愈失其真类如是。

二年二月，燕兵陷蔚州，进攻大同。

按成祖纪一云，二年春正月丙寅克蔚州，丙寅为二十一日，太宗实录卷五但书正月而不书日，惟于二月丁酉云，“命蔚州卫指挥同知王忠，率其精锐军随攻大同，”丁酉为二月初二日，则此云“二月燕兵陷蔚州，进攻大同，”殆因进攻大同而牵连记及正月蔚州之陷耳。

甲子，复以都察院为御史府。

方孝孺御史府记：“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诏若曰：顷以诉状繁，易御史台号都察院，与刑部分治庶狱；今赖宗庙神灵，断狱颇简，其更都院，仍汉制为御史府，专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省御史员，定为二十八人，务为忠厚以底治平。”

均江、浙田赋。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

按赵士喆建文年谱书此事于二年三月云，史仲彬请均江浙赋役，从之，下引致身录云：“时建文帝正值更制，彬乃上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赋役不均，非所以为治。江浙赋重，而苏松嘉湖又以籍入沈万三松江史有为嘉兴黄旭苏州纪定湖州准租起税，此以绳一时之顽，岂得据为定则！乞悉减免以苏民困。窃照各处起科，亩不过斗，即使江南地饶，亦何得倍之，乃有重至石余者！臣往年面奏先帝，赋敛太重，蒙旨嘉劳，特以臣苏人，而史有为又臣之族属也，恐坐以私，未敢尽言。幸逢皇上明圣，每事从宽，敢竭悉忠，伏乞采择。疏上，诏可，苏松准各处起科，苏松人仍官户部。”致身录系伪书，不足信，说详下。

然均江、浙田赋，当为建文新政之一，特传之史仲彬，转令实事为虚事耳。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赐胡广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革除遗事卷一："赐礼部进士胡广等一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广对策有'亲藩陸梁，人心不摇'等语，上亲擢为第一而赐名靖。"

何焯困学纪闻注："明无制科，以一甲三人为荣选，状元八十六人，入相者自胡广至魏藻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杨荣至傅冠凡三十人。"

秋八月癸巳，承天门灾，诏求直言。

按补本直言下，多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前门为路门二十九字。然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及改各门名，乃在九月壬戌朔承天门新成后，见革除逸史卷一，补本书于八月癸巳承天门灾后，不当。

三年三月癸巳，贬齐泰、黄子澄，谕燕罢兵。

按补本作窜齐泰、黄子澄，密令募兵于外，谕燕罢兵。又按实录，是年闰三月为庚寅朔，则癸巳为闰三月初四日，此系于三月误。

闰三月棣上书请召还诸将息兵

按书载实录卷七，文长不录，录逸史卷二节文于此："比闻臣泰子澄皆已窜逐，臣家长少，皆欣喜有更生之望！即以此意遍告将士，将士曰，诚所愿见，但虑非诚心而奸臣为退避之计以缓我耳。如出诚心，则盛庸吴杰之众当悉召还，而犹聚境上侵迫不已，则是奸臣之身虽退，而其计实行也。臣思其言，恐亦或然。夫圣人感人，至诚而已，至诚可孚豚鱼，而况人乎！陛下推诚待下，谁不说从？若徒示以去奸臣之名而实用其计，非独撤陛下之藩篱，将遂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览甚明，此不特智者而后知也。"

四年正月燕兵陷沛县，知县颜伯玮、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死之。

按革除遗事同卷颜伯玮作顔瑰，伯玮当为瓌字。又补本作燕兵陷萧、沛，沛县知县颜伯玮、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萧县知县郑恕死之。

四月庚辰，诸将及燕兵大战于灵壁，败绩，陈晖、平安、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卿彭与明皆被执。

按灵璧败绩，平安等被执，实录卷八及史平安传皆在辛巳。陈晖恐即与西番传洪武十二年守洮州卫之指挥同一人，见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卷五。大理寺卿彭与明，实录卿作丞，陈性善传作大理右丞。又补本败绩下多：指挥宋暄力战死七字。

五月壬寅，诏天下勤王。

国榷卷十二："诏曰：'燕祸日深，旦夕犯阙，中外臣民文武吏士，宜克日勤王，不忘尔报。'诏下，臣民闻之，无不恸哭。"

六月乙丑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补本："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

太宗实录卷九："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略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按纪上云："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下即云："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语不衔接。考建文纪为徐嘉炎稿，嘉炎用逊国事，朱彝尊等不以为然。彝尊明史提纲跋云："明史开局，监修总裁诸公以建文帝本纪书法下问，余以宫中火帝崩对，按即用实录说同馆徐胜力固争，当从逊国群书具述其事，遂任编纂，纪成，诸公终未以为然也。"可知嘉炎原稿，初以逊国为主，后乃依违于崩亡两说，改削不净，因留此语病耳。傅维鳞明书建文皇帝本纪云："上入宫，忽火发，皇后马氏暴崩，程济奉上变僧服遁去。燕王遂入宫，杀宫人女官内官略尽，惟得罪上者独留，因指烬中后骨以为上，燕王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用翰林侍讲王景议，以王礼葬之。"亦用逊国之说，而以火中之尸为后尸，与补本同。补本即库本，其殿本库本前后不同之故，则近人孟森有说，尝撰万季野明史稿辩诬一文发之，可参阅。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王鏊震泽纪闻："太宗师至城下，建文阙宫自燔死，或传实自火逃出，或传蜀府兵来赴难，窃载以去，竟莫得其实。永乐中，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访张仙为名，实为建文也，终莫知所之。至正统间，有御史出巡，忽一僧当道立，从者呵之不避，问之，乃献诗云云，询之，云吾建文也，御史奏之朝，诏廷臣询，亦不察虚实，后卒于狱中云。诗曰：流落江南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万历二年十月实录："上御文华殿讲读。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辅臣張居正对言，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云游在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吾欲归骨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莫知其终。上因命居正诵其诗之全章，慨然兴叹，又命书写进览云云。"

罪惟录惠宗纪论："帝以仁柔，海内欲不忘之，遂有逊荒之说，说历久益增，至史仲彬致身录，诸凿:实所疑，如或亲见之者，观 吴文定仲彬墓志，全不及此，一伪皆伪也。且太宗亦正欲以不死慰天下之心，当时实录具载出亡二字，安帝隐也。正统五年，遂有僧自云南至广西，称建文天子，事泄，逮京师会审，供云俗姓名杨行祥，然则所谓杨应能者，行祥所借也。行祥以洪武十七年度为僧，簿对确，毙狱，本末燎然。略英庙释建庶人，有云'悯兹遗孤，特加宽宥，'让皇而在，自宜倍加优典，胡绝不一闻之！总之行祥敢于冒引，实本前疑，而实录不载行祥事，曰以成前为实录之心也。又据天子礼葬，初必有其处，易代以出亡二字荒忽之，岂帝出亡，皇后埋骨壤土，亦遂不可问乎！存者其名，没者其实，必尔尔也。考出亡踪迹，见诸稗乘者二十五六而止，而情事各异，安得以各异者画为一定欤！至于胡濙郑和之传，益见附会，果匿亡王，何尚密访？以靖难声灵□□天下谁曰不可，即何顾忌而出此！且也子宁血书成王安在，何

不云彼自逊荒？或云葬西山，不封不树，何不考帝礼葬原处，与皇后合兆，为恪遵太宗初制之洽于礼？”

罪惟录陵志：“惠宗在焚，成祖指其尸而哭，用王景议发丧，以天子礼葬之，遂不传其处，意速朽之也。至正统中，杨行祥伪败，无有以让皇葬处明质者，知礼葬二字，犹具文无实耳。于是老佛西内之说，以渐而增，或云老西内，不知所终；或云葬西山，不封不树；又云葬处有碑，大书天下大法师之墓，诸不足据。”

按成祖疑惠帝出亡，并见史姚广孝、胡濙、郑和、牛景先诸传，惟方孝孺传直云惠帝自焚，亦史臣各据所见书之，未经整齐故也。自郑晓建文逊国记明言惠帝出亡事，诸书多信之，赵士喆撰建文年谱，邵远平撰建文帝后纪，戒山文存皆记惠帝出亡后事。然当时沈德符已不信致身录、传信录等书，其言曰：“少帝之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当时倘令故臣随行，必立见败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此时苏、嘉二府逼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又赓和篇什，徜徉山水，无一讥察者。况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永乐五年至丙申，十四年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毕至，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朝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真可骇恨！盖此段大谎，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衍而成，若流传于世，误后学不小。又传信录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此语尤可诧，盖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会之耳。乃不自揆，僭称传信，此与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异，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见野获编卷一盖以

为出亡之说可信，出亡诸书不可信。而力辨致身录为伪书之钱谦益，其序建文年谱，则曰“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涂以安之也。药灯之诅咒，剃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夷而典僧录，其释然于博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似又为惠帝力辨出亡数十年不遭踪迹之疑，与德符之坚辟出亡诸书固异矣。可参阅拙著古今伪书考补政致身录条。又孟森知从亡日记致身录之伪，但据史姚广孝、胡濙传及钱谦益建文年谱序，仍以建文逊国之说为可凭，而不信王鸿绪史例议力主自焚之说，有建文逊国事考一文，载北平图书馆刊五卷六号，今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中，亦可参阅。余以为惠帝或死或出亡，既皆无可凭之得证，则不妨两存其说；然其出亡后踪迹，决无如诸书凿凿可记之理，且以成祖之猜狠，亦绝不能有包容惠帝潜身终老之事，谦益从中调停，殊属牵强！而不信地道可出之潘柽章，则又曰“意是时成祖屯兵金川，遣人奉章，见長陵碑文实欲使惠宗自为计，而京师辽阔，东南一隅，燕师势难遍及，仓卒潜行，谁为物色之者，而又何必假途隧中也？况惠宗是日尚能手诛徐增寿于左顺门，则非坐困宫中可知。若夫出亡之实，则其事秘，吾不得而知之矣。必欲从二百载后，而一一指其同谋何人，寄迹何地，非愚则诬，阙疑焉可也。”国史考异卷四谓惠帝出亡之实可阙疑是也，谓成祖预示惠帝自为计，亦与谦益调停之说等耳。

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

按事见正统五年十一月实录，而薛应旂宪章录则改杨行祥为 杨应能，改正统五年为十二年，并附会诸书吴诚识之之说以实其事，不足信。盖惠帝以洪武十年生，至正统五年，不过六十四，即至十二年，亦不过七十一，故改为杨应能，以别于九十余之老僧杨行祥。建文旧臣杨荣卒于正统五年，其时杨士奇、杨溥尚在，识惠帝者亦不应吴诚一人，故改为十二年，则二杨亦卒，吴诚独识

之疑可以袪矣。此应旗之有意作伪也。

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

按庙谥之请，始于弘治中礼部主事杨循吉，而终于崇祯末驸马都尉巩永固，可参阅弘治十二年四月实录，及孙承泽山书卷十六崇祯十五年十月给事中沈胤培疏。

三、晁中辰·明成祖传（节选）

踪迹建文帝

明成祖入金川门后，建文帝是否死于火中，这一直是明成祖的一块大心病。他派心腹大臣四出，不余余力地寻找建文下落。永乐年间不少重大举措与此事有关。此后数百年间，有关建文帝的传说越来越多，学者们也作出了种种努力，试图揭开这桩疑案的真相。

（一）建文帝死于火了吗？

《明史·恭闵帝本纪》载，燕王入金川门的当天，“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几乎都能一字不错地背下这句话。明史馆始创于清顺治二年（1645），《明史》于乾隆四年（1739）刊行，此时距明成祖入金川门已 300 多年。《明史》中的这句话模棱两可，实际上它正是建文下落不明的反映。据我国著名的明史学者黄云眉先生考证，《恭闵帝本纪》出自徐嘉炎之手，而徐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清前期的著名学者朱彝尊也在明史馆，他则认为已死于火，就像《明实录》中所记载的那样。自明代嘉、万以后，社会上流传许多有关建文逊国的野史笔记。所谓“逊国”，即让位给明成祖而自己出走的意思，也就是说建文帝没有死。修《明史》的诸

学者意见不能统一，遂依违于二说之间，留下了这句模棱两可的话。这句话又给后来的学者留下疑点，吸引着许多人殚精竭虑地要寻个究竟。黄云眉先生考证《明史》可谓用力最著，成就也最大，但他考来考去，最后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表示："不妨两存其说。"

今天，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已经有可能再前进一步。这不仅因为今天的条件更优越，即可以更方便地看到各种文献，而且因为我们可以摆脱过去学者所受到的一些局限，尤其是明清时期，学者们持什么看法，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已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影响。

据《明实录》记载，燕王率兵入金川门后，建文帝"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8天后，明成祖"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以后明代官书都沿用此说。

据《明史·王景传》载，明成祖询问礼部侍郎王景，葬建文帝应该用什么礼仪。王景说："宜用天子礼。"明成祖"从之"。朱彝尊认为，明成祖不会用天子礼仪安葬建文帝。实际上，只要想一下就会发现，明成祖礼葬建文帝是完全可信的。这是因为，在全国百姓的心目中，建文帝是合法的正统的真龙天子，他如果不死，皇位就应该是他的。明成祖要名正言顺地即帝位，就必须给全国造成建文帝已死的印像。不管火中的尸体是谁，反正已经烧焦，无法辨识，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辨识，就指为建文帝的尸体，并用天子礼仪安葬一下，正可以遮天下人耳目。这样做，与明成祖起兵"诛奸恶"的旗号相一致，本来不是要推翻建文帝，他自焚死，便依礼安葬他，天下臣民对明成祖便无可指责。这样做，明成祖登极称帝才名正言顺。既然建文帝已死，国不可一日无君，明成祖这才能即帝位。

对这一点，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也看出了其中奥妙。他说："必以置陵守冢为用天子礼，则未必然。但葬时稍用天子仪仗，以震都人耳目，为绝天下人望之计，与出其尸于火，意正一贯，不必甚以为难信也。"也就是说，明成祖礼葬建文帝是可信的，只是"稍用天子仪仗"，在形式上使用皇帝的旗

帜、车驾、乐队等等，而不一定要“置陵守冢”，就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北京十三陵那样。

但明成祖礼葬的真是建文帝吗？从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安葬的不是建文帝，而是建文帝的皇后马氏。她是光禄少卿马全之女，洪武二十八年被册为皇太孙妃。《明史》明确记载道：“（建文）四年六月，城陷，崩于火。”死于火中的不是建文帝，而是马氏，但各种材料都看不到安葬马氏的记载，且尸体取之于火中，明成祖正可以指为建文帝之尸，接着便“稍以天子仪仗”将其安葬完事。纵观各方面的材料可以断定，建文帝确已出逃。这至少有以下一些证据：

第一，尽管明成祖“用天子礼”安葬了建文帝，但南京却没有建文帝的坟墓。《国榷》的作者谈迁是明末人，他记道：“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这是本朝人在记本朝事，相距还不算甚远。此时就已指不出建文陵墓，足见当时安葬虽“用天子礼”，但封冢肯定不大，时间稍久，人们就不能辨识。更重要的是，因明知安葬的不是建文帝，史牒中未予明确记载，太常寺不按时祭扫，时间用不了多久，坟迹就湮没无闻了。

第二，建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文奎，建文元年立为皇太子。次子文圭，被明成祖幽禁于广安宫，即历史上常常提到的建庶人。后来，明英宗将文圭释放，年已 57 岁了，不久即死去。那么，皇太子文奎哪里去了呢？据《明史》记载：“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看来是逃跑了。既然 7 岁的太子在这次事变中逃跑在外，建文帝也可以逃往外地。

第三，有一天明成祖对左右的人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明实录》中的这条材料为历代学者所忽略，实际上是一条很关键的材料。宝玺是封建皇帝发布诏令时所用的印章，被视为传国之宝。《明实录》无意中保留了这句话，却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建文帝所使用的宝玺和建文帝一起消失了。此事是很耐人寻味的。

自秦朝到唐朝的千余年间，都使用由和氏璧琢成的玉玺，上有李斯的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唐高祖李渊改“玺”为“宝”，所以后世又称宝玺。

据传，这颗传世之宝散失于五代时。明朝时又出现了另一种传说，即元顺帝北走沙漠时，带到了塞外。看来，和建文帝一起消失的不是这颗宝玺。那么，这颗宝玺要么是明太祖朱元璋琢制的那一颗，要么是建文帝琢制的那一颗。建文三年，使者由西域带回一块颇大的青玉，建文帝命琢制为玺，一改八字之古制，琢上16字："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颁用此玺时，礼仪还搞得颇为隆重。大概是受宝玺丢失这件事的影响，弘治十三年（1500），陕西鄠县人献上一颗伪玺，玺文也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字。但弘治帝弃置未用。

不论随建文帝一起消失的是哪一颗宝玺，对新继任的皇帝都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如果死在火中的是建文帝，即使宝玺有所损坏，也绝不至于无影无踪，至少应有残骸在建文帝身边。明成祖也像指建文帝死于火一样，谓"有言"宝玺毁于火，谁也未亲见。由此可以看出，建文帝在逃跑时也带走了宝玺。更何况，即使建文帝真的投火自焚，他也没必要带着宝玺去自焚。相反，建文帝逃跑在外则要带上宝玺，这样，他既是正统的合法的皇帝，又有着皇帝合法的印玺，号令群众就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因此可以说，这条不起眼的材料恰恰是建文帝未死于火的有力证据。

第四，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燕军虽然进入京师，但建文帝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要说江南基本上还是建文帝的地盘，即就江北而言，明成祖实际上所控制的地盘也不很多。当时，整个辽东还在朝廷控制之下，孙岳还控制着中都凤阳，铁铉仍控制着山东一带，驸马梅殷"尚拥兵淮上"。因此，当时建文帝可以调动的兵力仍然很多，没有必要投火自焚。他完全可以逃往外地，再图兴复。唐代发生"安史之乱"时，安禄山攻占了京师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后来终于平息了叛乱，唐室再兴。建文帝不会不知道这段历史。因此可以说，当时建文帝并没到非死不可的地步。

人们看到，明成祖进入南京后，建文遗臣除大量逃跑以外，有那么多人抗节不屈，有那么多人受株连，死得是那么惨烈，但很少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对建文帝那么忠心？其中除一部分人确有气节以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自对建文帝抱有幻想。他们知道建文帝已逃亡在外，还有可能复位，这成了他们不愿屈节归附明成祖的一种动力。

要知道，这时并不是臣下显示气节的最佳时刻，因为它并不是改朝换代，依旧是大明江山，依旧是朱元璋的后人当皇帝，只不过是由朱元璋的儿子当还是孙子当的问题，而他们实际上都有资格继承皇位。奇怪的是，这时旧臣所表现的气节比改朝换代时表现出的气节还要壮烈。李自成进京时，“文臣、阁部、词林、卿寺、台省以及郎署，自裁者仅二十人，竟无一人骂贼而死。”汉族士大夫称清是异族入主，该是显示气节的最佳时刻了吧，但也赶不上明成祖即位后那样惨烈，那样规模大。稍有些明清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明朝旧臣没有多少人因拒绝降清而被杀。在著名的清初“文字狱”中，株连最多的大概就是庄廷鑨的“明史狱”了，株连被杀者才 70 余人，数百人充军边疆。而方孝孺一案牵连被杀者即达 873 人、谪戍边疆者“不可胜计”，至少比被杀的要多。其他建文旧臣受株连被杀数百人者有好几起。这显然是清初所无法比拟的。还不能不使人想到，建文旧臣中显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建文帝抱有复位的幻想。这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建文帝并没有死于火。

第五，姚广孝在临死前，请求明成祖释放了僧人溥洽。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他因知道建文帝逃跑一事而被禁系了 16 年。《明史 • 姚广孝传》载：

（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治系久，愿赦之。”溥治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治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明末清初的大文人钱谦益在《初学集》中有过考辨，建文帝出逃时剃发为僧，即出自溥洽之手。这件事有力地告诉人们，明成祖心里很明白，建文帝已逃亡在外。

正因为如此，明成祖派出心腹大臣四出查访建文下落。这事情本身就表明，

建文帝的确没有死于火。

（二）寻找建文下落

建文帝是怎么逃出去的，逃到了什么地方，不只是当时的人很关心，后世人也常常提及此事，并产生了许多颇为神秘的说法。明清时期的许多野史笔记对此都有所记载，其中最系统的大概就是《明史纪事本末》中的《建文逊国》那一篇了。其他诸书，例如《吾学编》《明朝小史》《明高僧传》中的一些记载，都与《建文逊国》所记大同小异。

据记载，金川门失守后，建文帝长吁短叹，打算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逃。"少监王钺跪秉道："太祖驾崩时留下个铁箧，说有大难时打开，现放在奉先殿左边。"身边大臣急忙拿来铁箧，不只是裹着铁皮，两把锁也灌上了铁。建文帝急忙让人到大内点了把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打碎铁箧，里边有度牒 3 张，分别叫应文、应能、应贤，有剃刀一把，白银 10 锭，还有僧人穿的袈裟和鞋帽，里边还写着逃出的路线。程济随后为建文帝剃了发，杨应能愿剃发随行。监察御史叶希贤以自己名字中有"贤"字，认为"应贤无疑"，也剃了发。当时身边的五六十人都愿随行，建文帝以人多目标大、行动不便为由，让大家"宜各从便"，自己身边只带 9 个人逃去。神乐观道士王升用小船将建文帝接出。接着杨应能、叶希贤等 13 人赶来。此后，建文帝身边只留四五人做护卫，其余的人"遥为应援"。于是他们便忽南忽北，往来名胜，浪迹江湖，在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传说和故事。直到现代，云南"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者"。

建文帝在云贵一带留下的遗迹和传说较多，不少书还记录了一些建文帝的诗文。这些诗文有一些属后人假托，但有一些颇合建文帝的身份，似不像假冒。其中常为人所提到的是《罗永庵随笔》两首。这是建文帝避居贵州金竺（今贵州广顺）罗永庵时所作。其中一首是：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像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另一首是：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龙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

《建文逊国》对建文帝什么时间到了什么地方，由什么人跟随，记载得就像旅行日志，其可信程度已难以详考。有些内容肯定出自某些人的附会和传闻。例如建文帝由南京外逃时，说明太祖留下个铁箧，有的书还说成是明初大奇人刘基的主意，颇有神秘色彩，显然是后人附会。最关心这件事的应该说还是明成祖。他心里很明白，只要建文帝仍活在世上，他就是一面很神圣的旗帜，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随时都可以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威胁。因此，他派心腹大臣四出，有的是明言出使，借机访察，有的则扮成普通百姓，秘密寻找建文下落。这正像有的史书中所说；

文皇（明成祖）初，以逊国伏戎为虑，以故轺车四出，几于“上穷碧落下黄泉”矣。

私访建文帝最著名的大概就是胡濙了。在明成祖在位的20余年间，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四处寻访建文帝。《明史胡濙传》载：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明成祖）疑之。（永乐）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

所谓“颁御制诸书”，“访仙人张邋遢”，都不过是名义，他的主要任务和真正目的就是“隐察建文帝安在”。

这里提到的张邋遢是个奇人。他原籍辽东懿州（属今辽宁黑山县），名全一，又名君实，号三丰。因为他不修边副，所以人称张邋遢。他身材修长，龟形鹤背，大耳圆目，胡须根根如针。不论寒冬盛夏，随身只有一件破衲衣和一领蓑衣。读书过目不忘，善戏谑，旁若无人，有人说他能一日千里，行无定处。其形像就像家喻户晓的济公一样。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经访察过他，未访察到。明成祖这时让胡濙去访，也是“积数年不遇”，也许一开始就没准备遇上，因为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访察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实际上也有察访建文帝的用意。《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就是说，明成祖怀疑建文帝逃往海外，所以让郑和出使海外诸国时暗中访察。仔细检索一下史籍就会发现，在郑和的使团中也有锦衣卫人员。锦衣卫和东厂、西厂都是明代的特务机构。这些人跟随郑和出使，显然有暗中察访建文帝的用意。这种情况在《明实录》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宣德元年六月）锦衣卫杜子忠等四人，永乐中从太监郑和使西洋，至锡兰，四人被掠。今自苏门答腊国附朝贡舡来归。

这条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郑和使团中确实有锦衣卫特务跟随。这不仅是察访建文帝的一个有力证据，而且也是建文帝确实逃亡在外的一个有力证据。

明中期人郑晓也看破了这一点。他写道：

成祖西洋之舟发，不亦劳乎！郑和之泛海也，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云尔。

这里的所谓“大疑”，就是指建文帝逃亡在外一事。

若干年以来，研究郑和下西洋成为学术上的一个热点，有关著作和论文陆续不断，但人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史实，即明成祖为什么要用郑和这样一些宦官充任使臣。郑和的副手王景宏也是宦官，出使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尼八剌（今尼泊尔）和中印度等地的侯显也是宦官，《明史》上说他“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出使蒙古诸部的是宦官海童，出使西域（今中亚

一带）的主要是宦官李达。人们大都知道陈诚出使西域，是因为他留下了《使西域记》这本书，实际上他多次充当李达的副使，而正使是宦官李达。

一般说来，用宦官为使臣出使外国并不适宜，因为宦官被人们认为是“刑余小人”。那么，明成祖总是用宦官为使臣出使外国，难道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胜任，就没有别的人才了吗？显然不是，而是明成祖有其他考虑。不难想像，建文帝对待宦官严厉，他们纷纷逃归明成祖，透露建文帝宫中虚实，帮助明成祖夺得帝位。这些宦官不像士大夫那样讲究忠义，明成祖认为他们最为可靠，所以就让他们为使臣，“轺车四出”，暗中担负着访察建文帝的任务。如果不是有这种特殊任务的话，明成祖完全可以派文臣充任使节，而不必大量地使用这些宦官。

甚至老百姓中也有人告发这种事的，说建文帝藏在了谁家谁家。例如，“浦江义门郑氏厅中”，有建文帝亲书的“孝友堂”三字。建文逊国后，有人向朝廷告发，说建文帝藏在此家。明成祖“遣使廉之”，到这家搜查了一番，“及发柜，惟见经史。”没找到建文帝。明成祖听说后大怒，“乃斩诬者”。告发者虽以诬告罪被斩，但明成祖毕竟派人去搜查了。这事表明，明成祖知道建文帝逃亡在外。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必要派人去搜查了。同时也表明，当时下层人士也知道建文帝逃亡在外。这人以诬告罪被杀，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他触及了明成祖的痛处，明成祖本来说建文帝已死于火了，怎么还说他躲藏在谁家呢！岂不是扰乱民心！看来这人被杀是必然的了。

明成祖直到临死前一年才对此事放下心来。永乐二十一年（1423），胡濙由外地回朝，“驰谒帝（明成祖）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因为这是明成祖的心腹大事，所以尽管已经睡下了，还是起来接见胡濙，并谈到“四鼓乃出”。至于疑虑是怎么消失的，后人已不得其详，但肯定是得到了建文帝不会再为患的确切消息。另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是，郑和连续 6 次下西洋以后，明成祖从此就再也没有让他出使。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在宣德年间进行的。这不应被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与不必再访察建文帝有着内在的联系。

近人在考察建文帝下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文汇报》编辑徐作生原是学历史出身，他利用记者的方便条件，曾去南京寻访建文帝遗迹，后又赴北京多方考证。后来，徐作生数次去江苏吴县鼋山和穹窿山一带进行实地勘访，在此找到了建文帝出亡的遗迹、遗物，例如雕龙柱础、御池、御池桥、神道、方台等。他以文献材料结合自己实地勘访的结果，连续写成两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赞同。他经过 7 年的努力得出结论：当年建文帝出亡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帝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直至 1423 年（永乐二十年）病死于此，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作者的结论与胡濙向明成祖的回报恰相吻合。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建文帝没有死于火，而是逃亡在外了。

（三）关于建文疑案

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成为一桩历史疑案。这个问题不仅长期困扰着明成祖，而且困扰了后来的数代皇帝，并成为后代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人说建文帝已死于火，有的说他逃亡在外，有的人还冒充建文帝，再加上文人好异，加以附会渲染，更令人真假难辨。

有一种说法流传较广，直到嘉靖、万历年间还常常为人所提及，并笔之于书。郑晓在《吾学编》和《今言》中有五六处提到此事。据郑晓的记载，正统七年（1442），有一个僧人来到田州（今广西田阳）土官官府，自称是建文皇帝，说自己从四川到云南，又来到广西，因年纪已老，希望能把骸骨埋在祖墓旁边。官员们一听大惊，立即上报朝廷，并把他送往京师，宫中的人称他为“老佛”。朝廷大臣连连上疏，怀疑他是假冒，故意惑众。因老宦官吴亮侍奉过建文帝，英宗便命吴亮前去见一下这个僧人，看是真是假。一见面，那个僧人就说：“你不是吴亮吗？”吴亮故意说：“不是。”僧人说：“我往日御便殿，

你进饭食，吃的是子鹅。我扔到地下一片鹅肉，你的手还提着一只壶，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下把那块肉吃了，怎么说你不是吴亮呢！”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以后自经而死。英宗知道后，把僧人迎到西内，老死宫中，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这个传说并不完全是凭空编造，而是由杨行祥冒充一事敷行而成。仔细翻检一下《明实录》就会看到，在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丁巳”：

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绐人曰：“我建文也。张天师言我有四十年苦！今为僧期满，宜亟还邦国。”以黄纸为书，命其徒清进持诣思恩府（今广西武鸣）土官。知府岑瑛执送总兵官。柳溥械至京，会官鞫之，乃言其姓名为杨行祥，河南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历游两京、云南、贵州至广西。上命锦衣卫锢禁之，凡四逾月，死狱中。其同谋僧十二人俱谪戍辽东边卫。

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1377），至正统五年（1440）为64岁，杨行祥年已90余，自然容易被识破。有的书记为杨应祥，有的书记为杨应能，实际上都本于这一件事。更何况，建文帝既然逃跑在外，他绝不会再回来自投罗网。对照《明实录》中上面的这条记载，有关这类的传说自然不攻自破。

还有一种说法，严震直是建文时的工部尚书，明成祖即位后仍命他为工部尚书，奉使去安南，“见建文君，悲怆不食，吞金而死。”这个传说纯系编造。《明实录》中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工部尚书严震直卒。”但他并未死于安南，而是死于山西泽州（今晋城）。这在《明史》中有明确记载：“成祖即位，召见，命以故官巡视山西。至泽州，病卒。”严震直刚到山西就病死于泽州，根本没到安南。

这些传说虽不可信，但它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士人大都同情建文帝，直到明中期，士大夫还不断编造出一些有关建文帝疑踪的传说。

有许多建文遗臣逃散各地，他们变换姓名，隐居僻乡，操各种不同的职业，不时还吟诗怀旧，更为建文疑踪增添了神秘色彩。其中流传较广的是关于河西佣、补锅匠和云门僧等人的传说。

所说的河西佣不知是何许人。建文四年冬天，他便开始在金城（今甘肃皋兰）行乞，后到河西鲁家为佣工，故被称为河西佣。他整天穿一件破葛衣，后以工值 买了件羊皮袄，但仍要把旧葛衣套在外面。干活累了，有时还吟诗，夜里还不时啼哭。临死时嘱咐他的主人，不要埋葬他的尸骨，火焚后，等西北风起将骨灰扬掉即可。主人从其言。

补锅匠以补锅为业，经常往来于夔州和重庆一带，当地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称他为老补锅。不论到哪个地方，不过三天就离去。常宿寺庙，遇阴雨天即买酒自饮。有一天，在夔州他突然遇到一个人，相顾愕然，接着相抱痛哭，入山中密语一天，后离去。补锅匠还能写古诗，诗后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后不知所终。

云门僧隐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经常泛舟赋诗，回来就烧掉。还有个被称为东湖樵夫的人，以卖柴为生，卖柴时“口不二价”。闲暇时用草棒在地上写诗，写好后就用沙士乱其字迹。有人突然从后边抱住他，看他写的是什么内容，“皆孤臣去国之词”。

有关这类人的记载还有很多，其真实姓名难以详考，说他们是建文遗臣则大体可信。这些人的行踪不时唤起人们对建文帝的回忆，后来的士大夫也不断将这类事笔之于书。值得注意的是，后人的有关记载大都受到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未免有些曲笔。

永乐年间，士大夫中几没有敢言建文出亡一事者。官书所记，都是沿用建文死于火之说。当时的人本来知情，但碍于“国初杀气浑不除，越三十年还相屠”，人人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越是知情人越不敢言。

明中期以后，文网渐疏，此事已过去久远，统治者已没有建文或他的子孙复辟的担心，所以士大夫中谈建文事的人多了起来。自正德以后，甚至不时有大臣上书，请对建文帝后人加封，为建文帝加庙号、谥号，经部议，未能实行。也就在这时，记载建文出亡一事的书陆续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史仲彬的《致身录》。万历年间，科臣欧阳调律将此书献于朝，谓得之于茅山道士之手。书

中记建文帝出亡经过，作者史仲彬亲自随行，是跟随建文帝逃亡的22人之一。书前有焦竑的序，书后还有他儿子史晟的后记。此书流传至今，当时士大夫一时相信得很多。当时一些著名的文人大都持建文出亡一说，例如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郑晓在《吾学编和《今言》中都持此说。

这种情况在清前期为之一变，尤其是在清初，否认建文出亡一说者成为主流。像朱彝尊、王鸿绪等大文士都持此说。就连一直主张建文出亡一说的钱谦益也连连撰文，力辨《致身录》之伪，找出十条理由，证明它是后出的伪作。《明史》成书于清前期，也以史仲彬“实未尝为侍书”为由，谓《致身录》为晚出，“附会不足信”。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因为建文出亡一事与朱三太子案颇为相似。清初不时有人冒充朱三太子，以崇祯帝太子的身分密谋反清，给清初统治者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人们如果谈论建文出亡一事，就颇有借古喻今之嫌。人们为迎合清初统治者的心意，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就说建文出亡一事为伪撰。

这种局面到清中叶才有所变化。这时明朝灭亡已久，人们对朱三太子案一事早已淡忘，清朝的统治已稳固，人们才又敢于谈建文出亡一事。著名史学家赵翼就写过有关建文帝的诗，例如《金川门怀古》中即写道：“从亡芒履千山险，骈僇欧刀十族空。”“一领袈裟宵出窦，九江绮纨夜翻城。”从诗中可以看出，赵翼是相信建文出亡一说的。从士大夫的态度来看，大都同情建文帝，对明成祖多有微词。《儒林外史》的作者借邹吉甫的话说道：“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话虽说得褊狭，但却反映了一般士大夫的倾向。

四、王熹·建文帝·永乐帝（节选）

建文帝疑踪与朱棣所为

《明史·恭闵帝本纪》记载燕王入金川门的当天，“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这两句模棱两可前后自相矛盾的记载说明，建文帝是死是亡下落不明。而且人们大都认为死于火中的不是建文帝，而是皇后马氏。那么，建文帝究竟哪里去了呢？这事情便成为历史上永远无法弄清楚的疑案。

黄云眉先生考证《明史》可谓用力最著，成就也最大，但他考来考去，最后不得不发出“不妨两存其说”的感慨。晁中辰先生著《明成祖传）中，对各种材料进行勘比考证后认为，建文帝确已出逃。商传先生在《永乐皇帝）中描述说：“从许多历史迹像来看，建文帝虽然不像《致身录》所说那样流落西南，又自陈入宫，死葬西山，但他确实在京师城破时，乘乱出走了。”

建文帝是怎样逃走的，逃到了何处，不只朱棣与当时人很关心，后世人也常常提及此事，并由此演绎成为许多神秘的传说。明清时期的许多野史笔记对此均有所记载，《从亡随笔》和《致身录》被谷应泰集其大成，专作为《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一卷，可谓最系统。其他诸如《吾学编》《明朝小史》《明高僧传》中的许多记载，均与《建文逊国》所述大同小异。

金川门失守时，建文帝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长吁短叹，准备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逃”。少监王钺说：“太祖驾崩时留下个铁箧，说遇大难时打开，现存放在奉先殿左边。”随待左右的大臣急忙抬来铁箧，不只是外面里着铁皮，两把大锁也灌上了铁。建文帝急忙让人到大内点了把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敲碎铁箧，里面有度牒3张，分别叫应文、应能、应贤，有剃刀，白金10锭，更有僧人穿的袈裟、鞋帽，还有一张出逃路线图。程济随后为建文帝剃了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剃发随行。监察御史叶希贤以自己名字中有“贤”字，认为“应贤无疑”，也剃了发。当时随待在殿的五六十人都

愿随行，建文帝以“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为由，令众人“宜各从便”，身边只带9人逃去。神乐观道士王昇用小船将建文帝接出。接着杨应能、叶希贤等13人赶来。此后，建文帝身边仅留四五人做护卫，其余的人“遥为应授”。于是他们忽南忽北，往来名胜，浪迹江湖，在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传说和故事。直到现代，云南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即建文帝）为鼻祖的说法。

建文帝在云贵一带留下的遗迹和传说较多，不少书还载录有一些建文帝的诗文。有些记述虽然简略，仍颇具体，往往给人以一种真实感。如：

（永乐）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五月，结辰白龙山。

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难诸人，自为文哭之。时朝廷侦帝甚密，户科给事胡濙访求张三丰，盖为帝也。帝知之，遂遁迹不出。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复至（白龙）庵。工部尚书严震使安南，密访帝，震忽与帝遇于云南道中，相对而泣。帝曰：“何以处我？”对曰：“上从便，臣自有处。”夜缢于驿亭中。

在这些记述中，还收录了几首托名建文帝的诗，其中最有名的有如下三首：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 野老吞声哭未休。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像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

正统五年（1440）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决意东行。这时有同行僧人窃得建文所作诗，前往广西思恩知州府岑瑛处，自称建文帝。捕系僧人并建文帝一起械送京师。命御史廷鞫时，僧人称："年九十余，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驳斥："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九十岁！"经查实，僧人实为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论死，从者戍边。建文帝即在遣戍之列，实有南归之意，便以实相告。朝廷命建文时老阉吴亮前来探实。建文帝见到吴亮，立即认出他来。吴亮予以否认。建文帝对他说道；"当年我御便殿，你尚食，吃的是子鹅。我扔到地下一片鹅肉，你手执壶，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把那块肉吃了，怎么说你不是吴亮呢？"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以后自刎而死。英宗闻讯，把僧人迎到宫中，人皆呼他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这说明建文帝没有死于火，而是逃亡在外。

这样一个有始有终，绘声绘色的建文逊国传奇，就像一部旅行日志，对建文帝什么时间到了什么地方，由何人随从都有详细记载，其可信程度难以详考，或许完全出于一些人有意的传闻和臆造。对此，许多史家都曾持怀疑态度。孟森先生认为，这种附会"皆因心恶成祖诛夷诸忠烈之惨，而不忍建文之遽殒，故诡言刘基之秘箧，程济之幻术，以神奇其说耳。"这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建文帝与一些建文遗臣下落不明，又有正统五年杨应祥（即杨行样）之事，则是产生这种附会的土壤和温床。

除以上描述外，有许多建文遗臣逃散各地，云游四海，他们变换姓名，隐居山谷僻壤，操持各种各样的职业，不时吟诗怀旧，制造传闻，更为建文疑踪增添了神秘色彩。其中流传较广的是关于河西佣、补锅匠、云门僧人和玉山樵者等传说。《明史》中说：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佣，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

补锅匠者，常往来夔州、重庆间，业补祸，凡数年，川中人多识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顾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岩中，坐语竟日。复相持哭，别去。其人即冯也。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给衣食，能为古诗。诗后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后二人皆不知所终。

又会稽有二隐者：一云门僧，一若耶溪樵。僧每泛舟赋诗，归即焚之。樵每于溪沙上以荻画字，已，辄乱其沙。人有疑之者，从后抱持观之，则皆孤臣去国之词也。

时又有玉山樵者，居金华之东山，麻衣戴笠，终身不易。尝为王姓者题诗曰："宗人"，故疑其王姓云。

玉山樵者又称玉华山樵。自称大呆子性天然，曾经写过一首歌。歌的全文是：

七年艰难走闽越，日夜思亲鬓成雪。
回头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随衣百结。
当时恨不早见几，扁舟一棹江南归。
西风尘土障天起，秋水鲈鱼空自肥。
即今寄食荒村里，佳士出迎常倒屣。
当歌对酒忍暂欢，握手论心愧知己。
老怀岂能忘故山，神游往往于其间。
为君写此转凄恻，片云零暮何时还？

由歌词判断此人显然为建文遗臣无疑。再如雪庵和尚，名暨，靖难诛杀文臣时落发为僧，居白龙山寺中。好观楚辞，时时买楚词袖之，“登小舟，急棹滩中流。朗诵一页，辄投一页于水，投已辄哭，哭已又读，终卷乃已。”有人说他曾是建文朝的监察御史，也有人以为他就是松阳的叶希贤其人。这种传闻还有许多许多，如：

永乐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滨。久而复有两人至，聚居一室，不轻出门户。风月之夕，则棹小舟，操酒榼，泛湖而饮，饮至醉，扣舷面歌，歌竟，相持大恸而归，人莫测也。居人时以钱米周之，或受或否。而一人病革，呼其邻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为女累；不言，女终见疑，奈何？”其人固请，乃曰：“我建文朝某编修也，幸葬我湖旁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二人后不知所在。

大约在这场政治浩劫后数十年，一位名叫王诏的松阳人游览治平寺时，在转轮藏上得到一卷书，书中记载着建文亡臣二十余人的事迹，“楮墨断烂，可识者仅九人。”有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节，均是浙江定海人，同族而且同仕于朝廷。梁田玉，建文中官任郎中，京师沦陷，去为僧。梁良玉，官至中书舍人，壬午乱后，隐姓埋名，逃到海南，以卖文寿终。梁良用为舟师，死于水。梁中节好《老子》《太玄经》，亡命为道士。此外还有中书何申，建文中使蜀，至峡口闻变，呕血，疽发背死。宋和、郭节挟卜书走异域，客死。海州人何洲，不知为何官职，亦亡命为卜以生，后客死。郭良与梁中节相约弃为道士，后来一个名叫郑僖的人记下这些传闻事迹，汇集为《忠贤奇秘录》一书传世。有关建文帝出走西南的《致身录》等，即是以此为素材附会而成的。

关于建文帝率众亡诸臣出走的传闻，早在永乐初年就已经出现，而且传到了朱棣耳中。当初埋葬的那具火中尸体是不是建文帝，他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明白只要建文帝活在世上，对他夺嫡而得的皇权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隐患，他的一块心病就难除。因此他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追治“奸党”，追缴在逃诸臣诰敕，一方面派人四处秘察建文帝的踪迹。这正如有的史书所云；“文皇初，以逊国伏戎为虑，以故轺车四出，几于上穷碧落下黄泉矣。”

第一个被派出寻找建文帝踪迹的人是太监郑和，他与王景弘等人于永乐三年（1405）六月奉命出使西洋，使命之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朱棣的疑虑来自当时的传闻，“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

第二个受命秘察建文踪迹的人是户科给事中胡濙。永乐五年（1407），朱棣命他以颁御制诸书和访寻仙人张邋遢（张三丰）为名，“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同时也旁察东宫及各地官吏民间之事，但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胡濙在外近十年，源源不断将所见所闻所察上报，朱棣均予以高度重视。胡濙于永乐十四年（1416）结束访查还朝，向朱棣详细禀报了有关情况，但关于建文帝下落，除了觅得更多传闻而外，并未有所结论，未能使朱棣放心满意。这年，胡濙母亲病故，他照例乞归守丧，但未得朱棣恩准，反而擢升礼部左侍郎，继续寻觅建文帝的去向。

永乐十四年（1416）底至十五年（1417）初，发生了谷王朱橞谋反案。壬午年他是受命固守金川门的藩王，背叛朝廷迎纳燕师入门，对建文帝下落应当略知一二。他利用蜀王之子崇宁王朱悦燇得罪逃来谷府避匿之机，欺骗众人说：“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发有日矣。”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但谷王朱橞作为“金川门之变”的重要当事人，居然欲利用建文帝下落不明为己用，也可作为建文帝确实未曾焚死于宫中的一个佐证之一。

永乐十六年（1418）太子少师姚广孝临终前，朱棣前去探望，问他有何嘱托。姚广孝提出释放僧人溥洽的请求。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有人传言他知道建文帝踪迹而被朱棣关押了十余年。《明史·姚广孝传》记载：

（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广孝顿首谢。寻卒。

大概此时释放溥洽，不会对朱棣的统治构成什么威胁，所以答应了姚广孝的请求，这也可以作为建文帝逃亡在外的佐证。

尽管如此，朱棣仍未放弃查访建文帝踪迹，永乐十七年（1419），胡濙奉命再次出巡江、浙、湖、湘诸府。直至永乐二十一年（1423）还朝奏事复命时，京城已迁至北京。可当胡濙驰京时，朱棣率军亲征阿鲁台大军正好行至宣府，不敢稍有懈怠，日夜兼程赶赴宣府谒见，到达时已是深夜。

朱棣这时已经就寝，听说胡濙赶来，急忙起身召见。“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虽然无人知晓密谈内容，但肯定与胡濙肩负使命有关。两个月后，朱棣北征回师，“诏谕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死义者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至此，苦苦索寻20多年的建文帝踪迹一事，竟这样悄然了结了。

这时距朱棣魂归榆木川仅有8个月时间。朱棣在位22年，却为寻找建文帝疑踪前后拖拖拉拉竟困扰了21年之久，真可谓用心良苦，全力不懈。

历史和各种机遇，对胜利者而言是有情的，然而对失败者来说，却又是无情的。客观而论，朱棣由一隅之地的藩王而靖难成功，登临帝位，这既是历史的必然，却又是时代的偶然。他与建文帝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如果从成败得失而言，建文帝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自身素质与决策上的严重缺陷，却是重要因由之一。其具体表现在；一是身为一朝国君的建文帝未能很好抓住历史赋予的特殊机遇，确定有个性的建文时代；二是未能用好、用足手中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力；三是未能选择、任用、形成高素质的朝廷官僚群体；四是未能正确作出及时的战略决策，且在决策上有许多“盲区”“误区”；五是个人素质的巨大缺陷：其一，建文帝为一介文弱书生，非文武韬略兼具的帅才。其二，是聪明有余，魄力不足。其三，在与燕王的政治、军事较量中，面对政敌、挑战者的巨大压力，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欲委曲求全结果却失全。其四，建文帝的聪明才智与他的优柔、脆弱构成了他的双重的政治人格。而建文帝失败的悲剧，恰恰印证了这样的历史启示，即尽信祖不如无祖、尽信书不如

无书、尽信臣不如无臣。相较之下，朱棣则在诸多方面、酷似太祖，且在遇的把握、政治军事韬略方面，远远胜过建文帝。朱棣不仅是历史呼唤与造就的文武韬略兼具的帝王全材，而且作为帝王而言，其个人政治素质、才能，更有许多非凡之处。如：（1）有过人的胆识。在靖难之役中，在政治、军事方面，处处表现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勇于将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的卓越才华。（2）有非凡的韬略。在与建文朝臣长达四年之久的政治、军事较量中，朱棣时时处处闪现出把握、创造各种时机，迎接挑战，进而克敌制胜的非凡韬略、智慧的光辉。（3）有恢宏的气魄。在靖难之役中，在复杂多变、敌强我弱的战场上，朱棣善待部下士卒，以知人善任而增强凝聚力；在对敌上，则以攻心为上，尽可能地化敌为友，扫清障碍；在残酷的战争中，他处处身先士卒，知难而上，鼓励将士，既敢打硬仗恶仗，又善于死里求生、反败为胜，从而表现出政治军事统帅的恢宏气魄，使部众能在其旗帜下，团结一致，甘愿效命，虽万死而无怨望之心。（4）有灵活的手腕。从燕王起兵靖难到入京登临帝位，他在与建文朝廷长期、反复多变的政治军事斗争过程中，朱棣在政治、军事手腕的运用上，其可谓灵活多变、机巧有术。如起兵前的迷敌有术，巧于伪装；起兵时的牵敌有招，制敌有术；以“靖难”为名讨伐朝廷之师，致使名正理顺，善取民心；战场上的武戏文唱，敲山震虎手段的实施；成功后的观势察情，缓登帝位等手腕，均收到了多方面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效果。

由此可知，靖难之役的胜利与朱棣的成功，绝非一时的偶然与侥幸。因此，此一胜利既可说是历史优选法的胜利，又可称它为政治斗争伦理道德化的胜利。结果，历史不仅承认了此一胜利，且赋予胜利者以充裕的时机，以再造新的辉煌。

永乐帝（含建文帝）大事年表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应天（今南京）（1360）1岁

三月，朱元璋征浙东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至应天。闰五月，陈友谅杀其主徐寿辉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发兵攻应天。朱元璋败陈友谅于龙湾。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龙凤七年（1361）2岁

正月，小明王韩林儿加封朱元璋为吴国公。二月，朱元璋始立盐法、设置宝源局、议立茶法。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宋龙凤八年（1362）3岁

三月，徐寿辉部明玉珍在蜀称帝，国号大夏，建元天统。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龙凤九年（1363）4岁

三月，刘福通战死安丰，朱元璋挟小明王居滁州。七月，朱元璋败陈友谅部于鄱阳湖。八月，陈友谅中流箭死，其次子陈理于武昌称帝，改元德寿。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1364）5岁

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仍用龙凤年号。二月，朱元璋伐汉，陈理肉袒衔璧出降，两湖、江西原陈友谅辖属多归降。

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龙凤十一年（1365）6岁

二月，李文忠破张士诚军。十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攻取江北张士恆辖区，克泰州，围高邮。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龙凤十二年（1366）7岁

二月，夏主明玉珍病死，子明昇立，改元开熙。五月，朱元璋传檄攻张士诚，称白莲教为妖言。八月，陈友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于滁州，舟沉瓜步，小明王死，龙凤政权亡。

丁未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8 岁

朱元璋为诸子命名，始名朱棣。

正月，吴王朱元璋始称吴元年。九月，徐达、常遇春破苏州，俘张士诚，士诚自缢死，吴亡。十月，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胡廷瑞取福建，徐达、常遇春北伐中原。

成申明洪武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9 岁

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皇帝，国号明，建元洪武，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妻马氏为皇后。汤和克延平，陈友定被诛。六月两广略定。闰七月，徐达、常遇春克通州，元顺帝北逃上都，明军取大都。十一月，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师教授太子、诸王，选才俊之士伴读。朱元璋与太子论汉七国造反事。

己酉洪武二年（1369）10 岁

四月，诏中书省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及国邑官属之制，朱元璋立皇陵碑，以临濠府（今凤阳东）为中都。

正月，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立功臣庙，死者像祀，生者虚位。三月，明军克陕西，李思奇以临洮降。六月，明军攻占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二十公里闪电河北岸），元顺帝北逃。七月，常遇春病死。

庚戌洪武三年（1370）11 岁

四月，朱元璋封二子樉为秦王，三子㭎为晋王，四子棣为燕王，五子橚为吴王，六子桢为楚王，七子榑为齐王，八子梓为潭王，九子杞为赵王，十子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元顺帝卒于应昌，子爱猷识里达腊（又作阿裕锡哩达喇）嗣位，改明年为宣光元年。封李善长等六人为公，封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并赐诰命、铁券。

辛亥洪武四年（1371）12 岁

汤和、傅友德取蜀，明升降，夏亡。左丞相李善长致仕。诚意伯刘基致仕。国子司业宋濂谪知安远县。

壬子洪武五年（1372）13岁

赐秦王、晋王、吴王、靖王田各百顷。定郊祭时太子留宫居守，诸王戎服从祭之制，命百官奏事启禀太子。徐达攻岭北，大败。作铁榜申诫公侯。

癸丑洪武六年（1373）14岁

三月，颁《昭鉴录》，训诫诸王。五月，《祖训录》成，录于诸王宫殿及内宫东壁。命诸司嗣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降谪中书省右丞相汪广洋为广东行省参政。授胡惟庸为中书省右丞相。详定《大明律》，颁行天下。

甲寅洪武七年（1374）15岁

孙贵妃卒，命吴王行慈母服，斩衰三年。十月，皇长孙雄英生，为太子之长子。十一月，《孝慈录》成。命冯胜、邓愈、汤和仍镇北边。

乙卯洪武八年（1375）16岁

皇太子及秦、晋、楚、靖江等王赴中都讲武。宋濂修《洪武圣政记》成。造大明宝钞，设宝钞提举司。廖永忠坐事死。刘基（伯温）卒。中官出使自此始。改卫为都司。港安侯华云龙以擅用元宫中禁物，召还，中途死。诛功臣从此始。

丙辰洪武九年（1376）17岁

二月，重定诸王公主岁禄之数。册徐达长女为燕王妃。朱棣与秦、晋王等受命赴中都。朱棣为北平燕王府工程事致书李文忠。因星变求言，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下狱死。空印之狱起。

丁巳洪武十年（1377）18岁

增秦、晋、燕王府护卫。世子朱标次子朱允炆生。输林学士宋濂致仕。邓愈、沐英破吐蕃。命李善长、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命臣民言事者实封达御前。命中外政事先启皇太子裁决，然后奏闻。以胡惟庸为左丞相，汪广洋为右丞相。邓愈卒。

戊午洪武十一年（1378）19岁

秦、晋二王就藩。燕王在中都凤阳。改南京为京师，开封罢称北京。是年

封十一子椿为蜀王，十二子柏为湘王，十三子桂为代王，十四子楧为肃王，十五子植为辽王。北元爱猷识里达腊死，子脱古思帖木儿汗嗣位，改明年为天元元年。朱元璋派中官吴诚赴湖广视军，是为宦官预兵事之始。始疑胡惟庸，禁天下奏事勿禀告中书省。

己未洪武十二年（1379）20 岁。

燕王回至京师。汤和率列侯练兵于临清。右丞相汪广洋揭发胡惟庸，被谪广南，舟至太平，赐死。

庚申洪武十三年（1380）21 岁

燕王之国北平（今北京），领中、左二护卫侍从及将士五千七百七十人。胡惟庸案发。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被杀。罢中书省、废丞相，政归六部。废大都督府，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大将朱亮祖被鞭死。

辛酉洪武十四年（1381）22 岁

朱棣在北平。徐达、汤和等镇守北平。云南曲靖平，元梁王死。编赋役黄册。宋濂卒。

壬戌洪武十五年（1382）23 岁

马皇后病逝，燕王奔丧京师。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左善世宗泐荐道衍和尚，从燕王朱棣赴北平。云南全境平。设锦衣卫及镇抚司。设四辅官、殿阁大学士。“空印案”发，株连甚广。

癸亥洪武十六年（1383）24 岁

燕王在北平。西平侯沐英率众数万镇云南，自此沐氏世守云南。

甲子洪武十七年（1384）25 岁

李文忠卒。宋晟破西番。禁宦官干预外事，并命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乙丑洪武十八年（1385）26 岁

太傅魏国公徐达卒。郭桓案发，株连数万人。颁《大诰》于天下。

丙寅洪武十九年（1386）27岁

傅友德平云南诸蛮。遣行人刘敏等偕内监出使真腊等国。

《大诰三编》成，颁行天下。

丁卯洪武二十年（1387）28岁

冯胜等征纳哈出至金山，元将纳哈出降。置大宁都指挥使司。制定鱼鳞图册（田亩清册）。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1388）29岁

四月，蓝玉率军抵捕鱼儿海。元君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及臣属数十骑遁逃。明军俘获甚众。八月，颁武臣大诰。九月，燕王朱棣与秦、晋、周、楚、齐、湘、鲁、潭九王进京朝觐。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1389）30岁

正月，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以秦王为宗人令，晋王、燕王为左右宗正，周王、楚王为左、右宗人。五月，设兀良哈三卫。

七月，元也速迭儿缢杀其主脱古思帖木儿。十一月，思伦发降，麓川平。十二月，周王橚弃国至凤阳，朱元命其居京师，世子有燉理藩国事。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1390）31岁

正月，燕王朱棣与晋王朱棡受命率师北征。傅友德北平兵马受燕王节制，王弼等山西兵马受晋王节制。又命齐王朱榑率护卫及山东、徐、邳诸军从燕王北伐。三月，燕王等收降乃儿不花。自是元降军先后归附，甚至北平者皆归燕王调用。燕兵自此益强。晋王不见敌而还。四月，潭王梓之妃于氏之兄弟坐胡惟庸党，潭王惧，与妃俱自焚死。韩国公李善长以交通胡惟庸赐死，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皆坐诛。严禁沿海军民交通外番。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1391）32岁

燕、晋诸王岁遣大将巡行塞下，督诸卫士屯田，有来扰则败之。续封皇子朱㮵等十人为王。秦王有过，被召至京师。命皇太子巡抚关陕，献陕西地图，经略迁都事宜。傅友德备边北平、徐辉祖备边陕西。叶昇练兵甘肃。讨哈密。更造黄册。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1392）33 岁

正月，燕王与晋、楚、湘诸王入朝。朱元璋命诸王“岁训将练兵，周视封疆，作军器必精良，以固边圉。”靖江王以淫虐幽京师，卒。命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十之三守城。四月，皇太子朱标病死。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蓝玉征西番罕东。西平侯沐英卒。江夏侯周德兴以其子骥犯法，坐死。靖宁侯叶昇坐胡惟庸党诛。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1393）34 岁

朱元璋命冯胜、傅友德等备边，悉听燕、晋二王节制，事大者方准奏闻。凉国公蓝玉坐谋反死，族诛，坐党事死者一万五千余人。明开国元功宿将相继诛戮殆尽。定天下都司卫所。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1394）35 岁

命韩、沈二王省视燕王及秦、晋、周、齐诸王，以敦友悌。严禁私人海外贸易。傅友德、王弼赐死。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1395）36 岁

命周王、晋王发兵往塞北筑城屯田。命燕王发动北平、辽东兵同总兵官周兴、宋晟等剿捕野人女真。更定诸王岁供之数。皇太孙完婚，以光禄少卿马全女为妃。赐冯胜死。汤和卒。秦王朱樉病卒。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1396）37 岁

燕王北征，败鞑靼兵于彻彻儿山。重订诸王见东宫仪制。大赉致仕武臣，各进一级。《稽古定制》成，颁功臣之家。

丁丑洪武三十年（1397）38 岁

四月，燕王朱棣受命督筑大同城。五月，敕燕、晋、代、辽、宁、谷等王勤兵备边。楚王桢率师讨“古州蛮”，湘王柏副之。颁《大明律诰》。南北榜案发生。禁私茶出境，驸马欧阳伦违禁不法赐死。命沐春等讨刀干孟，遣送思伦发还滇。朱元璋有疾。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1398）39岁

三月，晋王朱棡病卒。四月，敕燕王备边方略。五月，敕燕王节制北平都司、行都司及燕、谷、宁王府兵，辽东都司及辽府兵备御开平。闰五月朱元璋病卒。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以齐泰、黄子澄参国政，定议削藩。七月，周王橚次子有爋告橚谋不轨，词连燕、齐、湘三王。寻周、齐、代、岷诸王以罪被逮，于是燕王益疑惧。十一月，惠帝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并受密旨伺察燕王。燕府长史葛诚具言府中之谋。

己卯明惠帝朱允炆建文元年（1399）40岁

二月，诏令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力士。用方孝孺之议，内外大小诸司及品级勋阶悉仿《周礼》更定。三月，命都督宋忠率兵屯开平，都督耿瓛练兵山海关，徐凯练兵临清，调兵屯彰德、顺德以防燕王。四月，湘王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皆以罪废为庶人。六月，岷王楩有罪，废为庶人，徙之漳州。燕王装疯谋举兵。七月，燕王计杀张昺、谢贵等，以僧道衍为谋士，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祖训起兵，称“靖难”之师。夺北平。朱允炆以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征讨。八月，燕师夜袭雄县，歼耿部先锋九千，复于真定大败耿炳文师。朱允炆遂以李景隆代耿。十月，燕王率师袭大宁，得朵颜三卫骑兵，回师败李景隆于郑村坝。十一月，李景隆败还德州，燕王上书自辩，请诛齐泰、黄子澄以告天下。

庚辰建文二年（1400）41岁

正月，鞑靼可汗遣使来燕纳款，且请助兵。二月，燕师攻大同，李景隆中计失地折将损兵。诏减江浙重赋。四月，败李景隆军于白沟河。五月，燕军入德州，攻济南不克。六月，遣使赦燕王罪，命罢兵，燕王不听。八月，南军收复德州。九月，诏授盛庸为平燕将军、历城侯以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败燕军于东昌，张玉战死。罗贯中卒。

辛巳建文三年（1401）42 岁

二月，燕师至保定、真定。三月，败盛庸于夹河。闰三月，败都督平安兵于藁城。六月，燕将李远南过济宁、穀城，直至沛县，焚南军粮道。用僧道衍计，出师直趋南京。谕燕王罢兵归藩，不听。罢齐泰、黄子澄以缓燕师未果，又贻书燕世子朱高炽，行反间计不成。修《太祖实录》成。

壬午建文四年（1402）43 岁

三月，燕师趋宿州，与平安战于淝河。四月，徐辉祖败燕师于齐眉山。燕师胜于灵璧，平安被俘。五月，诏天下勤王。召还齐泰、黄子澄。又命燕王从姊庆成郡主至燕军中，请割地求和，燕王不许。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师渡江，再败盛庸。谷王橞、李景隆开金川门纳燕师。都城陷，宫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终。榜示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为奸臣，肆行株连九族，史称“瓜蔓抄”。燕王朱棣即帝位，革建文之号仍称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大封靖难功臣，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同直文渊阁参与机务，为皇帝之顾问。移民北平。诏重修《太祖实录》。立妃徐氏为皇后。废广泽王允熥、怀恩王允熞为庶人。北元鬼力赤杀坤帖木儿汗，废元国号，改称鞑靼。

癸未永乐元年（1403）44 岁

恢复被建文帝所削诸藩，各令之国。改北平为北京，设北京机构。改谷王橞以长沙。遣使贻书鬼力赤以通好。徙封宁王权于南昌。遣太监侯显出西域征番僧。始命宦官出镇贵州、广西、宁夏诸边，赐公侯服，位诸将上。移大宁都指挥司于保定。海道运粮至北京。安南黎苍遣使奉表朝贡。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巡视浙西，治嘉、湖、苏、松水患。设建州卫与奴儿干卫，完成明对东北之统一。

甲申永乐二年（1404）45 岁

定屯田赏罚则例。以解缙、黄淮为考试官，会试录取天下贡

士四百七十人。以僧道衍为太子少师，复姚姓，赐名广孝。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籍耿炳文家，炳文惧而自杀。籍李景隆家。封哈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

王。始知黎苍父子夺位真相。原王子陈天平自老挝来奔。设兀者右卫后卫。

乙酉永乐三年（1405）46 岁

定辽东互市马价。派遣宦官郑和等出使西洋诸国。遣宦官山寿率兵出云州巡边，此为宦官典兵之始。颁《祖训》于诸王。密令暗害驸马都尉梅殷。以诸外国贡使日多，乃置福建、浙江、广东三舶司为馆以接待。忠顺王安克帖木儿被毒死，命其兄之子脱脱嗣位。日本国王源道义入贡，并送所俘对马、台岐诸岛海寇至京师。

丙戌永乐四年（1406）47 岁

三月，朱棣亲临太学祭孔。设开原、广宁马市。遣使护送陈天平返安南，行至芹站为胡 袭杀，遂议出兵讨伐。命礼部使四出购求遗书。废齐王榑为庶。广泽、怀恩二王被禁锢。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西番尚师哈立麻随侯显至京师。

丁亥永乐五年（1407）48 岁

封西番尚师哈立麻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改安南为交阯，设布政使司。皇后徐氏卒。郑和首次还自西洋，西洋诸国皆遣使随和入朝。继而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遣胡濙寻惠帝。修《永乐大典》书成，成祖亲制序言。

戊子永乐六年（1408）49 岁

岷王楩因有罪，罢其官属。鞑靼阿鲁台杀鬼力赤企本雅失里。交阯复乱，命沐晟等征讨。浡泥国王来朝，卒于京，以礼葬于安德门外石子岗。命安远侯柳升，平江伯陈瑄率水军沿海捕倭。

己丑永乐七年（1409）50 岁

严边关茶禁，设洮州、甘肃茶马司。朱棣北行，皇太子留京师监国。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丘福率师征讨鞑靼，于胪朐河遭全军覆灭。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张辅俘安南上皇简定送京诛之。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营昌平天寿山陵。

庚寅永乐八年（1410）51 岁

朱棣第一次亲征蒙古，命皇长孙瞻基留守北京，户部尚书夏原吉辅之。败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斡难河。设建州左卫，以猛哥贴木儿为指挥使。安南陈季扩屡败请降，明廷授其为交阯右布政使，拒命，复叛为乱。命宦官王安、王彦等监军，宦官监军出镇自是以为常。

辛卯永乐九年（1411）52 岁

张辅再征交阯。诛左都御史陈瑛。开会通河。逮交阯左参议

解缙于狱。郑和第三次自西洋还。封哈密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诏命姚广孝、夏原吉等重修《太祖实录》。立皇长孙朱瞻基为皇太孙。鞑靼阿鲁台遣使请允役属吐蕃各部，不许。亦失哈巡视奴儿干。

壬辰永乐十年（1412）53 岁

命入觐官千五百余人各陈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勿问。辽王植有罪，削其护卫。工部尚书宋礼奉命治卫河。禁宦官干预有司政事。郑和复使西洋。

癸巳永乐十一年（1413）54 岁

诏宥建文诸臣姻戚。始设贵州布政使司。朱棣赴北京，皇太孙随行，命皇太子监国。天寿山陵成，葬皇后徐氏。封鞑靼阿鲁台为和宁王。瓦剌扰边。张辅、沐晟大败交阯。立永宁寺碑于奴儿干都司。

甲午永乐十二年（1414）55 岁

张辅平定交阯之变。朱棣二次亲征瓦剌马哈木，大败之于忽兰忽失温。逮下东宫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等于锦衣卫狱。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宗喀巴派其子弟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明廷封之为“西天佛子大国师”。

乙未永乐十三年（1415）56 岁

解缙死于狱。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卒。罢海运。凿清江浦以通东南漕运，由平江伯陈瑄督办。定支运法。改封汉王高煦于青州。郑和出使西洋还，俘苏门答腊王子弟苏干剌以献。诏自今死罪皆无复奏，著为令。吏部员外陈诚使西域还。

丙申永乐十四年（1416）57 岁

赈北京、河南、山东饥。山西广灵民刘子进自言有异术，聚众起事。改封赵王朱高燧于彰德。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有罪伏诛。作北京西宫。朱棣自北京还，决定迁都。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削汉王高煦二护卫。郑和复使西洋诸国。输林儒士编辑《历代名臣奏议》成。

丁酉永乐十五年（1417）58 岁

谷王橞有罪，废为庶人。命丰城侯李彬镇交阯。汉王高煦有罪，徙封乐安州。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郡、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朱棣北巡至北京，北京西宫成。交阯以宦官扰民，复乱。顺宁王马哈木卒。曲阜孔子庙成，朱棣亲制文勒石。礼部尚书赵羾巡视塞北屯戍军民利弊。

戊戌永乐十六年（1418）59 岁

姚广孝卒。复代王朱桂护卫及官属。重修《太祖实录》成。胡广卒。赞善梁潜、司谏周冕以辅导皇太子有阙，皆下狱死。遣礼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诸郡，密察皇太子德行。

乙亥永乐十七年（1419）60 岁

辽东总兵刘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埚。郑和下西洋还。西藏新迦当教派创立人宗喀巴死。

庚子永乐十八年（1420）61 岁

山东蒲台唐赛儿反，唐赛儿不获，命逮天下出家尼姑万人。

遣陈智为左参将助李彬平交阯。置东厂。诏迁都北京。复遣中官侯显出使西域。皇太子、皇太孙至京师。北京郊庙宫殿成。论营建功封薛禄为阳武侯，擢工部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

辛丑永乐十九年（1421）62 岁

朱棣御新殿受朝贺。郑和复下西洋。后官以鱼、吕之乱大系宫女宦官，坐死三千余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灾尽毁。再议北征，夏原吉力谏阻止遭下狱。

壬寅永乐二十年（1422）63 岁

朱棣亲征蒙古，皇太子监国。鞑靼阿鲁台远遁，移师击兀良哈。郑和自西洋还。杨士奇、蹇义等以辅导太子有阙下狱。

癸卯永乐二十年（1423）64 岁

常山护卫指挥孟贤谋立赵王朱高燧夺嫡，伏诛。朱棣亲征鞑靼阿鲁台，皇太子监国。鞑靼已被瓦剌所败，朱棣不遇敌而还。也先土干率众来降，赐姓名金忠，封之为忠勇王。

甲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 65 岁

阿鲁台犯大同、开平。复命郑和下西洋。再次亲征阿鲁台，至祥云屯，又至翠云屯，以不遇敌还师，率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即位。葬朱棣于天寿山长陵，谥文皇帝，庙号太宗。

五、陈水源（台湾）·杰出航海家郑和（节选）

（一）建文帝自宫殿消迹

面临败战之际，建文帝对处境已有所觉悟，其内心之感受与思维模式，可归纳如此；

1. 内心里想逃离。

2. 与叔父交战，深觉嫌恶感。

3. 不愿意有祖父及叔父般之强悍果断性格。

4. 大明帝国之帝位，亦非自我营造而得，俟机再起吧！

5. 下令将宫中放火燃烧，西宫、东宫立即为大火所包围。特别与皇后告别，攀登上乾宫殿，跟从者仅有黄子澄之子黄达。

6. 死为人生之终结，无意识中敞开衣服，略感不适。

7. 大事亦无存念，仅想到祖父所赠留之箱键，那是四年前，祖父洪武帝崩殁边之事。

8. 老皇帝将其珍贵之键与金属制之箱子一并赠送给最爱之孙子。

9. 洪武帝面告以，平常勿开此箱，万一有紧急事态时，再行开启。

10. 至此，在乾宫殿之户棚中，请黄达将箱键打开，黄达在惊讶之中，将太祖陛下之箱键搬来。

11. 启开箱盖，发觉最上面系一张羊皮，羊皮中以墨绘制地图一枚。

12. 该图所绘系宫廷之乾宫殿旁边一古井户，有一地下道，可通达长江附近之孔子庙，顿然间让其敬仰祖父爱之深。

13. 在慌乱之中，再探视箱中之宝物，又发现一枚地图，该地图所绘系以孔子庙为起点，前往武昌间之路程记载。

14. 于是，取出二人分之袈裟，僧帽，草鞋，僧侣之身份证明文件（度牒），取得剃刀诸物件，剃度为僧侣，再经由地下通道往武昌。明示逃生之路线与要略。

15. 建文帝及黄达眼见箱键宝物之恩赐，不觉落泪。半刻之后，大火烧及宫廷之隅，两人向古井而消失。当乾宫殿燃烧时，燕军士兵亦侵入宫廷，乱成一团。在燕军直捣之下，宫廷死伤可想而知。

当燕王占领应天府之片刻，便着手调查宫殿燃烧后之残迹，期望能找到建文帝之尸体，实不可思议之事。这时之燕王仍有做贼心虚之感，潜意识中存在“篡夺者”之形像。倘无法确认建文帝之尸体，除内心不甘休之外，尚且有不安及疑惑从生之心态。换言之，燕王下定决心，探寻建文帝之行踪，方可解决之物议。盖“皇明朝训”曰：朝无皇子，始以嫡子继承。当然，应先行肯定建文死讯，方宜登上皇帝宝座。

有关建文帝之行踪，各方之情报及史书之记载归纳如下：

1. 宫殿大火燃烧之当天，稍迟自浦口往长江溯水而上之一艘船，搭载二位僧侣，其中一位无意中自称“朕”，并于急忙中改换口气，惟无法追查驶往长

江上游之船只去向。

2.《明史》恭闵帝本纪，有关建文帝去向之记载曰：“都城陷，宫中起火之际，帝之去向不明，或帝自地道出亡。”

（二）李挺陆上搜索建文帝

在确定指派郑和下西洋之前，事实上，永乐帝曾就内陆地区，进行追查建文帝之下落。其大致索查之行径，摘述于后供参阅：

1. 永乐二年（1404 年），正月底，永乐派遣李挺（三宝旧友）赴武昌，探索建文帝在武昌之行踪，似有其困难度存在。

2. 据李挺在武昌罗汉寺，所逮捕到之寺男证实，永乐元年（1403 年）六月间，曾有二位僧侣到访，一位年约三十；另一位为二十左右，温文有礼，白面书生之气质，面容略显疲劳。住持达玄和尚见其二人之度牒后，态度截然不同，引入客室接待，若有所托，惟实情如何，年逾古稀之名僧达玄，未曾透露，旋即病倒圆寂。事虽经李挺就事寺男、罗汉寺相关人员及寺内相关各类人等详细讯问追查，但均不得其门而作罢。

3. 然而，服侍二位僧侣之小坊主，曾听到二人对吟诗曰：“别时茫茫江浸月”；年青僧侣对曰：“忽闻水上琵琶声”；年长僧侣回应曰：“浔阳江头夜送客”，二人似乎往江州——浔阳方向前进，无意中听出二人感慨之呼声。

4. 李挺获得小坊主意见之后，立刻走访浔阳。浔阳古名江州，即现今九江。它系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地点，三国时吴之水军都督周瑜训练水军处所是也。同时，由此登山口可上庐山。李挺在此曾以附近之寺庙，相关人员，尤其针对与罗汉寺达玄和尚往来密切之寺庙，均逐一过滤讯问，亦未获知建文帝之去向。

5. 最后找到一位水运业者，据告：去年（1403 年）九月间，曾有二位僧侣结伴在江州南部，星子镇之江源寺漫游，其后二人搭船往鄱阳湖南下。李挺遂往鄱阳湖南下。途中又获闻二位僧侣由鄱阳湖东岸进入鄱江，并在鄱阳之仙山逗留。然后，又雇船只渡溪转进信江。

6. 李挺辗转赴信江流域，大力探索建文帝之下落，该处为农村地带，鄱阳水系之大小河川在此交错，亦逐条明察，确信建文帝曾在此落脚。因此，在信江流域之街镇、聚落、鹰潭之山腰等处，布下长期索探之天罗地网。同时，据报永乐元年（1403 年），曾有一位卖盐商人陪伴二人，由鹰潭朝南出发，而二人住宿均使用银子支付，该盐商可能往福建方向迈进。

7. 此信息使李挺想到，建文帝可能深知，由于身份特殊易被察觉，不适宜在中原本土寻找落脚住所，可能逃往国外浮生，况且福建之泉州，自宋代迄今已繁荣成国际港口。经查，泉州位处福州之南边，地接晋江河口之附近，在当时已成为中国最大之港埠，其别名为“刺桐”。红色花朵，形成华南特产之植物，其满开时节，颇能引人入胜。

8. 李挺对自己之推论，深信不疑，於是迅捷抵达泉州，首先走访武昌罗汉寺达玄和尚之弟子，开元寺住持念海和尚。据告，永乐元年（1403 年）年底，有二位男士搭乘阿拉伯航船前往印尼，该商船于广东搁浅破损，漂往海南岛。李挺获此消失，亦迅捷搭便船赴海南岛之琼州，即现今之海口探查，由于雷州半岛与琼州海峡之间，辟有港湾，李挺前后在海南岛走访一个月之久，足迹伸入南端之崖州，确实曾经有一艘阿拉伯船，在抱虎角海岸漂流，其中有一位年轻人貌似建文帝。有人指称该位男子，在等候通往印尼之便船，惟其正确足迹不得而知。

上项查访经过，李挺面向永乐帝报告，其结论以为：“无法掌握确切之足迹去向，但建文帝极有可能逃往南海。”永乐帝听后一副愁眉苦脸之表情，显得十分无奈，仍然无法解决内心之狐疑；平衡其被称为“燕贼，篡位”之困惑心态。

（三）永乐帝霸气吞天下

当永乐帝听完李挺搜查报告之后，便请郑和及尉迟子良（洛王之勇士，燕王之随身），传唤道衍进入宫殿中。盖此时之道衍僧侣，已决定还俗，虽暂居

于栖霞寺，法名为道衍，俗名为姚广孝。永乐二年（1402 年）四月，官拜资善大夫，担任国家最高职位太子少师，上朝时冠带齐整，退廷便著僧衣。时年已届七十岁，但头脑仍然十分清楚。

“靖难之变”后，马三宝有一天在长江沿岸之浦口散步时，於居酒屋饮酒之际，有位老人自怀中掏出一张羊皮交给三宝，如获珍宝物。经与道衍详研所绘图案之内容，二人异口同声认为系“张士诚之遗宝，所绘之图也。”张士诚系元末乱世时，与朱元璋争夺天下之群雄之一，以苏州为根据地，拥有强大之水军而自夸。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九月，当朱元璋包围攻击张士诚军旅时，捕获张士诚，张于解送途中自杀身亡。战后于张士诚营帐中，无法觅得其长年藏存之秘宝，惟坊间盛传，在张士诚败北逃逸时，曾将秘宝托交亲信之卫队“十条龙”勇士保管，并由水军移往南海某一秘密处所藏存，然而却无人知此项秘宝之真正下落。

当马三宝在踏破铁鞋无觅处时，获得张士诚之秘宝，自当喜出望外矣，於是，道衍僧侣便借机倡言点子，他认为：1. 如能就三宝太监手中所握有之张士诚之秘宝地图，妥予解读，必与事实相去不远。2. 该秘密所绘地点，可能系指介於舟山群岛与嵊泗列岛间之无人岛。3. 亦可能是张士诚秘藏宝物岛屿之化名，即张宝山是也。

马三宝与尉迟子良，听从道衍之分析，并向永乐帝提出建言：“为达成陛下建设大世界帝国迈进，所需庞大资金可动用洪武帝所储蓄之财源。”好大喜功之永乐帝，便下令郑和前往“张宝山”一探究竟。

马三宝此时亦热血滚滚，面报：“陛下容许前往张宝山，则任何邪魔亦当克服，希望子良同行之外，龙江宝船厂之船只，亦打造完成矣！”简言之，宝船厂即造船处所，而龙江宝船厂位于南京府城之西北郊，即现今下关之中保村附近。它系缘于明太祖时代之设计策划而来，有关龙江船厂提举司之管辖范围，涵盖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等各地造船工厂，计分四个部门，采分工合作之体制，从事船舶之建造是也。

据宋代沈括之《梦溪笔谈》之记载，宋熙宁间（1068—1077 年），该造船已有船坞之设施。换言之，宋朝时，已懂绘制造船之设计图，即模型性能之实验（浮船坞）等技术之应用。郑和与尉迟子良，随即搭乘三百吨级备用二帆八丁橹之帆船，首次由南京之龙江关出发，历经二十日，船通过崇明岛、长兴岛、东中国海，而朝目的地张宝山航行。同时，郑和依罗盘指针所指磁北 127.5 度辰巽之东南方向前进，於抵达张宝山时，方发觉该岛系位处东南之孤岛，一个平淡无奇特之小岛屿。于是，将船泊于孤岛之背侧，第二天清早再由子良指挥先遣队十人，搭乘二只小船攀岩上岸盘查，发觉崖上之岩有多处洼地，栈道之足迹朝山顶延伸，并朝向山顶。历经三个多小时之搜索，依图绘所示之位置，於二棵松树间掘出五个大壶，其中三个为砂金，一个为银制品，一个为金刚石，遂予以运回，并结束航程，将携回之张士诚秘宝呈献给永乐皇帝。

永乐为满足其霸者之心态，海上巡查无大收获之际，旋於永乐二年（1405 年）十二月，调集二十万大军远征铁木耳，……

六、上杉千年（日本）·郑和下西洋（节选）

寻找建文帝的踪迹

郑和下西洋主要的任务和目的，是要实现明朝政府对外的方针政策，但是，郑和出使西洋的原因也具有多重性。在清朝的各种评论中，多认为“踪迹建文”是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主要目的。

“靖难之役”中，当朱棣占领南京应天府的片刻，便立刻着手调查燃烧后的残迹，期望能找到建文帝的尸体，但结果却只发现了皇后的尸体，而建文帝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件事对于刚刚夺权的朱棣来讲直是心头悬着的一块巨石。因为在朱棣的潜意识当中仍然存在自己是“篡权夺位”者的形像，无法

知道建文帝的下落，除了他内心不安之外，还有恐惧和疑惑的心理。换句话说，朱棣只有探寻到建文帝的下落，才能解决个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安心地登上皇帝宝座。

对于当时的明成祖朱棣来说，建文帝的踪迹一天没有寻到，他一天就睡不安稳，悬着的心就一直放不下，事实上，在决定派郑和下西洋之前，朱棣曾命李挺在大陆范围内追查过建文帝的下落。

在永乐三年（1405 年）正月底，李挺根据永乐帝朱棣的指令秘密地来到武昌，任务是追查建文帝逃往武昌至琼州的足迹（当时“靖难之役”已过去很长时间，因此探寻建文帝武昌踪迹有一些困难）。

李挺在武昌罗汉寺一个和尚的口中得知，永乐元年（1403 年）六月的时候，曾有两个僧侣到访过这里，一位年约 30，另一个则在 20 岁左右，温文尔雅，有贵族气质。住持达玄和尚对待这人的态度迥然不同一般过往的僧侣，恭敬有礼，似乎是什么大人物般。李挺想从达玄口中了解此事的详细情况，但年逾古稀的达玄却只字未提，不久便病倒圆寂了，而寺中其他人均不知此人的身份来历。

然而，曾服侍这两个僧侣的一位小和尚却偶然间听到二人吟诗：“别时茫茫江浸月”年青僧侣说：“忽闻水上琵琶声”，年长僧侣应道：“浔阳江头夜送客”，这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段，似乎说明二人向江州浔阳方向前进。李挺立刻直接赶到浔阳（浔阳古名江州，现在为九江），把此地的庙宇，相关人员，尤其是与达玄和尚过往甚密的人逐一盘问了一遍，但都不知建文帝的去向。最后碰到一位渔夫，据他讲去年（永乐元年，1403 年）九月间曾有两个僧侣结伴往江州南部的星子旗镇的江原寺方向去，后来二人又搭船往鄱阳湖南下。李挺立即赶往鄱阳湖，途中又听说两僧侣由鄱阳湖东岸进入鄱江，并在鄱阳的仙山寺逗留，后来又雇船往信江去了。李挺没有放过一丝寻找建文帝的踪迹的线索又辗转赶赴信江流域。信江流域是鄱阳水域各处的交汇之地，地势错综复杂，通过调查，确定了建文帝曾在此落脚过。于是，李挺在这里的街镇山

川、村落布下天罗地网。同时又有消息说，曾有一位卖盐的商人陪伴二人，由此向南出发，目的地可能是福建方向。

此时，李挺根据一路追寻的线索判断，建文帝由于身份特殊，极易被察觉，不适于在中原寻找落脚之地，可能要逃往海外。况且福建的泉州自宋代以来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海港，进出海外的船队大都从这里出发。李挺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于是迅速抵达泉州。他首先走访了达玄的弟子，开元寺住持念海和尚，得知永乐元年（1403 年）年底，有两个男士乘阿拉伯航船远赴爪哇，该船在广东搁浅破损，漂往海南岛。李马不停蹄搭便船又赴海南琼州探查。由于地势复杂，李挺走访了一年有余，足迹遍布整个海南岛，终于确实有一艘阿拉伯船，在抱虎角海岸漂流，其中一人貌似建文帝，有人曾说此人在此等候搭乘通往爪哇的便船，而真正的去向却无从知晓。

建文帝的确切踪迹最终仍无法掌握，但极有可能已逃往海外。这个结论对朱棣来讲是糟糕的。也正是由于这个结论而使朱棣产生了出海寻找建文帝的心理。

但关于郑和下西洋是否怀有寻找建文帝的目的的说法仍有不同意见。

在明朝的相关论述中，可以说各执己见，而“踪迹建文”一事主要归于胡濙一人。

说的是明成祖朱棣命胡濙以访“仙人”张三丰为名，暗查建文帝踪迹。在张延玉《明史》中对此记载说“惠帝之崩于火，或云遁去，诸旧臣从者，帝疑之，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县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度泛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关于建文帝下落的疑案，因为胡濙的长期探查而有了结果，并不是听郑和的汇报而了结，这说明郑和泛海下西洋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访查建文帝踪迹。由于当时传言建文帝逃到海外，所以明成祖朱棣在郑和奉使之际，秘密命令他顺道探访建文帝的踪迹是有可能的。

但这只是郑和下西洋附带的一个目的，只能由郑和等使团领导成员秘密掌握进行，所以明代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几类主要的文字记载当中，对郑和使团“踪迹建文”的事只字不提。如果“踪迹建文”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那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初，永乐元年的时候就该派遣郑和率大军下西洋，而不会在建文帝失去踪迹快四年的时候才采取行动。

七、周新华·郑和七下西洋（节选）

从刘家港起锚

太仓是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在今江苏太仓刘家港存留有一块《通番事迹之记》碑，是明宣德六年（1431）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所撰文勒石，碑文中记曰：“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由此得知，太仓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郑和船队每次返航也都是以太仓为收泊地。

碑记又云：“是用勒文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昭示永久焉。”碑文记录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往返时间，当为最准确的史实，至为重要。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刘家港作为下西洋的始发港?

从文献记载来看，刘家港的地理位置优越特殊。它位于长江的入海口，素有“海洋之襟喉，江湖之门户”之说，是苏州地区天然的通海门户。《姑苏采风类记》记载，刘家港“港外即大海，水面宏广，与他港浦不同”。早在三国两晋时，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娄江口即成喇叭形自然港湾，“面宽二三里，入海处逐渐开阔，潮汐汹涌，可容万斛之舟”。

到了元明时期，刘家港已成名扬海内外的良港，尤其是元代重视海外贸易，

鼓励番舶自愿往来，于至元十九年（1282）宣慰使朱清、张瑄奉旨于刘家港开创海运（海运漕粮）之后，刘家港一跃成为国内东部沿海的贸易大港、一座崛起的江海雄镇。当时，刘家港外通琉球、日本、浡泥、罗斛等国，海贸繁盛，番商巨贾趋之若骛，谓之“六国码头”“东方大都会”“天下第一码头”。

郑和的远洋船队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每一次远航都有60多艘宝船，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近200艘，如此庞大的船队，如若没有一个与其排水量、吃水深度相适应的天然良港，根本不可能停泊和出海。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明成祖朱棣和郑和，正是首先看中了刘家港这样的港口条件，才作出了把刘家港作为通番始发基地的正确抉择。

事实上，太仓不仅仅是被朱棣以及郑和等选中作为“通番”的起锚地，太仓的地理位置一直为人重视。有意思的是，在明代建文四年，即“靖难之役”的最后一年，燕王朱棣即将攻入都城南京时，建文帝朱允炆曾下密旨，派太常寺卿黄子澄到太仓募兵勤王，但“未至而京城陷”，黄子澄也被捉拿。《太仓州志》记载了这一事件。这段记载令人注意到朱棣、朱允炆叔侄二人竟然是同时想到了太仓。而在民间传说中，建文帝朱允炆在“靖难”中并未被烧死，而是秘密逃到了太仓，并从这里出海逃到了外洋。

除了地理位置的优越，具备深水良港的条件外，太仓经济富庶，向被誉为“吴中富地，金溢太仓”，也是朱棣、郑和看重太仓，将其作为通番基地的重要因素。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空前庞大，必须要有良好的经济腹地作为依托，因为每次出洋所需的给养与货物数量十分可观。同时，船队所到国家众多，所带的赐予物及贸易物品种繁多，数量巨大。为了方便每次货物的筹备，郑和必须选择一个具有良好供给与集散地的地方作为启程港，而太仓恰好又具备这个优势。

太仓濒海枕江，背后是广袤的长江流域与最富饶的太湖流域构成的长江三角洲经济腹地。自东晋以来，江南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文献谓“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太仓更是岁多丰稔的鱼米之乡，“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苍廪俱丰实”。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太仓便是以粮

食充盈而闻名天下，这从“太仓”这个地名也可见一斑。郑和从太仓出发，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此地便于筹集粮食。

郑和远航西洋，如此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没有众多的航海工程技术人员是难以想像的。而太仓自宋元以来航海事业的发展，为郑和准备了一个可随时调用的“人才库”。海船启碇出港，扬帆远航，经常要受到波浪、潮汐、流向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在长期的海运活动中，江南及东南沿海有众多经验丰富的“驾船民艄”，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航海家作为郑和船队的舟师。

太仓有许多参加海运活动的人。比如太仓卫军士费信，曾在永乐、宣德年间四次随郑和出使西洋。还有一位太仓卫副千户周闻，从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起，曾先后五次跟随郑和出使西洋。费信尤其值得一说。他通晓阿拉伯语，熟悉西洋各国风情，“信每莅番城，辄伏几濡毫，叙缀篇章，标其山川夷类、物候风习……”也正因如此，费信后来写成《星槎胜览》，详细记录了他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见闻，这部书成为迄今研究郑和史迹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还有从宋元以来形成的长期驻扎在太仓的水军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条件。当时海上海盗横行，郑和率领的船队是和平的船队，但为了保证航海顺利，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为其保驾护航。元至正二年在太仓“立水军都万户府”以防方国珍骚扰，元末张士诚占据太仓后，训练了一支水军，最多时达几万人。1367年朱元璋灭张士诚，并以倭寇猖獗之故而加强水军，备有海船，巡缉海上盗贼。所以，太仓既有朱元璋善战的水军与张士诚水军留下的大批船只，又有大批富有航海经验的水手，因此，太仓卫很快训练出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海军”。若没有这支强大的水军护航，是很难保证船队的航行顺畅的。

太仓作为起锚地和收泊地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它离都城南京很近。明朝初定都南京，南京与太仓均雄踞长江沿岸，交通便利，两地相距“陆路六百九十二里，水路七百十二里”，太仓是离南京最近的良港，选定太仓作为出海口，便于朝廷与船队联系，也便于朝廷命官的来往。太仓与南京近在咫尺，船到太仓就如同到了南京。将如此之近的太仓作为起锚地十分便于明成祖朱棣

的召唤，因为明成祖下令郑和在“片板不得入海”的年代奉旨出海是有其内在隐情的，郑和每次出洋回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听旨。

正是因为太仓具备了以上这许多优越条件，才使得大明永乐王朝会将下西洋的起锚地选择在这里。

闽地留迹

从史料记载来看，郑和下西洋，自太仓刘家港起锚后，并不是直接驶往远洋，而是每次都在福建长乐港停留，以此作为“伺风开洋”之地和重要补给基地。因此福建长乐港也在郑和下西洋这恢宏壮丽的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海岸线不可谓不长，中国的良港不可谓不多，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唯独钟情于长乐，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历史选择?

如果从地缘地理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便多少可以明白其中的原委了。纵观东西沿海各地滨海城市，从东到西，遍查诸口岸的资源概况，诸如出海进港的便捷性、季风的稳定性和避风的安全性等，均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而福建长乐山川灵秀，物产丰富，海域辽阔，港口优良，素以鱼米之乡、海滨邹鲁闻名于世，具有自然和人文等各方面的优势。与相邻省市的港口相比，从长乐下西洋，可以说是航路条条，更为便捷。

根据明人茅元仪的《武备志》刊载的航海图来看，郑和下西洋出航路线，自江苏太仓至长乐的共 27 条，自长乐五虎门出海达“诸番”的共 29 条。而回程航路，海外返长乐五虎门的共 31 条，五虎门回太仓的共 22 条。共计记注 109 条涉及长乐。据专家考订，郑和七下西洋，前三次的航程，均是从长乐出发至印度为终点。长乐至印度是郑和舟师的基本航线，这条航线的第一站是占城（今越南南部），从长乐出发，“五虎门开洋，第十二帆，顺风十昼夜到占城国”（费信《星槎胜览》）。从以上分析，足见长乐占据地理之便。与省内的其他港口相比，长乐距福州最近，只有几十公里，便号令，易统筹，占据指挥优势。于是，郑和选择了长乐作为“开洋”的前哨基地。

现藏长乐郑和史迹陈列馆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中刻下了“累驻于斯，伺

风开洋”的句子。这里提到了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史实，就是“伺风”。古时航海，要倚风而行。郑和船队往往在冬季趁东北风而去，夏季又乘西南风而返。福建沿海航线与南海航线的交汇处，历来是前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闽江口的长乐太平港水面宽阔，风平浪静，是个理想的港湾。长乐太平港，有西北和东北两个出口与闽江相接，大船可以溯潮而出大江，直抵五虎门，出五虎门便是大海，咫尺航程，不需一“更”，是一个近程的伺风港口。五虎门位于闽江口前哨，闽江口又是喇叭形的港口，季风至此，形成一股强大的风力，“去以十一二月就北风，来以五六月就南风”。从太平港“开洋”，扬帆出海，尽得北风相送，而落帆归港，又得南风迎归，这正是郑和船队下西洋所需要的。

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到长乐驻泊，时间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将近一年。比如第四、第五次和最后一次出洋，从刘家港出发的时间已是十二月，到达长乐后，必须等到翌年的十一月才能伺风开洋，所以在长乐太平港驻泊了11个月。我们看郑和七下西洋的起讫时间，往往长达两三年，事实上真正在远洋上航行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除了伺风，长乐太平港还有一个重要优势是可以避风。作为郑和下西洋屯兵造船、储备物资的航海基地，除了倭寇侵扰是心腹大患之外，台风肆虐也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有效避风是郑和船队造船聚货、屯兵休整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遍访诸码头，查找历史记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所有东南沿海港湾，长乐受台风正面袭击的几率比其他地方少。当地民间有这样的歌谣；“台风急，台风吼，一到长乐就拐走。”这是由长乐位于台湾海峡偏北西岸的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另外，长乐太平港夹在北丘山和浮峰山之间，港湾曲折，山绕外环，水横内围，实为隐藏在内陆腹地的良港，即使偶遇台风袭击，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这正是长乐太平港区别于其他港口的地方，也是郑和选择此处作为航海基地和出洋港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乐的南山是当年郑和船队驻泊活动的中心，留下了不少有关郑和的遗迹。南山位于乐长县治之西南而得名，山上有隐屏、香界、石林三座小峰，又名三

峰山。山巅有塔，又称塔山。

南山因早年筑有天妃宫，遂成为郑和下西洋船员朝拜祈诵之地。由于历次驻泊航行平安，为感谢海神天妃兹佑，郑和于永乐十年（1412），奏请明成祖并获准在长乐南山建成一座雄伟壮丽的天妃行宫。翌年，郑和同寺僧重修三峰塔与三峰寺，并题匾额“三峰塔寺”。说到这个三峰塔，有个传说。该塔原名南山塔，始建于宋代。永乐十一年（1413），郑和登塔，得知该塔为宋徽宗祝寿而建，颇为不悦，谓赵舍乃庸君，被金人所俘而丧生北国，于是改题塔名为三峰塔。该塔迄今犹存，塔身石构，八角七层，巍然耸峙。此塔在当年既是郑和俯瞰驻泊太平港船队的瞭望塔，也是郑和船队出入太平港的航标塔。

明宣德六年（1431），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前，为了祈保出海航行平安，在他所建的长乐南山三清宝殿铸造大铜钟一口，俗称郑和铜钟。钟高 68 厘米，钮高 14 厘米，口径 49 厘米，厚 2 厘米，重 77 公斤。形体古朴，饰纹优美，铸工精良。钟体呈褐绿色，覆釜形，葵口，双龙钮柄顶，肩浮印八卦、云雷等纹饰。主纹上部饰五组八封纹，铸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八字。下部铭文五组共 54 字，行楷，全文为“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这口铜钟后来在南山天妃宫遗址出土，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郑和下西洋途中，福建泉州也是他重要的驻泊地，留下了许多遗迹。

泉州因其良好的港口条件，成为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早在唐时即成“船到城添外国人”的国际都市，也是其时中国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更趋鼎盛，与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往来，为东方第一大港，这里不仅有建造优良远洋船舶的造船业、技艺精湛的航海匠师和精通外国语言的通事（翻译），同时还有丰富的外销产品。如泉州德化窑的瓷器就是明代的重要外销瓷。史料记载，郑和“从苏州刘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并“满载陶瓷”“遍历群蛮”（清叶永兼《西山杂志》）。

郑和在永乐十五年（1417）第五次下西洋时，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祈求

圣灵庇佑，留下了著名的郑和行香碑。灵山圣墓位于今泉州城东东圣茂村，墓主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两位门徒，他们于唐武德年间来华传教，卒后葬于此处，据传此墓夜发异光，故称圣墓。该碑全名《泉州灵山回教先贤行香碑》，碑文载："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郑和为何要在此地行香祈求圣灵庇佑呢？郑和是回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而泉州是西域穆斯林"胡商"来往频繁的重要港口，也是伊斯兰教早期在中国传播的发祥地。在此定居的穆斯林为数众多，子孙繁衍，古老的清真寺建筑、西域伊斯兰教的陵雷锋以及阿拉伯、波斯文字图案的浮雕石刻等文物遗址为数不少。

郑和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很直观地传播了朝廷保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信息，营造了泉州回族及其文化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氛围。

九日山位于泉州西郊，山中古迹遍布，目前仅留80余处，多数集中于西峰东坡和东坡南麓，最珍贵的为宋元祈风石刻。因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相当发达，异域商人每年往来于泉州很多。当时来泉州经营海外贸易的番舶，要造风驾船，在春夏借东南风而来，秋冬则顺西北风而去。每年番舶扬帆之际，泉州郡守和市舶（海关）有关官员及泉州知名人士，都要登九日山昭惠庙，在通远王祠为番舶祈风，并刻石留记。

据清代《西山杂记》记载，当年郑和下西洋时，正使太监王景弘曾在此为下西洋船队平安顺利祈风。

八、商传·永乐大帝（节选）

建文迷踪

我们从野史笔记中，不断看到建文帝流落江湖的记述。但是其实谁也没有亲眼看到过那位神秘的江湖帝影。既然谁都没见过流落民间的建文帝，可为什么要编造出这么多的故事来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建文帝朱允炆的同情。朱允炆虽然丢了皇位，可他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是一个以仁慈出名的好皇帝。这样的一个好皇帝，同时又是个弱者，往往就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所以大家也都希望他没有死，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局。再加上有人对朱棣登极后的专制和滥杀建文朝遗臣的做法不满，就更愿意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一些建文帝的传闻了。

比如福建宁德市就有一座金贝寺，里面还有一座古墓，经过一些学者实地考察，发现寺中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如古墓前有金水河、金水桥，寺内还发现有五爪金龙的袈裟，因此认为金贝寺古墓可能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陵墓。但是这个说法很值得怀疑，大家想一想，死后修成皇宫式的陵墓还可以说是后人的所为，而穿五爪金龙的袈裟，那岂不是太张扬了吗？如果建文帝真的这么张扬，那不是很快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吗？

当时那些关于建文帝流落江湖的传说把朱棣搞得心神不宁。其实话说回来，既然建文帝朱允炆没有被烧死在宫中，那么，就永远找寻不到建文帝，这对于朱棣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找不到可以一直找下去，但是如果找到了，那怎么办？接回皇宫？当然不行，那朱棣自己到哪去呀？暗杀掉？也不好办，万一被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最好的结果就是找不到，但又不能大张旗鼓去找，就这样不清不楚，没有结果，其实对朱棣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

关于建文帝在江湖流浪的传说，原来最多的是说他隐居到云南一带的寺庙中。可是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不少关于建文帝朱允炆的传说和遗迹。这些传说

一直流传到现在，并且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于是近年来有两种“建文帝热”：一种是找寻并且证明哪里是建文帝确曾隐居过的寺院遗迹；另一种是寻根认祖，认为自己有可能就是建文帝的后代，或者找寻建文帝流落民间之后的后代。

关于建文帝朱允炆后代的事情，据史书记载，他曾经有二子，长子文奎，次子文圭。长子文奎在朱棣进入南京时，就失踪了；次子文圭被朱棣废为庶人，关在凤阳高墙里，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直到正统时才被放出，当时连牛马都区分不出来，也没有子嗣，这一支就算是断了。那么他的长子文奎如果流落到民间，或者建文帝朱允炆自己流落民间，他们在民间会不会也有后代相传呢？关于建文帝在民间的后代这件事，在明朝就有所传闻，后来查继佐修明史，就写了进去。说当初建文帝流落江湖后，曾带着一个儿子来到浦江郑氏家中，并且在那里又纳妾生了四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他让这四个儿子分别姓陈、姓同、姓朱。到了明英宗正统时，其中一个姓朱的儿子就对别人说，自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儿子，并且想到县里去明说，郑氏的几个儿子怕他惹祸，劝阻了他。后来这个朱姓的儿子离开了郑家，不知所终。

这个传说虽然不一定可信，但是如果建文帝真的流落民间，他很可能会娶妻生子，也就很可能会有后代相传，而且很可能会传到现在。关键是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后代呢？

大家知道，在中国有一种专门记述家庭或者家族传承脉络的文献，叫作“家谱”或者“族谱”。那么有没有建文帝的家谱或者族谱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还真的就有。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建文帝的家谱与族谱有两份，一份是湖北的《让氏家谱》，一份是湖南湘潭的《何氏族谱》。

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两份家谱与族谱都不姓朱，一个姓让，一个姓何。

湖北武昌的《让氏家谱》成书于民国间，系因先祖在明清两朝有所忌讳，不敢公开自己为建文后人，只好代代相传，记述历代先祖。依据祭祖的烧包单所记，第一世祖名让銮，就是将金銮殿让给别人的意思。应该说这个家谱虽然

成书晚，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湖南湘潭的《何氏族谱》首修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距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位，大约已过了一百年。这个族谱中并没有说明在湘潭锦石的何氏就是建文帝的后裔，但是记述了三个情况：一个情况是这个何氏的始祖是从外地迁到湘潭来的；第二个情况是说，这个何姓的始祖原来并不姓何而是姓朱；第三个情况是，这个原本姓朱的何氏祖先，是永乐二年从江西临川迁到这里的。这三个情况引起了何氏后人的注意，他们对族谱进行了认真考察，认为这个从江西临川迁到湖南湘潭来的朱姓后来改何姓的人，很可能就是建文帝朱允炆。《何氏族谱》里还记述了一个很让人吃惊的事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朱棣直下南京时，跟朝廷军队在灵壁打了一场大仗。结果朱棣大获全胜，朝廷方面文官武将被俘了二百多人，可是朝廷方面的主将何福却跑掉了。后来朱棣当了皇帝，起初没有追究何福的问题，还封他为宁远侯。但是在永乐八年（1410），何福就遭到弹劾，有人告他的状，说他“心怀怨望”，意思是心怀不满，发牢骚。结果何福就自杀而死了。这些事在《明史何福传》中都有明确记载。可是《何氏族谱》中却说何福“阳告终于家，实归隐湖南湘潭的银塘，迄无知之者”。就是说他对外装死，然后偷偷跑到湖南湘潭的银塘隐居起来，一直也没有人知道。他跑到湘潭来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建文帝朱允炆。

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重要材料了。我们先不管那个从江西迁来的朱姓人物是不是朱允炆，仅就何福装死这件事，就跟当时的人以及后来修正史的人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么大的事情，居然被他瞒天过海，就连朱棣那么精明的专制皇帝都不知道！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一切都是朱棣一手安排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当然就是让朱允炆永远隐居在他能够控制的民间，不会再对他有任何威胁。可是，倘若真的如此，他又为何一再派人去寻访建文疑踪呢？这实在是每一位读到这段历史的人都很想知道结果，但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历史悬案。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新发现的材料也越来越多，所说历史的谜团并非永远无解，也许说不定哪一天，这个谜团也终有水落石出之日。

九、马渭源·破解600年第一谜案（节选）

史料中建文帝出亡福建的蛛丝马迹

既然正史与文人笔记都没有直接记载建文帝的下落之谜，那么在间接的历史记载中是否有所披露呢？笔者在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觉得下列几段史料实在耐人寻味；

靖难战争中大宁总兵官刘贞战败后回朝廷，居然先上福建再回南京，为何？

明朝中期学者姜清给后人留下了这么一段史料："（刘）贞，合肥人。洪武中，宁献王封大宁，贞为总兵官。北平兵入大宁，宁王尽以护卫官军之北平，意贞亦降，籍其家下之狱。俄而贞由海道自福建还京师，家人遂得释。"（[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

这是讲"靖难战争"时东北大宁总后官刘贞吃了败仗后南归的事，可奇怪的是刘贞并没有直接回南京，而是去了福建，再由福建回南京，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那么刘贞究竟上福建绕了一个圈干什么？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刘贞后来成为了"国丈"，"（刘）贞女为文庙（即朱棣）昭顺德妃"。（[明]姜清：《姜氏秘史》卷2）

朱棣登基后的诏谕内容增益变化说明了什么？

据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发布的"燕王令旨"等史料而钦定的《奉天靖难记》所载，大明第二位君主建文帝朱允炆简直是禽兽不如："时诸王作废，允炆日益骄纵，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毁后宫，掘地五尺，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谓羊不肥美，辄杀数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淫药，药性燥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牝羊母猪与交。荒耽酒色，昼夜无度。及临朝，精神昏暗，俯首凭案，唯唯数事而已。宫中起大觉殿，于内置轮藏。（原无"置"字，据明天一

阁抄本补。）出公主与尼为徒，敬礼桑门，狎侮宗庙。尝置一女子于盒以为戏，谓为时物，舁入奉先殿荐新，盒开聚观，大笑而散。倚信阉竖，与决大事，凡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凌辱衣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棰挞。纪纲坏乱，构成大祸。自是灾异叠见，恬不自省。夜宴张灯荧煌，忽不见人。寝宫初成，见男子提一人头，血色模糊，直入宫内，随索之，寂无所有。狐狸满室，变怪万状，编置鹰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无光，星辰无度，彗扫军门，荧惑守心犯斗，飞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疫疠，连年不息，锦衣卫火，武库自焚，文华殿毁，承天门灾，虽变异多端，而酗乐自如。”（《奉天靖难记》卷 1）

明朝成化年间出了一位被史学家称誉为“搜辑建文忠臣遗事”第一人的福建莆田籍进士宋端仪，他在《立斋闲录》中抄录了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口口日朱棣发布的诏谕；

“皇帝敕谕天下文武群臣军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坏其祖宗成法，荒淫无度，奸臣擅权，涂炭生民，群雄并起，旷世无君，糜烂鼎沸。天命我父皇高皇帝龙飞淮甸，扫除祸乱，救民水火之中，措之诳席之上。立纲陈纪，政令惟新，官守其职，民乐其生，天下太平三十余年。不幸太祖宾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为禽兽之行，信任奸臣黄子澄、王叔英、齐泰等，改更祖宗法度。太祖不豫，不报各王，一日而殓，七日即葬。初崩之时，将鬼见愁、硫黄、雄黄调水遍洒满殿，使秽气触忤梓宫。及至发引，仗剑在后，谓人曰：我仗此剑，不畏强鬼。矫称不许诸王会葬。如此诡秘，事皆可疑。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将后宫拆毁，掘地二丈，大兴土木之工，军民不得聊生。溺于佛教，印经饬像，礼忏饭僧，靡费巨万。甚至改去公主名号，舍与道姑为徒，尼媪出入官蛛，秽德丑陋，渎乱人伦，灭绝天理。又将父皇母后御容尽行烧毁。上天怒其无道，灾于承天门，灾于乙字库，灾于锦衣卫，飞蝗蔽天，饿殍盈路。犹不改过，愈加为恶，起夫运粮，点民为兵，造作科征，天下被害。欲将成造炮架，雷火烧其木植；将欲练习水战，雷震其大将之船；将欲守城，雷雨震陷其城，屡修屡陷，数十余次。……

故敕。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口口日。”（[明]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

比较上述两段大体内容相同的直接诋毁建文帝的史料，我们发现其有两个显著的变化：

其一，朱棣在《奉天靖难记》中信口雌黄地说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兽”和逼迫老太太这部分内容，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朱棣发布的诏谕里没有了。问题是为什么一下子没有了？

因为历史上真实的建文帝是个好皇帝，他当政时的社会影响与社会风气相当之好，“闻之故老言，其时（建文年间）道不拾遗。亲有见遗钞于涂者，第拾起一观，恐污践，更置阶所高洁之处耳，竟不取也”。（[明]祝允明：《前闻记》《九朝野记》卷2也有相似的记载）

建文失国时，南京城里哭声震天。对于这么一个好皇帝，尽管朱棣肆意诋毁，但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尤其是南京及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对建文帝是如何之人还是一清二楚的。先前朱棣在北方发动“靖难之役”时可以任意胡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北方人不怎么了解建文帝，但是朱棣登基后向全国臣民发布诏谕时就不得不考虑不能将建文帝说得太过头，否则其诏谕的可信度和政治效应就大大降低。建文帝有没有那样荒淫无耻，别的地方人不知道，南京城里人多少还是听说一点的。因此，朱棣及其御用文人意识到，很有必要将建文帝如何荒淫地“奸兽”和逼迫老太太这部分实在荒诞的内容予以删除。

其二，宋端仪抄录在《立斋闲录》中的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口口日朱棣发布的诏谕里多了“（建文帝）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一句话，这看似令人费解。究其实，在“靖难战争”期间远在北方的朱棣尚不知南京城里的建文帝已派人上福建、两浙地区去，姑且说就是选美女吧，但后来他来了南京不仅连建文帝的影子都找不到，反而还时不时地传来建文帝出亡云南、福建和两浙等地的流言。如果朱棣所说的建文帝即位初就派人上闽浙地区去选美女这事属实的话，那么闽浙地区的好多人家就是建文帝的“丈人家”了。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建文帝后来出亡福建完全有这种可能。

但当时朱棣搞不清楚建文帝到底要出亡何处？于是他的心中时不时地泛起阵阵之隐痛，最终他精心地作出了追查建文帝下落和防止建文帝东山再起的--系列秘密安排与部署。

永乐元年朱棣任命“六亲不认”的“冷面寒铁”周新巡按福建，巧合吗？

有人说建文帝跑到西北去了，为了彻底追查建文帝和加强对大明西北边境的统治，朱棣上台后就与西北地区军事长官（总兵官）宋晟结为儿女亲家，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安成公主和咸宁公主分别下嫁给了宋晟的二儿子宋琥和三儿子宋瑛。（《明史·宋晟传》卷 155）

有人说建文帝出亡到了云南，朱棣又与黔国公沐英家联姻，他将自己最小的也是最为宝贝的女儿“常宁公主，下嫁沐昕，西平侯（沐）英子”。（《明史·公主传》卷 121，列传第 9）

有人说建文帝跑到浙江浦江郑渶家去了，朱棣“遣人索之（郑）渶家厅事中，列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备不虞。使者至，所发皆经史，置其半不启，乃免于祸。人以为至行所感云”。（张廷玉：《明史·孝义一·郑濂传》卷 296）

又有人说建文帝上了福建去，朱棣于永乐元年派“冷面寒铁”周新“巡按福建”。（[明]黄瑜:《双槐岁钞·周宪使》卷 3，中华书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P55--57）不过也有人认为周新巡按福建是为了整顿那里的吏治，这确实不假。《明史》中《周新传》是这么记载的：“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独呼‘新’，遂为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诸生贡入太学。授大理寺评事，以善决狱称。成祖即位，改监察御史。敢言，多所弹劾。贵戚震惧，目为‘冷面寒铁’。京师中至以其名怖小儿，辄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请都司卫所不得凌府州县，府卫官相见均礼，武人为之戢。改按北京。…… 还朝，即擢云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冤民系久，闻新至，喜日；‘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当是时，周廉使名闻天下。锦衣卫指挥纪纲使千户缉事浙江，攫贿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顷之，新賫文册入京，遇千户涿州，捕系州狱，

脱走诉于纲，纲诬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锦衣私人，在道榜身无完肤。既至，伏陛前抗声曰：‘陛下诏按察司行事，与都察院同。臣奉诏擒奸恶，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临刑大呼日；‘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竟杀之。他日，帝悔，问侍臣曰：‘周新何许人？’对曰：‘南海。’帝叹曰：“岭外乃有此人，枉杀之矣。”《明史·周新传》卷161，列传第49）

从铁面无私的大清官周新之官场履历来看，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南方省份，其中在浙江的任上时间最长，最后也在浙江任上“出事”，被皇帝朱棣冤杀。这似乎是已经定论了的事。但细细想来，周新这一生的官场活动有三个疑点；

其一，周新巡按的第一省份是福建，换个角度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朱棣要在永乐元年派“冷面寒铁”周新去福建巡按？是福建地方吏治出了问题还是铁面无私的周新被赋予了特殊之使命？从周新与朱棣的关系来看，周新原名周志新，因他受知于文皇帝（指朱棣），尝呼为周新，因以志新为字。（[明]黄瑜:《双槐岁钞·周宪使》卷3也有相似的记载，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第1版，P55）这说明两人关系很不错，周新又是“六亲不认”，所以朱棣完全有可能将肃清吏治与刺察建文帝等政治异己之类的重任委托给周新。当然也有人说没有充分的依据，这样的说法不能成立。我们暂不深入讨论，先看下面另一个疑点。

其二，周新在官场 上进行纪检和监察工作的主要省份是福建、北平、云南（有的说他没去云南就任就被改任了）和浙江，除了北平以外，其他三省是永乐年间盛传建文帝出亡地区，那么，周新巡按是否与建文帝出亡有着一定的关系?

其三，周新最终被杀是由于大坏蛋“（纪）纲诬奏（周）新罪”，到底什么罪?史书没说，要知道明成祖朱棣不是一个昏君，他与周新关系本来就不错，与纪纲关系也不错，朱棣“既即帝位，擢（纪纲）锦衣卫指挥使，令典亲军，司诏狱”。而“（纪）纲觇帝旨，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诋”。（《明史·佞幸·纪纲传》卷307，列传195）纪纲是朱棣肚子里的蛔虫，

他对篡位上台的永乐帝之心思摸得很透，其为永乐朝专门刺察与残害“建文奸党”及其家眷的一条凶恶的猎犬，虽说周新“六亲不认”，但官场上的这种利害关系，想必他不会不知道吧，可最后他又偏偏被诬陷冤杀了。

场面上的理由人们都懂，那么最本质的东西又是什么？难道上述三点都是巧合吗?

郑和是从永乐三年开始不断下西洋,且其正式启航地是在福建,就这么巧?

要说永乐朝怪异的“巧合”还真不少。周新在永乐元年巡按福建，二年巡按北平，接着就是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心腹太监郑和正式开始出使西洋，“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明史・宦官一．郑和传》卷 304，列传第 190）

最近福建泉州海交馆研究员刘志成先生找到了一条重要史料，编撰于明代的《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载东南地区航海世家蒲氏家族的先祖，会讲阿拉伯语、波斯语又熟娴海外事务的蒲日和曾作为通事（即翻译）跟随郑和一同下西洋：“（蒲）日和，字贵甫，寿成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资料来源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郑和七下西洋为寻建文帝蒲氏族谱提供佐证》，载福建《东南网》《大众网》等）

这段族谱记载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有个叫蒲日和的蒲氏先祖因为下西洋有功而被永乐朝授予泉州卫镇抚司的官职，换句话来说，蒲日和是当时明朝军队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曾在泉州市区的灵山圣墓三贤四贤墓回廊西侧立了一块“郑和行香碑”，1999 年笔者与朋友龚扬先生上泉州师院开会时曾参观过灵山圣墓，看过此碑，该碑高

约 1 米、宽约 0.5 米，用灰绿岩石雕刻而成，其上刻有“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 年 5 月 30 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从蒲氏家族族谱与宗教信仰来看，蒲日和是伊斯兰教信徒，他的名字也似乎带有一定的“外来”化，因此，有学者认为“郑和行香碑”上的“蒲和日”就是蒲氏族谱里的“蒲日和”（另外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两个略带差异名字的人是同时代、同职务一明 永乐时代的镇抚），由此笔者认为，上述《泉州蒲氏族谱 · 谱系表》中记载的有关信息应该是可靠的。

第二，《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载“蒲日和”跟随郑和“往西域寻玉玺”，前文笔者已述，朱棣进入南京明皇宫后挖地三尺就是找不到他“老爸”朱元璋的传国宝玺，于是就有了燕军闯入南京城的第 7 天，即“（建文）四年六月辛未，（朱棣）制皇帝亲亲宝。”（《明太宗实录》卷 9 下）第 13 天，即“（建文）四年六月丁丑，新作奉先殿。盖旧殿为建文所焚，至是，改作于奉天殿之西。制皇帝奉天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明太宗实录》卷 9 下）

从朱棣及其子孙钦定的《明太宗实录》记载来看，这位自称是高皇帝“嫡子”和大明帝国君位的“正宗传人”对宝玺的渴求是何等之急切！这也难为他了，因为原本大明帝国君主的宝玺不见了，它们可是大明帝位合法依据的像征啊。

据《明史》所载，“明初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曰‘皇帝信宝’，曰‘天子之宝’，曰‘天子行宝’，曰‘天子信宝’，曰‘制诰之宝’，曰‘敕命之宝’，曰‘广运之宝’，曰‘皇帝尊亲之宝’，曰‘皇帝亲亲之宝’，曰‘敬天勤民之宝’；又有‘御前之宝’、‘表彰经史之宝’及‘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洪武元年欲制宝玺，有贾胡浮海献美玉，曰：‘此出于阗，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乃命制为宝，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明史 · 舆服四》卷 68，志第 44）

也就是说明代合法皇帝应该拥有 17 枚宝玺，可新皇帝朱棣找不到它们，于是他就像现在社会上违法犯罪分子那样来个私刻图章，在一周不到的时间内，

居然让人连刻了 4 枚皇帝宝玺，接下来有没有再叫人刻下去呢？笔者在明代正史中没查到，但仔细阅读《明实录》，发现其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朱棣对那些高皇帝流传下来的但已“丢失”的宝玺耿耿于怀；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上（指朱棣——笔者注）宴闻御谨身殿，阅太祖皇帝《御制文集》，顾学士解缙等曰：‘皇考文章，固天资超迈，然宜学问所至，观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语简理至，蔼然可见。’缙等曰：‘诚如圣谕’。上曰：‘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明太宗实录》卷 26）

不是自己已经私刻了宝玺，还要这样“深恸之”？恐怕还是朱棣做贼心虚吧，因为私刻的宝玺说到底不是开国皇帝传下来的，就同他在政治宣传中所讲的“老爸”老早就有意将皇位传给他一般虚假，又唯恐别人非议，所以最好能找到宝玺的“真品原件”。事实上朱棣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大明帝国上下对于皇帝玉玺的真假还不乏甄别高手和辨伪专家。《明史》载，明孝宗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弘治十三年，鄠县民毛志学于泥河滨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纽。陕西巡抚熊种以为秦玺复出，遣人献之。礼部尚书傅瀚言：‘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等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记文盘五龙、螭缺一角 、旁刻魏录者不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跨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我高皇帝自制一代之玺，文各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何借此玺哉！’帝从其言，却而不用。”（《明史 · 舆服四》卷 68，志第 44）

陕西小民毛志学献宝玺讨了没趣，礼部尚书傅瀚的鉴宝方法不一定科学，但多少让我们看到，对于宝玺是否“正宗”，世间还真有识货人。朱棣篡位登

基本身就十分心虚，皇帝宝玺又是私刻的，一旦被人鉴别或发现其不真，岂不成了天下第－笑话！最可怕的是那些代表正统皇权的宝玺下落不明，“有言建文自焚并宝玺皆毁矣”，朱棣聪明绝顶，怎么会相信用高级石头做的宝玺会烧成灰而找不着？所以说寻找宝玺与寻找宝玺最为合适的携带者一前朝皇帝朱允炆本为同一事。《泉州蒲氏族谱·谱系表》中说他们的先祖蒲日和“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说白了就是寻找建文帝之下落，因此权威的《明史·郑和传》说：朱棣“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故而派遣郑和屡下西洋，“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这等说法，看来含义多多。

十、唐颐·二十八个人的闽东（节选）

戚继光和闽东古城堡（节选）

与抗倭相伴而生的，是闽东大地特别是沿海乡村的古城堡。据清代李拔的《福宁府志》记载，闽东的古城堡有五十八座之多，如果把这些如珍珠般的古城堡串联起来，当年就如一条盘山镇海的巨龙，构筑起闽东海疆的坚固屏障。

明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为了抵御倭寇，福建沿海设置五卫指挥使司，“福宁卫”就是其中之一，地址设在当时的州治东（今霞浦县），卫城新建城墙周长达三千米。卫下属设千户所，同时还设置了水澳、大筼筜、清湾、高罗、延亭、松山六个巡检司。卫所之下再设立墩台，派人瞭望，如发现倭寇，夜以举火、昼则焚烟为号，福宁州当时有这样的烟墩三十六座。同时，还建有三座水寨：烽火门、南日山和浯屿，其中烽火门寨址就在福鼎太姥山下的海边。

卫所建城，巡司建寨，又有星罗棋布的烟墩，按常理说，应是固若金汤了。可能刚建立初期，确实可行，洪武年间，明朝的国力还是很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嘉靖年代已是弊陋百出了。如水寨迁移——借口设在岛上的水寨地

点孤远，风涛汹涌而迁往岸上，实则是将士惮于过海，军备松懈。又如屯田体制崩坏，造成卫所饷源枯竭，军备失修，城防衰败。再如明朝将弁世袭，子弟养尊处优一代不如一代，失去了战斗力。

随着倭寇烧杀掳掠的日益猖獗，于是闽东沿海掀起了一场修建城堡的运动，以此作为防倭抗倭的守卫屏障。当然，州县的城郭，还得以政府官员牵头修筑。据有关史料记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钟一元为福宁知州，拓建西城，工程才告竣而倭来；三十七年（1558），柴应宾为知州，重建雉堞，修完而倭大至。这两战，由于修建了城郭，坚固防守，倭寇终于未能攻下。

福安县城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沦陷之后，知县卢仲亡羊补牢，把北山龟颈围入城内修建，翌年四月告竣，之后倭寇再来，则难以攻下了。

不仅是沿海的县市，就连山区的古田县，也因修建城郭，免于倭寇侵犯。辛竟可的《古田县志》载：古田离海数百里，本地人民以为寇不会来犯，知县之所以为路远不足恃，他唇焦舌燥劝谕城中富户，倭寇贪暴，志在金帛，说他们不会来，能有什么保证？于是登记富户，分三等出钱，建敌楼，增城垛，嘉庆四十年倭寇兵临城下，攻城五天，终于失望而去。

这些州县主官，有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的亡羊补牢措施得力，可谓是在其位谋其政。但这些城郭如今均已灰飞烟灭，现在我们环视闽东大地，倒是星星点点散落在乡村的保留尚好的古城堡多达几十个，其中霞浦县东冲半岛东侧的大京古城堡是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保存完好。

大京，原名大金，传说曾有过路客人在此失落黄金，村人拾金不昧，赢得失主赞之“誉比黄金”。朱元璋为抗御倭寇，下令设置海防巡检司千户所，大金名列福建十二个千户所首位，于是在此兴建城堡“崇墉屹立，不亚小县之城”，城周长两千八百多米，高七米，辟东西南三门（北面依山不设门），外门砌石缝隙皆以铁水浇固，城外凿护城河。城上遍设富铺、敌台、炮位，装备周全，壁垒森严，起到了“执福建之喉舌，固福宁之屏藩”的作用。

城堡内主要街道均以石灰岩板铺设，宽达七米，并建有四个街亭，开凿四

口八角大井。民居建筑也大体整齐划一，至今仍保留明朝建筑风格，井水依然清洌可供饮用，由于城堡与西安、南安明城墙以及崇武古城都是同时代的产物，当地就流传“洪武帝要在这里建临时帝都”的说法，大金之名也就一改为大京了。

距大京不远处有个传胪古城堡，明正德九年该村人民林遂登进士第，殿试名列第四名称“传胪”，从此该村被人叫“传胪村”。根据《林氏家谱》记载，传胪城堡建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周长六百四十米，高五米，座基宽五米，墙顶宽三米五，城今存西、南、北三个城门，古堡保存尚好，建城时依城四周植有岩柴树两百六十一株。如今，古树苍老却枝干遒劲，成为一大特色。传胪古城堡也是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乡村的古城堡大都由当地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修建的。史料记载当年戚继光“奏准始沿海各乡筑堡自卫”。福鼎市桐城街道的玉塘堡也是现存较为完好的城堡。玉塘村本为夏氏聚居地，为抵御倭寇来犯，嘉靖三十九年（1560）夏家集资兴筑城堡，城堡周长七百米，高六米七，顶宽三米多，原设计为东西南北四门，因建筑北门时，失一石匠，夏家认为不利而闭塞。原城门顶上建有城楼，并环以女墙，现城楼和女墙均已不存，但城墙仍保存较为完好。

福鼎太姥山下的洽溦城古堡也颇具特色。它是嘉靖年间由该村杨、叶、王、刘等家族为抗倭自保，分段兴筑而成的。城周长一千一百二十七米，高五米七，有东西南三门，南门口有一株百年古榕树，如一守城老将军，城堡至今保存尚好。

距溦城五千米便是秦屿镇，那是一座闽东历史英雄城。嘉靖十七年（1538），由土司陈登领导倡建，修筑了福鼎当年最大最长的乡城堡，光城门就有七个。与戚继光同时期的抗倭将军黎鹏举、俞大猷多次点兵于此，转战南北海疆。现城堡只残余靠海岸的一段，虽只是一截断垣，但很坚固，仍可作为防潮之用，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历史古迹。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一万余人侵犯秦屿，秦屿人民在当地人程伯简率领下奋起抵抗，青壮年守卫在前，弱者次之，连妇女也盘起头发运石送饭，程伯简还设下巧计“铳矢并发”，与倭寇展开决斗，迫使“倭乃宵遁”。可是程伯简却“中矢石死城上”，“共难四十余人”。

后人在古城堡的小东门城门旁，面对当年倭寇袭击城堡的集结地，建忠烈庙。忠烈庙面积近三百平方米，堂宇古朴，建筑精美。

像秦屿这样有过英雄历史的城堡还有许多，像程伯简这样的抗倭忠烈之士还有很多。《福宁府志·忠节》记载的壮烈牺牲的人就达数十人。他们有的身担一官半职，有的是读书人，但更多的是一介平民，均能“疾风所加时呈劲草”（清福宁太守李拔语），他们用血肉之躯筑就了闽东古城堡。

十一、王道亨·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选录)

之一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大事记

2008 年

1 月

2007 年冬，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被辟为宁德市与蕉城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由市委组织部牵头扶建。2008 年 1 月 3 日，村民在修建登山道时，在金贝寺下方山包上发现了一座奇特的古墓葬。村干部遂向时任蕉城区区长的陈宗森作了汇报。陈区长当即赶赴现场考察，敏感的他，当即感觉此墓不同寻常，遂向挂点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民生作了专题汇报。郑部长听完汇报后，随即驱车上山，赶赴现场作了踏勘。颇具慧眼的他，顿感这是个重大发现，里面似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但自己又说不出来。于是，他当即拿起手机拨通了市博物馆馆长钟亮的电话……。

2 月

2008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省、市博物馆的专家学者组成考古队对上金贝古墓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发现古墓现场构件狼藉，地宫空无一物。同年 2 月 22 日，《闽东日报》以“探访省内规模最大的单人僧塔”为题，

对考古情况作了报道。

3月

3月上旬，省博物馆研究员、文博专家王振镛及其助手伴随福建电视台“发现档案”栏目组编导一行数人到上金贝古墓现场拍摄实况录像。经过再次实地考察，王振镛研究员兴奋地提出，该古墓极有可能就是600年来史学家苦苦寻找的明朝失踪皇帝朱允炆的陵寝。其依据主要是，第一，墓碑暗合墓主是个流落江湖历尽沧桑的朱家第三代帝王——即朱元璋之孙本意。第二，墓葬规格高，精致豪华，超过一品大员林聪的墓葬。第三，古墓形制奇特，亦僧亦俗，符合建文帝朱允炆的特殊身份。王振镛研究员还指出，“这样的墓葬不是寻常和尚所能够拥有的，而身为奴才的太监又不致于如此张扬”，从而否定了古墓墓主为“僧人”或“太监”的说法。3月中旬，闽东日报以“上金贝古墓里躺着建文帝？”“上金贝古墓墓主真是建文帝”为题，对此事此论作了连续报道。闽东日报的报道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与争议。

3月25日，随着上金贝发现明代古墓葬的消息见诸报端，随着上金贝古墓极有可能是明朝失踪皇帝朱允炆的消息的被披露，从事史志工作30多年，深知此事在史学上的分量的宁德市方志委副主任王道亨，牵头在市直机关成立了“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王道亨被推举为组长。最初加入的王道亨（市方志委）、吴泽金（市委宣传部）、孙绍祥（市委组织部）、林丽祥（市总工会）、钟亮（市博物馆）等5人遂成为研究小组的最初发起人，而载入史册。

研究小组的活动得到了当时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民生的大力支持。在他的关心下，研究小组成了一个半官方的学术团体组织。

4月

4月初，研究工作开始启动。研究小组成员进驻上金贝村，用半个月时间对上金贝古墓进行了初始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小组的成员们感到要弄清这座古墓葬是否就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的陵寝，势必就要对号称“中国历史七大谜案之一”与“中国

明史第一谜案”的“明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之谜”这一重大历史谜案展开研究。这可是令许多当代的明史专家望而却步的重大历史课题啊！

面对这一情况，有的成员犹豫了。他们担心，600 年来，300 多位明史专家前仆后继，苦苦追索，却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这些人能破解得了这一世界级谜团吗？但是，组长王道亨毫不气馁，他鼓励大家说；我们又不是那些大牌的专家学者，失败了，也没有大的名誉损失；成功了，那可是我们的幸运与造化。

他将陆续加入研究小组的成员分成两拨，一拨负责上网全方位搜索有关建文帝踪迹研究问题的典籍、文章、资料、线索及相关信息；一拨负责在上金贝周边地区展开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

于是，宁德市的建文帝踪迹研究工作便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6 月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研究是从一本书、一个家族与一座寺庙、一个僧人开始的。事后的研究进程与所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以及一系列研究成果之事实证明，当初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所决定选择的突破口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长期的史志工作的实践与丰富的个人藏书以及文史知识方面的造诣，使王道亨组长在浩瀚的书山籍海中始终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他认为，中国的鸿篇巨著，不外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这三部。他认为;《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宠臣姚广孝监修、建文降臣解缙等主修，朱棣亲自审定的，里面绝对不会有我们所需要的资料与线索。《四库全书》虽修撰于清乾隆年间，但历朝历代专家学者已把它翻遍了，研究透了，我们是难以超越的。我们应该把目标锁定在《续修四库全书》这部鸿篇巨著上。理由是，《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虽然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典籍，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领域。可是，就是这两部鸿篇巨著，却也还有许多小乘之书与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未被收录，尤其是许多建文典籍未被收录。原因是明永乐

年间及清初政治上的需要所致。就在《四库全书》编成以来，几代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均曾多次向统治者倡议续修。清嘉庆初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利用职便，在江南陆续采购《四库》未收书170多种，向朝廷进呈，并撰写《四库未收书提要》。这可以说是乾隆以后对《四库全书》拟加补修的开端。可惜未果。后来，民国17年（1928），张学良将军（时兼东北大学校长）也曾提出“拟垫私财”对《四库全书》进行影印、增补、续修的倡议，亦未果。直至改革开放后的1994年，在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关心下，《续修四库全书》始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开始启动，历时8年，至2002年4月始完成全书1800册的编纂出版工作。《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既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也包括《四库全书》成书后的著述的续选。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焚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而建文典籍相当部分在此列。《续修四库全书》总共收书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可见规模之巨。该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260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下限至1911年，这之前的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可大致荟萃于此。

面对这部鸿篇巨著，小组内有些成员提出质疑，此举无异于大海捞针？王道亨组长坚定地回答；不错，我们就是要以这种大海捞针的精神来揭开这一历史谜团。也正是因为面对这一大部头著作，许多人不敢问津，我们才有机会，才会有所斩获。当然，我们不会盲目劳作，而会选择一些突破口来阅读、查找。我们的决定是，由《史部•别史类》入手，然后再逐步扩大阅读面。

功夫不负苦心人，果然，研究小组成员王小琳在《续修四库全书》中查到了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查继佐编著的《罪惟录》（原名《明书》）。因为事前组长王道亨已从网上搜索到查继佐与《罪惟录》的线索，得知查继佐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建文帝下落问题的专家学者，《罪惟录》是第一部系统叙述建文帝下落问题23说的史学专著，后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基本无出其外。在当时，这可是一本禁书，查继佐也曾因此入过狱。

这正是研究小组要找的东西。能这么快看到原著，对研究小组成员来讲真是喜出望外。组长王道亨拿来王小琳奉命下载的《罪惟录·建文逸纪》全文，并对其展开研究。

小组其他成员亦分头下载了《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与《明神宗实录》，作为辅助研究资料。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北上浙江浦江郑义门和南下福州雪峰寺之行。

于是，才有了对福建史学界所认定的“建文帝并未入闽说”的质疑。

这是建文帝踪迹研究过程中的第一个突破。

8月

研究小组成员从《罪惟录·建文逸记》中看到了历史上关于建文帝下落问题的23种说法，这就是著名的“二十三说”。大家感到，查继佐不愧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珍贵史料显示，查继佐对之前的关于建文帝下落问题的各种说法是曾作过专门研究的。只是由于后来触犯了清廷忌讳，琅珰入狱，没有作继续深入研究，真是太可惜了。同时，这一珍贵史料也使研究小组成员的思路豁然开朗，使他们明白了后世的各种说法，基本无出其外。明白了无须再去步那些专家学者的后尘，去作无谓的研究了。

《罪惟录·建文逸纪》中罗列的关于建文帝下落问题的23种说法里面，就有2说是涉及福建的。其一云，建文帝经由浙江浦江郑义门、浙江余姚，然后由温州入闽。其二云，建文帝在福州闽侯雪峰寺与郑和见过面。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怎能说“从未在史籍中见到有关建文帝入闽的记载？”怎敢断言“建文帝压根就没有来过福建？”

这一发现，使研究小组成员得以与那些著名的明史专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这一发现，亦使研究小组成员喜出望外。组长王道亨当即决定，先北上，后南下。在郑明生部长与市委组织部其他领导的支持下，这一决定得以实施。

8月初，王道亨、孙绍祥、林丽祥、钟亮、陈细灿、钟庚真、蓝陈平、宋

履张等 8 名成员联袂北上浙江浦江郑义门与浙江兰溪皇回山皇回寺。在这两处地方，小组成员意外地发现了建文帝身边的两位亲信大臣郑洽与程济的踪迹。在皇回寺后山，还发现了程济的墓葬。显然，建文帝圆寂后，程济潜隐该地，才会落葬该处。浙江浦江郑义门（亦称“江南第一家”）郑氏宗祠内特别辟建的一处供奉着一尊老佛像（即建文帝）的“老佛社”与皇回寺内特别辟建的一处供奉着一尊老佛像（即建文帝）的“老佛堂”引起研究小组的极大兴趣，特作了拍照与摄像。也正是这一发现，使研究小组后来对宁德市辖区内 9 个县市区相继发现的诸姓宗祠内供奉的“老佛龛”这一特异文化现像有了一个很好的依据充分的解读。因为这两者之间有一内在联系，决非偶然。这也成了研究小组后来破解一系列谜案的一把金钥匙。

而郑义门郑氏宗亲会副会长、郑义门文史研究会会长郑定汉先生赠送给王道亨组长的清代郑义门醉墨轩编纂的文史资料汇编《希忠录》，则成了后来研究小组发现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郑姓始祖郑岐就是浙江浦江郑义门八代孙郑洽（即跟随建文帝出亡的二十二名从亡大臣之一的郑洽），彻底揭开郑洽下落之谜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成为最终破解这一历史谜案的重要线索。

《希忠录》中记载着两首郑氏族人写的诗歌，其一为明代郑义门九世孙郑机所写的《先祖忠智公崇祀乡贤忠孝祠谨赋七绝四章其四》云；“孝义初缘御笔亲，今将移孝作忠臣，蛮风蛋雨同艰苦，长使君王恋此人。”其二为清代郑兰所写的诗云：“风云变幻矣，从龙惟有虎。事君如事亲，大节昭千古。池因夺凤凰，才能翻鹦鹉。寇压帝仓皇，英雄无用武。东道主谁家，吾家腾尺土。君不见，将军、竖儒、臣腐。惟有乃公一片心，金刚百炼心独苦。蛮风蛋雨从空劳，到今使星独耀江之浦。我尝读孝经，忠经未能补。今拟补亡诗，誊请大匠斧。”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认为，诗贵含蓄，上述这两首诗中的“蛮风蛋雨同艰苦”“蛮风蛋雨从空劳”句，寓意深刻。这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明代与清代）的诗歌作者，通过这两句诗，巧妙地向当世人与后世人透露了建文帝与郑洽的藏身之处。“蛮”在古代是指福建，因“蛮”通“闽”。而“蛋”通“疍”，

延伸为“疍民”。“疍民”特指“水上居民”，延伸为“海边居民”。闽东地方俗称渔民为“曲蹄”或“疍民”（广东省有些地方也称渔民为“疍民”，但因此诗句之前已冠一“蛮”字，当可排除）。而福建省称渔民为“疍民”的，仅闽中与闽东两地。闽中地区的闽江下游两岸也有称渔民为“疍民”的，但建文帝在闽中时，隐跸处在雪峰山上的雪峰寺，不在江边，故也可排除。前一首诗歌中的“蛮风蛋雨同艰苦”句的正确解读应是“在闽东海边渔村同甘共苦地生活”。后一首诗歌中的“蛮风蛋雨从空劳”句的正确解读应是“在闽东海边渔村替建文帝空操劳了半辈子。”

这两句诗歌的成功破译，使研究小组避免了进行大范围、大面积的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循此重要线索，研究小组立即组织力量对环绕上金贝山脚下的海边渔村展开了排查。果然，在上金贝山脚下的金涵乡的濂坑村、井上村与漳湾镇的郑岐村、门下村，相继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10月

10 月初的一天，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率领研究小组成员吴泽金、孙绍祥、林丽祥、钟亮、郑承忠、刘捷、张忠锋、李斌、余新汉、卓斌华来到了郑岐村，受到了郑岐村两委干部和郑氏族人的热情接待与大力配合，使调研活动得以顺利开展。郑氏族人向研究小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线索：1. 郑氏族人在此生息繁衍了 600 多年了，始终不知道自己祖先来自何处，家谱与周边郑姓始终无法对接。2. 郑岐村郑姓始祖郑岐公临终前交代了几件事情十分奇怪：一是说自己是朝廷钦犯，是“监视居住”，子孙后代不宜也不必去考取功名；二是说必须以他的名字作村名（这就是郑岐村村名的由来）；三是说，将来家族修家谱时，堂号就叫“东井堂”；四是说族谱要取名为“白麟谱”；五是说，村口那座公用水井要命名为“郑宅井”。3. 郑氏家族有一个十分奇特的习俗，每逢族里人家生了男孩，在来年春节要摆酒宴请族中老小，酒席上要由老人传诵四句吉利话——“新正火炮入华堂，子孝孙贤庆新春，九世同居郑忠义，子孙九代家不

分。”这种传承习俗在周边从来没见过，它到底来自何方？研究小组成员感到十分困惑。而组长王道亨则对郑姓始祖郑岐公那神秘奇特的“临终遗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功夫不负苦心人，在他的孜孜不倦地不间断的探索下，神秘奇特的遗嘱谜团终于被逐步解开了。古书《作法六秘说》云：“离者，合之反也。岐者，洽之反也。”“洽者，三之合也。”又云：“岐者山之分也，洽者水之合也。”这是郑洽巧妙利用古文字拆解反证法告诉后人——郑岐就是郑洽。郑三合就是郑洽。濂坑、井上、郑岐村知情群众提供的证言帮助我们解开了神秘奇特的遗嘱谜团。

铁沙溪古码头边上的濂坑村王姓乡亲代表王致纯、王和铅、王中兰先生和七都镇六都村的文史爱好者周乡齐先生、蕉南街道办事处的文史爱好者刘干成先生告诉研究小组成员，当地祖祖辈辈流传，明永乐年间（1403-1424），村里的王姓始祖王进，结识了一位携子迁到濂坑村来居住的郑姓朋友叫郑三合。这个郑三合人好且很聪明，父子俩很讨村里人喜欢。王进把自己在东井坂地方的老房子让给郑三合父子居住。村里一户陈姓长者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郑三合的儿子为妻。娶亲那天，南山上金鄣寺的高僧普庵禅师也来喝酒。三合管那高僧叫“师傅”，自称“弟子”。高僧精通堪舆学，特地指点郑洽在东井坂地方开挖了一口水井，取名“甘濂井”（即后来人们俗称之“安郑井”）。濂坑地方不但有“安郑井”，而且还有“安郑田”“安郑堤”。在濂坑周边地方还有“安郑门”（即今云淡门村），“安郑坪”（即今淡坪村）。据说，这些村庄与田堤的命名，与“安郑井”一样，是为了纪念皇帝与朝廷把郑洽（即郑三合、郑岐）安置此处的缘故。以致郑洽去世后，其墓葬亦被当地人称之为“困相墓”。

后来，金鄣寺的高僧普庵禅师圆寂了。郑三合便举家迁到了邻近的井上村去居住。临走时，他告诉好友王进，金鄣寺高僧就是建文帝，自己不叫郑三合，而叫郑洽，搬到邻村是为了不连累王姓族人，以免给王姓族人带来灾祸。郑三合在井上村住了一段时间后，又搬到了只有一户人家居住的郑岐村。这户人家也姓郑，名叫郑镠，郑洽要儿子认这位郑姓宗亲为兄长，并将名字改作郑钱（原

名郑栈），以便长期隐居。而郑洽又一次将自己的名字改作“郑岐”，从而成为今天郑岐村郑姓二房之始祖。

郑洽在濂坑村居住期间，住在东井坂地方。因此，郑岐村郑洽后人、下井堂（在蕉城小东门地方）郑洽后人的家谱均以“东井”为堂号，称“东井堂”，其意是在饮水思源（近源）。而郑洽原籍浙江浦江郑义门，又称“江南第一家”（洪武帝朱元璋所赐之匾）。郑义门门前那条小溪就叫“白麟溪”。郑岐村郑姓家谱与下井堂郑姓家谱均称“白麟谱”，其意仍是饮水思源（远源）。而郑岐村的公用水井取名为“郑宅井”，原因是郑义门所在地为浦江县郑宅镇辖区之缘故，用意同上。

至此，郑洽所设之神秘奇特之“临终遗嘱”迷局已悉数破解。此后数年，省内的《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收藏快报》《闽东日报》《宁德晚报》以及省外的《澳门日报》《金陵晚报》等多家媒体均不同程度地报道了研究小组的探秘解谜过程，有的媒体还作了连续性的报道。

颇具戏剧性的是，时任郑岐村村民主任的陈幼香女士与郑氏宗亲会会长郑成意、副会长郑裕亮先生竟然提出要加入研究小组，不拘一格的王道亨组长，欣然同意接纳了他（她）们。此举开了研究小组成员由机关走向社会的先河。此后数年，相继有社会贤达陈言雕、刘干成、周乡齐、王志纯、何宗鸿、王和铅、王中兰、阮晓东、释传弘、钟庚真、蓝陈平、钟昌发、钟碧弟、杨建斌、陈云明、王仕健、林尚华、周昌启、张本超等数十人加入了研究小组。

11月

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故宫特约研究员、明史专家熊召政教授一行在闽东日报副总编邱树添的陪同下，应邀到宁德考察上金贝古墓与建文帝踪迹，并应邀参加了在山水大酒店举行的宁德市首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郑民生、副市长薛成康及第一批研究小组成员2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会上，熊召政教授强调指出：中国历史上，那些落位的帝王与王公大臣，他们逃亡的方向一般只有两处，一处是湖北的武当山地区，也就是襄阳地区暨神农架地区；

另一处就是你们的闽东地区，这一点是有规律可循的。你们可以作一些探索与研究。所以说，建文帝往东南方向的福建宁德逃亡是非常有可能的。此外，永乐年间毁寺杀僧的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不仅闽东一地有，别处也有，不过朱棣烧毁的都是临济宗这一派的寺庙，因为临济宗这一派僧人，从掌门人溥洽起，从上而下，都是支持朱允炆，反对朱棣的。所以，朱棣上台后，临济宗这一派的寺庙与僧人就在劫难逃了。

熊教授的话，给研究小组成员以很大的启发，使他们更加坚定了将建文帝的出亡方向锁定在东南方向的福建宁德的基本观点，并继续坚持以这一基本观点作指导思想展开研究工作的信心与决心。

同月

浙江浦江郑义门郑氏宗亲会副会长郑定汉一行 5 人，应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邀请，到达宁德考察。他们先后考察了郑岐村与上金贝，还实地察看了郑洽墓葬——“困相墓”（位于金涵乡濂坑村后壑坑地方，1958 年修建福宁公路与水渠时被毁）的位置。他们用罗盘定位后认为，郑洽（郑三合、郑岐）墓葬与建文陵在同一中轴线（龙脉）上，建文帝葬在山上，郑洽葬在山下，这符合忠智公郑洽的行事风格。他们建议郑岐村郑姓宗亲与郑义门郑姓宗亲要加强联系，共同配合研究小组争取把建文帝从亡大臣郑洽的下落之谜彻底揭开。返回之前，他们向郑岐村郑氏宗亲发出邀请，请他们与研究小组一起到郑义门考察走访。

同月

11 月 26 日，福建日报刊载了由记者庄严、通讯员吴泽金主笔的“上金贝：建文陵寝话玄机”专文，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12 月

郑岐村郑氏宗亲会代表 11 人、研究小组成员代表 5 人在组长王道亨的带领下，赴浙江浦江郑义门调研。这对研究小组来说，是二上浙江浦江郑义门了。而对郑岐村的郑氏宗亲代表来说，则有一种特别的似曾相识的感觉；郑义门郑

氏家族的家规家训怎么与郑岐村五幢老房子内的柱子上的对联内容一模一样；祠堂内悬挂的“九世同居”的牌匾怎么与郑岐村郑氏族人在阴历正月初一唱颂的诗句中的用词一模一样：郑义门种植9棵600年树龄柏树，表示“九世同居”，郑岐村亦曾植有5棵600年树龄柏树，表示郑岐公“一花开五叶”（育有5个儿子）；郑义门门前的小溪叫白麟溪，而郑岐村郑氏族谱就取名“白麟谱”；郑义门所在乡镇名郑宅镇，而郑岐村村口的那座公用水井则叫“郑宅井”……这一切怎么就这样巧合，巧合得使人倍感亲切?

在返回的路上，郑岐村众位郑姓乡亲都觉得不虚此行，且在心里都默认了：我们的祖先应该就是来自郑义门。

同月

按照“北上南下”的工作计划，组长王道亨率领研究小组成员孙绍祥、林丽祥、刘捷、蓝陈平、蓝良吉、陈丽英等到达千年古刹——雪峰寺。待组长王道亨说明来意后，该寺副住持释明深法师热情地接待了小组成员，给他们提供了许多线索。并将明代徐𤊹编撰、清代与民国两次重修的《雪峰山志》借给他们复印，使他们从中获得了许多涉及建文行踪的珍贵史料。

2009年

1月

1月14日，福建日报再次刊载了记者庄严、通讯员吴泽金撰写的“建文帝陵寝之谜有新说”专文。之后，又分别于2009年7月30日、2009年11月12日、2010年5月18日连载了他们主笔的“建文帝陵寝谜底渐现”“建文帝陵寝考证又添新线索”“郑洽归宗；佐证建文帝陵寝论断”文章，对建文帝踪迹研究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月

2月3日，浙江浦江郑义门郑氏宗亲会会长郑隆喜（全国十大锁王之一）一行来到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进行实地考察。这第二次考察，促使他们与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达成了初步共识：郑岐极有可能就是郑洽。

3月

就在研究小组成员把研究目光集中于浙江浦江郑义门与福建福州雪峰寺的同时。在千里之外的江苏省南京市，也有一批专家学者瞄上了这两处地方。他们是；原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资深明史专家潘群，南京凤凰传媒编审、明史专家马渭源，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明史专家郑自海（郑和十九代孙），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明史专家郑宽涛（郑和二十代孙）。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当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与成员吴泽金与郑宽涛先生联系上后，双方竟然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觉。

经请示郑民生部长后，王道亨组长向郑宽涛先生发出邀请，请他和潘群教授、马渭源编审、郑自海秘书长到宁德考察建文史迹。郑宽涛先生欣然接受了邀请。

同月

3 月 25 日，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在蕉城区文体局二楼正式挂牌，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与蕉城区政府蓝晓平副区长及部分成员 30 多人出席了挂牌仪式。王道亨组长与年届八十三岁的蕉城区蕉南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刘干成先生为研究小组日常办公人员。

4月

4 月上旬，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首次向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民生提出，支提寺珍藏的云锦袈裟极有可能就是洪武帝朱元璋制作 的、被建文帝朱允炆带出宫的那件龙袍。

5月

5 月 19 日，明史专家郑自海、马渭源、郑宽涛先生一行到达宁德。

20—21 日，南京专家组一行在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成员吴泽金、孙绍祥、林丽祥、钟亮、郑承忠、刘捷、钟宜国、钟泉芳、余新汉、钟庚珍、蓝陈平、陈幼香等人的分别陪同下，考察了宁德上金贝、郑岐村、支提寺和福州闽侯雪

峰寺。南京的专家学者对王道亨组长发现的记载着郑和送千尊铁佛到宁德支提寺的明代木刻十分震惊，他们认为，这是一件从未见于典籍记载的实物证据，可谓是个惊天大发现。这么重要的东西，历代的文人与史家为何未发现，抑或已发现而不去记载它，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惊天秘密。由此推断，建文帝出亡至宁德并隐于宁德最终圆寂于宁德是完全有可能的。

21 日，宁德市第二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在山水大酒店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民生与宁德市副市长周乡绮出席会议。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向与会专家学者汇报了 2008 年 3 月以来研究小组开展研究的情况和主要研究成果。会上，南京专家建议；应尽快成立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会，以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要展开对支提寺珍藏的一系列明代珍贵文物的研究；应重视民间传说，大胆加以利用；应继续加强上金贝古墓和郑岐村郑洽隐居地的研究。郑民生部长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上金贝、支提寺、郑岐村文物的保护力度；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继续支持研究工作；研究小组要坚定信心，要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在当前已掌握大量真凭实据的前提下，争取出更大的成果。他希望，江苏省与南京市的郑和研究会与南京的专家学者能够帮助邀请到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此项研究中，一如既往地支持宁德市的建文帝踪迹研究工作。

6月

6 月底、7 月初，《福建日报网》《扬子晚报网》等媒体相继报道了南京云锦袈裟研究所设计室主任、云锦研究专家张洪宝先生对送到该所要求复制的支提寺珍藏云锦袈裟的鉴定意见》：“这件袈裟应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很可能就是建文帝携带出宫的那件东西。”消息传来，王道亨组长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增设“支提寺云锦袈裟之谜”课题，对袈裟展开研究。

研究小组的研究得到了后来到达宁德考察的南京明史专家潘群、马渭源、郑自海、郑宽涛和贵州“红崖天书”破译专家林国恩等学术界同仁的认可与支持。

北京故宫的专家也认为支提寺云锦袈裟应该是明代初期的东西。

8月

8月中旬，中共福建省委卢展工书记一行在宁德市委陈荣凯书记的陪同下，到上金贝畲家寨考察。卢书记一行还专程到上金贝古墓进行了实地考察。

同月

8月25—28日，应宁德市的邀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明史专家潘群，南京凤凰传媒编审、明史专家马渭源，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郑自海，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郑宽涛一行6人达宁德，实地考察了上金贝、郑岐村、支提寺，一致认定上金贝古墓为明建文帝陵。潘群教授还先后写下了“明朝第二陵”与“明建文帝陵”（该条副镌刻于帝陵山门牌坊背面）两副横幅赠送给研究小组。

南京专家的认定意见在全国媒体与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中央电视台（四套）也转播了相关新闻。

同月

8月26日，宁德市第三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在闽东宾馆贵宾楼召开，市政协主席姚智梅，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民生，副市长陈兴生以及部分研究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南京明史专家潘群、马渭源、郑自海、郑宽涛先生应邀参加研讨会，并分别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充分肯定了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工作，一致表示要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研究小组开展好研究工作。姚智梅主席代表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对潘群教授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希望他们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工作。

同月

8月31日，闽东日报用整整一个版面，刊载了马渭源编审的《追蹄大明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600年谜案宣告破解——解密支提寺云锦袈裟主题图饰》等两篇文章。

9月

9月初，宁德晚报决定开辟一个专版，连续报道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探

秘解谜全过程与研究成果。9 月 4 日，由记者缪洪通主笔的“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一”刊出。之后，共连载了 13 期。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尤其是中、老年人与文史爱好者的要求，从 2009 年 11 月 21 日起至 2010 年 6 月 22 日止，又连载了 36 期。

同月

9 月 7 日与 9 月 14 日，闽东日报继续用整版刊载了郑自海秘书长的《从朱元璋“闭嘴”作皇帝——试论闭嘴龙造型为明初皇家的规制》与马渭源编审的《支提寺袈裟图饰透露主人身份非凡，六百年历史谜案告破确切无疑》等两篇文章。

9 月 22 日，闽东日报记者黄莉莉撰文记述原中国古建筑研究所所长、著名古建筑专家于郑生教授实地考察上金贝建文帝陵的经过。于教授认为“上金贝古墓绝非元代僧人之墓，元代的习惯是不造墓，直到现在还有好几个元代皇帝找不到墓。而僧人也只有建舍利塔”。“古墓从风格上判断，应为明初到明中叶以前的。这一点，是从该古墓舍利塔底座的须弥座与莲花座的图饰来判定的。从理论说就是——具有明初的建筑风格但保留宋代的遗风。”

同月

省文物局局长率领专家组一行 6 人到宁德进行实地考察。专家组认为，上金贝古墓为沧海禅师墓。

同月

宁德市第四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在东方国际大饭店召开。

同月

9 月下旬，研究小组成员王道亨、吴泽金应中央电视台《百科探秘》栏目组的邀请，与南京的潘群教授、马渭源编审一道，以特邀嘉宾身份，作客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观众解读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与上金贝建文帝陵。

10 月

10 月 7 日，南京凤凰传媒编审、明史专家马渭源专程赶到宁德，用最新

的研究成果反驳了“上金贝古墓为沧海禅师墓”的模糊观点，重申了“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上金贝古墓系明建文帝陵”的观点。

同月

10 月 30 日，福建日报用专版推介宁德蕉城旅游风景线，其中的“畲家山寨惊现建文陵寝，上金贝舞动蕉城旅游龙头”醒目标题不仅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目光，还为上金贝引来了大批的省内外游客。高峰期，每天游客达上千人次。

11 月

2009 年 8 月，浙江浦江郑义门郑氏宗亲会会长郑隆喜在接受《浙中新报》记者石磊的采访时，公开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基本确信福建宁德郑岐村郑岐就是浙江浦江郑义门八世祖郑洽。消息传来，研究小组倍受鼓舞。在与浙江方面取得联系后，决定于 11 月 3 日，组团第六次北上浙江浦 江郑义门进行实地考察与家谱对接。

考察当天，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在翻阅《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一书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据《浦江县志》载，事隔靖难之役二百年后，在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者秉铎闽之镇海卫，致书浦江郑氏，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后子孙颇繁盛。”很显然，这句话的大体意思是：崇祯年间，郑义门收到了一封寄云南蒙自的一个姓郑的人写来的信，随信还附了一份“闽之镇海卫”的郑铎出具的文书，证明自己先祖跟随皇帝出亡，流落云南、广东，子孙后代繁盛，现欲认祖归宗。对其中所提到的“郑铎”，王道亨觉得十分眼熟，拿来郑岐村与下井堂的《郑氏宗谱》一查，果然在两本家谱的《世系表》中，均出现了郑铎其人，这让研究小组的人兴奋不已。

次日，在郑宅镇政府的大会议室中，众人在明崇祯间修的浦江《郑氏宗谱•卷十》中，找到了上述那段文宁的出处，它比清修《浦江县志》记载得更加明确。该段文字系郑义门第十五世孙郑崇宏所记述，文曰：“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秉铎闽之镇海卫寄书请谱。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蒙自子孙因家族颇繁盛，方之”这是一段原汁原味的文字，意思十分明确，即“崇祯年间，

云南蒙自有一个姓郑的人，拿着一封福建的镇海卫郑铎帮他写的证明文书，说他是郑义门的后人，是当年追随建文帝出亡云南、广东的义门八世祖郑洽的后代。现在家族繁衍壮大，要求认祖归宗，续上家谱。”显然，《浦江县志》的记载部分有误。应以明修《郑氏宗谱》为准。这在清编的《麟溪集》中的郑义门第十六世孙郑尚潘记述的《致身录节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该文最后一句；“明系讳其洽也。则蒙自之郑。为洽祖之嫡裔。无疑矣。”既然经“郑铎”证明的“蒙自之郑”都被确认为是郑洽之后裔了，那么这个“郑铎”是郑洽之后嫡应该更是确切无疑了。

而“闽之镇海卫”是什么意思呢？据史料记载，镇海卫系明洪武二十年（1381）朱元璋下令设立的一个军事辖区，由江夏侯周德兴任主官，其总镇设漳州府之镇海镇故称镇海卫。下辖福州府福宁县之福宁卫（其时福宁州已裁撤，降为福宁县，与原辖县福安、宁德一起并入福建行中书省福州府），福州府福清县之镇东卫，兴化府之平海卫，泉州府之泳宁卫。由上可见，闽东的福宁卫在镇海卫辖区内。郑洽后人为安全起见，把隐居范围说大一点也在情理之中。

面对着这一成功的家谱对接，与这些文字证据，郑义门宗亲会暨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郑定汉、秘书长郑秋义当场表态，同意福建宁德郑岐村郑氏认祖归宗，并正式确认郑岐即郑洽，郑岐村郑氏为义门八世祖郑洽后裔。并决定 2010 年阴历二月初八祭祖大典时一并举行归宗仪式。

同月

福建省厦门市郑坂村老人会在媒体上获悉建文帝与郑洽的一些史事之后，发现自己的宗谱中赫然记载着郑洽及其后代的信息。当年 11 月 29 日，郑坂村老人会理事郑原美等人向浙江浦江郑义门“江南第一家”文史研究会负责人郑隆喜先生寄去了他们先祖郑安升的墓碑碑文及郑洽的相关资料。

12 月

12 月上旬，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一行 10 多人在王道亨组长的带领下抵达厦门市郑坂村，实地察看了郑安升的墓葬碑文及相关的一些史料。厦门

市郑坂村郑姓族人给外调组提供的这些史料证据，刚好填补了研究小组研究郑洽下落问题这个课题之不足。

厦门市郑坂村《郑氏宗谱》的资料显示：郑洽共生育五子二女。长子郑榛，化名郑安升，定居厦门。次子郑松，靖难之役阵亡，其兄将其化名郑安治，葬厦门。三子郑樵，四子郑模，随母隐居浙江浦江桃源口。五子郑栈，化名郑钱，随父隐居福建宁德郑岐村。

建文初，郑榛曾任职于云南刺史府上。建文三年（1401），他迎娶了朱标的三女儿、朱允炆的亲妹妹朱璎娘，成为皇家驸马。“靖难事变”发生后，秘密举家迁往福建省翔凤里（今厦门），先居山头仔村，后迁郑坂村，与郑栈（郑洽第五子）一样，郑榛也认先徙居郑坂村的远房宗亲郑安德为长兄，自称二弟，并将名字改作郑安升，以掩人耳目。

郑洽次子名叫郑松，“靖难事变”发生后，为掩护建文帝的大队人马借道江苏太仓南撤浙江、福建，率部在江阴阻击燕军，不幸阵亡，草草埋葬。事隔多年，缓过劲来的大哥郑榛，才赴江阴，偷偷将二弟的骸骨运回福建，易名而葬。这些史事均记载于郑坂村《郑氏宗谱》中：“郑公安治，生于皇明洪武辛未年九月初七日申时，幼居帝都学文习武，文武双全。皇明永乐乙丑年七月十一日，在江阴护卫建文帝时阵亡，孝继男郑秉华。”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认为，真正到福建宁德郑岐村迁居，成为郑岐村郑氏与云南蒙自郑营村郑氏先祖的应该是郑洽的小儿子郑栈（化名郑钱）。这个郑栈才是跟随父亲郑洽（化名郑三合、郑岐、郑堂）终身追随建文帝尽忠的人。他与父亲先后隐居于上金贝山脚下的濂坑、井上、郑岐等村。其墓葬就在郑岐村门犬山地方，与上金贝建文帝陵遥遥相望，替帝陵看守东南门户。

至此，建文帝二十二名从亡大臣之一郑洽下落之谜的探索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0 年

1月

中共宁德市委陈荣凯书记在百忙中抽空全文阅读了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送呈他的长达 300 多页的《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考证》一书。事后，陈书记对王道亨组长说，考证基本上翔实可靠。

3月

3 月 22 日，由研究小组成员和郑岐村郑姓宗亲代表组成的 47 人代表团，在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蕉城区委常委杨良辉、副区长蓝晓平的带领下，到达浙江浦江郑义门参加认祖归宗庆典仪式。

3 月 23 日，浙江浦江郑义门——“江南第一家”内一片喜庆。在热烈的掌声中，经郑义门宗亲会确认，福建宁德蕉城区郑岐村郑氏宗亲会会长郑成意率领几位宗亲代表，在《归宗金禧书》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失散 600 多年的裔孙来认祖了，同时，也意味着“失踪”600 多年的浙江浦江郑义门八世祖郑洽终于归宗了。

浦江郑氏原以八世义字二十六兄弟分号，凡在宗祠祭祖时敲钟二十六下，再行祭礼，后因二十六少弟郑洽随帝出奔，不知所踪，遂只能敲二十五下。然郑氏族人于心不甘，故在敲二十五下之后，复敲半下，以示郑洽随帝出奔之举尚在延续，终有出头之日。果不其然，这一等待了 600 年的钟声终于在 2010 年 3 月 23 日这一天敲响了，而且是完完整整的二十六下。

浙江浦江郑义门的人沸腾了，福建宁德郑岐村的宗亲代表沸腾了，韩国郑氏宗亲参拜团的代表沸腾了。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高兴地对记者说：“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他认为，此举意义十分重大，它为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长眠金贝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把建文帝下落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随后，与会的全国十八家媒体记者纷纷报道了这一盛况。

这是建文帝踪迹研究过程中的第二个突破。

同月

根据明代徐火勃编著的《雪峰志》及清代、民国重刊的《雪峰山志》与清代查继佐编著的《罪惟录·建文逸纪》的记载，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期间，曾送瓦塔两座到雪峰寺，并与建文帝邂逅相遇，惊讶之余，郑和“泣拜于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对不能，别去。”

建文帝为何会躲藏在雪峰寺？

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精心研讨了《雪峰志》与《雪峰山志》。

一个神秘的高僧名字终于浮出了水面——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正映洁庵禅师。

据《雪峰志》与《雪峰山志》记载，洁庵禅师俗家姓洪，江西人，从小在福建宁德（今蕉城）的三峰寺（在洋中镇）与安仁寺（在石后乡）出家，当小沙弥。后拜南京灵谷寺住持、福宁籍（今福鼎市桐山镇籍）的高僧道谦牧庵禅师为师。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被朱元璋选拔为“国师”。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被朱元璋派到福建泉州开元寺任住持。永乐二年（1404年），突然辞去开元寺住持一职，转到雪峰寺任住持。永乐十六年（1419年），在雪峰寺突然失踪。雪峰寺副住持释明深法师说；“洁庵禅师是个神秘的高僧，我们雪峰寺前辈高僧代代相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的祖传画像之下记着一段偈语，至今无人能解。”按照明深法师的指点，王道亨组长在《雪峰山志》卷首洁庵禅师画像下读到了该则偈语：“前身后身，哪个是真，圣枝卵石，留签为珍，师乎师乎，来去有因，五百年后，雪峰回春。”王道亨组长认为，这里的“五百年后”当是虚指，可以是六百年，也可以是七百年，不定数。实暗指600年后，此迷案当可破解，雪峰寺又要名扬天下。

而洁庵禅师为何又会神秘失踪呢？

2009年3月，研究小组决定增设“洁庵禅师失踪之谜”课题进行研究。研究小组孙绍祥、刘捷、张忠锋、李斌、叶林生、赖文宫、吴康承、周乡齐、陈言雕、周康明、王小妹等成员先后参与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研究小组前后用

了将近一年时间，始解开这一谜团。

为了弄清洁庵禅师失踪之谜，王道亨组长带领研究小组成员吴泽金、郑承东、焦宁华、余新汉、蓝陈平、陈幼香、刘美观两下福建泉州开元寺，三上江苏南京灵谷寺，走访高僧，查阅档案，并购买了《灵谷寺志》《古南京史话》《郑和航海图》带回研究。

后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明永乐十六年，洁庵禅师的失踪缘于建文帝曾隐蔽于雪峰寺，雪峰寺一度成了建文势力反攻复辟的大本营。由于建文帝被祖渊禅师发现，遭到逮捕，并被秘密囚禁于永乐势力的大本营支提寺。从而祸及洁庵，洁庵禅师遂被朝廷秘密拘捕，被锦衣卫带到北京囚禁起来。原因当然很明白，窝藏与包庇建文帝。

这是建文帝踪迹研究过程中的第三个突破

4月

由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任主编的《建文帝研究系列丛书》共三本，以内部刊号形式出版。

同月

4月12日，中共宁德市委组织部以宁委组干函（2010）30号形式通知宁德市方志委，正式抽调王道亨副主任至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工作。

同月

4月中旬，原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一行，在宁德市委陈荣凯书记的陪同下，到达上金贝，专门考察了建文帝陵。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及成员钟宜国、蓝水禄、黄爱星、郭智明等陪同考察。

5月

由洁庵禅师失踪之谜而带出来的明永乐帝三大宠臣郑和、胡濙、祖渊（雨庵禅师）结缘雪峰之谜逐渐浮出水面。研究小组相应设立了“郑和踪迹建文之谜”“ 胡濙福建行踪之谜”与“祖渊禅师任职雪峰之谜”等三个课题对建文踪迹作深度考证。

同月

南京凤凰传媒编审、明史专家马渭源的专著《破解600年第一谜案》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宁德市为他举行了首发式。

7月

研究小组王道亨、蓝晓平、郑承东、焦宁华、苏方金等5位成员，应邀赴南京出席“国际建文帝踪迹研讨会”。王道亨组长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这一学说的提出，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响应。

正是由于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亮相，使得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及其学术研究引起了国际和中国史学界的注意和重视。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先生和副会长毛佩琦先生在会议总结发言中均着意强调了“今后的明史研究一定要走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的道路，不能再是书本里来书本里去了。”

这是对福建宁德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肯定与褒扬。

7月8日，三都澳侨报以“‘建文帝出亡宁德说’南京强势发声”为题，专版报道了会议概况。

这是建文帝踪迹研究过程中的第四个突破。

同月

研究小组成员的执着精神感动了许多著名明史专家，他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以各种方式介入了研究小组的研究。

7月3日，国际知名明史专家、日本关西大学校长阪仓笃秀教授在明史专家马渭源的陪同下，专程从南京赶到福建宁德上金贝拜谒建文帝陵，并到支提寺瞻仰云锦袈裟。

阪仓教授与马渭源编审还出席了宁德市第五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同月

7月5日至7日，原省政府副省长、省诚信促进会会长潘心诚一行，在市

委书记陈荣凯的陪同下，到宁德上金贝、支提寺考察调研。在上金贝考察过程中，潘会长认真听取了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的工作汇报。他强调，上金贝景区不仅仅是一个景点，还是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场所，一定要把旅游开发的事情办好。随着建文帝文化广场的建成以及该旅游项目的推广，必将有大批游客进入景区。建文帝陵的考证已成定论，考证依据充分，列举出的佐证很有说服力。因此，如何将上金贝建文帝陵作为特色，抓好周边景区建设将是重点。

潘会长还挥笔为建文帝陵的山门题下了“明二陵”三字。

7月8日，三都澳侨报专版报道了这一消息。

8月

8月13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一行到达上金贝考察调研。

同月

8月18日，中共宁德市委常委、蕉城区委书记郑民生率领研究小组成员王道亨、兰晓平、黄振溢、郑承东、黄钲平等，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向商传等5位专家汇报了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工作。汇报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与支持。

8月26日，三都澳侨报以“‘建文帝出亡宁德说’走进中国社科院”为题，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

这是建文帝踪迹研究过程中的第五个突破。

9月

9月10日至11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著名明史专家毛佩琦教授应邀到达宁德市上金贝、郑岐村、支提寺考察。在支提寺与郑岐村考察时，毛佩琦教授深为王道亨组长发现的记载着郑和送千尊铁佛到达支提寺史事的明代木刻和郑岐村的奇事所震惊。他建议适当时候可考虑在郑岐村建一座“郑洽纪念馆”，他十分愿意为纪念馆题匾。从而间接表达了他个人对“郑洽下落之谜”的最终被破解的欣赏与认可。

9月11日，毛佩琦教授出席了“宁德市第六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并

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也再度赞扬了研究小组的执着与奉献精神，他认为，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研究，工作扎实，成绩突出，在全国各种说法中，证据链最充分，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9 月 16 日，三都澳侨报专版报道了毛佩琦教授来宁考察活动的全过程。

12 月

12 月上旬，王道亨、释传弘、王仕锦合著的《金鄁志》一书以内部刊号形式出版发行。

2011 年

1 月

1 月上旬，集众家之长，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完成了《上金贝古墓为什么被众多到访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确认为明建文帝陵？》课题。该课题从规制（三大特点）、格局（三大特点）、构件（两大特点）、构件纹饰（两大特点）、墓主的宗教信仰（两大特点）、舍利塔 20 字碑刻解读等六个方面，深度解读了上金贝古墓。

2 月

2 月中旬，研究小组成员周乡齐、孙绍旭、袁科峰、谢爱国、陈丽英、吴谨等相继完成了《林聪与明建文帝陵》《洪武至永乐年间明政权对闽东的控制研究》《建文朝殿前三品指挥使杜华泗身世之谜初探》等课题的研究。

3 月

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执笔的《与建文帝史事相关的闽东民间传说故事研究》《郑和宁德踪迹建文考》《用诗歌证明建文帝出亡至福建宁德》等课题相继完成。

4 月

4 月 14 日，三都澳侨报用专版全文刊载了中共宁德市委副书记唐颐撰写的《六百年的眺望》一文，文章高度评价了研究小组成员的执着与奉献精神，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同月

市委唐颐副书记、市委郑民生常委、原市政协姚智梅主席、原市政协缪耕山副主席、市人大兰秀珍副主任接受研究小组聘请，担任研究小组顾问。

同月

4月21日，著名明史专家、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商传教授应邀到宁德。商传教授在宁期间，对上金贝建文帝陵、支提寺、郑岐村和石后乡国母亭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并应邀出席了宁德市第七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听取了王道亨组长关于“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的专题汇报。他对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并欣然挥笔写下了“六百年来是与非，今日求解又何为？只缘身系国家事，不解此谜逝不回”四句诗歌赠予研究小组，作为激励，并为蕉城区新闻中心正在拍摄的以建文谜案为题材的专题历史纪录片“龙隐宁川”题写了片名。

在考察期间，商传教授还以《建文帝与明初的政局》为题，为蕉城区干部群众作了一场精彩的历史文化专题讲座，并接受了蕉城在线女主持人包小红的专访。专访中，商传教授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一）建文帝出亡方向在“东南一隅”；（二）建文帝遗臣及其后代在宁德的大量出现是个重要佐证；（三）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执着精神与工作成效值得钦佩。

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与成员蓝晓平、吴泽金、郑承东、刘夏阳、钟泉芳、郑裕亮、陈言雕、陈幼香等陪同考察。

这是建文帝踪迹研究过程中的第六次突破。

5月

5月初，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发现一座明代古墓的消息引起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的注意，他带领研究小组成员陈言雕、余新汉等，在洋中镇领导的陪同下，赶赴钟洋村开展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在考察活动中，无意间在余姓宗祠发现了帝师周斌为余氏宗祠写的对联。“周斌怎么会给一个草寇头领和山大王的祠堂写对联？”“他与余姓先祖余六府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王道亨组长

在脑子里琢磨开了。

6月

6月10日，中央巡视组组长，原安徽省委书记、广电局局长王大华一行，在宁德市委陈荣凯书记、市政府廖小军市长等人陪同下，到上金贝调研。王组长一行专程考察了建文帝陵，并听取了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对帝陵和建文帝为什么要出亡福建宁德的解读。王组长高度赞扬了研究小组的执着奉献与善于钻研精神。

同月

6月中旬，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决定二上钟洋村。他召集钟洋村余姓族人开了一个座谈会，了解到一系列新线索。他初步断定，余六府绝不是一般草寇，而极有可能是建文帝从亡大臣。他决定扩大阅读面与调查范围。在蕉城区直机关任职的余永清和余姓企业家余根诚、余伏灿以及退休教师余深义等人的积极配合下，在20世纪90年代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古田分卷》中查到了关于“草寇”余六虎（府）的一些传说。并在钟洋村及其周边地区查到了关于余六府的另外一些传说。可奇怪的是，在三本《余氏家谱》中，关于余六府的生平事迹，却只有可怜的寥寥两行字，只知道他当过道士，绰号叫“六府”，连真实姓名叫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余六府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何如此这般神秘？神秘的让子孙后代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当的是什么官？有家谱，却不书写上姓名；有墓葬，墓碑却又不敢署名。这到底是为什么？

王道亨组长一行带着一系列疑问暂离钟洋村。

7月

7月上旬，为了彻底搞清楚余六府身世之谜，王道亨组长调兵遣将，三上钟洋村，开展大面积的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并将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的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古田县杉洋与大甲两个乡镇。功夫不负苦心人，在众人的努力下，余六府身世之谜谜底渐现。

第一，首先，破解了余六府墓葬留给后人的神奇密码。

余六府的墓葬无论是规制、格局、构件、造型、用料、墓碑文字均与上金贝建文帝陵有异曲同工之处。①明代的官帽椅造型，说明它是一座明初的墓葬。②墓葬上有拜亭（已毁，但构件与基础仍在），前有神道与石像生（已毁，但基本格局尚在），说明墓主是明代一位高级官员，而且至少是从三品，而不是“草寇”或“山大王”。③墓碑用于表明墓主身份的用字隐晦难解，与上金贝建文帝陵舍利塔碑刻用字以及郑岐村门犬山郑洽小儿子墓葬碑刻用字、濂坑后壑坑陈添（河南郑州府同知）墓葬碑刻用字一样，说明造墓者不想让世人知晓墓主的真实身份。④墓碑文字说明，余六府夫人姓周，联系余氏宗祠内周斌对联的落款“眷弟”二字，表明两点，其一，余、周两家是姻亲关系；其二，余六府与周斌是同时代的人。⑤墓葬用料全系溪石、卵石。用卵石砌墓之做法不同于宁德（蕉城）当地的习俗，它沿袭了江苏南京一带的习俗，此说明余姓祖先余六府及其家人来自江苏南京。而祠堂门口两边粉墙上的一副对联“钟山发迹，子而承，孙而继，千秋统绪续当年；湾水开基，宗有功，祖有德，数代怡谋绵俎日。”更证明了这一推断。⑥余姓宗老提供的证言与家谱记载相吻合，该墓葬确系余姓祖先余六府（虎）之坟。墓碑文字，左边书曰：“妣亲周氏”。右边书曰：“女考 君余公。”说明该墓主是余六府与其夫人周氏的合墓葬。中间大书曰：“戎宋大夫之墓。”这“戎宋大夫”四字，我们的理解是，它说明墓主是个武将，而且不是一般的武将，也许是个元帅。至于现实历史中是否有“戎宋大夫”这个封号，我们的理解是，如果有，那也是在出亡期间，建文帝给的封号。如果没有，那它就是一句暗语，只有留待日后再予破解。而墓碑不直接书明墓主人的真实姓名与身份，这与上金贝古墓如出一辙，异曲同工。而造墓人不想让世人知晓墓主人隐秘身份这事本身就说明了墓主人与建文史事有关。因为，在明永乐初那个特定的明代，需要隐藏身份，不能示于世人的除了与建文帝走得很近的人之外还能是什么人呢?

第二，使余姓宗祠内隐藏的一系列谜团，也一一得到了解读。

钟洋村余姓宗祠就坐落在余六府（虎）墓葬的边上。这是一座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的宗祠。清代虽有过重修，但仍保留原貌。走进祠堂，几副特大型柱联十分引人注目。中间一副对联，上联书曰："国族聚于斯相府芳声未艾"，下联书曰："宗祊藏之久后贤俊烈重兴。"落款为"眷弟万象新。"旁边一副对联，上联书曰："接武龙墀台谏勋名香御墨"，下联书曰："恹猷翰苑校书门第焕文章"。落款为"眷弟周斌"。祠堂大门两侧粉墙上的一副对联，上联书曰："钟山发迹子而承孙而继千秋统绪续当年"，下联书曰："湾水开基宗有德祖有功数代贻谋绵此日"。

钟洋村余姓宗祠中这三副奇怪的对联到底给后人透露了哪些历史信息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副对联。从对联所要表达的意思来看，显然主要是对余氏宗族的旌表与褒扬。从对联所处之居中位置来看，该副对联作者地位很高，应当在"两代帝师"周斌之上（因为帝师周斌所撰对联尚居下首）。

那么，这个"万象新"到底是谁呢?他的对联怎么会与周斌的对联一同出现在钟洋村余姓宗祠里呢?

仅从表面现像分析，我们可以断定，"万象新"、周斌与余六府（虎）应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应是明初之人。据钟洋村余姓宗老提供的证言所示，钟洋余姓先祖余六府（虎）祖籍系南京城月半池地方，他是死于明永乐初的。而余姓几位二祖是为了给余六府（虎）守墓而迁到钟洋村定居的。他们原先就隐居在钟洋村水头方向的湾底村。由此可见，这个"万象新"应是这个时候的人。

可是，我们查遍所有的史料，询问过周边所有的知情者，谁也不知道这"万象新"到底是谁?很显然，这是个化名。是个不愿为人知的"隐者"的化名。不然，为何给自家祠堂题写对联的地位显赫的人竟然全族无人知晓，家谱不作记载。这显然不合常理，十分蹊跷。

那么，这个"隐者"是谁呢?

我们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所收集的相关资料显示，建文帝朱允炆的后裔曾经冒用过"万""黄""让"三个姓氏。据此，我们推测，这个"万象

新”极有可能是建文帝太子朱文奎曾用过的一个化名。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这个“万象新”就极有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太子。这第一副对联就极有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太子所撰。除此之外，其余人等为余姓宗祠撰写对联，家谱不可能不载，族人不可能不知。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以下的分析中得到进一步佐证。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二副对联。从对联所要表达的意思来看，上联一是说明钟洋余氏始祖余六府是皇帝身边的武将，极有可能是锦衣卫将领，“龙墀”一词说明了这点；二是说明余六府祖上跟随先皇建功立业，功勋卓著，屡受先皇表彰。“香御墨”三字既点明了这一层意思，又暗示了另一层意思——主人余六府（虎）曾是个得到过“御赐墨宝”特殊荣耀之人。这一点，也间接佐证了“万象新”就是“皇上”——建文帝。下联一是说明钟洋余氏先祖们不但武功卓著，文治也很显赫；二是说明那些在翰林院任职的余姓先祖们留下了许多传世文章，被千秋传颂。

至于这个自称“眷弟”的周斌，是否就是明代的“国子先生周斌”，这一点从以下三点可以得到证明。第一，钟洋村余姓二祖是明永乐初始迁居于此的。第二，祠堂边上的余六府墓葬墓碑写明“妣亲周氏”。第三，钟洋村余姓宗老证言，余六府夫人系周斌姐妹。

最后，再分析一下第三副对联。“钟山发迹”一词，暗示余姓祖先余六府是在南京做官并受到提拔，成了皇帝的近臣。“湾水开基”是写明了余姓二祖是为了守陵而来到钟洋村定居的。

显然，这三副对联是互有关联的。

而余姓宗祠大门口那座半月形的水池，与虎贝乡黄柏村（里）姚姓宗祠以及别处疑是建文从亡大臣隐居处的半月形水池，它们给后人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是——这些姓氏族人的祖先来自一个共同的地方——南京城内月半池（月牙湖）。

那么，这个“月半池”到底在南京何处?

据我们初步考证，明初的南京城内的确有“月半池”地名。有诗为证；“微

月初消月半池，篱边遥见两三枝，清香传得天心在，未许寻常草木知”（明建文朝侍讲学士方孝孺作）。而随着岁月变迁，“月半池”又演变成了“月牙湖”。我们从《明朝都城图》得知，那儿即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一带。而位于玄武湖边上的今天的白下区与玄武区、鼓楼区一带即是当时明初的军营。可见，钟洋村余姓祖宗余六府（虎）与黄柏村姚姓祖宗姚子高一样，均是来自当年的月半池军营之中。

所以说，余六府（虎）应是建文朝武将与从亡大臣这一身份应该是确切无疑的。

同月

7 月 30 日，屏南县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郑道居（县政协副主席），常务副组长魏明恩。随后，古田、福安、寿宁等县亦成立了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

同月

由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牵头成立了“推进重建金鄗寺、兴建建文书院募资小组”。经募资小组一年多努力，共募集资金 130 多万元支持寺院重建与建文书院兴建之举。

8 月

由王道亨、余永清、余新汉共同执笔的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余六府身世之谜一探》《余六府身世之谜二探》《余六府身世之谜三探》问世。从而为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提供了又一个重要佐证。

10 月

10 月 1 日，宁德市第八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在上金贝召开，会议专题研讨了霍林洞天问题。出席会议的部分小组成员还认真观看了历史专题片《龙隐宁川》。

11 月

11 月 10 日，由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蕉城区新闻中心和香港全景

传媒联合拍摄的历史纪录片《龙隐宁川》在蕉城区委、区政府礼堂举行首映式，部分市直单位与区直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了首映式。

12 月

历史纪录片《龙隐宁川》被中国最大的网络视频网站——优酷视频网评为当月历史类纪录片播放最多视频，同时被酷六视频、黑妹视频、光速视频全集转载。由于点击量大，“龙隐宁川”关键词被百度搜为词条目录，同名电子相册在蕉城点击率超 7 万人次。

同月

12 月上旬，宁德市第九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在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召开。会议专题研讨了“余六府身世之谜”问题。

2012 年

1 月

由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执笔编纂的约 20 万字的《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考》一书第二稿完成，等待出版。

3 月

3 月 27 日，中共宁德市委宣传部以宁宣委 [2012]28 号文件形式通知中共蕉城区委宣传部，要求全力协助福建省电视台《发现档案》栏目做好拍摄《建文帝与福建》历史专题片的工作。

4 月

由福建电视台《发现档案》栏目组拍摄的反映建文帝在福建活动踪迹的历史专题片《大京军堡之谜》播出两集。

5 月

5 月上旬，宁德市第十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在上金贝召开，研究小组顾问郑民生（市政协主席）、唐颐（市委副书记）、姚智梅（原市政协方席）、缪耕山（原市政协副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总结通报了前四年的工作，部署安排了 2012 年的工作。会上，刘千成、陈丽英（古田

县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组长）、陈言雕、周乡齐、孙绍旭等小组成员作了交流经验发言。会议还向各与会人员赠送了部分研究成果与课题提示资料。

同月

5 月中旬，湖南电视台《X 档案》栏目摄制组在编导一行的带领下到达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与金涵乡上金贝村拍摄与建文史事相关的历史题材。

6 月

6 月 3 日，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与蕉城区石后乡政府在石后乡召开了“国母亭与吕太后下落之谜”“帝师周斌及其二子下落之谜”“余六府身世之谜”三个课题研讨会。市委唐颐副书记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

同月

6 月 18 日至 21 日，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先生一行专程到宁德考察了解宁德市的建文帝踪迹研究工作。通过实地调查与座谈交流，刘先生全面了解了研究小组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他被研究小组成员那种对中华文化的执着与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他高度评价了研究小组成员，认为从福尔摩斯探案的角度来说，这谜案已经破解了，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同时，也建议研究小组应着手于疏理研究成果，对核心史料、实证应进行提升，以求得史学界的共识。刘先生还表示，他回台湾会召集一批专家学者，到宁德参与这项工作，促成两岸史学界联手，共同做好这个重大历史课题。

7 月

7 月上旬，由湖南电视台《X 档案》栏目组拍摄的反映建文帝及其从亡大臣余六府在福建宁德活动踪迹的历史专题片《古墓谜云》播出两集。

8 月

8 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胡德平副部长（正部级）一行到宁德调研。调研组专程考察了上金贝建文帝陵，并听取了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关于“上金贝古墓为什么会被众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确认为明建文帝陵”和“建文帝为何要选择福建宁德为其出亡目的地”等两个问题的解读与说明。胡副部长表示赞同

这一观点，并即兴提出了“困龙说”。此论，与建文帝研究小组部分成员提出的“困相说”（上金贝山脚下郑洽墓葬被当时人称作“困相墓”）不谋而合。

10月

10月20日，宁德市第十一次建文帝踪迹研讨会在上金贝召开，担任研究小组顾问的市政协领导郑明生、黄家盛、陶敏辉与原市委、市政协领导姚智梅、唐颐、缪耕山等出席会议。

同月

10月24日，市政协陶敏辉副主席、雷仕庆副主席一行在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与成员黄式斌、何钊、余根诚等陪同下专程到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考察，考察组一行深为钟洋村的余姓祠堂与余六府墓葬所隐含的谜团所震惊，觉得真是值得把建文帝踪迹继续研究下去。陶敏辉副主席还亲自撰文记述了钟洋村一行之收获（10月29日闽东日报发表了该文）。

11月

11月11日至12日，原省专家组组长、省文史馆馆长卢美松一行再次到宁德调研考察建文帝踪迹研究现状。卢馆长认真听取了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自2010年以来研究进展情况的工作汇报，表示回去要组织力量支持这项研究工作。卢馆长还愉快地接受了研究小组顾问的聘请。

12月

12月27日，福安市建文帝踪迹研究会正式成立。市政协郑民生主席、市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到会祝贺。

2013年

3月

3月4日至5日，上海江南造船厂高级工程师、贵州“红崖天书”破译专家林国恩先生到达宁德探询建文帝踪迹。短短二天时间，林先生一行考察上金贝、郑岐村、钟洋村、支提寺，听取了王道亨组长的介绍，深为几处建文帝、郑洽、郑和文物古迹所震惊。在郑洽故居考察过程中，望着王道亨组长指给他

看的“离明继照”四个字样，林先生若有所思。经二人认真研讨，认为“离明继照”四字与“红崖天书”四字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有“怀念昔日明朝，讨伐今日明朝（指燕王朱棣之明朝）之含义。”理由是；凤为离为火，在南方；燕为坎为水，在北方。以建文帝为首的这个正统的，以火立国的明朝已离开南京，到了东南方的福建，它的光芒在继续照耀着宁德这个地方。而盘踞在南京的以明成祖朱棣为首的明朝是个非正统的篡位的明朝。为此，林先生还赋诗一首赠研究小组“红崖天书觅知音，离明继照壮我行，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记述了此行的收获。

这是建文帝踪迹研究过程中的第七次突破。

同月

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被宁德市政协聘为宁德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4月

4月26日至27日，中新社福建分社罗钦文副社长一行到宁德考察调研。罗副社长一行专程考察了上金贝、支提寺与钟洋村。在钟洋村竟然有了一个意外收获，钟洋村余姓祭祖图最下端所绘祠堂大门外一副对联引起了众人的注意。王道亨组长一边读着对联“须知宗祖在，莫作画图看”，一边问大家；“这副图画像一个什么字？”站在一旁的蕉城区委常委杨良辉脱口而出“这不是皇帝的‘帝’字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大家觉得，这副祭祖图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余六府确是建文帝从亡大臣，祠堂大厅居中的落款为“万象新”的那一副对联极有可能是建文帝所留下的“御墨”。不然，周斌那副对联之下联最后三字“香御墨”就无法解读。

随后，众人又在祠堂右边神龛中发现了“明门诸佛”横批，说明了余姓宗祠除了供奉祖先余六府之外，还供奉“明门诸佛”——建文帝等人。这种做法与郑岐村郑姓宗祠内同时供奉祖先郑岐公（郑洽）、普庵禅师（建文帝）如出一辙。

显然，余六府身世之谜的被破解，又为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这是建文帝踪迹研究过程中的第八次突破。

6 月

湖南电视台《X 档案》栏目组再次派出摄制组到宁德，跟踪拍摄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探索“余六府身世之谜”题材。

随后，安徽电视台《社教（海外）中心》栏目组编导韩德良一行亦来到宁德拍摄建文史事相关题材。

11 月

11 月 16 日晚，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再次播放了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新成果——“明史专家王道亨深度解读上金贝建文帝陵”。

12 月

由研究小组王道亨组长执笔编纂的约 10 万字的《新编建文年谱》一书完成第三稿，等待出版。

十二、王道亨·明初大历史
——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秘史

中国明代初期（主要是指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这一段历史，是一段十分诡异神秘的历史，尤其是建文转向永乐的那一段历史，更是扑朔迷离，云里雾里。

这一段历史虽然诡异神秘，但经过我们 10 多年的潜心研究，总算了解了一个大概。我们把这一段神秘的历史称作“中国断层明史”，与此相对应，我们在宁德市明史研究会的旗下，成立了一个“中国断层明史暨建文帝踪迹研究中心”，对明初的这一段历史及明初的三个朝代的历史展开深入的研究。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明初的这一段历史就是：和尚皇帝——朱元璋，历

尽艰辛，打下江山，建立大明王朝的历史；皇帝和尚——朱允炆，书生意气，丢失江山，流落江湖，削发为僧的历史；“靖难”皇帝——朱棣，借口“靖难”，夺取皇位，满世界追踪建文帝的历史。

至于和尚皇帝朱元璋是如何由和尚变皇帝，建立大明王朝的？皇帝和尚朱允炆又是如何由皇帝变成和尚，丢失江山，流落江湖，削发为僧的？“靖难”皇帝朱棣又是如何通过发动“靖难之变”，夺取皇位，并满世界追踪建文帝朱允炆的？

诸位请耐心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讲　和尚皇帝朱元璋

（内容提示；和尚皇帝——朱元璋是如何历尽艰辛，打下江山，建立大明王朝的？）

1. 朱元璋的生平与简历

关于朱元璋的简历与生平，《中国通史》是这样描述的；明太祖朱元璋，祖籍江苏沛县，其本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临淮镇）。祖与父都是贫苦人。元璋本名（小名）朱重八（当时的布依百姓一般都不取正式的名字，只用行辈或父母年龄合计数来作为称呼。比如，丈夫四十六岁，妻子四十二岁，合计八十八岁，生的孩子就取名“八八”。“八八”叫起来很别扭，于是就改叫“重八”。朱重八这一本名就是这样来的）。

元至正四年（1344 年），朱重八十七岁，父母兄弟相继死于瘟疫，因孤贫不能生活，遂入皇觉寺为僧，成了一个游方和尚，乞食河南、安徽诸州县凡三年。这也就是说，朱元璋既当过乞丐，又当过和尚，后来又当上了皇帝。为了纪念自己这种前无古人的奇特经历，他当了皇帝后，曾命人制作了一件用白金线与孔雀羽为原料的袈裟。如今，这件袈裟就收藏在我们宁德市蕉城区的支提寺里。

至于这件袈裟是如何来到这支提寺的？其中又蕴藏着何等惊人的秘密？后

面第二讲会给大家详述。

2. 从士兵到中级军官

元至正十二年（1352 年），土豪郭子兴据濠州起事。这年秋，重八接到小伙伴汤和的来信，遂赶到濠州投军，因相貌奇特，被郭子兴看中，并编入亲兵队。

元至元十三年（1353 年），回本乡募兵得七百人。十四年（1354 年），率壮士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攻定远县（今安徽定远县），招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土豪秦把头所部八百人，缪大亨所部二万人。

凭着胆略与幸运，仅一年多时间，重八即从一名普通士兵升至中级军官。

是年冬，重八率军进攻滁州并克之。受内部挤兑的郭子兴率所部万余人移师滁州，自称滁阳王。

在庆功宴上，郭子兴将义女（即后来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大脚马皇后）许配给朱重八，并将其名字改为朱元璋。

在滁州，他认识并收服了李善长（即后来的大明首任宰相）。

3. 从中级军官到吴国公

元至正十五年（1355 年），克和州。是年，郭子兴死，郭部义军内讧，朱元璋巧妙地运用借刀杀人的连环计，削平内部群雄，取得了代统余众的权力。自此，兵势益强。

是年冬，巢湖水寨首领俞通海、廖永忠来降，得水军万人，船千艘，遂强攻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渡江击破元大将蛮子海牙军，克集庆路（今南京），改称应天府。时，元璋自称吴国公。名义上奉韩林儿为宗主，实际上已成为江南的一个独立的强国。

这是朱元璋军力大增的第一个高峰。

从投军到成为吴国公，朱元璋仅用了四年时间。

4. 从吴国公到开国皇帝

当时，刘福通的红巾军纵横中原，声势巨大。而徐寿辉据汉阳，张士诚据

苏州，方国珍据庆元。朱元璋的吴军占领了虎踞龙盘的东南形胜之地（即风水宝地）应天府，籍四周新起势力作屏障，避免了与元军的正面冲突，使之得以不断扩张，养精蓄锐，待机而动。就在四邻与元军拼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之后，朱元璋的军队乘势出击，逐个击破东南群雄，并乘机夺取了元兵据守的部分州县，兵势益盛。

还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时，元璋就已遣徐达取镇江，邓愈取广德（今安徽省广德县）。至正十七年（1357年），元璋亲督徐达、常遇春攻宁国（今安徽省宁国县），缪大亨攻扬州。在宁国大败元将别不花，收服猛将朱亮祖，得军士十余万，马二千匹。

这是朱元璋军力大增的第二个高峰期。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又遣大将李文忠（元璋外甥）、邓愈、胡大海分路进攻建得路（浙江省建德县）。得手后，又率常遇春、李文忠诸将将兵十万，攻取了婺州（今浙省江金华市）。

在婺州之浦江县郑义门，元璋结识了郑义门郑氏宗老，了解到义门倡行孝义、“九世同居”事迹以及郑氏家族那不同于众的“家规家训”。后来，他把郑氏家族的家规家训与治家之道改造升格为治国良策，从而与郑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元璋曾两次赐匾义门，其亲笔手书的“江南第一家”匾额，至今仍挂在义门的大宗祠内。

这是一段未载入正史的隐史。《明实录》《明史》等正史之所以不记载它，是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把建文帝逃往福建途经郑义门的事给扯出来。不然，像朱元璋与郑义门的那种特殊关系，不大书特书才怪呢？

浙江浦江郑义门在明史尤其是断层明史中，居至关重要地位。因为在地方豪族中，只有他们能够同时与洪武、建文、永乐三个皇帝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也只有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这个郑义门与郑岐村、郑坂村，始终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这个郑义门，在历史上是一处聚焦之点，在今天的现实中，它竟然也成了一处聚焦之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期间，曾三次到

郑义门调研，他把郑义门辟为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廉政教育基地。中纪委王岐山书记亦亲自到郑义门调研，还把郑义门的家规家训放到中纪委网站首面予以宣传。

今天，我们把这一段明史重新勾陈出来，既是“还原一段真实明史”之举措，也是一种“古为今用”之举措。

在婺州，朱元璋还结识了曾在郑义门东明书院任过山长的浙东名贤宋濂。这个宋濂，后来成了朱元璋开国四大辅臣中的老二。

朱元璋攻克婺州后，又采纳了宋濂的计策，趁势攻取了处州。

在这儿，他遇到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帮他圆了皇帝梦的人。这个人是宋濂介绍的，宋濂把他吹得神乎其神，说他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这个人是浙江处州青田人，名刘基，字伯温。他与朋友宋濂、叶琛、章溢一道被时人称为“浙东四贤”（后成为朱元璋开国四大辅臣）。

朱元璋请刘伯温出山，也是颇具戏剧性的。就跟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始把诸葛亮请出山一样，朱元璋也是经过一请、二请、三请，始把刘伯温请出来。唯一不同的一点是，朱元璋是派人去请，没有自己去请。他采用了宋濂的计策，发动刘伯温的亲朋好友，纷纷给他写信，甚至把他的老母亲都动员起来参与劝说，硬是把他“逼”出青田，“逼”到了应天府。

元至正二十年（1360 年），陈友谅崛起，据江州。元璋采纳刘基的计策，先对付陈友谅，再收拾张士诚。于是，两军对峙近三年。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经鄱阳湖一战（水战），陈友谅败亡（中流矢而死）。次年，友谅子陈理降。江西、湖南、湖北尽归朱元璋。陈友谅部猛将胡廷美（又名胡廷瑞）等亦归顺朱元璋。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朱元璋遣徐达北伐，同时，又遣胡廷美、何文辉率陆军由江西进军福建，汤和、廖永忠率水军经由浙江沿海，进军福建。

上述水、陆两军会师福州，擒杀陈友定，福建平。

这里，专门详述一下胡廷美、汤和这两支军队进攻福建的概况以及与此相

关的后话。

胡廷美，又名胡廷瑞。字辉班。据福建省连江县江南乡儒阳村《胡氏家谱》记载：元至正十七年（1367年），封征南将军，与左丞何文辉、将军戴德一道率部由江西取福建。大军渡杉关，下光泽，取召武、建阳、建宁，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会水路汤和、廖永忠攻取了福州府，并延平、兴化、汀州、泉州诸郡。廷美奉旨率部镇守福建，汤和率部回师应天。廖永忠率部进军广东、广西。

洪武元年（1368年），以美为中书平章同知詹事院事。同年，美长女胡菊入宫为皇帝第十四位妃子，生湘江王、长沙王。是年冬，因军功封豫章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李善长案，受株连，被赐死。

胡廷美子胡卓汉，因军功封漳、泉、汀、抚四州指挥使。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家祸出逃。后辗转归隐兵部侍郎廖平处。“靖难事变”后，为建文皇帝太子朱文奎贴身护卫。

“后洪武朝代”，廖平、廖年（廖平弟）、胡卓汉诸将领史事在《明实录》《明史》中均失于记载。但闽东地方史料则显示了他们的存在，他们亦跟随建文帝父子俩来到了闽东。

廷美孙孙胡福龙（又名胡护龙）。因军功封福建都司左卫将军。洪武二十三年，闻变率家人逃离福州，先隐于连江县江南乡瓮下村，后迁儒阳村。“靖难事变”后，复出护驾。永乐帝上台后，亦曾下诏，许委以右卫将军之职，福龙公拒之。惹怒了朱棣，即遭追杀。后胡濙来到福建，找到福龙公隐身处，念在同祖同宗份上，遂在儒阳村东北方向地处闽江口的粗芦岛召见了他，嘱其不必再逃亡，不必到宁德那边去了，对外不要说是胡廷美后人，就说是胡大海的后人。并言自己会跟驻守在粗芦岛对面（长乐营前港）的郑和将军打招呼，叫他手下不要查你了。云云。

以上是胡廷美后裔的下落及其他们与建文史事的交集详情。

再说汤和、廖永忠的水军会同胡廷美、何文辉的陆军攻取福建后。廖永忠奉旨率部进军广东、广西。汤和则率部班师回朝。汤和水军途经福宁州的大京

（金）村时，见此处扼水陆要冲，遂留下一百一十名士兵，由一百户长率领，在那儿建了一座水寨，屯田自养。至今仍居住在那儿的戴姓居民与曾姓居民，即是大京的第一批屯军户的后代，也是大京城堡的第一批移民。

这即是大京城堡的来历。至于其后的拓展历史，在第二讲中会详述。

上面讲到，朱元璋采纳刘基的计策，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故在北征与进军福建、广东、广西之前的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初，又命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万，合围苏州，擒获张士诚。命汤和率军攻庆之，降服方国珍。平定了江南。

这是朱元璋军力大增的第三个高峰期。

在南征北伐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40 岁的朱元璋遂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阴历正月初四日，在应天南郊登基做皇帝。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以应天（今江苏南京）为京师。

经过十六年的征战，朱元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由一个和尚变成了一个开国皇帝。

5. 由南往北谋一统

朱元璋登基后，采纳谋士朱升的建议：闭嘴做皇帝。即少说多做。故在明初的洪武、建文两朝的皇朝龙都是“闭嘴龙”。这一点，我们从上金贝建文帝陵主陵龙椅两边墓手顶端的“闭嘴龙”即可得到验证。

朱元璋信奉藏传佛教，亦曾加入过明教。他崇拜火神祝融，以“火”立国。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借居于南方的火神之力量力克居于北方水神之域的北元。

朱元璋称帝后，为了巩固皇权，一方面大肆杀戮功臣，制造了许多冤案、迷案。明朝的冤案、迷案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多，达一百多个。这都是朱元璋的杰作。这种杀戮的直接后果是，一旦发生事变与战事，他的继承人将无将、帅可用。后来的“靖难之变”亦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 20 多个儿子分封到各省，用藩王来监视戍边将领与地方官员。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也为后来的“靖难之变”埋下了伏笔。

所以说，凡事有因必有果。朱允炆之所以会由一个皇帝变成一个和尚，这一半原因是和尚皇帝朱元璋造成的。

洪武十六年（1383 年），福建福宁宁德五都（今蕉城区洋中镇）举人周斌被选拔进京，授中都（安徽凤阳）国子司业。由于斌素直言无畏，才智过人，受太祖器重，旋被擢为国子祭酒兼齐王府左使。在安徽凤阳，周斌主持下的国子监为大明王朝培育出了两代帝王朱允炆与朱棣，还培育出了郑赐、杨荣等国之栋梁。为嘉奖励，朱元璋曾亲赐“国子先生”匾额一方，由工部尚书郑赐亲送至宁德五都（今蕉城区洋中镇）。20 世纪 80 年代，宁德县（今蕉城区）文化局工作人员曾编写过《建文帝哭师》闽剧，并在乡间上演《建文帝哭师》剧本（刻写件）今存世。后来，建文帝出亡，永乐帝上台，曾几次下诏宣周斌及其长子回南京做官。周斌遂诈死，率领家人隐遁他乡，音讯全无。无独有偶，就在洋中村对面的东山村，有一陈姓官员叫陈岳，其女陈凤春，因姿容出众，遂于明洪武三十一年初被选入宫，成了皇太孙朱允炆侧妃。

上述两则重要史料，在正史上均无记载，但在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与两姓家谱中均有记载。

这是建文帝为什么要选择闽东作为其出亡目的地的重要条件与原因之一。

朱元璋反腐败是很坚决的，但是，他所用的重典与酷刑也是很可怕的。

也正是由于各种有失偏颇的政策的制约，朱元璋前后共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统一了中国。

统一后的中国疆域，东起朝鲜，西至土番（今西藏），南至安南（今越南），北距沙漠，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零四里。南京、北京直隶朝廷，别设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布政使司管理国家。

第二讲　皇帝和尚朱允炆

（内容提示：皇帝和尚——朱允炆是如何书生意气，丢失江山，流落江湖，

削发为僧的？）

1. 朱元璋临终托孤

这是一段被尘埋的历史。正史不予记载，但许多偏史、野史、禅史却把它传承了下来。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夏四月，皇太子朱标病逝，洪武帝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长孙。朱元璋为何不立其他皇子呢？比如最有希望、最像自己的朱棣。原因有二，第一，为传统的嫡长制制约。第二，朱棣的血统不正（非汉族妃子所生）。正是这两点，使皇太孙朱允炆成了接班人。

对于朱允炆这个文弱书生接班当皇帝，朱元璋是很不放心的。他临终前作出了一系列安排。明里，他把智勇双全的大驸马梅殷与亲家耿炳文（将军，其大儿子娶朱标的大女儿朱珍娘（化名朱一娘）为妻）分别宣至病榻前，将朱允炆托付给他们，要他们全力辅佐朱允炆。暗里，他又将南京灵谷寺高僧洁庵禅师与武当道教至尊张三丰秘密召来，对一些后事作出了安排。随后，洁庵禅师与张三丰即被派往福建。洁庵禅师成了钦命的泉州开元寺住持，张三丰则背靠武夷山，成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云游道人，牵着胡濙到处转。

原来，朱元璋要洁庵禅师动员佛教力量全力保护朱允炆，要张三丰动员道教的力量，全力护卫建文帝的太子朱文奎。

这是朱元璋临终托孤的后手。堪称历史之绝唱。

2. 朱允炆推行“削藩”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执政，实行宽政减刑，皇朝经济开始走向繁荣，政治亦开始走向稳定。

仅就银矿开采一例来说，在当时的闽东，就有 20 多座银矿、3000 多个银坑洞在运营。建文朝时，闽东一地所产白银总产量是洪武朝的两倍，占全国白银总产量的六乡之一。建文朝派往闽东督办银场的太监是洪武朝的两倍，达 110 多人。

这是建文帝为什么要选择福宁（今闽东）作为其出亡目的地的重要原因与

条件之一。

建文帝执政，各方面都很好，但在初期的用人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失误。他重用书生气十足的黄子澄（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学士）、方孝孺（翰林院侍讲学士）、齐泰（兵部尚书）等一班人，不顾卓敬、高魏、康郁、重伦、杨砥、韩宜可、伊昌隆等一批大臣的反对，采纳了黄子澄他们的建议，实施了“削藩”政策。这是典型的书生误国主张。

这一政策的实施，直接触及了那些手握重兵的诸藩王的利益。燕王朱棣首先发难，借口“清君侧”，发动“靖难之变”（靖难是平定内乱的意思），南北立马进入战争状态，而诸王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帮。

3. 持续三年的“靖难战争”

建文元年（1399 年）七月，燕王计杀张昺（北平布政使）、谢贵（北平都指挥使），以僧道衍（即姚广孝）为军师，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祖训起兵，陷北平。

建文帝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部征讨。燕军夜袭樵县，歼耿部先锋九千，复于真定大败耿师。帝遂以李景隆代耿为师。

这个李景隆压根儿就是一个草包。上任伊始，一败郑村坝，二败大同，三败白沟河，失地千里，损兵折将，回南京后，许多大臣喊杀，但建文帝却赦免了他。以致后来他打开金川门降燕，导致了南京的失陷。

建文二年（1400 年）夏五月，燕军入德州，攻济南不克，败于铁铉。六月，济南围解。铁铉及盛庸复山东各州县。建文帝下旨诏授铁铉为兵部尚书，盛庸为平燕大将军，历城侯，代李景隆统兵伐燕。

是年冬十二月，盛庸败燕军于东昌，斩燕将张玉。燕王失一臂膀，败归北平。

建文三年（1401 年）正月，镌刻玉玺“凝命神宝”，帝亲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建文帝出亡时，带走了太祖朱元璋的传国玉玺与该宝玺，至今下落不明。

后来，太子朱文奎这一支朱姓人改姓“万”，尊建文帝为“万昌”公其所

署“万昌”二字即由该“凝命神宝”铭文而来。同年三月，建文帝三妹妹（化名朱三娘）朱璆娘尚郑义门郑洽（翰林待诏，建文四年升任南京留守卫都指挥使）长子郑榛。“靖难事变”后，郑榛携三公主跟随建文帝逃亡至福建福宁地域。后辗转流落泉州府同安县东界翔凤里十二都山头仔村（今厦门市翔安区一带）。永乐八年（1410 年），迁翔凤里石崎堡村（今厦门市翔安区郑坂村）。留姓更名为郑安升。

“靖难之役”差不多打了 3 年。到了建文四年（春），形势急转直下，主要原因是燕将李远南领兵南下济宁，攻略沛县，焚烧掉建文军粮船万余艘，断了建文军粮道，建文军全线崩溃，燕军一鼓作气，一直打到了长江边上。

4. 内宫密议分路出亡

关于密议出亡一事的记述，在我们的研究结果未出来之前，一共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明代史学家赵士喆为代表所持的并记述在《建文年谱》中的观点；“时廷议又不决，茹瑺、詹征、杜泽等大臣请幸湖襄，王韦、唐铎、杨靖等大臣请幸江、浙，而方孝孺、徐辉祖、楼琏等大臣则主张坚守待援。偏有那不识时务的徐增寿却劝建文帝投降。此时的建文帝一腔怒气正无处发泄，一听此言，立马离座，将徐增寿斩杀于左顺门。”

第二个版本是明代史学家谈迁所持的并记述在《国榷》中的观点：“（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庶人（指朱棣）至金川门下……而上（指朱允炆）急时，欲自杀，翰林编修朝邑程济曰：臣逆知有今日矣，为今之计莫若出亡，臣素习术，往南旗免。太监王钺曰：太祖遗箧藏奉天殿，云滨大难发之。及启示，皆髡缁之具，度牒二，白金十镒。上曰：数也，因大恸。群臣亦哭。兵部侍郎廖平进曰：功莫大于存嗣，臣请保太子。上急命太子出拜平，潜出之。群臣多愿从亡。程济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因雉上发，牒名应文。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松阳叶希贤，亦雉发，牒者应能、应贤。济易黄冠，尚书张紞、御史曾凤毅哭曰：臣请即以死报陛下。上手麾之去，同程济及中书舍人定海梁良用潜出西华门，沿河得空舸，良用鼓枻抵南门，舍舟易途。良用哭曰：臣从此别

矣，遂赴朱雀桥死。上潜出聚宝门，乘月之神乐观，宿道士王升所。”

第三个版本是清代史学家谷应泰所持的并记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观点：“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太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于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升一红箧至，四周俱固似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馀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这三个版本的共同特点是：密议出亡这一大事是在朝堂之上，而且是在众多朝臣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些版本的作者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史实——朱棣安插在朱允炆身边的“暗桩”。《中国通史》P743 页记载“朱棣起兵时，收买朱允炆左右阉官做间谍”，为他提供情报。如果在朝堂之上议论出亡大事，那朱允炆还逃得了吗？

显然，密议出亡之事肯定不是在朝堂之上，而且也不会在皇帝宫内。那么，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认为是在太后宫中。理由是：第一，朱棣不可能在太后宫中安插暗桩。第二，能决定太后留下欺敌的，只有太后自己，依建文帝的个性他是不敢行此大逆不道之事的。而且，参与密议之人，一定是具备双重身份之人——既是掌握一定兵权的高官且又是皇亲国戚或绝对的亲信。

所以，我们据此理由，并根据现身福建与福宁（今闽东）地界的建文帝文武大臣的身影，运用历史逻辑初步勾勒还原出皇宫密议的一幕。

建文四年（1402 年）春三月里的一天，皇宫里传来消息，太后急诏刚刚升任五军都督（正一品）的余六府（化名，我们猜测应该就是正史记载中的兵部侍郎廖平，因其女儿廖妙玉系太子朱文奎的正妃）和南京留守卫都指挥使郑洽（就是正史记载中的翰林待诏郑洽，因其大儿媳妇即是建文帝的三妹妹朱瓕娘）以及锦衣亲军都指挥使（正三品）杜华泗与小马国舅四人到了宫里，见建

文帝亦在一旁陪坐。四人跪拜毕，吕太后命宫女一一看坐。待四人入座毕，吕太后便向众人说明了诏他们入宫的目的；现在燕军已打到了长江边上。各地藩王按兵不动，勤王兵马一时难以到达，形势十分危急，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如果长江天险拦不住燕军怎么办？皇帝应该退往何处比较安全？就此事想听听众位卿家的意见。之所以把大家请到后宫来议此大事，而不放在朝堂之上与皇帝宫中来议，皆是为了以防隔墙有耳。

听罢太后一席话，众人顿感事态严重，身上压力倍增。

余六府、杜华泗与小马国舅皆目视郑洽，意思是请他先说。原因是郑洽是宋濂、刘伯温的学生，又是建文帝的近臣（家臣），一向以足智多谋著称。

郑洽见形势危急，亦不推辞，马上起身离座，站立殿中，不拘不束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臣以为，时下燕军兵锋正盛，锋芒直指京师，志在必得。三年来，我方败多胜少，士气不振。眼下京师兵微将寡，援兵一时难以到达。为今之计，宜速退至东南一隅的福建（今台湾）、广东，那儿离京师遥远，燕军势力一时难以到达。皇上退往彼地后，可以福建（含台湾）为中心，再聚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省之官军与民兵，以图兴复。”

郑洽话音刚落，众人均表赞成。太后与皇帝亦表赞许，并决定擢升小马国舅为福建行在都指挥使，领二品衔，并准予节制闽、粤、赣三省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衙门。同时赐上方宝剑一口，准予便宜行事。同时命杜华泗（疑为化名），统领亲军十二卫，归郑洽节制，护卫皇帝南下。

随后，吕太后又向大家强调说明；皇帝移驾东南之事，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了避开燕王安插在宫中的耳目，我与皇后必须留下欺敌。陈贵妃（名凤春）身怀六甲，且又是福建人，可与皇帝同行，以保一支血脉。其余宫中人等，一律留下。这样，一来可以瞒过燕军，二来可以稳定军心，避免朝野混乱。

大家均表赞成，并为太后的深明大义所折服。

随后密议的结果是：

由福建行在都指挥使小马国舅率领金吾前卫指挥使朱癸二（化名），金吾

后卫指挥使韩将军（名字不详），南京镇卫（或镇南卫）指挥使李建极诸将领本部人马 2 万人，作为第一拨，于 4 月上旬南下，走水路，由江苏太仓先行乘船南下，目的地是福建福州府城、福宁县城、大京所城及福建各卫所。其主要任务是扩建大京所城为卫城，并在那儿建立行宫；整顿各卫、所城；召起部分赋闲的闽地将领如原洪武朝漳、泉、汀、抚四州指挥使胡卓汉及其子胡福龙（原任福建都司左卫指挥使）等，以加强闽地的军事与防务。

由余六府（疑为化名）、余七府（疑为化名）兄弟俩率领的五军都督府直属的府军前卫、府军后卫、府军中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共 3 万人马为第二拨，于四月中旬南下，亦走水路，由江苏太仓出发，乘船梯次南下。第二拨人马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太子朱文奎（七岁）和由皇宫国库里运出的金银财宝，顺便带走太仓的屯粮与 3 万水军。目的地是福建福宁地区。

由郑洽、杜华泗率领的南京留守卫都指挥使司所属的留守前卫、留守后卫、留守中卫、留守左卫、留守右卫以及亲军指挥使司所属的锦衣卫、旗手卫、虎贲左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所属的 6 万人马作为第三拨，于四月下旬南下，先至浙江浦江郑义门，稍事停留（约 2 个月）后，再取道余姚、宁波，乘船南下福宁地区。其主要任务是护卫建文帝和身怀六甲，即将临盆的陈贵妃。顺便带走义门的 3000 多民兵与几百石粮草。

现已查明，上述文武大臣，大部分最终都落籍福宁（今宁德市）域内，少部分分匿福建各地。

关于这一点，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揭示了……

密议最后，郑洽又建议，于内宫选一面貌酷似皇帝者，扮作陛下，继续临朝。

另外，再安排一批朝臣，假扮建文帝与太子，往西北、西南一路而去，以迷惑与扰乱燕军视线。

众人皆拍手叫好。建文帝即刻下旨，诏御史叶希贤、吴王府教授杨应能、翰林编修赵天泰、钦天监正王之臣、刑部司务冯漼、中书舍人宋和、中书舍人

郭节、翰林编修程济入宫听旨。

两个月后，由这些人假扮的“皇帝”“皇太子”及其随从便出现在西北、西南诸省，混淆了燕军的视听。

这就是建文帝下落问题的“二十三说”的由来。

现已查明，上述扮演“皇帝”与“皇太子”的诸臣的最终落籍地为；叶希贤，最终落籍重庆大竹善庆里；杨应能，最终落籍广西横州寿佛寺；赵天泰，最终落籍甘肃庄浪；王之臣、冯漼，最终落籍今重庆奉节；宋和、郭节出亡至西域，最终“客死西域”；程济，先是出现在江苏太仓，最终落籍浙江金华兰溪县皇回山皇回寺。

5. 建文父子东南行（详见《建文帝出亡路线图》一书）

第三讲 “靖难皇帝”朱棣

（内容提示；“靖难”皇帝——朱棣是如何通过发动“靖难之变”，夺取皇位，并满世界追踪朱允炆的？）

1. 一桩惊天大案的炮制者

“靖难战争”打了三年，朱棣终于取胜了。建文四年（1402 年）六月，朱棣过江屯兵龙江驿，止步不前。他在等待什么呢？他在等待朱允炆自尽或禅让（皇位）。结果等了七八天，一点动静也没有。朱棣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便下令宫中暗桩纵火焚宫，欲烧死建文帝。

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暗桩被郑洽的一着“瞒天过海”的计策给欺骗了，没烧死建文帝，却把小马皇后给烧死了。而与皇后一起被烧死的，是那位由内侍假扮的建文帝。

查继佐的《罪惟录》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金川门破，事急。一内侍衣蟒服冕而代死……外廷传帝崩于火中。”

因为暗桩非皇后亲信，不能进入后宫，只能远远地探视，故难辨真假，所以误打误撞，坏了朱棣的大事。

吕太后与小马皇后假戏真做，演技高超，竟然把潜伏在皇宫中的十几名燕王暗桩都给瞒过去了。

朱棣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不由得在心里骂道；好个朱允炆，你也会“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不知是哪个谋臣给出的歪点子。好个吕太后与小马皇后，假戏真做，竟然把我埋在皇宫里的十几个暗桩都给骗过去了！

“假戏真做！”朱棣忽然灵机一动，我为何不学学他们，也来个“假戏真做”。

于是，他突然指着那个假皇帝的尸体，号啕大哭起来（朱棣原本就擅长这一招，在北平时，为了瞒过那些监督他的大臣与建文帝派往燕王府的暗桩，救回在南京当人质的三个儿子，他就曾经装过一回“疯”，而且很成功）“你这个傻孩子啊！我来南京是为了帮助你除灭奸臣，你干吧要去自焚，去寻短见啊！真是傻透了啊！”

朱棣的突然举措，把身边的侍卫与将领都吓傻了，以为他又疯了。众人吓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才开始慢慢有所反应。待完全领会了朱棣的意图后，众人便开始欢呼雀跃，开始大声喊叫“建文帝自焚啦！”“建文帝把自己烧死啦！”

于是，内廷、外廷便飞快传遍了建文帝自己烧死了自己的消息。

于是，一桩惊天大案就这样被炮制出来了，直到乾隆四十年，这冤案才被翻过来。

2.“后洪武时代”成金科玉律

为什么建文帝必须死，而不能是出亡呢？道理很简单，建文帝若活着，朱棣的皇帝梦就永远不能实现。

所以，他必须下决心找到建文帝。这事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朱棣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建文朝的帝号、纪年，改“建文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导致中国历史纪年上出现了一段荒唐的插曲；“一个死皇帝却拥有了活纪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洪武帝朱元璋死了以后，还当了四年的皇帝。所以，后来

的明史专家就把它称为“后洪武时代”。就这么一件荒唐的决定，在明朝建文之后 230 多年的历史上，却一直被历代明皇捧为金科玉律。明知有错，却不去纠正；明知欠妥，却依然维系。直到清高宗乾隆皇帝时，始作更正，恢复了建文帝（明惠帝）的帝号、纪年，还了历史一个公道。

皇帝的问题显然解决了，但是大臣的问题却至今没有解决，“政策”还没有彻底落实。

由于明成祖朱棣不承认朱允炆是一任皇帝，故在编纂《明实录》时，《太宗实录》直承《太祖实录》，中间缺了《建文实录》。建文朝在明代的官方历史中成了一个不存在的朝代。因而，建文朝在京的四百六十多名朝廷官员中，大部分都成了“不存在的官员”，从而被整部明史忽略不载。

这里需特别提一下的是，建文朝这四百六十名朝官中，只有李景隆、解晋、胡濙等十九人降燕，其余人等或被杀，或自尽，或逃亡。所以说，历朝历代，就数建文朝忠臣最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有诗赞曰：“中华自古有忠臣，不及建文一朝多，《千钟（忠）录》里芳名在，留于后人细评说”。

那些跟随建文帝出亡至福建的文武大臣，几乎全数落籍福宁（今宁德市）及其周边区域。他们或改名换姓，或留姓改名，隐藏了下来。而那些死于“壬午之难”的大臣的后裔，听说建文帝在福建，遂纷纷赶到福建，想依附建文帝。因回不了原籍，遂就地落籍。还有一些从江苏、浙江、安徽、湖广赶来勤王的将领，因建文军再次兵败，遂上山落草为寇或解散队伍，就地隐匿。

具体情况，后面第二个讲会详述。

3. 朱棣的文治武功

朱棣的文治，主要是委解晋等人编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永乐大典》。该全书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全书收录了中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八千余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

从这方面来说，朱棣功不可没。

当然，朱棣编书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即借此消除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文字资料与建文帝痕迹。而他的武功之一是派遣太监郑和六次下西洋。这虽然是个伟大的创举与伟大的实践。但按《中国通史》的说法，他派郑和下西洋出于三个目的："（1）探寻朱允炆踪迹。（2）消灭华侨对他不义行为的反抗。（3）压迫和招诱番人来中国朝贡。"其武功之二则是永乐四年派张辅（张信之子）率兵八十万，灭了安南国（今越南），改置郡县（朱瞻基时，明兵败退，安南复国）。其武功之三，则是北征蒙古。前后亲征五次，军民死伤无数，所得只是几个蒙古王归降。接受了朱棣的封号（如封瓦刺为贤义王，太平为安东王，也先土干为忠勇王）。

武将因军功受赏升迁，文官因国土扩大，仕途宽广，对朱棣早已感恩不已，谁还会替朱允炆抱不平。朱棣的统治日益巩固。

永乐元年（1403 年）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 年）迁都北京。

4. 五路人马踪迹建文

上文讲到，建文帝的失踪，始终是朱棣的一块心病。

自永乐三年（1405 年）起，永乐皇帝朱棣被各地送来的探报弄昏了头脑，怎么满世界都是"建文帝"，到底哪是真？哪是假？显然，这是郑治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

分析来，分析去，朱棣认为最值得担心的是怕朱允炆跑到海外番国去，一旦与番国勾结，凭他手中的传国玉玺与大批金银财宝，那将后患无穷。于是，他遂委派屯兵福建的郑和水军与李挺的锦衣卫，下西洋蹈海踪迹建文。随后，又于永乐五年（1407 年）春开始，先后派出户科给事中胡濙（后升任礼部尚书），工部侍郎严震直，道士张宇初，和尚祖渊（雨庵）禅师四路人马分头在陆上踪迹建文。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挖地三尺找建文"。

（具体过程详见《建文帝出亡路线图考》一书）

5. 朱高炽与姚广孝的密谋

建文帝与郑洽他们明明就在福宁大京、宁德西乡、闽侯（雪峰寺）、宁德（支提寺），为什么朱棣的人马就是找不到呢?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朱棣的儿子朱高炽，朱棣的皇后徐皇后，朱棣的军师姚广孝，姚广孝的徒弟郑和，郑洽的侄儿、朱高炽的老师郑棠诸人串通一气，瞒着朱棣，把朱允炆“藏在支提寺内”。“支提华严寺”改名为“支提华藏寺”本身就透露了这个秘密。民间一直在传诵的“不到支提不为僧，就有匡复天下时”又再次揭示了这个秘密（后人把它改为“不到支提枉为僧”）。

至于朱高炽、姚广孝等人为什么要保护朱允炆?（具体过程详见《建文帝出亡路线图考》一书）

其实，他们之间是有交易的，即：建文帝放弃抵抗，从雪峰寺移驾支提寺为僧，接受朱高炽亲信太监周觉成的保护。而监国朱高炽主持工作的朝廷则负责为死于“壬午之难”的千名建文官员铸千尊铁佛替身，供奉于华藏寺宝阁，以供建文帝日日诵经超度。所以，永乐五年（1407 年）始有支提寺的大兴土木之举措。也因此始有郑和送千尊铁佛至支提寺之传奇存世。

欲知此事的来龙去脉，且听……

十三、王道亨·建文帝出亡路线图

明建文四年（1402 年）三月里的一天，刚刚升任五军都督（正一品）的余六府（化名，真名不详）[①]、刚刚升任南京留守卫都指挥使（正二品）的郑洽[②]，以及刚刚升任锦衣卫都指挥使（正三品）的杜华泗[③]与小马国舅一起，奉

---

①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余氏家谱》。
②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村《郑氏家谱》。
③ 福建省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杜氏家谱》。

命入宫晋见太后。建文帝朱允炆亦在一旁陪坐。四人跪拜毕，吕太后命宫女一一看坐。待四人入座毕，吕太后便向众人说明了诏他们入宫的目的：

“哀家与皇帝商议了一下，现在燕军势大，形势危急，必须想个万全之策，万一长江天险拦不住燕军怎么办？皇帝应该退往何处比较安全？就此大事想听听众位卿家的意见。之所以把众位卿家请到后宫来议此大事，而不放在朝堂之上与皇帝宫中来议，皆是为防隔墙有耳。”

听罢太后一席话，众人顿感事态严重，身上压力倍增。

余六府、小马国舅与杜华泗皆目视郑洽，意思是请他先说。

郑洽见形势危急，亦不推辞，马上起身离座，站立殿中，侃侃而谈：“臣以为，时下燕军兵锋正盛，锋芒直指京师，志在必得。三年来，我方败多胜少，士气不振。眼下京师兵微将寡，援兵一时难以到达。为今之计，宜速退至东南一隅的福建（含台湾）、广东，那儿距离京师遥远，燕军势力一时难以到达。到达彼地后，可以福建（含台湾）为中心，再聚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省之官军与民兵，以图兴复。”

郑洽一番宏论，大家一致赞成。太后与皇帝亦表赞许。①

吕太后又说：“此事就这样定了，但需要一人前往福建、广东打前站，替皇帝与后续大队人马安排好一切，并建立起相应的军事设施与后勤保障设施。哀家的意思是，请国舅爷率领一拨人马先行南下，去办理这项差事。”

小马国舅应诺。

建文帝当即下旨，擢小马国舅为福建行在都指挥使，领二品衔，并赐上方宝剑一口，准予便宜行事。同时行文闽、粤、赣三省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衙门，严令诸司衙门一律受马国舅节制。

同时，急调将军徐辉祖回京师，接替郑洽的京师防务。

吕太后又接着说：“皇帝移驾东南之事，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了避开燕

---

① 黄云眉《明史考证》P61页。

王安插在宫中的耳目，我与皇后必须留下欺敌。陈贵妃[1]身怀六甲，且又是福建（宁德二十三都东山村）人[2]，可与皇帝同行。其余宫中人等，一律留下。这样，一来可以瞒过燕军，二来可以稳定军心，避免朝野混乱。”

大家均表赞成，并为太后的深明大义所折服。

随后密议的结果是：

由福建行在都指挥使小马国舅率领金吾前卫指挥使朱癸二（化名，真名不详）[3]，金吾后卫指挥使韩将军（名字不详）[4]，南京镇卫（应是镇南卫）指挥使李建极[5]诸将领及其本部人马1.8万人，作为第一拨，于4月上旬南下，走水路，由江苏太仓先行乘船南下，目的地是福建福州府城·福宁县城、大京所城及福建各卫所。其主要任务是扩建大京所城为卫城，并在那儿建立行宫；整顿各卫、所城；召起部分赋闲的闽地将领（如原洪武朝漳、泉、汀、抚四州指挥使胡卓汉及其子胡护龙＜化名，真名不详，儿时即为皇太孙朱允炆伴读＞）[6]，以加强闽地的军事、防务。

由余六府、余七府（化名，真名不详）兄弟俩率领的五军都督府直属的府军前卫、府军后卫、府军中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共3万人马作为第二拨，于四月中旬南下，走水路，由江苏太仓出发，乘船梯次南下。第二拨人马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太子朱文奎和由皇宫国库里运出的金银财宝，并顺便带走太仓的屯粮与5万水军[7]。目的地是福建福宁地区。

由郑洽、杜华泗率领的南京留守卫都指挥使司所属的留守前卫、留守后卫、留守中卫、留守左卫、留守右卫以及亲军指挥使司所属的锦衣卫、旗手卫、虎贲左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所属的6万人马作为第三拨，于四月下旬南下，

---

① 闺名陈凤春，系朱元璋在世时钦定皇太孙妃。
②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东山村《陈山下里厝谱》。
③ 福建省福鼎市管阳镇金钗溪村《朱氏家谱》。
④ 福建省柘荣县楮坪乡仙岭村《郑氏家谱》。
⑤ 福建省长乐市罗联乡项头村《李氏家谱》。
⑥ 福建省连江县江南乡儒阳村《胡氏家谱》。
⑦ 周钰雯《南京明文化经典之旅》。

先至浙江浦江郑义门[①]，稍事停留后，再取道余姚、宁波，乘船南下福建福宁地区[②]。其主要任务是护卫建文帝和身怀六甲的陈贵妃，顺便带走义门的民兵与其供应的粮草。

余六府、余七府及其后裔最终落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③]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留田村[④]。郑洽及其小儿子郑栈（化名郑钱），最终落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⑤]。其大儿子郑榛（化名郑尤榛）、儿媳妇朱璎娘（即朱三娘建文帝三妹妹）及其后裔，最终落籍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村[⑥]。郑洽小儿子的一支后裔最终落籍云南省蒙自县（今玉屏县）郑营村[⑦]。小马国舅及其后裔最终落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漈山村（后迁徙至其他乡镇。今金涵乡上金贝南山上尚有祭祀小马国舅的师公庙，八都镇漈山寺尚有建文帝赐封的祭祀小马国舅的省城隍庙）。杜华泗及其后裔最终落籍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⑧]。陈贵妃与三皇子朱文垚最终落籍瑞岩村的日庙与月庵。而下一个层次的建文朝南下将领朱癸二（化名）及其后裔最终落籍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管阳镇金钗溪村[⑨]。韩将军最终落籍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楮坪乡仙岭村[⑩]。李建极及其后裔最终落籍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市罗联乡顶头村[⑪]。胡卓汉与其子胡护龙（化名）及其后裔最终落籍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江南乡儒阳村[⑫]。

密议最后，郑洽又建议，于内宫选一面貌酷似皇帝者，扮作建文皇上，继

---

① 查继佐《罪惟录·建文逸纪》。
② 朱国桢《皇明史概·逊国臣传》。
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余氏家谱》。
④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留田村《黄氏家谱》。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田地村观音堂须弥座石刻。
⑤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郑氏家谱》。郑岐村郑洽故居及其故居内系列文物古迹。
⑥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村《郑氏家谱》。郑坂村郑榛、朱璎娘墓葬。
⑦ 云南省玉屏县郑营村《郑氏家谱》。
⑧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杜氏家谱》。
⑨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管阳镇金钗溪村《朱氏家谱》。
⑩ 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楮坪乡仙岭村《郑氏家谱》。
⑪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市罗联乡顶头村《李氏家谱》。
⑫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江南乡儒阳村《胡氏家谱》。

续临朝[1]。另应安排一批朝臣，假扮皇帝与皇太子，往西北、西南一带而去，以迷惑燕军。

众人拍手叫好，建文帝即刻下旨，诏御史叶希贤、吴王府教授杨应能、翰林编修赵天泰、钦天监正王之臣、刑部司务冯漼、中书舍人宋和、中书舍人郭节、翰林编修程济入宫听旨[2]。

两个月后，由这些人假扮的“皇帝”“皇太子”及其“随从”便出现在西北、西南与东南诸省，混淆了燕军的视听。

以上是建文帝下落问题的西北说、西南说、东南说的由来（原因）。

叶希贤最终落籍重庆大竹善庆里。杨应能最终落籍广西横州寿佛寺。赵天泰最终落籍甘肃庄浪。王之臣、冯漼最终落籍四川夔州（今四川奉节）。宋和、郭节出亡至西域，最终“客死西域”。程济最终落籍浙江金华兰溪县皇回寺[3]。

清代著名史学家查继佐在其名著《罪惟录·建文逸记》中记述道：“金川门破，事急。一内侍衣蟒服冕而代死。”其意思是说，金川门被攻破，确实有一个假扮建文皇帝的内侍与皇后一起被烧死了，这条材料说明了几件史实：一是确实有一名与建文帝长相相似的内侍假扮建文帝，与皇后在一起。二是皇宫内这一把火不是建文帝放的，也不是建文帝这边的人放的，因为这时吕太后与小马皇后尚在宫中，而建文帝与陈贵妃已不在宫中了。三是这一把火一定是燕王朱棣收买的宫中暗桩——宦官放的。理由是，燕王朱棣屯兵龙江驿，止步不前，就是在等待朱允炆自尽或禅让，等了七八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朱棣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下令暗桩纵火焚宫，欲烧死建文帝，这些《明实录》《明史》与《国榷》中都有详细记述。

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暗桩被郑洽的一招瞒天过海的计策给欺骗了，没烧死建文帝，却把小马皇后给烧死了。而与皇后一起被烧死的，是那一位由内侍

① 查继佐《罪惟录·建文逸纪》。
② 明·谈迁《国榷》。清查继佐《罪惟录·建文逸纪》。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
③ 明·朱国桢《皇明史概·逊国臣传》。

假扮的“建文帝”。

因为暗桩非皇后亲信，不能进入后宫，只能远远地探视，故难辨真假，所以误打误撞了。

吕太后与小马皇后假戏真做，演技高超，竟然把潜伏在宫中的十几名燕王暗桩都给瞒过去了。

朱棣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不由在心里骂道；好个朱允炆，你也会“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不知是哪个谋臣给他出的歪点子。好个吕太后与小马皇后，假戏真做，竟然把我埋在皇宫里的十几个暗桩都给骗过去了。

“假戏真做”！朱棣忽然灵机一动，我为何不学学他（她）们，也来个“假戏真做”。

于是，他突然指着那个假皇帝的尸体，号啕大哭起来（朱棣原本就擅长这一招，在北平时，为了瞒过建文帝的暗桩，救回在南京为人质的三个儿子，他就曾经装过一回“疯”，而且很成功）。“你这个傻孩子啊！我来南京是为了帮助你清君侧，除灭奸臣，你干吗要去自寻短见啊！真是傻透了！”①

朱棣的突然举措，把身边的侍卫与将领们都吓傻了，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待领会了朱棣的意图后，于是，众人便欢呼雀跃起来，四处散播——“建文帝被烧死了！”“建文帝被烧死了！”

于是，一桩惊天谜案就这样被炮制出来了，而且一直被延续了六百年。

浙江浦江郑义门——建文帝出亡第一站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130多名成员，经过10多年的艰辛探索与研究，终于勾勒出了一副明建文帝出亡路线图。

研究小组认为，在关于建文帝出亡的诸多说法中，清代著名史学家查继佐在其名著《罪惟录》中提出的23种说法中涉及福建的2种说法是最接近史实

---

① 清·张廷玉《明史》。

的记述。因为其余 21 种说法均属于孤证，既缺乏可供互勘的证据链，又不能自然延伸，根本不符合历史逻辑与规律。而涉及福建的这两说则不然，一旦深入研究进去，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具有内在规律的证据便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浮出水面，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证据链。

《罪惟录》云："金川门破，一内侍衣蟒服冕而代死。帝削发于淮清桥，从太平门出，历池州，渡浙江，投义门郑氏。郑设高几座之。钟鼓属礼见。呼之曰：老佛爷。郑有神光阁，帝为之更书"中和堂"三字易之……旬日，去之。如余姚石梁王氏。历温州，入闽。"[①]"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郑氏家。后又纳一妾，生四子（此处的"妾"即跟随建文帝南撤的福建籍的陈贵妃。建文帝有四个儿子，老三、老四均为了陈贵妃所生。）冒姓曰陈，曰同，二仍朱姓。……而帝左腋有痣，初别郑时，留龙纲为记。走着福州雪峰寺。三保（郑和）下洋遇之，泣拜于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对不能，别去"。[②]

这后一则涉及郑和到过雪峰寺的史料，有另外两则史料可与之互勘。明徐火勃著《雪峰山志》记载："明永乐中，三保太监自南洋携来瓦塔两座，就安置在寺前，塔已早圮，其址尚在。"[③]清康熙二十二年版《江宁县志·陵墓》记载："三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有奇功，秘知建文踪迹，回朝皆奏不闻，史称其有隐衷耳。"[④]

至于建文帝是怎么到达雪峰寺的，下文将会述及。

著名明史专家、南京大学教授潘群先生有专著《郑和踪迹建文考》述其事。

建文帝一行离开南京城，绕道池州（今安徽省辖地，明代直隶南京），来到了浙江浦江郑义门。此为其出亡第一站。

建文帝为何不跟随余六府、余七府和皇太子朱文奎的大队人马从太仓乘船南下福建，而走陆路（绕了一个弯）到郑义门，并在郑义门停留了一段时间？

---

① 清·查继佐《罪惟录·建文逸纪》。
② 清·查继佐《罪惟录·建文逸纪》。
③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
④ 清·康熙版《江宁县志》。

原因有三：一是为了迷惑燕军，二是为观察一下南京方面的形势，三是因为陈贵妃即将临产，需待其产后再续行程。

浙江宁波——建文帝出亡第二站

在浙江浦江郑义门住了一个多月，随行的陈贵妃在义门产下了三皇子朱文垚。六月初，探马来报，燕军已攻破金川门，进入南京城。建文帝感到大势已去，遂急忙下旨离开郑义门，取道余姚，向宁波而去。

建文帝离开南京城之前，已派出一批重臣分头到达苏州、太仓、宁波、杭州，以募兵勤王的名义，行造船备粮供应南下大军之实。故宁波知府王琎早已接到圣旨，已秘密备好一批海船与粮食恭候建文帝一行的到来。[①]

建文帝取道余姚的目的是为了去宁波，以便由宁波乘船南下。故宁波系其出亡第二站。

而《罪惟录》中仅记载了一句“如余姚石梁王氏”。[②]很令人费解。好在有后面一句“历温州，入闽”及下面一段史料的浮出，使人耳目一新。

明代著名史学家朱国桢在其名著《皇明史概·逊国臣传》中记载道；“公名琎，字器之，曰照人。……壬午，北兵已至江上，琎造船取海道勤王。后为卫吏卒缚送至京。文王问；‘造舟欲何为？’对曰‘泛海直趋瓜州（福州一古地名）截路耳’。”[③]此可与上述史料互勘。

可以想像，查继佐在撰写《罪惟录》时，其所采用的资料的提供者，为了掩人耳目，不暴露建文帝的行踪和王进的行为，只说其去余姚石梁（王进祖籍地），未言去宁波，也在情理之中。

浙江温州——建文帝出亡第三站

---

① 明·朱国桢《皇明史概·逊国臣传》。
② 清·查继佐《罪惟录·建文逸纪》。
③ 明·朱国桢《皇明史概·逊国臣传》

七月上旬，郑洽与杜华泗率大队人马护卫着建文帝，离开宁波港，浩浩荡荡地南下。

船队经许山、青屿、东霍山、西后门、普陀山、大翅山、舟山、大陈山与定海卫、昌国卫、台州卫、海门卫、松门卫、磐石卫防区，进入温州卫的温州港后，郑洽传令，除后勤人员外，其余人员一律不得离船上岸，而他自己只带两名贴身侍卫，策马向江浙行省处州府青田县南田乡武阳村（今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疾驰而去。[①]

他是找恩师刘基的二儿子、好友刘璟问计来了。

此时的刘璟，刚刚接到郑洽差专人送来的急件，看着急件，他心情十分沉重，陷入了沉思：

父亲刘基的《时务十八策》，始终引导着太祖朱元璋从胜利走向胜利，帮助太祖打下了大明江山且坐稳了江山。为何自己的《平燕十六策》却不能帮助建文皇上坐稳江山，以致出现了如今的局面。是自己不如父亲，还是建文皇上不如太祖皇帝？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②]

如今，建文皇上临危，启用仲平（郑洽字号）兄弟，也算是亡羊补牢了。此番仲平兄弟到访青田，想必是找自己商量南下闽地的大事来了，自己可得好好帮他合计合计。

刘璟正思忖着，庄园外传来马蹄声，转眼间郑洽一行已来到院门口。刘璟忙迎上前去，两人高兴地互相握手问候。

两人手挽着手进入厅堂，分宾主落座。郑洽首先开口："我这次奉诏南下闽地，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只恐有负圣恩。故特地登门向兄长请教，望兄长指点迷津。"

接着，郑洽就把建文帝和自己的打算一五一十地向刘璟作了陈述。

停顿片刻，刘璟言道："为今之计，退往东南，亦符合大势。南方属火，

---

① 清·查继佐《罪惟录·建文逸纪》。
② 明·朱国桢《皇明史概·逊国臣传》。

陛下五行属火，亦能相合。只是最终退往台湾不可取。台湾居东方，东方属木，与陛下五行不合。且台湾孤悬海外，其地偏狭，资源有限，不利发展。一旦被封锁，生存将陷入困境。是为绝地也。于反攻复国不起任何作用。而福宁地区的霍林洞天地区，古称“赤城”，亦称“方城”，四山列屏，两水纵横，俨然一天府之国，藏兵之所。且该地域居两省五县结合部，回旋余地大，地势易守难攻，作为反攻复国的基地是再理想不过了。何况其地属火，陛下五行属火，对陛下来说是往生门走，往那里一藏，谁也找不到。”

刘璟一席话，更加坚定了郑洽要把霍林洞天建成建文军的秘密根据地的决心与信心。

大事已定，郑洽也无心故地重游，喝完了刘璟为他准备的饯行酒，便告别刘璟，带着刘璟转交给他的 1000 多名民兵，匆匆上马赶回温州港去了。

福建福宁（今霞浦）——建文帝出亡第四站

建文四年（1402 年）七月下旬，郑洽、杜华泗率领船队，护卫着建文帝与陈贵妃，离开了温州卫防区，扬帆南下。

船队经东洛山、鹿屏山、凤凰山，到达平阳卫、金乡卫防区，又经石帆岛、俞山岛和壮士千户所、满门千户所，进入福宁卫防区。

这时，马国舅已率领李建极、朱癸二（化名，真名不详）、黄将军（真名不详）以及福宁卫指挥使、福宁县令等一批文武官员乘船到笔架山前接驾。在马国舅坐船的引领下，船队徐徐驶入大京所城前面的小港湾内。①

马国舅将建文帝、陈贵妃安置到新近突击修建的行宫之内，随即跟随郑洽、杜华泗一起，来到千户所衙门，商议警戒、布防事宜。

郑洽建议马国舅以大金为中心，每隔 3~4 里设一烽火台与墩台（即了望哨，今存）。这样，一旦有事，中军立马知晓，即可快速作出反应。

①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分卷》。

马国舅认为这办法很好，对保护皇上的安全很有效，立即作出部署与安排。

郑洽还建议，应对福宁境域的58座寨堡作一全面盘点，选择要害处，予以巩固或扩建。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修复、扩建军事设施的大行动在福宁大地展开了。一时间，卫、所建城堡，巡检司建寨堡，既增强了城堡与寨堡的防护功能，又改善了官兵的生活条件。

至今，在福宁湾沿岸留下了大量当时开采得还来不及运去修建城堡与水寨的块石，可证此事。此外，收录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中大量民间传说亦可与之互勘。

明人史起钦修的万历二十一年版的《福宁州志》是这样记载当时的福宁地域的："元至元二十三年（1363年），升长溪县为福宁州，领福安、宁德二县，属福州路。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陈友定占据。国朝洪武元年（1368年）归附。二年（1369年），改为福宁县，属福州府置。福宁卫领左、右、中、前、后（5所）及大金、定海千户所。"①

郑洽对福宁，本不陌生。此次南下之前，又从兵部、户部与宫里专门调阅了福宁地区的详细资料，尤其是与军事与银矿相关的资料。

郑洽知道，福宁为古杨州地，三代以降，为越、为楚、为闽中郡。汉封无诸为闽越王，都治。后汉始隶会稽南郡。晋置温麻，六朝沿之。至唐武德，又为长溪县，寻为宁远镇。武后时，复为长溪县。五代历宋，悉如旧。元升县为福宁州。我朝太祖二年（1369年），降为县，属福州府辖。②

据皇上（指建文帝）派往福宁、宁德、福安、古田、政和诸县督办银场的太监云，仅5县境内，就有银场10多座，银坑洞2000多处，所产白银占朝廷白银总产量的六分之一。③

---

① 明万历版《福宁州志》。
② 民国版《霞浦县志》。
③ 明弘治版《八闽通志》。明嘉靖版《福宁州志》。明万历版《闽书》。明万历版《福宁州志》。清乾隆版《福宁府志》。

因此，朝廷派往福宁及其周边督办银矿事务的内监多达百一十人以上。

而原福宁州城（福宁县城）系洪武三年（1370 年）由福宁镇守使驸马都尉王恭扩筑。时镇守使衙门称镇署。全城周三里，高一丈九尺，厚一丈，辟四门。东北隅穴水门，以泄涧水。江夏侯周德兴拆东壁，拓广里许，增高至三丈。计周四里，垛一千五百十有二，窝铺二十有九。①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太祖又命信国公汤和巡视闽、粤，筑城增兵。在福建沿海置福宁、镇东、平海、泳宁、定海 5 个卫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驻原镇守署。这一举措，使当时的福宁县城（今霞浦县城）一下子变得繁华起来了。因为一个相当于今天的师一级军事机构的进驻，与当初设立州一级的行政机构一样，均给地方的政治、经济带来了活力与繁荣。②

建文四年（1402 年）四月下旬，马国舅率领的大队人马，开始进驻福宁县城。

福宁卫指挥使司衙门被征用作福建行在都指挥都司衙门，卫指挥使司迁往县城附近的古县村。③

自此后，南京来的建文军开始大批进驻福宁及其周边地区。

明洪武元年（1368 年），洪武帝朱元璋遣大将汤和、胡廷美，分别从水路与陆路，向福建进军。信国公汤和率军走水路，取道浙江，经浙南、闽东攻向福州。豫章侯胡廷美率军走陆路，取道江西，经赣南、闽西攻向福州。

攻下福州后，胡廷美奉旨镇守福建（其后裔现定居福州市连江县江南乡儒阳村）。而汤和则奉旨班师回朝。途经福宁州（其时仍为州）大京寨堡（其时尚为寨堡）时，汤和觉得彼处堪为战略要地，遂留下一队人马（约百一十人），由一百户长率领，驻守屯田。这一批屯军户，即是福建沿海卫所城最早的原住民，亦是大京城堡的第一批移民。这批驻守大京寨堡的屯军户共编成十甲，每甲十户，均为军户。

---

① 民国版《霞浦县志》。
② 清张廷玉《明史》。
③ 民国版《霞浦县志》。

现在仍生活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的戴姓村民、曾姓村民，即是这批屯军户的后裔。[①]

洪武十九年（1386 年），倭寇开始骚扰东南沿海。洪武二十年（1387 年）太祖朱元璋命江夏侯巡视福建海疆，加强海边防建设，抗击倭寇。周德兴采取三丁抽一的办法，征集民兵 10 万人，军士 15000 人。在福建省沿海建起了 16 座卫所城，设置了 45 处巡检司，强化了海边防建设。

与汤和一样，颇具慧眼的江夏侯周德兴，也看到了大金所城的军事价值，遂将大京寨堡扩建成大金城堡。周德兴模仿南京城的格局，在城四角建四口镇城井，设四座角楼（街亭，至今尚存），开设瓮城、水关、暗道等。大金所城遂成规模。[②]

与此同时，大金城堡的人口亦由百户增至千户。这是大金城堡的第二批移民。那儿的大片土地被这批移民开垦出来了，屯军户将多余的土地租给周边的农户耕种，从而导致了周边人口的增加。

现在仍生活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及其周边的黄姓、张姓、陈姓、李姓村民，即是这批屯军户的后裔。[③]

建文四年（1402 年）五月起，随着建文军的陆续进入福宁地域，大金城堡及其周边人口激增。这批人，即是大金城堡的第三批移民，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移民。现在仍生活在大京村及其周边地区的朱姓、郑姓、王姓、林姓、卓姓、韩姓村民，即是这一批移民的后裔。[④]

“大京，原名南京，亦称大金（命名与南京明孝陵的大金门有关）。”[⑤]相传，建文军进驻后，曾计划将大金建成临时帝都（即陪都），“当地广泛流传‘洪

---

① 清张廷玉《明史》卷 132。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戴氏家谱》《曾氏家谱》。
② 清张廷玉《明史》卷 132。
③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黄氏家谱》《张氏家谱》《陈氏家谱》《李氏家谱》。
④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朱氏家谱》《郑氏家谱》《王氏家谱》《林氏家谱》《卓氏家谱》《韩氏家谱》。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洪口乡库山村《朱氏家谱》。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管阳镇金钗溪村《朱氏家谱》。
⑤ 宁德市文化与出版局《文明的足迹》。

武帝（即建文帝）要在这里建临时帝都’的说法。”[①]“大金”之所以演变为“大京”，是因为“大”字可谐音为“代”字，含有“代京”的意思。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畲族博物馆收藏有一块“当京皇帝万万岁”的明代祭祀皇帝的神祇牌可证此说。而大京这个“陪都”之所以没建成，只是因为郑和的水军来得太快了。建文水军战败，建文帝在众人的护卫下，从东冲口进入三都澳，撤向宁德东乡、西乡（今蕉城区洋中镇、石后乡、虎贝乡一带）。以至在当地留下了大量有关建文军与燕军在福宁沿海与三都澳水域交战的民间传说。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中收录了一则福宁民间传说故事;

传说洪武帝朱元璋是“天犬星”下凡，陈友谅是“天虎星”下凡，“天虎”听说“天犬”到凡间做皇帝，心里不服，以为自己是“天虎”，比“天犬”厉害，就偷偷跑到下界与朱元璋争天下来了。

有一次，朱元璋被陈友谅打得大败，率领兵马退到了三都官井洋，只见前面有一排青山挡路，船不能前进，后头追兵又近，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军师刘伯温知道朱元璋是“天犬星”，就对他说；“主公，请你跪在船头，学犬吠三声，定能化险为夷”。朱元璋为求脱身，也顾不得许多，就跪在船头，面对青山学了三声犬吠。一时间，天边乌云黑暗，雷声隆隆，接着山崩地裂一声巨响，青山当中裂开一道缝，现出水路，朱元璋的兵船就从这个裂口开过去逃走了。等陈友谅追到时，青山已经合拢，只剩下一个犬蜕一样的洞口了。从此，人们就把这个山口叫“犬蜕门”。

今天的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东面的那座山就叫“门犬山”。

《明朝十七帝王歌》可与之互勘，《歌》云：“第一皇帝洪武帝，削平群雄做皇帝，龙庭刚刚坐稳当，就有怪鸟飞来叫。洪武听知心头怒，即时就去问军师，怪生怨鸟因何事？教我江山退还他。军师开口答君王，怨鸟原是陈友谅，

① 唐颐《二十八个人的闽东》。

江山打来归你管，变做怨鸟犯君王。变做怨鸟犯君王，五更来叫声玲琅。御笔指去与它讲："你要江山给我养！"洪武御笔正指去，怨鸟展翅飞上天，飞去半天不见影，后来投胎永乐儿。永乐大来实在呆（ái），洪武忖来无计较，呆仔原是呆爹管，拨去北京守河界。永乐出门无言语，洪武面前来妆扮。凤凰因风吹过海，龙王掌水反江山。洪武坐朝卅一年，三十一年退江山。龙位退给太孙管，建文太孙管四年。第三皇帝永乐王，一心兴兵反凤阳。二十二年占龙庭，建文无奈去修行……"。

明永乐二年（1404 年）夏，燕军占领大金城堡。随即裁撤大金千户所，将其改为大金巡检司，并派一百户长率兵屯守。[①] 这一批人，即是大金城堡的第四批移民。

现在仍生活在大京及其周边的刘姓、龚姓、雷姓、蓝姓村民，即是这一批屯军（燕军）户的后裔。[②]

由于建文帝与郑洽在隐避福宁期间，替福宁百姓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于是，在福宁五县留下了许多颂扬他们的优美的民间传说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都被收入 20 世纪 80 年代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闽东各分卷。

不过，传说故事中的建文帝不再叫建文帝，而是叫"洪武帝"或"罗隐帝"。郑洽也不再叫郑洽，而叫"郑堂"或"郑三合"。

原因是，永乐帝朱棣占领南京后，把建文帝的帝号、年号都给取消了，建文帝成了一个非法的皇帝，建文朝也就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皇朝。建文纪年被洪武纪年所取代，建文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也就成了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久而久之，建文帝也就变成了"洪武帝"或"罗隐帝"。

在闽东民间，广泛流传着罗隐与郑堂的民间传说故事，仅收录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闽东各县分卷中的此类传说故事就有 45 篇，而这仅仅

① 明《郑和航海图》。
②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刘氏家谱》《龚氏家谱》。

是该传说中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传说散播在民间未收录在册。

关于“罗隐”和“郑堂”的传说故事的最初编纂者要给后人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信息呢？

集中起来有下列几点：1. 罗隐原来不是个凡人，是个皇帝。2. 郑堂是罗隐的军师兼宰相。3. 失去皇位的罗隐，流落民间，到处流浪。4. 做不成军师与宰相的郑堂也没有一个正当职业，也成了一个流浪汉。5. 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人，尤其是郑堂，更是百姓心目中惩恶扬善的智者与大侠。6. 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为百姓修桥补路、筑堤围塘，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7. 罗隐死后，就埋在一块又大又圆又扁的大石头（一说大石板）底下。郑堂（郑洽）死后，就埋在罗隐帝（建文帝）陵墓下方的“困相墓”内。

“郑堂和罗隐都是明朝人……罗隐做皇帝，郑堂做军师，罗隐不成帝，郑堂不成师”。①

“郑堂是罗隐帝的军师。据说能喝石成沙，喝水成冰……”②

“两位罗隐帝殿前的将军从皇城赶来找罗隐，听说罗隐做不成皇帝了（暗指举事失败了），愣了，站在路边变成了石头（闽东各县 < 市区 > 均有类似的传说——赶来勤王的将军）”。③

“余坑寨被官军攻陷后，金鸡山的金鸡也不叫了。一个姓石的将军从浙江省庆元县赶来助战。将军赶到马鞍山时，听说草寇寨主举事失败了，便拔剑自刎了。后来，这个将军的尸身化作一座巨石像，至今还屹立在马鞍山西麓的半山腰。”④

而十分有趣的是，这个“罗隐”到了浙江省，就被谐音成了“罗允”（浙江省有罗允寺），到了贵州省又被谐音成了“罗咏”（贵州省有罗咏庵），到了东南亚的泰国，又被谐音成了“罗勇”（至今泰国尚有一个“罗勇府”）那

①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
②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分卷》。
③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分卷》。
④ 寿宁县竹管垅乡志编委会《竹管垅乡志》。

里的民间传说故事也多与建文帝与郑洽有关。

与此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还有“草寇的传说”和“鸭母娘娘的传说”，这两个人物形像分别影射了建文军将领与陈贵妃。这两组传说在闽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流传也十分广泛。[①]

几百年来，人们为了纪念建文帝与郑洽，塑造了“罗隐”与“郑堂”以及“鸭母娘娘”与“草寇”这样一群艺术典型，让它在民间广泛流传，以此来与永乐朝廷抗争。

而闽东百姓口中的永乐帝朱棣，却是一个负面形像。上述那首流传在福安、寿宁、福鼎、霞浦畲族村庄的《明朝十七帝王歌》中，把朱棣说成是陈友谅投胎转世来夺洪武帝、建文帝江山之人，就是个典型的案例。

福建宁德（今蕉城）东乡——建文帝出亡第五站

永乐元年（1403 年）三月，已率兵至福建勤王的辽宁大宁总兵刘贞，因家眷被燕军拘捕，遂率部分水军沿水道至南京降燕，并向燕军和盘托出南军的军事部署。[②]

刘贞的叛逃，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家在北方燕军辖地的水军将士，纷纷效仿刘贞，驾船出逃。建文水军尚未开战，已减员近三分之一。

刘贞提供的情况，使明成祖朱棣大吃一惊，他一方面急令郑和加紧编练十万楼船水军，[③]一方面急令邱福、朱武率领十万陆军提前入闽，准备水陆夹击建文军。[④]

永乐二年（1404 年）三月，在燕军水战奇才郑和、尉迟子良[⑤]率领的十万楼船水军的攻击下，建文水军全线溃败。收到败报的建文帝一行遂撤至宁德县

①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闽东各县分卷。
② 明·姜清《姜氏秘史》。
③ 明·胡宗宪《筹海图篇》。
④ 清·李玉《千钟（忠）录》。
⑤ 台湾陈水源《杰出航海家郑和》。

东乡四都、五都、八都（今蕉城区金涵乡、八都镇、漳湾镇）一带。此为其出亡第五站。

永乐元年（1403 年）五月，郑洽率领南京留守都司所辖的 5 个卫的主力退到宁德县霍童乡水漈里，在以漈山、芙蓉山、上金贝南山为中心的区域内，建立了 36 处寨堡与烽火台。而此前，余六府他们已在漈山脚下的红门里（现地名）地方，为皇太子建了一座行宫（当地人称“黉门大厝”，后演变成“红门里”）。在宁德县霍童乡水漈里八都一图（今蕉城区八都镇门下村）地方为建文帝与陈贵妃建了一座绵延六华里的行宫（当地人称“大明堂”“金厝里”，并云主人是个姓“金”的太监，是个大财主。此亦是上金贝建文帝陵被认为是“金太监墓”的缘由）。[①]

而郑洽却将自己的行辕建在安东乡临海里五都崎坂村（今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一带。此行辕后来成了朝廷囚禁郑洽的“囚所”。久而久之，也就成了郑洽与其小儿子的故居）。

当地民谣——“大明堂，不空忙，有消息，要提防”。说的就是这件事。

而大明堂又被叫作“金厝里”，是因为朝廷与官府的人告诉百姓，那儿居住的主人姓“金”的缘故。

现该旧址上还留有一口明代的古井，曰“寒泉井”。

大明堂与红门里行宫依山而建，内部暗道密布，机关重重。明永乐元年（1403 年）十月，燕军在攻打漈山和这两处寨堡时，受到了重创。交战双方死伤了几万人，海滩上尸横遍野，鲜血把方圆几海里的海水都染红了，足见战况之惨烈。

后来，大明堂被燕军焚毁后，一位死里逃生的姓黄的建文军将领，在废墟上建起了茅草房，娶妻生子，后来始有了今天的门下村。

在门下村一带，六百年来，一直在流传着一则十分凄美的民间传说故事；

从前，不知哪个朝代，漳湾门下村出了一个草寇头领。这个头领小时候就

①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集》。

死了爹娘，全靠伊嫂一手养大。他每天下海抓鱼捞虾帮贴家庭。每次趁退潮的时候背起竹篓下滩涂，可辛辛苦苦讨一次小海回来，最多只能弄到半斤小鱼虾，日子越过越艰苦。

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白须白发的老仙翁对他说，“我送你三件宝物，助你为民除害。”老仙翁说完把袖子一拂，马上拿出一支毛笔，一支竹筒和一个簸箕。并且告诉他这三件宝的用法。他都暗暗记在心里。说完，老仙翁一下子不见了。

从此以后，他虽然还是下涂讨海，其实是坐在礁石上用海土捏出各种各样的鱼虾。他捏出的鱼虾，只要用仙人送的毛笔轻轻点一下眼睛，就变成了真鱼真虾。所以每次都能装上满满一大篓鱼虾回家。伊嫂很高兴逢人就夸小叔有本事。

这样，过了约一年时间，他每天除了捏篓鱼虾回家换柴换米当菜配外，还捏了好多好多的泥兵泥将、泥枪和泥马，要伊嫂晒干后，装进家里的米陈里保存起来。有一天，他又捏出一只大公鸡放在鸡笼里。晚上吩咐伊嫂说：“等鸡笼里的泥土鸡叫第一声时，就赶紧把我喊醒。”伊嫂将信将疑地答应下来。当晚，他真的在鸡笼旁边看守，一直等到天快亮时，泥公鸡还是没有开声叫。她实在困得不行，就随手拿了一把扫把伸到鸡笼里七搅八搅，泥公鸡被搅得受不了了，只好“举举歌……”叫了起来。这下伊嫂很得意，马上去把小叔喊了起来，小叔赶紧下床，从墙上摘下了弓箭。一口气跑到后门山的山顶上，对准京城里的皇帝殿重重地射出了一箭。可惜时间太早了，这时候皇帝才起床，宫娥、太监们还在侍候他洗脸、穿戴呢。当皇帝正要上殿坐朝时，突然间听到金銮宝座上“啪！”的一声响，龙椅靠背正当中了一支利箭。满朝文武吓得脸都发白了。一个老太监上前拔出来一看，箭杆上现出“福建省宁德市门下”几个字。皇帝听说此处有人造反那还了得，当下就派出大队人马去剿灭造反草寇。

再说门下这边。有一天，伊嫂正在熬盐卤，忽然听到米陈里闹嘈嘈的，她吓了一跳，赶紧从锅里舀了一勺勺滚烫的盐卤灌进每只米陈里。经她这么一灌，里面的吵闹声越来越大了。因为泥人泥马被热卤一烫，不是掉了脑袋，就是断

了手脚，不是烂了皮肉，就是瞎了眼睛。一个个都成了“十不全”。

朝廷派来的官兵经过好几个月的行军，终于到达门下村。草寇头领一听到风声，就马上把所有的米陈盖都掀开，谁料放出来的兵将、马匹都是“十不全”，打起仗来自然没用，半天工夫就被官兵打败了。他见势不妙，赶紧回家拿来簸箕作盾牌，正要上前迎敌时，谁知伊嫂在后面大叫；“快跑啊，官兵都追来啦，你还拿簸箕做什么呀！”一语泄漏了天机，盾牌变簸箕，草寇头领寡不敌众，被官兵杀害了。

官兵灭了草寇，班师回朝，皇帝听了回奏，怒气还未消，提起朱笔，从地图上找到门下这地方，狠狠划了一笔，他这一划，把门下的提刀山划断成两截，成了古迹。草寇头领当年射箭的后门山，被后人叫作“箭岭山”，这个山名就一直流传到现在。[①]

这个故事在福宁各县及其周边广泛流传，只是版本不同而已。

2. 血洒瑞迹

另一场激战发生在宁德县金溪里五都（今蕉城区金涵畲族乡）瑞迹寺，双方亦死伤近万人。

瑞迹寺，在宁德县金溪里四都（今蕉城区金涵畲族乡）淡坪岗下。五代梁乾化年间（911–912 年）建。距宁德市区约 5 公里。古人有诗赞曰：“蓬壶境界从天设，此是宁阳第一山。日午樵穿林竹径，月明僧度石门关。潭龙势带千江白，雾豹纹添万点斑。坐看岩边新果熟，饥猿作伴绕藤攀。”[②]

相传，当时在瑞迹寺与淡坪岗下，亦发生过一场激战。建文军伤亡了四千多人，燕军伤亡了五千多人。寺内寺外，尸堆成山。赶来增援的建文军只好把双方战死的将士的尸体集中到瑞迹寺山门外的深壑之中，推土掩埋。后世僧人在此“万人坑”上建了一座放生池，并请来杭州灵隐寺的高僧帮助念经，以超度亡灵。并依高僧建议在放生池内置 9 口覆转的水缸，以镇戾气。此制直至本

① 《中国民间故事集·福建卷·宁德分卷》。
② 清·乾隆版《宁德县志》。

世纪 2012 年寺庙重新拓展时才被废弃。

又传，是一个叫郑滃（即郑洽化名，详见浙江浦江郑义门——江南第一家编纂的《希忠录》）[①] 的将军派兵来掩埋了这些尸体。他还给寺庙住持送来了 5000 两白银，作为寺庙受损的修缮费。为此，寺庙住持特地给这位素未谋面的郑滃将军立了一个长生牌位，祈愿菩萨保佑他一生平安。

也正是这支建文军士兵，开到瑞迹寺后山的山洞口，撬动机关，使挡在洞口的巨大神道碑自动移开，露出下方的出入口。建文军士兵遂下到隧道中，搬出未来得及运走的库银，往石后方向蜿蜒而去。

为了纪念郑洽，当地百姓遂把“淡坪”称为“安郑坪”。[②]

以上是根据瑞迹寺当家和尚口述与蕉城八都、七都、六都、漳湾、金涵一带民间传说整理而成的。

3. 坚守云淡

又传，在云淡门岛上，也发生过一场激战。当时建文军在岛上四角建立了四座寨堡，分别叫马头寨、岭头寨、鸡角寨、后岗寨。燕军水军发兵来攻，从永乐三年（1405 年）阴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三，连攻三天，均被击退。至今云淡门村原住民还保留了一种奇异的风俗，每年阴历初一至初三，家家户户都要开山劈石，以为纪念。

后来，岛上的寨堡虽被燕军攻占，并被焚毁，但藏于寨堡的地下银库里的大量未加工成官银的银锭尚未被燕军发现。

燕军撤走后，建文军复来，搬走了银锭。

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还有村民在马头寨遗址地下洞库内挖出上百公斤的银锭，这些银锭为当地政府上交福建省人民银行。

而留在云淡岛上的建文军余部，以慈化寺为据点，一直坚持到宣德年间（1426—1435 年），由于几位头领的相继去世始告结束。

---

① 浙江浦江郑义门《希忠录》。
②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集》。

同样，为了纪念郑洽，当地百姓遂把“云淡门”称为“安郑门”。[①]

以上是根据慈化寺当家和尚口述与蕉城八都云淡村民口述整理成文的。

这几场激战，不但双方军队死伤惨重，而且还祸及古田、福安、宁德与福宁四县甚至整个福州府。此役是导致当时福建全省的人口降了三分之一，福州府与福宁县（今霞浦、福鼎）、宁德县（今蕉城区）、福安县（今福安市、寿宁县）人口下降了一半的主要原因（次要原因是下文将要述及的“永乐抄寺僧”）。宁德（今蕉城）县城（原址在金涵琼堂）亦被战火摧毁，后人遂在白鹤岭下重建县城。这场战火使当地人口骤减。当地流行的民谣“罗隐（指建文帝）不成帝，害死闽东人”即是这一历史悲剧的写照。

《福建历代人口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一书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1 年），全省有 49 个县，815527 户，3916806 人，每县平均户数 16990 户，每县平均人数 81600 人，每户平均人数 48.0 人。至明弘治四年（1491 年），全省有 53 个县，506039 户，2106906 人，每县平均户数 9548 户，每县平均人数 737 人，每户平均人数 4.16 人。”在这百年间，福建全省的户口数锐减了 309488 户，接近一半（二分之一弱，三分之一强）；人口数锐减了 1810746 人，亦近一半（二分之一弱，三分之一强）。

明嘉靖版《福宁州志》卷三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福宁本州“户二万一百七十七，口五万三千一百六十。”嘉靖十一年（1532 年），福宁本州“户六千一百三十八，口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五。”洪武二十四年（1389 年），福安县“户七千四百一十；口二万五千六百六十三。”嘉靖十一年（1532），福安县“户七千一百一十，口二万六百三十二。”洪武二十四年（1389 年），宁德县“户一万五千五百零七，口三万三千七百五十七。”嘉靖十一年（1532 年），宁德县“户五千八百二十，口二万八百零六。”在这一百四十多年间，整个福宁州户口数锐减了 24026 户，超过二分之一；人口数锐减了 52776 人，

①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集》。

减少了二分之一。

再深入剖析，人们会发现，福建省人口锐减的时间点就发生在建文转向永乐时期的永乐初；而人口锐减的重灾区恰好就是沿海的福宁县（今霞浦县、福鼎市、柘荣县）、宁德县（今蕉城区、周宁县）、福安县（今福安市、寿宁县）。

同时，所有的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的资料都显示，永乐执政的前五年，在福建东北部沿海的福宁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事，伴随而至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的结果就是，在当年福宁地区（今宁德市）的范围内，出现了大批的废村、废寨、废寺、废庵、废矿，形成了一个人口稀疏地带。而宁德县（蕉城区）县城也因此而易址。县城主姓陈姓被屠杀了 2000 多人。

永乐二年（1404 年）元月。漈山——芙蓉山——上金贝南山护宝大战持续了两个多月，双方死伤惨重，燕军退出三都澳，建文军则撤向霍林洞天深处。

而“建文宝藏”从此也就从人世间消失了，至今无人知其下落。

福建宁德（今蕉城）西乡——建文帝出亡第六站

霍林洞天，素有“仙巢佛窟”之称。山中遍布寺庙与道观。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曾隐于霍山修炼内丹坐化之术。有一天，他对弟子说；“吾今为青童君所召乃蝉蜕而去。”这里所说的青童，就是霍童。[①]

在司马承祯之前，已有著名道士霍童真人、王纬玄、茅盈、韩众、左慈、葛云、葛洪、邓伯光、褚伯玉、王玄甫、黄鞠、乐子长等隐于兹山修炼。而紧随司马承祯之后，又有许腊、白玉蟾、彭耜、程仙翁、周仙、马仙等著名道士入山修炼。

而就佛教来说，支提山与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九华山等四大佛教名山并列，为佛陀释迦牟尼身边的弟子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天冠等五大菩萨在中华大地现身说法的道场。在洞天深处，就有“天冠说法台”遗址。佛经

---

① 《赤城志》。

记载:“东南方有山名支提,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① 时至唐天宝年间(742—756年),有新罗国(今朝鲜)入唐求法学僧元表,从中国往印度巡游,蒙心王菩萨指示,震旦国有山名支提,千圣天冠演法其中,你可去寻找那罗延窟,隐而候之。元表即携《华严经》八十卷回到中土建筑兹山,礼天冠菩萨道场,立志为经文中提到的支提山作注脚。经过长途跋涉,他来到素有“神皋奥区”之称的霍童山之西北隅。只见彼处群峰环拱,层峦叠嶂,林密竹翠,鸟语花香,整座山状似千叶莲花,酷似佛陀当年于拘尸那迦城外婆罗双树林间进入永恒的涅槃之处。于是,元表便躬负《华严经》,入住天然洞穴那罗延窟,诵经念佛,过着涧饮木食的原始人生活,时间达数十年之久。直至唐大中元年(847年),附近的保福寺僧慧平禅师听闻其事,遂率徒众入山寻至那罗延窟,迎出《华严经》,存于甘露寺都尉院,此经才获面世。②

十分有趣的是,在古代,由霍童山脉延伸出来的小山脉,都叫“游仙山”,而由霍童山中流出来的溪流,也都叫 “游仙溪”(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的金溪以及它上游的洋中溪等)。

更为有趣的是,这些“神仙”与“菩萨”也是十分讲究秩序的,虽然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尽”,但在霍林洞天这个“神仙洞府”与“震旦佛窟”中,他们还是很讲原则的,双方以霍童岭为界,分片而居,不越雷池一步。

于是,在霍林洞天区域就留下了一句传世佳话“童东无佛迹,提西无仙踪。”

按照郑洽的部署安排,陆续撤至霍林洞天核心区域的皇太子朱文奎,陈贵妃和三皇子以及余六府、余七府、杜华泗、胡卓汉、詹斗二等人被霍林洞天的秀丽景色深深吸引住了,都为郑洽在危难之际还能为大伙儿找到这么一处人间仙境而欢欣鼓舞。

面对着洞天域内域外那上百座庵堂寺院和几十座宫观,大家不禁为郑洽的深谋远虑和周密部署而感叹不已。因为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可以扩建为

① 《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住品处》。
② 黄幼声等《宁德霍山》。

抗燕根据地，就可以存活下去。

这就是建文军退守这一区域的原因。

这也是后来建文帝要到支提华藏寺出家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也是郑洽的计划与主张。

冬十二月。按照郑洽的计策，退至霍林洞天区域内的建文军各部，纷纷以洪武帝的屯田军名义，择地而居，结寨而立，隐藏了起来。

同月，退至宁德县青田乡二十五都一带（今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及其周边三十六村）的余六府、余七府、胡卓汉、詹斗二，护卫着皇太子与国库里运出的金银财宝，按照郑洽的计划，重新筑堡结塞，继续与燕军周旋（余六府、余七府、胡卓汉、詹斗二及其后人均落籍该区域）。

至今，在钟洋余氏祠堂正中位置，还悬挂着皇太子朱文奎亲笔手书的一副对联“国族聚于斯相府方声未艾，宗祊藏之久后贤俊烈重兴”。对联下方的落款是“眷弟万象新（朱文奎化名，与之相对应，建文帝朱允炆曾化名“万昌”——浙江省的几部朱姓家谱均记载了此事）”。而在大厅两侧柱子上，则悬挂着帝师周斌亲笔手书的一副对联；“接武龙墀台谏熏名香御墨，恹猷翰苑校书门第焕文章。”对联下方的落款亦是“眷弟周斌”。[①]

而跟随余六府、余七府、胡卓汉、詹斗二退到该区域的建文军将领，纷纷在钟洋村周边的村庄隐居下来。胡卓汉负责经营钟洋村附近的岩前寨堡。而余七府，则隐居于与钟洋村相距二十里外的留田村（其后代已改姓黄）经营另一处寨堡。詹斗二隐居于与钟洋村相邻的眉屿村，经营弥陀寨堡。该村《詹姓家谱》中留下了两首诗歌，记述了其人其事。诗云：“一饮曾闻斗二升，魁梧神力足堪征，至今巨石巍然立，谁人见后不叹称。”“豪杰寥寥出世间，古今遗恨笔难删，能留胜事堆顽石，可当羊碑峙岘山。”另一位李姓将军化名李二，携家眷隐于山腰间的田地村。还有一位范姓将军（更名易姓），隐于上北洋村。

---

①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余氏家谱》、浙江省千岛湖农林村《朱氏家谱》。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集》。

又有一位建文朝吏部官员朱三，隐居于库山村（今属洪口乡辖）。这位朱姓官员及其手下是从福宁（今霞浦）大京逃到库山村的，是专门负责种植方竹，生产反季节竹笋，送给皇帝、贵妃与皇太子吃的。洋中一带，在永乐朝以前，是不出产这种方竹笋的。自从朱姓人来了以后，才开始出产这种竹笋。故当地人把这种竹子叫“皇帝竹”。村民供奉的神祇曰“二母娘娘”（即陈贵妃），相传她是“罗隐帝”（即建文帝）的妃子。[①]

这些隐于钟洋村周边各个村落的建文军将领的后裔编写的家谱，给世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的祖先来自“南京凤阳府八角井”、我们的祖先来自“南京凤阳府月半池”、我们的祖先来自“南京紫金山下”。

查阅明代南京历史与明初南京城全图，我们知道，明初的南京凤阳府八角井地方为禁军（御林军）与锦衣卫的驻地，南京凤阳府月半池地方系金川门内的军营所在地，而南京紫金山下则为三品以上王公大臣的住宅区。

只要翻阅一下各姓的家谱，我们即可明白那散布于八闽大地的建文从亡大臣与殉节大臣之后裔的来历及身份。

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更为惊人的是，那些陆续赶来的，与郑洽接上关系的各省的建文军，则被安排在洞天周边的各县安营扎寨，与洞天内的建文军遥相呼应，互为倚靠。在宁德县（今蕉城区，含今周宁县）境内有吴山寨、麒麟寨、留田寨、马头寨、岭头寨、鸡角寨、凤山寨、云门寨、后岗寨、像运寨、青山寨；在古田县（含今屏南县）境内有瑞岩寨、天湖山寨、瑞云寨、广利寨、三峰寨、波山寨、龙港寨、旗山寨、鸡母寨、三角寨、灵峰寨、顶盘寨；在福安县（今福安市，含今寿宁县）境内有石湖寨、余坑寨、荆棘寨、甘棠寨、九岭寨、碑坑寨、双坑寨、刘坪寨、蛇头寨、高洋头寨、大熟寨、鱼溪寨、白云山寨等。

同月。退至古田县元和乡邵南里四十四都（今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地界

---

①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洪口乡库山村《朱氏家谱》。

的杜华泗，按照郑洽的部署安排，以洪武帝屯田军名义，安营扎寨。他们命士兵为陈贵妃与三皇子突击修建了两座行宫。后来为了隐蹕起见，把三皇子的行宫改造成寺庙状，称“日庙”；把陈贵妃的行宫改造成庵堂状，称“月庵”。“月庵真际”古迹今存。[①]

世传，杜华泗还在古田县安乐里三十六都（今古田县杉洋乡）凤林寺一带建立了一个城堡，与胡卓汉的岩前寨一样，城堡背靠旗山与像山，面临人工湖凤林湖。湖边置有几艘小船供进出，颇有“水泊梁山”之韵味。

他们还在像山上设置了一个兵械制造厂，在旗山上设置了一个粮库，准备长期坚持抗燕斗争。

相传，这股建文军的粮库就建在旗山上的一个自然形成的天坑洞之内。

该湖泊干涸后，在寺庙大门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广场，人们站在寺庙大门口台阶上说话，会听到巨大的回声。

又传，杜华泗还在湖边的两座小山包上建了两座贮油池，夜里将油池点亮时，把湖边方圆十多里照得如同白昼。

至今，寺庙门前那历尽劫灰的巨大饮马槽与巨型石柱，向人们诉说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像这样的“水泊梁山”式山寨，在霍林洞天内还有多处。

秋八月。郑洽差人向在霍林洞天区域内坚持抗燕斗争的余六府、余七府、何群、胡卓汉、詹斗二、杜华泗等建文军将领通报了北方与西北方抗燕斗争的做法与经验,尤其是河北地区的尾尖寨与西水寨以及江西等省建文军采取军队、义兵、僧人三结合形式筑堡结寨，存兵于民的好办法。[②]

此后，福宁地区乃至福建全省的建文军据点均采化整为零，存兵于民，依托村庄、寨堡与寺庙、庵堂，与燕军周旋。

当时的福宁民谣“和尚当官，贵妇入庵，草木生孩，莫说荒唐”。正是这

①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集》。
② 王崇武《明靖难史考证》。

一段特殊历史的写照。

秋九月。燕军在霍林洞天东部山腹内来回搜索了一个多月，一无所获。愤怒之下，纵火烧毁了大明堂、爨门大厝以及漈山寺、瑞迹寺、安仁寺、凤山寺、龟山寺、云门寺、灵山寺、凤林寺、后院寺、宝岩寺、灵峰寺等建文军屯住过的几十座寺庙。

这就是闽东百姓口中的“永乐抄寺僧”[①]

永乐四年（1406 年）春三月。为了祭奠在漈山——芙蓉山——上金贝南山战役中殉难的大批建文朝文武官员，郑洽命人在漈山上建了一座城隍庙，并在周边地区建了几十座“师公庙”，以供他们的后人和周边百姓永世祭祀。这些师公庙与城隍庙几经重建重修，至今犹存。只不过其神祇牌一律不署帝号、纪年，一律只留姓不留名。此已成为今天宁德市蕉城区的一种特异文化现像。

据不完全统计，在上金贝南山有“林马二公大王庙”（在乌石马旁边），那是为了祭祀来自浙江乌镇的林公和来自江苏南京（石头城）的马公两位武将的；在石后乡石牌岗有“罗、张、杨三师公庙”，那是为了祭祀三位建文朝文官的……

而辗转来到宁德（今蕉城）西乡的建文帝的大妹妹朱珍娘（即朱一娘），其儿子化名黄继祖，与化名黄子淳的余六府的小儿子和化名黄道安的余七府的大儿子一道隐于宁德县青田乡二十五都二图（今蕉城区洋中镇留田村）。而余六府手下一位名叫李二（化名，真名不详）的将军与化名陈四的夫人一道隐于宁德县青田乡二十五都一图（今蕉城区洋中镇田地村）。[②]

至今，这些人的名字仍镌刻在蕉城区洋中镇田地村观音堂石质须弥座上。

屯守西乡的余六府、余七府、胡卓汉、詹斗二、李二、杜华泗等人还议定在留田村后山地名“梁厝里”地方，开设了一个书院，请了一个姓梁的国子监

① 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双城镇《刘氏家谱》。
②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留田村《黄氏家谱》。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田地村《李氏家谱》。

生，教皇太子、三皇子、耿世子与这些将领的儿子、孙子读书。[①]

福建闽县（今闽侯）雪峰寺——建文帝出亡第七站

永乐二年（1404 年）八月，在攻打宁德（今蕉城区、周宁县）、福安（今福安市、寿宁县）的战斗中受到重创的燕军，经过两个多月调息补充，又卷土重来。就在北军猛攻宁德（今蕉城）县城（当时的宁德县城位于今蕉城区金涵畲族乡琼堂村一带）的当天夜里，郑洽在部署安排好一切之后，秘密来到福州府宁德县青田乡二十五都（今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一带）的建文帝行宫，与何洲、周恕等率领三百多名侍卫，护卫着身着微服的建文帝朱允炆，趁着夜色，离开行宫，向古田县方向悄悄潜行。

由于建文帝有脚疾，不便行走，郑洽便命人扎了一副滑竿，抬着建文帝，往雪峰山上一步一步地攀登而去。

永乐三年（1405 年）九月初的一天凌晨，郑洽率领的这队人马，护卫着建文帝朱允炆，来到了雪峰崇圣禅寺。

雪峰寺全称雪峰崇圣禅寺，在福州市闽侯县大湖乡雪峰山南麓。雪峰山本名像骨峰，山脉绵亘 60 余里，跨闽侯、罗源、古田、闽清四县。寺距福州 77 公里。古人有诗赞曰："太华凝结素芙蓉，隔巘流云淡复浓。夏入伏中微觉暑，时移秋半便为冬。银锄错落千重岭，玉砌嵯峨百丈松。几度雨花台上望，光摇楼阁起霜钟。"[①]

雪峰寺开山祖师是高僧义存（822–902 年）。其人本是南安县杨梅乡曾氏子，十二岁剃度为僧，后为闽王王审之导义法师，馆于王府说经，名噪一时。义存精通佛理，从学者几盈全国，德高望重，中外闻名。禅门五宗（沩仰、临济 、曹洞、法眼、云门）中的法眼、云门二宗即出其派下。唐咸通十一年（870 年），高僧义存与同门行实到山中择址建寺。里人谢仿等为其斩茅结庵于桎洋

---

①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林贻瑞等《福建名胜风光》。

凉映台之北。一日行实登上像骨峰顶，见到“未冬先雪”的奇观，义存根据佛教圣地有鹫岭猴江，将山更名雪峰。乾符二年（875 年），赐名应天雪峰禅院。世传，五代时，闽王王审之询问义存：“师住像骨峰有何异？”义存答曰：“山顶暑月，犹有积雪。”因改名为雪峰。①

乾宁元年（894 年），该寺移于陈洋（今址），闽王捐资，里人蓝文卿舍田赞助，所建殿宇遍于山间。宋太平兴国三年改称雪峰崇圣禅寺。②

永乐二年（1404 年）六月，洁庵禅师为建文帝作了剃度，取法名普庵禅师。③

同月，内官监何洲、周恕与三十六名贴身内侍一并剃度入寺为僧。其余人等则跟随郑洽分别在进入雪峰寺的两处隘口驻扎，担负外围警戒与护卫。

“（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正映洁庵禅师。师讳正映，号洁庵。江西抚州金溪县洪氏子。幼不茹荤。先投宁德安仁、三峰寺为沙弥。明洪武十九年，试经得度，谒灵谷谦禅师。方入门，怀中香忽坠地，遂有省。谦命任维那职。谦示寂后，往天界雪轩。典藏会有旨云：泉州开元寺僧临难，选的当家住持乃阄选而出。乃引见，谕曰：着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你，恶则诽谤你。但清心洁已长久。师奉诏来院。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开堂演法，众志翕然。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不数年，百废俱兴。永乐元年朝京回福州（应是到福宁朝拜建文帝。原因是《明实录》《明史》中未记载此事），诸山长老举师主雪峰。重创佛殿、法堂，三门两廊。开万工池，修金鳌桥，焕然一新。洪熙元年，退隐钟山灵谷寺。当山凡一十五载。宣德元年，擢僧录司左讲经，后示寂灵谷。有语录若干卷，名《古镜三昧》”。④

上述这段关于洁庵正映禅师生平的文字记载来自明徐𤊹撰《雪峰山志》。

①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林贻瑞等《福建名胜风光》。
②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林贻瑞等《福建名胜风光》。
③ A 详见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郑氏宗祠大厅佛龛左侧供奉的“普庵禅师”坐像。B 洁庵禅师出身南京皇家寺院——灵谷寺。该寺高僧法号均带“庵”字，如洁庵禅师的师傅为道谦牧庵禅师。允炆普庵禅师的弟子为希贤雪庵禅师。
④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

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研究，其一是明太祖朱元璋在临宗之际把高僧洁庵钦命为福建泉州开元寺住持，是有深深的用意的。其二是文中详细记述了洁庵禅师前半段与后半段的生平，至于中间一段生平事迹，却留下了一段空白。也就是说，永乐二年（1404 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这二十年间，洁庵禅师到哪里去了，在干什么？志书中却不作记述。此举着实令后人不解。

不但徐火勃 的《雪峰山志》是这样记述洁庵禅师生平事迹的，其他两部同时代的志书也即明洁庵禅师撰《钟山志》，明释元贤撰《泉州开元寺志》，也是这样记述的。[①]

为什么不记述洁庵禅师这一段生平事迹?

很显然，根本原因就是这一段时间里，洁庵禅师是与建文帝和郑洽他们在一起。

朝廷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因而就对洁庵禅师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些修饰与掩盖，并严禁洁庵禅师的这一段经历外传。

而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后来的永乐十七年（1419 年）胡濙入闽上山处理洁庵禅师一案善后事宜中，利用给洁庵禅师树碑立传之机，对其生平事迹作了掩人耳目的记述。

这一系列现像，其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必须尘埋掉这一段历史，即不让当代人知道这一切，也不让后代人知道这一切。

早在永乐元年（1403 年）初，洁庵禅师即以“进京朝拜新皇帝”的名义，秘密来到福宁大金（大京）拜见建文帝并转告了当初太祖皇帝安排他到福建的秘密使命。[②]

在大金行宫内，郑洽向洁庵禅师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形势与双方的军力。并向洁庵禅师阐明，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兼之南军缺乏实战经验，有可能再次战

---

① 明·洁庵禅师《钟山志》（原书名《灵谷禅林志》。明·释元贤《开元寺志》（原书名《泉州开元寺志》）。

②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明·释元贤《开元寺志》。

败，一旦战败，皇帝将计划退隐雪峰寺，望大师早作安排与打算。洁庵禅师心领神会，表示回泉州后会尽快安排上雪峰寺，并打点好一切。随后，洁庵禅师即辞去开元寺住持一职，以福州众山长老一致推举名义，出任素有“南方丛林第一”之称的福州闽县雪峰崇圣禅寺住持。①

郑洽之所以要改变太祖朱元璋的应变初衷，主要是基于以下四点考虑；第一，雪峰崇圣禅寺不是临济宗一派寺院，不会引起永乐帝朱棣与追踪者的注意，进入他们的视野。第二，雪峰崇圣禅寺地处偏僻，且位于四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回旋余地大，比隐于沿海繁华港口州郡泉州开元寺保险系数高。第三，雪峰崇圣禅寺规模宏大，僧人众多，仅殿堂楼宇即达千余间，僧众达一千五百多人，便于皇帝隐跸其中，不易为人察觉。第四，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雪峰崇圣禅寺紧邻建文军主力藏身地——霍林洞天的古田、宁德县，随时可以得到增援或可以退往彼地。

这些就是郑洽与洁庵禅师在大金行宫谋定护持建文帝退往闽县雪峰崇圣禅寺的主张之重要依据。

由于郑洽策划的这一举措，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实施与进行的。瞒过了朱棣，瞒过了燕军，同时也瞒过了建文军将领。这旷世奇谋既为尔后建文帝的再次兵败设计好了退路，又为尔后建文帝在人世间的突然蒸发做好了安排。堪称历史之绝唱。

冬十一月。隐跸在雪峰崇圣禅寺的建文帝朱允炆，开始以普庵禅师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而郑洽、何洲、周恕以及众侍卫与其相见，皆以师傅相称，而众人皆自称弟子。

此时，郑洽正式亮出化名郑滃，身份是商人。②

次年春三月。就在燕军把福宁地区与霍林洞天围得跟铁桶一般，企图困死建文军时。而普庵禅师（建文帝）正身披袈裟，端坐雪峰寺旁约里许的枯木庵

---

①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
② 浙江浦江郑义门《希忠录》。

内，吟诵刚刚获得的得意之作；“枯木千年有故庵，美才那复识梗楠。盘时已得归根所，虚处真成入定龛。非色非空沾雨露，不生不灭饱烟岚。由来神物山灵护，岱顶泰松也自惭。”载于明徐𤊹著《雪峰山志》中署名“前人”作的这首古体诗的存世，自然会引发后人的联想。试想，当年隐踀于雪峰寺的建文帝朱允炆，每日在枯木庵内打坐，千年枯木哪识来者竟是九五之尊。诗歌既借景嘲笑了那些费尽心思跑断腿的追捕者，也流露出朱允炆从心底里萌生的意欲放弃与朱棣的争战，遁入空门，还百姓一个安宁祥和的世界的思想。[①]

站在一旁的郑洽、何洲、周恕与洁庵禅师，均觉察到了皇帝的内心世界的变化。

洁庵禅师面露笑容，连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在雪峰崇圣禅寺期间。郑洽、何洲、周恕等每日轮流陪伴已出家为僧的建文帝或参禅打坐，或合掌念经，或登山游览，或吟诗作对。

据后来的明人徐𤊹著《雪峰山志》记载，建文帝与郑洽等人在雪峰寺隐踀期间，写下了不少诗歌，仅存世的以“前人”名义收录在册的即有五十六首。

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农工民主党常委潘亮先生撰写的《试揭福州雪峰寺“前人”题咏之谜》[②]对这些诗歌作了深入研究与探讨：

“建文帝文采出众，‘好文章，喜诗歌’，正映洁庵禅师亦有‘人上人，好诗歌’之偈句存世。《雪峰山志》卷六‘胜迹题咏’篇内收集了自明初以来名人题诗215首，其中56首为佚名诗，只署‘前人’，这‘前人’究竟是谁？为何不署真名？从诗文看，风格相近，多为五言，少数七言，多喻世事沧桑，情调悲凉，具相当造诣，亦显超脱达观，参透世故之慨。”

---

①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
②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集》。

如题无字碑四首：

其一

鸟迹空中见，苔纹石上生。

若教逢巨眼，字字没分明。

其二

字前原有教，碑后已无纹。

欲待何人识，天风吹暮云。

其三

何来一片石，剥落苍烟中。

欲读已无字，野烧吹天风。

其四

语录都成诳，木毯亦是权。

何为此一石，有字不能镌。

题蘸月池一首：

蘸月方池澄如镜，当年元为放生开。

至今绿水依然在，谁见金鳞透网来。

题龙眠坊一首：

冥搜远不厌，到此龙眠坊。

龙去复几时，雾气自生光。

溪阴鸟影遁，日落竹生凉。

遥聆夕罄发，倚杖立苍茫。

如果这署名“前人”的作者就是建文帝，可以想像这位落难逊国的明朝开国皇孙，内心的酸楚与无奈。他在位短短四年就丢了江山，浪迹四方，隐身僻远的雪峰寺，与青灯古佛为伴，放眼四周景物，只能是“厌、凉、苍茫”“龙去复几时，雾气自生光”，尚有对往昔的感慨；而“金鳞透网来”也只能是一种奢望了。而“遥聆夕罄发，倚杖立苍茫”，又怎不引人对这位文采出众的逊

国皇帝心生无限同情。[①]

永乐七年（1409年）春三月的一天，正在禅堂打坐的建文帝，忽然开口对郑洽与洁庵禅师说："朕想派个人去与燕王议和，朕不想与他争这个江山了，让他安心当他的皇帝，还朕一个清静，还百姓一个安宁。"

郑洽应道："议和当然可以，但不宜直接找燕王，应先找世子朱高炽谈。陛下毕竟有恩于他，当年要不是陛下慈悲为怀，放他三兄弟返回北平，他哪还有今日。"

洁庵禅师非常赞成郑洽的主张，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到南京走一趟，先找姚少师（广孝），再找朱监国。

郑洽说："如此甚好，待我修书一封给我侄儿郑棠，他如今是朱高炽的师傅，应该能从旁做些工作。"[②]

三人商议妥当，郑洽即修书一封，交由洁庵禅师带给郑棠。

第二天，洁庵禅师即启程北上了。

五月初，洁庵禅师到达南京。

他按计划先找郑棠、姚广孝。此时的姚广孝仍在深刻反省自己。自从上次建议朱棣撤回燕军主力，兴兵北伐以来，姚广孝一直都在反思自己，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但他先前的这个建议仅仅只能帮助朱允炆与郑洽赢得一点喘气的时间，争取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如何才能保全朱允炆的性命，保全他手下那几万生灵的性命呢？他想到了朱高炽，第一，朱高炽生性仁厚；第二，他与朱允炆从小一起长大，感情甚笃；第三，徐皇后生前对他有过交代，无论如何都要保全朱允炆父子的性命。现在徐皇后走了，能够保全朱允炆父子俩的也只有这位储君了。

姚广孝正在苦于如何找朱高炽谈这件事之时，洁庵禅师突然出现了，而且还带来了建文皇帝愿意与燕王罢兵议和的口信。这岂不是天意。

①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集》。
② 明·郑崇岳（浙江浦江郑义门）《圣恩录》。

聪明绝顶的姚广孝，一看是郑棠陪着洁庵禅师到来，心里立刻就明白了八九分。

他心想，这事就更有把握了。

他还特地告诉两人，说他已说动永乐皇上北行，专心对付北元。留他协助朱高炽监国。他已为议和创造了条件。[①]

于是，三人便联袂来找朱高炽。

洁庵禅师首先向朱高炽转达了太祖高皇帝当年派他到福建泉州开元寺任住持的秘密用意与良苦用心，继而又申述了都是皇家骨肉，不该骨肉相残，应该相亲相爱的道理。

姚广孝接过洁庵禅师的话，继续开导道；"都是皇家骨肉，比不得外人，当年殿下三兄弟被扣留在京师作人质时，不也是建文皇帝念在骨肉之情，力排众议，放殿下兄弟三人返北京嘛。"

郑棠一听，十分激动，立即附议。他感到，这下叔叔郑洽和兄弟郑榛和三郡主有救了。

朱高炽当即表态同意派人去福建与建文帝谈判议和。

四人遂议定；一、派一位信得过的得力官员，持朱高炽的亲笔信去见建文帝。姚广孝建议派自己的徒弟郑和去，朱高炽与郑棠均表赞成。二、为安全起见，决定此事暂时不上奏朱棣。[②]

夏六月。郑和结束第二次下西洋的行程，返回南京。

同月。皇太子、监国朱高炽秘密诏见郑和、姚广孝、郑棠、梁潜（赞善）、周冕（司谏）与周觉成，向他们阐明事由，要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的间隙，专程到雪峰寺拜见建文帝，转交密信。

姚广孝与郑棠又对郑和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

十月底。第三次下西洋的船队到达福建长乐太平港后，郑和即揣着密信，

① 晁中辰《明成祖传》。王熹《建文帝·永乐帝》。
② 明·郑崇岳《圣恩录》。清·查继佐《罪惟录》。

携着由西洋带回来的两座陶塔，与几名亲信太监一道，策马向闽县（今闽侯）雪峰寺驰去。[①]

同月。按照郑棠交代的联系办法，郑和在雪峰半山腰一村落中找到了郑洽，向他转交了郑棠写的密信。

郑洽阅信，感到事关重大，遂将郑和等人安置到客舍休息，自己急忙上山向建文帝报告。

同月。建文帝在雪峰寺知客舍召见了郑和。郑和向建文帝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尔后向建文帝呈上了朱高炽的亲笔信。[②]

望着身披五爪金龙袈裟并已剃度的建文帝，郑和不由悲从心生。

此时的朱允炆非常平静地对郑和说；“你回去对世子说，我已剃度出家了，不会再与他和他父亲争天下了，愿他们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要再追剿建文军了。具体的事情，你可与郑洽商议吧！”

十一月初。郑和回到太平港行辕，将拜见建文帝及与郑洽商谈的详情写成奏折，连同郑洽写给郑棠的信一并交给等候在行辕的周觉成带回南京。自己则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船队便启程下西洋去了。

关于郑和与建文帝曾在雪峰寺秘密见面一事，上文已述及，此处不再说明。

郑和频密地下西洋，实际是在躲避朱棣。

永乐八年（1410 年）春正月，十九日，内官监太监古童、段奇、徐忠奉朱高炽之命，到福州闽县雪峰崇圣禅寺拜见建文帝并转达朱高炽的问候。同时“喜舍大殿五尊佛藏，修崇善事，游览古迹。登像骨峰、龙头、水磨香石诸界，至二日出山。”洁庵禅师勒石以纪。古迹现存。[③]

古童一行，还给建文帝送来了许多宫廷用品，以及补品、药品。同时，也

①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雪峰寺内郑和送至寺庙的陶塔基座。
② 清·查继佐《罪惟录》。清·康熙版《江宁县志》。
③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

给郑洽及众侍卫送来了粮食和补给。他们还以下属之礼参见了旧日的上司何洲、周恕，双方免不了寒暄几句。

古童、段奇、徐忠一行走后，洁庵禅师即动用他们捐赠的白银，对普庵禅师（建文帝）居住的凤凰岗古寺作了修葺，拓展了寺后的石室——栖真洞。同时，还修葺了普庵禅师（建文帝）常去参禅打坐的枯木庵。从而有效地改善了普庵禅师（建文帝）居住与修行的生活环境。

明徐𤊹《雪峰山志》载："唐天祐二年（905年）闽王施钱重建枯木庵。开放生池。""枯木庵距寺数百步，在金鳌桥附近。庵之兴废，不止一次。枯木非楩非栖，高丈许，大可十围，外嵌中枵，皮剥殆尽。义存大师初入山时，宴坐其中。今虽无枝梢，但本根不朽。自唐迄今，历千有余年"。实乃雪峰第一奇观。

春二月。朱棣第一次亲征蒙古，命皇长孙朱瞻基留守北京，户部尚书夏元洁辅之。

春三月。按照郑和与郑洽商定的条款，建文帝将移驾支提华藏寺，朝廷负责为死于壬午之难的千名建文朝臣铸千尊铁佛替身，供于华藏寺宝阁，便于建文帝日日诵经超度。①

冬十月。朱高炽命内官监冯让、赞善梁潜、司谏周冕以"舍财住持洁庵禅师重创佛殿、法堂、山门诸处"名义，专程上雪峰，敬请建文帝移驾支提华藏寺。②

为了封住雪峰崇圣禅寺众僧之口，冯让还给寺里的每位僧人都分发了僧鞋、僧帽、僧服和赏银。一时间，雪峰众僧皆大欢喜，都为普庵禅师（建文帝）给大伙儿带来了好运气而大念"阿弥陀佛。"

在朱高炽的支持下，雪峰寺开始大兴土木。

不到两年时间，一座雄伟的大雄宝殿拔地而起，一座重塑的佛祖释迦牟尼

① 周乡齐《郑和送至支提寺千尊铁佛有玄机》。
②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晁中辰《明成祖传》。

像端坐其中，庄严肃穆。众佛与菩萨分列两厢，尽显佛门的慈悲与宽容。而佛殿之后是新建的法堂。法堂之右为修葺一新的祖师堂。义存祖师坐化于此，闽王王审之命人建难提石塔存其肉身。相传，祖师示寂时，曾留签一谒："石卵爆裂，杉枝拂地，孝竹笋生，吾当再来。"[①]时恰逢难提卵塔石卵爆裂，孝出竹笋，洁庵大师上山入寺，而寺庙大兴。故雪峰僧众都把洁庵禅师视作"再来之真觉，转世之义存。"

与此同时，大雄宝殿左面的斋堂和右面的禅堂也修葺一新。洁庵禅师还拓展了大雄宝殿前面的放生池——万工池。修建了大湖之滨、枯木庵旁的金鳌桥，使寺院南北得以贯通，极大的方便了信众与香客。

随着三门两廊的竣工，雪峰崇圣禅寺面貌焕然一新。

而洁庵禅师也因为重建与拓展寺庙作出重大贡献，被寺庙众僧尊为中兴雪峰的高僧大德。

明永乐十六年（1418 年），洁庵禅师在雪峰寺突然失踪（实是被奉永乐皇帝之命的锦衣卫押至北京软禁）。

雪峰寺高僧释常亮曾留签一谒记述了洁庵正映禅师的传奇经历；"前身后身，哪个是真？柽枝卵石，留签为珍。师乎师乎，来去有因。五百年后，雪峰回春。"[②]

留签一语道破了洁庵禅师的来去之谜。

福建宁德（今蕉城）支提寺——建文帝出亡第八站

夏五月。升任福宁银场督办太监的周觉成奉命护送朱高炽手书"华藏寺"匾额至支提山（支提寺原署名明成祖手书"华藏寺"匾额，经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毛佩琦先生考证，不是朱棣手迹，应为朱高炽手迹）。"支提华严寺"从此改称"支提华藏寺"。周觉成继续留在宁德，一边督造华藏寺

---

①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
②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卷首）。

大雄宝殿与宝阁，一边开始调整支提山周边的军事部署，以迎接建文帝入驻。

“至明永乐五年，钦差中使周觉成建大殿，赐额‘华藏寺’，诏无碍禅师住持。仁孝皇太后重赐铁铸天冠一千尊，建宝阁于殿西以祀之。”[①]

“（明）宣德五年七月，督办银场太监周觉成，至十三都青岩下，令药鱼。拟炼巨石投水中爆裂，俾鱼惊出。是日有道人来告曰：‘一切蠢动，咸有佛性，乞减药’”。不从，道人索食，啖以豆腐饭菜，食讫而去。明日，下药，投石于溪，鱼虾尽死，中有大黄蝎，剖之，腹中有豆腐、菜饭，乃知道士是鱼所化。觉成旋病剧，恍惚见鱼虾无数索命，遂死。”[②]

“天心寺，在三十一都（今柘荣县黄柏乡），明宣德中，太监周觉成梦天落月于身，询僧宝月符其梦，召里人游良懋共新之。良懋建华严阁为藏经所，舍田十亩。”[③]

“周觉成逝世，墓葬寺后山上，遗迹今存。”[④]

上述散记于闽东各地的关联周觉成的零星材料使我们觉得十分诧异，一个堂堂的二品银场督办太监，在福宁（今宁德）生活了大半生，最后终老闽东。为何死后地方上却没有为他树碑立传？而是将其草草埋葬于百里之外的柘荣县黄柏乡天星寺后山？地方上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此必与建文史事有关。

按议定条款，东、南、西、北四向距支提华藏寺五十华里内不得驻扎朝廷军队。建文帝与郑洽、何洲、周恕等可以在此范围内自由活动。

秋八月。滞留在霍林洞天区域内的燕军陆续撤出。

永乐九年（1411 年）春正月。朱棣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原建文朝江防都督，后降燕）继续以剿捕“海寇”名义追剿建文水军残部。[⑤]

永乐十年（1412 年）九月。郑和船队奉命将已铸造完毕的千尊铁佛，送

---

① 清崔嵸《支提寺图志》卷二。
② 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卷十。
③ 民国版《霞浦县志》卷二十四。
④ 1995 年版《柘荣县志》第二十八篇。
⑤ 晁中辰《明成祖传》。王熹《建文帝·永乐帝》。

至福建省宁德市支提华藏寺。对外则宣称自己是奉已故徐皇后遗命而为之。

“菩萨岭，在支提那罗岩之下。成祖文皇帝时，铸天冠千身赐寺中，遣太监郑和航海而至。中流，飓风大作，舟人惧，取其半沉水中。及舟抵寺，而沉水者已先至矣，俱栖梁上。先数夜时，远近村人望见冠盖数百，鳞次登岭，若傀儡然，光彩异常。乃是始悟，故又呼傀儡岭。岭旁有晒衣台，则皆沉水者晒衣其处，迄今寸草不生。”①

谢肇淛是第一个记述郑和曾经到过支提华藏寺的明代史学家，而且是福建省本地人。

其实，在谢肇淛之前，已经有人（明万历年间的支提寺住持）把这事记录下来了，而且还把他刻在一块大木板上；“成祖文皇帝握乾符以升位泽被九流”“仁孝皇太后体坤德以资他恩隆三宝”“圣像铸千尊”“内官郑和送”。此明代木刻今藏支提寺。

所以，郑和二十代孙郑宽涛先生说；“虽然《明史》《明实录》没有记载，但明永乐中，郑和到过宁德支提华藏寺，应该是确切无疑的。”

支提华藏寺原名华严寺，是宋开宝四年（971 年）敕赐的。命名原因是据《华严经》载：“支提山为天冠菩萨道场。”又传，五代天福十二年（947 年），越王钱俶曾铸天冠千身浮海至华严寺供奉。故郑和送千尊铁佛至支提华藏寺不会引起世人质疑，能起掩人耳目之效。这也是建文帝为何要移驾支提华藏寺的缘故，因为千尊铁佛是不能送至雪峰崇圣禅寺供奉的。

是年冬。郑洽、何洲、周恕等十数人伴随建文帝移驾支提山华藏寺，并入住宝阁。原先护卫建文帝的人马则被遣散。

而此时，已运至支提山的千尊铁佛，也已入住宝阁。不过，他们不是安放于佛座之上，而是全部悬挂于阁内的几十根横梁之上。

郑洽心里明白，那是建文帝的意思；这些忠魂不愿顶着永乐的天，不愿立

① 明·谢肇淛《长溪琐语》。

着永乐的地，在改朝换代之前，就让他们永远悬浮于这空空世界之中吧！[1]不过，您翻开他们的背面一看，你会大吃一惊，铁佛背面全系镂空，为的就是便于悬挂。这一“铁佛悬梁”奇观，也算是千古一绝。

这千尊铁佛，几经劫难，至今仍剩九百四十七尊。

永乐五年（1407 年）春三月。继任礼部尚书李至刚力荐郑洽侄儿郑棠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夏五月，朱棣命礼部试参修大典之三千硕儒以文词，郑棠三试皆第一。遂被授予翰林典籍掌文渊阁秘书，旋又擢升翰林检讨，并列经筵选讲，为太子师傅，协助朱高炽监国南京。[2]

秋九月。郑和下西洋还朝。因未踪迹到建文，朱棣心急如焚。一面命郑和再次下西洋，继续寻找建文。一面又派户部给事中胡濙以寻找仙人张三丰的名义到湖南、湖北、江西一带去踪迹建文；派工部侍郎严震直以抚边为名到广西、云南、贵州一带去踪迹建文。

“胡濙，字元洁，武进入。生而白发，弥月乃黑。建文二年举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永乐元年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县邑，隐察建文安在。”[3]

又传，张三丰设了一个局，把追踪建文帝的胡濙诳得团团转，引着胡濙从湖北到湖南，又从湖南到江西，最后把他引到了福建武夷山。

“张三丰，辽东懿川人。名君宝，字玄玄。生有异质，龟形鹤骨，大耳环眼，鬓髯戟张。顶作一髻，手持刀尺。一衣去袖，寒暑御之。不饰边副，人呼张邋遢。日行千里。静则闭目旬日。所啖斗升，辄尽。或辟谷数月，自若也。元末居宝鸡金台，流颂而化。临葬，闻棺中有声，发视之，复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炼，结庵于玉虚宫。庵前有古木五株，三丰栖其下。后入武

---

① 明·谢肇淛《长溪琐语》。周乡齐《郑和送至支提寺千尊铁佛有玄机》。
② 明·郑崇岳《圣恩录》。
③ 清·张廷玉《明史·胡濙传》。

当。时时语人云；兹山以真人应世，异日当大显于天下。人亦不之信。一旦拂衣去。未几，成祖国命胡濙物色之，不见。遂敕武当建宫以待。三丰知之，遂隐见其踪迹。纵游湖海间。尝为正一天师邮书张守常。守常欲得其墨润，阚后山寻其迹。至宝极观遇之。居岁余，知胡濙将至。竟遁去。后无知其所踪。”[①]“张三丰俗称张邋遢，畅游武夷，饮通仙井水。曰不徒茶美，亦此水之力也。”[②]

到达武夷山的胡濙曾在武夷山留下了三首诗作，其一《题画武夷图》：“武夷形胜一蓬莱，山下停舟几往回，未尽平生游览意，云缣写入画图来。”其二《望武夷（因文公精舍在此，不胜感慨）》：“遥望武夷山，缅怀沧州翁。山色自古今，屹立摩晴空。岩岩鲁泰山，神秀将无同。下有九曲溪，脉与朱泗通。源头泉混混，日夜流无穷。欲上千仞岗，一啸豁尘胸。欲寻九曲源，洗耳听清风。翁兮不可作，怀抱徒忡忡”。[③]其三《夜宿天心寺》）：“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④]

随后，张三丰又把胡濙引向了泉州港，始结束了这一行程。[⑤]

随后，永乐帝朱棣又派僧人祖渊雨庵禅师，道士张宇初，到全国各地寺庙、道观寻踪建文。[⑥]

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挖地三尺找建文。”

就在朝廷侦骑四出，或明或暗地大规模踪迹建文下落之时。军师姚广孝却给朱棣来了一个提醒：建文帝的下落、建文军残余势力虽然是一个心腹大患，但它毕竟是内患，是家里事，而北元与安南是外患，外部的敌人更可怕，应该先外后内。何况时下建文军残余势力已掀不起大浪，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已不足为虑，大军应从速撤回南京，先南征，后北伐，此为上策。[⑦]

---

① 明·徐像梅《两浙名贤录》。
②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
③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
④ 明·释元贤《瑞岩实录·诗偈》。
⑤ 明·黄景昉《国史唯疑》。
⑥ 郑自海《试揭建文帝隐藏雪峰寺的神秘面纱》。
⑦ 晁中辰《明成祖传》。王熹《建文帝·永乐帝》。

在军国大事上，朱棣向来对姚广孝是言听计从的。

于是，朱棣便下令撤回围堵霍林洞天建文军的二十万大军。另派遣两支神秘的部队替换燕军主力部队。

这两支神秘的部队就是历朝历代明史专家一直在寻找的《明史》与《明实录》中未予记载的、曾经帮助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各有5万多人的苗裔畲民部队与闽籍疍民部队。

闽籍疍民，历史悠久，在上古时代，就已有他们的踪影。据徐霞客编著《图解山海经》记载：“交胫国也在灭蒙鸟的东面。这个国家（部落）里的人双腿交叉（曲蹄），甚至在走路时也是这样。传说交胫国国民个子不高，四尺左右，身上长有毛，足骨没有骨节，故而双腿能够相互交叉。他们走路时都格外小心，因为一旦摔倒，就只能趴在地上，直到有人搀扶才能站起来。另一种说法认为，交胫国在穿胸国的东面”。

而闽籍疍民，即是交胫国民的后裔。因为在古代，海平面较高，现在的福建沿海多数地方都淹没于海水之中，故有“闽在海中”之说。也正因此，《山海经》原著才把“交胫国”列为“南方的海外国家。”

这两支部队一直驻扎在南京近郊，屯田垦荒，自给自足。已多年未参与战事，以至世人差点都把他们给忘记了。把这两支队伍派到闽地围困盘踞在霍林洞天区域的建文军，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流传在浙南、闽东畲族山村的《畲族祖歌》里的唱词“我们都是广东一路人，我们都是南京一路人”揭示了这一“秘密”。同样，这些地区畲族乡民修的《钟氏家谱》《雷氏家谱》《蓝氏家谱》均印证了这一“秘密”。[①]

朱棣这一举措，正合姚广孝的心思，他当即表示赞成。

其实，姚广孝也是个明白人。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侍候的这位皇上与他老爹朱元璋一样，绝不是什么善类，“他是绝不会容忍一个知道他太多秘

---

① 《畲族祖歌》。

密而且比他更聪明的人一直留在他身边的。所以，当朱棣要予以厚赐时，他什么也不要，房子、美女、金银财宝一概退了回去，目的是更好地隐藏自己。所以，他还是僧人装束，光头上朝，目的也是为了隐藏自己。他只求能平静地生活下去。”①

有两件事情给姚广孝很大刺激，令他开始反思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他一直没有一个好名声。永乐二年（1404 年）八月，他衣锦还乡，回到家乡江苏长洲。令他想不到的是，亲姐姐竟然闭门不见（姐不纳）。无奈之下，他只好去见青年时期的朋友王宾，可是王宾也不愿见他，只是让人带了两句话给他：‘和尚误矣！和尚误矣！’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既深刻表达了朋友王宾对他的情感，又委婉地表达了王宾的政治立场。”②

“姚广孝终于体会到众叛亲离的味道。原先是穷困潦倒，但毕竟还有亲人朋友。现在大权在握，官运亨通，身边的人却纷纷离他而去。……每天都躲在寺庙里过着类似苦行僧的生活，似乎是要反省自己以前的行为。”③

姚广孝在反思着；“在自己的阴谋策划下，无数人死于非命，从方孝孺到黄子澄，……”。④

于是，他决定，从现在起，要救赎朱允炆，要救赎那些从亡大臣以及他们的妻儿老小，能救多少是多少。救赎他们就是救赎自己，救赎自己的灵魂，减轻自己的罪过。⑤

于是，他向朱棣提出撤兵北伐，给被困于霍林洞天内的建文军以休养生息和喘气的机会。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最新的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资料显示；姚广孝祖籍竟然是宁德（今蕉城区）西乡（今洋中）姚溪尾村（有该村《姚氏家谱》

①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②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③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④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⑤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为证）。

之后不久，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调整活动在闽东大地及其周边区域展开了；

总兵刘帮彦率三千铁甲军由江苏丹阳入闽，先驻建阳，后屯驻福宁柘洋（今柘洋）堡；总兵王文彬率五千人马由江西吉安入闽，守闽清渡口；千户孙寿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福宁管阳堡；卫指挥使王知诰领军四千四百人屯驻福宁卫；百户王宁领军一百十二人屯驻福宁大京城堡（归福宁卫辖）；千户王新兴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罗源洪洋大目（今罗源洪洋）；卫指挥使王佛生领军四千四百人屯驻福清镇东卫；千户龚富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长乐梅花千户所（归福清镇东卫辖）；千户王胜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闽清橘林林洋堡；千户王益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政和潆源（今寿宁县清源乡潆头仔）堡；千户谢胜生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兴化万善里锦溪堡（今莆田市辖区）；总旗官邹佛保领军五百人屯驻福宁店下堡（今福鼎市辖区）；卫指挥使张安实领军五千六百人屯驻兴化卫（今莆田市）；卫指挥使刘璋领军五千六百人由江西宜黄调防屯驻古田县新俗里四都宜家洋堡（今屏南县双溪镇宜洋村）……[1]

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十二月。身负隐察建文秘密使命的祖渊雨庵禅师（后来的雪峰寺第七十二代住持）到达雪峰寺。

"祖渊，字天泉，号雨庵，庐陵杨氏子。永乐元年（1403年）具戒于青原山。至南京，谒净戒，多所启发，号'入室弟子'。净戒'对众称之'。他'不以小地自满'。'然臂香，笃志求道，至废寝食五年'，始得微悟。遂'振锡观方，遍礼祖塔，所至丛林畏敬之，声望陡然起同辈间。'二十年（1422年），刺血书《法华经》。宣德改元，住山阐教。寻为僧录司举住雪峰。未几，移居天童寺。宣德九年（1434年）被召入京，为左觉义，兼敕建大功德寺住持，宣宗赐田四百余顷以赡。……奏准给度正额外增加五分之一，'一时受度者如川汇云集。'升右善世。以皇帝所赐建大寺于江宁凤翔山，赐额'普宁禅寺'。

① 林国平、邱季端《福建移民史》。福建通俗文艺研究会《八闽王氏》。闽东孙氏志编委会《闽东孙氏志》。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双城镇《刘氏家谱》。

万善戒贪戒，受命为传戒宗师。他‘忠于事上，勤于接下。一时尊而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正统十四年（1449 年）三月，示寂。”①

令人奇怪的是，如此一位高僧，又是雪峰寺第七十二代住持，而几个版本的《雪峰山志》均未予立传。有学者指出“此必与建文史事有关。”②

永乐十六年（1418 年）春二月。永乐帝朱棣接到祖渊禅师密报，言建文帝曾隐于福建闽县雪峰寺。

于是，赞善梁潜、司谏周冕被以辅导皇太子有阙（实是涉建文行踪案）的罪名处死。③

于是，洁庵禅师被秘密逮捕，并押送至南京，旋又被秘密押送至北京，直至宣德元年才被释放回南京。④

于是，被关了十六年的原建文朝主录僧傅洽被宣布无罪释放。

“（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乃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傅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⑤

因为朱棣与姚广孝都清楚，洁庵禅师的被拘，已经证明傅洽无罪。

祖渊禅师还向明成祖报告了吕太后的踪迹；吕太后逃出南京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已经死在福建宁德西乡（今蕉城石后）一带了。

朱棣听后很高兴，总算放下了一桩心事。

原来，永乐四年（1406 年）秋七月，同样是一把冲天大火，烧毁了明东陵的几间偏殿。被朱棣打发去看守东陵的建文帝母亲吕太后与建文帝大妹妹朱珍娘突然失踪了。

---

① 明·释元贤《补续高僧传》。
② 郑自海《试揭建文帝隐藏雪峰寺的神秘面纱》。
③ 王熹《建文帝·永乐帝》。晁中辰《明成祖传》。
④ 清·甘熙《灵谷禅林志》。
⑤ 清·张廷玉《明史·胡濙传》。

三天以后，就在太仓港的一处码头边上，几位劲装妇女在送一位老年妇女、三位中年妇女、一位中年男子和两个小孩上船。

送行的妇女中，有一位着装华贵、模样俊俏的妇女正频频向船中的人们挥身告别，直到船开远了，才翻身上马，与同伴急驰而去。

由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周围的人们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是干什么的？

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一行人与三天前明东陵起火、前朝建文皇上的母亲吕太后、大公主朱珍娘突然失踪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会明白这些行色匆匆的人们是谁了。

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船上的七个人中竟然有曾经是皇太后的吕氏和曾经是大公主的朱珍娘以及曾经是徐王的建文少弟允火熙 。此刻，他们正带着她们的外孙、儿子，也就是曾经是洪武朝和建文朝的大将军和少将军的耿炳文和耿璿父子俩的唯一血脉的耿世子，在建文帝皇太子妃廖妙玉（廖平女儿，系徐妙锦的武当同门师姐妹）带来的一男一女两名原建文朝大内侍卫的护卫下，逃出了南京城，准备航海南下闽地，寻找建文帝朱允炆。

同样，人们做梦也想不到，救她们出来并将她们护送到太仓港登船南下的，竟然是当今皇上朱棣的结发妻子徐皇后的亲妹妹、洪武朝开国功臣大将军徐达的小女儿也即当今皇姨徐妙锦。

其实，这一切都是徐皇后导演的。徐皇后要妹妹徐妙锦设法找到廖妙玉，将吕太后一行秘密送至东南一隅的福宁地域。

因为吕太后她们乘坐的是沙船，航速较慢，在海上整整走了近一个月，于八月初才到达福宁（今霞浦）三沙港。

上岸后，廖妙玉将她们安置于一渔家落脚，便外出打探消息。

此时，正值建文帝再次兵败，建文军主力已悉数退往霍林洞天藏匿，周边已被燕军全面封锁。进入宁德、古田的道路也已被禁止通行。

在无奈之下，吕太后一行只得在福宁县城城郊租了一处房屋，暂住下来，

再作计较。

陪伴吕太后和朱珍娘的廖妙玉及两名侍卫很不简单，他（她）们均系武当高手，相传他们的武艺还得到过张三丰的指点。尤其是廖妙玉武功更是了得。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医术精湛。她以行医为名，掩护行踪。由于他（她）们行医不计报酬，在福宁县境内留下了极佳的口碑。

永乐八年（1410 年）十月，燕军撤销了对霍林洞天的军事封锁，一直滞留在福宁地区的吕太后一行，才得以借道三都澳，进入宁德（今蕉城）西乡（今洋中、石后、虎贝一带）。行至二十三都芹坂头村（今蕉城区石后乡芹坂头村），吕太后一病不起，崩于该村。为避燕军耳目，随从众人遂将其葬于该村廊桥桥头对面山岗下的乡历壇内。

那名男侍卫护卫着大公主朱珍娘和徐王允火熙 深入西乡继续寻找建文帝与郑洽，而廖妙玉与那名女侍卫则留在芹坂头村，在廊桥桥头开了一家中草药店，继续为吕太后守陵。

相传，她们在宁德（今蕉城）西乡芹坂头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宁德（今蕉城）当地人称她为“南京婆”。又因她一直在寒桥头开药店，悬壶济世，乡民又称她为“桥头婆”。乡民感念她造福乡梓，遂在西乡与四都、五都、六都一带建了多处“南京大王庙”祭祀她，香火至今不断。[①]

又传，“南京婆”曾经收了一名女徒弟，名叫爱俤，擅长骨科与治疗创伤，在宁德（今蕉城）西乡与古田东部（今大桥、杉洋、大甲）一带颇有名气。此人后隐于古田县大甲乡昆楼（今昆源）村。该村离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仅五里。[②]

而流落宁德（今蕉城）西乡的朱珍娘母子俩和徐王允火熙 ，在那名男侍卫的伴随下，几经辗转，最后终于找到了侄儿朱文奎（皇太子）和余六府、余七府他们。

---

①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集》。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南京大王庙”。

②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集》。

朱珍娘母子俩和徐王允火熙 后落籍宁德西乡留田村（今蕉城区洋中镇留田村）。耿世子改名换姓为黄继祖。①

永乐十年（1412 年）冬，建文帝与郑洽移驾支提华藏寺后不久，朱允炆获悉母亲吕太后为了寻找自己，历尽艰辛，长途跋涉，颠沛流离，最后仙逝宁德（今蕉城）西乡芹坂头村时，伤心得放声大哭。于是，命郑洽斥资在该村廊桥头乡历壇前建一座拜亭，以祀其母。

聪明的郑洽为了迷惑朝廷与官府，遂在铁沙溪（今蕉城区金函畲族乡濂坑村境内）码头至西乡洋中的一路上的各个乡历壇前均建了一模一样的六座拜亭，对外声称是为了祭祀洪武帝朱元璋的母亲。

而六座拜亭中，唯独芹坂头村廊桥头这座拜亭六百年来香火不断，其原因，相传，一是因为建文帝朱允炆曾赐额“寒桥”（未书落款、帝号与纪年）巨匾一块，挂在廊桥入口上方；二是郑洽临死之前，曾亲书一副对联“大明君钦赐凉亭，寒桥头犹存古迹”，要儿子郑钱（郑栈）将对联贴在拜亭大门两边的柱子上。②

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座乡历壇叫作“太后墓”，把这座拜亭叫作“国母亭”了。

而隐居于宁德（今蕉城）西乡三十六村的建文朝从亡大臣的后裔们，也就久而久之地、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风俗，年年春秋两季联袂祭拜“国母亭”，年年更换亭前那副郑堂（郑洽）亲笔手书的对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福建宁德（今蕉城）金贝寺——建文帝出亡第九站

闻知梁潜、周冕二人被处死，洁庵禅师被捕，少师姚广孝辞世，太子朱高炽十分惊慌，急诏郑棠、郑堪商议对策。③

---

①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留田村《黄氏家谱》。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田地村观音堂须弥座石刻。
② 宁德市建文帝研究系列丛书之七《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续集》。
③ 明·郑崇岳《圣恩录》。王真《建文帝·永乐帝》。晁中辰《明成祖传》。

于是，一封八百里加急的太子手谕由东宫侍卫统领郝峰快马加鞭地送到了坐镇福建省宁德县（今蕉城区）支提华藏寺的周觉成手上。

于是，是年福建省先后有十多名五品以上官员被处死。福州府与福宁县、古田县、福安县亦有一批官员被处死。宁德县（今蕉城区）前后三任知县亦皆被处死（对这三任知县，邑志只留其姓，不书其名）。[1]

与此同时，支提寺周边的各处驿站官员与邮差亦悉数被处死。[2]

突如其来的福建官场的大地震，预示着某种不祥之兆。

果然，建文帝被秘密转移至支提华藏寺的下院金鄁禅寺，并被安置于五云崖下的五云精舍之内。

果然，郑洽全家被监视着转移到金鄁山脚下的濂坑村（今蕉城区金涵畲族乡濂坑村）隐居。

此时，郑洽已更名为郑三合，其子也已更名为郑楠。

永乐十七年（1419 年），朱棣着胡濙再度出巡，目标直指闽粤。不过，这次出巡，朱棣给胡濙增加了一项任务；“密察皇太子德行。”[3] 说白了，就是密查太子有无参与包庇和窝藏朱允炆事。

这年冬天，胡濙来到了雪峰寺。

在雪峰寺，胡濙终于有了收获。

虽然雪峰寺的僧人守口如瓶，但胡濙还是从小沙弥口中问出了一些情况。小沙弥告诉胡濙，多年前，寺里来了一位普庵禅师，还来了许多人。这位普庵禅师很受住持洁庵师傅崇敬，但很少与外人接触。后来，不知到哪里去了。

胡濙心里十分明白，这个普庵禅师一定就是建文帝朱允炆。

胡濙不禁佩服起建文帝身边的谋士郑洽来了。

因为胡濙作梦也没有想到，建文帝一行会隐踪在法眼宗与云门宗的祖庭雪

① 明·谈迁《国榷》。清乾隆版《宁德县志》。
②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七《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续集》。
③ 王熹《建文帝·永乐帝》。

峰崇圣禅寺内，而不是藏身于溥洽门下的临济宗的寺庙中。

而先前自己和严震直一直在临济宗的寺庙与道教的宫观里挖地三尺地寻找建文帝，难怪总是找不到。

胡濙从雪峰寺还了解到；郑和曾经到过雪峰寺，还送来了两座陶塔；内官监太监古童、段奇、徐忠等人继郑和之后，也相继来到了雪峰寺，给雪峰寺捐了许多白银；紧随他们之后来到雪峰寺的还有内官监太监冯让、赞善梁潜、司谏周冕等人。

想到这些人都是太子朱高炽和少师姚广孝身边的人，胡濙似乎明白了。

但同时胡濙也放心了，困扰了自己十多年的梦萦终于可以释怀了。

是啊，都是前朝旧臣，何必把事情做绝了。

“濙又在湖湘（实是福建，《明实录》用了障眼法），数遇建文不窘之，使得逸去。”[①]

于是，胡濙想到了要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给永乐帝朱棣发去一份奏报，说明雪峰寺窝藏建文帝一案与太子、姚少师、郑和、郑棠、周觉成等人无关。自己要留在雪峰寺，处理善后事宜。

第二件事，要给洁庵禅师立一块碑，这碑文还要自己亲书，而且要写明真实的时间，写明是奉旨行事，让后来的明白人知道个中的缘由。[②]

第三件事，办完这些事情后，立即动身到宁德县（今蕉城区）去找周觉成，争取与建文皇上与郑洽见上一面，以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以免被世人误解，被后人唾骂。

由于胡濙的有意袒护，太子朱高炽与郑棠、郑堪、郑和、周觉成等均安然无事。

关于胡濙有意替太子朱高炽开脱一事，晁中晨先生在《明成祖传》中有过一段精彩的记述；“当时臣下都处在明成祖的严密监视之下，甚至皇太子也不

① 明·黄景昉《国史惟疑》。
②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

能幸免。胡濙在国内踪迹建文帝，永乐十六年，他还奉明成祖之命，名为出巡江、浙（实是闽中），暗中到南京侦察太子的行为（实是了解朱高炽有无包庇朱允炆、窝藏朱允炆事）。他在南京故意多住了些日子，连内阁学士杨仕奇也感到奇怪，催他上道，胡濙便以'冬衣未完'来掩饰。他到安庆后，将所见所闻秘密地写成报告（初始报告），为皇太子说了些好话，这才解除了明成祖的疑虑。"①

也正是由于胡濙的刻意隐瞒，建文帝与郑洽始能在金鄁寺与郑岐村安度晚年。

三个月后，一块颂扬洁庵禅师中兴雪峰崇圣禅寺之丰功伟绩的木质碑刻（后改石质碑刻）在雪峰寺功德堂内悄然而立。②

胡濙的留书，既是对洁庵禅师的传人、继任者远芷禅师的安慰、开导，又是对他的告诫与警示。

永乐十八年（1420 年）春正月。建文帝仍以沧海禅师与金太监的身份面对世人。此时，陪伴在建文帝身边的仅何洲、周恕二人。郑洽与建文帝的联系受到了诸多限制。建文帝可以下山见郑洽，郑洽却不可以上山拜见建文帝。

春三月。因郑三合（郑洽）、郑楠（郑栈）父子俩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很讨村里人喜欢。王姓长者把自己在东井坂的旧宅送给郑洽居住，陈姓长者则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三合儿子郑楠为妻。娶亲那天，南山上金鄁寺高僧沧海禅师（建文帝）也来喝喜酒。郑三合管那高僧叫"师傅"，自称"弟子"。

也就在这时，郑洽给义门家长发出了最后一封家信，告诉他们自己已来到"蛮烟疍雨"处定居。③

同月。为纪念蒙难的方孝孺，沧海禅师（建文帝）挥毫写下了"蒙泉"二字，并命何洲、周恕请石匠将其刻在寺内井壁之上。留书不署帝号、纪年，只

①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晁中辰《明成祖传》。
② 明·徐火勃《雪峰山志》。
③ 浙江浦江郑义门《希忠录》。

书“住山仓海作”五字。古迹今存。

夏五月。山东蒲台唐赛儿反。唐赛儿不获，命逮天下出家尼姑万人。[①]隐于福宁（今宁德）各地尼姑庵的近千名尼姑（多系建文朝宫女与官员眷属）亦被逮。上百处尼庵被毁。

夏六月。沧海禅师（建文帝）听闻郑三合（郑洽）喜添孙子，特下山到郑宅祝贺。郑三合（郑洽）与王姓长者王进领着他观赏了濂坑八景。当他来到八景之一的“灵谷甘泉”时，异常兴奋。他察看了一番地理格局与龙脉走向后，建议三合在自家屋边迁建一井，并赐名“甘濂井”。后村里人为了纪念郑三合，又把该水井唤作“安郑井”（意即郑洽是被朝廷安置居住也即监视居住的人）。[②]

郑三合（郑洽）与王进邀沧海禅师（建文帝）到郑宅后花园小阁楼小坐，师傅欣然应允。望着窗外赤赤鉴湖边的湖光山色，沧海禅师（建文帝）不由诗兴大发，随拈一首；“乘兴登临小阁楼，湖光山色望中收。骝山日暖万松媚，鉴水风轻百艇摇。鸥鹭争飞云中闹，炊烟无力屋上游。好山好水难品足，赤鉴风光第一流。”[③]

郑、王二人皆拍手叫好。郑三合（郑洽）高兴地对王进说：“此乃师傅平生第一快诗也！”

而郑三合（郑洽）故居后花园也因此诗出了名。这一地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相传，沧海禅师（建文帝）在金鄫禅寺期间，很想吃海鲜，但是，海鲜送到上金贝后，多数不能存活。于是，郑三合（郑洽）就请教好友王进，如何才能让师傅吃上鲜活的鱼、虾。王进说，这好办，可以在精舍前挖筑一三合土的水池（该水池今存），再雇人挑一些海泥上去，在池里放养一些石斑鱼、跳鱼（弹涂鱼）和海虾，就可以了。郑洽按此办法雇人去做，果然一年四季都能保证师傅吃上鲜鱼、鲜虾。[④]

---

① 王熹《建文帝·永乐帝》。
②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七《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续集》。
③ 王中兰《濂坑秘传“金贝上人”（即建文帝）诗选》。
④ 王中兰《荤厨柜与素厨柜的故事》。

秋七月。生活在濂坑村的郑三合父子俩，有时也跟随村里人下滩涂捕捉虾、蟹、蛏、蛤与弹条（即弹涂鱼）。他发现村民们的脚经常被锋利的海蛎壳划破。于是，他便根据北方的雪橇制作原理，设计制作出一种可供滩涂作业使用的工具——土橇。这土橇几经改进，很快在周边渔村推广开了。村民们把它叫作“三合溜”或“溜板”。[①]

后来，戚继光的队伍开到宁德（今蕉城区）来打倭寇，他们发现这土橇是个很好的滩涂载具。于是，便成立了一队拥有两千名将士的土橇兵。这队土橇兵借夜色的掩护，犹如神兵天降般地突然出现在横屿岛上，全歼了岛上的倭寇。

秋八月。周觉成深为郑洽的忠义诚信和聪明睿智所折服，从心底里解除了对他的监禁。

同月。胡濙到达宁德（今蕉城）。对找上门来的胡濙，周觉成一五一十地向胡濙和盘托出这不是秘密的秘密，并推心置腹地与胡濙做了一次长谈。

胡濙认同了周觉成的看法。他心想；姚广孝、洁庵禅师、郑和、郑洽、郑棠、周觉成、郑堪、梁潜、周冕诸君都是智者，他们背后的徐皇后、朱高炽也是个智者，我胡濙为何不做个智者。是的，应该做个智者。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后世人唾骂。

同月。在周觉成的建议下，胡濙来到了濂坑东井坂地方，见到久闻的郑三合（郑洽）。

二人亦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胡濙也深深被郑洽的忠贞与智慧所折服。

冬十月。胡、周二人破例让郑洽上山看望了病中的建文帝。

同月。望着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的建文帝，郑洽心如刀割。君臣二人相对无言，只是默默地流泪。

从建文帝微弱的脉像，郑洽敏锐地感觉到，陛下是慢性中毒。但他不敢明言，也无须明言。因为他深知，朱高炽、胡濙、周觉成他们都是一种无奈之举，

---

① 王和铝《郑三合与土橇》（原文载20世纪80年代“宁德县文史资料”）。

因为朱棣在临死之前是不会让皇上活着的。他不由在心里感叹道；朝廷（指朱棣）终究还是不放过他（指建文帝）。

这是郑洽最后一次见到建文帝。

在下山的路上，胡濙苦笑着对周、郑二人说，我也不能回朝了，只能在宁德陪着二位了。

三人相视一笑，相揖作别。

永乐二十年（1422 年）春三月。朱棣亲征蒙古。

夏五月。余六府、余七府、胡卓汉、詹斗二（化名，真名不详）、杜华泗、李二拥载太子朱文奎举事失败。后人在他们举事的尼姑庵草坪处建了村落，并把该村命名为"小登广村"（即小登基广场村），村名沿袭至今。[①]余六府被叛将杀害，胡卓汉不知所终。仅剩杜华泗、余七府、詹斗二、李二隐于霍林洞天深处护卫着皇太子、三皇子。

世传，皇太子、三皇子的后裔，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方才离开福宁前往浙江、广东。后来，朱文奎的后裔就以"万"字为姓（"万"字意味着他们是"万岁"的后代），朱文垚的后裔就以"黄"字为姓（"黄"字谐音为"皇"字，也即意味着他们是"皇帝"的后代）。朱文奎后裔定居于浙江省千岛湖农林村。朱文垚的后裔定居于广东省某地。[②]

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春二月。沧海禅师（建文帝）病重。

夏六月一个雷鸣电闪的日子里。沧海禅师（建文帝）在金鄫寺圆寂。

几年后，一个从亡大臣悄悄在金鄫寺后山的八仙顶上题刻了一首《皇帝印》诗；"仿佛奉高仪，情凝碧落晖。千年露滴泪，百战苦征衣。饮恨归泉下，无缘梦帝基。仙人留迹处，万古待君归。"[③]

另一个从亡大臣则在金鄫寺大雄宝殿墙壁上题写了一首《金鄫十奇》诗：

①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五《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集》。
② 浙江省千岛湖农林村《朱氏家谱》。
③ 明嘉靖版《宁德县志》。明万历版《宁德县志》。清乾隆版《宁德县志》。

“长老岩高晓独跻，地因金涌见招提。潜鳞沼泮瑞云霭，碧水帘前石马嘶。灵响音消怀旧恨，盘跎藓剥见新题。蒙泉更可供清赏，遥看山屏日未西。”①

前诗署名“兰奉高”作，后诗署名“僧元定”作。两诗署名，异曲同工。诗歌作者的意思十分明显，在寺里出家的那个僧人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传人，我们写诗是为了怀念他，以申明正义。

诗歌借景抒情，表达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对沧海禅师（建文帝）的深切哀悼。同时也告慰了那一位静静地躺在金贝山谷封土堆下人工铺就的一块“又大又圆又扁”的巨石底下的明朝第二帝。

尾声

就在建文帝去世的第二天，金鄁寺周边突然来了大批官兵，寺庙周边道路被禁止通行（随后又被挖成了断头路）。

同月。周觉成夜访郑三合（郑洽），向他转达了胡濙要他改名换姓，举家避祸的意见。

第二天，郑三合（郑洽）告别了好友王进与陈姓亲家，搬到了邻近的井上村。②

三个月后，又奉命搬到了单门独户的崎坂村（今郑崎村）原南京留守卫都指挥使司衙门旧宅隐居。郑洽又一次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郑崎，把儿子的名字改成郑钱，把孙子的名字改成郑镠。并要儿子认先居住于此的那家郑姓宗亲为兄长。③

秋七月。郑崎（郑洽）告诉家人，皇帝（沧海禅师）已经圆寂了。朝廷已

① 王凌《金鄁古寺·畲家新寨》。
②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七《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续集》。
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郑氏家谱》。

经给他建了一座衣冠冢，其真身埋在一块又大又圆又扁的大石头底下。[①]

同月。胡濙日夜兼程，驰京奏报。此时朱棣正率军亲征阿鲁台，行至宣府。胡濙又赶至宣府谒见，到达时已是深夜。这时朱棣已睡下，听说胡濙赶来，急忙起身召见。"濙悉已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至是疑始释。"[②]

两个月后，朱棣北征回师，"诏谕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死义者家属，发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③]

得到消息的胡濙，急忙前往晋见太子朱高炽，向其禀报了郑洽隐于闽东海边渔村的详情。朱高炽听后，十分高兴。站在一旁的郑棠，急忙连连向胡濙致谢。胡濙向朱高炽建议，对郑洽应作出一个妥善安排，是否以福建布政司致仕官员的名义，就地居住，以免当地官员骚扰他。朱高炽当即同意，并决定把这一差事交给周觉成去办理。[④]

于是，又一封八百里加急手谕送到了福建银场督办衙门周觉成的手上。

于是，郑岐村的原南京留守卫都指挥使司衙门摇身一变又成了致仕的"布政司理问"府邸。

于是，郑崎（郑洽）又摇身一变，成了福建布政司致仕官员郑堂。

郑岐村郑堂（郑洽）故居，是五幢连体房，与当地的闽派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而是清一色的徽派建筑风格。青砖黛瓦，飞檐斗拱，白灰勾缝，官帽迎门。走进古宅，几乎每根柱子上都镌刻着源自浙江浦江郑义门的家规家训，"无益人言休着口，不干己事莫当头""爱到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

进入第二进绣楼大门口两边，是取自明代的官帽造型的两口奇特的"官帽井"。显然，其构思来自郑义门郑氏宗祠内的三口"品字型"的水池，建筑设计风格特征与郑义门一脉相承。

①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周宁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分卷》。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之七《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续集》。

② 清·张廷玉《明史·胡濙传》。

③ 清·张廷玉《明史·胡濙传》。

④ 明·郑崇岳《圣恩录》。

尤其是那镶嵌在几十座大门、小门上方的大大小小的匾额，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眼球。专家们对其中的三个大门上的三副由郑堂（郑洽）亲笔手书的“视履考祥”“离明继照”“豹蔚南山”匾额的解读是；它们全部源自《易经》中的字句，稍加改编，制成匾额。其一，大门口门楣上的匾额“视履考祥”。原文为“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刘建生著《周易精解》释为“回顾自己谨慎走过的道路，认真体会吉凶的预兆”。用在此时此地的寓意是；“沿着（皇上）制定的伐燕道路走下去，一定会出现灭燕复明的吉兆”。其二，刻于闺阁内向门楣上的“离明继照”匾额。其中，“明”字中的“日”字被换成“目”字，寓意是“偷天换日”，与“红崖天书”中的“大明日月无光”相呼应。原文“离为火……南方之卦也。”凤为离为火，在南方；燕为坎为水，在北方。人间正道是；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以南伐北，必能取胜，拯救大明。用在此时此地的寓意是；“灭燕复明，恢复被篡夺的大明，使天上重现昔日大明”“朱红”的太阳之景像一定会实现。这与“红崖天书”中的“凤鸣岐山”意境是相通的。其三，刻于第一进驿站式的会客厅后大门门楣（即第二进大门门楣）上的“豹蔚南山”匾额。原文为“四十九·革卦”。卦辞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豹蔚南山”也有作“豹隐南山”的。古人常用“南山玄豹”的典故来比喻隐居之人或事。唐骆宾王《秋日别候四》诗句“我留安豹隐，君去学鹏抟”即是此意。[①]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认为其还有谐音为“保卫南山”之义，是该句的引申义。而该句用在此时此地的寓意是；“隐在此处是为了图谋将来的灭燕复明。”

郑堂（郑洽）在福宁（今宁德）乡间留下了不少墨宝。据说，福鼎市管阳镇金钗溪村的廊桥上方悬挂的“通济桥”匾额即是郑堂（郑洽）题写的。还有柘荣县楮坪乡仙岭村郑氏宗祠内的“庆远堂”匾额也是郑堂（郑洽）题写的。[②]该匾额落款“雪樵”。而郑洽在郑义门时的字号正是“雪樵山人”。

① 林国恩《续破“天书”觅“建文”》。
② 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楮坪乡仙岭村《郑氏家谱》。

曾经有书法家把“庆远堂”三字拿去与郑岐村的“离明继照”四字作比较，认为同出一人手笔。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秋七月。永乐帝朱棣病逝于榆木川行军途中。

秋九月。郑崎（郑洽）卧病不起。

冬十月。郑崎（郑洽）感到自己大限已到，遂急召儿子与孙子到床前，将早已写好的十条遗嘱交给儿子郑钱（郑栈），嘱咐后代一定要遵照遗嘱去做。[①]

十条遗嘱是；

（一）自己死后要葬在上金鄁南山山脚下。

（二）要用自己的名字郑崎作村名。

（三）后人修的家谱要取名为《白麟谱》。

（四）后代建房一律面朝上金贝南山。

（五）后代建祠堂要在门前种下五棵柏树。

（六）要在祠堂大厅右边神龛内供奉普庵禅师。

（七）郑崎郑氏后人不必去考取功名。

（八）要把“九世同居”作为行酒令代代相传。

（九）要把义门《郑氏规范》刻写在新居柱子上。

（十）每年阴历正月初一开门应高声朗诵一首诗歌“新正火炮入华堂，子孝孙贤庆新春，九世同居郑忠义，子孙九代家不分。”

因为郑洽深知，燕王朱棣明白自己的皇位来得不正，所以他和他的继承人绝对不会让建文帝朱允炆尚在人世间的信息，以及他曾经在闽地活动过的踪迹存世；同时也不会让自己这帮从亡大臣在闽地活动过的踪迹存世。他和他的继承人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让当世人忘却这件事，忘却这些人；让后世人无从查考这件事，无法知晓这些人。

因为郑洽还深知，任何有文字记载的东西，留下来都是个祸害，会给子孙

①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郑氏家谱》。

后代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要想将真实的历史留住，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些无文字的表述——特殊的遗嘱的方式，把无声的历史留住。用口碑的方式，把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传承下去。

因为郑洽深信，若干年后，总会有一些聪明人能读懂他的遗嘱，读懂这部“无字天书”，寻找到他与建文帝的踪迹，补叙上这一段被尘埋的历史。

郑洽还坚信，那些隐于霍林洞天及其周边地区的从亡大臣和他们的后人，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把这一段历史留住，并公之于众。

他还告诉儿子与孙子；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名字改成“郑钱”与“郑镠”；因为在唐昭宗的时候，我们浙江省出了一个忠臣名叫钱镠，是镇海镇将领董昌的裨将。董昌反，钱镠将他擒获，送交唐昭宗治罪。后被封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唐昭宗特赐“金书铁券”（即丹书铁券）予他，若其后人犯罪，凭此“金书铁券”可免死。钱镠后拥兵两浙，统十一州。唐昭宗天复二年（902 年），封越王。唐哀帝天祐元年（904 年），封吴王。后梁太祖天平元年（907 年），封吴越王。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钱镠后人钱由因父亲犯罪将问斩，他便持此祖传的“金书铁券”面见太祖，太祖仔细观看了他呈献的“金书铁券”，遂赦了他父亲的死罪。我朝元功宿将持有的“丹书铁券”免死牌一制即由此而来。我将你们父子俩取名为“郑钱”“郑镠”，就是希望你们世世代代要忠于太祖，忠于建文皇上，忠于大明朝廷，永远做忠臣。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在宁德县安东乡陵山里四都一图（今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的南山之麓，出现了一座十分奇特而神秘的古墓葬，墓葬的舍利塔碑刻上书写着一行小字“御赐金襴福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个朝代修的墓？是哪一位和尚的墓？因为墓碑上没有墓主的姓名、没有落款、没有帝号、没有纪年。再加上金贝寺被朝廷与官府军事封锁达二十年之久，直至明正统十一年（1446 年）才予以开放，准许香客信众上山烧香拜佛。由于时过境迁，许多知情人已经作古，久而久之，这

座陵墓也就渐渐地被湮没了。除了郑崎（郑洽）和他的儿子郑钱（郑栈）及孙子郑镠以外，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这座陵墓的来历了。

事隔不久，在这座陵墓下方约三百丈处，又添了两座新坟，令人奇怪的是，这两座墓葬竟然与那座神秘的墓葬一样，均未署墓主姓名，亦没有落款、没有帝号、没有纪年。乡里人代代相传，上面那一座是一个宰相的墓，下面那一座是一个府同知的墓。近前一看，上面一座墓葬墓碑上果然刻着“宰辅龙井”四字，下面一座墓葬墓碑上亦刻着“同知龙井”四字。乡里的老人告诉后生，明朝的时候，来祭祀上一座墓的，都是姓郑的人；来祭祀下一座墓的，都是姓陈的人。

已故蕉城区七都镇六都村文史爱好者周乡齐先生，生前曾经用了三年时间，专门对这两座墓葬作了考证。撰写了《宁德两位“非常”人物》一文，文中引用清代主修《福宁府志》的张君宾先生对宁德籍河南郑州府同知陈添（宁德蕉城金涵琼堂人）“死于建文之难”一事的考证资料和清乾隆版《福宁府志》与《宁德县志》中的相关记述，证明上文提到的下一座墓葬墓主应是那个“弃官为建文帝殉节而死”的河南郑州府同知陈添之陵。也即今天金涵畲族乡琼堂村及其周边陈姓人的先人。周先生认为，居于陈陵上方的那座墓，应该就是宁德（今蕉城）人世代相传的与上金贝南山上的“困龙墓”相对应的“困相墓”，也就是建文帝的宰相兼军师郑洽（郑三合、郑崎、郑堂）之墓。

对于周先生的上述结论，郑岐村郑洽后裔普遍认同，因为族中老人在儿时确实跟随大人去那儿祭扫过该墓。

卷八　专论类

插图 1：明初高僧正映洁庵禅师驻锡过的三大寺庙

——江苏南京灵谷寺、福建泉州开元寺、福建闽侯雪峰寺



明初灵谷寺全景图



灵谷寺山门



开元寺全景图



雪峰寺全景图



雪峰寺遗存的明代别院门楼
——相传为建文帝在雪峰寺时的藏身所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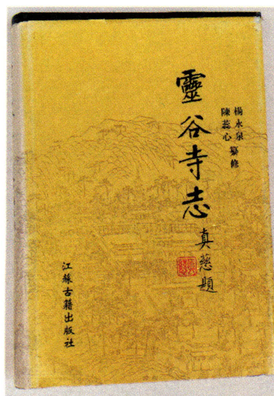
万工池边的枯木庵
——相传为建文帝在雪峰寺时的藏身所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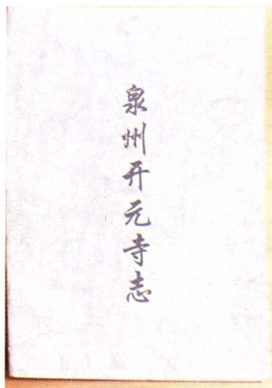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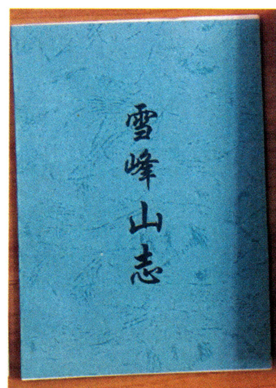
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洁庵禅师



雪峰寺历代住持神祇牌，洁庵禅师的牌位亦在其中。







《灵谷寺志》、《开元寺志》、《雪峰山志》

插图 2：明永乐年间建文帝朱允炆出家后驻锡过的三大寺庙

——福建闽侯雪峰寺、福建宁德支提寺、福建宁德金贝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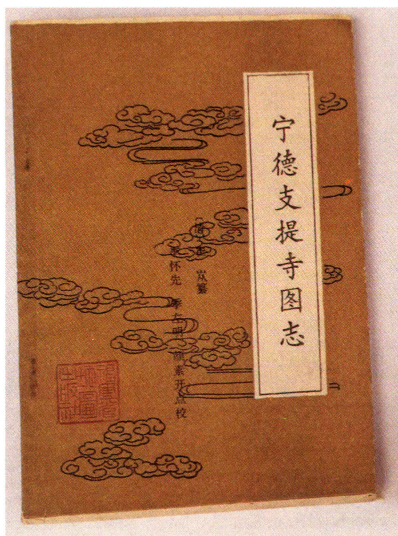
支提寺全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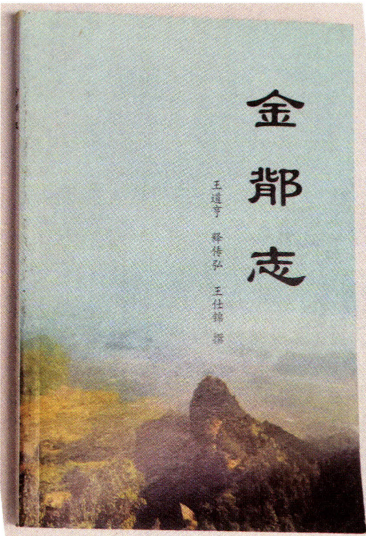
明代支提寺山门



金贝寺全景图



《支提寺图志》



《金鄫志》

宁德市明史馆全景图



宁德市明史馆全景图

插图 3：建文帝踪迹研究专论集萃



插图 4：建文帝朱允炆当年读书生活过的地方

——南京明故宫一角?（资料来源：马渭源《大明帝国——建文帝卷》）



插图 5：实物博物馆——明代南京城中华门城堡全景图

（资料来源；周钰雯 ·《南京明文化经典之旅》）



插图 6：贵州红崖天书

（资料来源；马渭源《大明帝国——建文帝卷》）



插图 7：郑和宝船

（资料来源；周钰雯《南京明文化经典之旅》）



开展建文帝研究的文化意义

陈支平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掀起了研究明代建文帝的热潮，福建省宁德市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建文帝研究中心之一。不少学者认为，现今各地兴起的建文帝研究，大多缺乏过硬的文献记录和史料传续，所谓的建文帝隐居地及其遗迹，处于疑似之间，因此没有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实事求是地说，这部分学者的观点，从纯粹的历史学学术意义上讲，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并且跨越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学术原则来审视这一问题，那么近年来所兴起的建文帝研究的热潮，其所存在的文化意义，则又是我们所不可忽视的。

（一）不同历史时空的道德价值观变迁

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除了在于对以往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求真求实之外，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历史学家对于以往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客观评价。然而要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进行客观评价，这就需要秉持一定的道德价值观作为尺度，从而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做出符合时代道德价值观标准的评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所谓的“道德价值观”标准尺度呢？毫无疑问，所谓的“道德价值观”是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迁的。从夏、商、周三代以迄明清近代时期，我们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以来，随着商业化社会的加剧和国际化的推进，有些所谓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来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其中关于武大郎、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情节，是大家所熟知的。数百年来，人们一直以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淫乱为不齿，同时也为武松杀死潘金莲、西门庆而为兄长报仇的悲愤行为叫好。数百年来人们对于潘金莲、西门庆的不齿和对武大郎、武松的同情，毫无疑问

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女子“三从四德”的道德价值观的评判标准而得出的社会基本共识。然而到了现代，这种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已经不被一部分人所接受，于是大概二十年前吧，有地方戏剧对《水浒传》中潘金莲、西门庆的评价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认为潘金莲嫁给武大郎，是封建社会强加给潘金莲的非人性婚姻，是对潘金莲人性的摧残，而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勾搭成奸”，正是他们追求自由恋爱的结晶，是爱情的真正体现。武松残忍地杀害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反映了武松作为一位封建卫道士的残暴行径。

同样的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情节，在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和现当代人性爱情价值观的各自评判之下，居然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差。这让我们很难分清究竟谁错谁对，因为各个不同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是无法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时空的推移而不断变迁之中。

或许可以说，《水浒传》中潘金莲和西门庆的评判标准变迁，这只是小说家言的游戏之作。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社会大转型和文化大变迁，势必对于历史学的研究，产生某种程度的冲击作用。例如，在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讲授历史课程的老师，给我们讲授了许多诸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历史故事，使我们从小就培养了敬畏和向往这些民族英雄的文化心理。但是近年来，由于强调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评判标准，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既然中国历史上的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都是中华兄弟民族的一分子，那么这些兄弟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只能算是“兄弟不和”“家内斗”。而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他们所面对的“敌人”，都是兄弟民族，因而他们也都不能算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顶多只能算是宋朝和明朝的没落朝廷的“英雄”。

如此一来，在新的道德价值观的评判之下，中国历史上所能称得起为“民族英雄”的人物就只剩得寥寥无几了。前些年，记得有历史学者撰写出版了明清之际历史人物《洪承畴传》，这是一部从现代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视野来重新评判洪承畴这一历史人物的学术著作，全书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观点，特

别是对于洪承畴促成清王朝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而这一新的评判观点的提出，显然是与现当代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道德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其实，关于洪承畴的历史评价，自明清以来就有多次的反复。洪承畴走过了两个朝代，历经过七位君王。崇祯帝为他殉节的谣传"痛哭遥祭"，皇太极亲手为他披上自己的貂裘，顺治帝对他"信之独真，任之独专，用之独久"，康熙帝却对他"大功不赏"。百年之后的乾隆更是将他视为"贰臣"而加以贬斥……洪承畴究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还是明朝最倚重的干城之器？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还是开清第一功勋？是遗泽咸知的夙望贤臣，还是大节有亏的汉奸贼子？这都是四百年来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对于洪承畴这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并且差异甚大。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不同时代、不同阶层所依据的道德价值观的不同所致。

我们在进行高校历史教学的时候，同样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例如关于历史上的一些人物评价，秦始皇、隋炀帝等，在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的认知中，往往被人们视为暴君，施行暴政，残害人民。但是我们在与学生们进行课堂讨论和学术互动时，有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秦始皇、隋炀帝虽然说是古代的暴君，但是幸亏有了这些暴君，我们现在才有诸如长城、运河、兵马俑这样傲视世界的文化遗产，才能依托这些文化遗产而开展旅游事业、发展经济。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暴政，恰恰为中国的文化传承留下了辉煌的业绩，而反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所谓明君、良臣，在位时不敢劳民伤财，建构不多，无法给后世留下什么壮观的东西，因而也无法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做出比较突出的贡献。学生们的这些提问，似乎不无道理，但是让老师们很为难作答。其中的差异之处，依然是关于道德价值观的不同认知问题。

（二）道德价值观的认定应该放到历史当时的时空中去思考

评判中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的道德价值观是如此地差异和变迁，那么我们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学术立场？换言之，我们每当需要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

或历史事件时，我们应该依据哪一种道德价值观来衡量呢？

马克思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把研究的对像放到其原来的历史时代、历史背景之中去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时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又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任何东西。”[①]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只能仅仅是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而不能滥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历史阶段，他说；“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真正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像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②]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联系时，同样强调了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的重要性。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

---

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第 1 版，第 153-154 页。
②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 . 阿尔伯特 . 朗格》（1865 年 3 月 29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25 页。

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①

列宁在一系列的论述中，也反复强调了研究历史必须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的重要性。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地。”②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③

我们从上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得论述中，就不难了解到，无论是研究社会的、经济的、精神的、军事的任何历史问题，都必须把这些问题放到它原来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空中寻求它们的正确答案，否则，都将是“庸俗的见解。”都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重温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则之后，我们就不难对于上述的当今历史学研究中的困惑问题，进行清晰肯定而又有说服力的思辨。不论是秦始皇、隋炀帝、汉高祖，还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洪承畴、林则徐甚至潘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页。
② 引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229页。
③ 列宁；《游击战争》（1906年9月30日），摘自《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0页。

金莲，我们都应该把他们各自放到他们所处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运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空所盛行的道德价值观来评判他们。应该十分慎重而不是草率地运用我们今天的道德价值观去衡量古人的历史功过与历史地位。只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原则，我们就依然可以认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我们也可以由此认为秦始皇、隋炀帝等在执政时期确实存在不少的暴政。而不必以当今的道德价值观来予以别出心裁的颠覆评价。

当然，各个历史时代的道德价值观，确实也存在着某些违反人性、阻碍社会进步的糟粕内容。对于历史上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糟粕文化，我们必须理性地予以批判，采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主张的“扬弃”的手段来对待它们。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地坚持以当今的道德价值观来评判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那么只能混淆历史的正邪是非界限，把历史学研究引入不可知论的深渊。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对于封建社会中某些违反人性的道德价值观例如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欣赏女人缠足等等的社会文化，应予摒弃，但是我们对于那些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烈女、贞女、节妇等，还是应当深怀敬意。

（三）建文帝研究的文化意义

当我们明白了如何运用各个不同时期的道德价值观来研究分析各个不同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这一学术原则之后，回过头来审视近年来兴起的关于明代建文帝的学术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研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

从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来评判明代前期的“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以叔父藩王的身份，起兵夺得侄儿明惠帝朱允炆的帝位，这无疑就是谋反篡夺，是不符合当时的道德价值观的。因此自明成祖夺得帝位之后的四五百年间，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一直对明成祖朱棣的篡位行为，予以谴责。就连清代官修的《明史》一书中，撰修者在对朱棣的这一行径，也是严词批评；“革除之际，

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①]而对失去帝位的明惠帝朱允炆，则普遍怀有同情之心。《明史·恭闵帝·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后，纪年复称洪武，嗣是子孙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更越圣朝，得经论定，尊名壹惠，君德用彰，懿哉。”[②]

在这样的道德价值观评判之下，明惠帝朱允炆与明成祖朱棣的民间形像，形成了高下立判的两极反差。尤其是明惠帝朱允炆在朱棣率兵攻进南京都城的时候，生死不明，所谓“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③]明惠帝朱允炆的这种悲惨遭遇，更是引起了民间的普遍同情。于是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各地便已开始出现了不少关于明惠帝朱允炆出走行踪的传说。《明史》记云；“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④]这些民间的传说，弄得心虚的明成祖朱棣疑神疑鬼，四处搜寻，甚至于郑和下西洋，为了寻找明惠帝朱允炆的下落，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明史.郑和传》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⑤]

自明代永乐年间以来，全国各地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关于明惠帝朱允炆出走行踪的传说，究其成因，大致有二。一是从当时的道德价值观来评判，民间普遍存在同情明惠帝朱允炆的文化心理；二是明惠帝当朝时的一部分臣属，对于明惠帝的不得善终，心怀不平。从“忠君”的道德价值观出发，依然

---

① 张廷玉；《明史》卷7，《成祖三.赞》。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4月第1版，第105页。
② 张廷玉；《明史》卷4，《恭闵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4月第1版，第66页。
③ 张廷玉；《明史》卷4，《恭闵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4月第1版，第66页。
④ 张廷玉；《明史》卷4，《恭闵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4月第1版，第66页。
⑤ 张廷玉；《明史》卷304，《宦官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4月第1版，第7766–7767页。

久久怀念故主，甚至于在自己的私家范围内，留下一些难以为外人觉察的怀念设施。在这两种因素的交集下，明惠帝朱允炆的出走行踪遗迹就不能不较为长久地在民间流传下来。

从当时的传统文化“忠孝仁义”道德价值观来衡量，明代永乐年间以来所出现的关于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的传说，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如果我们运用现在的道德价值观来考察全国各地所出现的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传说的这一历史现像，则或许感到有些可笑和缺乏历史学的学术意义。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反复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论述所言，我们今天讨论明惠帝朱允炆的行踪遗迹传说，运用现在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只能以当时的道德价值观来审视这一问题。那么，我们今天来讨论明代惠帝朱允炆的行踪遗迹传说问题，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就相当地明显了。

近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对于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指示。关于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传说的现像既然在当时的道德价值观氛围之下，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在我们现代的文化氛围中，也基本上不存在什么负面的影响。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尝不可把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传说的文化现像，来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内容呢？我想，福建省宁德市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上下一心，努力把这一地方的有关明惠帝朱允炆行踪遗迹传说作为一项文化事业来建设，善加整理维护，广为宣传，这无疑就是响应党和国家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大力振兴地方文化的一个具体举措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建文帝离开南京城的四种传统说法阐析

王道亨

要讨论建文帝的出亡路线图问题，必须先讨论一下其是怎么离开皇宫、离开南京城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纵观各种建文典籍，不外乎“从间道出走”“从地道出走”“从水关出走”“骑马从太平门出走”四种说法。

“从间道出走说”，主要见于《明神宗实录》中的相关记载。据《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年十月戊午）上御文华殿讲读，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辅臣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出走，后云游四方，无人知者。”

“从地道出走说”，主要见于清张廷玉《明史》与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相关记载。据清张廷玉《明史·恭闵帝本纪》载：“都城陷，宫中起火之际，帝之去向不明；或帝自地道逃亡。”又据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载：“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因知陛下之来也。畴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

“从水关出走说”，主要见于明谈迁《国榷》卷十二与清查继佐《罪惟录》中的相关记载。据明谈迁《国榷》卷十二载：“上手麾之去，同程济及中书舍人定海梁良用潜出西华门，沿河得空舸，良用鼓拽抵南门，舍舟易涂。良用哭曰：臣从此别，遂赴朱雀桥水死。上潜至聚宝门，乘月之神乐观，宿道士王升所。”又据清查继佐《罪惟录》载：“金川门开，帝仓促不知所出，一官捧太祖遗箧，出自奉先殿。曰：曩受命，遇大难乃发。得杨应能度牒一，及僧衣一。程济曰：嗟，皇祖预为陛下置矣。可奈何。立召主录僧傅洽为帝祝发及举火。帝从水关出，外廷传帝崩于火中。”

“骑马从太平门出走说”，主要见于清查继佐《罪惟录》中的相关记载。据清查继佐《罪惟录》载：“金川门破，事急。一内侍衣蟒服冕而代死。帝削发于淮清桥，从太平门乘马出，历池州，渡浙江，投义门郑氏。”

对此，吴晗先生在《大明朝历史》一书72页引用史料作了论述：“当时许多书上都说当南京被燕兵包围时，城门打不开，建文帝便剃了头发，跟着几个随从的人从下水道的水门跑出去了。钱谦益说这靠不住，南京下水道的水门根本不能通出城去。他当时做南京的礼部尚书，宫殿里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此外，还有很多不合事实的传说，他都逐条驳斥了”。

这里，吴晗先生毫不客气地否定了“从地道出走”和“从水门出走”两说。

几乎半数以上的建文典籍都记载了建文帝君臣一行离开皇宫后，从“间道”出走，首先到达了神乐观。神乐观应是建文帝君臣出亡的第一站，也是建文帝一行离开南京城前的最后落脚点。对此，笔者开始也是赞成“从间道出走”说的。一是受郑自海、郑宽涛先生的《建文帝从南京出逃新探》的影响。二是受明赵士喆《建文年谱》记载史料的影响。三是受周新华先生《郑和七下西洋》一书影响。

《建文帝从南京出逃新探》一文云：“建文帝选择神乐观为最后告别南京之地，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沿江百里燕兵都已布防，燕军已先期占领了高资、镇江等处，朱棣亲率精兵从金川门方向而来，相对来说位居城南的神乐观比较安全，且神乐观又紧靠秦淮河，交通便利，便于逃脱。”

“神乐观位于今（南京城）光华门外石门坎省冶金机械厂一带，……正南为秦淮河，北为护城河。”

“秦淮河，古称龙藏浦，又叫淮水，传说为秦始皇所开，故称秦淮河。该河全长110公里，流域2100公里。朱元璋命李新在溧水开凿了胭脂河，未曾想到为建文帝营造了一条逃生之路。据张学义的《古南京史话》载：明初，朱元璋为维护京师封建王朝的庞大开支，向各地征收税务（粮食）多用船运载。两浙是鱼米之乡，是中央政权的重要经济来源，但由于山水的阻隔，漕运很不

方便。朱元璋深感岁费殷繁。自浙河至丹阳舍舟登陆，转输甚难。自大江溯流而上，风涛之险，覆溺者多，因此决定：今欲自畿甸近地凿胭脂河以通于浙，俾输者不劳，商旅获便。开凿胭脂河的重要意义，在于打通两浙的粮船由太湖进入濑溪河（古称中江，又称胥河）通道，经东坝入固城湖，又经石臼湖、洪蓝，再经秦淮河直达南京。建文帝及众文臣打仗不如燕王朱棣，天文地理之术则非常精通，秦淮河成为商旅获便之道，理当首选为逃生之路。只要逃往太湖地区，就如鱼得水。事实证明，建文帝君臣选择神乐观作为逃出南京的最后集合点，由秦淮河逃生的举措是高明的决策。”

建文帝一行正是从这一条曲折的水路到达太湖，再由太湖东南向的吴江县（今吴江市）经由阳澄湖水路到达江苏太仓港。在太仓港换乘海舟南下浙江、福建的。

其实，由太仓乘舟南下福建的这一路人马，不是建文帝与郑洽他们，而是由廖平（或是余六府，化名）护卫的太子朱文奎他们（详见笔者拙作《建文帝出亡路线图》一文）。

不知多数史家有否注意到一个奇怪现像，多数建文典籍在记载到建文帝君臣一行到达吴江以后即失去踪迹或突然掉头西去。突然失去踪迹，说明保密工作做得好。只有走水路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言其突然掉头西去，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是什么原因给尔后的研究建文帝下落问题的史学家造成了误导与困难呢？明赵士喆著的《建文年谱》141 页的一段记载披露了这一谜团。该书云：“建文逊去，益可以无疑矣。冯氏之言在史程二书（指《致身录》与《从亡随笔》二书）未出以前，故多揣摩，然已不服太仓之论。况二书之即出，与二书颇有抵牾。”这段话的意思是，在《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这两部伪作未出世之前，专注研究建文帝出亡方向的史学家都是把目光集中在东南方向，认为是从太仓出海而去了。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这两本伪书的出炉，把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视线引向西北、西南而去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把“寥落东南四十秋”与“流落江南四十秋”的诗句，肆意篡改为“流落西南四十秋”与“流落

江湖四十秋”之闹剧。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两部伪作作者罪莫大焉。

而周新华先生著的《郑和七下西洋》一书 P79-81 页载：事实上，太仓不仅仅是被朱棣以及郑和等选中作为“通番”的起锚地，太仓的地理位置一直为人重视。有意思的是，在明代建文四年，即“靖难之役”的最后一年，燕王朱棣即将攻入都城南京时，建文帝朱允炆曾下密旨，派太常寺卿黄子澄到太仓募兵勤王，但“未至而南京陷”，黄子澄也被捉拿。《太仓州志》记载了这一事件。这段记载令人注意到朱棣、朱允炆叔侄二人竟然是同时想到了太仓。而在民间传说中，云建文帝朱允炆在靖难中并未被烧死，而是秘密逃到了太仓，从这里出海逃到了“外洋”。

受以上三个方面资料的影响，在 2015 年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建文帝离开南京城是走“间道”至江苏太仓，然后由太仓走水路南下。

后来，由于研究的逐步深入，证据链的不断出现，我们意识到从太仓走水路南下的不是建文帝与郑洽这一拨人马，而是余六府（化名）护卫下的太子朱文奎这一路人马。

而建文帝与郑洽这一拨人马正是从太平门出的南京城，绕道池州，直奔浙江浦江郑义门。原因一是观望形势，二是陈贵妃（明代宁德县西乡洋中东山陈氏女，该村《陈山下陈氏家谱》详载其事迹）即将临产。

而金川门破，建文帝与郑洽等离开郑义门，取道余姚直奔宁波，由宁波乘船南下，此为后话，另文阐述。

所以说，关于建文帝离开南京城的四种传统说法中，清代查继佐著的《罪惟录》中记载的“骑马从太平门出走”说是最正确的。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

建文帝出亡方向的三种传统说法阐析

王道亨

至于建文帝离开皇宫、离开南京城后的去向，也就是建文帝出亡的方向，历史上一直存在三种说法。第一种是西北说，即朝西北方向的湖北、四川逃亡，走的是西北道。第二种说法是西南说，即朝西南方向的贵州、云南逃亡，走的是西南道。第三种说法是东南说，即朝东南方向的浙江、福建逃亡，走的是东南道。这一点，明末清初的李玉所著之《千钟录》（谐音“千忠录“）一书记载得最为明白，《千钟录》48 页载：“燕王朱棣差朱能之子朱武，领一支人马，往浙江、福建一路追去。又差大将邱福，领一支人马由江西直往两广一路而去。又差大将张玉，领一支人马，从湖广而来，要往贵州，再去云南，转入四川寻觅。”

我们认为，以上三说中，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东南说”，即“浙江、福建说”。理由是，建文帝出亡，不可能是无目的而为，而应该是有目的而为。如果是无目的而为，那么他的行为举措就必然表现为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东躲西藏，四处逃亡。也就跟传统建文典籍如明代赵士喆的《建文年谱》，清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以及托名之作《致身录》《传信录》《奇秘录》《从亡随笔》中所记述那样，东南西北乱跑一气了。在当时的东南半壁江山还尚在建文势力控制之中的背景下，建文帝与其亲信大臣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一仗不打，掉头就跑。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关于这一点，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在《明朝大历史》一书 72 页中，有过一段论述：“明成祖以后的各代对建文帝的下落一事也非常重视。万历皇帝就曾经同他的老师谈起这个问题，问建文帝到底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一百多年还搞不清楚。当时出现了很多有关建文帝的书，这些书讲建文帝是怎么逃出南京的，经过些什么地方，逃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书说他到了云南，当了和尚；跟他一起逃走的那些人也都当了和尚。诸如此类的传说越来越多。此外，

记载建文帝事迹的书也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一个政治问题。建文帝在位期间，改变了他祖父明太祖的一些做法。他认为明太祖所定下来的一些制度，现在经过几十年，应该改变。当时建文帝周围的一些人都是些儒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他们自己出的一些办法也并不高明。尽管如此，建文帝的这种举动还是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是明成祖起兵反对他。在明成祖看来，明太祖所规定的一切制度都是尽善尽美的。他不容许建文帝改变祖先的东西。因此，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间的斗争就是保持还是改变明太祖所定的旧制度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建文帝失败了。明成祖做了皇帝以后，把建文帝改变了的一些东西又全部恢复过来。一直到明朝灭亡，二百多年都没有变动”。

“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对明成祖的政治感到不满，不满意他的统治。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不满呢？公开反对不行，于是通过对建文帝的怀念来表达。他们肯定建文帝，赞扬建文帝，实际上就是反对明成祖。因此，关于建文帝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到四川、云南这些地方旅行，到处可以发现所谓建文帝的遗址。这里有一个庙说是建文帝住过的，那里有一个寺院，里头有几棵树，说是建文帝栽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没有。明末清初有个文人叫钱谦益（这个人政治上很糟糕）写了文章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许多书上都说：当南京被燕兵包围时，城门打不开，建文帝便剃了头发，跟着几个随从的人从下水道的水门跑出去了。钱谦益说这靠不住，南京下水道的水门根本不能通出城去。他当时做南京的礼部尚书，宫殿里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此外，还有很多不合事实的传说，他都逐条驳斥了。最后他作了这样的解释：假如建文帝真的跑出去了，当时明成祖所统治的地区只是从北京到南京的交通线附近，只要建文帝一号召，全国各地都会响应他，他还可以继续进行斗争。但结果没有这样。这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建文帝是死在宫里了。但当时不能肯定，万一他跑了怎么办？所以就派人去找。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比较说得通”。

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建文帝既然已经出逃了，且当时的南方十一个省还是建文势力的地盘，建文势力为何没有与燕军势力继续作战？笔者

认为退守东南一隅的建文势力与燕军势力是有开展过继续作战的，我们把它叫作“第二次靖难战役”，作战地点就在当时的福宁地区（今宁德市境内）。只不过由于战胜一方的朱棣与燕军势力的严密封锁与彻底清理，所有与建文帝和建文势力有关的史料与信息都被清理殆尽，造成这一段历史的空白，这是一段被彻底掩埋与尘封的历史。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宏观与微观现像上寻找到它的蛛丝马迹的。比如，我们从正史资料上，可以看到自明初到明中期，福建省的人口突然降了一半，福宁地区的人口突然降了三分之二。这是铁一番的史实。可是，历代史学家却是缄口不谈，不言原因。却是为何（详见笔者拙作《明中叶福建省福宁州、宁德县人口比明初锐减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一文）？我们从家谱资料上也可以看到，明永乐二年（1404），福宁地区周边突然增加了大批屯军这一现像，同样也是原因不明（详见郑冠军《明永乐二年朝廷在福宁及其周边地区的不寻常军事部署》一文）。我们从正史资料还可以看到，明初到明中期，中国佛教突然出现了衰微现像，福建省与福宁地区尤甚，又同样是原因不明而且在永乐初的福宁地区，几十座千年禅院突然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有的禅院，千名僧人，一夜之间突然不见了（详见笔者拙作《明中叶中国佛教突然衰微原因分析》一文）。还有，现宁德的 9 个县（市、区）内竟然有 50 多个姓氏家谱赫然记载着他们的先祖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永乐初期，从同一个地方——南京凤阳府八角井与月半池迁徙到宁德……

晁中辰先生在《明成祖传》215 页中也说得很明白：“第四，从当时的形势看，燕军虽然进入京师，但建文帝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要说江南基本上还是建文帝的地盘，即就江北而言，明成祖实际上所控制的地盘也不是很多。当时，整个辽东还在朝廷控制之下，孙岳还控制着中都凤阳，铁铉仍控制着山东一带，附马梅殷尚拥兵淮上。因此，当时建文帝可以调动的兵力仍然很多，没有必要投火自焚。他完全可以逃往外地，再图兴复。唐代发生‘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出兵攻占了京师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后来终于平息了叛乱，唐室再兴。建文帝不会不知道这一段历史”。

而“西北说”（即“湖北、四川说”）与“西南说”（即“贵州、云南说”）都是建立在“建文帝出亡只是一种无目的而为的慌乱之举”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都是这种“无目的而为”的观点下的产物，所以说，都是不能成立的，经不起学者的推敲与历史的检验的。在这种观点与学说的主导下的研究与考证，其结果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证据越挖越少。同时，这也是600年来谜案始终无法破解的症结之所在。但如果是有目的而为，那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他的行为举措就必然表现为十分静定，从容应对，慎密策划，严密部署。他们就必然会考虑到一系列问题；即逃向哪里比较安全且有利于反攻复国，如何安全离开皇宫、离开南京城，哪些人跟随前往护卫，哪些人留下迷惑、阻击燕军，等等。翻开相关的典籍，我们可以看到，临难之际的朱允炆身边，已不再是方孝孺、黄子澄、齐泰、李景隆之辈了，而是换上了郑洽、廖平、杜华泗、徐辉祖、小马国舅等一批有远见卓识的能人死士。情况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作出上述思考与决策是完全有可能且符合真实的历史的。

我们研究小组试站在600年前的建文帝及其谋臣们的立场上，用他们的思维来认真思考与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建文帝一行所去的这个地方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第一，这个地方必须是燕军势力一时难以到达的；第二，必须是临海且交通十分便利的；第三，必须是经济相对发达，物产相对富饶，人民相对富足，且易于聚财的；第四，必须是易于藏兵屯粮的；第五，必须是具备有已方的广泛社会基础的。

那么，建文帝与他的亲信大臣在燕军即将兵临城下之际，所考虑的这个出亡目的地是哪里呢？笔者认为，它就是地处中国的“东南一隅”的福建宁德（福宁地区）。因为这里为建文帝和它的流亡政府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喜与欣慰的是，我们的上述观点与见解并不是孤立的，透过时间隧道，我们寻觅到了知音。我们的观点与见解，得到了一古一今俩位史学大师的支持。

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在其名著《明史考证》第一册第61页中，引用

了明末清初的大史学家潘柽章的论述："意是时成祖屯兵金川，遣人奏章（见长陵碑文）实欲使惠宗自以为计。而京师辽阔，东南一隅，燕师势难遍及，仓卒潜行，谁为物色之者，而又何必假途隧中也？况惠宗是日尚能手诛徐增寿于左顺门，则非坐困宫中可知。"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是，明成祖朱棣进军南京，到达金川门后，停止进攻，在龙江驿那儿驻扎下来作壁上观。他在等待什么呢？他是在等待建文帝朱允炆自行了断或向他投降。但是，朱棣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他既没等到朱允炆自行了断的消息，也没等到他主动逊位于他的消息，而是等来了皇宫里的一把大火。等到他醒悟过来，急忙挥兵进城时，建文帝与其亲信大臣一行人马，早已不见踪影，而且去向不明。

建文帝到底去向哪里？潘柽章先生认为其是奔向"东南一隅"。其第一个理由是，那儿距离京城遥远，在燕军的势力范围之外，虽说匆忙之间，但昼伏夜行，追踪者在短时间内是发现不了的。因为是逃向尚属于"建文势力"的"东南一隅"，因而也就用不着从皇宫内院钻地道逃亡，完全可以借夜色掩护，从太平门悄悄撤离。其第二个理由是：建文帝朱允炆并不像一些史料所记载的那样是一个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昏君。当日朱允炆尚能在金銮殿亲手挥剑斩杀徐增寿，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他绝不会坐困宫中等待燕兵前来宰杀，而定然会与他的亲信大臣郑洽、程济、廖平等一道，对出亡之事，作出严密安排。而关于他的出逃，也绝不会像一些建文典籍所记载那样，一直等到城破之后，才匆匆忙忙从地道与水关出走，而应该是早在城破之前几个月就已离开皇宫，离开南京城了（详见笔者拙作《建文帝出亡路线图》一文）。

而留在宫中的"建文帝"，那只是一个穿着龙袍的太监假扮的"影子皇帝"而已。

为了把戏演得更加逼真，为了掩护建文帝顺利南撤，深明大义的吕太后与小马皇后以及 500 多名太监宫女留了下来，以迷惑内奸（太监）与燕军。

上文提到的清查继佐《罪惟录》中的记载已披露了这一史实。该记载云：

“金川门破，事急。一内侍衣蟒服冕而代死。”即是明证。

所以，笔者认为潘柽章先生关于建文帝出亡方向应在“东南一隅”的推论是正确的。

除了我们研究小组与潘柽章、黄云眉这一古一今两位史学大师之外，还有哪些史学家是赞成这一观点的呢?

请看明王鏊《守溪长语》中的记述。

明王鏊《守溪长语》5 页载：“太宗师至城下，传建文阖宫自燔死。然或传实自火逃出。或传蜀府兵来赴难，窃载以去。然莫察其实，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访张仙为名，实为文也。终是莫知所知。后至正统间，有御史出巡，忽一僧当道立，从者呵之，终不避。问之，乃献诗云云。询之，乃文也。御史奏之朝。诏廷臣询，亦不察虚实，后卒于中”。其诗曰：“流落江南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诗中的“流落江南四十秋”句明确点出建文出亡方向在“江南”。

再请看明祝允明（枝山）《前闻记》中的记述。

明祝允明（枝山）《前闻记》12 页载：“今世传逸诗一首云；‘寥落东南四十秋，而祇今霜雪已蒙头。新蒲细柳年年绿，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词意殊凄怆也。”诗中“寥落东南四十秋”句更明确指出建文帝出亡方向在“东南”。

清查继佐《罪惟录》一书也有提到“流落江南”一事。

只是后来的别有用心的人们把上述诗中的“流落江南四十秋”与“寥落东南四十秋“中的“江南”与“东南”一词改成“西南”与“江湖”，一字之差，误导了几百年来的史家与学者。

现在该是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候了，应该还给历史以真实的面目了。

关于这个问题，明史中有明确记载：“成祖疑惠帝蹈海去，欲踪迹之”。

又云："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商传先生认为："这是建文帝出亡东南说的最有力证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建文帝君臣一行的出亡方向为"东南一隅"，应是确凿无疑的。

也正因此，十年来，我们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正是立足于"建文帝出亡方向应在'东南一隅'"这一基本观点，毫不动摇地展开我们的研究的。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

建文帝入闽入宁新探

王道亨

（一）建文帝入闽新探

关于建文帝入闽问题，请看清查继佐《罪惟录·建文逸纪》所载：

"金川门破，……帝削发于淮清桥，从太平门乘马出历池州，渡浙江，投义门郑氏。……旬日，去之，如余姚石梁王氏。历温州，入闽。"

"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郑氏家，……初别郑时，留龙纲为记。走住福州雷（应为雪）峰寺。三保下洋过之，泣拜于地，为之摩足。"

复请看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所载：

"仁宗洪熙元年（1425）春正月，建文帝在潮音洞拜谒大士。五月，从闽返回鹤庆庵。仅令程济一人随行。"

以上 3 则史料，均记载了建文帝入闽一事。虽然说法各异，但都说明建文

帝君臣确实到过福建。时间是永乐元年（1403）夏秋之季节。尤其是查继佐的《罪惟录》一书的记载，具体明确，由什么地方入闽，到过什么地方，记载得十分详细。

笔者查阅了所能收集到的历代建文典籍，发现至少有50多部著作有提到建文帝君臣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出现。而且，这些典籍中所提到的二十二位从亡大臣中，三分之二最终下落都是在浙江、福建。他们是程济、廖平、郑洽、牛景先、王资、蔡运、吴成学、梁中节、郭良、何洲、周恕、梁田玉、刘伸（以上详见拙作《建文朝二十二名从亡大臣考》一文，该文收在《建文帝研究论文集》中）。而且，其中的史仲彬是由福建辗转回到江苏老家。梁良玉是由浙江转赴海南，客死海南。叶希贤则是由福建流浪至重庆善庆里观音寺为僧，终老那里，享年百岁以上。杨应能则是由福建转赴广西，客死广西横州寿佛寺的。此四人尚未计在内。而他们很可能是在建文帝辞世后始离开浙江、福建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作为建文帝的“替身”被郑洽派往西北、西南以扰乱燕军视线的。此外，尚有一大批未见史载的建文朝从亡大臣及一些从亡大臣的后代，在福建宁德（福宁地区）及周边地区出现，此亦有力佐证了建文帝确实入闽的观点与推论（详见笔者拙作《千忠录》与《从亡录》两文）。

明朱国桢《皇明史概·逊国臣传》与明谈迁《国榷》中的相关记载，更进一步明确锁定了建文帝出亡方向不但在东南一隅，而且就在闽浙边界，就在福建。据《皇明史概·逊国臣传》载：“东阳（浙江）东山，永乐初有自称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间。仪容俊伟，趣识超群。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盘桓于山南村落，与之游饮者，每得其诗画。诗画虽未过人。亦不尘俗。将死，嘱主人曰：殓吾尸于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终莫知之。尝有歌云：‘七年艰难走闽越，日夜思亲鬓成雪。回头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随衣百结。当时恨不早见机，扁舟一棹江南归。西天尘土障天起，秋水鲈鱼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里，佳士出迎当倒屣。当歌对酒忍暂欢，握手论心愧知己。老怀岂能忘故山，神游往往在其间，为君写此转凄恻，片云零落何时还？’又有歌赠王姓者，曰：

宗兄。人始知其姓王，建文时忠臣也。时称玉华山樵。”又据《国榷》载：“王资易为道人，隐金华玉华山。”考众多建文典籍，二十二名从亡大臣中王姓者有两人，一为王之臣，二为王资。王之臣流落川中为补锅匠，去向与下落都十分明确。所以，笔者认为上述第一段文字中记载的“大呆子性天然”者与“玉华山樵”者，应是王资无疑。而且王资是第一个在诗歌中披露了建文帝隐于闽浙边界地区及自已在闽浙边界寻找建文帝达七年之久却始终找不着之这一段史实之人。这一段史实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建文帝的行踪的确十分隐秘，即使连亲信大臣，一旦失散，也即切断联系，他们再也找不着建文帝了。难怪胡濙等人找了十几载始终无果而返。

又据明赵士喆著《建文年谱》下卷22页记载：建文四年（1402）七月，明成祖朱棣“降封允熥为广泽王，居漳州（福建）；允熞为怀思王，居建昌（江西）”。同年九月，朱棣以“不能谏正建文”（实为劝降，笔者注）为由，“废为庶人，禁锢至死。”这条看似不起眼的材料，恰恰是建文帝君臣逃到东南一隅的福建的最有力证据。

由此可见，建文帝进入福建应是不争的事实。

（二）建文帝入宁新探

建文帝一行于建文四年（1402）秋、冬之季进入福宁（今宁德）地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600年来一直在今宁德市所辖的蕉城、福安、霞浦、福鼎、古田、屏南、周宁、寿宁、柘荣等几个县（市、区）及其周边的连江、罗源、政和、松溪、景宁、庆元、泰顺、苍南、平阳等县（市）大面积流传的与建文史事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如“罗隐的传说故事”“郑堂的传说故事”“鸭母娘娘的传说故事”“草寇的传说故事”等等。这些传说故事大部分已经被收入20世纪80年代末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主导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的相关各县（市、区）分卷之中。2008年以来，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对其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与建文史事相关

的闽东民间传说故事研究》专题资料（详见笔者拙作《与建文史事相关的闽东民间传说故事研究》一文）。

研究小组认为，建文帝入闽第一站应该就是今宁德市霞浦县所辖的明初所设的“福宁卫大金守御千户所”，即今天的霞浦县长春镇的大京城堡（详见笔者拙作《明初的大京城堡及其四批移民》一文）。

蕉城区上金贝畲族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文物“当京皇帝万万岁”龙头神祇牌支持了上述观点。

清编《希忠录》（浙江浦江郑义门传家之作）一书亦可证明建文帝入闽入宁一事。据《希忠录》所载义门郑氏九世孙郑机所写的《从先祖忠智公崇祀乡贤忠孝祠谨赋七绝四章其四》云：“孝义初缘御笔亲，今将移孝作忠臣，蛮烟蛋雨同艰苦，长使君王恋此人。”另一首郑氏后人郑兰的诗云：“风云变幻矣，从龙惟有虎。事君如事亲，大节昭千古。池因夺凤凰，才能翻鹦鹉。寇压帝仓惶，英雄无用武。东道主谁家，吾家腾尺土。君不见，将军、竖儒、臣腐。惟有乃公一片心，金钢百炼心独苦。蛮风蛋雨从空劳，到今使星独曜江之浦。我尝读孝经，忠经未能补。今拟补亡诗，誊请大匠斧。”

笔者认为，这两首诗中的“蛮烟蛋雨同艰苦”与“蛮风蛋雨从空劳”句，寓意深刻。这两位生活于不同时代（明代与清代）的诗歌作者，通过这两句诗，巧妙地向后人透露了建文帝与郑洽的隐踪之处。“蛮”在古代是指福建，因“蛮”通“闽”。而“蛋”通“疍”，延伸为“疍民”。“疍民”特指“水上居民”，延伸为“渔民”。闽东地方俗称“渔民”为“曲蹄”或“疍民”（广东省有些地方也称渔民为“疍民”，但因此诗句前冠一“蛮”字，当可排除）。而福建省称渔民为“疍民”的，仅闽东与闽中两地。闽中地区的闽江下游两岸也有称渔民为“疍民”的，但建文帝在闽中时，隐踪处在雪峰山上的雪峰寺，不在江边，故也可排除。前一句，“蛮烟蛋雨同艰苦”，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在闽东渔村同甘共苦地生活”。后一句“蛮风蛋雨从空劳”，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在闽东渔村白白替建文帝操劳了半辈子”。而郑洽（化名郑三合、郑岐）所居住

过的濂坑、井上、郑岐这三个村庄，正是当年上金贝山脚下（环绕南山）的三个渔村。由此可证，建文帝一行确实逃到了“东南一隅”的福建福宁地域。而且在再次兵败后，又由霞浦大京一带撤退到了宁德县（今蕉城区）境内。而今蕉城一带的大量家谱资料与民间传说支持了上述观点。

蕉城民间一直传说，建文帝与郑洽当年是从东冲口进入三都澳，直达铁沙溪港（后来当地百姓为纪念郑洽——郑三合，把铁沙溪港改称“三合港”，至今当地老一辈人都知道这事），从铁沙溪古码头直上八都漈山寺（即香积寺）。而后逐步撤向宁德西乡（今蕉城虎贝、洋中、石后一带）。当地的金涵乡濂坑村百姓为了纪念郑洽，把郑洽船队进入三都澳腹地门户取名“安郑门”（今云淡门），把郑洽当年上岸之处取名“郑投角”，把郑洽上岸居住过的第一个村子改名“安郑坪”（今淡平村），把建文帝帮助郑洽新家勘测的一口水井改名为“安郑井”，意为建文帝把郑洽安插在濂坑村充当耳目，充当联络官。在蕉城区的金涵、漳湾、七都、八都、三都等乡镇渔村，至今还流传着建文帝的水军与朱棣的水军在三都澳海面打过仗的故事（详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一书）。

收录在明嘉靖版《福宁州志》、明万历版《福宁州志》、明嘉靖版《宁德县志》、明万历版《宁德县志》与清乾隆版《宁德县志》中的一首署名僧元定所写的《金邶十奇》诗云：“长老岩高晓独跻，地因金涌见招提。潜鳞沼泮瑞云霭，碧水帘前石马嘶。灵响音消怀旧恨，盘陀藓剥见新题。蒙泉更可供清赏，遥看山屏日未西”。也向世人透露了建文帝君臣曾在上金贝与金邶寺隐辟过的信息。因为据传，该诗原先是题写在被毁之前的金邶寺大殿墙壁之上的。这金邶十景，平平常常，但闽东的历代地方志甚至省一级的《八闽通志》均收录了这首咏景诗，这一点说明上金贝与金邶寺在明、清时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而其影响力大，主要原因当然是帝陵在此。

此外，笔者还在宁德支提寺的明代木刻版画《支提寺全图》的说明文字部分发现了记载着访查建文帝的密探郑和曾于永乐五年（1407）到过支提寺的史

实内容。同时，在明谢肇氵制 纂《长溪琐语》中，亦发现了郑和送千尊铁佛到宁德支提寺的相关记载。还在《武夷山志》中发现了访查建文帝的胡濙写的两首诗歌，在明徐火勃纂《雪峰志》中发现了胡濙写的碑文，在清崔嵸纂《支提寺图志》等 5 部地方志书中发现了访查建文帝的密探中使太监周觉成曾于永乐五年（1407）到过宁德支提寺并终老闽东的相关记载。并在柘荣县黄柏乡天星寺后山发现了周觉成的墓葬。在上金贝半山腰发现了葬于永乐十二年（1414 年）的建文帝侍从国子监生林绍斋的墓葬。在上金贝山脚下濂坑村后壑坑地方发现了为建文帝殉葬的建文朝郑州府同知陈添的墓葬（陈添事迹详见清乾隆版《福宁府志》与清乾隆版《宁德县志》）。陈添墓葬与上金贝帝陵一样，属于无名墓，仅书“同知龙井”四字。在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发现了同样不署名，仅署“戎宋大夫”四字的钟洋余姓先祖、建文帝出亡途中的保驾大将军余六府（虎）墓葬。在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余姓宗祠内发现了落款为“眷弟万象新”的疑为朱允炆太子朱文奎亲笔书写的一副对联（详见王道亨、余永清、余新汉、余根诚合著《建文朝武将余六府身世之谜探秘》一书）。在金涵乡濂坑村发现了疑似建文帝所写的 10 多首诗歌（与先前在《雪峰山志》中发现的 10 多首疑似建文帝所写诗歌风格十分相似）。此外，我们还在蕉城区石后乡芹坂头村发现了建文帝母亲吕太后的踪迹，在八都镇吴山村发现了建文朝御医吴二明的踪迹，在古田县大桥镇发现了建文朝殿前三品指挥使（疑是失踪之建文朝锦衣卫指挥使）杜华泗踪迹。在蕉城区洋中镇东山村发现了建文帝侧妃陈贵妃的踪迹。这些，均可佐证建文帝入宁之说。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

郑洽归宗有力佐证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

王道亨

增设课题，决心破解“谜中之谜”

自2008年初，福建省宁德市上金贝发现神秘古墓后，市建文帝研究小组便根据史书上收集来的线索，开始紧锣密鼓地探寻建文帝“由苏入浙”“由浙入闽”的踪迹。在探谜过程中，又涉及到了一个“谜中之谜”——建文朝二十二名从亡大臣之一的浙江浦江郑义门之八世祖郑洽下落之谜。而小组的调查资料显示，这个郑洽有可能就隐居在上金贝山脚下的郑岐村。

郑洽其人，祖籍浙江浦江郑义门，进士出身，官居翰林待诏，是建文帝朱允炆的亲信大臣之一。已为正史所确认的建文朝二十二名从亡大臣之一。而浙江浦江郑义门与大明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洪武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的匾额。建文帝朱允炆也曾大力旌表郑氏家族，并御书“孝义家”匾额。

在明代的所有涉及建文帝及其下落问题的典籍中，唯有郑洽、程济等几位从亡大臣下落不明。因此，若能探明郑洽的下落，对探寻建文帝的下落是大有帮助的。

于是，研究小组决定在原有“宁德上金贝建文帝陵的规制、格局、构件、构件纹饰、舍利塔碑文的研究”与“宁德支提寺珍藏‘龙袍袈裟’（又称‘龙纹袈裟’‘龙锦袈裟’）的研究”这两个课题的基础上，增加“建文朝二十二名从亡大臣之一翰林待诏郑洽下落问题研究”这个课题，并相应调拨人手，调集经费，展开内查外调，将课题研究落到实处。

开展内查，郑洽踪迹渐趋明朗

为了弄清上金贝山脚下的郑岐村郑姓始祖郑岐公这个疑似郑洽者的真实身份。宁德市建文帝研究小组对上金贝周边乡镇的各个行政村与自然村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重点是查阅迁居历史在550年以上的姓氏族谱、民间传说以及其

他各种口碑资料。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 3 个多月的调查访问，认真研究，郑洽的踪迹渐趋明朗。

在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山脚下，环列着濂坑、井上、郑岐三个海边渔村。在这三个海边渔村的中心点上，是铁沙溪古码头。在西坡塘未围垦起来之前，这里一直是交通要道。从宋、元时起直至20世纪的70年代，走水路至宁德（今蕉城）县城，这里是必经之路。涂着七省一市舷号的船舶，进进出出铁沙溪码头。而从铁沙溪码头上行至上金贝，只需半个钟头的路程即可到达。

铁沙溪码头边上的濂坑村群众告诉研究小组成员，当地祖祖辈辈流传，明永乐年间，村里的王姓始祖王进，结识了一位携子迁到濂坑来居住的郑姓朋友叫郑三合。这个郑三合人好且很聪明，父子俩很讨村里人喜欢。村里一户陈姓长者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三合的儿子为妻。娶亲那天，南山上金邶寺的高僧也来喝喜酒。三合管那高僧叫“师傅”，自称“弟子”。后来金邶寺的高僧圆寂了。郑三合便举家搬到了邻近的井上村去居住。临走时，他告诉好友王进，僧人就是建文帝，自己不叫郑三合，而叫郑洽，搬到邻村是为了不连累村里人，以免给村里人带来灾祸。郑三合在井上村住了一段时间后，又搬到了只有一户人家居住的郑岐村。这户人家也姓郑，郑洽要儿子认这位郑姓宗亲为兄长，并将名字改作郑钱，以便长期隐居。而郑洽又一次将自己的名字改作“郑岐”，从而成为今天的郑岐村的郑姓始祖。

郑洽在濂坑村居住期间，住在东井坂地方。因此，郑岐村郑洽后人、下井堂郑洽后人的家谱均以“东井”为堂号，称“东井堂”，意在饮水思源。而两支郑氏宗谱均称“白麟谱”，亦是意在“饮水思源”（这是后来浙江浦江郑义门的郑氏宗亲到访后才知道的）。濂坑东井坂地方至今留有一口明代的古井，唤作“甘濂井”，亦唤作“安郑井”，是当地群众为纪念建文帝将郑洽安在濂坑担负联络与打探消息而改的名。

郑洽在濂坑居住期间，还发明了一种用于滩涂捕捉渔贝类的重要交通载

具——土橇，又叫泥橇，当地渔民俗称“溜”或“溜板”。由于这东西很好用，在闽东沿海渔村飞快普及了，各地渔民纷纷效仿制作。以致后来参将戚继光在率兵攻打横屿倭寇时，也用上了它。土橇虽小，但却是郑洽下落宁德郑岐的铁证。

20世纪80年代，濂坑村文史爱好者王和铅曾撰写过一篇《郑三合与土撬》，该文登载于当时的《宁德县文史资料》上。

而在郑岐村，此类证据则比比皆是。

郑岐村郑氏祠堂内供奉的神祇与众不同。祠堂右边神龛内供奉着祖公祖婆——郑洽夫妇。而左边神龛内却供奉着一个僧人，名曰：普庵禅师。这在闽东，可是个例外。而在浙江浦江郑义门的宗祠里的“老佛社”内，也供奉着一个“老佛”——建文帝。这绝非巧合。很显然，它是一脉相承的。郑岐村至今还保留着5幢源自浙江的徽派建筑物。在该村的老宅的柱子上，均刻着类似浦江郑义门《郑氏规范》中的家规家训。显然，这也是一脉相承的。浙江浦江郑义门有一块建文帝的亲笔题匾，曰：“孝义家”。而福建宁德郑岐村亦有一块题匾，曰：中议第（忠义第）。二者的传承关系亦十分明显。此可用郑义门醉墨轩编写的《希忠录》（清代）中的一首诗歌来为此作注：“孝义祖缘御笔亲，今将移孝作忠臣，蛮风蛋雨同艰苦，长使君王恋此人。”郑洽跟随建文帝出亡，不能尽孝，只能尽忠，故郑岐村匾额少了个“孝”字，多了个“忠”字。此有力证明了郑岐村郑氏传承了郑义门的核心精神，证明了郑岐就是郑洽（2010年郑义门祭祖归宗大会，郑岐村宗亲会首次出席郑义门祭祖盛典，向郑义门宗亲会赠送的匾额用了“脉延孝义”四个字，即典出于此）。而诗歌中的“蛮风蛋雨”四字，实际暗示了“郑洽隐于闽东渔村”，只是世人未予注意罢了。因为在古文字学中，“蛮”通“闽”；“蛋”通“疍”，延伸为“疍民”。“疍民”特指“水上居民”，可延伸为渔民、渔村。故“蛮风蛋雨同艰苦”诗句向人们透露了郑洽隐于闽东渔村，与山上寺内的建文帝同甘共苦，艰难地生活（详见笔者拙作《建文帝入闽入宁新探》一文）。此外，郑义门植有9棵树龄高达600年以上的古柏，而郑岐村原先亦植有5棵古柏，民国年间枯死，但树桩仍在，挖开泥

土即可见到。显然，这 5 棵古柏的种植，用意十分深刻；一是传承家风——植树明志；二是表明郑洽（郑三合、郑岐）一花五叶，瓜瓞绵延。郑岐村一直流行着一句“九世同居”的行酒令，在福建没有一个家族曾经九世同居，只有浙江浦江郑义门挂着这样一副匾额。郑岐村过去还流行过这样一个习俗，族里人家生了男孩，在来年春节要摆酒席宴请族中老小，酒席上要由老人传诵四句吉利话：“新正火炮入华堂，子孝孙贤庆新春，九世同居郑忠义，子孙九代家不分。”这也是一种传承习俗，是义门独有的习俗。而郑洽巧妙地把“水之合”的“洽”字更改为“山之分”的“岐”字，分明是冥冥之中在暗示他的后人到浙江浦江郑义门寻根。

几度外调，郑洽谜踪尘埃落定

为了确定福建宁德郑岐村的郑岐是否就是当年跟随建文帝出亡而不知所终的郑洽，研究小组先后五次北上浙江，浙江浦江郑义门文史研究会同行也曾三下福建，双方进行了多次互动后，开始有了更多的共识。2009 年 2 月 3 日，浙江浦江郑义门郑氏宗亲会会长郑隆喜一行来到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进行实地考察。这第三次考察，促使他们与宁德市建文帝研究小组达成了初步的共识：郑岐极有可能是郑洽。

随后，浙江方面在接受《浙中新报》记者石磊的采访时，公开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基本确信福建宁德郑岐村郑岐应是浦江义门八世祖郑洽无疑。

消息传来，研究小组倍受鼓舞，在与浙江方面取得联系后，立即组成了一个 13 人的代表团，由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与蕉城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杨良辉带队，携着郑岐村、下井堂郑氏的两部家谱，第四次北上浙江，直赴浦江义门。

考察当天，市建文帝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在翻阅《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据《浦江县志》载，事隔靖难之役二百年后，在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者秉铎闽之镇海卫，致书浦江郑氏，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后子孙颇繁盛。”很显然，这句话的大体意思是：崇祯年间，郑义门收到了一封寄自云南的一个姓郑的人写来的信，随信还附了一份

“闽之镇海卫”的郑铎出具的文书，证明自己先祖跟随皇帝出亡，流落云南、广东，子孙后代繁盛。对其中所提到的“郑铎”，王道亨觉得十分眼熟，拿来郑岐村与下井堂的《郑氏宗谱》一查，果然在两本家谱的《世系表》中，均出现了郑铎其人，这让研究小组的人兴奋不已。

次日，在郑宅镇政府的大会议室中，众人在明崇祯间修的浦江《郑氏宗谱·卷十》中，找到了上述那段文字的出处，它比清修《浦江县志》记载得更加明确。该段文字系郑义门第十五世孙郑崇宏所记述，文曰：“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秉铎闽之镇海卫寄书请谱。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蒙自子孙因家族颇繁盛，方之”这是一段原汁原味的文字，意思十分明确，即“崇祯年间，云南蒙自有一个姓郑的人，拿着一封福建的镇海卫郑铎帮他写的证明文书，说他是郑义门的后人，是当年追随建文帝出亡云南、广东的义门八世祖郑洽的后代。现在家族繁衍壮大，要求认祖归宗，续上家谱。”显然，《浦江县志》的记载部分有误。应以明修《郑氏宗谱》为准。这在清编的《麟溪集》中的郑义门第十六世孙郑尚潘记述的《致身录节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该文最后一句;“明系讳其洽也。则蒙自之郑。为洽祖之嫡裔。无疑矣。”既然经“郑铎”证明的“蒙自之郑”都被确认为是郑洽之后裔了，那么这个“郑铎”是郑洽之后裔应该更是确切无疑了。

而“闽之镇海卫”是什么意思呢？据史料记载，镇海卫系明洪武二十年（1381）朱元璋下令设立的一个军事辖区，由江夏侯周德兴任主官，其总镇设漳州府之镇海故称镇海卫。下辖福州府福宁县之福宁卫（其时福宁州已裁撤，降为福宁县，与原辖县福安、宁德一起并入福建行中书省福州府），福州府福清县之镇东卫，兴化府之平海卫，泉州府之泳宁卫。由上可见，闽东的福宁卫在镇海卫辖区内。郑洽后人为安全起见，把隐居范围说大一点也在情理之中。

面对着这一成功的家谱对接，与这些文字证据，郑义门宗亲会暨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郑定汉、秘书长郑秋义当场表态，同意福建宁德郑岐村郑氏认祖归宗，并正式确认郑岐即郑洽，郑岐村郑氏为义门八世祖郑洽后裔。并确定 2010 年

阴历二月初八祭祖大典时一并举行归宗仪式。

至此，郑洽谜踪遂告尘埃落定。

奇峰突起，郑洽竟是皇亲国戚

就在郑岐郑姓族人紧锣密鼓准备北上认祖归宗的当儿，突然传来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事情是这样的，2009 年 11 月，厦门市郑坂村老人会在媒体上获悉建文帝与郑洽的一些史事之后，发现自己的宗谱中赫然记载着郑洽及其后代的信息。当年 11 月 29 日，郑坂村老人会郑原美等人向浙江浦江郑义门“江南第一家”文史研究会负责人郑隆喜先生寄去了他们先祖郑安升的墓碑碑文及郑洽的相关资料。郑隆喜先生将这一重要历史信息转给了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

2009 年 12 月底，宁德市建文帝研究小组一行 10 多人抵达厦门市郑坂村，实地察看了郑安升的墓葬碑文及相关的一些史料。厦门市郑坂村郑姓族人给外调组提供的这些史料证据，刚好填补了研究小组研究郑洽下落问题这个课题之不足。

厦门市郑坂村《郑氏宗谱》的资料显示：郑洽共生育五子二女。长子郑榛，化名郑安升，定居厦门。次子郑松，靖难之役阵亡，其兄将其化名郑安治，葬厦门。三子郑樵，四子郑模，随母隐居浦江桃源口。五子郑栈，化名郑钱，随父隐居宁德郑岐村。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后来的研究揭开了郑洽将自己的儿子更名为郑钱，孙子更名为郑镠的秘密。原来，郑洽要自己的子孙学习唐代浙江钱塘（今杭州）忠臣良将钱镠誓死效忠大唐皇朝的事迹，世世代代忠于建文帝。

建文初，郑榛曾任职于云南刺史府上。建文三年（1401），他迎娶了朱标的二女儿、朱允炆的亲妹妹朱璆娘，成为皇家郡马。“靖难事变”发生后，秘密举家迁往福建翔凤里（今厦门市翔安区），先居山头仔村，后迁郑坂村，认先徙居郑坂村的远房宗亲郑安德为长兄，自称二弟，并将名字改作郑安升，以掩人耳目。

郑洽次子名叫郑松。“靖难事变”发生后，为掩护建文帝的大队人马南撤浙江、福建，率部在江阴阻击燕军，不幸阵亡，草草埋葬。事隔多年，缓过劲来的大哥郑榛，才赴江阴，偷偷将二弟的骸骨运回福建，易名而葬。这些史事均记载于郑坂村《郑氏宗谱》中：“郑公安治，生于皇明洪武辛未年九月初七日申时，幼居帝都学文习武，文武双全。皇明永乐乙丑年七月十一日，在江阴护卫建文帝时阵亡，孝继男郑秉华。”

宁德市建文帝研究小组认为，真正到福建宁德郑岐村迁居，成为郑岐村郑氏与云南蒙自郑营村郑氏先祖的应该是郑洽的小儿子郑栈（化名郑钱）。这个郑栈才真正是跟随父亲郑洽（化名郑三合、郑岐）终身追随建文帝尽忠的人。他与父亲先后隐居于上金贝山脚下的濂坑、井上、郑岐等村。其墓葬就在郑岐村门犬山地方，与上金贝建文帝陵遥遥相望，替帝陵看守东南门户。

至此，建文帝二十二名从亡大臣之一郑洽下落之谜的探索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尾 声

3 月 23 日，浙江浦江郑义门——“江南第一家”内一片喜庆。在热烈的掌声中，经郑义门宗亲会确认，福建宁德蕉城区郑岐村郑氏宗亲会会长郑成意率领几位宗亲代表，在《归宗金禧书》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失散 600 多年的裔孙来认祖了，同时，也意味着“失踪”600 多年的浙江浦江郑义门八世祖郑洽终于归宗了。

浦江郑氏原以八世义字二十六兄弟分号，凡在宗祠祭祖时敲钟二十六下，再行祭礼，后因二十六少弟郑洽随帝出奔，不知所踪，遂只能敲二十五下。然郑氏族人于心不甘，故在敲二十五下之后，复敲半下，以示郑洽随帝出奔之举尚在延续，终有出头之日。果不其然，这一等待了 600 年的钟声终于在 2010 年 3 月 23 日这一天敲响了是完完整整的二十六下。

浙江浦江郑义门的人沸腾了，福建宁德郑岐村的宗亲代表沸腾了，韩国郑氏宗亲参拜团的代表沸腾了。

宁德市建文帝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高兴地对记者说：“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他认为，此举意义十分重大，它为建文帝出亡宁德长眠金贝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把建文帝下落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作者单位：宁德市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

上金贝古墓为何被众多到访的专家学者确认为明建文帝陵

王道亨

2008 年初春，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被辟为宁德市与蕉城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由市委组织部牵头扶建。村民在修建登山道时，在金鄗寺左下方山包上发现了一座奇特的古墓葬，遂向时任蕉城区区长的陈宗森作了报告。陈区长当即赶赴现场考察，敏感的他，当即感觉此墓不同寻常，遂向挂点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民生作了专题汇报。郑民生部长听完汇报后，当即赶赴现场，作了踏勘。颇具慧眼与文化底蕴的他，顿感这是个重大发现，里面似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但自己又说不出来。他当即拿起手机拨通了市博物馆馆长钟亮的电话……

于是，便有了 2008 年 2 月 6 日省博物院研究员王振镛的“上金贝古墓有可能是失踪了 600 多年的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的陵寝”问题的提出；便有了 2008 年 3 月中旬中共宁德市委机关报《闽东日报》刊载的关于上金贝古墓谜团的系列文章的问世；便有了“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应运而生；便有了紧锣密鼓的建文帝踪迹的探索与研究活动；便有了 230 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上金贝之行；便有了国际国内 300 多家报刊、杂志、电视台多年来连续不

断的对此事的报道与宣传。

那么，这座古墓墓主到底是谁呢？

随着《闽东日报》点燃的一把火，各种传媒上传递的见解纷纷出来了，有持墓主是太监说的，有持墓主是僧人说的，亦有持墓主是皇帝说的。

一时间，热闹非凡。

由市直机关处、科级干部发起并组成的“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成员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该墓及墓主人问题展开了全方位地、系统地、广泛地考证与研究。

实际上，“太监说”由来已久，一是来自上金贝及周边村庄的村民口口相传，二是来自省文物管理部门。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省文物管理部门曾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过一次文物摸底普查活动。当时就已涉及这座古墓。由于他们只开展了一些一般性咨询，未作深入调查，结果就把这座古墓当作“太监墓”登记上报，编入普查资料。

根据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深入细致的调查显示，就“太监说”来讲，就存在三种不同版本。第一种版本是，墓主金太监是奉明成祖朱棣之命送御赐匾额到支提华藏寺，途经上金贝病重而亡，就地埋葬。第二种版本是，墓主金太监是奉明成祖朱棣之命送千尊铁佛、御制袈裟与青花瓷器到支提寺。结果金太监私自窃据了袈裟，并逃到金鄁寺出家为僧。明成祖知悉后，派兵到金鄁寺捉拿他。于是，金太监便东躲西藏。待到明成祖找到他时，人已病死，并已下葬金鄁山中。于是朱棣便派人将其坟墓捣毁。第三种版本是，墓主金太监是奉明成祖朱棣之命送御赐品到支提寺，返程时因病住在金鄁寺治疗，因和尚治好了他的病，他便出家当了和尚。明成祖误听密报，说他聚众谋反，便派兵到金鄁寺捉住了他，并判了个斩立决。之后，皇帝发现是杀错了人。于是，就赐他金头银脖子，重新厚葬。还在福建宁德至南京的一路上，为这个所谓的“金太监”造了 36 座与上金贝一模一样的坟墓。

亲爱的读者，当您读了关于墓主“金太监”的种种奇特经历与死因的三个

版本的民间传说之后，不知有否悟出了点什么?

听听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分析吧。

第一种说法的破绽是：1. 奉旨送御赐匾额到支提寺的是太监周觉成，而不是“金太监”；2. 太监周觉成先是奉旨督建支提寺，后是奉旨督办闽东银场，并未到金鄁寺出家；3. 周觉成死于明宣德年间，而不是明永乐年间；4. 周觉成的墓葬在柘荣县黄柏乡天星寺后山，不在金鄁山上。其墓十分简陋，与豪华无比的“金太监”墓根本无法相比。清乾隆版《宁德县志》、清崔嵸撰《支提山图志》、民国版《周墩区志》、民国版《霞浦县志》、新编《周宁县志》、新编《柘荣县志》均记载了周觉成其人其事。

第二种说法的破绽是：1. 奉旨送千尊铁佛、御制袈裟与青花瓷器到支提寺的是明永乐朝的太监郑和与明万历朝的几个太监，而不是永乐朝的“金太监”；2. 终永乐一朝，太监郑和都在忙于六下西洋，哪来“出过家为僧”之说。明万历朝的几个奉命送御赐品的太监也没有一个去出家的。只有一个大迁和尚，他本来就是北京城里的和尚，不存在后来出家问题；3. 郑和死于宣德年间，并非死于永乐年间; 4. 郑和墓葬在江苏省江宁县,并非在福建省宁德县(今蕉城区); 5. 至于明万历间的几个太监那就更不用说了。明谢肇淛撰《长溪琐语》、清乾隆版《宁德县志》、清崔嵸撰《支提山图志》与《支提寺家谱》均记载了郑和与这些太监的史事。还有，支提寺至今尚存郑和送的 947 尊铁佛和记载着郑和到支提寺史事的明代木刻《支提寺全图》等两件物证。

第三种说法的破绽是：1. 查遍国家正史与闽东的地方志，也找不出曾经有个姓“金”的太监奉旨送御赐品到宁德支提寺的史实记载：2. 永乐年间的确有个姓“金”的太监，名叫金英，官至南京留守太监（正二品），但他从未到过福建，且其墓葬在南京，而不在宁德；3. 金英是永乐亲信太监，不可能被巫杀；4. 金英的结局身份仍是太监，并非和尚。关于这个金太监的详细资料，读者可以查阅王春瑜著的《明朝的宦官》一书。

综合分析三个版本，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1.“金太监”是个“影

子太监”，实无其人，他的真实身份在当时应是十分隐秘，他应是朝廷与官府十分忌讳提到的人。2.“金太监”一定来自京城南京。3.“金太监”随身携带一件御制袈裟。4.“金太监”曾经出家当过和尚，具有僧人身份。5.“金太监”曾经聚众谋反，是当时朝廷（永乐朝）追捕的对像。6.“金太监”没有被朝廷捉到，他是病死的。7.他在金鄁山上的陵寝应是从亡大臣所建。陵寝曾经被朝廷与官府发现并被捣毁过。8.后来的朝廷与官府又为他修建或重建了陵寝。

研究小组认为，以上分析只是就事论事，立足于三个传说版本而言。但就从以上8点看，这个“金太监”就是明建文帝朱允炆的影子。就像600年来宁德民间一直在流传的“洪武帝”“罗隐帝”是建文帝的影子一样。

从上述这个角度来看“太监说”，实际上，它就等同于“皇帝说”，说的是同一个人。

而“僧人说”明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僧人只能建塔，不能造“墓”，亦不能建拜亭。而这座呈风字形的古墓，采用的明显是明代的龙椅造型。这种明代的龙椅，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家族与文物收藏家那里是可以找到比对物的。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陈家华先生在上金贝建文帝陵考察时就曾对笔者说过，他福州老家就有四张这样的明代龙椅。

实际上，除了上面三个版本的传说之外，上金贝山脚下的六都、七都、八都村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这个姓“金”的太监原来住在山脚下的“金厝里”（在今八都镇红门里一带），后来因谋反被朝廷贬到支提寺里当和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被转移到金贝寺来了。1993年版的《周宁县志》记载了这位“金太监”在支提寺期间积德行善的事迹。

六都村的群众还告诉笔者，上金贝古墓面前的小溪流原来比较宽阔，后来因山洪暴发，变窄了。人们习惯上都称它为“金水河”，桥上原有5座“金水桥”，4座被洪水冲走了，如今只剩下最上面那座。

周边的群众还说，正是因为八都“金厝里”出了个“金太监”，所以，蕉城区金涵畲族乡周边便出现了一系列以“金”字打头的地名；上金贝、下金贝、

金仙山、金溪、金涵、金舆岭（皇帝坐轿子从该岭经过）、金鳌河、金鳌渡、金鳌境、金字峰、金蛇头、大金门……

随着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的深入开展，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小组找到了“潜鳞沼”古碑刻的另一半，拼接之后的碑刻题字为；中间刻写着大号“潜鳞沼”三字，左上角刻写着小号“绍定甲子岁”五字，右下角刻写着“住山沧海作”五字。对碑刻的正确解读是：“潜鳞沼”碑刻立于“绍定戊子岁”，也就是南宋绍定元年（1228），立碑人是当山住持沧海和尚。此时距《三山志》成书约36年。也就是说，这个沧海和尚应该就是当时的“金鹊院”住持。

而观该碑刻的字体和书写风格与金鹊寺后蒙泉井后石壁上的摩崖石刻的字体和书写风格极其相似，只是落款稍有不同，前者有帝号与纪年，后者无帝号与纪年。

很显然，两碑刻不是同一人所作。后者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不然，为何不留纪年与帝号？

“潜鳞沼”的断碑重合意味着被人为隔断的历史即将得以重续。同时，它还带出了一个重要发现：也就是说，在宋、元、明三个朝代，在金鹊寺（院）分别有三个法号皆曰“沧海”的高僧卓锡在彼。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那样只有元代止云沧海一人。因而，把上金贝古墓推断为是元代金鹊寺住持止云沧海墓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正因这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们，不理睬“僧人说”者的鼓捣，认准“皇帝说”，毫不动摇地一路走下去。

研究小组通过对上金贝古墓的规制、格局、构件，构件纹饰，墓主的宗教信仰与舍利塔正面的二十字碑刻等六个方面的研究，为证明古墓确系明建文皇帝朱允炆的陵寝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首先，从古墓的规制来看，它呈现出三大特点：其一，它沿袭了历代帝王的五级墓埕制。其二，它沿袭了朱元璋的明孝陵与朱标的明东陵的宝山明楼制（可以说是一座缩小了的明孝陵或明东陵）。其三，它具备着亦僧亦俗，僧俗兼备的奇特规制。

该墓葬在规制上所体现的这三大特点，说明墓主是个明初之人，是个与皇家有关系的人，亦是个出家之人。

这些，与建文帝朱允炆的身份十分吻合。

其次，从古墓的格局来看，它亦体现了三大特点：其一，墓地若用罗盘定位，你会发现，古墓在格局上是坐离卦，离卦属火，建文帝五行属火，墓主的五行与墓葬的五行相匹配（俗称“相合”“合局”），预示墓主的来生会大吉大利，大富大贵。其二，从古墓的朝向上看，古墓坐癸向丁，水出巽口，竟然与北京的十三陵之一的明长陵（永乐皇帝陵墓）采取相同的坐向。且与上金贝南山（古墓所在山）的祖山鹫峰山脉与宗山霍童山脉的出水保持相同的方向。其三，从古墓的朝山与靠山来看，该墓葬虽然明堂不舒，但前山墓塔岗为“一案朝天”，背后八仙顶为“一柱擎天”，如此的冲天大格局，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承受得起的，非帝王莫属。

再次，古墓在构件组成方面亦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凡是显性构件，一律呈现为“王”的规格，比如拜亭，无角龙（闭嘴龙）等，给人的感觉是，这只是一座享有明代“王”的规格的墓葬。其二，凡是隐性构件，如舍利塔、圈椅（龙椅）状主陵、五级墓埕、舍利塔前的“步步高（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金銮殿上皇帝宝座前的三级台阶）等，均显示了墓葬享有明代的“帝”的规格。

这种矛盾现像反映了造墓者的一种矛盾心理。

再往细微处看，古墓舍利塔的塔刹是由5块块石组成的，中间的须弥座是由9块块石组成的，底下的莲花座亦是由9块块石组成的。此外，圈椅（龙椅）的靠背，是用9层的块石砌起来的；而舍利塔的基台（即第五级墓埕），亦是用5层的块石砌起来的。如果再加上墓埕之间的9级台阶与5级台阶，恰好构成了三组“九五”术数。造墓者这种匠心独具的做法，其目的是向世人昭示，埋在这儿的墓主人不是个单纯的僧人，他曾经是个“九五”之尊。

古墓的两尊“闭嘴龙”龙头两边的纹饰，一为祥云，一为波浪。祥云者，暗蕴“飞龙在天”（八卦里乾卦卦辞）；波浪者，暗蕴“潜龙在渊”（八卦里

坤卦卦辞）。此构件学术名称叫“墓手”（即椅子的扶手）。按《易经》里“天”为“乾”，“地”为“坤”的说法，此构件要告诉世人的一句话是；墓主生前曾经是个“手握乾坤”之人。

墓手中段的龙身之后不见尾巴，此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八卦里兑卦的卦辞）。此构件要告诉世人的一句话是：墓主同时又是一个隐士（隐居之人）。

复从古墓的构件纹饰来看，亦为研究者断代提供了依据。其一，舍利塔须弥座上的菱形图案与莲花座上的如意云图案，与南京明故宫与明孝陵、明东陵内的石构件纹饰图案一模一样，此亦有力证明古墓应为明初建筑物。其二，古墓两边墓手顶端的龙嘴采用圣旨封口的造型，此为典型的明初皇朝龙的特殊造型。它亦证明了古墓系明初的建筑物。因为，明初由于元代蒙古族统治中原，这一时期龙的造型揉进了草原文化的特点，龙嘴上唇尖而翘，并且长于下唇，龙纹发展趋势则变成龙头硕大，额部隆起，大目圆睁，双角后扬，龙颈较细，龙身较粗。明初的龙多为闭嘴龙（源自朱元璋“闭嘴做皇帝”的政治理念），龙口前有火焰珠，龙鼻端多被处理成“如意形”，以强化其吉祥意义。明永乐以后，龙体变粗，张嘴伸舌，上腭高突，五趾鹰爪，俗称“风车爪”。

再从墓主的宗教信仰来看，亦显现了两大特点。第一，墓顶的火轮珠。这是藏传佛教的典型标志。它的准确名称是藏传佛教七宝中的轮宝。同时，它也是拜火教——明教的典型标志。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信奉藏传佛教，也崇拜火神祝融。他加入过明教，是拜火教徒。他相信用南方之火（大明）可克死北方之水（北元）。故崇尚以火立国。而朱元璋这一立国理念与宗教信仰在这座古墓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第二，舍利塔底下的莲花座。这既是藏传佛教的典型标志，同时也是明教的标志性信物。因为明教十分崇尚白莲花。有专家学者指出，莲花座在明朝是不能随便用的，只有朱家王朝的龙子龙孙死后才能享用。这是一项殊荣。

上述这一现像向世人昭示：墓主的宗教信仰与明太祖朱元璋是一脉相承的。墓主是朱家王朝的龙子龙孙。

最后，从古墓舍利塔正面20字碑文来看，显现了一大特点：欲言又止，藏头露尾；一语双关，巧妙设局。

该古墓舍利塔背面的20字碑文已被神秘铲去。上面究竟写些什么？是何人把它铲去？为什么铲去？这已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而古墓舍利塔正面却留下了令人费解的20字碑文“御赐金襕福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这20个字是原有的，还是像塔后碑刻一样被铲去后再刻上去的？后人亦不得而知。

但不管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外来与当地的专家、学者对此还是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

关于舍利塔下面的“御赐金襕福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这20字碑刻，困扰了研究小组整整八年时间，直至2016年6月才彻底破解。一是“金襕”不能当“袈裟”解，应作“龙袍”解。二是“第三代”是个双关语，起承上启下之作用，不能单纯放在前半句，也不能单纯放在后半句。这20字碑刻的正确解读应该是：（这座塔的主人是）一个得到皇帝御赐龙袍（暗指“皇位”）的而且是这位皇帝（即“福日圆明大师”，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曾追封他为“福日圆明大师”）的第三代（皇太孙）；同时也是（山上那座寺庙的）第三代沧海（法号）和尚的塔。前人在20字碑刻上设了一个局，跟后人与今人玩了一场文字游戏。他们巧妙地利用了金贝寺在三个不同的朝代，分别有过3个法号均为沧海的住持和尚这个历史的巧合，在这里给人们设了一个哑谜，困扰了人们600年。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在宋绍定元年（1228年）前后，有一位法号为沧海的住持和尚卓锡在彼（此虽无文字记载，但却有“潜鳞沼”碑刻为证）。在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又有一位法号为沧海的住持和尚卓锡在彼（有明嘉靖版《宁德县志》、万历版《宁德县志》为据）。在明永乐十六至二十一年间（1418-1423年），金贝寺又来了一位法号为沧海的住持和尚（有金贝寺内的“蒙泉”摩崖石刻为据）。这第三位（第三代）沧海和尚在寺内留下了“蒙泉”手书，却不书帝号、纪年，似有难言之隐。但若把此人

与“蒙泉”石刻以及寺庙下方的舍利塔正面的20字碑刻之内容作一联系，两碑似意在互文与互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金贝古墓被认定为明朝第二个皇帝的陵寝应是确切无疑的。

众多的专家学者或撰写专著，或发表文章，或为帝陵题匾，支持了研究小组的上述观点。著名明史专家、原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潘群先生首先站出来支持研究小组的观点。国际建文帝踪迹研究权威学者、日本关西大学校长阪仓笃秀先生在考察完上金贝帝陵后，回到日本遂发表声明，支持研究小组的观点。原中国古建筑研究所所长俞正声教授从考古学角度，确认古墓为明初建筑。著名明史专家、南京凤凰出版传媒编审马渭源先生先后出版了《大明帝国・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破解600年第一谜案》两部专著，支持了研究小组的上述观点。著名郑和研究专家、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郑自海先生亦先后撰写了《从朱元璋“闭嘴”作皇帝——试论闭嘴龙造型为明初皇家的规制》等多篇文章，支持了研究小组的上述观点。著名明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原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先生在上金贝留书“龙隐宁川”四字，并勒石留迹，以示对此事的支持。明史爱好者、贵州红崖天书破译专家、上海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林国恩先生亦出专著支持了研究小组的上述观点。宁德师院副教授、博士生孙绍旭在《史林》杂志上撰写《建文帝出亡宁德考》专文，支持了研究小组的观点。明史爱好者、中共宁德市委副书记唐颐亦在《宁德通讯》《福建文学》上发表了《600年的眺望》一文，支持和肯定了研究小组的上述观点。潘群先生还挥毫为上金贝建文帝陵题写了“明建文帝陵”匾额。明史爱好者、原福建省副省长潘心诚先生亦挥毫为上金贝建文帝陵题写了“明二陵”匾额。支持了研究小组的上述观点。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

支提寺珍藏的五爪金龙袈裟被确认为明初御用品

王小妹

宁德支提寺珍藏的五爪金龙袈裟为什么被众多到访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确认为明初的御用品?

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说一说什么是“袈裟”。

袈裟本是印度梵文的音译词，意译为“不正色”“坏色”等，本意为颜色的不纯正。久而久之，逐渐演变为法衣的代称。通常有大、中、小三件，合称“三衣”。大者称“九条”，红色；中者称“七条”，紫色；小者称“五条”，黄色。据《支提寺家谱》记载，明万历皇帝赐给支提寺的凤锦条紫衣即属此类中的“七条”之列。而不是清崔徙所撰《支提寺图志》中所载的“五爪金龙紫衣袈裟”。《支提寺图志》记载明显有误，应予更正。而此类条衣中，当属“九条”袈裟最为尊贵，一般是知名高僧做法事时才能穿。常被捧为佛门至宝。

所谓“大红大紫”一词，即典出此处。

纵观历朝历代，皇帝赐给高僧的袈裟，从来就没有“五爪金龙”绣纹的。所以说，《支提寺图志》记载明显失实，不能引以为据。

其次，议一议袈裟的原始主人到底是谁?

近距离观察支提寺五爪金龙云锦袈裟（不是紫衣袈裟），它是由近百片各种颜色的云锦面料拼制而成的，可称之为“百条”（意为“吃百家饭”）。其基本样式是按古代和尚穿的“百衲衣”缝制而成的。而不是按“九条”“七条”“五条”的样式缝制的。和尚之所以谦称自己为“衲子”“老衲”，即典出此处。

据佛经记载，百衲衣也称“纳衣”，为僧尼的苦行之物。“衲”字本作“纳”，为缝制之意。大家知道，布鞋的“千层底”是怎么制成的吗？它是“纳”成的，闽东方言称“纳鞋底”。因为这种衣服是由许多别人丢弃的旧布片与布条拾掇缝制而成的，故称“百衲衣”。

笔者认为，支提寺云锦袈裟从衣服式样与缝制技术角度来讲，它就是佛门袈裟与百衲衣二者兼而有之的特殊产物。你说它是单纯的袈裟吗？可它并不是按“九条”“七条”“五条”的规制来缝制的？你说它是单纯的百衲衣吗？可它的总体外形结构式样却又不同于百衲衣，而类似袈裟。总之，是二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角度去揣摩袈裟的最初拥有者必定是个不凡之人，必定有一个不凡的经历，而且必定是个既当过和尚又当过乞丐（游方僧、苦行僧）之人。

再次，从袈裟的主题图饰来看，其中所反映的全是非出世内涵，如“五龙”“九蟒”“吉祥结”“如意云”……此表明袈裟主人应为“九五之尊”。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哪一个人既当过和尚，又当过乞丐，最后还登上“九五”之位？此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如果笔者没猜错的话，朱元璋制作这件袈裟的真实用意是为了纪念自己一生的特殊的、非凡的经历。

袈裟的非出世内涵与时代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袈裟上的八吉祥纹样图饰特征说明袈裟应为明初之物。根据杨鸿姣的《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图饰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变化》一文记载：“法轮在元代是花轮，到了明初演变成八辐轮或六辐轮，法螺在明初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尤其是对尾部旋进的内部结构的表现；宝伞在明初以继承元代风格的捆住型居多，但相对于元代则更加华丽，较突出流苏和帷幔；明初莲花花瓣排列较为密集，装饰性增加；一对金鱼呈对称式布局等等。”“吉祥结在永乐时期还保留元代的上下成尖状特征，宣德时期则演变为上下各有一结的形制，这一形制被后世所承袭，成为吉祥结的固定样式，直至现代的中国结也与此一脉相承。此外，在汉地八吉祥图形中，飘带自永乐时期开始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根据这两段文字记述，对照袈裟中的八吉祥纹样图饰特征，放大镜下，我们发现袈裟中的法轮是六辐轮，法螺尾部旋进结构刻画细腻、形像，流苏与帷幔装饰下的宝伞正被捆着，起着点缀作用的飘带自然流畅……而明中叶后的八吉祥纹样图饰则完全不同，如宝伞即为撑开状。

徐仲杰著《南京云锦史》一书，支持了上述观点。

著名明史专家、南京大学教授潘群作序，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编审马渭源先生新著《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对此袈裟作过专门研究与考证，并支持了上述观点。

由此，我们认定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为明初之物，该袈裟的主人应为明初之人。

第二，按理说，袈裟是出家人的法衣，即使再高档的袈裟也应是佛家之物，其纹样图饰所绘内容应完全以佛教主题为主，其位置应在十分显眼的地方。而支提寺珍藏之五爪金龙袈裟则完全不是如此，袈裟中的八吉祥纹样图饰、卐字符纹样图饰等能反映佛教题材的纹样图饰所占据的面积不到整件袈裟的1/20，在袈裟中完全居于不显眼的位置。这一反常现像说明了袈裟的纹样图饰所要表现的主题应该是以非出世内涵为主的，该袈裟的主人应该不是个纯粹的和尚，身份应该很特别，应该是个先当和尚后还俗之人。

第三，相反，这件袈裟的纹样图饰所绘的内容全是大大小小的、形态各异的龙，有行龙，有团龙。在这些龙中间，间隔性地排列着许多绘有9蟒纹样图饰的长条云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袈裟的正上方与正中位置上，分布着9条五爪龙与5条五爪龙。这一“九五”之数与龙饰主题的出现，说明这件袈裟的拥有者应是皇帝无疑，而且应是明初的某位皇帝。

第四，再看袈裟的左边与右边的长条云锦上，皆为云龙纹样图饰，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这件袈裟与大明皇家有关。因为根据《明史》记载，大明帝国能够享用云龙纹样图饰舆服的只有四个人：皇帝、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而由上可见，袈裟当为皇帝之物。

第五，同样，袈裟底边的二十二盏宫灯纹样图饰中，绣有“福寿”字样。而据《明史》记载，大明帝国能够享用“福寿”纹样图饰的只有两人：皇帝与皇后。而由上可见，袈裟当为皇帝之物。

第六，从云锦材料角度考究，南京云锦的最大特点是大量用金，而支提寺这件袈裟的用金量是十分惊人的，从摄像机与照相机镜头中望去，整件袈裟金

光闪闪，而肉眼看去，却无此感觉，真乃宝物也，它不像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龙袍，仅仅胸前团龙部分用金，其余均白地。全部用金线与孔雀羽织出的云锦，是云锦精品中的精品，支提寺云锦袈裟正是这样一件精品。

第七，从云锦织造技术的角度考究，支提寺这件云锦袈裟使用了缂丝（即刻丝）技术。该技术源于宋代，来自西域的波斯诸国，盛于元代，直到明初的永乐年间，还有关于该织物的记载。葛寅亮的《金陵梵刹志·钦录集》云；明永乐二十年十月初六日，“上（指朱棣）御奉天门，赐僧道官宴，天下众僧亦在丹墀。宴毕，先赐一如（僧名）刻丝观音菩萨。”这则史料弥足珍贵，它既说明了明初还存在刻丝技术及实物，又说明了它已成为御用品与御赐品。同时，这则史料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刻丝技术与实物的最后的记载。因为到了明中期，这一技术已经失传，这种实物实在难见到。这一点从南京云锦权威专家徐仲杰先生的名著《南京云锦史》中的记载即可明了。在书中，徐先生告诉我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是采用本色暗花与妆花两种技术相结合织造而成的。而宁德支提寺的云锦袈裟采用的则是元末明初流行的“纳石失”织金锦技术织造而成的。两者织法完全不同。所以，袈裟当为明初之物。

第八，2009 年 6、7 月间，《福建日报网》《扬子晚报网》等媒体相继报道了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室主任、云锦研究专家张洪宝先生对送到该所要求复制的这件袈裟的鉴定意见：“这件袈裟应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很可能就是建文帝携带出宫的那件东西。”

鉴于以上八条，因此，笔者认定支提寺这件五爪金龙袈裟即是许多明史资料中所记载的，朱元璋放在铁匣之中，后来被朱允炆携带出宫的那件袈裟，别解法门。

此外，若细察袈裟底部裙摆上的那二十二盏宫灯以及绣在上面的文字，亦大有文章。宫灯绣在膝盖以下意为袈裟制作时朱元璋“膝下有二十二个儿子”；宫灯上是一个“福”字重在八个“寿”字之上，此既暗含朱元璋小名“重八”

之意，又暗喻“重八有福且多寿”。这一点，非常符合《明实录》《明史》中描绘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再次印证了笔者的上述推断“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应为明初皇家之物”。

作者单位：闽东技师学院

明初的大京城堡及其四批移民

王道亨

（一）大京城堡的现状

大京，明代以前称大金，明初改称大京（意为“代替京城的地方”）。其地处霞浦县东南海滨，距县城约 40 公里，今属长春镇管辖。

始建于明初的大京城堡，周长 2815 米，东、西、南各辟 1 门，南门命名为“南金门”（命名源自南京明孝陵的“南金门”）。城墙高 6.5 米至 7 米不等，宽 3.6 米，为乱毛石砌筑。城内一条卵石砌就的主街道，全长 1200 米。

由于大京城堡保存较完善，1991 年时，被列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大京城堡的来历

明洪武元年（1368 年），洪武帝朱元璋遣大将汤和、胡廷美（又名胡廷瑞），分别从水路与陆路，进攻福建。信国公汤和率水军走水路，取道浙江，经浙南、闽东，攻向福州。预章侯胡廷美率陆军走陆路，取道江西，经赣南、闽西攻向福州。攻下福州及周边州、县后，胡廷美奉旨镇守福建（其后裔现定居福州市连江县江南乡儒阳村）。而汤和则奉旨班师回朝。他在途经福宁州（其时仍为

州）大京寨堡时，觉得彼处堪为战略要地，遂留下一队人马（约一百一十人），由一百户长率领，驻守屯田。这一批屯军户，即是福建沿海卫所城最早的原住民，亦是大京寨堡的第一批移民。这批驻守大京寨堡的屯军户共编成十甲，每甲十户，均为军户。

现在仍生活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的戴姓村民、曾姓村民，即是这批屯军户的后裔。

洪武十九年（1386 年），倭寇开始骚扰东南沿海。洪武二十年（1387 年），太祖朱元璋命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海疆，加强海边防建设，抗击倭寇。周德兴采取三丁抽一的办法，征集民兵 10 万人，军士 1.5 万人。在福建沿海建起了 16 座卫所城，设置了 45 处巡检司，强化了海边防建设。

与汤和一样，颇具慧眼的周德兴，也看到了大京寨堡的军事价值，遂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大京寨堡扩建成了大京城堡。周德兴模仿南京城的格局，在城堡四角挖了 4 口镇城井，井呈八角（源自南京城的“八角井”）。同时，还在主街东、南、西、北建了 4 座角亭（俗称“街亭”），分别命名为天地亭、迎恩亭、巷里亭、舱口亭。同时，在迎海处的南金门内设一瓮城，后山设一水关，并在城堡西南面城墙外挖了一条护城河，以提高城堡的防卫功能。

与此同时，大京城堡的人口亦由百户增至千户。这是大京城堡的第二批移民。那儿的大片土地被这批移民开垦出来了，屯军户将多余的土地租给周边的农户耕种，从而导致了周边人口的增加。

现在仍生活在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及其周边的黄姓、张姓、陈姓、李姓、林姓村民，即是这批屯军户的后裔。

（三）大京城堡的沿革与演变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太祖朱元璋又命信国公汤和巡视闽、粤，筑城增兵。在福建沿海置福宁、镇东、平海、永宁、定海（一说镇海）5 个卫指挥使司。这一举措，使当时的福宁县城（今霞浦县城）一下子又变得繁华起来，

人口一下子又增加好几倍。因为一个卫（相当于现在一个师）一级的军事机构的进驻，与当初设立州一级的行政机构给地方带来繁华景像的作用是一样的。

以上史实详细记载在《明史》卷132第3861—3862页，以及明嘉靖版《福宁州志》、万历版《福宁州志》与清乾隆版《福宁府志》中。

可是令人十分诧异的是，笔者在民国版《霞浦县志》中，却读到了下面这一段话；“镇署相传为都指挥使司衙门”。都指挥使司是当时省一级的军事指挥机构，它何时移驻福宁（今霞浦）县城？查阅省、市各种典籍，均无此记载，不知何故？多年来，人们一直无法解开这个谜团。

无独有偶，大京及其周边乡村，六百年来一直沿袭着一种奇怪的拜神传统——尊崇威灵公信仰。而威灵公是省一级的城隍爷，为何被请到大京这个小城堡来供奉呢？

走访乡村民众，回答是一个样的；我们大京城堡的城隍爷是皇帝赐封的，规格比县城隍、府城隍都要高。问是哪个皇帝封的，有的回答说是“洪武帝”封的，有的回答说是“罗隐帝”封的。乡民、村民还说，当年“洪武帝”曾到过大京城，还喝过城堡里东南方向那口水井里的水。所以祖辈人都把那口水井称作“皇帝井”。

大京村这一特异的拜神现像，不由得使笔者想起了前几年在开展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时，了解到的蕉城区八都镇漈山村村民在山上建城隍庙供奉威灵公——省城隍的现像。按照正常的习俗，省、州、县城隍庙应建在省、州、县城城门口，怎么能建到山上去呢？漈山村村民还煞有其事地告诉笔者；我们这儿的城隍是“洪武帝”封的，规格很高，管闽、粤、赣三省。

两地的特异拜神习俗，异曲同工。

为什么闽东各地与这两处一样，到处都在流传着“洪武帝”当年曾到过福宁地区。所有典籍都证明，洪武帝朱元璋没到过闽东，这是不争的史实。故，这里人们所说的“洪武帝”，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建文帝，而不是“洪武帝”。因为只有建文帝朱允炆到过福宁地区。理由是，永乐帝上台后，把建文

帝的年号、帝号给取消了。建文朝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皇朝，建文帝也就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皇帝。建文一年、二年、三年、四年被朱棣改成了“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朱棣做的这种荒唐事，说具体一点，实质就是“一个死皇帝，却占有了活纪年”。史学家戏称其为“后洪武时代”。这一极其荒唐的行为却被继任的历代明朝皇帝捧为金科玉律，延续了几百年，直到清乾隆四十年，才得到平反与恢复。这一历史现状造成了闽东人长期以来只知有“洪武帝”，不知有建文帝，可悲！可叹！人们把建文帝在闽东的所有经历，做的所有事情，都说成是“洪武帝”干的。

要想了解这一切，请大家去看一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县分卷》这本书就都明白了。这本书不是我们研究小组编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霞浦县宣传、文化部门编的。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几年来的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表明，霞浦大京极有可能就是建文帝入闽的第一站。在建文帝入闽之前，应该还有两拨建文军提前到达福宁地界（另文阐述）。按军师郑洽的原计划，是想把大京城堡扩建为“陪都”（建文帝的“行在”）。“大京”的“大”字可谐音为“代”字，“大京”即可释为“代京”（代替京城）的意思。只是由于郑和与尉迟子良的十万楼船水军来得太快了，“代京”还没建好，建文帝的五军都督余六府（化名）由江苏太仓带过来的六万水军就被击败了。建文帝只好经三都澳仓皇向宁德（今蕉城区）四都、五都、六都、七都、八都（今漳湾镇、七都镇、八都镇、金涵乡）一带撤退了。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民国版《霞浦县志》中的记述就不足为奇了。建文帝大军南撤，想必在福宁县城（今霞浦县城）征用原福宁卫指挥使司衙门，把其作为先行到达的新成立的由小马国舅坐镇的福建行都指挥使司衙门（俗称“镇使衙门”）。因为在朱棣眼里，建文朝是一个不存在的王朝，那么，建文朝的官方机构自然也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机构。而由朱棣继承人把持下的朝廷与官府控制的史书与志书是不会去记载这一史实的。

民国版《霞浦县志》的作者不经意间，把这一重要的历史信息保存了下来，把重大的秘密透露了出来，从而给了后人以莫大的启迪。

读者如果有心，把这一历史信息与霞浦县宣传、文化部门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分卷》中所收录的民间传说作个互勘，很快就恍然大悟了，“建文秘史”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笔者认为，现在大京村及其周边的朱姓、郑姓、黄姓、王姓、陈姓、李姓、卓姓、何姓、林姓（不同分支）、廖姓等10多个姓氏，即是跟随建文帝撤退到福宁（今闽东）地区的文臣武将的后裔。他们是明初大京的第三批移民。他们的家谱或世代相传的口碑均云：“我们都是来自南京月半池地方”或“我们都是来自南京八角井地方”说明了这一点；大京城堡北门西门尚留有“月半桥”说明了这一点；城堡内的“皇帝井”说明了这一点；而至今仍留在霞浦三沙垅头至长春大京沿海岸边的大量开采出来但却未加工成形的原计划用于筑城的巨石亦说明了这一点。

大家还可以找一找建文遗臣留下的痕迹，那儿朱姓的故居建在台地上，居高临下，房屋也比其他姓氏的住房要高大、精致。

永乐二年（1404年）起，建文军撤走，燕军陆续调防至闽东镇压“造反的和尚”（实际是以寺庙为据点的建文军余部）。大京千户所被裁撤，降格为巡检司衙门。这一点，明史却没有记载。究其原因，亦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暴露了建文帝的行踪。明史虽没记载，但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图却把这事记下来了。读者只要细心观看一下该航海图即明白了。

至今仍生活在大京村的刘姓、龚姓村民即是当年进驻大京围剿建文军的燕军的后裔，他们的家谱详细记述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明初大京的第四批移民。

而在闽东民间广泛流传的“罗隐帝”，则是隐居在福宁（今宁德）及其周边的建文朝臣编造出来的一个“影子皇帝”。“罗隐”就是建文帝的“影子”。用文字拆解法解读“罗”字的繁体字，意为“我是一个做了四年皇帝，被朱棣

横插一扛，夺走皇位的落难皇帝”，而“隐”谐音为“影”，合起来就是“皇帝影子”或“影子皇帝”。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

明中叶福建省·福宁州·宁德县人口比明初锐减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宁德

王道亨

据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的《福建历代人口论考》（P241 页）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1），全省有 49 个县，815527 户，3916806 人，每县平均户数 16990 户，每县平均人数 81600 人，每户平均人数 4.80 人。至明弘治四年（1491），全省有 53 个县，506039 户，2106060 人，每县平均户数 9548 户，每县平均人数 39737 人，每户平均人数 4.16 人”。在这百年间，福建全省的户口数锐减了 309488 户，接近一半（二分之一弱，三分之一强）；人口数锐减了 1810746 人，亦近一半（二分之一弱，三分之一强）。

据明嘉靖版《福宁州志》卷之三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福宁本州“户二万一百七十七，口五万三千一百六十。”嘉靖十一年（1532），福宁本州“户六千一百三十八，口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五”。洪武二十四年，福安县“户七千四百一十，口二万五千六百六十三”。嘉靖十一年，福安县“户七千一百一十，口二万六百三十三”。洪武二十四年，宁德县“户一万五千五百零七，口三万三千七百五十七”。嘉靖十一年，“户五千八百二十，口二万八千零六（此数字肯定有误，或有意修饰，笔者注）”。在这一百四十多年间，整个福宁州户口数锐减了 24026 户，超过一半（二分之

一强）；人口数锐减了 45566 人，接近一半（二分之一弱）。这里，户口数锐减与人口数锐减不一致的原因是明嘉靖十一年宁德县人口统计数字明显不准确，户口数与洪武二十四年比较，锐减了三分之二，而人口数与洪武二十四年比较，只锐减了五分之一。这一统计数字明显不真实，应作修正。如果是微调，应调为锐减三分之一，那就是锐减至 2.2 万人。如果是强调，应调为锐减三分之二，那就是锐减至 1.1 万人。不管作哪一种调整，都能使福宁州户口数、人口数的锐减保持一致，并与全省当时的户口、人口锐减保持一致。

查明万历版《福宁州志》所记述户口、人口数字与嘉靖版《福宁州志》所记述户口、人口数字完全一致。

关于这一期间宁德县（今蕉城区）的户数、人口数的记载，明嘉靖版《宁德县志》、明万历版《宁德县志》与清乾隆版《宁德县志》三志基本一致。以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为例进行分析。该志（P267—268 页）载："明洪武二十四年，户一万五千五百七十，口三万三千七百五十七。嘉靖十一年，户五千八百二十，口二万八千零六。万历十年，户五千六百九十二，口二万五千四百二十，辛酉（指明嘉靖四十年，笔者注）倭寇蹂践之后，继以瘟疫，故户口凋零。万历四十年，户三千八百，口二万二千一百五十五（此人口数与户口数又不一致，故此数字亦是严重失真，笔者注）。"

以上这一段文字记述明确告诉读者，明嘉靖四十年（1561）以后的宁德县的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倭患"与"连年的瘟疫"，而嘉靖四十年之前的人口锐减的原因是什么？志书的编纂者未作交代。

笔者认真查阅了一下宁德市所属的 9 县（市、区）的几十部新旧志书，未发现有什么特别重大的能造成人口锐减的，抑或大副度锐减的自然灾害。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它是人祸造成的。可是，查遍新志、旧志，这期间，只有少数地区有银矿工人与农民起义发生，可是这些地方都位于偏远的山区地带，与沿海毫无关系。而我们人口锐减的重灾区，一是福宁州（福宁县）本部（指今霞浦县与福鼎市），二是宁德县。资料显示，这两个地方是重灾区。而我们研

究小组二年来调查挖掘出来的资料也显示，永乐年间被毁的几十座寺庙与几十座山寨——建文帝用于举事的兵力的驻兵之所，正是分布于这两个区域的古官道两侧。而永乐帝朱棣分别从福宁州周边调集来的军队，就分别驻扎在这两个地区。比如，朱棣将建宁卫总兵刘邦彦的3000多人调驻柘荣（见柘荣县城关《刘氏宗谱》）就是一例。将江西吉安参将王文彬的2000多人调驻闽清负责守口也是一例（见《八闽王氏》44页）。又如，朱棣派遣心腹爱将朱能之子朱武率1万铁骑直击建文帝的护宝大军——瑞迹寺的郑熙（淪）将军的指挥部又是一例。朱棣的水军与建文帝的水军在三都澳水面发生激战也是一例。

事实证明，永乐初（应是永乐元年至五年间），在当时的福宁州（今宁德市）地域内，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事，伴随而至的是一场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的结果是，在今天宁德市的沿海几个县市的土地上，出现了大批的废村、废寨、废寺，形成了无人地带。

伴随着这些废村、废寨、废寺，在福宁境内出现了一系列十分有趣的古地名，诸如：和尚坪、尼姑坪、院前、寨后、练功坪、点将台、小登基广场村等等，不一而足。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

明永乐二年（1404年）朝廷在福宁及其周边地区的不寻常军事部署

郑冠军

明永乐初，朝廷在福宁（今宁德）地区有过不寻常的军事部署，具体表现为：

据柘荣县城关《刘氏宗谱》载："始祖刘邦颜（字维泽，号南池），明永乐元年（1403），奉旨由镇江丹徒率兵入闽，为建宁总兵。永乐二年（1404），领兵至柘荣上营、下营地方驻扎，专责抄（造反）寺僧。"

又据《闽东孙氏志》18页载："福鼎市管阳镇姚阳村孙氏是从江苏南京迁入的，先祖在浙江瑞安桐江传三代至孙寿公于明永乐二年（1404）授中军职，领军驻南平建宁右衙前，后转迁福鼎姚阳。孙寿公成为姚阳开基始祖。"

又据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八闽王氏》44页载："明永乐二年（1404），（先祖）王文彬任职江西吉安，奉命率军入闽，守闽清路口。"

又复据《八闽王氏》44页载："明洪武年间，王安由安徽庐州统军入闽，定居鼓楼区钱塘巷。生子三：王端、王敏、王宁，均袭将军职。永乐初，王宁屯兵永福赤岸，后迁赤岸前洋。"

又复据《八闽王氏》45页载："明洪武年间，王新兴由江西吉安岩头村入闽任延平卫。永乐二年（1404），随军屯田定居罗源洪洋大目。衍分松山镇小获村，分迁宁德县。"

又复据《八闽王氏》59页载："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王继成（王延政长子）十三世孙福州长乐彭坑人王氏儿（又名王知本）从戎助明兵攻克福州有功，领百户。王氏儿有三子，长兴祖，字良恩；次佛生，字良来；三良贵，字良慈。……王氏儿的次子王佛生，于明洪武二十年抽补为小旗官，先后镇守福清镇东卫、泉州永宁卫所。永乐二年（1404），奉旨屯田。其长子王子英承父官爵，领兵到安溪三洋（今属芦田）军垦。"

又复据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杜氏家谱》载："先祖杜华泗系建文朝殿前三品指挥使，于明永乐二年率军到瑞岩村屯田。后定居于此。"

又复据《八闽王氏》载：明永乐二年（1404），王胜田安徽凤阳横路下八角井随军入闽，后迁闽清二十三都橘林林洋。

据寿宁县清源乡漈头仔村《王氏家谱》载："王丽居处州丽水二十八都，其子王盛迁居浙江松阳……王盛三子王达三世孙益于明永乐二年（1404）随军

徙漈源（今寿宁县清源乡漈头仔村）”。

据长乐市罗联乡顶头村《李氏家谱》载：“始祖讳观，字建极，祖居南京宠头里棋盘街石狮巷，官居南京镇卫指挥使。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奉诏入闽。“靖难之变”后遂止于闽，娶陈氏与二世祖居焉。后抵吴航，过罗城多福岭，遇周、卓二公，见公英雄气概，止之。问所自，知为忠义良臣，结为异姓兄弟，遂于其旁以居。至五世祖仲龄公迁居今址。”

又据罗联乡洋中村古灵自然村《陈氏家谱》载：“始祖叔通公，字审享、官议徽。于永乐十二年（1414）；从（原屯军处）闽县钦仁里迁洋中。”

此外，福建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林国平先生所著《福建移民史》一书中也大量引用了福建各地家谱所载明永乐二年（1404）朝廷将福建的追剿军改驻屯军的史料。

据《福建移民史》一书 56 页载：“（张姓）石苍大妹澄塘张，入仙始祖福庵公第三子膺公第十四代孙，于明永乐二年（1404），由永泰嵩口月洲前张徙居此地，至今已有 595 年。裔衍游洋坞里张等处。”

据《福建移民史》一书 56 页载：“（谢姓）国祥公（即瑞官公），又同御史大夫阳和率师从海道平福州，功既最，受爵食禄，遂居福州之金牛桥。生长胜山公，次胜生公，三胜光公，各袭荫有差。永乐二年（1404），奉诏食屯各府县。胜山公移屯漳州（龙溪），今族姓里居，仍福州金斗号；胜光公食禄仍居在省；胜生公食屯兴化，爰择仙之万善里锦溪，而作亭其上，居室遂以‘亭下’名，而著姓亦称亭下谢云。”

又据《福建移民史》一书 57 页载：“（张姓）明永乐二年（1404），实行解甲屯田制，奉帝诏，从福州府都卫左右所调入仙游屯田的有 220 人，其中主要分布在兴太里及其他一些地方。经考证共有 6 支：（1）钟山霞厅张，入仙初祖世斌公，字文质（其父兴信公任福州后所‘百户侯’，因承授总旗，于明永乐二年（1404）拨兴化府兴太里就职），遂卜居于今钟山镇湖亭村的霞厅（亦名龟山霞厅）。裔衍卓泉村的新霞厅下厝张、顶厝张、寨尾张、后面张、塔尾

张、东溪村的柿岭张等处，人口2503人。（2）钟山梨山张，入仙初祖八哥公，于永乐二年（1404）奉帝牒屯田卜居现在钟山镇东溪乡梨山村。裔衍本村的仓前张、坑厝张，游洋五里村的湖里张等处，人口1884人。（3）西苑乡西乾张，入仙初祖关保公祖籍南京直隶府汀溪场（其父九三公在福州府都左卫所任职），于明永乐二年（1404），随屯众先卜居外源场，后卜居西乾村。裔衍凤山湄溪张、像溪北溪张，全族人口1734人。（4）钟山镇湖亭村岳后张，入仙初祖先启公，为始兴堂（曲江）九龄公派系，于明永乐二年（1404）奉帝牒偕屯众卜居于兴太里岳帝庙后的山兜，故称岳后张。裔衍本村的上岳后张、下岳后张，东溪村的宫后张、罗尾山张，麦斜村的汾水张和盖尾聚仙村的半山张等处。（5）钟山和阳张，入仙始祖安实公，讳豹佐，官指挥使。明永乐二年（1404），解甲屯田先卜居兴太张宅，因地势低洼，常遇水患，遂于明万历间迁居现天珠村和阳。裔衍本村的旧厝、新厝、石顶、下厝、中兜张和游洋和星村的白石林张等处，人口722人。（6）钟山佩厝张，入仙初祖智广公于明永乐二年（1404），随屯众卜居于现卓泉佩厝村繁衍生息，现有人口410人。”

据《福建移民史》一书67页载：“夏姓，明永乐二年（1404），由江苏定远县迁入福鼎叠石、库口、大章、南溪等地，后迁居桐山玉塘村，始祖夏章保，至今46代，发展人数约5000人。”

又据《福建移民史》一书70页载：“德化霞碧彭（氏）始祖彭闰于明永乐元年（1403）由泉州拨军迁入。”“德化隆泰凤阳曾（氏）始祖曾仁寿于永乐年间（1403-1424）由南安前训武营迁入。”“德化浔中高阳陈（氏）始祖陈治子、陈顺德于永乐年间（1403-1424）由同安县从顺里三都埔头迁入。”

又复据《福建移民史》一书77页载：“（福鼎）丹桥钟氏始祖讳舍子公，乃建宁右卫左所夏百户下军小旗，于明永乐二年（1404）同总旗邹佛保领六姓到福宁店下屯驻，为最早入迁福鼎的畲族钟姓……该派钟氏自明永乐二年（1404）入迁福鼎后，世系发祥，子孙繁衍，分迁福鼎井头、山兜、店下、格山庵、才堡岭脚、老鸦湾、油坑、龙头湾、三步榣、坑兜、坑门内、罗唇马渡、

西岐月梳洋、吴家溪等处。”

又复据《福建移民史》138 页载：“据寿宁县清源乡杨柳木臭 村的《叶氏宗谱》载，叶氏始祖贤玉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从浙江景宁巨则上村半岭徙居政和北里杨梅村（今寿宁县鳌阳镇），居数载又迁杨柳木臭村”。

又复据《福建移民史》139 页载：“刘璋，江西宜黄县指挥使，明永乐间（1403−1424）随王师入闽，遂择地于宜洋（屏南县属）而居之”。

同页载：“陈任，浙江钱塘江（今属杭州市）人，明永乐时授古田教谕，定居于此。”

又复据《福建移民史》140 页载：“雷姓移古田有二支……一支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从江西迁古田雷家村（化为罗家墩），后迁中村雷厝墩，定居梅坪、溪里厂。现在雷姓 281 户，1619 人，占全县人口 0.4‰，居住梅坪、招坑、五斗、马山头、山墩、银山、苏墩、溪里厂、东双”。

据《福建移民史》141 页载：“曾氏始祖曾孟于永乐年间（1403−1424）充官由江西新潘迁入福州洪塘。”

《福建移民史》143 页载：“莆田县，现在可以知道的迁入姓氏，从唐朝到清朝共有 124 个，其中明朝迁入者 40 个，占 32%；清朝迁入者 9 个，占 7%。其具体人数缺乏记载，说明明清时期有关外来人口迁入，尤其以明朝为较多，其中迁入者有方孝孺后裔。”

明朝名臣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后，他以不肯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杀，凡灭十族八百七十余人。据《明史》记载，方孝孺的后裔有的居住在福建。据民国初涵江史学家康其修的抄录本和涵江后度《黄氏族谱》载，方孝孺二侄迁入莆田。

康氏说：“曾阅某书，佚其名，载方孝孺之被族也，尚书魏公泽时谪为宁海典史，当捕方时，悉力保护周旋，以故方氏有遗族。谢文肃诗谓：孙技一叶者，泽之力也”泽后过孝孺故居，为诗悲悼，有云：“黄鸟向人空百啭，清猿坠泪只三声。”至今读之，犹觉鼻酸。惟莆田之方氏后裔，则他书未之及也。

“康氏又引涵江后度《方氏族谱》载：“方孝孺被磔后，妻郑氏，弟孝支亦死，子中宪、中愈先后自经，二女投秦淮河（死）。侄畏庵，名志道，知家必不免也，固存宗祀，深自晦匿。偕弟体乾，名志洲，于永乐二十年壬寅（1422），度仙霞岭，逾岭峤，潜入闽始至莆，居城东。畏庵死，体乾偕嫂黄氏，携侄安礼，购地自居桂岭”。据林祖韩先生考证：方孝孺“侄志道，志洲变姓名，辗转入闽，于永乐二十年（1422）至莆城东。方志洲则在涵江教书为生。正统九年（1444）始定居青璜山，建宗祠称“桂岭方”，即今后度之方（姓）。”大约在明末，涵江后渡方氏已衍成大族，科甲联芳。遂有方氏宗祠，方家大墓，和瑶山书院等建筑物。涵江后度“桂岭方”，成为莆田方姓三个支派中的一个。

据《云霄县志》记载，从明朝洪武八年（1375）到清同治八年（1869），外地（官民）陆续迁入云霄县有方、吴、林、陈、郑、何、罗、柳、王、黄、汤、蔡、周、唐、江、孔、罗、石、谢、施、刘、董、沉等23姓，其中明朝占18姓，清朝占5姓。

邻省名贤隐士寓居平和情况表

朝代	姓名	原籍	官职	备注
明朝	姚文蔚	浙江钱塘	太仆侍卿	
明朝	旗无德	江西清江	参政	
明朝	戴澳	浙江奉化	吏部郎中	
明朝	邱道光	广东大埔	推官	
明朝	张邦豫	浙江奉化		
明朝	古时学	广东程乡	通判	
明朝	朱完	广东南海		
明朝	侯谨度	广东程乡	知县	
明朝	张兆行	广东龙川		
明朝	何楷	浙江镇海	举人	
明朝	何槐	浙江镇海	给事中	
清朝	杨之徐	广东	进士	

又据明嘉靖朝兵部尚书胡宗宪著《筹海图编》一书卷二载："永乐二年（1404）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招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疑。"对此史实，许多史学家曾质疑。他们认为，其一，从《明成祖实录》《明史》诸书的记载来看，永乐元年至永乐四年，朱棣对日本还是实行友好政策的，不可能有东征日本之事发生。其二，如果有东征日本之事发生，十万大军出动进军海外番国，属头等大事，以上两书以及《国榷》《明史纪事本末》《东西洋考》诸书不可能不记载。其三，郑和率军出征日本，不从就近的山东、江苏或浙江的港口出发，却从福建的港口出发，不合情理。所以，许多史学家认为"此举另有隐情"。对此，江苏省文学院陈亚昌先生有专文《试论郑和下西洋与建文帝藏匿福建华藏寺》（载《南京钟山文化研究》2010 年 6 月增刊）研究。陈先生认为，这"隐情"就是朱棣与郑和搞了个"声东击西"，实际是在福建宁德用兵。从而把明朝的许多人包括胡宗宪给瞒住了。至此，又制造出了一个历史疑案。而查谈迁《国榷》卷 13 中，确有朱棣下旨福建造船事，该书 902 页载："辛巳，命福建造海舟百三十七艘。"这船显然是为郑和的船队所造。而从时间点来看，也十分吻合。永乐二年初至永乐三年底，正是朱棣燕军与郑和水军大举进攻福建宁德（福宁）境内的建文势力的时间。而永乐元年命福建造船，正合其时其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138 页中有一则民间传说故事叫作"犬蜕门"，说的是"洪武帝朱元璋的水军与陈友谅的水军在三都澳官井洋海面交战"的故事。故事中的"洪武帝"竟然被"陈友谅"打败了。故事中的"洪武帝"与"陈友谅"到底是谁呢？福安市畲族地区流传的"朱棣是陈友谅投胎转世"的故事为此作了注脚。而宁德（蕉城）民间一直把"建文帝"说成是"洪武帝"，则源于当年朱棣取消了建文年号，代之以"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建文时代"成了"后洪武时代"。以至如今宁德（蕉城）的旧地方志如明嘉靖版《宁德县志》、明万历版《宁德县志》、清乾隆版《宁德县志》中仍多处沿用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纪年。600 多年的冤案至今尚未彻底平反，真是可悲可叹！

综上所述，永乐初朝廷在福宁（今宁德）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系列不寻常的军事部署，显然是针对建文帝与建文军的，此亦有力佐证了建文帝的确出亡至福建宁德。

作者单位；宁德市东侨区税务局

明中叶中国佛教的突然衰微原因分析

王道亨　释传弘

研究建文帝问题不能不研究明代的中国佛教史。

中国佛教协会编纂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史略·明代佛教》中有这么一段话："明代中叶，自宣宗至穆宗（1426-1572）的一百多年间，各宗都衰微。但到神宗万历时期（1573-1619），名匠辈出，形成佛教的复兴气像"。为什么在明初太祖朱元璋至惠帝朱允炆时期（1368-1402）盛极一时的中国佛教，经过明成祖永乐（1403-1424）仅仅二十二年，到明宣宗宣德时（中间明仁宗仅在位十个月），即开始走下坡路，逐步走向衰微呢？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衰微呢？是谁造成这种衰微呢？几百年来，无人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无人去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也就无法取得大的进展。因为专家学者没有把建文帝下落问题与中国佛教突然走向衰微这个大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是单一地就建文帝的行踪研究建文帝的下落问题，自然也就研究不出个结果来了。所以，笔者认为，要弄清建文帝的下落问题，势必要研究明中叶中国佛教为什么突然走向衰微这个问题。因为这一现像虽然出现在明宣宗至明穆宗期间，但根源不在这几任皇帝，而在明成祖永乐。在于其对中国佛教主流派禅宗，尤其是临济宗一派寺庙与僧人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摧毁。原

因当然是因为建文帝。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中国佛教的简史吧。

佛教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历史最为悠久。佛教传入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魏晋到隋唐时代，经过广泛传播，其影响渗透到我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以至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在哲学上，它对宋代理学的影响尤为显著，这已是哲学史家公认的事实。千百年来，先人们为我们留下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成为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考中国佛教的传播历史，后汉时期，应是佛教流行于中国的第一阶段。三国时期，为佛教流行于中国的第二阶段。西晋时期，为佛教流行于中国的第三阶段。此后，大约经历了东晋、南朝、北朝、隋代、唐代、五代、宋代、辽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计十五个阶段。而自佛教传入中国始形成的诚实师、涅槃师、毗昙师、地论师、摄论师、俱舍师、净土宗、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慈恩宗、贤首宗、密宗、禅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杨岐派、黄龙派、三阶派、格鲁派、响巴迦举派、萨嘉派、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等，大大小小大约有28个宗派。

佛门讲究佛祖只有一个，宗师亦不世出。然佛祖之为佛祖，宗师之为宗师，皆以其开启智慧法门之故也。所以，我们对其研究，也应行智慧法门。我们还是老办法，“绕道而走，直奔主题”，只拣与上金贝古墓与建文帝有关的禅宗这一教派进行研究。

禅宗这一教派在达摩祖师以前，自佛祖释迦牟尼起，二世祖为大边叶，三世祖为阿难……二十七世祖般若多罗，二十八世祖菩提达摩。其于梁六年（526年），由南天竺泛海至广州，因机缘不契，渡江到洛阳，入嵩山少林寺，始创禅宗。禅宗以讲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故又称佛心宗。

达摩祖师以后，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到慧能南奔，创南禅宗（北禅宗为神秀，不久即灭）。尔后“一花开五叶”，

又衍生出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大分支。可谓枝繁叶茂。五宗中，沩仰宗、临济宗又归南岳怀让一系，该系一传为道一禅师，二传为怀海禅师，三传为灵佑禅师（史载福州长溪人，十五岁即在霞浦建善寺落发出家）与希运禅师，四传为慧寂禅师与义玄禅师，此二人即是沩仰宗与临济宗的创始人，二人所在的袁州大仰山寺与镇州临济院也就成为此两宗的祖庭。由于沩仰宗是灵佑禅师与徒弟慧寂禅师分别在潭州的沩山（今湖南宁乡县西）与袁州的仰山（今江西宜春县南）共同开创的，故二人一道被尊为沩仰宗共同祖先。而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又归青原行思一系，该系一传为道悟禅师与药山惟俨禅师，二传为崇信禅师与云岩昙晟禅师，三传为宣鉴禅师与洞山良价禅师，四传为义存禅师（即福建福州闽侯雪峰寺的开山祖师）、洞山道膺禅师、曹山本寂禅师。洞山良价禅师与曹山本寂禅师创立曹洞宗，为曹洞宗的共同创始人。故洞山寺与曹山寺也就成为曹洞宗的共同祖庭。而义存禅师以下，又传文偃、师备，是为五传。文偃在韶州云门山创立云门宗，为云门宗的创始人。而这个文偃初参道足从（南岳怀让一系三传弟子希运的门徒，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的师兄弟），后偈义存。故其人与临济宗也有渊源。而师备以下传至桂琛禅师，是为六传。再传至文益禅师，是为七传。文益禅师后至金陵清凉寺创立法眼宗，为法眼宗创始人。清凉寺亦成为法眼宗的祖庭。而福建福州闽侯雪峰寺则与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这三个宗派都有传承关系，被其尊为共同发祥地之一。

而南禅宗慧能以下的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一辈，较著名者还有希迁（700-790）、神会（-760）、玄觉（665-713）、慧忠（-775）、法海等名僧。希迁人称石头和尚。时，江西主大寂（道一），湖南主石头（希迁）。唐德宗时，以神会为禅宗第七祖，其法统称为荷泽宗。而玄觉倡天台、禅宗融合说。慧忠则倡“禅即教”说。

禅宗五家中，沩仰宗于五代时倾一时繁兴，到了宋代，从慧寂以后传四世，法系不明。曹洞宗本寂的法系，从本寂以后四世即绝，赖道膺一脉，曹洞得以绵延。道膺六传到道楷，其下有子淳，子淳以下有清了、正觉（即宏智）。与

临济宗以下宗杲同时。此宗虽然在宋初曾兴盛一时，后却逐渐衰微，到宋中叶，法脉几绝。云门宗在五代勃兴，到了宋代，与临济宗并盛，从文偃经过澄远、光祚，至重显，在明州雪窦山中兴。临济宗从义玄经过存奖，慧顒、延治、善昭，至楚圆，其下慧南、方会，又创黄龙、杨岐二派，合前五家，称为七宗。杨岐方会传守端、法演后，有慧勤（佛鉴）、清远（佛眼）、克勤（佛果），世称三佛。克勤以下传大慧宗杲、虎丘绍隆等七十五人，成为天下大宗。所谓五宗，在宋代实只临济一宗，其余各宗或归绝灭，或就衰微。但曹洞一宗，绵延至宋末，忽臻隆盛。临济以下黄龙一派，数传即灭；而杨岐一派，仍复临济旧称。所以，递流至晚近，只临济称盛，而曹洞只维持未坠之绪而已。故佛学史上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临济宗也就成为禅宗主流。所以，摧毁了临济宗，也就等于摧毁了禅宗，摧毁了中国佛教。

元代的禅宗，北方有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师，与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师。史载“海云印简（1202–1257），曾为忽必烈讲说佛法并传戒。他重兴真定临济寺，时人称他为临济中兴名匠。嗣法者十四人，有语录曰《杂旨海》。元代著名政治家刘秉忠即是其弟子。印简的师傅是中观沼公，是个高僧。因此印简佛学选诣颇深。备受皇室礼敬。南宋宝祐五年（1257）阴历四月四日（即蒙古宪宗七年），印简说谒而逝，时年五十六岁。钦承忽必烈大王令旨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号“佛日圆明大师”。

而近来网上个别学者考证说上金贝古墓墓主系印简的再传弟子(二传弟子)元大德间（1297–1307）金埘寺住持止云沧海，也就是明嘉靖版《宁德县志》所载的“元大德间住持止云沧海。”据该志所载，金埘寺曾于元大德间重修过一次，大约是止云沧海任上重修的。嘉靖版《宁德县志》的记载仅能说明止云沧海是元大德年间的金埘寺住持而已，说明他曾主持重修过金埘寺。而无法说明他就是上金贝古墓墓主，何况，止云沧海是否印简的再传弟子尚未考证清楚。就算是印简的再传弟子，其声名既不如印简，也不如其师叔刘秉忠，有什么资格与资金建如此豪华气派的墓葬呢？不要说止云沧海，就是印简与刘秉忠也没

有资格与资金建如此宏大的墓葬。

再者，禅宗僧人死后实行火化与塔葬已形成规制，自少林寺菩提达摩祖师起即已如此，代代相传。作为禅宗的分支与主流派的临济宗，更是严格坚持祖制，从无奢华之例。而金邶寺住持止云沧海作为临济宗的正宗传人，更是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建如此规模宏大且具有皇家气派、官家风格（墓顶火龙珠、明代龙椅状主陵、玺状舍利塔、龙头裙摆状边墙以及那不合规制地建在内墓坪的高大的拜亭）。止云沧海一介普通僧人，有何必要、有多大的冤屈要去兴师动众（墓葬的建成，至少动用了上百名工匠）造这样一座“僧不僧，俗不俗；官不官，民不民；皇不皇，王不王”状不伦不类的神秘墓葬？去建这样一座寓意深刻且寄托着某种哀思的神秘古墓？

如果有人还不信此论，不妨花点钱到嵩山少林寺、闽侯雪峰寺等处去看那里的禅宗历代高僧的塔林吧，也许会有所醒悟的。

不过，该学者的考证，倒从一个角度证明了金邶寺系临济宗所属寺庙，证明了建文帝有可能到过金邶寺和选择金邶寺作隐辟处。因为建文帝逃难途中，几乎全是选择临济宗所属寺庙栖息的。这与其主录僧溥洽是天下临济宗的总掌门人有关。

元代的禅宗，在南方则有云峰妙高、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著名临济宗匠，传持禅学。其主要活动中心在余杭径山寺、临安灵隐寺。而闽东的临济宗诸寺庙则源于浙东、浙南，是浙东浙南传过来的。

上面说到的印简的弟子、元代著名政治家刘秉忠（1212 — 1274），原云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聪。印简应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经云中时，闻他的才名，约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印简南归，他遂留于行帐，参决军政大事，后复刘姓，命名秉忠。世祖即位时，他起草的朝政、官制等一切典章，成为元朝一代的政治制度。遗著有《文集》十卷。

此一时期，除上述主流宗派与高僧外，还有天台、华严、慈恩、戒律诸宗，仍余绪未绝。如天台宗的湛堂性澄、玉岗蒙阔、浮休允诺、大用必才、绝宗善

继等；华严宗的仲华文才、大林了性、幻堂宝严、丽水盘谷等；慈恩宗的普觉英辨、云岩志德、吉祥普喜，以及律宗的光教法闻等，都是当时各宗硕果仅存的学者。

元代佛教在传统各宗之外，江南还有白云宗、白莲宗等教团。

元代僧人中以诗文之著名者颇多，如明本、行端、祖铭、椭堂、大圭、宗衍、子庭、本诚、子贡、圆至、实存、善住、大訢、清珙、至仁、惟则等。其最高成就当推“诗禅三隐”。明姚广孝谓元代僧人的文章，虽三隐并名，应推天隐为第一（见姚广孝《牧潜集序》）。这个姚广孝即明初的道衍和尚，也就是替明永乐帝朱棣出谋划策，夺取天下的第一谋臣。

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叭教的弊端，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叭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土、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与发扬光大。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管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这就是为什么道谦牧庵禅师（福宁桐山人）由朱元璋钦命为南京钟山灵谷寺住持、牧庵弟子正映洁庵禅师由朱元璋钦命为泉州开元寺住持的缘由）。到了洪武十五年，对于佛教的整顿更为积极，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主要职责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等。从洪武二十五年起，僧录司各级僧官都按级给俸〕（见《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七年，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洪武二十四年，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规定男子非年达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岁以上者不准出家（见《明史·职官志》）。

明代寺院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明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如报恩、灵谷、天界，号为南京三大寺，都有许多寺田。这个灵谷寺即是洁庵

禅师拜师入门的地方，也就是洁庵师傅道谦牧庵禅师任住持的寺庙。那是洪武十六年、十九年的事。因为灵谷寺是临济宗所属的寺庙，所以道谦牧庵禅师原来出家的福宁劝儒乡（福鼎）昭明寺也应该是临济宗所属的寺庙。明代灵谷寺僧人法号均带“庵”字，故建文帝出家法号初曰“普庵”。而从亡大臣叶贤法号为“雪庵”，杨应能法号为“静安”。

由于明初朱明政权的扶持与鼓励，禅宗及各宗派在明初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各派均出现了中兴盛况。雪峰寺及闽东的金邶寺、凤山寺、氵祭山寺、昭明寺、龟山寺、灵峰寺、凤阳寺、云门寺等寺庙都是在这一时期兴旺发达起来的。

明初各宗派中，禅宗盛行，而以临济为最，曹洞次之。元末禅僧继续传法于明初的，有楚石焚琦、梦堂昙噩、愚庵智及。明初知名的禅僧有季潭宗泐、恕中无愠、呆庵普庄、见心来复、斯道道衍、雪轩道成、南洲溥洽等。其中的斯道道衍（1335–1478）就是上文提到的外号逃虚子的姚广孝。其在成祖起兵时，任军师，论功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任太子少师，复姓姚，命名广孝。常居僧寺，冠带而朝，还乃缁衣。他除监修《太祖实录》及监修《永乐大典》外，著有《道余录》一卷、《净土简要录》一卷、《诸上善人咏》一卷、诗文《逃虚子集》十卷（详见《明史》卷一百四十五）。而此处的南州溥洽（1346－1426）正是明建文帝朱允炆的主录僧，临济宗天下总掌门人。史载溥洽博究教典，并通儒书，曾任僧录司左善世。建文帝出奔时，成祖疑他参与其事，把他拘禁了十余年。后因道衍临终之请，始释其狱。寂后，杨士奇为其撰塔铭（详见《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

由此可见，建文帝出奔，溥洽是知情者。不但知情，而且还是个在场的策划者之一。关于为建文帝削发剃度，目前史书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溥洽所为，一种认为是程济所为。单就这两种说法而论，笔者前一种说法还比较合理。因为按照规矩，一座寺庙要正式收一名弟子，帮助这位弟子剃度的一定是寺庙的方丈。因此，只有作为主录僧与天下临济宗总掌门人的溥洽才有资格为建文帝剃度，而程济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因此，《致身录》中的这种说法是没

有根据的。既然为建文帝剃度了，难道就不能再做一些什么事吗？如此，将临济宗的掌门信物交付与建文帝，或写一封信什么的。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存在的。不然，朱棣为何要将其拘捕关押了十几年？

但是，随着研究小组研究的逐步深入，真正为建文帝剃度出家的另有其人，他就是福州闽侯雪峰禅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洁庵禅师。因为建文帝不可能在出南京城之前就行剃度的。而是在再次兵败福建宁德，遁入雪峰寺才行剃度的。

华严宗在正德至嘉靖之间，稍弘于北方。由无极（明信）传鲁庵（普泰）传贤首传雪浪洪恩（1545–1608）传巢松慧浸与一雨通润。一雨通润（1565–1624）的弟子有苍雪读彻（1588–1656）和汰如明河（1588–1640）。

天台一宗，宋元两代盛传于江浙。入明以来，只有东溟慧日、原璞士璋、白庵力金等数家。慧日以后，有无碍普智、万松慧林、千松明地、百松真觉诸家。至万历间无尽传灯（1553–1627）住天台幽溪高明寺，始重立天台祖庭，大开讲席。时称天台中兴。其后智旭继之，为明代天台最后的一大家。此处的无碍普智禅师，即是清代修的《支提寺图志》中提到的明永乐五年（1407）被钦命为支提寺住持的无碍禅师（霍童陈氏子，原在仁丰、凤山二寺出家）。

从以上史料来看，支提寺既不属于临济宗，也不属于曹洞宗，而应属于天台宗（但也有史料说其属于华严宗）。

从以上对元明两代佛教历史的简略概述可以看出，经过明初朱元璋 30 多年的努力，佛教尤其是禅宗（主要是临济宗），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的。朱允炆即位后，维持了这一发展趋势。而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则不一样了。很显然，正是这个永乐皇帝为了寻找与诛杀行走与栖身于临济宗派下的寺院之间的建文帝与从亡大臣，而对临济宗寺庙展开的搜捕与烧杀，导致了明中叶中国佛教的大衰微。这一点从我们研究小组调查出来的明永乐年间闽东地面上有几十座临济宗所属的寺庙被烧毁、几千名临济宗僧侣被悉数残杀的历史资料方面即可得到印证。文章开头那段话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屠杀不止发生在闽东，还发生在闽东以外的地方。这显然是一个有计划的摧毁行为。目的是要摧毁建文帝赖

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以临济宗为主流的禅宗佛教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保护建文帝的，特别是在闽东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地僻人难到，寺庙密度高，回旋余地大，是一个逃难栖身的好去处。因而自然也就成了朱棣及其手下锦衣卫的重点清理区域。而朱棣及其手下越是关注闽东，就越能证明建文帝就在闽东的某个寺庙隐跸；其越是大面积地摧毁闽东的寺院，屠杀大批临济宗的僧人，就越能证明当时闽东各临济宗所属寺院是听从僧录司主录僧、临济宗天下总掌门人溥洽号令，坚决支持建文帝的。不然，是不会惨遭此大规模杀戮的。据不完整统计，当时闽东地面上，几十座寺庙被焚毁，它们分别是古田县的瑞岩寺、香林寺、显得寺，屏南县的灵峰寺、宝岩寺、后院寺，霞浦县的清潭寺、大报恩寺，周宁县的灵鹫寺、云门寺、凤山寺、灵峰寺、瑞龙观，蕉城区的漈山寺、天王寺、三峰寺、安仁寺、瑞迹寺、金光寺、瑞龙寺、弥陀寺，寿宁县的九峰寺、凤阳寺、青石塔寺、平溪寺，福安市的兴庆寺、狮峰寺、西隐仁皇寺、云霖寺、白莲寺、龙潭寺，福鼎市的昭明寺、叠石庵。这些寺庙都是在同一时间（永乐年间），以相同的原因（寺庙僧人行为不轨，在寺内挖地道，建密室，坑害良家妇女）被摧毁的。这些寺庙所处的位置也是惊人的一致，全部都位于明初的古官道两侧，而且都是处在以蕉城区金涵乡的金邶寺和霍童镇的支提寺为圆心的周边地区。这一点说明，建文帝确曾长期隐居金邶寺与支提寺（关于这一点，有当地的大量口碑资料可证明）。甚至连邻市的罗源县也有（罗源县中房寺被毁就是一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建文帝有可能隐跸在金邶寺，上金贝古墓墓主就是建文帝。

明初永乐年间在闽东地面上毁寺杀僧这一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摧毁建文帝朱允炆的社会基础——临济宗佛教徒，消灭建文帝留在金邶寺与支提寺周边寺庙的影响与踪迹而采取的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朱棣这一骇人听闻的屠杀计划的贯彻与实施，造成了明中叶中国佛教（主要是禅宗主流临济宗）的突然走向衰微。

而中国佛教各宗之所以会在明神宗万历时期复兴，也是与其大政方针的变

化有关。明万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官纷纷上奏应改正建文史事，“改正建文朝实录”“为建文一朝单列本纪”，即通过修史来改正已经过“钦定”的附建文朝于洪武朝且不书建文年号的做法。这些奏章虽没有被完全允准，但是皇帝最终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同意直书建文年号，但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另一方面，对宗教的政策也作了很大调整，朝廷直接拨款建寺庙，还给许多寺院赐匾额、紫衣、金冠、玉杖以及经书等物品。宁德支提寺现藏的大藏经（即《北藏》）一部，紫衣一袭，即是那时万历皇帝与皇太后所赐。朝廷对佛教的扶持，是中国佛教在明末的又得以重兴的主要原因。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明确记载在秘而不传的《支提寺家谱》中。

因此，对于中国佛教，主要是禅宗，也即临济宗的兴衰史的研究，一定要置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也是这样，只有将其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究权衡，才能获得进展，取得突破。

作者单位：①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方志研究室
②宁德市金鄫禅寺

建文帝选择福建福宁为其出亡目的地原因分析

王小琳

建文帝之所以会选择福建宁德为其出亡目的地，是出于诸多因素考虑的。也就是说，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

1. 历史事件影响促成的因素

因为福建宁德，地处中国的东南一隅，它与湖北的武当山地区一样，是历史上落位皇帝与皇族逃难的首选之地。在建文帝到达宁德之前，已有一个落位

皇帝与两个落位皇族，曾逃难到此处。

第一位是五代南唐后主李煜的弟弟李从善。其逃到今境内的周宁县咸村镇落籍，当地的《李氏家谱》记载了此事。

第二位是北宋太子赵麟钦。其是在36名朝官的护卫下，逃到今境内的屏南县（当时归古田县辖）长岭乡，不幸病亡，就地安葬。36名官员亦就地落籍，为其守陵。这些官员的后代修的家谱记载了此事。

第三位是南宋少帝赵昺，其逃到域内百辟村（今霞浦县北辟乡），企图举事，不想事败，扔下散布在闽东（主要是今福鼎、霞浦一带）、浙南的3000多名宫女及部分后妃，只身逃往海南岛。从而演绎了闽东自古出美女的一段佳话。《广舆记》《闽书》均记载了此事。

也正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建文二年（1400），朝廷在浙南、闽东选了20多名美女入宫一事的发生，才有了建文帝拥有一名福宁（宁德）籍妃子之事的发生。明代宋端仪的《立闲斋录》一书记载了此事。现任周宁县浦源镇白云庵住持的证言佐证了此事。据这位住持讲，白云庵创建于明永乐初，创庵庵主原是一位落难皇帝的妃子。皇帝死后，隐于民间的从亡大臣把她送到这庵当尼姑。白云庵因此留下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头神祇牌，就是这位妃子为了纪念那位落难皇帝而设立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中的相关记载佐证了此事。

上述这些帝王与皇族的逃亡路线与建文父子俩的逃亡路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很显然，建文帝南逃福建宁德定然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而太子朱文奎也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而逃往湖北襄阳与武当山地区的。

从挖掘出来的许多史料证明，建文帝朱允炆与太子朱文奎正是在郑洽与廖平（化名余六府）的护卫下，分别逃往湖北襄阳与福建宁德的。而郑洽与廖平又先后与建文帝结成了儿女亲家（郑洽的大儿子郑榛娶了朱标的三女儿、建文帝的三妹妹朱璆娘为妻。廖平的女儿则嫁给了太子朱文奎为妻）。明谈迁的《国榷》与清查继佐的《罪惟录》以及民国王崇武先生的《靖难史事考证》和福建

厦门翔安区郑坂村《郑氏宗谱》记载了此事。

2. 自然基础条件考虑促成的因素

因为宁德其地，远离京师，燕军势力一时难以到达。地理上，该地域属东南丘陵地带，山深林密，沟壑纵横，是个藏兵屯粮的好地方，反攻复国的理想基地。这里，隐藏着被道教尊为三十六小洞天之第一洞天的霍林洞天与天然良港三都澳。

首先，从堪舆学的角度来说，“霍林洞天”所处位置的地理格局为；宁德的主山为霍山。霍山系鹫峰山脉与洞宫山脉交汇于境内的丹丘山（位于宁德、古田、屏南三县交界处）地方转脉形成。其脉分左右两支，右脉趋罗源，左脉经上天湖（虎贝）、下天湖（洋中），于巽位磅礴入海。

而金邶山（又称南山）正居霍山东脉之巽位。如果说起势于天湖的霍山东脉婉如一条蜿蜒入海的蛟龙，那么金邶山主峰八仙顶就是那探海的龙头。它与上天湖的“虎头”，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处虎踞龙盘、山交水汇的格局，成就一方之形胜。

流淌于众山脉之间的溪流亦步亦趋，也一齐奔向巽位入海，众水所归合于形家所谓“水汇”者。

按《五岳古本真形图•霍山图》所载：在“霍林洞天”辖境内，霍童溪与洋中溪把蕉城区西北部、屏南县东部、古田县东北部的山地分割成四向屏障的一个方形区域，古称“方城”，亦称“赤城”。意为“属火神管辖之地”。主要依据是《五岳古本真形图·霍山图》旁边有一行篆书云：“黄帝命霍山南储君”。此处的“南”指“南岳”，即衡山。南岳主神为火神祝融，火神的储君（儿子）理当属火。吴晗先生在其明史研究集大成之作——《明朝大历史》一书178页云：“且新朝自南方建国，与历史上以北定南者异势；以阴阳五行之说，则南方属火，为祝融，北方属水，为玄冥；元建都于北平，起自更北之蒙古，以火克水，以明制暗，斯又汉以来儒生所津津乐道者；故又力赞以明为国号。”建文帝五行缺火，退往火神管辖之地，是往生门行走，有利反攻复国。

这在当时亦在情理之中。何况建文帝朱允炆的宗教信仰与洪武帝朱元璋是一脉相传，都是崇拜火神祝融的。火神祝融在他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是可以依靠的，是会护佑他的。所以他认为，一旦举事失败，隐身于火神管辖的“霍林洞天”及其周边区域是再合适不过的。

而“霍林洞天”这座天然城堡的四屏为：北有洞宫山脉，主峰百山祖（浙南）1857 米；西有鹫峰山脉，主峰香炉尖（屏南）1598 米；南有天湖山脉，主峰麒麟山（古田）1428 米；东有太姥西南支脉，主峰南屏峰（蕉城赤溪龟山）1079 米。“城堡”之内千米以上的高峰有 900 多座，实为一“天府之国”，藏兵之所。

山中遍布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尤多珍贵的中草药。实可与湖北武当山、神农架相媲美。

另据古籍记载：霍山主体“延袤五十里”，折合今制 78.5 平方公里。霍林洞天周围一千里，“延袤二百里”。该区域辖现蕉城区的霍童、八都、九都、洋中、石后、虎贝、赤溪、洪口、金涵以及屏南县的代溪、寿山与古田县的杉洋、大甲等三县十三个乡镇地盘。

很显然，“霍林洞天”这一天然方城，既是一处修身养性的好处所，又是一处十分隐蔽的藏兵屯粮的好地方。

那么，我们在“霍林洞天”这一区域范围内到底发现了哪些与建文史事有关的东西呢?

第一，我们发现了建文帝曾经在霍山支提寺（华藏寺）隐辟过（或被囚禁过）的实物证据与史料证据（详见下文）。

第二，我们发现了与踪迹建文有关的永乐内臣郑和曾经到过霍山支提寺的实物证据与史料证据（详见下文）。

第三，我们发现了与踪迹建文有关的永乐内臣周觉成曾经到过支提寺并终老闽东的实物证据与史料证据（详见下文）。

第四，我们发现了与建文史事有关的洁庵禅师曾经到过霍山支提寺的资料线索。

第五，我们发现了与踪迹建文有关的胡濙曾经到过“霍林洞天”区域的资料线索。

第六，我们发现霍山支提寺曾经拥有过百多件明代宫廷文物的资料线索并征集到部分文物照片。

第七，我们发现了被朱允炆携带出宫的两颗传国玉玺曾经一度藏匿于支提寺的资料线索。

第八，我们在“霍林洞天”区域内或周边地区发现了大批隐匿的建文朝从亡大臣或被杀朝臣后裔的踪迹（详见下文）。

第九，我们在“霍林洞天”周边大范围区域内发现了大批永乐朝屯田军的踪迹（详见下文）。

对于上述这些发现，我们会在下文一一举证。

其次，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三都澳。三都澳是霍山东脉与太姥山南脉交汇而形成的。海岸曲折率为 1：122，面积达 714 平方公里。而且，三都澳口小腹大，水深港阔，地理位置十分隐蔽。澳内隐藏着三条小内港（盐田港、白马港、铁沙溪港），利于建文帝集结与隐藏在山东、江苏、浙江沿海被打散的水军。

那么，我们在三都澳水域又有哪些新发现呢？

第一，我们在明嘉靖朝兵部尚书胡宗宪所著的《筹海图编》一书中发现了永乐二年（1404），朱棣与郑和曾经在三都澳用兵的史料证据。

第二，我们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一书中，发现了永乐二年（1402），朱棣与郑和曾经在三都澳用兵的史料证据。

第三，我们在福安畲族地区流传的民间传说故事中发现了朱棣与郑和在三都澳用兵的口碑资料证据。

第四，我们在三都澳一处海滩淤泥下发现了郑和当年造船所剩余的百多根巨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建文帝手下，打仗不如朱棣手下，但对佛道之学，五行之说，奇门遁甲之术，却是比朱棣手下要精通得多。他们之所以会选择福

建宁德作为出亡目的地，选择“霍林洞天”与“三都澳”作为隐退行动中的“屯兵之所”，正是上述哲学思想与行为心理的反映。

所以说，建文帝和他手下那些从亡大臣之所以决定退守福建，退守宁德，很大一个因素是冲着“霍林洞天”这座天然方城与三都澳这个天然良港而来的。

3. 经济基础条件考虑促成的因素

因为宁德的特殊区位，使其受到了江南经济文化与海洋经济文化的双重辐射与影响，经济发达，物产富饶，人民富足，便于聚财。兼之境内分布着20多座银场，3000多个银坑洞，所产的白银占当时全国白银总产量的六分之一。若具有这些银矿，便有了复国之资。建文帝之所以决定退守福建，退守宁德，很大一个因素是冲着这些银场来的。

4. 军事基础条件考虑促成的因素

据《明太祖实录》卷181记载，明洪武二十年（1387）四月，朱元璋命江夏侯周德兴入闽巡视海疆。周德兴为强化海防，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筑起了20座卫所城与50多座寨堡与烽火台。其作用一是防御山区内的陈友定部，二是防御海外的倭寇。不久，陈友定部被平定，倭患也暂告平，许多卫所城与寨堡随即被空置。想不到，朱元璋与其部将苦心经营的这些军事设施，却让其孙子派上了用场。建文帝之所以决定退守福建，退守宁德，很大一个因素是冲着这些军事设施而来的。

而霞浦县长春镇大京城堡，即是当时周德兴建的最大的一座“卫所城”。当地一直流传一种说法，“洪武帝”（即建文帝）想把大京城堡辟为临时首都，因而才有“大京”之名。据蕉城区七都镇六都村周乡齐先生考证，“大京”，原为“代京”之谐音口误。而古籍中写作“大金堡”“南金门”，显然是当时的朝廷与官府为避免百姓传扬建文史事而改口所致。笔者认为此论有一定道理。蕉城区石后乡小登广村尼姑庵所遗之龙头神祇牌中的“当京皇帝万万岁”中的故意笔误这一举措，可以与此论互勘。它们从一个侧面间接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

5. 社会基础条件考虑促成的因素

因为宁德是建文帝的宁德（蕉城）籍妃子陈凤春的家乡，是建文帝的启蒙老师周斌（曾任中都国子司业）的家乡，是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姚莘（洪武朝状元）与余六府（建文朝武将）的家乡。建文朝的福建籍官员数位居全国第三，建文朝的太监大部分来自福建，洪武朝、建文朝的南京三大皇家寺院的住持、高僧几乎全都与福建、宁德有渊源。在这儿，有全力支持他的福建省与福宁州的官场，有全力支持他的 100 多名银场督办太监，有全力支持他的 100 多座临济宗所属的寺庙及近万名僧侣……

因此，笔者认为，建文帝及其身边的谋臣在策划逃亡时，定然是充分考虑到了自己这一方在宁德（福宁）、在福建的社会基础这一重要因素的，而宁德（福宁）、福建存在的强大的建文势力，正是促成建文帝决策出亡福建宁德的重要因素之一。

6. 多元宗教构成之社会环境考虑促成的因素

明初的福宁州（今宁德市）域内，存在佛教、道教与残存的明教、摩尼教等教派，是个多元宗教交汇区域，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十分有利于复辟举事。在道教的洞天福地司命天律条款中，霍林洞天属第九宫，主宰“人变仙”事项。另外，霍林洞天位居二十八宿之牛女星分野，为东南木火通明之地，利于元神出窍，具备羽化成仙的技术基础与地理条件。因而产生了许多高道大德，使霍林洞天成了道教的圣地，成了“仙生之所”。而五代及宋，在霍童及部分区域，佛教华严宗一派在此择地弘法，产生了许多高僧大德，使支提山成了佛教的圣地，成了“佛生之处”（“支提”本义是“佛生处”）。在当时的福宁州（今宁德市）地域，即环霍林洞天与环三都澳周边地区，光佛教寺庙就有 150 多座，其中，属于临济宗的寺庙即有 100 多座，僧侣近万名。因为临济宗的全国总掌门溥洽是建文朝的主录僧，是建文帝的铁杆支持者，因此，临济宗一派寺庙与僧侣自然也不例外，都是建文帝的支持者。而道教的祖师爷张三丰据说也是建文帝的支持者，据《武夷山志》与《今献汇言》载，此时他也来到了福建。因

此，福宁州（今宁德市）域内的道观与道人大多数也是同情与支持建文帝的。而朱元璋在铲除了全国各地的明教与摩尼教之同时，独独留下了闽东地域内的明教与摩尼教的寺庙与僧侣，此举亦颇耐人寻味。笔者认为，正是这多元宗教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环境这一有利因素，促成了建文帝决定出亡福建，出亡宁德，以图东山再起。

作者单位：蕉城区市场监督局

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

孙绍旭

【摘要】“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下落，久被视为明史第一悬案。多数学者认为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自焚，而是偕近臣出逃，但出亡地点却众说纷纭，若按建文帝出亡具体地点分，先后出现 62 种不同说法，但因缺乏有力史料支撑，一直未能形成定论。本文对近年在宁德新发现的云锦袈裟、上金贝古墓以及郑歧村郑洽认祖归宗和明初对闽东军控等逐一进行细密的考证，在综合这些考证的基础上，提出建文帝出亡宁德新说。

【关键词】建文帝；出亡地；宁德

【中图分类号】K248.1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6−0057−11

【作者简介】孙绍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宁德师范学院副教授 352100

明建文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役”后的下落，多数学者认为他在“靖难之役”中未被烧死，而是偕近臣出亡。但关于出亡地点却众说纷纭。据统计，明清以

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地点按出亡省份（直辖市）分有；云南说、贵州说、重庆说、四川说、两广说、湖广说、福建说、浙江说、安徽说、江西说、江苏说、陕西说、青海说、甘肃说等 14 说和海外说，共 15 种说法。若按出亡具体地点分，又可进一步细分为 62 种说法，其中佐证材料源于民间传说者 31 种，源于民间传说、考证、前人书籍者 15 种，源于明史和地方志者 5 种，源于族谱者 1 种，源于其他材料者 10 种。①说法之多歧性，说明建文帝出亡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朱棣登基后，对与建文帝相关的史料进行彻底的清洗；而建文帝出亡行踪需高度隐秘，且出其不意，方能逃脱永乐帝的追杀。这就使得能够确证他具体出亡地点的纸面史料极为稀见。尽管众多学者使尽浑身解数，从地方志、明初名人笔记、摩崖石刻甚至从民间传说及历史民俗找，而且确实也找出一些疑似的史料，但多系孤证，均无法形成足以破解此一悬案的完整证据链，因此始终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定论。②然而，建文帝毕竟是一代之主，他的出亡行踪不可能“事如春梦了无痕”。在纸上之材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若能“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或有助于破解此一悬案。 本文对宁德近年发现的云锦袈裟、上金贝古墓，以及郑歧村郑洽认祖归宗和明初对闽东军控等逐一进行细密的考证，并在综合这些考证的基础上，提出建文帝出亡宁德新说，以期进一步廓清或逼近建文帝出亡史迹真相。

①参见马渭源：《破解大明第一谜案》，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2-67 页。

②近年来单见诸中文期刊数据库的较有代表性相关考证文章即有：公维章根据民国《创修渭源县志·艺文志》中的《五竹寺记》及康熙《渭源县志》中的《五竹山五竹概略·诗名缘起》两资料，撰｛明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新探》（《泰山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文，提出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说。杨淼林、杨慰根据青海乐都地区谱牒慕寿棋手记《创修渭源县志》等史料，民间传说调查，明王朝、乐都杨氏家族与瞿昙寺间关系，瞿昙寺建筑特征的考证，得出建文帝圆寂青海乐都瞿昙寺之说（杨淼林、杨慰：《建文帝圆寂青海乐都

瞿昙寺考》《青海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杨知秋根据明初《三迤随笔》《叶榆稗史》和《准城夜话》三种笔记，提出建文帝出亡云南（杨知秋：建文帝出亡云南新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4 期）。岑沫据明朝同代一些史志及名人传记、笔记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出亡宝华山（岑沫：《明建文帝南逃与隐匿广西宝华山之谜》，《文史春秋》2009 年第 4 期）。刘乐一根据田野调查，认为建文帝在贵州安顺地区的平坝县境内高峰山（刘乐一：《追踪建文帝》，《民俗研究》2000 年第 2 期）。王录生通过研究认为，建文帝避难贵州（王录生：《建文帝避难贵州应是史实》《文史天地》2003 年第 6 期）。管维良根据野史、方志、笔记认为建文帝出逃并流落云、贵、渝、桂数省市（管维良：《建文帝出亡之谜新解》《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 年第 5 期）。全伟则从历史语境出发，研究明建文帝去向（全伟：（明建文帝去向的历史语境研究》《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熊星宇认同黄云眉《明史考证·明史卷四（恭闵帝记）考证》之说（熊星宇:《建文帝下落考》,《安徽文学》2010 年 11 月）。晁中辰撰文《建文帝“逊国”新证》（《安徽史学》1995 年第 1 期），认同建文帝出亡。束有春、阎小强通过实地搜集的民间传说与古代文献记载相结合，撰文《亦帝亦僧亦为仙半史半野半相疑——明代建文帝的传说及其历史民俗》《东南文化》1998 年第 3 期）指出建文帝的民间传说实质上体现了中国历史民俗文化中的“帝王神异论”等思想。徐作生认为建文帝出亡穹窿山（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隆山新证》，《史学月刊》1986 年第 6 期）等。

（一）谁的云锦袈裟？

2010 年，在宁德市蕉城区支提寺发现一袭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久远、保管最好、质地最高的云锦袈裟，[①] 引起各界的普遍关注。那么，这袭袈裟的

---

① 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2010 年第 5 期。

主人究竟是谁?

1. 宁德支提云锦袈裟的概况

1. 整体而言。由长约 100 厘米的 15 个长方形小片云锦缀合缝制而成，长 2.1 米、宽 1.3 米的五爪金龙袈裟，基本保存完好。整袭袈裟共有游龙、团龙等 90 条左右，袈裟呈黄色偏红。

2. 袈裟左右。袈裟左右两侧各织有 24 条云龙纹描金图案。

3. 袈裟中间。分布着方形图案，图案中有牡丹如意云；正中间 5 条五爪龙间隔分布（在整袭袈裟中它们比两边上的“小金龙”要大得多），且金地龙赶珠、蓝地龙赶珠、黄地龙赶珠等五条彩龙保存完好。

4. 袈裟上下。袈裟“横幅”上与正中间 5 条五爪龙差不多大小的 9 条五爪龙（3 条五爪龙的位置已经被黄色丝绸“补”住了）。“蓝地织福寿字灯笼纹”，袈裟的最下方一长条上均匀地绣着 22 个灯笼，灯笼里有“福寿”等字样。

5. 八吉祥。“黄地八吉祥妆花缎”，袈裟中代表佛教题材的八吉祥纹样图饰、卐字符纹样图饰和狮子（麒麟）图案主要出于云锦袈裟上方横幅下的左右对称处，是两个小方块六瓣花形内狮子（麒麟）图案，中间杂以卐字如意云纹，此外还有 3 块分散的八吉祥图饰和 2 块乐字与狮子（麒麟）相间的图饰。

6. 云锦。袈裟两边从左到右有 13 条云锦，正上方云锦 1 条，合计 14 条。

7. 调子和气势。图饰布势合理，格调高雅，气势雄浑，尤其是顶部“逐珠五爪龙”走势雄健，“画神笔法”老道深沉凝重。

8. 结构布局及其他。八吉祥纹样图饰、卐字符纹样图饰和狮子（麒麟）图案等占据袈裟总面积近 1/20 ，且处于袈裟中不显眼的配饰位置。袈裟的纹样图饰所绘的内容是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行龙和团龙。在这些龙饰图案中，间隔性地排列着九蟒纹样图饰和长条云锦。袈裟正中偏上有两个“蓝地逐珠龙纹”，正中偏下有两个“黄地夔龙团花纹”，正上有“金地龙赶珠纹”。

9. 立体感。穿上袈裟后，横幅上的 9 条五爪金龙显示在人的领子上，袈裟右下方一三角形褶皱处平时遮住的 3 条龙全显现出来，袈裟的正面与背面露出

的5条五爪龙，整袭袈裟的9条龙与5条龙之分布格局与清乾隆帝年轻时的正装画像极为相似。[①]

2. 宁德支提云锦袈裟特征如下

1. 具有明初特征的八吉祥纹样图饰。根据杨鸿姣的研究："法轮在元代是花轮，到了明初演变成八辐轮或六辐轮，法螺在明初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刻画，尤其是对尾部旋进的内部结构的表现；宝伞在明初以继承元代风格的捆住型居多，但相对于元代则更加华丽，较突出流苏和帷幔；明初莲花花瓣排列较为密集，装饰性增加；一对金鱼呈对称式布局等等。""吉祥结在永乐时期还保留元代的上下成尖状特征，宣德时期则演变为上下各有一结的形制，这一形制被后世所承袭，成为吉祥结的固定样式，直至现代的中国结也与此一脉相承。此外，在汉地八吉祥图形中，飘带自永乐时期开始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②]对照支提寺袈裟中的八吉祥纹样图饰特征，发现袈裟中的法轮是六辐轮，法螺尾部旋进结构刻画细腻、形像，流苏与帷幔装饰下的宝伞正被捆着，起着点缀作用的飘带自然流畅等等，明初特征极为明显。此外，徐仲杰著《南京云锦史》对明初袈裟中八吉祥纹样的描述也佐证了这一点。[③]

2. 以五爪金龙为主题配饰以佛教题材。根据佛理，袈裟为出家人法衣，其纹样图饰所绘内容应以佛教主题为主，即其位置应在最为显眼之处。而支提寺珍藏云锦袈裟则有其特点：袈裟中代表佛教题材的八吉祥纹样图饰卐字符纹样图饰等占据袈裟面积近1/20，且处于袈裟中不显眼的配饰位置。与此同时，袈裟的纹样图饰所绘的内容是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行龙和团龙。在这些龙饰图案中，间隔性地排列着九蟒纹样图饰和长条云锦。在袈裟的正上方是9条五爪龙，正中位置是5条五爪龙，"九五"之数显而易见。五爪金龙袈裟更是袈裟

① 马渭源：《破解大明一谜案》，第88页。
② 杨鸿姣：《明代藏传 佛教八吉祥纹样图饰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变化》，《西藏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
③ 徐仲杰：《南京云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9页。

中的最高级别，只能奉旨织造。[①] 袈裟左右两边的长条云锦上，皆为云龙纹样图饰。根据《明史·舆服志一》大明帝国能够享用云龙纹样图饰舆服的只有四个人：皇帝、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袈裟底边的 22 盏宫灯纹样图饰中，绣有“福寿”字样。而大明帝国能够享用“福寿”纹样图饰的只有两人：皇帝与皇后。[②] 郑自海通过对现存遗址、遗物等明显存在的事实调查，论证明代初期至中叶“闭嘴龙”特征的规制，应该是非常确定的事实。而“袈裟周边设计为图腾状 18 只五爪金龙，均是闭嘴龙，是典型的明初龙造型”。[③]

3. 编织材料中大量含金。支提寺云锦袈裟的用金量是十分惊人的。通过摄像机与照相机镜头，整件袈裟金光闪闪，而肉眼看去，却无比感觉。全部用金线与孔雀羽织出的云锦，是云锦精品中的精品，支提寺云锦袈裟正是这样一件精品。《南京云锦史》中记载：明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龙袍，仅仅胸前团龙部分用金，其余均白地。[④] 由于使用上等的金线与孔雀羽材料，袈裟中间部分绿地龙赶珠、蓝地龙赶珠黄地龙赶珠等五条彩龙保存完好，充分印证了“九五之尊”最高等级袈裟的说法。另外袈裟两侧各织有团龙 24 条，加上周围众多的夔龙整袭袈裟共有游龙、团龙 90 条左右也基本保存完好。连明初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都未曾获得过金襕袈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副姚广孝画像，姚广孝只是身披一件紫衣袈裟端坐宝椅之上）。[⑤]

4. 织造中使用缂丝（即刻丝）技术。支提寺云锦袈裟使用了缂丝（即刻丝）技术。从织造技术的角度考究，该技术源于宋代，来自西域的波斯诸国，盛于元代，直到明初的永乐年间，还有关于该织物的记载。葛寅亮的《金陵梵刹志·钦录集》云：明永乐二十年十月初六日，“上（指朱棣）御奉天门，赐僧道官宴，

---

① 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2010 年第 5 期。
② 《明史》卷 65《舆服志一》，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③ 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 云锦袈裟和团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2010 年第 5 期。
④ 徐仲杰：《南京云锦史》，第 14–19 页。
⑤ 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2010 年第 5 期。

天下众僧亦在丹墀。宴毕，先赐一如（僧名）刻丝观音菩萨”。[1]这则史料既说明了明初还存在刻丝技术及实物，又说明了它已成为御用品与御赐品。同时，也是所能见到的关于刻丝技术与实物的最后记载。因为到了明中期，这一技术已经失传，这种实物实在难见到。这一点从《南京云锦史》中的记载得到佐证：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是采用本色暗花与妆花两种技术相结合织造而成的。而宁德支提寺的云锦袈裟采用的则是元末明初流行的“纳石失”织金锦技术织造而成的，两者织法完全不同。[2]僧人最华丽的礼服为金襕袈裟，金襕袈裟的珍贵，就是在袈裟中织入金丝、银线、孔雀羽毛等，此种织造工艺，民间织造作坊很难胜任。”[3]

基于这样一袭云锦袈裟的质地规格和特征，商传教授认为，明中晚期皇家有赐袈裟给寺庙的习惯，但明初皇家确实没有这样的习惯，这件明初期云锦袈裟在支提寺出现，很值得研究。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从主体图案——八吉祥龙法轮、云龙纹和“九五之尊”的五爪金龙龙饰图案断定，支提寺云锦袈裟应是明初云锦宫廷御用珍品，尽显明初皇家规制。其主人应是明初宫廷之主人。[4]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室主任、云锦研究专家张洪宝亦认为，“这件袈裟应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很可能就是建文帝携带出宫的那件东西。”孤证不立，单凭一袭袈裟在宁德被发现，自然不能证明建文帝即出亡宁德。但如果这袭袈裟果系建文帝携带出宫的，那么它在宁德支提寺被发现，至少说明建文帝有到过支提寺的可能。

（二）上金贝古墓墓主是谁？

关于宁德金涵上金贝古墓，根据福建博物院王振墉先生的考古，该墓是一

---

①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② 徐仲杰：《南京云锦史》，第51页。
③ 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 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绞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2010年第5期。
④ 《龙隐宁川》编辑委员会编《龙隐宁川》，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1年版，第33页。

座大型僧墓，布局形制比较特殊，福建各地尚未见到类似的实例。[①] 学者郑自海考察上金贝古墓后认为，目前在全国很难寻找到第二例这样的高僧墓葬形式。[②] 令人好奇的是，这座形制特异的古墓的墓主究竟是谁?

1. 学者王振墉对上金贝古墓的研究结论

王振墉对上金贝古墓散落墓地上的各种石构件进行了初步辨识、鉴定，对其布局、形制和舍利塔、护墙、墓手（墓网）等进行研究，主要如下；[③]

1. 舍利塔塔身上凿出长方形的浅完，完上方雕刻一荷叶宝盖，下方一刻作仰覆莲座，完内隐刻一碑，碑上阴刻两行共 20 字碑文，此类装饰荷叶盖及仰覆莲座的浅完或开光形式，多见于南宋和元代，元以后较少见。

2. 舍利塔自上而下由未脚、单层须弥座、俊盆、塔身和圆顶组成，须弥座由束腰和上下臬混组成。在中国古建筑中，须弥座的束腰和上下臬混的高度比例是有一定时代差异的，宋元时期束腰高度较大，臬混高度则较小。明清时期，二者的高度比例有很大变化，束腰高度缩小，臬混高度增大。有的束腰和上下臬混的高度约各占三分之 --，以此对照沧海舍利塔的须弥座，其束腰高度明显大于上下臬混的高度，应是宋元时期的做法。此外，覆盆或覆盆式柱础也是宋元建筑特征之一。

3. 须弥座束腰中的柱子，宋元时期多是圆柱束箍形，箍多为圆条形，宋代的多为每道一箍，如仙游枫亭北宋天中万寿塔和泉州开元寺南京镇国塔。元代的多为每道两箍，明清时期束腰柱子多为方竹节形，也有圆柱束箍形，但箍多变为菱形。

4. 圭脚的形态，宋元与明清也有很大区别。宋元时期的圭脚多呈现如花瓣的云朵状，较为肥阔而简洁，如泉州南宋府文庙月台圭脚、顺昌大干元代宝山寺抱鼓石圭脚、泉州开元寺南宋镇国塔圭脚、仙游枫亭天中万寿塔第二层须弥

① 王振墉：《福建宁德上金静沧海墓考》，《福建文博》2009 年第 1 期。
② 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 >2010 年第 5 期。
③ 王振墉：＜福建宁德上金都沧海墓考》.《福建文博》2009 年第 1 期。

座圭脚等。明清时期，圭脚的做法较为繁复，云朵状较少见，即使有，也变为瘦长形，多数呈兽足或兽首形。沧海舍利塔圭脚。尤其是后来在高台前的盗坑填土中发现的碑座圭脚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形态是宋元时期的做法。

5. 从残存的拜亭屋顶构件看，应是歇山式屋顶，正脊两端鱼形鸥尾常见于元明时期，但支撑梁架屋顶的四根连础小八角石柱或称抹角方柱，也多见于南宋、元代，同金鄱寺内所散存的元代石柱相似。明清时期多以圆柱、方柱为主，且多不与柱础连体。

王振墉根据该墓构件所表现的时代特征主要是元代的，所以认为该墓应是一座元代僧墓。

2. 学者郑自海等对上金贝古墓的研究结论

郑自海对上金贝古墓的墓前左右手龙刻构建、古墓舍利塔正面阴刻文字和与月江正印禅师比较考证，主要如下：

1. 上金贝古墓前左右手龙刻构建与明初相应构建。根据古墓前左右手龙刻构建与明孝陵享殿三台基的龙刻构建、明郓国公宋晟墓神道碑碑额二条云龙为闭嘴龙、明朝开国功臣李文忠墓碑额镌刻两条闭嘴云龙、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墓战马坐垫雕刻精美云龙中的闭嘴龙明朝第一功臣徐达墓碑额镌刻闭嘴龙、武当山博物馆藏明代建文元年（1399）湘王朱柏的“投龙”法器等 16 个同时代的实物得出上金贝古墓断代为明初。[①] 关于此，马渭源将制造于明天顺四年的霞浦县上万村摩尼神座底座、南京明皇宫午门底座与宁德上金贝舍利塔底座的比较，断代为明初。[②]

2. 古墓舍利塔正面阴刻文字内涵。郑自海先生从古墓舍利塔正面阴刻“御赐金襕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二十个字中御赐金祢出发，认为金祢袈裟的珍贵，就是在袈裟中织入金丝、银线、孔雀羽毛等，此种织造工艺，

① 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2010 年第 5 期。
② 马渭源：《破解大明第一 迷案》，第 127-129 页。

民间织造作坊很难胜任。[1]

3. 关于元末著名禅师月江正印的文献。据文献记载，月江正印为元代阿育王寺的著名禅师，可以说月江正印与沧海珠几乎是同一时期的禅师，奇怪的是月江正印只建舍利塔，未建“龙椅”状主陵墓围与享殿。

由此推断福建宁德上金贝僧人舍利塔与俗家墓建筑风格并存的豪华墓葬，并非元代高僧墓葬的规制。根据明代初年皇家盛行的闭嘴龙纹饰与宁德上金贝古墓中的闭嘴龙纹石刻的形式风格相一致。可以推断该墓应当是明代初年修建的一座具有皇家龙纹礼仪规制的罕见皇室墓葬。[2]

在陵寝制度方面，明代做出了重大改革。据刘毅等学者研究，从明太祖修建孝陵开始对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3]改革的意思即改掉存在的、不合理的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完善。当然，其应遵循这一规则：在改革的前提下，对存在的、不合理的部分的修改程度在不同时期是存在差异的，在过渡时期应该是前代遗留更多些，而新的成分少些；随着时代的推移，新的成分越来越多。那么，明代特别是明初这一改革初期在陵寝构件上遗留有宋元时代特征无论多少都属正常现像。当然，只要有一个特征为明代的，即不能断代为宋元，这道理显而易见。且正如王振镛的结论依据中所说：“该墓构件所表现的时代特征主要是元代的。”[4]哪也说明墓构建中还有明代特征，所以就此断代为元代，略显草率。而郑自海从同时代相同实物、古墓舍利塔正面阴刻文字中主要文字和元末著名禅师月江正印的陵寝的对比推断，特别是对明初闭嘴龙造型研究的创新成果的应用更合理些。

再联系前文，支提寺明初云锦袈裟、建于明初的具有皇家龙纹礼仪规制的罕见皇室墓葬上金贝古墓，以及古墓舍利塔上刻的“金襕”袈裟，明初有皇家身份．拥有云锦袈裟、能够以皇家龙纹礼仪规制下葬的墓主人似乎屈指可数，

① 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 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2010 年第 5 期。
② 郑自海：《从宁 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 东方收藏》2010 年第 5 期。
③ 刘毅：《中国古代陵墓》，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7—148 页：
④ 王振墉：《福建宁德上金郞沧海墓考》，福建文博》2009 年第 1 期。

而暂无可考者仅建文帝。另据卓礼江、杨倩《卓氏族谱中有关建文帝削发为僧的记载》的研究，居住在四川资阳（也包括后来从这里迁居广东、福建、陕西等地）的卓姓为人川始祖卓用祥的后代，而卓用样又为卓敬之孙，那么卓氏宗谱上有关建文帝削发为僧的记载（写于 1816 年）应具有一定的可信度。”[1] 目前上金贝古墓的墓主虽然仍无法确定就是建文帝，但它的形制特征无疑进一 - 步指 向建文帝，这是建文帝出亡宁德的又一证据。

（三）宁德郑岐村始迁祖郑岐为何许人？

宁德蕉城区有个郑歧村，郑岐村的始迁祖郑岐为何许人，他跟浙江浦江郑义门有何渊源？郑岐村郑氏为何认祖归宗郑义门？众所周知，郑义门郑洽系建文帝的近臣，随建文帝出亡，郑岐跟郑洽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跟建文帝出亡宁德有关，值得深究。

1. 浙江浦江郑义门

“郑义门”号称“江南第一家”，世称“九世同居”，位于浙江中部浦江县郑宅镇。自北宋初年郑氏在此定居迄今已 900 余年，原名“承恩里”，南宋时曾先后易名为“三郑”“仁义里”。元代因两次旌表为“孝义门”而改称“郑义门”。郑义门因其辉煌的“孝义同居”被明代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它是白麟郑氏家族与宋濂共同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同居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家族文献丰富而罕见的特殊大家庭。

据记载：郑凝道之十三子郑安仁官任秘阁校理，生渥、涚、淮三兄弟，他们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 年）迁徙浦江。三兄弟情笃义行一时名闻乡里，故居住地被称为三郑（即今郑宅），由是成为浦江郑氏始祖。其中人赘居于香岩溪承恩里的宣家为婿的郑准，因表其不忘祖德之志，改香岩溪为白麟溪，“白麟”是郑氏远祖尊称。

---

① 卓礼江、杨倩：《卓氏族谱中有关建文帝削发为僧的记载》，《文史杂谈》1998 年第 2 期。

在郑氏义门的同居史上，五世郑德璋制定了“以法齐家”的治家准则，创办了“东明精舍”，教化子孙后代。六世祖郑文融扩建“东明精舍”并邀请宿儒吴莱和宋濂敦教主讲；同时，请宋濂帮助制订了家族法典《郑氏家规（五十八条）》。七世祖郑钦又在宋濂的帮助下将家规续订到70条。此后又经郑氏后世郑铉、郑源、郑涛等人的努力，将《郑氏家规》增加到168条，自此郑氏家庭的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①]

2. 宁德蕉城区郑岐村认祖归宗郑义门

关于宁德蕉城区郑岐村认祖归宗郑义门主要如下：

1. 郑铎其人引发郑歧村溯源的导火索。浙江省浦江县白麟溪郑义门《郑氏宗谱》、福建省宁德市郑岐村《下井堂郑氏宗谱》、云南省蒙自（今石屏）县郑营村《郑氏宗谱》中同时出现“郑铎”其人。

据核对证实三家族谱所记确系一人。

据《浦江县志》载，“事隔靖难之役二百年后，在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者秉铎闽之镇海卫，致书浦江郑氏，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后子孙颇繁盛”。随信还附了一份“闽之镇海卫”的郑铎出具的文书，证明自己先祖跟随皇帝出亡，流落云南、广东，子孙后代繁盛。查阅明崇祯年间修的白麟溪郑义门《郑氏宗谱》卷10中义门第十五世孙郑崇宏的记述，文曰：“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秉铎闽之镇海卫寄书请谱。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蒙自子孙因家族颇繁盛，方之。”[②]义门清编《麟溪集》中第十六世孙郑尚潘之《致身录节略》中之文“明系讳其洽也。则蒙自之郑。为洽祖之嫡裔。无疑矣”。作为传统社会宗族奇葩的浦江郑义门，在明清传统时期对蒙自之郑的认祖归宗的论证应该是慎重的，能够写进族谱并交代如此清楚即为佐证。据郑岐村《下井堂郑氏宗谱》中的《世系表》载：“郑氏迁居郑岐始祖坟之时，先祭崎公坟，

① 芮顺淦：《家族史上的奇葩廉洁德治的典范一 江南第－家：浦江郑义门琐谈》，（东南文化》2003年第1期。

② 浦江白麟溪郑义门《郑氏宗谱》卷10，崇祯年间。

次祭本坟，子孙均须登山受胙。但前时粗石为碑，年深月久，碑字不明，因而失名，三世郑铎”，于是郑铎的爷爷郑洽与郑岐成为焦点。

2. 浙江浦江郑义门的郑洽与福建宁德郑岐村之郑三合生辰八字同。根据江南第一家郑氏义门宗谱“麟溪集”和“希忠录＂记载，郑岐村郑氏分支宁德城关下井堂郑氏“东井谱”以及厦门市郑坂村碑记等史料显示郑三合（郑洽、郑岐）出生于至正癸未（1343）十月初十日。此亦进－步证明郑三合、郑岐就是郑洽。更名不符合郑义门“孝义之风”，古人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但在严酷的“灭十族”“瓜蔓抄”的背景下，不更名则引来杀身灭族之祸，于是采取折中方式，根据古书《作法六秘说》“离者，合之反也。岐者洽之反也”，巧妙地将“水之合”的“洽”字更名为“山之分”的“岐”。改名为郑岐。

3. 浙江浦江郑义门与福建宁德郑岐村存在许多共同文化特征。福建省宁德市郑岐村《下井堂郑氏宗谱》称“白麟谱”，浙江省浦江县有白麟溪（即今郑义门所在地的白麟溪）。郑义门有一公用井，唤作“孝感泉”，为元代石砌建筑，呈圆形；郑岐村亦有一公用井，唤作“郑宅井”，为明代砖砌建筑，呈方形。浦江白麟溪郑义门《郑氏规范》中的家规家训中第 11 条“毋用妇言以间和气，毋为横非而扰门庭”等对宗族子孙社交理念与郑岐村徽派建筑物的柱子上对联如“无益人言休着口，不干己事莫当头”等同理。郑义门挂着“九世同居”的匾额，而福建省宁德市郑岐村一直流行着一句“九世同居”的行酒令。据村民郑慈安所言：族里有个风俗，生了男孩要在来年春节摆酒席，席上要由老人传诵四句吉利话“新正火炮入华堂，子孝孙贤庆新春，九世同居郑忠义，子孙九代家不分。”郑义门有一块题匾，曰：孝义门：福建宁德郑岐村亦有一块题匾，曰：忠义第，等等。

经过福建宁德郑岐村四上浙江浦江郑义门文史研究会两下福建宁德查考比对，福建省宁德市郑岐村郑岐被确认为浙江省浦江县郑义门八世祖郑洽。而据白麟溪郑义门重修《郑氏宗谱》载：“建文四年，同居八世祖洽公随帝出奔，合族几达灭族之祸。洽公二子樵、模随母王氏隐居。一直至万历义门郑氏宗谱

讳套名，后世莫知其终。今稽南山之麓，桃源郑氏宗谱，其源流与吾宗族吻合。经族众确认，洽公裔孙于2009年归兮义门郑氏之源。此举既慰洽公之忠魂，又圆义门二十六昆仲季弟之缺。”[①]从浦江郑义门族谱的记录可以看出，郑洽为建文近臣，且跟随建文出亡，失踪了600年，现在建文帝近臣郑洽公突然在宁德郑岐村出现。2011年4月21日，明史专家商传教授调研郑歧村郑洽认祖归宗郑义门之事后认为，建文遗臣郑洽在宁德的出现实际上支持了建文帝出亡东南说。可以说，这是建文帝出亡宁德的另一重要佐证。

（四）永乐年间宁德三任知县为何有姓无名？

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从立邑至清乾隆中期宁邑历任知县共190多人，唯独永乐间连续3任知县有姓无名。而与此同时，永乐年间发生于宁德的一些皇家大事也被“省略”了。为什么会这样，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隐情？

没有记录的明永乐年间宁德发生的大事。第一，周觉成奉旨督建华藏寺。《闽书·方域志》关于支提华严寺的记载：胡元末寺毁废。皇朝永乐初遣中使周觉成鼎建，敕名华严寺。[②]清编《支提寺图志》亦记载了此事：“明永乐五年，钦差中使太监周觉成建大殿，赐额‘华藏寺’，诏无碍禅师住持。”第二，郑和奉旨送千尊铁佛到支提寺。内官监太监郑和奉旨护送千尊铁铸天冠菩萨像至宁德支提寺在支提寺现存的明代木刻《支提寺全图》中，还依稀可见。内容为：“天冠说法之处□□□□□□□尊宿澄鉴荷南宋荣封于嘉定迨我□成祖文皇帝握乾符以异位泽被九流仁孝皇太后体坤德以资他恩隆三宝圣像铸千尊□□□□□□□□内官郑和送□□□□□□□□”该木刻证明郑和于永乐五年到达宁德。明谢肇淛《长溪琐语》也有记载：“菩萨岭在支提那罗岩之下。成祖文皇帝时铸天官（冠）千身，赐寺中，遣太监郑和航海而至。”[③]

---

① 重修白麟溪郑义门《郑氏宗谱》，2005年。
② 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4页。
③ 谢肇淛等：《由霍林上支提记》载《宁德支提寺图志》卷4，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在中国传统这个家天下的社会里，皇家之事皆为国家大事，其形式是钦差奉旨出使。对于地方而言，此类事被定位地方之头等大事。钦差大臣到宁德，该地主官按照礼制接待那是肯定的，特别是明初这一对礼制要求极为严格的时代。当然做记录也是必然的，符合中国重视历史的传统。但翻阅嘉靖、万历宁德地方志却无此记录，为什么？与此同时，连这个时候的三名主官的名字也省却。赵柏田的研究："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被大量销毁，宫廷档案和皇帝起居录等被涂写和修改，一切记载这一政变的私家记述和文献都被禁止。"[①]是否因此被特意删除了呢？

2. 三任无名氏宁德知县与特殊的历史背景的猜想。据《明神宗实录》载："万历十三年三月壬辰，释革除年坐忠臣方孝孺等谪戍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②]"又据明谈迁著《国榷》载：从永乐四年至永乐十年，福建全省先后有福建都指挥使张錳、建宁知府芮麟、巡按福建御史赵升、福建巡海指挥使李彝、福建都指挥使童俊、福建右布政使张拱辰、福建御史殷昶、福建行都指挥佥事刘达、福建都指挥佥事张豫、福建按察司副使陈思聪、福建按察司副使卢文达等 10 多名五品以上要员被处置或被贬职。"[③]

朱棣要销除建文朝历史痕迹，下令将建文朝官方档案及记载尽数焚毁。这些政策造成了政治高压和党禁文禁的严迫，使逊国之际，严网四张，人人在刀俎之上，凡建文故臣之文字，人们不敢收藏片语。诚如万历中期史家屠叔方所云："文皇帝人继大统，党禁严迫。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讦、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但成祖仍不满足，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实录是要置于宫中保存，并不在民间流传，因而对当下的社会影响还有一定限度。在成祖授意下又修撰了《奉天靖难记》，集中表达官方对建文朝的

① 赵柏田：《朱棣的"清洗记忆"运动：销毁档案篡改历史记载》，《北京档案》2012年第 3 期。
② 《明神宗实录》卷 159，"中研院"历史研究所校印，1962 年第 2927 页。
③ 谈迁：《国榷》，卷 13-15，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否定态度。该书进一步歪曲相关建文朝历史事实，粉饰成祖即位的合法性，甚至捏造建文帝是矫诏篡位。”①

而宁德（今蕉城）县被处置的各级官员中，比较典型的是永乐五年至永乐十六年的连续三任知县资料被处置的史实。据清乾隆《宁德县志》载：“贾得善。萧山人，永乐元年任，有传。李某，失名，永乐间任。姚某，失名，常山人，永乐间任。包某，失名，永乐间任。张初，浙江安吉人，宣德四年任，有传。”②明嘉靖《宁德县志》载：“本……乐年。贾得善。见名宦。李某，姚某（常山人），包某。宣德年，张初，见名宦。”③万历《宁德县志》记载与嘉靖《福宁州志》记载大体相同。在宋至清历任知县都记全的情况下，唯独永乐间三任知县有姓无名，也缺乏相关的信息。周觉成郑和到支提寺与同时期的三任知县的有姓无名，应与潘忠泉、李怡、赵柏田等学者研究的朱棣销除建文朝历史痕迹属同一件事。本为永乐清理建文历史痕迹的一桩小事，但联系同时出现于宁德的云锦袈裟、上金贝古墓郑岐村郑氏认祖，可以合理推断，永乐年间宁德三任主官有姓无名绝非偶然疏漏，显与建文帝出亡宁德有关。

（五）永乐帝为何强化对闽东的军事控制？

明初对闽东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在县城建立文职公署，在各险要地域建巡检司，在各地驻军，设校场烽燧等军事设施来实现。明初在闽东这一区域驻扎有四县共计守城弓兵1500人左右，十二个巡检司大体兵力656人，旗兵7 370人，水寨卫兵1 690人，辅兵295人，合计11216人。具体情形如下：

1. 明初在闽东大地的军事力量布局。

关于明初在闽东的军力布置，主要表现在县治驻军、边界驻扎屯田军、沿海设置烽燧，内地险要处设巡检，在县治、屯田军、巡检司、沿海烽燧间通过铺递传递消息而形成网络。

① 潘忠泉、李怡：明代建文朝史修纂的开山之作：《革除录》，《图书馆论坛》2007年第1期。
② 乾隆《宁德县志》，1983年重印本，第211页。
③ 嘉靖《宁德县志》，第826页。

1. 军屯情况。明初闽东地区具体屯田军情况：

表 1 明初福宁州屯田军部署情况

屯名	具体位置
左所屯二所	州一都草坂底起至四都止
右所屯二所	州五都大清化起到培育都大飞泉止
中所屯二所	州二十都大坪起至二十一都止
前所屯二所	州二十一都杉洋起至二十五、六都崇儒止
后所屯二所	州四十四、五清皎起至四十六都下浦止

备注：福宁卫指挥使司屯田 10 所，共田地 192 顷 74 亩 4 分，计旗军 717 人。

资料来源：黄仲昭：《八闽通志》（上），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再版，第 908−909 页。

表 2 明初福州右卫指挥使司旗兵在闽东屯田军部署情况

屯名	具体位置
中所屯五所	古田县四所，俱在五都破察乾起至十都前山止
前所屯五所	古田县十二都起至四十四都赤桩止
后所屯五所	古田县一所

备注：福州右卫指挥使司屯田新旧共 39 所，共田地 576 顷 64 亩 3 分 3 厘，旗兵 1926 人。

资料来源；黄仲昭：《八闽通志》（上）第 851−852 页。

表 3 明初建宁左卫指挥使司旗兵在闽东屯田军部署情况

屯名	具体位置
福州府古田县 18 所	在一等都宝石等处
福宁州宁德县 2 所	一所在县南二都飞鸾渡，一所在县西一都白鹤岭

备注：建宁左卫指挥使司；屯田21所，共田地406顷73亩4分8厘，计旗军1355名。

资料来源：黄仲昭：《八闽通志》（上）第861–862页。

从上述三个屯田驻军表格中可以看出：屯田军散布于在闽东东北部的福宁县、闽东西部的古田县境内，闽东南部的宁德二都飞鸾渡和一都白鹤岭。在闽东大地的西部、南部、东北部形成厚实的屏障。当然，这些散布于闽东各地的屯田军不仅为当地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对所在地及其附近有治安方面的作用，并且与行政机构等策应，共同管理闽东地区。

2. 明初福宁州烽燧部署情况。关于明初闽东海防，主要布置于福宁州沿海的烽燧。

所在地域	名称
一都	沙松、台澳
三都	赖离、后琦
五都	大青画、小青画、东壁、离智、烽火
七都	梅花
八都	三山、大峰、南金、金家
十都	南岭、白露、水澳
十一都	黄琦、白岩
十五都	沙埕
四十一都	右县
四十二都	长门
四十五都	积石、闾峡、南山、罗浮、赤崎、小南
五十一都	塔尾、下许
五十二都	青山、界石
五十三都	刘金、下笔、车安、石湖、关崎

资料来源：黄仲昭《八闽通志》（上），第849-909，887-888页。

据上表可知，明初在闽东东南的福宁谈得上 的一都、三都、五都、七都、八都、十都、十一都、十五都、四十一都、四十二都、四十五都、五十一都、五十二都、五十三都等十四都设置烽燧38处，驻兵守卫，传达警报形成对沿海的防卫带。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明初在闽东的西部、南部、东部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即东部即福宁县驻扎屯田军和在沿海建立烽燧驻扎水军，在西部即古田县西部驻扎屯田军，在南部即宁德一、二都和古田南部驻扎屯田军队，从而形成一个三面包围的闽东军事格局。在这一格局的内部通过建立福宁县古田县、宁德县、福安县等县级行政机构，在要害之处建立巡检司、关隘，并在闽东大地上建立了行走于古官道之上传递信息的铺递，从而形成一个有点、有线、有面，且点中有重点，线有主线，面有实面的东、西、南厚实，县治行政中心坚实，险要地带特置巡检的网络。

2. 闽东军事与福建其他地区的比较

明洪武至永乐间福建各府户数、人口、巡检司、铺递、烽燧一览表

府别	户口		巡检司	铺递	烽燧
福州	94514	285265	13	101	
建宁	122142	392468	9	124	
泉州	41824	180813	16	71	53
漳州	49254	317650	12	80	11
汀州	43307	252871	7	68	
延平	63584	236325	8	76	
邵武	39644	132282	2	48	
兴化	31687	180006	6	20	53
福宁	6200	18335	10	57	38

备注：1. 古田县，户7085，口20 112；寿宁县，户3 252，口11 651。

2. 建宁府左卫旗兵1 355人，共21所；古田县18，宁德2；巡检司寿宁县1，

铺递 6；政和县赤岩巡检司现属周宁。

资料来源：黄仲昭：《八闽通志》（上），第 390−398、847−906 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根据《八闽通志》载：明初福建人口总数为 1995 915 人，全省陆地面积 121400 平方公里，宣德元年（1426 年）明会典：福建原额兵 125 381 员名，见在 38 475 员名。闽东的人口总数 50 098 人，陆地面积 13379 平方公里，2 总兵额 11216 人。那么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数字：福建土地面积是闽东的 9 倍多，人口是闽东的 39.8 倍，兵额数是闽东的 10.88 倍。福建省每平方公里 16.44 人，每平方公里 1.03 个士兵，每兵负责管理 15.91 人。就闽东而言每平方公里 3.74 人，每平方公里 0.84 个士兵，每兵负责管理 4.35 人。从以上的数据看，明初的闽东每平方公里人数是福建省平均数的 0.22 倍，每平方公里士兵数是全省平均数的 0.84 倍但因为地广人稀，每兵负责管理人数则是全省平均数的 0.27。从巡检司铺递、烽燧的比例看；福建省的巡检司总数为 83 个，铺递 645 个，烽燧 155 个；闽东的巡检司为 12 个，是福建省的 1/7 强；铺递为 57 个，是福建省的 1/11 弱；烽燧为 37 个，是福建省的 1/3 弱。但就面积占 1/9，人口占 1/40 的闽东来说，明初政府对该区域的军事控制力较全省平均水平高出很多。

据《明史・地理志六・福建广东广西》记载，洪武时，福宁与宁德两县仅设 4 个东洋麻岭巡检司，至永乐初，巡检司猛增至 16 处，分别是东洋麻岭巡检司、柘洋巡检司、芦门巡检司、大箕笆巡检司、清湾巡检司高罗巡检司、延亭巡检司、蒋洋巡检司，小澜巡检司、库溪巡检司、蓝田巡检司、西白巡检司等。”这些（福建）卫、所与其他各省卫所的增设，使永乐时期所设的卫比洪武时期增加了一半（洪武时期全国设 329 卫，永乐时期全国设 493 卫），千户所比洪武时期增加了 5 倍（洪武时期全国设 65 个千户所，永乐时期全国设 359 个千户所）。由此可以看出，闽东军事力量的加强应在永乐时期。

根据以上史料显示，明洪武时期，闽东业已形成东面为福宁州烽燧，南面和西面为屯田军，险要地段设巡检，核心地带为县治所在地，在各个点之

间通过铺递加强联络的军控网络。闽东为福建最且克复的地方，曾为明克复全国的大后方，按常理，应最为安全，且经过洪武三十年的发展，政治更热稳定。但永乐初年却大力强化军控，最终形成极为严密的军控网络。为什么永乐帝要不惜代价、彰费如此巨大的军力在闽东布置严密网络？莫非永乐帝已察觉出建文帝出亡宁德的蛛丝马迹？显然，这也反面间接证实了建文帝出亡宁德的事实。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的物证和事证，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初步结论：

第一，云锦袈裟物证与历史文献记录相符，且与上金贝古基隐含的信息相呼应，支提云锦之主人与上金贝古墓墓主应为同一个人，且具备“九五之尊”与僧人双重身份，而明初具备“九五之尊”与僧人双重身份者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和靖难之役中逃亡的建文帝朱允汶。明太祖帝陵在南京，正史中班班可考，唯独此主人正史和地方志书无考。所以，支提云锦之主人与上金贝古墓墓主最大可能只有建文帝朱允汶。

第二，建文帝近臣郑治更名郑岐或郑三合潜伏于上金贝山脚的宁德郑岐村，并且其墓葬位于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濂坑村后壑坑，背靠上金贝古墓，与上金贝古墓在同一中轴线上，采同一坐向；郑岐村村落面向上金贝，背对大海的奇特布局，与“枕山、环水、面屏”的基本风水格局相左。但这符合浙江浦江郑义门忠孝家风，这无疑进一步佐证建文终亡宁德。而从浦江郑义门和宁德郑岐村现存族谱查考比对可知，郑岐即郑洽的更名，且两地郑氏家风相近，这更有力地佐证了建文帝出亡宁德一说。

第三，明初钦差郑和与周觉成奉旨到宁德之事在正史和地方志中被隐去，以及永乐间《宁德县志》中连续三位宁德知县材料被删除，而同期在福建其他地方志主政者的记录相对完整，此现像与地方撰史体例不合。这绝非偶然疏漏，显然与永乐帝登基后发动的销毁建文时期有关建文档案篡改历史记载的“清洗记忆”运动有关。永乐皇帝不惜代价耗费巨大军力在闽东布置严密的军事控制网络，则可能与他已察觉建文帝出亡宁德，故而在宁德采取军事严控措施。这

些事实虽不能成为建文帝出亡宁德的直接证据，但亦从反面印证了建文帝出亡宁德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建文帝出亡宁德不但可能，而且是事实。

①吴廷燮撰魏连科点校《都抚年表》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499 页；

②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德地区志》、方志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102 页；

③《明史》卷 45《地理志六 · 福建广东广西》第 1132 页。

（责任编辑：归愚）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师院

皇太孙朱允炆侧妃陈凤春身世之谜探秘

王道亨

闽东域内，一直在盛传“皇帝妃子”也即“皇后娘娘”的故事。尤其是“鸭母娘娘”的故事流传更为广泛。《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 福建卷》所辖之宁德（今蕉城）、福安、寿宁、周宁、屏南、古田 6 个县的分卷均记载了鸭母娘娘的故事。至于未收入该丛书的关于“皇帝妃子”也就是“皇后娘娘”的传说故事，数量要比这多得多。

耐人寻味的是，关于这位“皇帝妃子”抑或是“皇后娘娘”的籍贯，传说与记载却完全不一样。福安、周宁分卷记载她是福安晓阳人，屏南分卷记载她是寿山溪病人，寿宁分卷记载她是凤阳锣鼓山人，古田分卷记载她是小东凤阳山人，而宁德（蕉城）分卷则记载她是漳湾南埕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像呢？很明显，是在掩盖什么？

笔者认为，最初编造这一故事的人们是为了掩盖的确存在的“皇帝贵妃”或“皇后娘娘”的真实籍贯。

那么，这个闽东籍的“皇帝贵妃”或“皇后娘娘”到底是哪朝哪代？哪个皇帝的皇后或贵妃呢？是闽东哪个县的人呢？

首先，我们用排除法将传说中的“闽王妃子”“正德娘娘”“洪武妃子”“乾隆皇后”等排除，因为这些皇帝都没到过闽东地界。历史上，唯一到过闽东的，仅建文帝朱允炆一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传说中的“皇帝贵妃”，应该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妃子（因为建文帝的正宫小马皇后在南京城被攻破后，被烧死在皇宫大内里了，这是正史上有记载的）。

其次，这个与建文帝一道南撤的闽东籍的妃子到底是闽东哪里人呢？

从2008年以来，我们在踪迹建文帝的闽东籍妃子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开始，瞄准了周宁县浦源镇白云庵，但一直无果；后来，又转向研究蕉城区漳湾镇南埕村的“鸭母娘娘”，结果，又是徒劳无功。直至2019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们的研究小组成员陈永霄、陈丽斌看到了一本修于清道光年间的《陈氏家谱》，此课题才算真正有了重大突破。

蕉城区洋中镇东山村《陈山下里厝谱》是一本陈姓人的支谱，是一位陈姓农民群众保存下来的，其真实性比较可靠。该家谱中赫然记载着这么一段文字：陈姓六世陈岊（音jié），洪武末任京官时，“挚一女闺名凤春，入宫为皇太孙侧妃。”这也就是说，第一，皇太孙朱允炆侧妃陈凤春入宫是洪武帝在世时就定了的事，为何《明实录》《明史》不载此事？很显然，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暴露了建文帝和陈贵妃一度隐辟于宁德（今蕉城）西乡（今洋中一带）的行踪。第二，东山村与帝师周斌的故居地蓝桥村紧紧相邻，陈家女之所以能够入宫为皇太孙侧妃，是否与周斌有关？第三，陈岊其人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一书中“墓生儿”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如按传说故事记载，陈氏家人是遭了大难了。这事与宁德（今蕉城）陈塘（今琼堂）陈姓人被燕军

查抄（抄族）是否有关？第四，这个陈贵妃在建文帝出家后，携带三皇子朱文奎去了何处？受建文朝锦衣卫都指挥使杜华泗护卫并隐居在古田县大桥镇松岩（今瑞岩）村的“日庙”与“月庵”中的那位“妃子”与“太子”是不是就是“陈贵妃”与“三皇子”？因为古田大桥瑞岩离蕉城洋中东山仅二十多里地。

笔者认为，随着建文帝踪迹研究的逐步深入，建文帝妃子陈凤春的身世将会越来越清晰。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方志研究室

“孝文帝”与“小登基广场村”

陈永霄

我是蕉城区洋中镇洋中村人，从小就很喜欢听故事。记得曾经听父亲讲过一则“孝文帝”与“小登基广场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落难的皇太子”，被那些追随他的文武大臣拥戴做皇帝，在今石后乡的小漈、大泽溪一带的山腰上的一个村庄举行了“登基仪式”，帝号“孝文”。因为此事，西乡（今洋中、石后、虎贝）一带的百姓就把那个村庄叫作“小登基广场村”。

至于这个“孝文帝”是哪朝哪代人，父亲说不明白，我也探究不明白。就这样，云里雾里地延续了几十年，困惑了我几十年。

直到 2008 年，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后山发现明代第二个皇帝朱允炆的墓葬，消息传来，我大脑灵光一闪：我父亲说的这个“孝文帝”，会不会就是那个“建文帝”呢？

我把自己的想法与宗亲陈言雕作了商讨，他也觉得有可能。

于是，我们便把这一情况向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王道亨组长作了汇

报。王组长和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认真分析、研究了我们反映的这一情况，他们认为：第一，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它说明，建文势力在闽东曾有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抵抗活动；第二，在小登基广场村“登基”的应该不是建文帝，因为朱允炆已经是皇帝了，这是天下人皆知的事情，没有必要这样做。因此，在小登基广场村“登基”的另有其人。至于是谁呢？王道亨组长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正史记载的，由建文帝的兵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廖平护卫的建文帝的太子朱文奎。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廖平、朱文奎到达闽东的踪迹。第四，虽说小登广村“登基”的不可能是建文帝，但此事必定与建文史事有关系。

于是，研究小组决定对小登基广场村及其周边的乡村开展一次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

果然，在小登广村及其周边有了一系列新发现。首先，在村中央发现了一座“菜堂”（即尼姑庵）。村里的老人说，这尼姑庵最初的庵主是皇帝的妃子。老人还告诉我们，庵里原先有供奉一尊“当京皇帝万万岁”的神祇牌，是为了祭祀“孝文帝”的。后来，这座神祇牌被文物贩子收购走了。其次，我们发现了两处明代的建筑；一为“阁楼”，一为“门楼”。尤其是那座“门楼”，与各地所发现的建文朝臣隐居地氏族的“门楼”一样，一律朝向上金贝方向（因为建文帝陵在那儿）。再次，我们在石牌岗地方发现了一座石构的“师公庙”，与各处的祭祀建文朝臣的“师公庙”一样，神祇牌只书姓氏不留名。石牌岗师公庙神祇牌上书“罗、张、杨三师公庙”。显然，这座藏头露尾的师公庙里的神祇，一定是死于该地方的建文朝臣。此外，我们还在邻村发现了一座被称为“猴墓”（侯墓）的古墓葬，据说是建文朝的一位侯爷的墓葬。至于这位“侯爷”的真实身份是谁，由于找不到家谱，一时难以弄清，只能留待日后探究了。

考察结束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观点：①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应该是不争的史实。②我父亲故事里所述的“孝文帝”，应该就是建文帝太子朱文奎。他被拥戴登基应该是建文帝到雪峰寺、支提寺、金邯寺出家后的事。③历史上，

在我们西乡，在洋中、石后、虎贝一带的确有大批建文朝的文武大臣隐居匿伏，他们的后人修的家谱应该有所反映。所有这些，都在等待我们去挖掘，去发现。

作者单位：蕉城区文明办

明建文末永乐初闽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移民潮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

王道亨

据长乐市罗联乡顶头村《李氏家谱》载："始祖讳观，字建极，祖居南京宠头里棋盘街石狮巷，官居南京镇卫指挥使。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 年）奉诏入闽。"靖难之变"后遂止于闽，娶陈氏与二世祖居焉。后抵吴航，过罗城多福岭，遇周、卓二公，见公英雄气概以止之。问所自，知为忠义良臣，结为异姓兄弟，遂于其旁以居。至五世祖仲龄公迁居今址。"又，多福岭东面有个岭东村，是个古村落，疑为始居地。

据长乐市罗联乡洋中村古灵自然村《陈氏家谱》载："始祖叔通公，字审亨，官议征。明永乐初从原屯军处闽县钦仁里迁洋中。"

据柘荣县城关《刘氏家谱》载："始祖刘邦颜，字维泽，号南池，明永乐元年（1403 年），奉旨率靖难军由镇江丹徒率兵入闽，为建宁总兵。永乐二年（1404 年），领兵至柘荣上营、下营地方驻扎，专责抄（剿）造反寺僧。"

据孙高桐主编《闽东孙氏志》18 页载："福鼎市管阳镇姚阳村孙氏是从江苏南京迁入的，先祖在浙江瑞安桐江传三代至孙寿公，在南京任军职。于明永乐二年（1404 年）授中军职，领军驻南平建宁卫左右衙前，后转迁福鼎姚阳。孙寿公遂成为姚阳开基始祖。"

据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杜氏家谱》载："始祖瘦汉公，名杜华泗，生于元至正十年（1350年）。明洪武朝任武官。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洪武帝驾崩，嫡长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瘦汉公仍在朝做官，为殿前三品指挥使。""永乐二年（1404年），奉旨（应是奉建文帝圣旨）顶军扒（播）种，定址松岩（即瑞岩村）。""京兆郡祖家在南京直隶太平府，当塗县，姑孰乡（今姑孰镇），就是前辈人传说的'南京凤阳府八角井'地方"。

据寿宁县清源乡漈头仔村《王氏家谱》载："王丽居处州二十八都，其子王盛迁居松阳，……王盛三子王达三世孙（王）益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随军徙漈源（今寿宁县清源乡漈头仔村）。"

据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八闽王氏》44页载："明永乐二年（1404年），（先祖）王文彬任职江西吉安，奉命率军入闽，守闽清路口。"

据《八闽王氏》44页载："明洪武年间，王安由安徽庐州统军入闽，定居鼓楼区钱塘巷。生子三；王端、王敏、王宁，均袭将军职。永乐初，王宁屯兵永福赤岸，分迁宁德县。"

据《八闽王氏》45页载："明洪武年间，王新兴由江西吉安岩头村入闽任延平卫。永乐二年（1404年），随军屯田定居罗源洪洋大目。衍分松山镇小获村，分迁宁德县。"

据《八闽王氏》59页载："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王继成（王延政长子）十三世孙福州长乐彭坑人王氏儿（又名王知本）从戎助明军攻克福州有功，领百户。王氏儿有三子；长兴祖，字良恩；次佛生，字良来；三良贵，字良慈。……王氏儿次子王佛生，于明洪武二十年抽补为小旗官，先后镇守福清镇东卫、泉州永宁卫。永乐二年（1404年），奉旨屯田。其长子王子英承父官职，领兵至安溪三洋（今属芦田）军垦。"

据《八闽王氏》43页载："明永乐二年（1404年），王胜由安徽凤阳横路下八角井随军入闽，后迁闽清二十三都橘林林洋。"

据林国平著《福建移民史》56页载："张姓石巷大妹澄塘张，入仙（游）

始祖福庵公第三子膺公第十四代孙，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奉诏食屯各府县。胜山公移屯漳州（龙溪），今族姓里居，仍福州金斗号；胜光公食禄仍居在省；胜生公食屯兴化，爰择仙（游）之万善里锦溪，而坐亭其上，居室遂以“亭下”名，而著姓亦称亭下张云。”

据《福建移民史》57页载：“明永乐二年（1404年），实行解甲屯田制，（张姓）奉帝诏，从福州府都卫左右所（应是福建都司左右卫）调入仙游屯田的有220人，其中主要分布在兴泰里及其他一些地方。经考证共有6支；（1）钟山霞厅张，入仙初祖世斌公，字文质（其父兴信公任福州后所百户侯<应为百户>，因承授总旗，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拨兴化府兴太里就职），遂卜居于今钟山镇湖亭村霞厅（亦名龟山霞厅）。裔衍卓泉村的新霞厅下厝张、顶厝张、寨尾张、后面张、塔尾张、东溪村的柿岭张等处，人口2503人。（2）钟山梨山张，入仙初祖八哥公，于永乐二年（1404年）奉帝牒屯田卜居现在钟山镇东溪乡梨山村。裔衍本村的仓前张、坑厝张、游洋五里村的湖里张等处，人口1854人。（3）西苑乡西乾张，入仙初祖关保公祖籍南京直隶府汀溪场(其父九三公在福州府都左卫(应是福建都司左卫)所(应是千户所)任职，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随屯众先卜居外源场，后卜居西乾村。裔衍凤山湄溪张、像溪八溪张，入仙初祖先启公，为始兴堂（曲江）九龄公派系，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奉帝牒偕众卜居于兴太里岳帝庙后的山兜，故称岳后张。裔衍本村的上岳后张、下岳后张、东溪村的宫后张、罗尾山张，麦斜村的汾水张和盖尾聚仙林半山张等处。（5）钟山和阳张，入仙始祖安实公，讳豹左，官指挥使。明永乐二年(1404年)，解甲屯田先后卜居兴太张宅，因地势低洼，常遇水患，遂于明万历间迁居现天珠村和阳。裔衍本村的旧厝、新厝、石顶、下厝、中兜张和游洋和星村的白石林张等处，人口722人。（6）钟山佩厝张，入仙初祖智广公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随屯众卜居现卓泉佩厝村繁衍生息，现有人口410人。）”

据《福建移民史》67页载：“夏姓，明永乐二年（1404年），由江苏定

远县迁入福鼎叠石、库口、大章、南溪等地，后迁居桐山玉塘村，始祖夏章保。至今已传46代，约500多人。”

据《福建移民史》70页载：“德化霞碧彭姓始祖彭闰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由泉州拨军迁入。”“德化隆泰凤阳曾姓始祖曾仁寿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南安前训武营迁入。”“德化浔中高阳陈姓始祖陈治子、陈顺德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同安县从顺里三都埔头迁入。”

据《福建移民史》77页载：“（福鼎）丹桥钟氏始祖讳舍子公，乃建宁右卫左所夏百户属下小旗官，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同总旗官邹佛保领六姓到福宁店下屯驻，为最早入迁福鼎的畲族钟姓。……该派钟氏自明永乐二年（1404年）入迁福鼎后，世系发祥，子孙繁衍，分迁福鼎井头、山兜、店下、格山庵、才堡岭脚、老鸦湾、油坑、龙头湾、三步樞、坑兜、坑门唇马渡、西岐月梳洋、吴家溪等处。”

据《福建移民史》139页载：“刘璋，江西宜黄县指挥使，明永乐间（1403—1424年）随王师入闽，遂择地于宜洋（今屏南县辖）而居之。”

据《福建移民史》140页载：“雷姓移古田有二支，……一支于明永乐间（1403—1424年）从江西迁古田雷家村（又名罗家墩），后迁中村雷厝墩，定居梅坪、溪里厂。现有281户，1619人，占全县人口0.4%。散居梅坪、招坑、五斗、马山头、山墩、银山、苏墩、溪里厂、东双。”

据《福建移民史》141页载：“曾氏始祖曾孟宁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弃官由江西新淦迁入福州洪塘。”

据寿宁县清源乡杨柳楧村《叶氏家谱》载：“叶氏始祖贤玉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从浙江景宁巨则上村半岭徙居政和北里杨梅村（今寿宁县鳌阳镇辖地），居数载又迁杨柳楧村。”

据莆田涵江后度《方氏族谱》载：“方孝孺被磔后，妻郑氏（浙江浦江郑义门人），弟孝支亦死，子中宪、中愈先后自经，二女投秦淮河死。侄畏庵，名志道，知家必不免也，固存宗祀，深自晦匿。偕弟体乾，名志州南逃。于永

乐二十年（1422年）壬寅，度仙霞岭，逾岭峤，入闽至莆，先居城东。畏庵死，体乾偕嫂黄氏，携侄安礼，购地自居桂岭。”据林祖韩先生考证，方孝儒“侄志道、志州变姓名，辗转入闽，于永乐二十年（1422年）至莆城东。方志州则在涵江以教书为生。正统九年（1444年）始定居青璜山，建宗祠称‘桂岭方’，即今后度之方姓。大约在明末，涵江后渡方氏已衍成大族，科甲联芳。遂有方氏宗祠、方家大厝和瑶山书院等建筑物。涵江后渡‘桂岭’方遂成为莆田方姓三大支派中的一个。”

据蕉城区洪口乡库山村《朱姓家谱》载：“（该村）朱姓来源有二，其一来自七都镇六都村，其二来自南京凤阳府八角井地方。由南京航海入闽，先居霞浦县大京城堡，后徙宁德（今蕉城）西乡洪口库村。入闽先祖官阶很高，在南京与大金时，与其他官员相遇，他人都要避让。据说是个“天官”（吏部大员）。在库村时，只精心种植方竹与酸枣，据说皇帝喜欢吃方竹笋与酸枣果。”

据福鼎市管阳镇金钗溪村《朱氏家谱》载：“（该村）朱姓有两个来源，一支来自浙江省苍南县三桥镇地方，大约是宋末迁现址。一支来自南京凤阳府紫金山（又称南京凤阳府紫竹湾）地方，大约是明永乐初迁入现址。来自南京的这一支朱姓人始祖朱癸二（化名），原系南京金吾卫将军（应是亲军都指挥使司下辖之上二十二卫之一的金吾卫指挥使）。”该村朱姓宗祠内供奉着一尊“白衣相爷”神祀，与祖宗朱癸二神像并列，享受朱姓后人祭拜。祠堂外百米处还建了一座“清隐亭”，以纪念这位“白衣相爷。”

据蕉城区八都镇吴山村《吴氏家谱》载：“始祖吴二明（化名），于明永乐间（1403-1424年）由江苏南京紫金山迁福州府古田县东（今屏南县黛溪镇辖地），旋迁吴山村。是个御医。”

据连江县江南乡儒阳村《胡氏家谱》载：“始祖胡福龙又名胡护龙（均为化名），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隐居连江县儒阳村。先时，始祖胡福龙与其父胡卓汉均隐居连江县瓮下村。后建文军到福建，父子俩应诏复出。胡卓汉跟随廖平任皇长子护卫，胡福龙则仍任福州府左卫将军。燕军攻下福州后，

胡福龙复归隐连江县儒阳村。胡卓汉下落不明。”儒阳村胡姓长老口述称，胡卓汉奉旨跟随兵部侍郎廖平一起护卫皇太子朱文奎去了，不知所终。

据蕉城区漳湾镇郑岐村《郑氏家谱》载：“始祖郑洽公，化名郑三合、郑岐，先后隐居濂坑村、郑岐村，时间系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郑姓村民有一特异风俗，在郑姓祠堂内供奉普庵禅师，春秋两祭。

据蕉城区飞鸾镇梅田村《郑氏家谱》载“先祖郑子智（化名）系浙江省浦江县郑义门八世二十六个堂兄弟之一的郑濂的后裔。郑子智追随建文帝于明永乐初入闽后，先居福州府，后迁漳浦县徐洋镇西霞村，复迁宁德县（今蕉城区）梅溪（今梅田）村。”“与子智公同时入闽居章的昆仲有子聪公、子明公、子睿公、子慧公诸公（皆化名）。”

据蕉城区霍童镇福口村《郑氏家谱》载：“先祖系浙江省浦江县郑义门八世二十六个堂兄弟之一的郑湜后裔。其追随建文帝于明永乐初入闽后，先居福安县（今福安市）后迁宁德县（今蕉城区）霍童镇福口村。”又传，郑姓人沦为朝廷钦犯后，把家产托付给管家董姓人，不料被董姓人谋夺。此事造成后来的郑、董两家成为世仇，不能通婚。

蕉城区石后乡石厝村《石氏家谱》载：“石氏家谱多年未修，先世恐有一二莫明。”“始祖竹所公南京汴梁人也(一说系南京凤阳府八角井迁来<见《宁川域情》324 页>）。（明初）随王（应是汤和）镇守海口（应是大金）。旋迁本县七都蔗园。后入赘崎兜林家。”石宗善父亲石铁讳字“南金”。

据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刘氏宗谱》载：“始祖刘廷琛，族人刘忠，追随燕王朱棣起兵，参加过白沟河大战，并随王入南京。永乐二年（1404 年），调防至大金千户所，任舍人之职。长子刘弼国袭父职，为大金千户所百户长”。

据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戴姓家谱》《曾姓家谱》载：大京戴姓、曾姓始祖是大金的第一批原住民，他们均是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跟随将军汤和航海入闽，攻取福州，回程时奉命留下屯守大金的军人。

据霞浦县长春镇大京村《朱姓家谱》《李姓家谱》《黄姓家谱》《王姓家

谱》《郑姓家谱》《林姓家谱》载：大京朱姓、李姓、王姓、黄姓、郑姓、林姓始祖是大金的第二批原住民，他们是跟随一个姓郑的将军（也就是坐落于城北门的城隍威灵公——皇帝御封的城隍爷），于明代建文年间来到大金屯守的。

据古田县杉洋镇璜溪村《黄氏宗谱》载："始祖亚方公，字矩团，号圆峻。明建文年间投笔从戎，屡立战功，升任卫指挥使。明永乐二年（1404 年），由浙江省温州府平阳县北港水头八角井黄家村随公之考妣木主迁居福州府古田县善德院（今古田县杉洋镇辖地），为善德黄氏开基始祖。"

据蕉城区虎贝乡黄柏村《姚氏家谱》载："姚姓始祖姚子高源自南京凤阳府八角井，系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辗转迁徙到达黄柏村的"。资料链接：姚姓祠堂内的两副对联暗藏玄机，"凤舞鸾翔百代昌，龙蟠虎踞千载盛""三支派繁衍俱宗，一脉流传无迹痕"。此联告诉世人，黄柏姚姓先祖有难言之隐。

据屏南县甘棠乡瑞云村《姚氏家谱》载："瑞云姚姓始祖姚晊系宁德（今蕉城）东蜀姚姓始祖盐铁副使姚廷义十四世孙。"又据福建省《姚氏宗谱》载："晊与其叔荣避元入古田，各卜居地，荣得厚荣（现古田县后仓村），晊得瑞云（现屏南辖）。相距可二百里许。时修宗好，后以远，故稍踈。晊生昭郎，昭郎生子高、子润、子容。盖是皇明玉宇矣。以故（指"靖难事变"，姚昭郎（化名）被诛杀，三个儿子逃返原籍）子高返黄柏旧庐；子润戍广性，后以将军显；子容（返瑞云）拓云天而张大之举。"

据《宁川域情》324 页载："石后乡石厝村石姓传由南京凤阳府八角井迁入"。

据屏南县黛溪镇《吴氏宗谱》载："吴姓始祖系明洪武年间派到古田县东部（今屏南县黛溪镇一带）督办银矿。该村庄名叫银墙村，洪武、建文年间年产量一般在 3 万两左右。而建文末年、永乐初年年产量突增至 5 万两左右。后来又突然被朝廷查抄关闭，人也不知去向。"

据《八闽王氏》第 43 页载："明永乐二年（1404 年），王宗盛由南京凤阳府八角井迁入闽清橘林高洋（阳）村。至今已传十五世，30 多户，100 多人。"

据《八闽王氏》第 44 页载："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闽王王审

知第二十二代孙随兄王谷政、王谷用由福州黄巷迁入闽清县下祝乡新村（杉村、岩富村）定居。至今已传十八世，100 多户，500 多人。”

据蕉城区漳湾镇门下村《黄姓家谱》载：“门下黄姓系由石后岭头迁入，时间是明永乐初年（1403 年）。该村原名石园中。迁入不久就被官府抄没了（烧掉了）。”相传，该村原有一座大房子，可连接红门里村，有长廊相连，下雨天走 5—6 华里都不要撑雨伞。现基础还在。村里尚存一口明代古井，雕刻有狴犴（龙的九子之一）。村里人建房经常挖到明代青花瓷碗等文物。

据蕉城区七都镇西林村《郑氏家谱》《彭氏家谱》载：“西林村原住民姓谢，明永乐初被抄没。后郑姓人于明末由福安濂村迁入。彭姓人于清乾隆间由洋中迁入。”

据蕉城区漳湾镇官沪村《韩氏家谱》载：“该村韩姓于明永乐初年（1403 年）由霞浦韩村迁入。迁徙原因是为了躲避战事与兵灾。”

据蕉城区八都镇云淡门村《郑氏家谱》载：“该村郑姓于明朝由莆田迁入。”云淡门村最高峰叫“官山顶”，海拔 223 米，据说是为了纪念镇守云淡门那个大官而命名的。该村呈八卦状。明代时，建文军曾在山上建了四个寨堡。

据福安市秦溪洋《王氏家谱》载：“始祖王世荣于明永乐间（1403—1424 年）由漳州横口谟房迁韩（指福安城关）。”

据寿宁县下党乡下屏峰村《王氏家谱》载：“始祖王凤六系福安穆洋卓家坂籍王畴德三世孙，系明永乐初由福安穆洋卓家坂（今福安市穆云乡桂林村）徙迁寿宁下党下屏峰村。”

据蕉城区七都镇三乐村《乐氏家谱》（乐仁遂支谱）载：“始祖乐仁遂于明永乐初由江苏南京凤阳府八角井徙迁宁德（今蕉城）七都三乐村。”刚到三乐村时，居住在石姓人留给他们的旧厝内居住（彼时石姓人已迁往石后乡石厝村）。

据屏南县古峰镇古厦村《黄氏家谱》载：“始祖系明永乐初由南京凤阳府八角井迁徙入闽。为屯军。居处曰黄厝。其后裔有一支迁长峅村。”

据蕉城区洋中镇莒溪村《冯氏家谱》载：“始祖于明永乐初由南京凤阳府

八角井迁徙入闽，后辗转来到洋中莒溪。”

据寿宁县下党乡曹坑村《蔡氏家谱》载：“始祖于明永乐间由江苏南京入闽，辗转徙迁下党曹坑。”

据周宁县咸村镇枣岭村《孙氏家谱》载：“始祖于永乐初弃官由江苏南京返闽，辗转徙迁咸村镇枣岭村定居”。另，该村有一特异风俗，每年阴历正月初一至初四，不燃放鞭炮（该期间为“明宗佛忌日）。村人需结伴去祭拜‘明宗佛’”。

据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余氏宗谱》载：余氏湾底分支“始祖余六府（化名）于明永乐初由江苏南京钟山入闽，辗转徙迁钟洋定居。”又，该村另一支余姓迁自古田县杉洋镇杉洋村。钟洋村余姓亦保留一特异习俗，即在余姓祠堂内供奉三座“明门诸佛”，供族人春秋祭拜。而钟洋周边村庄的村民则有供奉“青蛙神”的习俗。据说，“青蛙神”就是余姓始祖余六府将军的化身。

据寿宁县武曲镇甲峰村《黄氏家谱》载：“始祖于明永乐初由江苏南京徙迁入闽，辗转落籍甲峰。”

据古田县凤竹村《胡氏家谱》载：“始祖胡牛儿于明永乐二年（1404 年），由江西省封城县‘拨军落屯’古田凤竹，顶军扒种，派衍三房，外迁后路、马洋等村。”

据蕉城区城南镇福洋村的《颜氏家谱》与《宋姓家谱》载：该村的颜姓与宋姓，均是明永乐年间辗转徙迁至该地方的。

据蕉城区城南镇岐头村的《韩氏家谱》与《李氏家谱》载：“岐头村的韩姓与李姓，均是于明永乐年间辗转徙迁至该村的。”

据蕉城区飞鸾镇阮家洞村《阮氏家谱》载：“阮姓始祖于明永乐初迁该村”。阮家洞附近有个村子叫将军堡，明初有个将军落籍该村。该村村民的习俗十分奇特。

据蕉城区洋中镇眉屿村《詹氏家谱》载：“始祖詹斗二（化名）于明永乐初由江苏南京月半池地方辗转徙迁而来。”相传，詹姓始祖是钟洋村余六府手

下的一名将军。《詹姓家谱》记载了族人撰写的关于詹斗二其人其事的两首诗歌："一饮曾闻斗二升，魁梧神力足堪征，至今巨石巍然立，谁人见后不叹称？""豪杰寥寥出世间，古今遗恨笔难删，能留胜事堆顽石，可当羊碑峙岘山。"该村流传明代宫廷戏曲——四平戏，很有来头。又，该村秘传一木盒，内藏一图画。相传若打开，会招来杀身之祸。前几年被一青年盗出赌博输掉了。

据福鼎市叠石乡库口村《孙氏宗谱》载："始祖礼珀公系孙能公之子，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由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金城乡安业村石井栏边徙迁入闽，辗转定居库口村。"

据蕉城区洋中镇田地村观音堂须弥座石刻记载并参考钟洋村《余氏家谱》与留田村几本《黄姓家谱》，可以断定：留田村黄姓人有多个来源；黄子淳这一支应是由余姓（或他姓）改姓而来，是余六府的后代；黄道安这一支亦是由余姓（或他姓）改姓而来，应是余七府的后代；黄继祖这一支，应是由耿姓改姓而来，是耿睿（耿炳文儿子）与朱珍娘（化名朱一娘）的后代。如果余六府、余七府不姓"余"（透天余），另当别论。

据寿宁县斜滩镇印潭村《李氏家谱》载："始祖李显公于明永乐初领兵入闽，辗转至政和县善政里十三都（今寿宁县斜滩镇印潭村）落籍。"印潭三关底虎墓墓主王氏宜人系将军李显的夫人。

据《福建历代人口论考》载："明，林聪，赣州守，（弃官）隐于闽。"

据蕉城区石后乡芹坂头村《周氏家谱》载：明永乐初年，洋中周姓族人中有一支迁往罗源县万石洋村，具体是周斌本人还是他的儿子中的一人，尚不清楚。据说这支周姓人带走了一个神秘的木箱，箱中藏着一副画。又，芹坂头周姓祠堂大厅上原悬一匾，大书"玄堂永贲"四字。

据蕉城区金涵畲族乡琼堂村《陈氏家谱》载："先祖陈添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弃官（河南郑州府同知，调南京修《永乐大典》）回原籍。"据考证，陈添墓在金涵畲族乡廉坑村后壑坑地方，墓碑仅署"同知龙井"四字。该墓葬与上金贝建文帝陵在同一中轴线上。

据清乾隆版《宁德县志》399 页载："龚正，一都人，初名文寿。洪武九年，从军遵化卫，调会州卫。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以靖难功，授镇虏卫中所百户。正老，子富袭职，（永乐初入闽）调镇东卫梅花千户所。富老，侄德袭职。"

据浙江省浦江县桃源口郑姓于 20 世纪的 1983 年重修的《郑氏家谱》载："至族中传说福建、云南一带有洽祖子嗣，似无可非议。洽祖随帝出奔后，尚在世二十年之久，此间另有子嗣随从，亦有可能。兹桃源已归宗，而查清闽、滇两省郑氏之所宗，则有待于后之高明者。"

据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村《郑氏家谱》载："当年在护卫建文帝南撤时，郑洽为引开燕军，命次子郑松化名郑治（因"治"与"洽"字相像，易给燕军探子造成错觉）率领一部分老弱残兵逆向而行，西击燕军，在江阴战斗中阵亡。"

据霞浦县城关《卓氏家谱》载："始祖系建文朝忠臣卓敬小儿子。卓敬被夷三族，侥幸逃脱，于明永乐初辗转到达福宁地区，定居霞浦城关。"

据泉州市《洋埭村志》36 页载："明永乐元年（1403 年）林松（洋埭林姓始迁祖）依岳父王德先（泉州府儒学教授）居泉州庄府巷，松公喜爱洋埭风光，旋迁于斯。"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方志研究室

“日庙”与“月庵”
——兼论建文朝殿前三品指挥使杜华泗身世

吴 谨

（一）“殿前三品指挥使”是个什么样的官？

“殿前三品指挥使”应为明朝锦衣卫最高长官。查阅《明实录》《明史》诸书，锦衣卫全称系“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正式设置，首任长官系蒋瓛（蓝玉案制造者）。锦衣卫前身系“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改为“大内亲军都督府”，长官为毛骧（胡惟庸案制造者）。锦衣卫的职能原为护卫皇宫，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太祖朱元璋为加强专制统治，特令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权力。最高长官为指挥使，殿前三品。该职位常由功臣、外戚充任。下设指挥同知若干，从三品。指挥佥事若干，四品。南北镇抚司镇抚二人，五品。十四千户所千户十四人，五品。百户若干，六品。总旗若干，七品。基层为力士、校尉等。进入明中叶后，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成为“厂”“卫”并称的军事特务组织。

查《明实录》《明史》中有关锦衣卫部分史料得知，终明一朝，自首任长官蒋瓛以下，共计29人。如果算上锦衣卫前身的长官毛骧，一共是30人（详见“附录”）。其中，独缺明洪武二十六年至建文四年（1393-1402）这一任指挥使姓名。

那么，这一任锦衣卫指挥使到底是谁呢？为何《明实录》《明史》中独缺漏这一个环节的记载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分析一下这件事所处的历史背景。

明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军攻破南京城，建文帝出亡，朱棣称帝。朱棣上台后，废除了建文朝的帝号、纪年，改“建文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导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段荒唐的插曲，“一个死皇帝却拥有了活纪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洪武帝朱元璋

死了以后，还当了四年皇帝。就这么一件荒唐的事，在明朝建文之后 230 多年的历史上，却一直被历代皇帝捧为金科玉律，明知是错，却不去碰它，不作更正。直至清高宗乾隆时，才作更正，恢复建文帝（明惠帝）帝号、纪年，还了历史一个公道。

由于明成祖朱棣不承认建文帝朱允炆是一任皇帝，故《明实录》中，《太宗实录》直承《太祖实录》，中间缺了《建文实录》。建文朝在明代的官方历史中成了一个不存在的朝代。因而，建文朝的 460 多名在京的朝廷官员中，大部分亦成了一批“不存在的官员”，从而被整部明史忽略不载。

建文朝殿前三品指挥使杜华泗被忽略不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照理说，像杜华泗这样一个从洪武朝就开始任职的建文朝锦衣卫高级官员，史书是不应该把他遗漏不载的。可偏偏他是个建文朝从亡大臣，沾了建文帝的光，因而《明实录》《明史》上就自然没有他的大名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明史》《明实录》中，明朝的历任锦衣卫指挥使中独缺的第三任（或第四任）锦衣卫指挥使，也就是洪武二十六年至建文四年间这一任指挥使应该就是杜华泗。

（二）杜华泗其人其事考

据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杜氏家谱》8–9 页载：“始祖，瘦汉公名杜华泗，生于元至正十年（1350）。明朝洪武间任武官。洪武三十一年（1398），洪武帝驾崩，嫡长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瘦汉公在朝做官，为殿前三品指挥使。……永乐二年（1404），奉旨顶军扒（播）种，定址松岩。”“京兆郡祖家在南直隶太平府、当涂县、姑孰乡、二十七都”。“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三日，本次修谱理会成员凌书、昌曙二人去安徽省寻祖。二人走访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向山镇杜塘村，当涂县太白镇新桥村与当涂县薛津镇三地，因排行对不上，又改访当涂县姑孰镇（原姑孰乡）。据当地杜氏族人讲，姑孰镇（姑孰乡）就是前辈人传说的‘南京北角井（八角井）’地方”。“瘦汉公用过大刀一把，重

90 公斤，解放后一直放在杜姓旧厝门角。1960 年失踪。”

由以上四段文字可知，第一，杜华泗，绰号“瘦汉公”（跟随建文帝逃亡到闽东的建文朝武将大部分都有绰号，比如“六府公”，指余六府，真实名字不详，其系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余姓始祖，有墓；“斗二公”，真实名字不详，其系蕉城区洋中镇眉屿村詹姓先人，有墓；“黄艮公”，真实名字不详，其系蕉城区洋中镇溪源村黄姓始祖）系洪武朝武将。建文朝锦衣卫指挥使。第二，杜华泗原籍系京兆郡太平府当塗县姑孰乡二十七都，即俗称“南京北角井（八角井）”地方。该地方在当时应直隶南京辖。也就是说，瑞岩杜姓与钟洋余姓一样，都是来自江苏南京。第三，根据上文考证，杜华泗应该就是明朝 31 任锦衣卫指挥使中唯一被正史漏载的由洪武朝转向建文朝时期的锦衣卫指挥使。漏载原因就是因为其跟随建文帝出亡，最终落籍福建宁德古田。第四，第一段文字载“永乐二年（1404），奉旨顶军扒（播）种，定址松岩”。此处的“奉旨”显然奉的是建文帝之旨，不可能奉的是永乐帝之旨。因为其时福建闽中、闽东基本上还是建文势力控制的地盘，“燕军势力一时还不能到达”。此时，建文势力方面，匆匆赶到福建闽中、闽东勤王的各路人马，纷纷以“屯田军”的名义，占山为王，抗击燕军。而永乐势力方面，亦调兵遣将，向福建靠拢，占据路口隘道，以“剿灭造反和尚”为名义，把原福宁州地域围得像铁桶一般。因而也就出现了福建省各地的族谱中纷纷留下了先祖们于“永乐二年，奉旨屯田。”“永乐二年，奉旨镇守。”“永乐二年，奉旨抄寺僧”诸记载。据不完全统计，福建各地已有 80 多部家谱，均有记载到各自先祖于“永乐二年”这一特定的时间点，“奉旨入闽屯田”。“奉旨入闽镇守”。而这“奉旨入闽屯田”的，多数应是建文势力的军队。而那“奉旨入闽镇守”的，或“奉旨专责守路口隘道”的，或“奉旨专责抄寺僧”的，多数应是永乐势力的军队。这种状况，大约延续到永乐五年（1407），永乐势力全面控制闽东之时。第四，据瑞岩村杜姓老人说，瑞岩村在明代叫松岩。第五，从所遗大刀重 90 公斤来看，杜华泗多系武举出身，膂力过人，不然，是抡不动这么重的大刀的。

（三）瑞岩村及其周边地区所遗留古迹与流传的民间传说所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

瑞岩村杜姓村民代代相传，瑞岩村是先有寺、庵，后有村庄。而且据说瑞岩寺原名“日庙”，瑞岩庵原名“月庵”。该寺与庵是一个月之内突击建成的。试问，在当时谁能拥有这种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显然，只有朝廷与官府才能办得到。瑞岩寺与瑞岩庵之间有密道相通。寺虽被毁，但地基犹存。原址在村右面山坡上，俗称“棋盘丘”地方。那儿原遗留有两个巨大的圆柱形石鼓，一块上刻“月庵真际”，一块上刻“日庙正宗”。真际，意为世界的本体，成佛的境界。正宗，意为佛教本源嫡传。“日”“月”合起来是“明”字。“圆珠”者暗喻朱氏也。此石刻用字十分深奥，蕴意亦十分深刻。它要给后人传达的信息是；此寺、庵的主人是大明朝正宗传人。显然，此寺、庵极有可能是建文帝与陈贵妃或陈贵妃与三皇子朱文垚曾经住过的一处“行在”（行宫）。只可惜两石鼓，至今只剩下“月庵真际”一只，另一只已失踪不知所在了。

村民还告诉笔者，据上辈人相传，此处初建寺庙时，不许附近乡村百姓靠近。其原因极有可能与陈贵妃一行隐蹕此处有关。这也是瑞岩村 600 年来一直只有杜姓一族居住在此的原因。

笔者认为，瑞岩村杜姓先祖杜华泗及其手下，极有可能是陈贵妃行在的守护者与这处建文势力抗燕据点的主力军。

瑞岩村杜姓族人还告诉笔者，寺、庵初建时，寺里还添置了两个巨大的饮马槽，可供几十匹马饮用。这两个饮马槽，一个被偷，一个尚在瑞岩村。据说，偷运饮马槽的盗贼与司机事后均相继神秘死亡。至于瑞岩寺与瑞岩庵，据说也是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的。这一传说与别处同样是建文势力据点的被毁寺庙一夜之间被毁的说法十分相似。很显然，寺、庵也是在一种大规模的行动中消失的。而且一样地成了永久性的废墟，几百年来再也无人敢在废墟上重建寺、庵。

附：明朝历任锦衣卫指挥使

明朝历任锦衣卫指挥使

毛　骧　洪武二年至洪武十五年（1369–1382）

蒋　瓛　洪武十五年至洪武二十六年（1382–1393）

？？？　洪武二十六年至建文四年（1393–1402）

纪　纲　永乐元年至永乐十五年（1403–1717）

赛哈智　永乐十五年至宣德元年（1417–1426）

刘　勉　宣德元年至正统元年（1426–1436）

徐　恭　正统元年至正统二年（1436–1437）

马　顺　正统二年至正统十四年（1437–1449）

卢　忠　正统十四年至景泰元年（1449–1450）

朱　骧　景泰元年至景泰七年（1450–1456）

逯　杲　天顺元年至天顺二年（1457–1458）

哈　铭　天顺二年至天顺五年（1458–1461）

袁　彬　天顺五年至天顺七年（1461–1463）

门　达　天顺七年至成化元年（1463–1465）

万　通　成化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1465–1487）

牟　斌　弘治元年至正德元年（1488–1506）

石文义　正德元年至正德三年（1506–1508）

张　采　正德五年至正德十一年（1510–1516）

钱　宁　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六年（1516–1521）

江　彬　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六年（1516–1521）

朱　宸　嘉靖元年至嘉靖十一年（1522–1532）

骆　安　嘉靖十一年至嘉靖十五年（1532–1536）

王　佐　嘉靖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年（1536–1541）

陈　寅　嘉靖二十年至嘉靖三十年（1541—1551）

陆　炳　嘉靖三十年至嘉靖三十九年（1551—1560）

朱希忠　嘉靖三十九年至隆庆二年（1560—1568）

刘守有　隆庆二年至万历十年（1568—1582）

骆思恭　万历十年至天启四年（1582—1624）

田尔耕　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1624—1627）

骆养性　天启七年至崇祯十六年（1627—1643）

吴孟明　崇祯十六年至崇祯十七年（1643—1644）

作者单位；古田县华侨中学

皇太孙朱允炆伴读、洪武朝福建都司左卫将军胡护龙身世之谜探秘

王道亨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链的出现，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工作开始向宁德周边的福州、莆田、南平、丽水、温州所辖的县（市、区）拓展。继在莆田市发现建文朝臣方孝孺、卓敬后人踪迹之后，近日，在福州连江又有了新发现。

连江县江南乡儒阳村《胡氏宗谱》第 5 页载：“儒阳始迁祖福公字龙（一说为“护公字龙”，真实名字不详），（洪武时）官授福建都司左卫将军。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因家祸株连，入连避难。永乐皇帝曾降诏授右卫将军，不受。后因拒附永乐遭追杀。从此销声匿迹，遁隐儒阳。”

这个胡福（护）龙究竟何许人也?

带着疑问，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一行 4 人，在组长王道亨的带领下，于 2014 年 4 月 日，驱车直奔连江县儒阳村。在该村胡氏宗祠，福建省胡氏联谊会暨连江儒阳胡氏宗祠理事长胡新煊先生及几位胡姓宗亲热情接待了研究小组一行。

（一）事情的原由

胡新煊先生首先向研究小组成员们道明了事情的原由；胡姓族人在重修儒阳《胡氏宗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祖先与明初的三位皇帝洪武帝、建文帝、永乐帝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直想弄清其中的是非曲直与来龙去脉。正在这时，消息传来，宁德上金贝畲族村发现明建文皇帝的墓葬。他们从报刊、杂志和电视上看到了建文帝陵的许多构件与自己祖先福（护）龙公在明成化年间修的墓葬的构件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便萌生了到宁德上金贝实地考察一番的念头。2009 年冬，在宁德胡氏联谊会会长胡承余先生的帮助下，连江儒阳胡姓族人便派遣胡新煊先生一行 9 人，专程赶到宁德上金贝考察了建文帝陵。考察后，他们认为，无论是石质、纹理、纹饰、构件以及坐向等各方面，上金贝建文帝陵与连江儒阳建于明成化年间的胡姓先祖福（护）龙公的墓葬均有许多相似之处。胡新煊等人更加坚信自己的祖先的确与建文史事与永乐史事紧密相关。2010 年初在召开宁德胡姓联谊会时，原计划放在上金贝召开，后因未联系上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遂改在别处召开。他们表示，今后如有在宁德开会，一定要放在上金贝开。

（二）胡廷瑞其人其事

胡廷瑞，又名胡廷美。字辉班。据连江儒阳《胡氏宗谱》第 197−199 页载：胡廷瑞原系陈友谅部将，后被朱元璋招降。元至正廿七年（1637 年），封征南将军，率师由江西取福建（汤和率师由浙江水路取福建）。副将是左丞何文辉（任胡廷美部副参政）、将军戴德。胡廷瑞率军渡杉关，下光泽，取邵武、

建阳、建宁，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会水路汤和攻取福州，并延平、兴化、汀州、泉州诸郡。廷瑞奉旨镇守福建。太祖即位时，以美为中书平章同知詹事院事。洪武三年（1370 年），命赴河南招集扩廓故部曲。是年冬，论军功封豫章侯。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例奸党，言美（即廷瑞）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子婿刑死，赐美自尽，云云。

由以上文字看，胡廷瑞（胡廷美）还是国丈，其长女胡菊是朱元璋的第十四位妃子。生湘王、长沙王。

（三）胡福（护）龙其人其事

胡福（护）龙公真实姓名不得而知。福（护）龙是其化名。福（护）龙系廷瑞（廷美）公的嫡长孙。儿时即为皇太孙朱允炆的伴读（侍读）。其父卓汉公与其祖廷瑞公一道进攻福建，因军功封漳、泉、汀、抚（江西）四州指挥使。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因家祸逃到湖北监利一带。后依附廖平，为建文帝太子朱文奎护卫。据胡新煊先生口述，为查清家族的历史，胡氏族人努力了几十年，得益于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成果，使我们对自己的家族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与判断。根据连江儒阳《胡氏宗谱》明代的始修本与清代的重修本和福州地区与连江县的文史资料，以及家族长老的口碑资料与儒阳及其周边地区的民间传说云：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胡氏家祸发生时，儒阳胡氏先祖福（护）龙公正在福建都指挥使司左卫将军任上，闻变即率家人逃离福州，先隐于连江儒阳西南方的瓮下村，后迁至儒阳村。“靖难事变”时，复出护驾。永乐帝上台后，亦曾下诏，欲委以右卫将军，福（护）龙公拒之。惹怒了朱棣，即遭追杀。后胡濙到达福建，找到了福（护）龙公隐身之处，遂在儒阳东北方向的闽江口的粗芦岛召见了福（护）龙。胡濙念在同宗同祖情分上，对福（护）龙公面授机宜：①不要再继续逃亡，就呆在儒阳好了。②将胡大海认作祖先，不要说是胡廷瑞（廷美）的后人。③我会与驻在粗芦岛对面的郑和将军说，这儿的胡姓是胡大海的后人，要他交代手下不要查了。④北面的宁德正在打仗，

水路、陆路已经封锁了，过不去了，不要去那边。于是，福（护）龙便遵照胡濙的吩咐，在儒阳隐居下来。大家从家谱中的人物画像就可以看出来，福（护）龙公之后几代先祖都是布衣，都没有功名爵位。这就是隐姓埋名的证据。而化名为胡福（护）龙，实隐含有护卫建文帝，为建文帝尽忠之意。

胡新煊先生的口述使在场的研究小组成员皆耳目一新，都觉得不虚此行。同时，也都感到很有必要协助连江儒阳胡氏理事会与福州胡氏联谊会的同志把胡福（护）龙的身世之谜探究清楚。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党史与方志研究室

郑洽其人考

郑焕安

2010 年 3 月，宁德郑岐村的郑姓村民，北上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与郑义门认祖归宗、续接了家谱，确认了郑岐村的开基始祖郑洽，正是六百年前在郑义门随建文帝出亡的同居八世祖义二十六公郑洽。但有关郑洽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辗转”最后“隐居”在宁德等等，无论是郑义门还是郑岐村的郑氏后人，都茫然无知。因此，对郑洽其人进行研究考证，应该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建文帝出亡前后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一）典籍史料证实了郑洽随亡

郑洽随亡是否确有其事？这是本文研究和思考的关键。通过对典籍史料的探寻，这个问题应该是能够得到确认的。

1.《致身录》中记载了郑洽随亡

记载建文帝出亡最著名的，当属史仲彬的《致身录》了，这本书在对待建文朝逊国君臣的政治氛围稍微缓和的万历年间刊行于世，书中详细列出了出亡的二十二人名单，其中就有郑洽：

"……大内火起，帝从鬼门遁去，从者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阳人；刑部侍郎金焦，贵池人；翰林院编修赵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参政蔡运，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监察御史叶希贤，松阳人；程济，绩溪人；中书舍人梁良玉，梁中节，俱定海人；宋和，临川人；郭节，连州人；刑部司务冯淮，黄岩人；所镇抚牛景先，沅人；王资、杨应能、刘申，俱杞县人；翰林院侍诏郑洽，浦江人；钦天监正王之臣，襄阳人；太监周恕、何洲及徐王府宾辅史仲彬，吴江人。"

在谈迁《国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明史著作中描述建文帝出亡时，显然也引用了史仲彬《致身录》中的说法①，"浦江人""翰林待诏"郑洽都名列其中，谈迁在《国榷》中甚至还提到"郑洽卒公安"②。史仲彬对建文帝出亡绘声绘色的描述，为后人质疑不断，但关于随亡人员，除了对其中"浙江按察使王良"（猜测是"王艮"笔误）有所质疑外③，还没有发现对包括郑洽在内的其他具体某个从亡人员的质疑。因此，郑洽随同建文帝出亡，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2.《弘光实录钞》中也确认郑洽随亡

黄宗羲所著《弘光实录钞》是一部重要南明史著，上起"崇祯十七年夏五月庚寅福王建监国号于南京，下至弘光元年"秋七月庚辰朔江西巡抚旷昭迎降，万安知县梁于涘不下"。书中记载了南明弘光元年（1645）七月，弘光皇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7《建文逊国》，谈迁《国榷》卷12《惠宗建文四年》。
② 谈迁《国榷》卷12《惠宗建文四年》。
③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载："王良（？—1402），明河南祥符人，字天性。洪武累官佥都御史。坐事贬刑部郎中。建文中官至浙江按察使。成祖即位，遣使召见。誓不赴，自焚死。"《国榷》中的从亡名单里，没有王良的名字。

帝朱由崧大张旗鼓为建文帝翻案，定庙号为“惠宗”，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不仅如此，弘光皇帝还大规模地补谥包括文臣75人、武臣17人、女子6人等建文帝的逊国忠臣，均有名有姓，其中还罗列从亡诸臣，郑洽名列其中；[①]

“辛丑，补谥逊国文臣七十五人。翰林侍讲方孝孺文正、翰林修撰王叔英文忠、修撰王艮文节……。武臣十七人。魏国公徐辉祖忠贞、越嶲侯俞通渊襄烈……。女子六人。方孝孺妻李氏贞愍、王艮妻贞烈、储福妻范氏孝节。文臣修撰吴成学，尚书张紞、徐贞……。武臣长兴侯耿炳文、历城侯盛庸、滦城侯李贤、驸马都尉梅殷……。内臣胡伯颜、官职无考。卢振、梁良用、郭良、马坤、朱进、王埠、陈子方。河西佣补锅匠冯翁、王公。东湖、乐清、耶溪三樵夫。云门僧洞庭居士、雪庵和尚等。从亡诸臣翰林史彬、程济、赵天泰、郑洽。侍郎廖平、金焦。郎中梁玉田。司务冯潅。御史叶希贤。中书梁良玉、梁中节、宋和、郭节。监正王之臣。”

建文朝虽然时间短暂，但其展现出来的清明政治形像，却是历整个明朝二百余年来，被朝野悄悄传颂并让江南士子仰羡不已的话题。因此，当明朝灭亡后，被拥立为南明弘光皇帝的福王朱由菘，急需迅速树立起清正廉明的政治形像，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反清复明”的支持，因而为建文帝翻案、补谥靖难诸臣成了他最好的选择。而由皇室出面做这样的事情，其可靠性则远远大于野史笔记中故作神秘的记述。

3.《建文年谱》中提到了郑洽随亡

《建文年谱》记载：“……建文尝访郑洽于浦江，其堂中匾[②]无故坠地，建文惊遁。寻侦者至，无所得，乃免。洽后省建文于蜀道，病留公安辰舍中卒。”[③]

---

①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2，十五页。

② 《明史》卷296列传第184孝义一《郑濂》：建文帝表其门，溁朝谢，御书“孝义家”三字赐之。

③ 《建文年谱》，明赵士喆著，《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8册之《建文年谱》P159。赵士喆，明末史家。

谈迁所说“郑洽卒公安”，看来出处于此。《建文年谱》为明末赵士喆所撰，此书对建文帝生平考核颇费苦心，于建文帝遗迹载之尤详，如其遁迹杭州一带等；另外又对建文帝所作诗文，虽单词只句无不搜罗。书成，作者从弟赵士冕曾为之梓行。清初学者王士祯见后颇多赞赏。建文帝是否到访浦江，除了郑义门家族的史料的记载和部分遗迹之外，尚无其他佐证资料。但以明初浦江郑义门与朱明王朝的密切关系及其家族实力来看，建文帝出亡后在某种程度上依托郑义门，也不是特别离谱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这则记载揭示了郑洽确实与已经逊国的建文帝仍然保持了某种紧密的联系。

4.《罪惟录》中载有郑洽小传

《罪惟录》列传卷二十一《播匿诸臣列传》中郑洽的小传很简练：“郑洽，南直浦江人，为翰林院待诏。金川门开，洽中堂匾额无故坠地，惊而逸去，至蜀道，病留公安茅庵中，遂卒。”

《罪惟录》原名《明书》，为明朝一直到南明的纪传体史书，作者查继佐。[①]《罪惟录》纯属私修，修成后更不敢公开，一直藏在夹壁墙里，辛亥革命后始公诸于世。查继佐是个铁杆的反清复明者，他在《自序》中明确表示，自己是明朝人，不是清朝百姓。书中南明各主，均列本纪，福王称安宗简皇帝，建文、崇祯两帝谥号，皆从弘光朝所定，不用清政府所谥。《罪惟录》最注意“靖难”以及明清易代之际的记载，查继佐将郑洽归类到反对明成祖朱棣的“播匿诸臣”序列中，毫无疑问，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确切掌握有郑洽随同建文帝出亡的信息。

视野所限，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本文暂时只能在上述几处史料中找到相关郑洽的记载（其他一些史料中偶有记载的，也与《致身录》大同小异）。虽然并没有出亡的前因后果、随亡的曲折历程以及各种惊心动魄的事例，郑洽是否“卒公安”也没有找到更多可以互相佐证的材料，特别是实证。但上述这几则

① 查继佐（1601 — 1676），初名继佑，初字三秀，更字友三，号伊璜，又号与斋，别号东山钓史、钓玉。浙江海宁人。崇祯十六年（1644）起作明史，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易稿数十次，毕一生之力成书。原名《明书》，后因遭庄氏史狱牵连，以“获罪惟录书”而署书名，故名《罪惟录》（注：一说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之意）。

史料，却清楚地告知后人：出自“浦江郑氏”的郑洽随建文帝出亡了，那么，浦江郑氏有没有郑洽其人呢？

（二）浦江郑义门确有郑洽其人

郑义门位于浙江浦江郑宅镇。始迁祖郑淮是郑桓公第六十四世孙，北宋元符年间卜居仁义里，淮孙缊、绮俩昆仲以孝义治家，开创了聚居之端，裔孙们恪守祖训，以超越生命价值的仁义继承和发扬，同财共爨长达340余载，远垂15世，食指多达2000余。[①]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朱元璋御赐“江南第一家”，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亲书“孝义家”以褒奖。郑义门是封建时代极为成功的耕读世家，以东明精舍为平台，延聘吴莱[②]、宋濂[③]、方孝孺[④]等名儒主讲，主张“学以致用”，注重培育管理人才，在家族治理中实践并丰富完善了“以德正心，以礼修身，以法齐家，以义济世”的儒家思想，而且培育了一大批济世良才，在不经科考，仅凭推荐的情况下，居然前后有50多人入朝为官，[⑤]而直接辅佐皇室的更不在少数，这些直接促成了郑义门极大的辉煌。东明精舍还敞开大门吸纳四方学子，凝聚了一大批当时的文化名流，成为程朱理学在浙江的分支——“婺学”的主要集散地。这种浓厚的治学氛围，也使郑义门留存的家族文献，如《麟溪集》《旌义篇》《圣恩录》《郑氏规范》等具备了一般家族史料所不具备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1. 按照《圣恩录》的记载，郑义门八世祖只有二十五人

① 大多数人认为“二千余指”说的是二三千人同居，实际是错误的。人有十指，应该说的是二三百人同居。参见：李静：《义门家族的受命于婚姻状况分析》（《江淮论坛》2004年第5期，第96—99页）。

② 吴莱1297—1340元代学者。字立夫，本名来凤，元朝集贤殿大学士吴直方长子，门人私谥“渊颖先生”。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宋濂曾从其学，著有《渊颖吴先生集》。

③ 宋濂1310−138，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文学家。朱元璋称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太史公”。

④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明朝建文年间重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南明安宗追谥文正。后因参与组织削藩，反对并拒绝与朱棣合作，不屈而亡，被诛十族。

⑤ 郑义门藏书《希忠录》。

《圣恩录》是郑崇岳[①]在明万历中后期编撰的，主要分御札、史录、公文、诰敕四个部分，都是原始档案内容的照录，因此都属于第一手史料。而且《圣恩录》的叙述大多比其他材料所载详尽许多，有些事件是别的材料没有记载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圣恩录》中记载：

"洪武四年（1371），为盘提内藏库，亏少金一千三百一两一钱四分二厘，银二千六百七十两七钱三分，时本家郑洪[②]为提点，同官坐法，以辞累洪。户部差郊期李源、齐符到府，委正官钦依坐去数目，严追征足，备解部。又蒙户部符文，钦蒙旨，'这该内藏库提点郑洪若，若把他家抄了呵。缘他是义门，这的不干他家长并其余人口事。如今把他本户下有多少人口，多少财产，多少田土，郑洪合得多少，叫他家长逐一明白分豁出来，官府只抄郑洪一分的。钦此。'本部主事王□、本府知府吴□、本县知县赵□亲临本家，着家长郑伯阳（郑渭）具报实在数目，兄弟二十五人，合作二十五分均分，内除会食钟一口，听训鼓一面，其余郑洪当房，分限同逐一抄去，于七月二十一日起解去讫。"

从这条资料看，郑义门八世祖只有25人无疑。但是，如果郑义门确实不存在郑洽这个人，那么万历朝昭雪大典后，郑义门后人又何以拿着从《致身录》中扒出的那么点信息，将郑洽认了祖宗，并"毫无争议"地将郑洽列入《郑氏宗谱》中同居七世祖郑铭的名下呢？显然，郑义门在这里面围绕"郑洽"，一定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而这个秘密又是以不惜改动朱元璋圣旨、甘冒抄家灭族的政治风险为代价的。

2.《麟溪集》的记载揭示了郑义门第八世至少有二十六人

《麟溪集》是郑义门最重要的家藏史料之一，收录了自宋以后诸家为表扬义门而题赠的诗赋及撰写的碑志、序记、题跋等，元郑大和编[③]。书中收录了当时郑义门编修《郑氏宗谱》时柳贯[④]所撰的《荥阳族系记》，详细记录了郑

---

① 郑崇岳（1550—1631），郑义门同居十五世孙，字克生，号霁华。（《郑氏宗谱》）
② 郑洪（1328—1371）：字仲纤，号尚书通，义十二。（《郑氏宗谱》）
③ 郑大和，即郑文融（1264—1353），郑义门同居六世祖，字顺卿，第荣二。（《郑氏宗谱》）
④ 柳贯（1270—1342），字道传，自号乌蜀山人，婺州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官至翰林待制，

义门同居第一世到第八世的世系渊源，其中关于郑洽的父亲郑铭名下诸子的记载是；“铭生湰、淂、洤、渝、冲。溢、汪、溱、演、冲皆早卒。[①]”显然，这里面没有郑洽，但出现了一个后来家谱中都没有的郑渝。这是手抄本的记载，而刻本的《麟溪集》中同一篇柳贯的《荥阳族系记》却记载的是；“铭生濬、淂、洤、渊（右上有个‘大’字，以下均用‘大渊’代之）、冲。溢、汪、溱、演、冲皆早卒。”这里面也没有郑洽，却一样多了个后来家谱中没有的郑“大渊”[②]。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版本都列举了郑义门第八世总共三十一人，其中“溢、汪、溱、演、冲”五人早卒，从而确定义门八世义字行水字辈存活到成年的是二十六人。早卒的五人中，既无“渝”，也无“大渊”，就说明这个人活着，但郑义门的家谱以及其他史料中，都没有这个人的信息。

根据厦门郑坂村《郑氏宗谱》的记载，郑洽生于元至正三年（1343），在这前一年柳贯就已经去世了，柳贯不可能记录下郑洽的信息。但古人修谱还是相当严谨的，郑义门的家长在得到郑氏谱图并着手修订家谱时，请吴莱和柳贯分别撰写《郑氏谱图序》和《荥阳族系记》，吴莱还撰写了《郑氏谱图后序》。柳贯的老师吴莱在《郑氏谱图序》中直接阐明：“稽司空之所定，参夔生之所述，衍而申之，至鉴兄弟之名而止，复虚其左方，使来者续书焉”，柳贯《荥阳族系记》无疑也是采用同样的办法，留空让后人补充。因此可以肯定，在郑洽随同建文帝出亡之前，《郑氏宗谱》及《荥阳族系记》中一定记录了郑洽的一些个人信息。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郑渝也好，郑“大渊”也罢，肯定是郑氏后人在郑洽被削籍之后无奈之下用“冒名顶替”的方法补充的。显然，郑氏后人主要就是依据这条线索，确认这个人就是郑义门故意不为人知的义二十六公郑洽。那么，郑氏后人用“渝”和“大渊”指代郑洽，是否蕴含了什么信息呢?

兼国史院编修，系元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书画家，是元代“儒林四杰”之一，元代散文家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贯并称“儒林四杰”。

① 《麟溪集》载胡翰撰写的《乐全子郑君（郑铭）墓志铭》中也有相同记载。

② 清光绪壬午（1882）重刻的《郑氏宗谱》中，由于郑洽已经“入籍”，因而其收录的《荥阳族系记》中，直接把“大渊”纳入到“早卒”之列。

古人最擅长这种既不明言、却又寓意深远的表达方式。“渝”的意思是“变换、变更”，是不是以此告诉后人郑洽在这里是换了名字的？“渊”是“深水、深潭”的意思，用“大渊”来指代郑洽，是不是告诉后人这个换了名字的先祖，已经“潜入”不同寻常的深水深潭，难以寻找了呢？否则两个版本的同一篇文章，何以用两个不同的字？另外“大渊”与“渝”这两个字，形体相似，因而也有可能是刻板错误所致。但不管怎么说，对于郑义门这样家学深厚、文儒众多的大族而言，仅仅是用“笔误”来遮掩，恐怕是难以服人的。

3. 郑沂的《墓志铭》透露了八世祖有二十六个兄弟的信息

郑沂[①]在郑义门中，也算是一位颇为传奇的人物，估计是明朝乃至数千年封建王朝吏治中，唯独一个由布衣直接担任礼部尚书并不拿俸禄的人。《圣恩录》记载：“洪武三十年，蒙钦取天下大姓税户授以重任，本家以郑沂起送。吏部引奏，上特名沂旨前谕曰：‘你家大孝大义，累世同居，前朝虽当仕，宦未有显达，我今使汝大贵。’钦蒙御笔亲除沂为礼部尚书，沂辞以白身人，恐才不满，不能当宗伯之任。上曰：‘你休没志气，你是义家，与我掌天下礼仪，只把守家法这六十年与义掌一颗印。’次日，沂进谢恩，就辞俸曰：‘臣蒙皇上与臣田得山塘，勾臣支持，朝廷俸禄未敢关支。’上曰：‘俸禄乃朝廷养贤者，不要关支，也随你。’”郑沂出任礼部尚书，除了不拿薪俸外，在办完朱元璋的丧事后即致仕而归。更奇怪的是，他还在“永乐元年入朝，留为故官，未几复谢去”。[②]（朱棣重新启用郑沂，是要给皇室中的什么人办丧事吗？事后朱棣还对他进行了赏赐。[③]当时永乐朝的红人、太子少师姚广孝[④]还写诗为他送行。[⑤]）

---

① 郑沂：1338—1412，字仲与，号抚琴子，义廿五。
② 《明史》卷296，列传第184孝义一《郑濂传》。《明太宗实录》卷21：郑沂（永乐元年七月）复任礼部尚书，九月致仕。
③ 《明太宗实录》卷10下。
④ 姚广孝（法名道衍，1335-1418），字斯道，号独庵老人，长洲人。是朱棣发动靖难的主要功臣。
⑤ 《麟溪集》壬卷：白麟溪上尚书宅，尽说江南第一家，历世子孙诚远大，盈床袍笏更光华，文朋义重金兰契，圣主荣恩玉树花，何日浙西归老去，寻君观礼泛仙槎。

《麟溪集》中收录了明初蜀府左长史明善（宋濂的妹夫[①]）为郑沂写的墓志铭《大明故资善大夫礼部尚书郑公神道碑铭》，序中写道："公与兄弟行最幼，诸兄二十四人，事之如严父，不命之坐不敢坐，凡有任使，趋赴不敢后，故诸兄尤爱之。"这个记载很明确，就是排行二十五的郑沂之下有个弟弟，也就是说郑义门同居第八世肯定是二十六人。郑沂死于永乐十年（1412），这篇墓志铭是郑沂的儿子郑杓在郑沂去世四年后，即永乐十四年（1416）"持状"（有关郑沂生平的资料）不远万里赴成都"泣告"明善所作的。这一年应当还处在朱棣积极搜捕建文帝及其余党的政治高压中，无论是郑氏后人还是明善都"明知故犯"地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郑义门八世祖中第二十六人"的信息委婉地发布在即将勒石永存的《墓志铭》中，除了表示他们对郑洽这位亲人坚定的认同之外，毫无疑问，还宣示了他们坚信郑洽其人其事终将大白于天下的期待。又或者说，此时建文帝出亡这个事情已经有所缓和?

明善是朝廷任命的蜀府左长史，与郑义门颇有渊源。《麟溪集》中收录了不少明善的文章（诗词）。方孝孺以及与方孝孺交往最密切的同学郑楷[②]先后入职蜀府担任教授，都与明善的推荐有很大的关系。以明善的身份为郑义门这样以孝义闻名天下的大家巨族撰写《墓志铭》这样严肃的文字，没有凭空杜撰的可能性。

4.《郑氏宗谱》明确将郑洽补为义二十六公

郑义门《郑氏宗谱》[③]在郑洽名下记载了两段话：

恰登洪武进士，官翰林待诏，建文时从帝遁滇，道麟溪，里人陈忠告讦，合族就逮。以踪迹无稽，得从宽典。洽祖名系字行遂从芟削。至万历己未（1619）[④]，有昭雪靖难死节之典，得吴江史仲彬《致身录》梓行于世，因节其略，

---

① 《宋濂传》，万斌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② 郑楷：（1346—1438）字叔度，旌十三，渊之子。（《郑氏宗谱》）
③ 光绪壬午年（1882）重修本，义门第十五世孙郑崇宏主编。
④ 应为万历乙未年（1572），《明史》卷20《本纪二十·神宗一》："隆庆六年（1572）甲子，（神宗）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诏赦天下，祀建文朝尽节诸臣于乡。"

载入《麟溪集》中。兹附名义字行末，使知义门第八世自渭祖二十五人之外，更有忠义之洽祖也。

附记：建文时，金川失守，宫中自焚，帝祝发远遁。杨应能、叶希贤等从行二十二人，内郑洽，浦江人，官翰林待诏。当帝潜踪神乐观时，举家给足，备一夕者七家。于是，众拟先之浦江，曰集家孝义可居，而洽亦曰，臣蒙高皇隆恩，无以矢报，正其时也。事载翰林侍书史仲彬《致身录》，太史焦漪园梓以行世，犹稗史也。正统五年（1440），奉帝入西内，老内官吴亮审视果是，而广西思恩州之升府土官岑瑛之改知府，载入睿皇实录，国史班班可考也。家谱旧属吴宋二公所修，载《麟溪集》卯卷，内系图削去印籍，易以手抄，洽祖以厉禁讳而不书。夫介子推从亡，而尝不及洽祖周旋患难，备历险阻，九死不悔，而不获考其所自出，惜哉！晋文（王）返国，从行七人咸受爵赉，子推虽隐，亦有绵上之赐。宏家蒙高皇简拔义门弟子桢、干，皇朝求忠臣于孝义之家也，而公力捍牧圉，委身沟壑，并姓名不留于世，忠云瘁已。当是时也，宏之一门，孝以全忠，几蹈族亡之不测，置数千食指于不顾，亦危哉。详观《圣恩录》所述诸祖被累，类能濒死而生，履危而安，不可谓非天之默佑仁族已！虽然，彼二十二人既已炳炳史册，而洽祖之名，家乘阙焉无闻，岂所以昭示来兹乎？崇正（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者，秉铎闽之镇海卫寄书请谱，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蒙自，子孙因家焉，族颇盛。[①]方之宋文宪从茂州而祀于浦，方逊志波及八百七十三人，而幼子派衍于上海之余薪熄火，传政至异地有同符也。可知其不止为天下士直，足尚友古人而无忝，何必其嗣之定居浦哉？仁人孝子，其后必昌，信然，非宏一人之私言也。特记之，以兴起后之忠孝，或庶几焉。义门第十五世孙崇宏谨述。

这个记载里面没有郑洽的生卒年月、字行、婚配和墓葬情况等基本信息，这说明郑义门将郑洽削籍确实彻底。当然，这些郑洽的信息郑义门一定是以“易

① 《浦江县志》也载：事隔靖难之役二百年后，在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者秉铎闽之镇海卫，致书浦江郑氏，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后子孙颇繁盛。

以手抄”的形式保存下来了，但随后发生的两件“天灾人祸”，则可能彻底断绝了郑义门恢复郑洽身份、补齐资料的可能性。一是在正统十二年（1447），浙、闽、赣边境爆发了农民和矿工起义。[①] 正统十四年（1449），“乱军过郑义门，烧杀掠抢，家室尽毁”。[②] 二是“天顺三年（1459），遭受火灾族众散处”，“族人因疏忽失火，蔓延全族，除家庙外，宅皆毁灭，火灾后族散分居”。[③] 大火之后，家族元气大伤，无奈以义字辈（同居第八世）兄弟为号分家析灶。根据族谱记载，虽然第十八号郑氏后裔在郑宅镇还继续同居聚食直至清康熙初年，但他们已经没有条件或没有可靠资料足以恢复郑洽完整的信息了。

可惜历史没有假如，但即便如此，留居郑宅镇的郑义门后人还是在政治氛围稍有缓和的时候，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他们不仅在家谱中补录了郑洽，而且公开宣示了建文帝曾经在郑义门活动、隐匿的遗迹，还光明正大地在宗祠中供奉了建文帝的化身——老佛、和建文帝曾经遗落的靴子。而宗祠中用于祭祀大典的钟鼓，也在敲响二十五声后，再轻敲半声，以追忆这位随帝出亡、不知所终的义二十六公郑洽。这个风俗世代相传，直到公元2010年郑岐村的郑氏村民北上郑义门认祖归宗而终。

（三）郑洽因随帝出亡而被郑义门削籍

郑义门留存资料中，多处体现了郑洽被削籍的事实。除前文所述之外，一是在《麟溪集》的亥卷附录史仲彬《致身录》后，由郑义门同居十六世孙、明贡士尚藩又作了一个附记，指出“洽祖复于是时随帝远遁，家谱遂削去其名，系以免不测之祸。万历己未岁，有昭雪靖难死节之典”；二是《希忠录》[④] 载

---

①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一《平浙闽盗》。
② （元）郑大和，《麟溪集》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
③ （元）郑大和，《麟溪集》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
④ 《希忠录》是由郑义门醉墨轩刊于清道光丙午年（1846），书中汇集了有关郑氏义廿六忠智公、明翰林待诏郑洽的议、传、祭、序、诗、跋等篇章，书前有诗文启和郑洽入祀乡贤祠的禀呈和浦江县知县批文共三件，是义门郑氏的主要藏书之一。

义乌陈炳荣[①]《明翰林待诏郑忠智公传》："公匿帝枯井中得脱，旋即随驾远遁，杳不知所终。其家谱以恐干例禁，亦削公名。"在该书最后，附录有郑氏后人郑骏声（郑义门东明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所作的笔记，对郑洽在宗谱中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质疑，最后结论："我家宗谱，在万历以前，没有郑洽的名字，直至昭雪大典颁发后，才将郑洽之名增入谱内，即为义廿六公也。"

对于郑义门这样的家族而言，削籍应该算是对族人最严厉的惩罚了，《郑氏规范》[②]明确规定："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如被诬指者则不拘此。""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于宗图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复之。"按照这个规定，前文提到的内藏库提点、同居八世祖义十二公郑洪因为贪污公款被处决，虽然有朱元璋将其"分家"的宽宥，也应当早该被削籍了。纵然宋濂亲自撰写《郑烈妇石氏传》[③]为郑义门缓和气氛（郑洪被处决后，其妻毅然自戕），郑义门确实也没有将其留在族谱内的道理，毕竟这是冒着"欺君"的风险。即便后来知道郑洪被人"诬连"，也有一个补录的过程，但郑义门并没有相关记载。这说明在郑义门看来，郑洪是不是真的贪污这件事情还不够大。

那么郑洽是因为犯了什么大事，而被削籍得如此决绝彻底呢？如果郑洽仅仅是贪赃枉法或者是其他"大不孝"的行为，郑义门没有理由连只言片纸也不留下。只有一个原因，即郑洽被削籍与逊国的建文帝有关！永乐初，朱棣的"革除"手段，造成了当时政治的高压和党禁、文禁的严迫，使"逊国之际，严网四张，人人在刀俎之上"[④]；凡建文故臣之文字，人们不敢收藏片语。万历中期史家屠叔方就曾经感叹说："文皇帝入继大统，党禁严迫。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讦、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⑤]在这

---

① 陈炳荣是道光己亥科副榜，候选直隶州州判，1844（甲辰）—1846（丙午）年间担任浦江郑氏东明书院山长（《东明书院志》，金华方志丛刊【第九辑】）。
② （元）郑大和，《郑氏规范》. 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 （元）郑大和，《麟溪集》. 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97 年影印本。
④ （清）谈迁 :《国榷》卷 12，第 843 页，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⑤ （明）屠叔方 :《建文朝野汇编 · 自序》，四库存目丛书本，史部 51 册。

样严酷的政治氛围中，郑洽可以潇洒地移孝作忠，毅然跟随建文帝出亡，但郑义门的家长郑渶却不能“几蹈族亡之不测，置数千食指于不顾”[①]。因而郑义门即便有万般的无奈和不舍，也只能将郑洽彻底“革除”了。

这样的判断，还基于郑义门家藏史料中披露的另外一条“重大信息”。《郑氏宗谱》记载：“（郑济）字仲辨，号青萝学士，义十九。作诗文时出新意，不蹈袭前人语，书法得晋唐诸家体，有名于时。洪武廿六年（1393），高庙以义门礼法之家，悉召至前，凡廿四人，问才德孰优，众以济对。授左春坊庶子，阶奉议大夫，日侍左右，献替为多，所荐引往往为名臣，成就后进，闻人一善，谭之不置，尤深性命之学。每朝退，求书者阗门竟日不倦。后弟沂为礼部尚书，遂赐楮币致仕。及修实录，又召入史馆，三年卒于京。著述甚蕃，止存《潜溪文粹后识》。生于重纪至元乙亥（1335）二月十六日，卒于永乐癸未（1403）二月初五日，年六十九。”[②]朱棣篡位后在修史上几经反复，本就为后来史家所诟病。可就在他刚立年号的一个月后，在史馆修实录的郑济就突然死在了任上。这本身就是一条耐人寻味的信息。《麟溪集》中收录的郑洽的侄儿郑干的墓志铭又“无意”中透露了其中的玄机。这篇由明翰林侍读学士兼修国史庐陵曾棨[③]撰写的《故文林郎湖广道监察御史郑公墓志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太祖高皇帝召其家年三十者，悉赴京选用。时公与左春坊庶子公济等二十四人赴京听选，庶子即授前职。上选公以备擢用。……继而庶子公为史事干黑其家例，当簿录重愆，公即上疏，雪免一家之谴。”[④]《郑氏宗谱》中郑干名下也记载了同样的信息；“（郑干）字叔恭，旌十，汉之三子，自幼颖悟，受业于学士景濂宋公。……从叔庶子为史事所累，本家例当簿录，上疏雪免。[⑤]”

---

① 《希忠录》。
② 《郑氏宗谱》，光绪壬午年（1882）重修本，义门第十五世孙郑崇宏主编。
③ 曾棨（1372—1432），字子启，号西墅。江西永丰人。明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状元及第，原取刘子钦，但因刘骄矜自恃，引起主考官解缙不快，解缙遂将考题泄漏给曾棨。授修撰，累官至詹事府少詹事。
④ 《麟溪集》，寅卷下。
⑤ 《郑氏宗谱》，光绪壬午年（1882）重修本，义门第十五世孙郑崇宏主编。

将上述三则信息串起来看，一副郑济赴京修史的画卷就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最晚建文三年（1401），就在《明太祖实录》纂修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建文帝将他那位年近七旬、并早已退休在家的老师郑济请到了南京。当了建文帝差不多四年老师的“左春坊庶子”郑济，应该是参与了实际修纂工作。谁知这项工作还没有完结，建文帝就逊了国。建文四年（1402）九月，朱棣篡位登基后不到四个月，就很快发现这部实录不遂他的心意，便下令尽行销毁，并诛杀前实录官，“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实录》，直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藉没”[①]，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认为“比者建文所修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朕鉴之诚有歉焉，今命儒臣重加纂修，务在详备。”[②]于是，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的郑济等一众原班人马，就在解缙[③]的领导下匆匆忙忙着手重修。虽然这次重修只用了短短的八个月时间，即在永乐元年（1403）六月就成书了，可是郑济却在成书之前的四个月，即二月初五日就突然“卒于京”了。如果郑济是因为修史劳累过度而死，或即便就是年老、疾病等原因正常死亡，他不仅会得到官方的嘉奖，而且会成为郑义门的一种荣耀而载入家族史册。可是郑济这一死，郑义门感受到的却是“为史事所累”的严重后果。

累什么呢？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郑义门这样的家风和家教熏陶出来的郑济，在修撰《明太祖实录》中与朱棣观点、意见不合，而且还可能“屡教不改”，又不能或不忍甩手不干，只好努力用自己身上那股文人的倔劲，不失绝望地坚守史料公正的最后底线，结果彻底惹怒朱棣。只有这样，郑济才会出人预料地死在纂修实录的岗位上，也只有这样，“著述甚蕃”的郑济也要经历一次彻底的“革除”，到最后“止存《潜溪文粹后识》”。结合当时“革除”的政治高压，《郑氏家谱》中这种对郑济之死的“平静表达”更让人浮想联翩。而郑义门因为郑济之死骤然面临“干黑其家例，当簿录重愆”的政治灾难，更是坐实

①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监修实录》，第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明太宗实录》卷13下，第233页。
③ 解缙（1369–1415），字大绅、缙绅，号春雨、喜易，江西吉安府吉水（今江西吉水）人，明代大臣、文学家，与徐渭、杨慎并称为明朝三大才子。

了郑济因为修史而“忤逆”朱棣的“滔天大罪”。尽管因为郑干的“上疏”，也尽管我们无从知道郑干在这个“疏”里向永乐皇帝陈述了什么，郑义门究竟还是勉勉强强地躲过了这一劫,临近削籍边缘的郑济也没有因此而真正被削籍。

由此可见，郑洽被削籍，其“犯罪事实”远比郑济要严重得多！郑洽的“犯罪事实”也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郑洽比郑济更接近于建文帝、而且要更“死忠于”建文帝。而如果建文帝早就焚于宫中，那就想像不出比郑济因修纂实录而忤逆朱棣还要严重的“犯罪事实”了。因此，建文帝一定是出亡了，而这个郑义门的“逆子”郑洽，也一定是紧紧地追随在建文帝的身边。也只有这样，才会让郑义门深切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并果断地做出决绝的削籍决定，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掘地三尺”、甚至粗暴销毁的削籍行为，以至于如今在郑义门家藏谱册中，竟无法找到与郑洽直接相关的任何信息。

《麟溪集》自元末郑大和编撰以来，后人不断补益，刊行版本甚多。施贤明在《〈麟溪集〉的文献价值论略》[①]中，对《麟溪集》的文献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还通过考证发现了《麟溪集》中所收录的《郑氏谱图》存在罕见的缺失。他在文中写道：“除了墓志铭、传、志之外，《麟溪集》个别版本还收录了《郑氏谱图》《续谱图》，这些都是有关郑氏人物的珍贵文献资料。国家图书馆藏 10404 本（明初递修本）卯卷吴莱《郑氏谱图序》（未完篇）之后第五至九页缺失，第十至十四页均为郑氏人物小传，小传之终是吴莱所作《郑氏谱图后记》。依常理推断，吴莱《序》与《后记》之间当是其人所撰《郑氏谱图》。据吴序，因为浦江郑氏家牒“至照之兄弟，述载方详，其先类出于传闻，尝疑其不足证据”，于是郑鉴在得到遂安主簿夏应孙所赠《遂安谱》后，“命莱仿欧阳氏《谱图》著书以示子孙”，吴莱则“稽司空之所定，参夔生之所述，衍而申之，至鉴兄弟之名而止，复虚其左方，使来者续书焉”。又据同

① 施贤明(1985—)，江苏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元代文学文献。《〈麟溪集〉的文献价值论略》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 年 3 月第 2 期。

卷林以顺《郑氏谱图序》所言，郑钦以吴莱所作《谱图》一卷见示，当知此间近十页内容确系吴莱所撰《郑氏谱图》。另外该本同卷第十六页首行署曰“续谱图已附刊前图，不重出”，仅存序及郑銮、郑钟二人传，未详撰者。不过，成化本次序署作“金华宋濂记”，《宋濂全集》据《郑氏后郑宗谱》所辑佚文《题义门郑氏续谱图》两篇，首篇正是该序。因此，《郑氏续谱图》当为宋氏之作。复据该页所称“鉴伯仲一行十人，鉴、钧、锐三人已见前谱，今书自銮始”云云，可知此《续谱图》亦是残篇。10404本《谱图》仅存十之四五，《续谱图》更是仅余一页，却也弥珍贵。因为这些内容并不见于作者本集，嗣后《麟溪集》诸本中亦罕见收录。除成化本收录《谱图》残篇（卯卷第五页，存郑淮、照、组及绮四人小传，作为全书唯一一页每行23字的版刻，内容也与前后页无法顺接，极为突兀）外，其余诸本难觅其踪。”这段话不仅直接验证了郑崇宏在将郑洽增补进《郑氏宗谱》时“家谱旧属吴宋二公所修，载《麟溪集》卯卷，内系图削去印籍，易以手抄，洽祖以厉禁讳而不书。”的说法，更是郑义门在当时大难临头时，迫不得已在仓促之间将郑洽削籍时采取的“直接撕掉《郑氏谱图》”之“粗暴手段”的有力证据。

那么，因随帝出亡而被郑义门“削”得干干净净的郑洽，是不是远在千里之外宁德郑岐村的郑洽呢?

（四）宁德郑岐村的郑洽就是随亡的郑洽

数百年来，关于建文帝出亡的讨论几乎没有停止过，而建文帝最终隐跸在哪儿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达数十种之多。其实这也不奇怪，传说朱元璋出殡时，南京十三个城门洞开，同时抬出了十三口棺材，作为朱元璋治丧委员会最高领导的建文帝，不会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在建文帝出亡诸说中绝大多数都将建文帝描绘成孤魂落魄的流亡和尚，而忽视了他作为一个帝王应有的政治格局和战略弹性，更忽视了其出亡仍然是以“复辟”为目的而展开的以军事斗争为主要线索的“革除”局面。实际上最晚到建文三年（1401）十月战场形势开始恶化

之后，建文帝还是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策划包括“出亡”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当建文四年（1402）三月建文军开始呈现出全线溃败之势，尤其是四月下《罪己诏》时[①]，建文帝如果还没有做好出亡的安排，那他这个朝廷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宁德地区是建文帝复国战略的最佳选择

建文帝出亡东南说应该是诸说中比较具倾向性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云眉先生就十分赞同潘柽章“东南一隅，燕师势难遍及”[②]的说法，这无疑揭示了建文帝出亡面临的最大困难，即经过四年多的靖难战役后已经落魄到需要“募兵勤王[③]”的建文帝，显然已经无法与朱棣在陆上进行军事抗衡了。这种情况下，腿脚不便的他想远赴西南，只能如诸说中提到的那样狼狈潜逃，这是其一。其二，建文帝以“削藩”而酿成大祸，他那些分封藩王的叔叔们，即便不是朱棣坚定的追随者，也绝不可能为他提供庇护，更别说拥戴他东山再起。有意思的是朱元璋在给他的二十四个皇子分封（朱元璋二十六个儿子，太子朱标不封、二十六子朱楠早夭未封）时，竟然神使鬼差地留下了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等几个省份未封藩。不管是不是朱元璋未卜先知，建文帝在出亡前断不至于忽视这种地缘因素。其三，因为朱棣的水军基本空白，建文帝只有依赖规模庞大的沿海水军，才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军事优势，建文帝的近臣黄子澄“欲与善航海乞兵”[④]的记载印证了这种选择。明初为防范逃亡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残余势力以及倭寇侵扰，朱元璋十分重视东南沿海防务建设并在浙闽沿海建成了一支由中央直属的规模超过千艘战船的巡洋舰队[⑤]。据统计到洪武末期，全国沿海共设置卫 54、所 99、巡检司 353、烽堠 997，按照当时卫所的编制估

① 朝鲜《李朝实录》卷 4，吴晗 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 册，第 175 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16 记载为“五月”。
② 黄云眉《明史考证》卷 4。
③ 朝鲜《李朝实录》卷 4，建文帝《罪己诏》。
④ 《明史》卷 141《黄子澄传》。
⑤ 参见：杨国桢、刘璐璐《明初琉球洋海战与后世的社会反响》。https://crlhd.xmu.edu.cn/2016/0503/c11794a234407/page.htm

算，沿海水军规模超过 40 万[①]。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月，朱元璋还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②]”这些兵力即便是平均分布，浙江南部、福建及广东东部沿海水军规模应不少于 20 万人，舰船不低于千艘。问题是，如果这些水军不掌握在建文帝手里，或者已经归附朱棣，那么在永乐初的几年里，朱棣有必要大规模地营造海船吗？梳理《明太宗实录》的记载粗略统计，从建文四年（1402）九月开始到永乐三年（1405）年底，朱棣命令福建、浙江、江苏等地都司赶造、改造海船有据可查的数量竟高达 2734 艘[③]！永乐朝郑和六次下西洋，最大规模的船队只有二百多艘，人员不到三万人，也就是说，朱棣在东南沿海赶造这么多海船做什么用？其实答案不言自明。

从军事斗争的角度衡量朱棣在东南沿海的作为，“疑点”还有很多。一是明初宁德驻军主要有东洋麻岭巡检司、南靖关、福宁卫和大金千户所（洪武二十一年置）等 4 处，而在永乐初猛增到 16 处[④]，有的驻军还不断地变更驻地，这种非同寻常的军事部署直接印证了当时在宁德地区潜藏着巨大的军事风险。二是“永乐二年（1404），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招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疑。”[⑤]这个没有后续结论的记载本身就令人疑惑，且不说永乐初周边关系尚好，而且日本更是弱小且“温顺”，在建文“余孽”尚未根本肃清的情况下，朱棣完全没有必要动用“楼船水军十万”的牛刀去收拾日本，最大的可能就是应对建文水军存在的军事威胁。三是让郑和率水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福建长乐（梅花）、泉州（刺桐）两个港口作为“下西洋”的出发基地，绝不仅仅是因为两港的保障条件好，而是因为这两港是扼守台湾海峡的军事要

① 胡宗宪《筹海图编》，参见：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https://wenku.baidu.com/view/274f90adbceb19e8b8f6bac0.html#
② 《明太祖实录》卷 201。
③ 《明太宗实录》卷 20—卷 30。
④ 《明史》卷 45，《地理志六》。有关朱棣加强闽东军事部署相关依据，详情可参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载《史林》2016 年第 6 期，第 64 页。
⑤ 胡宗宪（明）《筹海图编》。

点。稍具航海常识很容易就能看出，从长乐以北、泉州以南沿岸出发的船只想偷渡到台湾，这两个港至今都是最便捷的截击出发阵地。如果在陆上控制住长乐与泉州之间有限的几个港口，就能完全阻止任何人下海私渡。

宁德古称宁川，朱熹曾盛赞其“山川姻合，临危不危，临险不险”①。境内霍山（支提）山脉就像两个臂膀，右臂向南伸向罗源，左臂经上天湖（虎浿乡）、下天湖（洋中镇）于霞浦方向入海。两臂环抱着霍林洞天（道教三十六洞天之第一洞天）和“状似葫芦的内海（三都澳）”。在这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地副内，不仅地势奇骏绵延、海岛星罗棋布易守难攻，而且气候湿润、土厚海丰足以自产自给，还有银矿提供充足的财政保障②，无疑是数十万建文水军以及从四处驰援而来的“勤王”军马天然的驻屯蓄力之所，郑岐村就处在其中山海衔接的中心位置。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建文军很容易就能够依托地形构建起“以大京（东冲半岛）为前沿、以郑岐村为中军、以钟洋村为大帐③”的作战部署。这样部署，进可北伐复国，退可偏安台湾或远遁西洋，应该说在建文帝出亡的其他诸说中，均不具备这种在军事抗衡上比较优越的地理条件。实际上环三都澳就近的村庄还流传许多“大海战”的口碑传说，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建文帝最终隐跸在宁德，而只能说明宁德是其立足军事手段谋求复国的最佳战略选择之一。如果郑洽确实是因为军事才能和忠诚被建文帝器重和依赖，那么他在郑岐这个“战场的中心位置”④上发挥作用就再合适不过了。

2. 郑洽不是“卒公安”而是到了福建沿海

古籍史料中关于郑洽随亡去哪里的问题，赵士喆的《建文年谱》首次提到

① 谢肇淛（明）《长溪琐语》。
② 梁方仲：《明代矿银考》、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四卷：福建宁德地区有5个银矿，明初年开采量将近全国的10%。参见：孙绍旭《白银古道》，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③ 三地都留存有大量的疑似建文遗迹。参见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系列丛书《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之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其中郑岐村所在的漳湾岛（1965年填海造地之前是岛）还保留有明初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并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④ 克劳塞维兹《战争论》，意为能够调控战场的有利位置，即关键节点。

郑洽“建文尝访郑洽于浦江，其堂中匾无故坠地，建文惊遁。寻侦者至，无所得，乃免。洽后省建文于蜀道，病留公安辰舍中卒。”在其后成书的，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谈迁的《国榷》和查继佐的《罪惟录》等也都采用了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值得商榷。第一，郑洽是什么身份，出亡的建文帝能屈尊跑到郑义门“访”他？要访也是访郑义门当时的家长、曾经被自己“接见[①]”过的郑渶。郑洽如果曾经是朝廷栋梁抑或是建文帝十分信任的亲随，或者早被朱棣列入奸臣名单四处张榜抓捕，或早就紧紧跟随在建文帝身边了，不至于建文帝还要冒险亲自跑到浦江去“访”。而如果郑洽只是一个普通乡绅，那就更不可思议了。第二，永乐初，郑义门正是被朱棣朝廷重点关注的地方，建文帝的老师郑济因为修史刚刚不明不白地死在南京，全家正为此所累。而具体承办朱元璋丧礼的礼部尚书郑沂致仕回家还没几年，又被朱棣召到南京并“复其官”。第九世的郑干、郑棠也被启用担任监察御史和翰林检讨[②]。不管建文帝是否知道这些信息，对他而言郑义门都是吉凶难卜的“高危雷区”。反过来说，如果是郑洽陪着建文帝“隐匿”到郑义门倒是比较合理，郑义门家藏史料中确实也有很多建文帝曾经在郑义门“隐匿”的记载。但如果这样，建文帝和郑洽就犯不着再“走蜀道”了，因为从南京直接溯江而上过三峡入川，远比从郑义门出发入蜀要便捷得多，而从郑义门南下进入福建宁德地区倒是便捷得很。第三，朱棣还真的因为藏匿建文帝的事情查抄过郑义门，“有告建文帝匿其家者，遣人索之。渶家厅事中，列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备不虞。使者至，所发皆经史，置其半不启，乃免于祸，人以为至行所感云。”[③]如果赵士喆所言查抄事属实，《明史》也好，郑义门家藏史料也好，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记载下来。又或者说这两次查抄实际上是同一件事？那么被“免”的就不仅仅是郑洽，而是郑渶及其所代表的郑义门全家数百人。第四，郑洽如果只是被幸免者中普普通通的家族一员，

---

① 《明史》卷296列传第184孝义一《郑濂》：建文帝表其门，渶朝谢，御书“孝义家”三字赐之。

② 《郑氏宗谱》，光绪壬午年（1882）重修本，义门第十五世孙郑崇宏主编。

③ 《明史》卷296列传第184孝义一《郑濂》。郑义门家藏史料也多有类似记载。

又有什么理由让他做出“省建文于蜀道”的决定、并让其家族被迫承担因此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呢？这对于秉持孝义特别是已经年过六十的郑义门子弟而言是不可想像的，除非郑洽真的是建文帝出亡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这样，郑洽完全没有理由像姜太公一样在浦江家中坐等着建文帝来访。所以郑洽“走蜀道”并“卒公安”的说法不可信，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在公安或者哪怕附近的其他地方，均未发现任何相关郑洽及其后人的线索，更不用说实物实证了。

如果说万历年间郑崇岳将郑洽补录到《郑氏宗谱》时[①]，没有看到有关郑洽“卒公安”的信息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随后从清康熙六年（1667）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郑义门后人十六次修谱中均未看到这个信息，那就有点说不通了。特别是郑义门在清中期举办的一场专题纪念郑洽的“盛大”活动，也说明了郑氏后人并不认可郑洽“卒公安”的说法。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金华举人金际熙、贾思暲等二十四名士绅，因康熙年间松阳士绅为叶希贤[②]建寓贤祠[③]时，将郑洽与方孝孺等建文忠臣同列配享而感佩本乡郑洽的忠义事迹，联名向金华府浦江县具文请示将郑洽补祀在乡贤祠。知县在批文中认为郑洽“慷慨悲歌，当日之音容宛在；从容赴难，此时之朽骨犹馨。斯诚一代完人也。”而后表示“应享岁时之俎豆，准即续祀贤祠，以垂奕祀[④]”。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二十六日，由“署浦江知县事、福建古田郑镛[⑤]”主持，邀集本乡士绅名流为郑洽举办了隆重的补祀祭奠仪式，并以“随亡为忠、避祸为智[⑥]”追谥郑洽为“忠智公”。众人不吝笔墨、纷纷撰文赋诗百余篇（首）对“忠智公”随亡事迹追思感慨，最后结集成册，即郑义门家藏重要史料之一——《希忠录》。这应该是有史以来对郑洽随亡最全面的总结了，其中《拟翰林待

① 根据郑义门修谱记录，这次修谱时间应是明天启六年（1626）。
② 建文帝随亡大臣之一。《明史》（卷141）：“希贤，松阳人。亦坐奸党被杀。或曰去为僧，号雪庵和尚云。”
③ 位浙江松阳县城关，祠仍存，建国后已改用他途。
④ 《希忠录》。
⑤ 《希忠录》。
⑥ 《希忠录》。

诏郑公私谥忠智议》《明翰林待诏郑忠智公传》《祭乡贤郑忠智公文》等文描述了郑洽随亡的概貌，颇有文名的三位作者均未采纳其“卒公安”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希忠录》中收录的郑义门同居第九世——郑洽的侄儿郑机[①]的两首诗，让人觉得话外有音。其一：“退难补过进思忠，气节森森有古风，潜德幽光今可发，共怜艰险一生终。”其二：“孝义初缘御笔亲，今将移孝作忠臣。蛮烟疍雨同艰苦，长使君王恋此人。”诗中“潜德幽光”应该是揭示了郑洽与建文帝及其家人长期而“隐蔽”的主仆关系，否则郑洽怎么能做到“长使君王恋此人”呢？“蛮烟疍雨”地“蛮”通“闽”，“疍”即疍民[②]——以船为家的流浪渔民，是不是郑机隐隐中向后人交代了郑洽随同建文帝从郑义门离开后远赴福建沿海的线索？郑机比郑洽小十八岁，建文帝出亡时（1402）也才四十一岁，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他的说法也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奇怪的是这两首诗并没有被收录到《麟溪集》中，而是在跨越四百多年后被《希忠录》收录，这大约也是因为其诗意敏感，而无奈采用像郑洽被“削籍”时关键信息“易以手抄”的惯用手法吧。

3. 尘封孝义的郑岐村

2009年初，在离郑岐村不足五里的上金贝村发现神秘古墓后，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为了比对就近金邶寺一块石碑上的字迹[③]，慕名来到郑义门寻找建文帝手迹[④]。虽然无果，但他们在郑宅镇看到一切似乎十分熟悉，很多特征于千里之外的宁德郑岐村十分相似。通过研究小组的深入研究并与郑义门之间多次互动，特别是得到了厦门郑坂村郑紫挺老人（即郑洽长子郑榛后人）提供族谱信息的支持，得出了郑岐村开基始祖郑崎公（即郑洽）与郑义门同居八世祖、随帝从亡的郑洽是同一个人的结论并于2010年3月正式与郑义门认祖归宗。

① 字叔慎，旌廿三，淏之长子（1361–1429）。永乐间以郡邑交荐，授湖广汉川知县，转广东仁化知县。
② 现在在福建霞浦至连江海域，还有部分疍民沿袭着古老的生活习俗。
③ 署名沧海大师作“蒙泉”石刻，疑为建文帝手书，今存。
④ 《明史》卷296列传第184孝义一《郑濂》：建文帝表其门，渶朝谢，御书“孝义家”三字赐之。

孙绍旭[1]教授在《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2]一文中对郑洽最后落脚在宁德郑岐村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本文不再赘述，但其中对“秉铎”的释义值得商榷。孙教授引用了《浦江县志》和郑义门《郑氏宗谱》中“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者秉铎闽之镇海卫，致书浦江郑氏，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后子孙颇繁盛。”的记载，大概按照字面意思认为是“云南有郑某者拿着一个名叫‘铎’的人写的信……”，因为郑岐村《郑氏宗谱》中恰好出现了一个“（郑）铎”，因而认为郑岐村郑氏后人亦出自郑义门，但这个结论可能存在较大的歧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时龙[3]副研究员认为“秉铎”是古代担任教育工作的一种职务名称，因而所引用材料的大意应该是：“云南有个在福建镇海卫担任‘秉铎’的姓郑的人……”。福建镇海卫儒学成立于明嘉靖二年[4]，实际上郑洽随亡时已经六十岁了，郑铎作为其重孙（郑岐村家谱第四世，郑洽为第一世始祖）不可能在嘉靖年间担任镇海卫“秉铎”。即便他真的给云南的分支写了认祖归宗的证明信，但这封信却在二百年之后的崇祯年间出现，其中的曲折婉转比如“随驾滇粤流寓”之类的线索必值得深入探究。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对云南蒙自的这支郑氏族系进行考察研究的公开资料。

郑义门派出考察的宗亲，在郑岐村深深地感受到两项“强烈震撼”的郑义门孝义文化基因。一个是郑岐村家谱名为《白麟谱》，“白麟”二字让人瞬间就能体会到郑岐村郑氏后人追念祖德宗功的初心。北宋元符二年（1099），郑义门始迁祖郑淮在郑宅镇定居后，为了让后人世世代代纪念其十九世先祖郑白麟，就把村前的“香岩溪”改名为“白麟溪”[5]。在郑岐村不仅也有一条环绕房前屋后的“溪”，而且由始祖郑洽亲自把家谱定名为《白麟谱》，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个是郑洽化名郑崎出现在家谱中始祖的位置，让郑义门后

① 孙绍旭，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宁德师院教授。
② 《史林》2016 年第 6 期。
③ 陈时龙：（1977.1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
④ 郭培贵《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第 321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 年 6 月第 1 版。
⑤ 《麟溪集》。元丞相脱脱亲书“白麟溪”赠郑义门，碑刻今存。

人感怀至深。郑义门同居第一世始祖郑绮[①]也算是个传奇的人物，自身博学至孝不说，临终时“召子孙于先祠，刺指血滴酒中，次第饮之，誓曰：‘吾子孙有不孝悌，不同釜炊者，天实临殛之’，言讫而逝。[②]”由此开创了全家同财共爨长达三百多年的“孝义家声”，郑义门后人至今对郑绮的仰戴一刻也没有马虎过。郑岐村“先祭崎公坟，次祭本坟，子孙均须登山受胙[③]”的习惯，与郑义门对郑绮的祭祀[④]如出一辙。郑洽在郑义门“削籍”出亡，并故意不避先祖名讳以“郑崎”之名开基，除了“革除”的因素必须更名外，效仿先祖试图在郑岐再开创一个同财共爨的“郑义门”，难道不也是他迫不得已“移孝作忠”后感恩先祖的一种寄托吗？除了这些“尘封的孝义”之外，郑岐村及周边村镇还流传很多与“建文帝大臣郑洽”相关的口碑传说，似乎也在佐证随帝出亡的郑洽在郑岐村落脚的事实。郑岐村至今留存的五栋与闽东其他民居风格迥异的明初古建筑，以及内中悬挂的诸多令人捉摸不透其内容的牌匾，更让人对这个郑洽的身份和经历产生诸多的联想。

与郑岐村及郑洽的神秘一样，在闽东乡村各地也同样若明若现地存在着许许多多类似建文帝及随亡臣子“隐居”的线索和一些奇怪的“遗存”，宁德市建文帝踪迹小组十余年来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梳理出来的数十条“证据链”和“疑问”，无疑是深入考察研究建文帝出亡谜团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然而，在那个一方要拼命隐藏痕迹、一方要拼命“革除”痕迹、叔侄之间围绕帝位正统而展开的持续数十年的惨烈追杀与逃匿的年代中，根本不可能留下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只有尘封在各地乡野僻壤之中并正在逐渐消失的那些“奇怪”遗迹、隐晦记载和神秘传说、奇特风俗，仍然在默默地注视着今天看起来严谨求实、实则双眼已被蒙蔽的我们。因此，一是要用保护民俗遗存、丰富传统文化的态

① 郑绮（1118—1193），字宗文。浦江人。为郑义门创始人。性至孝。乾道间，赐号冲素处士。
② 宋濂（明）《浦阳人物传》，《宋史·孝友列传》《麟溪集》亦载。
③ 郑岐村《下井堂郑氏宗谱·世系表》，参见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史林》2016年第6期，第62页。
④ 郑义门《郑氏家仪》《郑氏规范》。

度，加紧宁德地区有关口碑、遗迹、风俗的梳理、保护工作，即便不能立即取得某种学术突破，也便于为后人深入研究留下“活标本”。二是要坚持站在军事斗争的角度，结合宁德地区特殊的军事地理条件，审慎衡量明初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重大的政治、外交、经济决策和军事部署调整中可能十分神秘的文献记载。三是要以帝王的政治格局，科学分析建文帝出亡后从“复国的企图”到最后“归隐的无奈”这个过程中的心路变化，以此审视在宁德地区出现的“线索”并进一步挖掘完善。

作者单位：福建省科委

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情况汇报

各位专家与来宾；

早上好！

首先，让我代表宁德市明史研究会、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下面，我从两个方面向大家汇报一下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情况。

（一）研究历程与主要收获

概括地说，宁德市的建文帝踪迹研究工作自 2008 年 3 月以来，已经开展了 12 个年头了。如果从 2010 年 7 月南京国际建文帝踪迹研讨会暨中国明史学会年会召开算来，也已经历了整整 10 个年头了。

10 年来，宁德市明史研究会、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 130 多位志愿者，

本着“自觉、自愿、执着、奉献”的团队精神和“还原一段真实的明史，还原一个真实的明朝”的奋斗目标，三进北京，五入南京，七上浙江，八下福州、厦门、泉州，九上雪峰寺，十度到支提，足迹踏遍了苏南、河北、皖东、浙中、浙南、闽中、闽南及市内的55个县、市、区，91个乡镇，313个行政村与自然村，查阅地方志与地情资料129部，家谱1855部（其中清代以前的家谱96部），收集到流传于宁德域内及周边地区的与建文史事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350多则，摘录各种馆藏资料9000多万字，收集到与建文史事相关的历史信息7000多条，坚持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具有闽东的“滴水穿石”精神的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相结合的明史研究创新之路。

首先，我们筹资几十万元，购买和复印了一批正史资料与明史论著（详见附件一），作为大背景资料进行研究。同时，购买和复印了一批明代笔记与杂记（详见附件二），来作为小背景资料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还搜集了一批一般地方志书与稀有地方志书（详见附件三），作为主要辅助资料进行研究。并同时搜集了一批关联性家谱与家族文史资料以及域内相关部门编写的关联性民间故事集（详见附件四），作为次要辅助资料进行研究。

经过疏理，我们又先后设置了“建文帝是怎么离开南京城的？”“建文帝到底逃向何处？”“建文帝是如何入闽入宁的”等一系列课题进行研究，并撰写了《建文帝离开南京城的四种传统说法阐释》《建文帝出亡方向的三种传统说法阐释》《建文帝入闽入宁新探》等一批研究文章（详见附件五）。

这些系列文章组成了一组证据链，从理论方面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

在此基础上，我们初步描绘出建文帝出亡路线图，撰写了《建文帝出亡路线图考》一文。2010年7月，我们带着这篇文章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国际建文帝踪迹研讨会暨中国明史学会年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该文已被收入会议文集《天下说建文》一书。

2010 年 7 月起，我们积极响应中国明史学会在南京会议上提出的“今后的明史研究要走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相结合的道路”的号召，并把这一号召切切实实地落到实处。

这期间，我们又相继完成了一批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和一批研究文章（详见附件六）。

这些系列文章组成了另一组证据链，从实践方面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的研究是全方位的、系统的、多角度的全面取证、论证，而不是单一的、孤立的、片面的取证、论证。由于我们的论证是以证据链的形式进行的，故我们的论文不构形式，不求规范，不限字数，不图华丽，只要能说明问题即可。

具体地说，宁德市的建文帝踪迹研究工作缘起于一座古墓，起步于一本古书、一个家族、一座寺庙与一个僧人，拓展于一块木刻、一件袈裟、一位帝师与一个太后，延伸于一位郡主、一个妃子、一位将军与一副古画，收获于一批大臣、一群墓葬、一批驻军与一群移民。

1. 一座古墓

2007 年冬，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被辟为宁德市与蕉城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由宁德市委组织部牵头扶建。2008 年 1 月 3 日，村民在修建登山道时，在金贝寺下方的山包上发现了一座奇特的古墓葬。村干部遂向时任蕉城区区长的陈宗森作了汇报。陈区长当即赶赴现场考察，敏感的他，当即感觉此墓不同寻常，遂向挂点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民生作了专题汇报。郑部长听完汇报后，随即驱车上山，赶赴现场作了踏勘。颇具慧眼的他，顿感这是个重大发现，里面似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但自己又说不出来。于是，他当即拿起手机拨通了市博物馆馆长钟亮的电话……

2008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应宁德市博物馆的邀请，福建省博物馆考古专家、研究员王振镛偕助手到达宁德，与宁德市博物馆的专家学者组成考古工作队，

对上金贝古墓进行了为期7天的考古挖掘与实地调查，发现古墓现场构件狼藉，地宫空无一物。同年2月22日，《闽东日报》以“探访省内规模最大的单人僧塔”为题，对考古情况作了报道。

3月上旬，王振镛先生及其助手伴随福建电视台“发现档案”栏目组编导一行数人到上金贝古墓现场进行二度田野考古，并拍摄实况录像。经过再次实地考察，王振镛研究员兴奋地提出，该古墓极有可能就是六百年来众多明史专家苦苦寻觅的明朝失踪皇帝朱允炆的陵寝。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墓（舍利塔）碑碑文内容暗合墓主是个流落江湖历尽沧桑的朱家第三代帝王（明朝第二个皇帝）——即朱元璋之孙（朱允炆）本意。第二，墓葬规格高，精致豪华，超过闽东籍（福宁籍）一品大员林聪的墓葬。第三，古墓形制奇特，亦僧亦俗，符合建文帝朱允炆的特殊身份。王振镛研究员还指出：“这样的墓葬不是寻常和尚所能拥有的，而身为奴才的太监又不至于如此张扬”，从而否定了古墓墓主为“僧人”或“太监”的说法。3月中旬，《闽东日报》以“上金贝古墓里躺着建文帝？”“上金贝古墓墓主真的是建文帝？”为题，对此事此论及王振镛研究员的原话作了连续报道。《闽东日报》的报道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与争议。这轰动与争议延至2010年，以至成了2009年与2010年福建省的十大新闻。

这就是上金贝古墓发现并成为福建省十大新闻的始末。

2. 一本古书、一个家族、一座寺庙与一个僧人

一本古书——指得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学家查继佐写的《罪惟录·建文逸纪》一书。该书记载了自明初至清初关于建文帝下落的“二十三种说法”（史称“二十三说”）。这“二十三说”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二十三说”的发现与研究，那么我们在研究建文帝的历程中，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而且完全有可能出现像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状况。整个研究就有可能重蹈历史覆辙，无果而终（详见发给大家的《建文帝离开南京城的四种传统说法阐释》《建文帝出亡方向的三种传统说法阐释》《建文帝入闽入宁新探》诸文）。

循此“二十三说”中提到的涉及福建的“两说”之线索，我们立马组织力量北上浙江浦江郑义门，南下福州雪峰寺。很快，研究小组就获取了大量的资料线索。并据此资料线索，对上金贝山脚下的几个渔村——金涵乡濂坑村、井上村与漳湾镇郑岐村、门下村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终于有了更大收获。

一个家族指得是浙江浦江郑义门郑氏家族及其八世祖郑洽。其人跟随建文帝出亡，一直下落不明。郑氏家族找了600年一直找不到他。无独有偶，宁德市蕉城区郑岐村郑氏家族，他们在那儿定居了600年了，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祖先郑岐公来自何方。研究小组用大量证据证明了先后化名为郑三合、郑岐与郑堂的郑岐村郑氏家族的始祖郑岐就是郑洽。我们充当红娘，牵线搭桥，促使双方经过多次互动与家谱对接，终于在2010年阴历二月初八实现了认祖归宗。郑义门郑氏族人等待了600年的26下钟声，终于得以敲响了。他们用各种庆典方式表达了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全国有十八家媒体报道了郑义门举行认祖归宗盛典（详见发给大家的《郑洽归宗有力佐证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一文）。

这里需要提及的一点是，这个浙江浦江郑义门，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亲自树立的“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廉政教育基地”。浙江浦江“义门郑氏”已成为一种文化现像，那就是用家规家训培养出来的廉政思想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曾三入郑义门，认真总结了郑氏家族不出贪官的做法。2015年初，中纪委王岐山书记深入郑义门调研，回去后在中纪委网站首页全文刊登了义门的家规家训。而义门郑氏文化的唯一传承地就是宁德。

“郑岐村的郑岐就是郑义门的郑洽”这个课题的尘埃落地，在全国明史学界与福建省宁德市的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许多人纷纷加入了研究的行列，其中一部分还自愿加入了研究小组充当“志愿者”。

一座寺庙指得是福州闽侯雪峰寺。该寺号称“南方第一禅林”，它是佛教禅宗五大支派中的云门宗、法眼宗的共同发祥地（即“祖庭”），其在佛教界居领袖地位，影响甚巨。

一个僧人——指得是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正映洁庵禅师。这个洁庵禅师

是江西人，从小在福建宁德的三峰寺与安仁寺出家。后拜南京灵谷寺住持福建福宁桐山（今福鼎市桐山镇）籍的道谦牧庵禅师为师。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被朱元璋选拔为“国师”。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被朱元璋派到福建泉州开元寺任住持。永乐二年（1404年），突然辞去开元寺住持一职，转赴雪峰寺任住持。永乐十六年（1419年），在雪峰寺突然失踪。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又突然从北京现身回到了南京灵谷寺。这位高僧的曲折离奇的经历，一定程度地反映和折射了建文转向永乐时期这一段被沉埋的历史，揭示了隐藏于其中的重大秘密（详见发给大家的《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洁庵禅师身世之谜探秘》）。

洁庵禅师与武当张三丰是建文父子俩的保护神。由佛、道两教的力量来暗中护卫朱允炆、朱文奎父子俩，这应该是朱元璋生前就作出的严密安排。这也是朱允炆、朱文奎父子俩在永乐初、永乐中能够躲过燕军势力轮番的追杀，得以幸存的主要原因。

3. 一块木刻、一件袈裟、一位帝师与一个太后

一块木刻指得是宁德支提寺藏经阁中收藏的明代木刻《支提寺全图》。几百年来，谁也不知道上面刻了什么东西，记载了什么内容。有一次，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率队到支提寺考察珍藏文物，细心的王先生无意间发现了这块木刻上竟然刻写着郑和送千尊圣像（指天冠菩萨坐像）到达支提寺的史事。开头大家还没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谁知媒体把这件事报道出去以后，却引来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专家的到访与指导使研究小组成员明白了木刻的重要性；第一，它是郑和到过宁德，到过支提寺的第一件重要物证。对于建文帝踪迹研究来说，它的作用比袈裟、千尊铁佛的作用还要大。因为它是会说话的，而袈裟、千尊铁佛是不会说话的。袈裟是有争议的，它是没有争议的。就如同郑岐村的郑岐被确认为是郑义门八世祖（八代孙）郑洽一样，其重要意义与影响力是巨大的。它的发现，深层次的意义就在于，有了它，千尊铁佛这个郑和到达宁德，到达支提寺的第二件物证也就成立了。袈裟是明初之物的理由也就

更充分了。第二，它颠覆了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观点——郑和足迹未到过宁德。而木刻则说明了，“郑和到过宁德是千真万确的事”（郑宽涛先生语）。它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多重的、广泛的。它为郑和文化的挖掘与利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一带一路的宁德段过程提供了具体内容。第三，它会使人们去思考另一个问题——郑和为何会在永乐十年（1412年）九月，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年份突然出现在宁德支提寺？因为在郑和之前钦差中使太监周觉成也突然来到了宁德支提寺。据正史资料记载，他是奉朱棣之命到宁德支提寺来督建大雄宝殿与宝阁的，而建宝阁就是为了安置千尊铁佛与建文帝的，两者之间存在因果与逻辑关系。而周觉成终身留在宁德未走，最后列得不明不白。这些均从反面证明了建文帝隐藏在宁德。此外，如果您是个有心人，您不妨认真探索一下建文四年六月至永乐三年六月这一时间段里，郑和到底在哪里？他在干什么？如果深入研究下去，您就会大吃一惊，就会有重大收获。这三年中，郑和与姚广孝一起，一直在浙江与福建的沿海活动，一边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一边寻找“建文宝藏”与“张士诚宝藏”。结果，张士诚宝藏给他找到了，但建文宝藏却杳无音讯。虽然没有找到“建文宝藏”，但却发现了建文势力全面退守闽东与闽中地区的情报。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郑和十万楼船水军进击福宁湾、三都澳、罗源湾、马尾港、泉州湾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只是鉴于政治上的需要，永乐帝朱棣把这一段历史尘埋了。谁料想，明嘉靖朝兵部尚书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却把这段历史给抖了出来。

一件袈裟指得是宁德支提寺珍藏的那件稀世瑰宝云锦袈裟。《福建日报网》《扬子晚报网》相继报道了南京云锦研究所专家张云宝先生对这件云锦袈裟的鉴定意见；“这件袈裟应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很可能就是建文帝带出宫的那件东西。”于是，研究小组便设立了“支提寺云锦袈裟之谜”这个课题进行研究（详见发给大家的《支提寺珍藏的五爪金龙袈裟确为明初的御用品》一文）。

一位帝师，指得是“国子先生”周斌。蕉城区洋中镇蓝桥村，是帝师周斌的家乡。那儿，流传着大量建文帝与帝师周斌的民间传说故事，这些故事有些

已被收入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主导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

在宁德（今蕉城），不但有建文帝与帝师周斌的民间传说故事流传，20世纪80年代还曾经上演过《建文帝哭师》的闽剧。研究小组还收集到剧本原件。

相传，永乐初，朝廷曾连续下过6道圣旨，要周斌回朝做官，周斌拒不接旨，遂行诈死，远隐他乡。而周斌的三个儿子亦隐姓埋名，失去踪迹。

一个太后指得是建文帝母亲吕太后。据史料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秋七月，同样是一把冲天大火，烧毁了明东陵的几间偏殿。起火后，被永乐帝朱棣打发去看守明东陵的建文帝母亲吕太后，建文少弟徐王允火熙　与建文大妹妹朱珍娘（即朱一娘）突然失踪了。

几年后，在宁德西乡石后（今蕉城区石后乡）芹坂头村廊桥头乡历壇前，有人牵头建起了一座拜亭。奇怪的是，那些人在铁沙溪码头（古码头，在今蕉城区金涵畲族乡濂坑村境内）至西乡洋中村的一路上，又建了5座与寒桥头拜亭一模一样的亭子。而后，芹坂头村及其周边35个村庄的人都异口同声说，这个亭子是“太后亭”，亭后的乡历坛内葬着明太祖朱元璋的母亲。

而6座拜亭与乡历坛中，唯独芹坂头村寒桥头这座拜亭与乡历坛600年来香火不断。究其原因，相传，一是因为该拜亭是奉大明皇帝旨意修建的。二是廊桥曾被那个大明皇帝命名为“寒桥”。该廊桥入口上方原镶有匾额一方，上书“寒桥”二字，后毁于火。三是拜亭两边的那一副“大明君钦赐凉亭，三十六村春秋祭扫”的对联系邑人郑堂（即郑洽）手书。至于那个“大明皇帝”是谁，里人都口口声声说是明太祖朱元璋。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未曾到过闽东，其母亲与父亲的合葬墓——明皇陵则在安徽凤阳。不知为什么；600年来，宁德西乡百姓会相信这种误传，却始终没有人去纠正它？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大家终于明白，石后乡芹坂头村寒桥头的太后亭与亭后的乡历坛600年来一直被误传是“洪武帝”母亲墓这事显然与“建文帝”一直被闽东人误传为“洪武帝”一事有关。而“建文帝”之所以被说成是“洪

武帝”，则与永乐帝朱棣上台后，把建文帝的帝号、年号取消了，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被改成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其结果是“一个死皇帝却拥有了活纪年”，朱元璋死后又凭空多做了四年皇帝。因而史学家就把朱棣炮制出来的这一纪年戏称为“后洪武时代”。久而久之，造成后来的闽东人只知有“洪武帝”，不知有“建文帝”，错把“建文帝”的母亲当成了“洪武帝”的母亲。而郑洽等一批隐于西乡与周边地区的建文朝从亡大臣则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一种误读作掩护，从容地开展了祭拜活动。而且公祭活动代代相传，香火延续了 600 年，从而形成了宁德（今蕉城）西乡这一奇特的传统与特异文化现像。

相传，建文帝的母亲吕太后在西乡芹坂头村去世并被葬入乡历坛后，跟随她的皇太子妃廖妙玉（廖平女）一直留在寒桥头为吕太后守墓，宁德（今蕉城）当地百姓称她为“南京婆”。又因她一直在寒桥头开药店，悬壶济世，乡民又称她为“桥头婆”。乡民感念她生前造福乡梓，遂在西乡与四都、五都、六都一带建了多处“南京大王庙”祭祀她，香火至今不断。

4. 一位郡主、一个妃子、一位将军与一副古画

就在研究小组正要给“从亡大臣郑洽下落之谜”的破解画上句号之际，又传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福建省厦门市郑坂村老人会在媒体上获悉建文帝与郑洽的一些史实之后，发现自己家族的宗谱与文史资料赫然记载着郑洽及其后代的信息。经过郑义门、郑岐村、郑坂村三地郑氏族人的多次互动与研究小组的帮助，三地郑姓人实现了互认。

厦门市郑坂村《郑氏宗谱》与郑氏家族自撰的文史资料显示；郑洽共生育五子二女。长子郑榛，定居厦门（时为泉州府翔凤里石岐堡）。次子郑松，“靖难之役”发生后，为掩护建文帝与皇太子朱文奎分头南撤，在江阴阻击战中阵亡，草草埋葬。事隔多年之后，其兄潜赴江阴，移骸福建厦门，易名郑安治重新安葬。

建文初，郑榛曾任职于云南刺史府上。建文三年（1401 年），他迎娶了

朱标的三女儿（朱允炆的三妹妹）朱璎娘（即朱三娘），成为皇家郡马。“靖难事变”发生后，先是随父亲郑洽南逃到宁德（今蕉城），后举家秘密迁往福建省泉州府翔凤里（今厦门市翔安区），先居山头仔村（俗称“山头郑”），后迁郑坂村（时称石岐堡）。

随后，研究小组又追踪到了建文帝妃子的身世——建文帝为皇太孙时，洪武帝朱元璋为其选择的侧妃陈凤春，竟然是帝师周斌的小同乡。时，周斌家住宁德（今蕉城）西乡（今洋中）蓝桥村，陈凤春家住宁德西乡东山村，两村相隔仅里许。当地民谣“东山人走马，蓝桥少人家”说的就是这事。

此外，研究小组成员还在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发现了建文帝的妃子与三皇子朱文垚的隐居地——“日庙”与“月庵”，并发现了负责护卫皇贵妃与三皇子的建文朝锦衣卫都指挥使（瑞岩村《杜氏家谱》中记载为“建文朝殿前三品指挥使”）杜华泗的踪迹。

我们还发现了建文朝武将（一说为护驾大将军）、皇亲国戚余六府的踪迹，并发现了以姻亲身份（余六府的夫人系周斌的姐姐）为余氏祠堂撰写对联的帝师周斌的手迹。并在洋中镇留田村发现了建文朝武将余七府（化名）的踪迹。

这些皇亲国戚的现身，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至福建宁德。

一副古画——指得是秘藏于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余姓宗祠内的“帝”字型祭祖图。这副古画蕴藏了诸多的历史信息与多重秘密，我们至今无法破解，急需在座同仁鼎力相助。

5. 一批大臣、一群墓葬、一批驻军与一群移民

一批大臣指得是以郑洽为首的誓死追随建文帝而落籍于福宁（今宁德）及其周边地区的（含回归故里的）从亡大臣（附件七）。这些从亡大臣有墓葬、有家谱、有传说，所涉及的实物证据与史料证据均可互勘。

还有一大批只有单一证据的从亡大臣，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附件七所列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的重要人证，正面的人证。

一群墓葬指得是分布在上金贝建文帝陵周边的从亡大臣的墓葬群。已找到的有13座，有线索但尚未找到的有20多座（详见附件八）。

一批驻军——指的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前后，朝廷往福宁及其周边地区大规模调驻军队现像（详见附件九）。《福建移民史》《八闽王氏家谱》诸书以及闽东域内50多个姓氏的家谱资料揭示了这一秘密（详见发给大家的《明永乐二年朝廷在福宁及其周边的不寻常军事部署》一文）。

一群移民指得是建文末永乐初追随与服从建文帝而在福宁及其周边地区落籍的从亡大臣及其后裔（详见发给大家的《明建文末永乐初闽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移民潮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一文）。

（二）研究局限与研究困难

1. 研究局限

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是如何找到建文帝的真身埋葬地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12年，至今无法解决。自2008年5月，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成立至今，我们对古墓开展了10多年连续不断的深入研究，对古墓系建文帝朱允炆的“衣冠冢”的观点作出了详细的解读（详见发给大家的《上金贝古墓为何被众多的专家学者确认为明建文帝陵》一文）。但由于建文帝真身埋葬地点尚未找到，因此，建文帝最终下落这个谜团还不能画上句号，有待在座的同仁与我们一起合力攻关。

第二是如何给那些改名换姓或留姓更名的从亡大臣“验明正身”问题。我们在踪迹建文帝下落的过程中，挖掘出一大批像郑洽一样或改名换姓、或留姓更名的建文朝从亡大臣，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些人十有八九均是建文帝的从亡大臣，但却无法给其“验明正身”。因为这些人的原籍地找不到，没有对方的配合，我们无法确认其真实身份。使得这些谜案均成了“半拉子”工程。因此，急需得到中国明史学会与在座同仁的帮助，以攻克这一难关。这些疑似建文帝

的从亡大臣主要有钟洋村的“余六府”，留田村的“余七府”，眉屿村的“詹斗二”、儒阳村的“胡福（护）龙”、吴山村的“吴二明”、金钗溪村的“朱癸二”……。

第三是如何给那些虽留下真名正字，但却无法对号入座的建文帝从亡大臣“归位”问题。比如瑞岩村的杜华泗、顶头村的李建极、琼堂村的陈添、下金贝村的林绍斋。这一批建文帝的从亡大臣的特点是有家谱、有墓葬、有真实姓名，但正史中却查不到其人。因而，也需中国明史学会与在座同仁的帮助，以协力攻关。

第四是如何破译与解读在踪迹建文帝下落的过程中挖掘出来的疑与建文史事有关的文物古迹问题。比如钟洋村余姓祠堂秘藏的“祭祖图”以及该村的“坑道”（俗称“鬼洞”）与坑道口的巨大的无字神道碑，郑岐村的古壁画与古匾额中的文字，还有钟洋村、漈山村的地下设施等等。由于我们的研究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是非历史专业与非考古专业的，对此类问题不知该如何处理，急需得到考古部门的强力支持。

第五，是对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中挖掘出来的大量起源于明初且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的解读与利用问题。诸如“和尚当官，贵妇入庵，草墓生孩，莫说荒唐”“罗隐做皇帝，郑堂做军师，罗隐不成帝，郑堂不成师”“一粒崎头母，圆又圆得好，扁又扁得好，压我（罗隐）正好”“大明堂，不空忙，有消息，要提防”“罗隐不成帝，害死闽东人”等等。我们心里知道，民谣里所说的“罗隐”与“郑堂”就是建文帝与郑洽，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证明这件事。这个“罗隐”在浙江省被谐音为“罗允”，浙江省有“罗允寺”；在贵州省被谐音为“罗咏”，贵州省有“罗咏庵”；在泰国被谐音为“罗勇”，泰国有“罗勇府”。不管怎么谐音，但那儿的人们都知道，这个“罗隐”（“罗允”“罗咏”“罗勇”）就是建文帝。

第六是对福建、浙江的畲族聚居地为何围绕宁德县（今蕉城区）成为有规律地环列一圈现像的解读问题。我们在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中发现，福建、浙

江的畲族聚居地是围绕宁德县（今蕉城区）呈现一种有规律的环列。这种现像绝非偶然。这一现像是否与明史中记载的朱元璋的两支失踪的神秘部队有关？由于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支持，我们无法开展深入研究。故此事亦需中国明史学会从中协调

2. 存在困难

主要有下列几项：

一是明史研究会与研究小组非常设机构，无法发挥正常作用。二是没有行政与事业拨款支持，许多事情都办不成。三是我们的研究团队都是非历史专业的，一些研究成果水平不高，档次也不高，切需提升。

鉴于以上三点，我们殷切希望中国明史学会能够呈文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院，把宁德市的中国断层明史暨建文帝踪迹研究列入国家重大历史研究项目计划，并予以立项，以利我们开展后续研究。同时，我们也竭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史学界同仁参与进来，尤其是高校的研究生团队参与进来，帮助我们揭开所有的谜团，还历史一个真面目。

附件一：10 年来，购买和复印来作为大背景资料进行研究的正史资料和明史论著清单

《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明神宗实录》《皇明史概》《皇明献实》《皇明文衡》《国榷》《高僧传》《建文年谱》《明史》《罪惟录》《明史纪事本末》《明史考证》《明靖难史事考证稿》《明清史论著集刊》《朱元璋传》《明朝大历史》《吴晗论明史》《明朝简史》《明史讲义》《明史解读》《万斯同与明史》《永乐帝·建文帝》《明成祖传》《郑和七下西洋》《南京云锦史》《万季野明史辩证》《筹海图编》《福建移民史》。

附件二：10 年来，购买和复印来作为小背景资料进行研究的明代笔记与杂记清单

《万历野获篇》《今献汇言》《建文帝后纪》《今言》《五杂俎》《明朝小史》《姜氏秘史》《国史唯疑》《立斋闲录》《前闻记》《守溪长语与震泽

纪事》《长溪琐语》《致身录》《奇秘录》《从亡随笔》《千钟（忠）录》《两浙名贤录》《西园闻见录》。

附件三：10 年来，购买和复印来作为主要辅助资料进行研究的一般地方志书与稀有地方志书清单

《三山志》《八闽通志》《闽书》《福宁州志》（嘉靖版）《福宁州志》（万历版）《福宁府志》《建宁府志》《江宁县志》（康熙版）《宁德县志》（嘉靖版）《宁德县志》（万历版）《宁德县志》（乾隆版）《宁德县志》（民国版）《霞浦县志》（民国版）《福安县志》（光绪版）《古田县志》（乾隆版）《屏南县志》（乾隆版）《屏南县志》（道光版）《屏南县志》（光绪版）《屏南县志》（民国版）《寿宁待志》（冯梦龙修）《寿宁县志》（康熙版）《福鼎县志》（嘉庆版）《雪峰山志》《开元寺志》《灵谷禅林志》《支提寺图志》《太姥山志》《武夷山志》。

附件四：10 年来，购买和复印作为次要辅助资料进行研究的闽东域内相关姓氏家谱、家族文史资料与民间故事集清单

《八闽王氏》《闽东孙氏》《郑氏家谱》（郑岐村）《郑氏家谱》（郑坂村）《郑氏家谱》（郑义门）《圣恩录》（郑义门）《希忠录》（郑义门）《麟溪集》（郑义门）《周氏联谱》（洋中村）《陈山下里厝谱》（东山村）《余氏家谱》（钟洋村）《杜氏家谱》（瑞岩村）《朱氏家谱》（金钗溪村）《李氏家谱》（顶头村）《胡氏家谱》（儒阳村）《郑氏家谱》（仙岭村）《黄氏家谱》（留田村）《刘氏家谱》（大京村）《朱氏家谱》（大京村）《龚氏家谱》（大京村）《郑氏家谱》（大京村）《王氏家谱》（大京村）《林氏家谱》（大京村）《卓氏家谱》（大京村）《戴氏家谱》（大京村）《曾氏家谱》（大京村）《黄氏家谱》（大京村）《朱氏家谱》（库山村）《刘氏家谱》（柘荣双城镇）《朱氏家谱》（千岛湖农林村）。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福安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

建卷・古田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寿宁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福鼎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屏南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周宁分卷》。

附件五：10 年来，我们设置了一系列课题来予以研究，撰写了一批论文，这些系列文章组成了一组证据链，从理论上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宁德说。

我们设置了“建文帝是怎么离开南京城的”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建文帝离开南京城的四种传统说法阐释》一文；设置了“建文帝到底逃向何处？”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建文帝出亡方向的三种传统说法阐释》一文。设置了“建文帝是如何入闽入宁的”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建文帝入闽入宁新探》一文；设置了“建文帝为何要选择福建福宁为其出亡目的地”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建文帝选择福建福宁为其出亡目的地原因分析》一文；设置了“如何正确解读与建文史事相关的闽东民间传说故事”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与建文史事相关的闽东民间传说故事研究》一文；设置了“明中叶福宁州、宁德县人口为何突然减少”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明中叶福建省福宁州、宁德县人口比明初锐减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一文；设置了“明永乐二年前后福宁州及其周边驻军骤增原因探究”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明永乐二年朝廷在福宁及其周边地区的不寻常军事部署》一文；设置了“闽东民众口口相传的永乐初‘永乐抄寺僧’现状探究”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明中叶中国佛教突然衰微原因分析》一文；设置了“建文末永乐初闽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移民潮说明了什么”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撰写了《明建文末永乐初闽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移民潮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一文。

这些系列文章组成了一组证据链，从理论方面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

附件六：10 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系列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并撰写了一批论文，这些系列文章组成了另一组证据链，从实践方面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

我们设置了“郑岐村郑岐身世之谜探秘”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形成了“郑义门实地调查报告”“郑岐村实地调查报告”“郑坂村实地调查报告”，撰写了《郑洽归宗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一文；我们设置了“上金贝古墓谜云”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上金贝及其周边村庄实地调查报告”，“南京明孝陵实地调查报告”“南京明东陵实地调查报告”“南京明故宫实地调查报告”，“关于金太监传说的实地调查报告”，撰写了《上金贝古墓为何被众多到访的专家学者确认为明建文帝陵》一文；我们设置了“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之谜”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形成了“支提寺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南京云锦研究所实地调查报告”“南京云锦世家调查访问报告”，撰写了《支提寺珍藏的五爪金龙袈裟确为明初的御用品》一文；我们设置了“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洁庵禅师身世之谜”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形成了“福州闽侯雪峰寺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泉州开元寺实地调查报告”，“南京灵谷寺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宁德安仁寺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宁德三峰寺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撰写了《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洁庵禅师身世之谜探秘》一文。此外，我们还形成了“霞浦县大京城堡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撰写了《明初的大京城堡及其四批移民》一文；形成了“蕉城区洋中镇钟洋村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撰写了《建文朝将军余六府（化名）身世之谜探秘》一文；形成了“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撰写了《“日庙”与“月庵”——兼论建文朝殿前三品指挥使杜华泗身世》一文；形成了“福鼎市管阳镇金钗溪村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撰写了《建文朝锦衣卫金吾前卫指挥使朱癸二（化名）身世之谜探秘》一文；形成了“连江县江南乡儒阳村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撰写了《皇太孙朱允炆伴读、洪武朝福建都司左卫将军胡护龙（化名）身世之谜探秘》一文；形成

“蕉城区洋中镇东山村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撰写了《皇太孙朱允炆侧妃陈凤春身世之谜探秘》一文；形成了“蕉城区石后乡小登广村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撰写了《“孝文帝”与“小登基广场村”》一文。

这些文章组成了又一组证据链，从实践方面有力佐证了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

附件七：我们找到了以郑洽为首的一批从亡大臣的下落

10年来，经过艰辛探索，我们找到了一批以郑洽为首的落籍福宁（今宁德）及其周边地区的（含回归故里的）从亡大臣的下落。他们是；建文朝南京留守卫都指挥使、建文帝出亡途中的军师兼宰相、皇亲国戚郑洽；建文朝郡马、郑洽长子郑榛；建文帝三妹妹、建文朝郡主朱璎娘；洪武朝皇太孙侧妃、建文帝的宁德（今蕉城）籍妃子陈凤春；洪武朝国子司业、建文帝老师周斌；洪武朝皇太孙伴读、洪武与建文朝福建都司左卫将军胡福（护）龙；建文朝护驾大将军余六府（化名）；建文朝将军余七府（化名）；建文朝殿前三品指挥使（应为锦衣卫都指挥使）杜华泗；建文朝御医吴二明（化名）；建文朝锦衣卫金吾前卫指挥使朱癸二（化名）；建文朝镇南卫指挥使李建极；建文朝将军詹斗二（化名）；建文朝河南郑州府同知陈添；建文朝国子监生林绍斋等。这些从亡大臣有墓葬，有家谱、有传说，所涉及到的实物证据与史料证据均可互勘。还有一大批只有单一证据的从亡大臣，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附件八：我们发现了上金贝南山建文帝陵周边的从亡大臣陪葬墓群

10年来，我们在上金贝南山周边发现了大批建文帝从亡大臣的陪葬墓。第一座是国子监生林绍斋墓，下葬时间是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地点在上金贝半山腰。第二座是南京留守卫都指挥使郑洽墓，下葬时间是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地点在上金贝山脚下地名后壑坑地方。第三座是河南郑州府同知陈添墓，时间亦是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地点亦是上金贝山脚下地名后壑坑地方。第四座是郑洽小儿子郑栈墓，下葬时间不详（墓碑无字），地点在上金贝山脚下的郑岐村门犬山地方。第五座是建文朝武将余六府墓，下葬时间不详，地点在洋中镇钟洋村。第六座是建文朝锦衣卫都指挥使杜

华泗墓，下葬时间不详，地点在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后山。第七座是建文朝总兵叶将军（名字不详，即寿宁县斜滩镇山田村荆棘寨寨主）墓，下葬时间不详，地点在寿宁县竹管垅乡竹管垅村水尾山……。

据明史记载，洪武帝朱元璋曾戏称皇太孙朱允炆为“半边月”，因此，“半边月”就成了建文帝朱允炆的绰号。上述这些从亡大臣就如众星拱月般地誓死追随建文帝左右，不离不弃。有诗赞曰：中华自古有忠臣，不及建文一朝多，《千钟录》里芳名在，留与后人细评说。

附件九；我们发现了明永乐二年（1404 年）前后这一特定的时间点里，朝廷往福宁及其周边地区大规模调防驻军的证据。

明永乐二年(1404年)，总兵刘邦彦率三千铁甲军由江苏丹阳入闽，先驻建阳，后屯驻福宁柘洋(今柘荣)；总兵王文彬率五千人马由江西吉安入闽，守闽清路口；千户孙寿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福宁管阳堡；卫指挥使王知诰领军四千四百人屯驻福宁卫；百户王宁领军一百一十人屯驻福宁大京城堡（归福宁卫辖）；千户王新兴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罗源洪洋大目（今罗源洪洋）；卫指挥使王佛生领军四千四百人屯驻福清镇东卫；千户龚富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长乐梅花千户所（归福清镇东卫辖）；千户王胜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政和漈源（今寿宁县清源乡漈头仔）堡；千户谢信生领军一千二百人屯驻兴化（今莆田）万善里锦溪堡；总旗官邹佛保领军五百人屯驻福宁店下堡（今福鼎市店下镇）；卫指挥使张安实领军五千六百人屯驻兴化卫（今莆田市）；卫指挥使刘璋领军五千六百人由江西宜黄调防屯驻古田县新俗里四都宜家洋堡（今屏南县双溪镇宜洋村）……。

以上文字资料在林国平教授著《福建移民史》与福建王氏联谊会编《八闽王氏》诸书中均有记载。

无须置疑，如此大规模地驻军闽东及其周边地区，显然是为了清剿被燕军击败而躲入寺庙及深山密林之中的建文军残部。这也就是闽东百姓口口相传的“永乐抄寺僧”行为。

汇报人：王道亨

宁德民间故事中的建文帝形像

刘慧钦（博士生）

摘要：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成为六百多年来的迷案。关于他的下落，主要有自焚而死和出亡民间两种说法。宁德市有许多关于建文帝出亡宁德的民间故事。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构建了一个饱满的建文帝形像。结合当地的史料物证和考古发现，人们认为建文帝很有可能逃至宁德并在此长居。这些关于建文帝的民间故事既是人们纪念建文帝的方式，也体现了人们对真善美价值观的追求。这样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叙述，无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宁德民间故事、建文帝、形像

（一）导论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因皇太子朱标早逝，年轻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建文。建文帝听从臣下之言削藩，激起燕王朱棣与其的矛盾。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之名举兵反抗。1402年，朱棣夺取皇位，改年号为永乐，但他不是继承朱允纹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废除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对于建文帝的下落，史学上有不同说法，成为六百多年来的一桩谜案。《明史·恭闵帝本纪》曰：“（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穗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王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①]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而死还是由地道出亡，仍有待更多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来解答。

关于建文帝在民间的传说故事很多，也存在于许多地区。民间传说故事往

① 张廷玉：《明史》卷四，《恭闵帝》。中华书局标点版1999年版，第45页。

往源远流长，是老百姓叙述历史的一－种手段。本文主要选取宁德地区的相关民间故事为研究对像，研究建文帝逃至宁德的可能性。本文选取的民间故事来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分卷。宁德地处闽东北，开邑一千多年。这里有美丽的山海风貌，淳朴的乡土民情，其民间文学源远流长。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精神，宁德于 1986 年成立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和编委会。宁德地区所属各县市实地普查采录，严格实行田野作业和忠实原貌的原则，本着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科学要求，历经多年编纂而成此书。书中的每一篇作品， 讲述者来自各行各业的老百姓，采录整理者多是干部和民间文学工作者，作品又经当地部门鉴别筛选推荐来的，这也大大增强了这些民间故事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而关于建文帝的故事传说在宁德流传甚广，流传甚久，当地人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建文帝的形像。

（二）建文帝的形像

1. 初到宁德

在宁德民间故事中，与建文帝有关的故事，大多数以其他名字来描写，但其中有一个故事，则是直接指出建文帝来到宁德洋中村，寻找老师周斌。故事如下：

建文帝与国子先生周斌

明朝洪武帝请宁德洋中人周斌教太子读书，但皇太子却不认真学习。后来，洪武帝驾崩，皇太子当上皇帝。几年后，朝廷混乱，百姓遭殃。此时，皇帝才觉得治理国家大事不能没有知识，他后悔小时候不认真学习，得罪了周先生，于是亲自登门看望周先生。可是，当皇帝到达洋中村时，听说周老先生已去世，悲痛万分，到周老先生墓前祭奠后，让人在村头建塔，塔旁立一个坊，坊上写着“国子先生”四个大字。此坊于文革期间被毁。[①]

① 见宁德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市分卷》,1991 年版，第 13−14 页。根据故事内容，书中所说的皇太子应校正为皇太孙。

明代文人黄仲昭在《八闽通志》这样记述周斌："周斌字质夫。宁德人。洪武中领乡荐，授建宁府学教授。时兵革甫息，斌修废起弊，严立教条，作新士习。

郡县长贰非公事弗造其室，与之语曰皆政教大端，弗及私事。十五年，云南平，撰贺表称旨，有金币之赐。秩满，召至便殿，承顾问，以质直见重。明年拜中都国子监肆业，约度明信，诸生悦服。又明年，召还，升齐王府左长史，辅翼开陈，一以正道。丁内忧，以病卒。"[1]根据史料，周斌是洪武年间的宁德籍官员，并且与皇家有较密切关系。他以质直见重，受到洪武帝的赏识，曾当过宫廷顾问，后来又担任中都国子监的教官。建文帝从小在皇宫中成长，他和周斌应该是熟识的。而且朱元璋曾让皇子、皇孙回安徽凤阳（即中都）读书，周斌有可能在此时成为建文帝的先生。因此，建文帝逃出皇宫后，来福建宁德寻找投靠老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2. 做不成帝

在宁德民间，罗隐是个带传奇色彩的人物，流传着许多关于罗隐的故事。宁德各地区流传的版本略有细节差异，但是总体上十分相似。主要包含罗隐"不成帝""乞丐身皇帝嘴"等故事。故事如下：

罗隐的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宁德安乐里有一户罗姓人家，生下男孩，取名罗隐。罗隐八岁时，放学后经常晚归。父母和先生悄悄跟着，发现宫里菩萨会向他磕头哈腰迎接"天子"进去，给他东西吃，给他演戏看，天黑了还送他回家。罗隐母亲知道儿子的皇帝命后，变得骄横，每天烧火煮饭时，用吹火筒边敲灶边骂叔公叔婶。灶神君被她打得一肚子气。年关二十三，灶神君一五十把罗隐母亲的事告诉玉帝。玉帝大气，立即叫太白金星带领天兵天将下凡，把罗隐全身筋骨换成乞丐骨。罗隐痛得厉害，从床上滚下来，嘴巴刚好扑在尿壶嘴上，天兵天将怕尿壶污秽，就回天宫去了。所以罗隐就变成乞丐身，皇帝嘴，他"圣口"

① 《八闽通志》卷七十二《人物·福宁府·士行》

一开准见灵验。[①]

关于罗隐的故事都没有写明年代，这应该是老百姓出于善意而特地设计。但在关于他的部下郑堂的故事里，却明确写明“郑堂和罗隐都是明朝人。宁德民间传说：罗隐做皇帝，郑堂做军师；罗隐不成帝，郑堂去巡街。”[②]关于罗隐，周乡齐曾做过考证，认为蕉城地方方言“龙”“罗”谐音，“罗隐”应是“龙隐”之谐音。实暗指建文帝隐于宁德（蕉城）。罗隐的故事表达的意思和建文帝有关联性。首先，罗隐本来应该是皇帝，但是却变成了乞丐。建文帝本来是皇帝，但因兵变而逃往民间，日子恐过得并不尽如人意。而且根据许多民间传说，结合他爷爷出身对他的影响，他极有可能在民间当和尚。根据孙绍旭的考证，宁德支提寺的云锦袈裟是重要物证，他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具有皇帝和和尚双重身份的建文帝朱允炆，这也说明了建文帝至少到过宁德的可能性。[③]在世人眼中，和尚和乞丐也差不多，用乞丐来指称和尚，也是符合世人的价值观。这种种迹像表明，罗隐极有可能是建文帝。老百姓既要通过民间故事来叙述历史，又出于对建文帝的保护，而使用了“罗隐”这一化名。

3. 建都计划

宁德民间故事中，有关于朱元璋和罗隐在宁德选址建都的传说。故事如下：

第一则故事：

三沙石头和猪牳栏

相传有一天，臭头洪武帝，派他的军师刘伯温，到福宁府选地方建京城。刘伯温后来选中三沙的陇头，陇头对面是“大目岛”。洪武帝听刘伯温上奏就

---

① 见宁德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市分卷》，1991年版，第330-335页。又见霞浦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县分卷》，1992年版，第324-327页，其中父母写为奶娘，灶公是天天向天帝告状，塞在罗隐嘴里的是奶娘的缠脚布。又见福安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福安县分卷》，1989年版，第392-395页，其中告状的是灶公灶婆，塞在罗隐嘴里的是他母亲的裤头。

② 见宁德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市分卷》，1991年版，第336-340页。

③ 关于支提寺的云锦袈裟及其主人的考证，可参见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史林》2016年第6期，第57-67页。

同意派大批人马去陇头建城。他们准备把由陇头到大目岛的全条海峡填平。神仙知道后就下凡帮忙，他见一块石头像只猪辑，就用手一指，这块石头立刻变成大猪牳，又将那所有石头全部变成猪仔，跟这大猪特向西方走去。当这群石头猪路过三沙周湾村时，一个洗衣妇女看见了，大叫“这明明是石头，可好奇怪呀，它们跟猪一样会走路。”这一叫，天机泄露，便用手一指，那滚动的石头马上倒在山上、路旁不动了。

第二则故事：

虞公亭石头

传说霞浦出了罗隐帝，天上神仙下凡来帮忙他填海造都城。神仙们手一点，许多石头都化成一群又一群猪，神仙们赶着猪走。

土地公知道了这件事，他想这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好，舍不得拿去做都城，就化成一个小姑娘在溪边洗衣服，打算劝说或者拦阻。神仙赶着猪到了古桶，虞公亭。猪跑得太快，神仙不懂猪到了哪里？神仙问小姑娘猪去哪里了？小姑娘答：“我没有见什么猪，只看见一粒一粒大石头向前面滚着滚着。”经土地公这么一说，猪全部都停下不动，变成一块一块石头停在古桶、虞公亭一带。”

第三则故事：

罗隐的故事

还传说，为了罗隐帝，天仙派了大将要将葛洪山上的石头搬去官井洋，将官井洋填平，让罗隐做帝都。葛洪石头化作一群猪仔，刚赶到东冲山边，听说罗隐皇帝头换了，罗隐不成皇帝了，一群猪仔就恢复了原形。两位罗隐的将官从皇城来找罗隐，走到石坝塘，听说罗隐做不成皇帝了，就站在路边成了石人。[①]

查阅史料，并无洪武帝朱元璋到宁德的记载，也没有到此选址建都的记载。这三个故事存在极大相似性，结合建文帝到宁德存在较大可能性，笔者认为故事中的“洪武帝”和“罗隐”，都是暗指建文帝。这些传说，隐藏着一层重要

---

① 见霞浦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 --- 霞浦县分卷》，1992年版，第324–327

信息，即建文帝及其部下有在宁德地区建都的计划和行动，但是最后因为力量不足而失败了。

4. 行踪暴露

宁德民间故事时，有多个和草寇有关。各地流传版本略有差异，但总体上大同小异。其中，宁德卷提到的故事如下：

门下草寇

漳湾门下村出了一个草寇头领。有一天他梦见一个白须白发的老仙翁对他说：我送你三件宝物，助你为民除害。”老仙翁说完把袖子一拂，马上现出一把毛笔，一支竹箭和一个簸畚。并且告诉他这三件宝的用法。他都暗暗记在心里。

他捏了好多好多的泥兵泥将、泥枪和泥马，装进家里所有的米陈里保存起来。有一天，他又捏出一头大公鸡放在鸡笼里。第二天，待泥鸡第一声啼叫时，他一口气跑到后门山顶上、对着京城街的皇帝重重地射出一箭。可惜时间太早了，这时候皇帝才起床，还未上朝，因此只是射中了龙椅靠背。箭上现出“福建宁德门下”几个字。皇帝听说有人造反那还了得，当下就派大队人马去门下提拿造反草寇。

再说门下这边。有一天，伊嫂正在熬盐卤，忽然听到米陈里闹嘈嘈的，她吓了一跳，赶紧从锅里舀了滚烫的盐卤灌进每只米陈里。经她这么一灌，里面的吵闹声越来越大了。因为泥人泥马被热卤一烫，不是掉了脑袋，就是断了手脚不是烂了皮肉，就是瞎了眼睛。一个个都成了“十不全”。

朝廷派来的官兵经过好几个月的行军，终手到达门下村。草寇头领一听到风声，就马上把所有的米陈盖都掀开谁知放出来的兵将、马匹都是没脚没手的“十不全”，打起仗来自然没用，半天工夫就被官兵打败了。他看势况坏了，赶紧拿起簸畚作盾牌，但被伊嫂大喊，泄露天机，簸畚变回原形，结果草寇头领寡不敌众，被官兵杀害了！①

① 见宁德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 -- 宁德市分卷》，1991 年版，第 241-243 页。又见福鼎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 - 福鼎分卷》，1989 年版，第 133-136 页，在《资国寺》这一篇中，故事结局有所不同，全村男人削发为僧，女人削发为尼，避免被官兵杀害。

这个故事是否和建文帝有关呢？京城里的皇帝听说门下有人“造反”，是不是所指永乐帝听说建文帝在宁德门下并欲夺回皇位，因此而派出到宁德呢？根据宁德当地研究人员在门下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说，门下村曾有过规模巨大的建筑物，大房子之间有长廊相连，连续走5–6里路都不用撑雨伞。王道亨分析这是退至此处的建文势力初期的办公机构与场所。[①]

5. 与敌交战

宁德民间故事里，没有关于罗隐与敌军交战的内容，也没有建文帝与永乐帝交战的内容，但却有几则关于朱元璋和陈友谅在宁德交战的故事。

犬蜕门

传说洪武帝朱元璋是“天犬星”下凡。陈友谅是“天虎星”，他听说“天犬”到凡间做皇帝，自己是“天虎”，比“天犬”厉害，就偷偷跑到下界与朱元璋争天下来了。有一次，朱元璋被陈友谅打得大败，兵退到了三都官井洋，只见前面有一排青山挡路，船不能前进，后头追兵又近，真是上天无路，出海无门。军师刘伯温知道朱元璋是“天犬星”，就对他说：“主公，请你跪在船头，学犬吠三声，定能化险为夷”。朱元璋为求脱身，也顾不得许多，就跪在船头，面对青山学了三声犬吠。一时间，天边乌云黑暗，雷声隆隆，接着山崩地裂一声巨响，青山当中裂开一道缝，现出水路，朱元璋的兵船就从这个裂口开过去逃走了。等陈友谅追到时，青山已经合拢，只剩下一个犬蜕一样的洞口了。从此，人们就把这个山口叫“犬蜕门”。[②]

查阅史料，并没有朱元璋和陈友谅到过闽东的记载，更没有双方在此交战的记载。那么，这些宁德故事中的朱元璋和陈友谅究竟暗指何人？王道亨认为，闽东百姓之所以把“建文帝”的事情统统算到“洪武帝”头上，根本原因是永乐皇帝朱棣上台后，把建文帝的帝号取消了，把建文帝的纪年并到他爷爷朱元

① 见王道亨：《与建文史事相关的闽东民间传说故事研究》，2020年4月。
② 见宁德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市分卷》，1991年版，第138页。

璋那里去了，因而建文一年至四年就成了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建文时代”就成了“后洪武时代”，“建文帝”也就变成了“洪武帝”。[①]

另外，宁德畲族故事《臭头皇帝朱元璋》里，也对陈友谅和永乐帝的关系做出解释。故事结尾如下：

朱元璋乘胜驱兵北上，灭了元朝，当上明朝第一个皇帝。那陈友谅死后，变成一头怨鸟，天天飞来落在朱元璋宫殿前叫：“还我江山！给我江山！”朱元璋知道这只怨鸟就是陈友谅变的，就说：“除非你给我做儿子，才能给你江山。”从此，这只怨鸟不见了。传说是去投娘娘的胎，给朱元璋做了儿子，就是后来的永乐帝呢。

这个故事暗含“永乐帝”就是故事中的“陈友谅”。闽东百姓把“建文帝”写为“洪武帝”。根据这些故事分析，存在以下可能性：永乐帝曾找到建文帝在宁德的下落，并派兵前来，双方曾在宁德交战过，后建文帝得以逃脱。据《明史地理志六·福建广东广西》记载，洪武时，福宁与宁德两县仅设 4 个东洋麻岭巡检司，至永乐初，巡检司猛增至 16 处。[②]可见，永乐年间，闽东军事力量大力强化。永乐帝为什么要在闽东布置巨大军力？也许是因为永乐帝发现建文帝在宁德的行踪。这是个合理的解释。

6. 为民办事

前文讲到罗隐“乞丐身皇帝嘴”，他出口成谶，十分灵验，他为当地人民做过不少好事。故事如下：

第一则故事：

石蛋堤的传说

很久以前，三沙镇陇头村村前的堤常常被海潮冲垮，人们常为此发愁。有一年，村人又在修堤坝决口。一天晌午，妇女们给干活男人送来了饭菜。此时，饥肠辘辘的“罗隐帝”路过这里，就乞求给他点吃的，并答应他吃饱后，堤岸

① 见王道亨：《与建文史事相关的闽东民间传说故事研究》，2020 年 4 月。
② 《明史》卷 45《地理志六·福建广东广西》，第 1132 页。

由他来修。心轻的妇女看见他的可怜相，过意不去，就让他吃些。罗隐帝吃完饭后，让修堤的男人们上来。他口念咒语，左手抓一把蚕豆，右手抓一把豌豆，向决口撒去。豆都变成小石卵，小石卵逐渐变成大石蛋，把决口基座修得严严实实。人们说："罗隐帝是乞丐身，皇帝嘴。"此话不假。[①]

第二则故事：

罗隐的故事

有一天，罗隐到石湖，肚子大饿。石湖人正在海边做塘，看见罗隐叫："罗隐啊！你快来帮一下。"

罗隐应："空腹肠，帮！"做塘人一听怕起来，空腹塘还了得，有个老佬讲："我们这还有一点冷饭你拿去吃。"

罗隐吃好冷饭高兴起来，就来帮他们做堂。他叫人拿一盘黄豆一盘糠，给他做"法术"。罗隐把黄豆、糠两盘合起来，嘴里念："石塘湖石塘湖，咸水进不去，淡水会落塘。"念好，将盘中黄豆和糠撒去。突然间，一阵东风吹落，把撒下的糠吹到外浒就变成沙。（故此，外浒的海滩都是沙。）黄豆变成石卵。（故此，石湖海滩都是石卵。）[②]

从这些民间故事的记载看，建文帝有可能在宁德当地居住后，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也正可能是因为他对老百姓的帮助，老百姓对他充满感激，通过民间故事的形式传颂他的事迹，希望能为后人所记住，也希望后人早日拨开历史迷雾。

（三）结论

这些关于建文帝的民间故事，在宁德各地流传版本中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异性。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去质疑故事的可信度呢？笔者认为，这些细微的差异

① 见霞浦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县分卷》中，1992 年版，第 108–109 页。
② 见霞浦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霞浦县分卷》中，1992 年版， 第 324–327 页。

性并不影响可信度。在古代，人们没有现在这么多发达的传播技术，主要靠口头和文本传播。但因为这些故事可能涉及建文帝，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不适合用文本来传播，而口头传播则成为民间重要的传播方式。然而，口头传播时，传播者难免会存在一些细节表述不够精确到位的情况，而听者与传播者之间也会存在信息差，此后当听者以新传播者身份去传播时，难免又有误差。这些关于建文帝的民间故事，尽管它们在宁德不同地区存在一些差异性，但是总体上大同小异，可见流传之广，受欢迎之深，因此可信度还是高的。

虽然建文帝出亡后究竟是不是来宁德，还得寄希望于有更多的史料和考古资料来进一步证明，但历代宁德人民对建文帝的情感却是比较清晰明了的。从宁德这些流传甚久的民间故事看，当地人民对建文帝有着多元的情感。首先是同情。建文帝是洪武帝的孙子，因其父亲早逝，而由他继承爷爷的皇位成为皇帝，但却因为永乐帝的兵变夺权，使他生死未知。宁德民间流传的罗隐故事中，都提到他不成帝，变成乞丐身皇帝嘴，流落民间，但未被杀。这表明了人们对建文帝的同情，寄托了人们希望建文帝出逃成功的情感。其次是感激。宁德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有多则关于罗隐出口成谶、为民修塘筑堤的故事。这些故事表达了老百姓对皇帝仁义爱民、为民办事的期待和感激之情。最后是忠诚。民间故事中提到的“草寇”“石猪”“郑堂”等，都暗指建文帝的部下。尽管建文帝落难，但他们忠于君主，不离不弃，始终追随他，希望帮助他建立都城、起兵杀敌、再创辉煌。而对于永乐帝，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形像则是“叛变者”“夺权者”。可见，忠君爱国是建文帝部下和老百姓的共同情感，是符合历史语境的。

近年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2017 年 10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借鉴观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他关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密相连的深邃思考。而关于建文帝的踪迹传说，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都符合中国人“忠君爱国”和“仁义爱民”的价值观，也彰显中国人追寻真善美的价值观。

宁德市根据田野调查和考古发现，深入研究建文帝踪迹，既能拓展明史研究，也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继承和创新。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建文帝“活化”宁德历史文化现场

张梅[①]

摘要：作为福建佛教圣地的支提寺，跟“明朝第一悬案”建文帝的历史记录有着天然的耦合，随着上金贝古墓的出土全景呈现到了世人的面前。现以建文帝曾进入宁德西乡为纲要，能有效解释明王朝对支提寺200多年来的持续性关注和恩赐；宁德市聚集性人口的增减和特定村落宗祠的暗示性格局和碑文；以及周边各村落的特殊布局和现存遗迹的建筑格局和信仰习俗；并且能与明永乐初年的流亡大臣名号和轨迹形成呼应。

关键词：建文帝、活化、文化现场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活”可溯源到化学反应中的术语“活化分子”，指将无数次无效碰撞转化成有效碰撞，从而形成化学反应的分子。瑞典化学家阿仑尼乌斯，1889年基于大量实验结果而撰写的著名“阿仑尼乌斯经验公式”中，导入了“活化能’（Ea）的概念，认为在化学反应中，普通分子，即具有平均能量的分子，必须吸收足够能量先变成活化分子，因此其将在此变化过程中所要吸收的最小能量称为活化能。无独有偶，1998年受邀作为第二届“汤用彤学术讲座”[②]主

① 张梅，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师，闽南文化研究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② 汤用彤学术讲座由中国文化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于1997年设立，每年5月邀请国外学者作为该讲座的主讲教授。

讲教授的施舟人[1]提出“文化基因库”的概念，认为；“新的文化形式出现，总是不同文化传统使用的结果，总是不同文明互动的产物”[2]。互动就如同化学反应，是文化“活化”并推陈出新的必要条件。但其“活化”的原材料分子确是传统文化基因中的文物，遗产，民俗和文字等。

2007 年，以东南名寺支提寺为核心的支提山国家森林公园，由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将宁德市西部从北向南绵延到海边的金山、支提山、平匋山和白马山全部纳入其中，总面积达 2299. 93 平方公里，拉开了宁德市文化生态形像整体建构的序幕，而这刚好是明朝“宁德西乡”的历史现场。

2008 年初，村民在上金贝村修建登山道时发现的明代初年大型古墓葬，一下叩响了“明史第一悬案”的大门，在媒体的报道下引发各方关注。宁德文史界快速响应，在政协主席郑民生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宁德市方志委副主任王道亨为组长的半官方研究团队“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随着研究小组十多年来“三进北京、五入南京、七上浙江、八下福州、厦门、泉州，九上雪峰寺，十度到支提……”的脚步，大量史料和实物的浮现和考证，让马渭源先生的《破解 600 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是否可以石锤落地呢？

很显然，要破解扣人心弦的明朝第一谜案，厘清历史现场的各种文物、遗迹、习俗和文字遗存是确定谜案的基因源头和还原历史现场的基础；“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整合“建文帝”的各种相关追寻力量，是让宁德并辐射浙江、云南、南京等区域的各种基因库中的文化分子产生化学反应的“活化能”；而依据追寻结果并逐步建构起来的历史脉络，是新时代文化自信框架体系下，地方挖掘、梳理和建构自己独特文化并形成个性文化的“活化过程”。因此，对宁德市“明朝第一悬案”破解的分子、活化能和活化过程的研究和梳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意义。

---

① 施舟人（1934–）：生于瑞典，荷兰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道教正一派道士。

② [法]施舟人：《中国文化基因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 页。

（一）宁德历史现场的建文帝文化分子

据“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十多年的追踪成果，现整理了宁德现存与建文帝关联的文化分子原材料，几乎覆盖了除却屏南县的宁德市一区、两市、六县全境。可以分为现存寺庙、宗祠等建筑；遗迹和碑刻等物质文化材料和传说故事，民间习俗等非物质文化材料（表 1）。

表 1：宁德市各地文化因子分布（不完全统计）

区划	乡村	建筑遗存	物质文化遗存	非物质文化遗存
蕉城区金涵乡	上金贝村	明代上金贝古墓葬	“潜鳞沼·住山沧海”石碑	
		明代“国子监生林绍熙”墓	明代师公庙“林马二公大王庙”石碑	
			乌石马摩崖石刻	
			金贝寺“蒙泉·住山沧海作”摩崖石刻	
			“金贝禅寺”石匾	
			“金贝禅寺”石匾	
	淡坪村		明代古村名；安郑坪	
	廉坑村	郑三合（即郑洽）故居后花园遗址		土撬名“三合溜”
		古井—安郑井		
		古海堤—安郑堤		
蕉城区漳湾镇	郑岐村	郑洽故居、明代古井（官帽井，名郑宅井）	“离明继照”匾额	浙江浦江郑义门的家规家训
			“视履考祥”匾额	
			“豹蔚南山”匾额	“门下草寇”传说
			“中义第”匾额	
			普庵禅师坐像	

（续表）

区划	乡村	建筑遗存	物质文化遗存	非物质文化遗存
蕉城区漳湾镇			“寒泉井”内“龙生九子”时刻	
蕉城区八都镇	吴山村	明代城堡遗址		御医二明（吴山村始祖）隐居地
		城隍庙		
	云淡门	郡寨堡遗址四处		明代村名—安郑门、管山顶传说
		灵山寺军粮库遗址		
蕉城区霍童镇		仙岩寺的军粮库遗址	仙岩寺的“万岁塔”碑刻	
			支提寺云锦袈裟	
			支提寺明代御碗	
			支提寺明代木刻	
			支提寺的千尊铁佛	
			“华藏寺”匾额	
蕉城区洋中镇	钟洋村	“余六府”墓	帝师周斌亲书对联	帝师周斌
		余氏宗祠	宗祠署名；“万象新”	
			“明门诸佛”之谜	
	田地村		观音堂须弥座石刻	人物关系
	留田村			“梁厝里书院”
				家谱中“皇姑”
				黄道安身世之谜
	莒溪村			冯某隐居地
	姚溪尾			姚广孝的祖籍地

（续表）

区划	乡村	建筑遗存	物质文化遗存	非物质文化遗存
蕉城区石后乡	芹坂村	寒桥头国母亭与太后墓		
		石牌岗“罗张杨”三师公庙		
	小登广	“京堂庵”		登基广场的传说
	石厝村	石氏宗祠	“功参大造”匾额	石宗善身世之谜
		寒桥、神庙、古官道		“太”字格局
	金蛇头			何群隐居地
	大岭村			黄隐隐居地
霞浦县长春镇		大京城堡	皇帝井	四批移民
			《筹海图编》记录海战事实	两次扩建
霞浦县城				卓敬小获子隐居地
柘荣县	县城			《刘氏宗谱》
黄柏乡		天心寺后山周觉成墓葬		
褚坪乡	仙岭村			韩将军的隐居地
福鼎市管阳镇	金钗溪	寨堡式村落建筑典型	“通济桥”三字匾额及建筑名称	朱葵二始祖
古田县大桥镇	瑞岩村	日庙、月庵		杜华泗的隐居地
		旗山寨		林贵妃的隐居地
杉洋镇	璜溪村			黄亚芳（字矩团）的隐居地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这些田野文化材料和配合各种历史文字材料的发掘可

以形成完整的故事线。如果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从名字来看，以洋中镇“田地”和“留田”村为中心的话，其相关建筑和遗址分布呈现聚集性且地理位置战略性分布特征。如果要用人物线索串联起重要的建筑布点的话，提炼出核心支撑点乃为重点。

（二）故事骨架和重要文化支撑点

从现有材料来看，从雪峰寺入宁德如果成立的话，支提寺是切合人物背景并拥有丰富的明朝皇宫实物，昭示其与明朝皇宫强关系的地点。

1. 支提寺文物与明朝皇宫

971 年，吴越王钱俶敕命杭州灵隐寺的了悟大师，在支提山上建华严寺，世称支提寺。支提是“caiya”的梵文译语，也曾译为“枝坚固”“支帝”“制底”“浮屠”等。有“聚集”“灵庙”“佛骨塔”“聚佛德处”等意涵，乃天冠菩萨道场。宋元明经四次敕建，五次赐额，代有兴废。现有格局源自明万历元年（1573），大迁禅师奉旨重建，师徒历三十年苦心经营之格局。后虽有起伏，但法缘未断，1983 年被授予全国重点佛教寺院。[①]

据《支提山华严寺志》，现存文物除了实体建筑殿阁外，有经藏、造像、碑刻、紫衣等共 22 件，其价值最为珍贵和记述最为丰满的以明代御赐[②]宝物为主，反映了支提寺与明朝皇宫的万千渊源。包括：

1. 大藏经；万历十八年（1590）李太后赐《永乐北藏》636 函，《续大藏经》41 函，目录 1 函，共 678 函，计 6771 卷。康熙五年（1666）修补装裱，按“千字文”编排，分贮八大橱。

2. 天冠菩萨造像

永乐徐皇后，大明开国元勋徐达长女，命工精铁铸造千尊天冠菩萨造像。

① 袁冰凌：《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年。
② 根据《支提山华严寺志》《第八章文物与古迹》（第 247-）中内容整理。

在永乐五年（1407）七月过世后的当年九月，由第二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运来本寺建，并命太监周觉成督造宝阁供奉。现存947尊。

3. 千叶宝莲毗卢佛

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太后赐毗卢佛、世尊、观音及地藏佛共四尊，命钦差太监张文赍送达。今仅存毗卢佛趺坐像，莲座千叶，莲瓣乃小金佛，现遗失两个。工艺精湛，围长370厘米，高250厘米，铜铸金参，重达千斤。

4. 紫衣

明万历元年（1573），大迁禅师奉旨重修华严寺时万历帝所赐。衣缝内有墨书“岁次乙酉年金灯室置”，据考为民国寿明法师手笔。

5. 敕谕碑

楠木刻碑长224厘米，高95厘米。上方为双龙戏珠，中心镶嵌版刻“敕谕”，下方三道敕谕书从右往左分别是：万历十八年（1590）三月二十七日、万历二十七年（1599）和万历十二年（1584）的神宗敕谕全文。

从刊刻顺序和万历十八年御赐清单来看，该木刻碑为基于万历十八年的御赐敕谕碑的重刻碑。

6. 敕赐大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山图碑

现存红豆杉碑由两板组成，高226厘米，宽75厘米，上图下文。上面山图 为万历年寺院全貌；背靠双髻脉山，三折而下中轴线上为祖堂、大雄宝殿、天王殿、山门。左厢伽蓝堂，右厢祖师堂，东西两廊接钟鼓楼，另有方丈禅堂、香积厨房和斋堂等。

下面《敕赐大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山图记》全文约600多字，占全图总长约五分之一。该图碑由于文革期间流落民间做猪栏板，右侧文字损毁严重，约三分之一的文字已不能辨识。但总体．上该记当时描述了“华藏万寿寺山图”的盛景，作为天冠菩萨道场和遣郑和运送天冠菩萨造像到寺等史实。

7. 明敕中兴赐紫迁国师塔碑

碑立于寺后山大迁塔前方，清康熙三十年（1691）十二月吉旦立。

除了上述明代御赐文物外，支提寺现存宋、明、清其他文物还有 15 种，其中宋朝 2 种，明朝 6 种，清朝 7 种（表 2）。

表 2：支提寺现存古代文物列表（部分）

朝代	名称	年号	地点
宋	铁铸释迦像、铜镜两面		
明	樵云“千圣同居士”摩崖石刻	万历	辟支岩洞上方
	铁钟	万历三十八年	
	天冠铜像、观音鎏金铜像、献桃童子铜像、铜香炉二只		
清	石水槽一只	康熙二十二年	
	“精进报恩”匾	康熙三十一年	
	敕赐支提山华藏万寿寺图拓片	康熙三十三年	
	大铁钟	康熙五十六年	
	铁风铃一对	光绪五年	大悟室
	泉州府晋江县大护法施韬建藏殿碑		
	《支提山华藏万寿寺法派宗谱》	咸丰	

从地理方位来看，东南作为佛教布点对于国家整体布局一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在一统天下的总体格局中，东南沿海通道的国家边界布控是皇朝关注的首要因素。但从现存文物比较来看，明王朝对其的关注度明显要强于其他朝代。而在时间分布上又刚好出现两个周期，第一个是永乐年间，第二个是万历年间，这刚好对应建文帝出亡后以及建文帝万历年间被逐步平反的时期。

2. 故事串联线索

除此之外，随着今天技术和调查资源和方法的多样化，还陆续出现了多种支撑材料，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是支提寺一直认为是万历年间属于大迁法师的“紫衣”，经专家签订

乃“云锦袈裟”，乃明初之物，甚至有人认为乃朱元璋所造，建文帝出亡带走的那件。[①] 同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从历史文献来看，支提寺应该存有吴越王时期，永乐时期和万历时期的御赐“紫衣”，为何独独保留了一件“云锦袈裟”？这本身也具有故事性。

其次是余氏宗祠、郑氏宗祠、帝字形古画、名门诸佛以及各师公庙和寺庙所存对联和遗物中的高度关联性和暗示性，都极大的表明曾经宁德周边各个村落和寺庙之间的关联性和一体性。这也高度暗示了该区域曾经有某一核心人物对于本区域进行过人为整合。

再次是四大历史史实的支撑：一是宁德军事力量在永乐时期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其次永乐初期前后宁德出现的大面积移民；再次是永乐时期宁德区域人口的锐减；最后是宁德区域永乐初定居的家族高度重合于建文朝的出亡大臣。

最后是宁德区域特殊的祭祀民俗和单姓自然村落的广泛布局，不似自然形成的村落形态，暗示了曾经的战略布局。当然研究小组更是认为：余氏宗祠实际是建文帝入宁德后的“官厅”“衙门”，是当时的行政中心，并以此为据点，四面布局了 4 个大型寨堡，36 个小型寨堡拱卫。4 个大型寨堡入口均为一高山湖泊，现保留高山湖泊和码头遗址为：

西面：古田县杉洋镇——旗山寨， 建文朝锦衣卫指挥使杜华泗把守；

北面：蕉城——留田寨，右军都督余七府（廖年）把守；

东面：蕉城——弥陀寨，前军都督詹斗二（名字不详）把守；

南面：罗源——石洋寨，左军都督何群把守；

中间：钟洋村——岩前寨：中军都督胡卓汉把守。[②]

这样的结果很显然是基于众多田野遗址、地理空间和流亡大臣隐居地并配合当地传说等线索而进行的故事性编排。为历史的还原提供了一种可能。

---

① 王小妹：《支提寺珍藏的五爪金龙袈裟确为明初御用品》，2018 年 8 月。

② 王道亨：《闽东及其周边区域与建文史事相关联的人与事物》，宁德：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2018 年 5 月。

（三）结论：宁德文化因建文帝而“活”

常规印象中宁德有良好的生态，如国家森林公园的动植物生态景观非常丰富[①]（表3）。也有良好的海港，但是由于没有开发，其港口经济并未盘活。

表3 支提山森林公园自然景观资源不完全统计表

景观类别	平甸山	支提山	白马山	金山	合计
植物群落（CA）	01 杪椤群落	03 南方红豆杉、半枫荷针阔混交林；04 三尖杉群落		05 半枫荷群落	7 大植群
	02 金毛狗蕨群落	06 映山红群落			
	07 突脉青冈				
野生动物（CB）	羽类 25 种；虫类 25 种；兽类 18 种；鱼类 15 种；畜类 8 种；蚧类 6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19 种。				97 类
奇石景观（AC）		05；一夫当关		01 十八学士 02 莲花石 03 猴子抬轿 04 石笋凌霄	5 种
天钟爱景观（DA）	01 日出；02 云雾				2 种
河系景观（BA）	01 溪流；02 百丈瀑；03 漈里瀑；04 双仙瀑				4 种

长期以来，其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有长足的发展，也展示了良好的文化单体，但是单体文化存在不突出、同质性与竞争优势不明显的缺陷。因此建

① 林生智：《支提山国家森林公园资源状况及开发前景分析》，《林业勘察设计》，2017 年第 3 期，第 17–21 页。

文帝疑似墓的出土，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将宁德市区及各村落遗迹、遗址、遗物全部照亮。将流传在宁德民间的大量传说故事的场景再现，并将相关村落的始祖放到同一历史背景下进行重新组合，将各个宗祠的脉络进行重新梳理，可谓对宁德文化建设起到了灵魂纲要的作用。

另外，由于建文帝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其文化资产的内涵自带国家力量，不仅有效连通了宁德市各类地理、文物、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以建文帝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从亡大臣为线索，将宁德文化与浙江、云南、南京等关联地有效连接起来，不仅凸显了宁德文化的独占性，更为宁德文化的开放性提供了基础。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从建文帝部属及永乐帝对闽东地区的监控看建文帝出亡闽东的可能性

刘桂生

摘要：黄子澄作为与建文帝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南京城破后，推测其计划往闽浙沿海方向逃亡，佐证了建文帝出亡东南说。郑洽、洁庵禅师等与建文帝出亡有着密切关联的人或定居于宁德，或长期在宁德附近活动，佐证了建文帝流亡宁德说。永乐帝在权力稳固之后，对建文帝流亡君臣的策略应是以加强监控、威慑为主，永乐帝对闽东地区采取的加强军事控制、派遣中官周觉成常驻宁德、遣郑和与胡濙巡视福建、周新巡按福建等，都表明其在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监控与军事控制。

关键词：建文帝；部属；永乐帝；监控

（一）从黄子澄的逃亡路线推测建文帝的逃亡方向

应重视对黄子澄逃亡路线的研究。黄子澄、齐泰、方孝孺是建文朝权力中枢的三大核心人物“金川门事变”发生时，方孝孺在南京城内，迅速被抓；齐泰在广德被捕；黄子澄则先是前往苏州联络姚善，后又到嘉兴找杨任，在嘉兴被捕，如果不是有人告密而被抓捕，似乎还有进一步逃亡的打算。以往对建文帝出逃的研究，除研究建文帝本人外，多集中在建文帝的从亡大臣上，忽略了对逃亡过程中被捕大臣的分析。黄子澄作为帝师、建文朝的权力核心之一，和建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姑且不论水平的高低，建文帝在许多重要决策上都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而且黄子澄在外逃亡的距离是建文朝三位核心大臣中最长的；同时，相比于建文帝从亡大臣的一些史料，黄子澄逃亡路线相关史料的可信度也更高。因此，对黄子澄逃亡路线进行研究，有利于为建文帝的逃亡路线做更好的推断。

姚善与黄子澄的分歧与默契。南京城破之时，黄子澄并不在南京，逃亡至姚善处，两人有过一次对话，“时子澄匿善所，约共航海起兵。善谢曰：‘公朝臣，当行收兵图兴复。善守土，与城存亡耳。’子澄去”[①]。姚善不同意的是黄子澄要自己放弃经营多年的苏州而去“航海起兵”而并未不认同“航海起兵”“收兵图收复”，相反，姚善也认为黄子澄应当“收兵图兴复”。但是眼下，对姚善而言，守住苏州更重要。苏州是江南重镇，同时也是一座坚城，在元末的战争中，张士诚据苏州固守，朱元璋集中主力围城十月方破，足见苏州城防之坚固；加上建文帝让姚善“兼督苏、松、常、镇、嘉兴五府兵勤王”[②]，此时苏州姚善手上应当是聚集了一定兵力的。宋元之际，远在福州的南宋小朝廷召李庭芝率兵勤王，结果李庭芝刚率兵马出城，坚城扬州即被叛徒出卖，兵士逃散，南宋没能得到李庭芝的援兵，却失去了江北的坚城；明清之交，李自成轻易放弃经营成熟的襄阳等府，复成流寇。此时，姚善如果放弃了苏州府而随黄子澄去募兵，无异于舍本逐末。苏州别后，姚善与黄子澄二人应形成了一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 1539 页。
② 国张廷玉等：《明史》卷 – 百四十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 1539 页。

定的默契，由姚善负责守住苏州等地区，而黄子澄则负责“航海起兵”。

黄子澄的“海上起兵”并非到海外借兵。由于黄子澄在削藩过程中形成的昏聩形像，加上《明史黄子澄传》中的“欲与善航海乞兵，善不可。”[①]四使一些学者认为，黄子澄是想到海外借兵，如“黄子澄只好又折回苏州，到姚善那儿去，秘密地住下了，并与姚善商议，一起出海向人借兵”[②]。但是，当时的朝鲜、日本等国自身国力尚且不足；其次，当时的远洋输送能力较差，远海航行的难度较大，以这些国家的国力，要大规模地运输兵力和战争物资，是很不现实的；最后，这些国家并没有援助建文帝的内在动力，如朝鲜；“由于靖难之役建文帝方面屡屡失败，使得建文帝政权在朝鲜王朝的威望逐渐降低，而在建文帝执政后期，朝鲜王朝干脆放弃了对建文帝至诚的态度，拒绝支援建文帝政权战马用于对燕王作战饷”[③]。因此，乞兵海外的可行性极低。黄子澄尽管在一些重要决策上犯了错，但也不至于昏聩到想去海外借兵。姚善的“不可”指的是姚善本人不可弃苏州而“航海起兵”，对于黄子澄的“航海起兵”，姚善是持支持态度的。姚善行事稳重，为政苏州；吴中大治”[④]，曾在南京城破之前劝建文帝召回黄子澄，“子澄才足悍难，不宜弃闲远以快敌人”[⑤]，如果黄子澄有这等不切实际的想法，姚善应当会及时劝止。然而姚善并没有劝止，反而认同黄子澄的做法；当行收兵图兴复”，说明黄子澄的“航海起兵”并非前往不切实际的海外诸国，而且黄子澄的“收兵”方向也是姚善所认可的。黄子澄的“航海起兵”方向应是钱塘江以南的闽浙沿海地区。在当时，尽管有陆路可行，但对当时南京、苏州地区的人来说，要前往这些地区，走陆路迂远难行，走海路则方便得多。尤其是福建地区，陆路并不通畅，但是海上交通则颇为便利，甚至有所谓“闽在海中”的说法。黄子澄离开苏州后，往东南方向行，

---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 1528 页。
② 马渭源：《大明帝国.建文帝卷下》，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48 页。
③ 崔坚：《试论建文帝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延边：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百四十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 1538 页。
⑤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 1528 页。

到达嘉兴后找杨任，在嘉兴被捕。此时，黄子澄明显是往东南沿海方向行动，如能顺利出海，其下一步目标应该是航海前往福建、浙江的沿海地区征集兵马。

（二）建文帝在闽东地区的部属与支持力量

自建文帝失国以来，关于建文帝流亡地点众说纷纭。近年来，建文帝流亡宁德说不断引起关注，闽东地区不断发掘出来资料显示，建文帝流亡部属曾在这一地区活动，也在印证着这一看法。

建文帝的逃亡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南京陷落之初，尚有恢复之机的时期。

这一段时间建文帝虽然失去了都城南京，但朱棣尚未控制全国，淮安、济南、凤阳、苏州、辽东等地都还有忠于建文帝的部属在坚守。因此，这一时期的主题是复辟！此时，建文帝流亡君臣们如果想复辟成功，其逃亡方向应当和黄子澄的逃亡路线相似。黄子澄的逃亡路线是先前往苏州，后往嘉兴，而建文帝的逃亡路线比较公认的是出南京后先到吴江，吴江位于苏州城南，恰恰处于苏州和嘉兴之间的位置！到达吴江后，其下一步的去向则众说纷纭。本人认为，参考黄子澄“航海起兵”的计划路线，建文帝下一步的逃亡路线应当是前往钱塘江以南的闽浙沿海地区！

南宋末年，元兵南下占领首都临安后，南宋残余势力逃到福州才得以获得喘息之机；南明时期，南京失守后，各地藩王纷纷宣布监国，但大多昙花一现，只有身在福州的唐王朱聿键才得以顺利监国称帝，并获得各省的承认。“金川门之变”后，建文帝君臣所面临的局面和南宋、南明时期面临的局面类似，此时如果能顺利逃到福州等地，则可以通过海路与两淮、山东乃至辽东地区保持联系；在面对北军的进攻时，不仅有山川之险，更有浙江、江西等地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同时，朱棣所率领的军队多骑兵，擅长平原作战，水上作战非其所长，福建、浙江一带的军队则擅长海战。

建文帝在福建地区的统治基础十分牢固。“建文新政时期或以前的朝廷中

枢中许多高官都与福建有着一定的关联。”[①] 文臣集团是建文朝的核心支持力量“靖难军”进入南京后，除少数文臣向朱棣投诚外，其余大部或誓死抵抗，或弃官远遁。“如果我们将朱棣前后两次开列的‘奸党’名录，人数合起来算的话，总计被指认为‘奸党’的人数为 58 人。在这 58 人当中文臣学士占了 95% 以上，难怪有人说靖难之役’是文人学士集团与军人武夫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较量与斗争。”[②] 而福建地区自宋代自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科举日益发达，文臣数量在各省之中位居前列。另外，《明神宗实录》卷 159 记载“万历十三年三月壬辰，革除年坐忠臣方孝孺等谪戍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③] 由此可见，福建地区的文臣对建文帝多持支持的态度，建文帝如果前往福建一带避难，可以得到当地士人的同情与广泛支持。

因此，在这一阶段，为了更好地进行反攻、与朱棣势力相抗衡，建文帝的逃亡方向应当与黄子澄的计划相类似，即前往福州等闽浙沿海地区。

第二段是永乐稳固权力之后，恢复无望的隐居时期。朱棣进入南京后，肃清建文帝的文官集团，建立起忠于自己的文官集团，对外招降建文帝残余军队，击灭铁铉等抵抗势力，残酷迫害、株连建文帝的部属，调换各省的军事及政治长官，将军事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建文帝此时已复国无望。因此，在这一阶段，建文帝及其流亡大臣的主题是隐居避世，普遍认为，建文帝在这一时期出家做了和尚。

近年来，在宁德等地发掘的资料表明，郑洽等建文帝部属曾逃亡到福州福宁地区、并在该地定居；同时，长期在闽东地区活动的洁庵禅师也与建文帝有着密切的联系。恰好与建文帝逃亡两段时期的主题相对应！

---

① 马渭源：《大明帝国系列 6. 破解大明第一谜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05 页。

② 马渭源：《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57 页。

③ 转引自马渭源：《大明帝国系列 6. 破解大明第一谜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10 页。

郑岐村郑氏归宗与郑洽流亡宁德。郑洽为追随建文帝流亡的大臣之一，同时也是浦江郑义门家族中人。朱棣攻下南京后罗列“奸党”名单，对忠于建文帝的臣子及其家族实行的残暴行为，无疑让在外流亡的建文帝君臣加强了警惕。在保护家人这一块，有的流亡大臣选择举家迁徙，如在谈迁的《国榷》中，从亡大臣之一的廖平便将家族迁徙到了汉中，鉴于风声日紧，廖氏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杀，举族迁徙汉中；而廖平自己则隐匿到会稽一带，充当卖柴翁”[①]。而浦江郑家是个大家族，人口众多，且距离南京的距离较近，处于永乐朝廷监视之下，难以举家迁徙，为了家族的安全，郑洽在当时必须隐姓埋名，极力掩饰自己的行踪。郑洽的行踪一度成谜。宁德郑岐村郑氏、浦江郑义门及蒙自郑营村等通过比对族谱、生辰八字，文化特征等，最终确定宁德郑岐村的始迁祖郑岐与浦江郑义门的郑洽为同一人。[②]“经过福建宁德郑岐村四上浙江浦江，郑义门文史研究会两下福建宁德查考比对，福建省宁德市郑岐村郑岐被确认为浙江省浦江县郑义门八世祖郑洽……明史专家商传教授调研郑岐村郑洽认祖归宗郑义门之事后认为建文遗臣郑洽在宁德的出现实际上支持了建文帝出亡东南说。可以说这是建文帝出亡宁德的另一重要佐证”[③]。

宁德周斌的影响。祖籍宁德洋中镇的周斌曾担任建宁教授一职，曾在国子监任职，又辅佐过齐王太子，名臣杨荣是其得意门生，后以丁内忧回到家乡。这么一位在教育上有突出成就的人，在当时追求科举的热潮下，回到家乡后，应当也会发挥一下余热，在家乡教授一些学生，至少是教授过家族子弟。周斌“以质直见重”“约度明信”“辅翼开陈，一以正道”，所教的不仅仅是一些知识，更加教授儒家的礼仪道德。建文失国后，在福建漳州地区，便有过老师不顾自身安危带领学生哭祭建文帝的案例“漳州教授陈思贤闻靖难诏至，率诸生伍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曾廷瑞、吕贤，即明伦堂，为建文皇帝哭

---

① 马渭源：《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

② 参见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史林》2016年第6期。

③ 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史林》2016年第6期。

临如礼，郡人惧而执之送京师”[1]。因此，在建文帝逃亡过程中，如果逃亡到此地，周斌在宁德的弟子、族人们无疑是乐于提供帮助和庇护的。

洋中镇钟洋村余氏祠堂对联与余六府传说。在宁德一带的民间传说中，余六府是一名武将，后因占山为王，对抗朝廷，被官府卧底暗杀。据钟洋余姓家谱的记载，余家第 18 世的余伦和第 19 世的余煊均为洪武朝官员，而余六府作为余氏 17 世中年龄最小的儿子，很可能也是洪武乃至建文朝的官员。余姓祠堂的对联“接武龙墀台谏勋名香御墨，恹猷翰苑书门第焕文章“落款”眷弟周斌拜书“[2] 周斌原籍洋中镇洋中村，其丁忧回乡已是在洪武末年，周斌作此对联的时间应当也是在洪武末年。若族谱所载与周斌对联均成立，则可推测余六府或其他身为朝廷官员的余氏族人在洪武末年仍活跃于洋中镇一带。建文帝失国在数年之后，周斌虽已故去，但是身为朝廷官员的余六府或其他余氏族人此时可能仍然活跃在洋中镇一带，因此，建文帝如流亡至此，应当是能提供相当的帮助的。

闽东地区流传的“皇帝妃子”或为建文帝妃子。长期以来，闽东地区都流传着“皇帝妃子”的故事。分别记载在闽东各县的民间故事集成中，但是关于这位“皇帝妃子”的籍贯等，各地的说法并不一致。经过宁德建文帝下落问题研究小组的不断努力，终于在 2019 年 6 月，“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们的研究小组成员陈永霄、陈丽斌看到了一本修于清道光年间的《陈氏家谱》……蕉城区洋中镇东山村《陈山下里厝谱》是一本陈姓人的支谱，是一位陈姓农民群众保存下来的，其真实性比较可靠。该家谱中赫然记载着这么一段文字：陈姓六世陈岛（音 jie），洪武末任京官时；挚一女闺名凤春，入宫为皇太孙侧妃。[3] 建文帝出逃之时，宫内燃起大火，宫中一片慌乱，建文帝原本打算带着皇三子一起出逃，慌乱中却将其落在了宫门。[4] 慌乱之中，皇帝很有可能带着身边的

① 刘延銮：《金陵全书（乙编史料类）建文逊国之际月表》，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 年，第 576 页。
② 参见余根诚，余新汉，陈言雕：《建文朝武将余六府身世之谜探秘》（未刊稿）
③ 王道亨：《皇太孙朱允炆侧妃陈凤春身世之谜探秘》（未刊稿）。
④ 马渭源：《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24 页。

其他人如妃子等一块出逃。根据这段族谱资料，如果陈凤春确为建文帝妃子，则将为建文帝流亡宁德提供一大佐证。

洁庵禅师与建文帝出亡闽东。作为与建文帝出亡传闻有着密切关系的洁庵禅师，前人已做过较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突破。明崇祯版《泉州开元寺志》载“释正映，号洁庵，抚州金溪人。姓洪氏。幼入安仁、三峰为沙弥。洪武十九年，试经得度，谒灵谷谦”[①]，洪武三十一年，被朱元璋任命为泉州开元寺主持，成行前曾与朱元璋有过对话：永乐元年，赴京朝拜后回福州，任雪峰寺主持，永乐十六年前往北京，洪熙元年到南京任灵谷寺主持，宣德元年擢僧录司左讲经，正统四年圆寂。值得注意的是，洁庵禅师不仅自幼在宁德的安仁、三峰两座寺庙出家为僧，后拜为师的南京灵谷寺道谦牧庵禅师，为今福鼎市人。[②]另外，身负踪迹建文使命的胡濙在出巡福建期间曾登览雪峰寺，从其撰写的《雪峰崇圣禅寺碑文记》来看，胡濙对洁庵禅师有相当的了解。在胡濙撰写的碑文中，有几个疑点，第一，在记述洁庵禅师的传略时，一是有意隐去了洁庵禅师在福建宁德（今蕉城）安仁寺、三峰寺出家的情节，而说他“受具足戒于杭之昭庆寺”[③]，第二，胡濙说洁庵禅师离开雪峰寺的原因是“年已衰迈，欲归老灵谷”，但实际上，洁庵禅师当时并未“归老灵谷”而是前往北京，而且，自永乐十六年（1418年）离开雪峰寺一直到正统四年（1439年），仍然在北京与南京之间活跃了二十一年的时间“年已衰迈”似乎并不是洁庵禅师离开雪峰寺的原因。种种迹像表明，洁庵禅师与闽东地区的佛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胡濙等则试图抹去这一段历史，并在永乐十六年调洁庵禅师入京，切断其与福建地区的联系。

（三）永乐帝对闽东等地所采取的监控措施

朱棣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在进入南京后，首先做的便是散布建文帝已死的

① 转引自王小琳：《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主持洁庵禅师身世之谜探秘》（未刊稿）
② 参见王小琳：《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主持洁庵禅师身世之谜探秘》（未刊稿）
③ 王小琳：《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主持洁庵禅师身世之谜探秘》（未刊稿）

消息，从而瓦解其文臣武将的抵抗意志，随后，罗列“奸党”名单，对内迅速肃清忠于建文帝的文官集团并通过招降、开永乐朝科举等方式建立起忠于自己的文官集团，对外招降建文帝残余军队，击灭铁铉等坚持抵抗的势力，残酷迫害、株连建文帝的部属，调换各省的军事及政治长官，并通过数次征讨蒙元、派遣郑和下西洋等将军事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忠于建文帝的势力被肃清、永乐帝牢牢掌控权力的情况下，即使建文帝重新出现，也难以对永乐帝的权力地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因此，即使发现了建文帝的踪迹，只需对其加以监控、加强周边地区的军事控制即可。作为建文帝有可能藏匿的闽东地区，永乐帝进行了一些军事、人事等方面的部署。

永乐初对闽东地区军事控制的加强。关于这一段史实，孙绍旭在《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一文中论述得十分清初“明初在闽东的西部、南部、东部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即东部即福宁县驻扎屯田军和在沿海建立烽燧驻扎水军，在西部即古田县西部驻扎屯田军，在南部即宁德一、二都和古田南部驻扎屯田军队，从而形成一个三面包围的闽东军事格局。在这一格局的内部通过建立福宁县、古田县、宁德县、福安县等县级行政机构，在要害之处建立巡检司、关隘，并在闽东大地上建立了行走于古官道之上传递信息的铺递，从而形成一个有点、有线、有面，且点中有重点，线有主线，面有实面的东、西、南厚实，县治行政中心坚实，险要地带特置巡检的网络…….闽东军事力量的加强应在永乐时期”[①]。值得关注的是永乐初这个时间点，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下南京，在其后数月之内迅速打击、瓦解建文帝的文官集团和军事力量，其权力基础已相当牢固，此时，即使建文帝流亡君臣复出，也难以撼动朱棣的权力基础。且建文帝君臣从南京出发，长途跋涉，又是秘密行动，即使有护卫军队随从，也只能维持在较小的规模。如果发现了建文帝的踪迹，只需派一些军队在附近加强监

① 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史林》2016 年第 6 期。

控即可，贸然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进行围剿，等于向世人宣示了建文帝的存在，反而得不偿失，永乐帝对闽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正符合这一特征。

派遣太监周觉成等人长期驻守宁德宝丰银矿。周觉成等驻守宝丰银矿，客观上加强了对宁德及周边地区的监控。“据《周墩区志》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邑民何安请得重开宝丰银场，岁纳银三十六两。永乐元年（1403），命中官、御史各一员监督输课。……与蒋御史一起来的监银税中官是谁呢，他与奉旨鼎建支提的太监周觉成应该是同一人。迄今可资查考的资料显示，永乐初年在闽东监矿的太监只有一位，就是周觉成。而且他也留在闽东很久，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卒于当地”[①]。宝丰银场随纳银仅三十六两，却让“中官”周觉成一直驻守到在当地直到逝世，中途并未让其他太监进行替换，不免让人猜想其借监督宝丰银场之名，肩负着其他的使命。周觉成是永乐元年派出的太监，意味着他应该是在建文朝就已在宫中当太监，可能亲眼见过建文帝，识得建文帝的样貌。皇帝平时久居宫中，除了朝会等时机见大臣们以外，平时生活起居见得最多的便是宫中的太监、宫女，而建文朝以后进宫的太监则对建文帝无缘得见。因此，派遣周觉成常驻闽东地区，其可以加强对宁德地区的监督，其二如果见到流亡的建文帝，周觉成也可以辨识。

搜查浦江郑家，威慑在外逃亡的郑洽等人。浦江郑家是建文帝从亡大臣郑洽所在的家族浦江郑家与朱元璋、朱允炆的关系一直很密切。“靖难”成功以后，有人告发说，建文帝逃到了浙江浦江去了藏在郑……朱棣立即派了人前往浦江郑家进行搜查……朱棣派的那些人在检查了五个大柜之后，发现竟然全是书，觉得没劲，也就没有继续往下搜查了”[②]。郑洽是追随建文帝流亡的大臣之一，即使郑洽隐姓埋名难以掌其踪迹，对浦江郑家进行搜查，结合朱棣对方孝孺、黄子澄等人祸及家人的残酷迫害，也足以对在外逃亡的郑洽等人起到一定的威

① 袁冰凌：《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18页。
② 马渭源：《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慑作用。

遣郑和、胡濙等寻访福建。郑和与胡濙是永乐帝派出寻访建文帝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福建位于东南沿海，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补给基地，郑和对建文帝在福建地区的寻访自不用说。《明史胡濙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察建文帝安在，淡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①]。虽然《明史胡濙传》只提到胡濙出使江浙湖湘诸省，但是从永乐五年到永乐十四年，加上永乐十七年到二十一年，在外出巡长达十三年的时间，怎么会仅仅出巡江浙湖湘诸省呢？所谓“江浙湖湘诸省”应当是胡濙出巡的部分省份，而绝非仅出巡了此数省。胡濙到过福建有较为可靠的依据；他曾在福建武夷山留下的诗篇为后人收辑在《武夷山志》里[②]，在徐火勃所纂《雪峰志》中，也收录了胡濙所撰写的《雪峰崇圣寺碑文记，其中有“永乐十七年冬予奉使闽粤，登览雪峰之盛……师姓洪氏，名正映，号洁庵咽之语，明确表明胡濙不仅曾出巡福建，更是探访过传闻和建文帝流亡有关的雪峰寺。

遣周新巡抚福建。永乐元年，朱棣命周新巡按福建，《明史周新传》记载，“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独呼新，遂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诸生贡入太学，授大理寺评事，以善决狱称。成祖即位改监察御史，敢言，多所弹劾，贵戚震惧，目为冷面寒铁，京师中至以其名怖小儿，辄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请都司卫所不得凌府州县，府卫官相见均礼，武人为之戢“[③]。从以上文字可以知道，周新是一个酷吏形像，以至于“贵戚震惧”；朱棣与周新的关系还不错，在“靖难之役”成功后，周新得到了永乐帝进一步的重用，这样一个人对永乐帝的忠诚度应当是非常高的；到福建后；府卫官相见均礼，武人为之戢”，说明周新在福建的权力较大，甚至对福建的卫所官兵也有一定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六十九，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 1755 页。
② 马渭源：《大明帝国系列 6. 破解大明第一谜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63 页。
③ 转引自王小琳：《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主持洁庵禅师身世之谜探秘》（未刊稿）

的影响力。同时“周新在官场上进行纪检和检查工作的主要省份是福建、北平、云南（有的说他没去云南就任就被改任了）和浙江，除了北平以外，其他三省是永乐年间盛传建文帝出亡地区”[①]。以上种种表明周新巡按福建或许与建文帝的下落有一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黄子澄作为与建文帝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南京城破后推测其计划往闽浙沿海方向逃亡，佐证了建文帝出亡东南说。近年来在宁德地区挖掘的材料表明，郑治、洁庵禅师等与建文帝关系密切的人物或定居于宁德，或长期在宁德附近活动，佐证了建文帝流亡宁德说。永乐帝在权力稳固之后，对建文帝流亡君臣的策略以加强监控、威慑为主，而永乐帝对闽东地区的军事与人事安排，则恰恰表明其在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监控与军事控制。

关于建文帝出亡宁德相关研究的评析与思考

鄢姿

作为大明第一谜案，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后的去向与结局一直众说纷纭，目前历史学界总共提出了六十几种去向各异的逃亡说。[②]随着 2009 年宁德上金贝村古墓的挖掘与相关史料的重现，福建宁德成为建文帝遗踪研究的另一热门。尽管后来福建博物院研究员王振镛、原蕉城区地方志编委会主任李怀先等学者认为此墓很可能只是元代的一个禅师之墓，让古墓与建文帝之间的联系似乎一下子又断裂了。不过，由于古墓内的很多建筑规制还无法解释清楚，甚至与普通禅师之规制之间还存在较大的落差，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上金贝古墓的墓主人依然很大可能还是建文帝。并且由于建文帝出没福建研究导向的影响，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六十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 1683 页。
② 马渭源：《破解大明第一谜案》，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2 一 67 页。

十几年间再次出现了一系列蛛丝马迹的证据，特别是2010年郑洽归宗一事，又给建文帝流落，宁德一说以强有力支撑。孰是孰非，自是有待诸位学者大家探赜索隐，各逞良才。笔者在参阅相关研究论文时，发现众多学者在论证建文帝于宁德活动的迹像时，不少文章论据之间有互相矛盾之处，因此，本文拟列举其中疑惑之处，求教于大家，并且希冀借此扫清迷障，为建文帝隐入宁德之谜题做一定逻辑上的梳理。

第一个疑惑是关于雪峰寺洁庵禅师藏匿建文帝之说。

王小琳的《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洁庵身世之谜探秘》一文中，作者通过查阅明修《灵谷寺志》明崇祯版《泉州开元寺志》以及明人徐勃撰写的《雪峰志》、明礼部侍郎胡濙撰写的《雪峰崇圣禅寺碑文记》等记载，判断洁庵禅师离开泉州开元寺至福州雪峰寺任职大有深意，一是可以就近号召丛林势力支持举事，二是万一失败，可以给建文帝提供栖身之地。作者的这两个判断乍一看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仔细一想却发现还是有疑惑之处，一是朱元璋是否有可能提前预见建文帝与朱棣必有一战，并为建文帝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二是万一举事失败，假设福建丛林确实有足够的力量来提供支持的话，能够提供明目张胆的支持所在，还能不能成为建文帝的隐匿之处？再者，作者又根据材料判断，洁庵禅师因为收容建文帝事发，永乐十六年去北京，实际，上是被朱棣软禁了十几年，关于此事，作者并没有提供明确记载洁庵禅师如何被软禁的相关史料，只是出于一种猜测。而接续此猜测，作者又指出，洁庵禅师放回南京灵谷寺，后来又被擢升为僧录司左讲经。作者引用史料明人徐火勃写的《雪峰志》中提到："钦选当山凡一十五载，营任佛殿法堂，山门焕然一新，宣德元年，擢僧录司左讲经，后退归钟山之灵谷寺示寂。"奇怪的是，笔者翻阅明代徐火勃的《雪峰志》[①]查看后，并未发现该文提及洁庵禅师于"宣德元年，擢僧录司左讲经"一说。当然，不排除作者所查阅到的版本或者其他资料有不同出处的可能性，抑或是

① 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二辑，第7册，徐物(明)撰《雪峰志》，1980年版，第144页。

出于现实的需求，历史上不同朝代或版本资料对这段文字就做过文献上的增删，这里有待商榷。但是笔者也做过此番假设，真如作者查阅文献所言的话，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疑问是，假设洁庵禅师真的收留过建文帝，在永乐初期大肆诛杀建文党羽的情况下，可能只是简单地软禁并最终释放吗？即使朱棣出于某些原因没有诛杀洁庵禅师，那还会让此等罪人担任僧录司左讲经吗？僧录司是古代朝廷的中央机构之一，掌管有关僧侣等相关事宜。洪武十四年六月，礼部提出了设置僧司衙门方案；在京设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各府、州、县分别设僧纲、僧正、僧会等司，分掌其事；僧录司设善世（正六品）、阐教（从六品）、讲经（正八品）、觉义（从八品）各二员，僧纲司设都纲（从九品）、副都纲各一员，僧正司设僧正一员，僧会司设僧会一员；僧录司官员由礼部任命，不支俸，官、吏、皂隶等皆由僧人及佃仆充任；各级僧司衙门“专一简束”僧人，管理寺院，僧人除“犯奸盗非为”“与军民相涉”等罪以外，“有司不许干预”[①]。由此可见，僧录司是当时正规的寺院行政管理部门，那么试问一个有打算借丛林力量支持举事前科的禅师还能有机会进入并参与这样的部门吗？根据王道亨先生的《明中叶中国佛教的突然衰微原因分析》中提到，朱棣一度在国内毁寺杀僧，说明他并无不可杀三宝之类的信仰忌讳，那么洁庵禅师犯了弥天大罪还能苟活，简直匪夷所思。因此洁庵禅师是建文帝的接应这种说法，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第二个疑惑是支提寺五爪金龙云锦袈裟与上金贝古墓塔碑上的内容相左。

尽管建文帝出奔宁德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链，而上金贝古墓也已经被部分学者断定为僧墓，但里面的修建规格及特点依然让许多学者心意难平，认为在没有确切的证据面前，还不能排除墓主为建文帝的猜想。因此不少学者在论证建文帝前往宁德的可能时，最经常引用的论据就是上金贝古墓及宁德支提寺的五爪金龙云锦袈裟，比如孙绍旭先生的《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以及王道亨

---

① （明）释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2，转引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博士论文，第2页。

先生执笔的《用诗歌证明建文帝出亡至福建宁德》中均有提到。特别袈裟原物经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室主任、云锦研究专家张洪宝鉴定，认为“这件袈裟应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很可能就是建文帝携带出宫的那件东西。”[①]这里，姑且不论张洪宝的鉴定是否准确，此袈裟是建文帝携带出宫的推断就与上金贝古墓塔碑上的20字碑文相左。那20字碑文写着：御赐金斓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法师之塔。其中御赐金斓的意思是皇帝赐予过袈裟，这个行为就与携带出宫形成矛盾。因此，孙绍旭先生猜测的“支提寺明初云锦袈裟、建于明初的具有皇家龙纹礼仪规制的罕见皇室墓葬上金贝古墓，以及古墓舍利塔上刻的“金镧”袈裟，明初有皇家身份、拥有云锦袈裟、能够以皇家龙纹礼仪规制下葬的墓主人似乎屈指可数，而暂无可考者仅建文帝。”这一论断值得商榷，假若五爪金龙袈裟是建文帝携带出宫，那么。上金贝古墓墓主人就应该不是建文帝。除非上金贝古墓主人确定是建文帝无疑，那么才来考虑被御赐金斓的人是谁？有没有可能是支提寺五爪金龙袈裟的主人？有学者认为沧海珠就是建文帝本人，那么假设五爪金龙袈裟是朱元璋赐予他的，因此建文帝出逃时依然携带，那么一个爷爷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会赐给孙子一件袈裟？也有学者认为御赐金斓的意思不一定是指赐予袈裟，也可以说是赐予金色的华服，而朱元璋就赐予了建文帝这个金色的华服即龙袍。这个解释就非常牵强，笔者查阅史料，提到金斓二字的基本都是袈裟的意思，在没有确切的史料佐证前，金斓不宜解释为龙袍。

而上金贝古墓里面的雕刻也有一个疑问是，谁来督造？若真如学者们大胆猜测的，朱棣把建文帝秘密处死，是否有可能大费周章给他建造豪华墓葬？有学者猜测是建文帝的亡臣帮忙建造的坟墓，那同样有这样一个疑惑，墓外或许含含糊糊不方便说清道明，为什么在相对安全的墓穴里面也没有只言片语的暗示呢？在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比如神道碑、墓志、墓表等，或者墓内砖刻、

① 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史林》，2016年第6期，第57页。

浮雕等佐证之前，就认定此墓为建文帝墓，笔者以为较不符合历史的客观追求。

第三个疑惑是，结论先行的论证方法是否可行？

在王道亨先生的《用诗歌证明建文帝出亡至福建宁德》中推测“建文帝在雪峰寺隐跸时间长达十几载，此间不可能不留下几多诗作”，作者进而以此为立论基础，从各种雪峰寺僧人的诗作来与建文帝生平相互印证，以此“证明”建文帝出亡于宁德。迄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据证明建文帝在雪峰寺隐跸。拿一个尚未有证据支持之结论，用诗歌验证方式来索隐，是否可行？比如关于雪峰寺里面的佚名诗的解读。出家为僧的尽管不少出自下层社会，但也不乏历经变故而投身佛门的，因此根据诗歌里面的“世事沧桑，悲凉”（请参见王道亨先生的《用诗歌证明建文帝出亡至福建宁德》）等情调来判断此为建文帝所作，笔者认为可能失之武断。

第四个疑惑是关于第二次靖难之役。

有学者认为，在朱棣攻进南京后，建文帝依然控制着南方十一个省，因此与燕军势力是有过第二次交战的，战场就在福宁地区，只是因为朱棣的清扫，所以这段历史被尘封（请参见王道亨先生的《建文帝出亡方向的三种传统说法阐析》），作者还通过福建在明初至明中期人口莫名骤降的情况作为佐证。这种猜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假设建文帝控制着南方十一省，那么在这十一省中他的行踪应该是比较自如的，并不一定要改头换面，遮遮掩掩，乃至更不可能在其他十个省中都没有留下关于他的存在的任何确切记载。更甚者，倘若有第二次靖难之役，建文帝为什么没有用自己的名号号召更多的势力参与呢？从常识而言，南方真的有十一省联军的话，更需要大张旗鼓地以建文帝为旗帜来勤王，以便师出有名。若真有此类声势浩大的号召，在距今并不算久远的历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是不大可能的。

第五个疑惑是关于民俗故事里的罗隐能否作为建文帝原型解读。

王道亨先生在《与建文相关的闽东民间史事研究》中，把罗隐这个传说与建文帝的生平做了细致的比较分析，认为宁德地区广为流传的罗隐传说与建文

帝大有关系，罗隐这个乞丐皇帝乃建文帝，传说中石化的石头人是追随建文帝的忠臣。作者引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宁德分卷》第336页“罗隐不成帝”中的记载来与自己的推测相互印证：“郑堂和罗隐都是明朝人。宁德民间传说；‘罗隐做皇帝，郑堂做军师，罗隐不成帝，郑堂去巡街’。”进而指出，这个罗隐是明朝人，印证了这个传说与建文帝有关的时代背景。

但是，巧合的是，笔者刚好翻开陈支平老师的《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家族的宗教信仰章节，里面提到“某个罗氏家族，其家族寺庙内竟供奉着‘丐王爷’。丐王爷姓罗名敷，五代时人，原是杭州吴越王和福州闽越王的朋友，能诗善文，无奈秉性懒惰，不愿为官，甘心为丐，成为闽浙各地乞丐的首领。”支平老师这段话参见的是《闽都别记》。这里罗隐与罗敷名字的相似性，传说内容大同小异，丐王爷与丐皇帝身份的雷同，让人很难不把他们作为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看待，从故事发展的眼光看，应是先流传的是丐王爷的版本，然后经过民众加工，王爷身份升级为皇帝，比较符合逻辑，当然这个只是推测，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考证和论证才是。在罗敷故事里，罗敷是五代时人，这个与明代相差甚远，若罗敷故事是最原始版本的话，罗隐故事与建文帝的关联就比较难以成立。当然民间故事本来就多属于神话传说或是口口相传的故事，其自身的真实性本就有待考究也是大家都熟知的常识。因此，非要证明罗隐丐皇帝的民间传说与建文帝有关，首要先研究罗隐传说的最早版本的年代以及罗隐其人所在的时代，才好做进一步的扩展研究。

以上是笔者对关于建文帝入闽研究的相关论文在史料的分析中提出一些质疑，并非即此否认诸位前辈学者的研究心血，而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把其中的某些逻辑不通之处指出，求教于大家，更希望能看到有确凿无疑之论据和无懈可击之分析，使建文帝出亡宁德一事让天下人心服口服。事实上，纵观各位学者大家的论文，里面提到的种种历史材料以及民间资料显示，建文帝逃亡宁德的可能看起来是非常之大的，当前要做的或者挖掘新史料，或者对旧史料进行穷尽式的逻辑与相互印证分析。

建文帝是否真从大火中逃出，是否到了福建，是否又最终葬在宁德，这三个历史谜题，一环紧套一环，若能证明建文帝确凿无疑葬在宁德，那么就可以说明建文帝奔向福建，并且从大火中逃出，反之，如若能证明建文帝并没有从大火中逃出，那么所有的谜团都将是伪命题。

那么，在不能确切证明上金贝古墓就是建文帝之墓时，对宁德的历史开发经济建设会有损害吗？笔者以为，并不见得。若善加利用，恐怕可以是一次成功的旅游规划。在宁德发现了如此之多影影绰绰的线索，有支提寺神秘的五爪金龙袈裟，有建造规格暗含九五之数的上金贝古墓（请参王道亨先生的见《上金贝古墓为何被众多到访的专家学者确认为明建文帝陵》），有建文帝逃难宁德的民间传说，有清编《支提寺图志》中收录的清代高兆（宁德人）写的《古篇》诗“沧海红尘事已久，碧瓦朱甍亦同朽。山僧垂泪检残篇，亥豕龙蛇痛心手。劫灰洗出玉柙文，天花焕发金泥牖。龙宫遗物一朝新，钟鼓能鸣事岂偶”，诗中提到的沧海、山僧与上金贝古墓的碑刻提到沧海珠禅师若有关系，在吴康成先生的《闽东旧地方志书中关于上金贝及古墓的曲笔记载佐证了上金贝古墓确系明建文帝陵》中又提到很难仅仅用巧合来说明的江湖切口隐喻内容；在《支提寺图志》69页中留下了千金难求的十一字诗注“九达禅师至之夕，钟鼓自鸣”。这十一个字表面上看，似乎是对68页诗歌“钟鼓能鸣事岂偶”句的注释，实际上是用江湖切口隐喻“建文帝这个从地道水关逃出来的人（因为民间一直沿袭“从地道出走”说）”——“九达禅师”来到了支提寺，而且到寺之日，寺钟寺鼓不敲自鸣，有帝字形古画，有郑洽故居与红崖天书隐约相连的“离明离照”牌匾（《续破天书觅建文》），有郑洽归宗一事，有万岁神祇牌（在《试论闽东民间特异文化现像》中提到“小登……村里有一尼姑庵（俗称“菜堂”）长年供奉着一个雕刻有龙头的神祇牌，上书：“当京皇帝万万岁”，但没有帝号、纪年，也没有落款。”，作者又在周宁县等其他地方发现多个类似的万岁神牌）等等，这些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历史谜语大坑。而中国人自古就有猜谜的爱好，已知的真相也并不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美更加让人惦念。

因此，在笔者看来，建文帝是否进入宁德，必定是一个长期的学术论争之题，当地相关部门完全可以抓住这个论题并加以渲染，吸引游客参与讨论并寻求线索，既引导各路专业研究者将其作为严谨的学术问题来探讨，也将本论题外放成为一场面向世人的大型智力嘉年华。其好处有三，一是或许民众的大规模参与，可能挖掘出更多的史料证据，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之上，出现更具突破性的史料证据，统合现有各种线索，真正凝结成逻辑完整、证据确凿的学术命题。二是民众的大规模参与，对现有史料证据反复磨勘、多方思索，有可能在机缘巧合之下突破学者们的迷障，阴差阳错寻求出关于此命题的关键证据或者隐藏脉络。这并非天方夜谭之事，即如笔者区区，偶然间对“丐王爷”故事的发现，也有助于探寻有关“丐皇帝”传说的来源，补正研究者对于相关故事的认知。三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建立以探秘寻谜为主题的旅游新样式，有助于激发宁德旅游的内在潜力，实现宁德旅游的跨越式发展。在各种旅游景点趋于相似化的今天，普通的自然景观或者人文景观，已经很难引起旅游者的兴趣，沉浸式体验式的新旅游样态越来越得到新一代旅游者的欢迎，目前国内尚少见到以探秘寻谜为主题的文化旅游产品，大多数的体验式旅游也都大同小异，缺乏文化支撑与历史纵深。如果能够以建文帝在宁德这个点为基础，好好开发设计一套沉浸式体验式旅游方案，就有可能成为爆款，不仅提升宁德文化形象，也更新宁德旅游主题，既彰显文化又繁荣经济，一举两得。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锦袈裟与“建文帝出亡宁德说”

吴晓非

摘要：一些学者认为福建宁德支提山寺发现的云锦袈裟是建文帝带来的，这一说法过于肯定。明清时期皇室有赏赐寺庙高规格袈裟、珍宝的传统，因此云锦袈裟可能为朝廷的赏赐。支提山并非名寺，与明王室也无明显渊源，而明成祖及明神宗对支提山寺非常重视，其原因可能是建文帝出亡此地出家为僧。

关键词：宁德；云锦袈裟；建文帝

关于“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朱允炆出亡的下落，诸多专家学者众说纷纭。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发掘，学者从地方志、明人笔记、摩崖石刻、考古发掘以及民间传说和历史民俗等资料入手，试图找出破解这一大明第一奇案的证据。目前，学界关于明清以来有关建文帝出亡的地点共有 15 种说法，涉及云南、贵州、重庆、四川、两广、湖广、福建、浙江、安徽、江西、江苏、陕西、青海、甘肃等 14 个省份和海外一说。[①] 此外，据马渭源先生详细统计，出亡的具体地点又可进一步细分为 62 种说法，其中佐证材料源于民间传说者 31 种，源于民间传说、考证、前人书籍者 15 种，源于明史和地方志者 5 种，源于族谱者 1 种，源于其他材料者 10 种。[②]

近年来，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受到较多人的关注。诸多学者从近年来宁德的考古及研究新发现入手，并进行了细密的考证。如宁德新发现的云锦袈裟、上金贝古墓以及郑岐村郑洽认祖归宗和明朝初年对宁德地区的军事控制等几方面。[③] 作为一代帝王，建文帝的出亡行踪必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本文选取云锦袈裟作为研究对像，结合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展开论述，以期进一步厘清建文帝出亡的真相。

---

① 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史林》2016 年第 6 期，第 57 页。

② 马渭源：《破解大明第一谜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2 一 67 页。

③ 参见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2010 年第 5 期；徐仲杰：《南京云锦史》，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王振墉：《福建宁德上金鄁沧海墓考》，《福建文博》2009 年第 1 期；浦江白麟溪郑义门《郑氏宗谱》卷 10，崇祯年间；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德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年；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史林》2016 年第 6 期。

（一）关于支提山寺云锦袈裟的误解

2010年，福建宁德支提寺发现一袭精美的云锦袈裟。这件袈裟无论从质地、图饰、主题配饰，还是从编织材料、织造技术上，都尽显高贵，遂引起了普遍关注。商传先生认为，明代初期皇家从未有过赐袈裟给寺庙的习惯，对袈裟的来源表示疑问。南京的云锦研究专家张洪宝先生认为："这件袈裟应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很可能就是建文帝携带出宫的那件东西"。张先生肯定了这件袈裟的崇高规格，但也未确定这件袈裟的来源。而学者张小妹更认定支提寺这件五爪金龙袈裟即是许多明史资料中所记载的，朱元璋放在铁匣之中，后来被朱允炆携带出宫的那件袈裟。福建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制作材料用金量十分丰富，其精美程度甚至丝毫不逊色于明定陵出图的万历皇帝的龙袍和明初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的紫衣袈裟，故有学者凭此认为，支提寺的云锦袈裟应是明初宫廷御用珍品，其主人应是明初宫廷之主。[①]尚不讨论此袈裟是否为宫廷之物，在宁德支提寺发现如此珍贵的云锦袈裟，足以断定历史上福建宁德支提圭中曾存在过一位得道高僧或知名禅师，以至于之后明代的几位帝王对支提寺"偏爱"有加。在支提山寺发现这一袭珍贵的袈裟，足以见得明代此处曾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僧人，但并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建文帝，因为明清朝廷赐禅师、高僧金襕、紫衣等高规格袈裟的情况屡见不鲜。

明朝建立初朝，便有过为禅师、高僧赐予袈裟的事例。据《抱冲斋诗集》记载，"武陵寺北魏元熙年建，明太祖赐碧峰禅师金襕袈裟尚存"。[②]可见，明太祖朱元璋曾赐予武陵寺的碧峰禅师一袭金襕袈裟。武陵寺，在今陕西省永寿县境内武陵山上，据《陵西通志》记载，"武陵山，一名翠屏山，在城外西南，昔在城内，上有武陵寺。山形如屏，亦名翠屏山。后魏平阳王熙建，

① 郑自海：《从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和闭嘴龙纹饰看明初皇家礼制》，《东方收藏》2010年第5期。
② （清）斌良《抱冲斋诗集》卷二四《青海纪行集二》，清光绪五年崇福湖南刻本。

有浮图”。[①] 碧峰禅师何许人也？其本姓石氏，号为碧峰，生于乾州永寿县，“年六岁依云寂温法师为弟子”，“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即位于建邺，明年己酉，燕都乎？又明年庚戌，诏禅师至南京。夏五月见上于奉天殿，且曰腾闻师名久已”。[②] 碧峰禅师是永寿县人，且武陵寺即在永寿县城外西南处，而在明初，太祖皇帝召见碧峰禅师于奉天殿，综上可知，《抱冲斋诗集》中所记载的“明太祖赐碧峰禅师金襕袈裟”应为属实。

明中晚期之后皇家赐袈裟给寺庙的高僧禅师逐渐增多，到了清代仍然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这一习惯。清世祖顺治皇帝曾赐予本孚法师紫袈裟一袭。据《震泽县志》记载，“本孚，字楚莫，出家崇义寺，道白之法弟也。少有智慧，不乐赴应，本师戒月甚异之。年十七，归木陈，豁然顿悟，应对如流。顺治十六年，诏迎宏觉国师敷坐问道时，随师同谒世祖世祖者四大弟子，本孚其一也。在京月余，御赐紫袈裟一袭，帑银五百两，敕建绍兴云门禅寺，康熙八年圆寂。”[③] 顺治皇帝在向国师问道时，便赐予其弟子本孚法师一袭紫袈裟及五百两库银，可见帝王对得道高僧的敬重。

再如，清高宗乾隆皇帝曾赐予阿育山寺高僧持荃法师紫袈裟、龙缎袍等诸多高贵的宫廷御制珍品。《明州阿育王山志》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经过：

“乾隆十六年春，皇帝南巡至浙。三月初五日，臣僧持荃于六和塔道左恭迎圣驾，龙颜大悦。即日内，大臣传旨召至行宫，申刻，恩赐紫袈裟一顶，内造龙缎袍一袭，宫绸两轴，彩缎二端，御茶六瓶，宫制绣袋一对。本年六月十七日，宁波府知府臣胡邦祐恭赍御书心经墨宝到山，奉旨赐阿育王寺，臣僧持荃即阙谢恩。乾隆十九年夏月，臣僧持荃恭纪。乾隆二十二年，今上翠华重幸。二月二十七日，臣僧持荃同浙省名山住持僧众在拱辰桥外恭迎圣驾，即随驾进城，二十八日午刻同各山住持僧众到外行宫恭请圣安，天颜大喜，荷独唤阿育王寺臣僧名，随即趋前，奏应当赐荷包一对，初四日辰刻，内大臣奉旨传

① （清）沈清崖《陕西通志》卷二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九，明万历刻天启印本。
③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三《人物十一》，清光绪重刊本。

臣僧持茎至，宫门赐东莞香一盒，龙缎官绸八臣，绣袋一对，谢恩后即日酉刻，忠勇公傅奉旨传臣僧持茎至宫门，特恩赐紫尝即恩。初六日仍于拱辰桥外送架回銮，赐紫砂门。持茎恭纪承恩。”①

乾隆皇帝不仅赐予持茎高僧紫衣袈裟，更是将龙饰锦袍以及龙纹官制绸缎、绣袋这一像征皇家规制的宫廷珍品赏赐于高僧，可见皇帝对于得道高僧极高的敬重，待遇丝毫不亚于其他皇室成员。

综上可知，明清时期帝王为表达对得道高僧、禅师的尊敬，常常赐予其皇室规格、宫廷御制的云锦袈裟。袈裟作为出家人的法衣，其高贵的程度亦可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受赐予者身份的高低。由此可见，明清宫廷赐予禅师、高僧宫廷御制袈裟的情况屡见不鲜，有龙纹装饰的缎袍也可作为宫廷的恩典。

（二）明代宫廷对支提山寺的恩典

明永乐五年（1407），钦差中使周觉成奉旨敕修支提寺大殿，并赐田十六顷四十余亩，“皇朝永乐初遣中使周觉成鼎建，敕名华严寺，立田十六顷四十余亩。”②之后仁孝徐皇后命工匠铸造千尊铁铸天冠圣像赐予支提寺。又诏无碍禅师为住持，赐紫衣袈裟一袭。千尊铁铸天冠圣像颇为罕见，可见支提寺对徐皇后有重要意义。徐皇后（1362-1407）是明初开国功臣徐达长女，洪武九年（1376）册封为燕王妃，洪武十三年随燕王就藩北平。建文四年（1402）燕王于南京即皇位，十一月册封为皇后，病故于永乐五年（1407）七月。③可见，永乐年间，远在福建宁德的支提寺便受到明成祖朱棣与徐皇后的恩宠，不仅敕修大殿，而且赐天冠圣像和紫衣袈裟。但据记载，支提寺在明初并未与朝廷有何渊源，也非著名庙宇，成祖和徐皇后对其的重视颇有可疑之处。据《明史》

---

①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二五，清乾隆续刻本。
② 何智远撰：《闽书》卷六，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所《闽书》校点组校点，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③ 袁冰凌编著：《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7 页。

记载，“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①]，徐增寿乃明初大将徐达之子，也就是徐皇后的兄弟，徐皇后如此重视支提寺，其原因可能为建文帝曾流落至此地。

万历年间，支提山寺又受到各方的关注。万历元年（1573），僧人大迁奉旨来到支提山。据支提山华严寺《宗谱》记载，“慈圣母陈、李二娘娘请（大迁）入内宫，拜为国师，赐金冠、紫衣，留内宫供养半载，将重建支提一事，细诉一番。”之后，“慈圣母传旨慰谕，圣上敕赐金銮驾，钦差太监张文齐送钱粮等项，取木司、土司匠人，起建大雄宝殿、天王殿、钟鼓楼、伽蓝殿、祖师殿、方丈禅堂、香积厨房、斋堂等处”。[②]大迁奉旨来重建华严寺，再加上当地官员与乡绅的资助，到万历八年（1580），华严寺重建已初具规模。之后，万历十八年（1590）和万历二十年（1592）李太后与神宗皇帝两次敕赐经书、珍品于华严寺，据《支提山华严寺志》记载，除了《永乐北藏》《续大藏经》《全藏经》以及四大部经《华严经》《宝积经》《般若经》《涅槃经》各十二部等经书，其中《永乐北藏》由明成祖敕令雕印，只能是官方印刷，极为珍贵。除了经书，还有金带黄凉伞一把、龙凤旗二副、金冠十二顶、龙棍一副……凤锦十二副、凤锦条紫衣十二领、随藏法器全备。[③]要知道，在明代能够使用龙凤图案装饰的，必定是身份及其高贵的人。而细数这些御赐品，除了经书，不乏“金銮驾”“金冠”“凤锦紫衣”等配饰，更能彰显出皇室对支提山华严寺的重视。

巧合的是，万历皇帝对建文下落也颇为关注，据记载，“万历二年，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当时逃免，果否？辅臣张居正对言：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④]而且在位期间，还恢复了建文帝的年号，

① 张廷玉：《明史》卷四《惠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② 《宗谱》“重建支提华藏万寿禅寺合山源流法派宗谱集要”条下。
③ 彭冰凌编著：《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十，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这是明代对建文朝态度的一大转变。万历皇帝对支提山华严寺的特殊感情，或许与此有关。

（三）结语

“建文帝为僧遁去”[①]的说法由来已久，其说虽无明确证据，但种种发现表明这一说法是有可能的，而福建宁德可能是建文帝为僧之地。无论是宁德地区近年新发现的云锦袈裟，抑或是陈皇后、李太后分别赐予支提山寺的紫衣袈裟，以及永乐皇帝与万历皇帝对支提山中寺庙格外重视，都说明支提山寺庙有不同寻常之处。但作为福建邻海地区的一个普通寺庙，历史上也未出现高僧大德，皇室对其的关注令人费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文帝有着王室血统，又是成祖的亲侄子，如果建文逃到福建沿海地区，将其控制于此，出家为僧是最好的处置方法，既不会对统治造成威胁，也不会背上篡位杀侄的骂名。并结合永乐时期对此地军事部署的加强。综上所述，“建文帝携近臣出亡至福建宁德地区出家为僧”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郑和访支提山与建文帝下落关系考

林东杰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西南有山名支提，山上有座华严寺，世称支提寺，乃是 971 年吴越王钱俶命杭州灵隐寺了悟清耸禅师创建，历宋元明三朝四度敕建，五次分别赐额“大华严”“雍熙”“政和万寿”“华藏”“华藏万寿”。[②]

① 张廷玉：《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
② 袁冰凌编著：《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绪论”第 1 页。

民间传说，永乐五年（1407），郑和接受永乐帝朱棣密旨，表面上以徐皇后遗愿为名送千尊天冠菩萨像到支提寺，实际是安抚软禁在该寺的建文帝。这个传说包含了三个关键问题：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出亡、建文帝被软禁于支提山、郑和肩负安抚建文帝秘密使命。以下逐一梳理。

一

靖难之役中南京城破之时，建文帝是自焚而死，还是“逊国”出亡了？六百余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史料记载歧出。《明实录》，上记载道：（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门。时诸王分守京城门，谷王穗守金川门，穗登城望，上遂按兵而入城中。军民皆具香花夹道迎拜……时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①]

（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辛未）追封故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徐增寿为武阳侯，赐溢忠愍，敕有司治丧……上之举义，增寿最效勤诚，有发其事于朝，遂囚之。上入金川门，建文君将自焚，命捽至，杀之君顺门庑下……[②]

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③]

从这些记载可以得知：靖难之军在乙丑日进南京金川门时，建文帝在杀了背叛自己的徐增寿后，自焚。朱棣望见皇宫起火，急忙派中使去救，可惜去晚了，只从火中找出了建文帝尸体。过了吧天即壬申日，朱棣礼葬建文帝，并为此辍朝三日。这些记载都明确说明建文帝自焚而死。

---

①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太宗实录》卷九下，第129–131页。
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太宗实录》卷九下，第137页。
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太宗实录》卷九下，第138页。

这里有一点可疑，既然入城当日已经找到建文帝尸体，似乎应该尽快安葬建文帝，因为只有建文帝死了，朱棣才能名正言顺登上帝位，正如孟森先生揭示的“葬时稍用天子仪仗，以震都人耳目，为绝天下人望之计，与其出尸于火，意正一贯，不必甚以为难信也”。[①] 意即不管建文帝到底生死如何，他的结果只能是“死亡”被葬。既然如此，南京附近应该有建文帝陵墓，但据明末人谈迁的记载：“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②] 事情越发蹊跷了。

永乐帝即位不久，有人诬告建文帝隐藏在浦江义门郑氏一家。于是，永乐帝“遣使廉之”，因为没找到建文帝，于是“乃斩诬者”。[③] 按理说，如果建文帝已经安葬了，那么朝廷收到建文帝出亡郑家的消息，直接处置就是了，还特意派人调查，看来就连永乐帝自己也不确信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

到了《明史》记载建文帝在南京城破之时去向，再不像《明实录》那样言之凿凿地说“自焚而死”，颇有“春秋笔法”味道：

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穗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均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④]

正史以上记载与《明实录》所记两点不同：起义，王申日安葬的是建文帝皇后；其二，建文帝不知所终。这样一来，也比较能解释为何明代“金陵故老”无人知道建文帝下葬地方。综上，加以建文帝并无实录[⑤]、永乐帝在位不但篡

① 孟森：《建文逊国事考》，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2 页。
② （明）谈迁：《国榷》卷十二“惠宗建文四年”，张宗祥校点，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852 页。
③ （明）吕毖：《明朝小史》卷四《永乐纪·孝友堂》，《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19 册，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33-534 页。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中华书局 1974 年标点本，第 66 页。
⑤ 郭培贵：《建文帝有实录吗》，《殷都学刊》2000 年第 4 期。

改建文帝在位时的历史且销毁史料，[①] 故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笔者赞同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出亡的观点。[②]

二

建文帝出南京城的具体经过，现存文献的描写太过夸张，难以为信。然而，一些文献记载建文帝后来出家为僧，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史书上写；

（姚广孝）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治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治知状，或言匿溥治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滢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治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③]

这段材料再次证明当初永乐帝安葬的并不是建文帝，还提到永乐帝派胡濙寻找建文帝。胡滢确实花了十几年寻访天下，但是否是找建文帝，后文将会提及，在此略而不谈。至于上文提到，有人告发溥洽帮助出家为僧的建文帝出亡，永乐帝就以其他理由囚禁了溥洽十多年。在这件事上，至少有两则材料可以证明。杨士奇《僧录司右善世南洲法师塔铭》记载道：

……溥洽，字南洲……乐四年，诏修天禧等浮图。落成之日，车驾临幸，命公庆赞。祥光烨煜，万众聚观，天颜愉怿。时有仕觉义者，忌师之宠，构词间之，左迁右觉……行公既进位太子少师，赐名广孝，其晚岁于师尤厚。有疾，将化前一日，太宗皇帝亲临视之，问所欲言，独举师为对，不及他事……[④]

另李贽《续藏书》上说："太监吴亮， 建文中中官，建文焚宫逊去，文皇

① 参见杨永康：《朱棣篡史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11 期。
② 参见孟森：《建文逊国事考》，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11 页；商传：《建文帝疑踪》，载《永乐皇帝朱棣》，长春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7–113 页；晁中辰：《建文帝 "逊国" 新证》，《安徽史学》1995 年第 1 期。
③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中华书局 1974 年标点本，第 4081 页。
④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刘伯涵、朱海点校，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74–375 页。

疑匿僧溥洽所。永乐四年，以他事禁锢溥……”[①]两则材料的记录者都是明代人，杨士奇在建文帝时出仕、且深受永乐帝宠信，有他的记载更加可以相信永乐帝囚禁了溥洽十多年，但他或许出于忌讳，所以没细说永乐帝囚禁溥洽的原因。

到了万历二年，当时的皇帝在一次讲读时主动提起建文皇帝，并询问“闻建文当时当时逃免，果否”；张居正答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②]据此可知，建文帝出亡为僧的说法在明朝已经广为传播了。

建文帝在明代很长一段时间是个禁忌话题， 到了万历年间，由于神宗皇帝即位伊始，即多次态度鲜明地褒表建文朝死节诸臣和抚恤这些人幸存后裔，这个局面才有了一个根本性变化。[③]巧合的是，没落的华严寺也正是在万历年间得以重振。

万历元年(1573)，时年六十五岁的大迁禅师奉李太后之命南下重建华严寺。大迁禅师和乃师翠峰禅师与朝廷特别是宫廷有密切联系，华严寺获得许多赏赐。万历十八年（1590）和万历二十年（1592），李太后与明神宗在赐给《永乐北藏》、新刊《续大藏经》之外，还赐有敕谕亭一座，内敕书－封；敕谕碑一座， 御藏碑一座；四大部经《华严经》《宝积经》《般若经》《涅柴经》 各十二部；金带黄凉伞——把，龙凤旗二副，幢皤十二首，金冠十二顶，龙棍一副，“华藏寺”龙匾一副，凤锦棹帏十二副，经盖十二只，经袱十二副，凤锦条紫衣十二领，褊衫十二领，随藏法器全备。此外，李太后宝像四轴，太后御书《法华经》一部及“大、法、宝、藏、阁、腌、嘛、咪、叭、咪、叶”十一大字，泥金《法华经》《梁皇忏》各十二部，丹青倚槛观音、鱼篮观音、文殊、普贤各一副等等。[④]

① （明）李贽：《续藏书》卷七《太监吴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24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21页。
②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神宗实录》卷三十，第728-729页。
③ 牛建强：《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反正过程——以明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为视角》，《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
④ 袁冰凌编著：《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绪论”第24－27页。

由于当时福建地方官的原因，新刊《续大藏经》和大迁禅师早年请得的《永乐南藏》没有送到支提山，而是留在了福州开元寺。因此，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住持华严寺的明启禅师与送李太后赐千叶宝莲毗卢佛像来寺的中官张文一同往京谢恩，在京待了一年多期间，重新请得《永乐南藏》，另请得“华藏万寿”赐额等。[①]

华严寺地理位置较偏，距北京十分遥远，但得到朝廷许多赏赐，且在万历十八年（1590）、崇祯九年（1636）都有皇帝替僧来山，这两位是历史上不多见的且有名号可靠的皇帝替僧。[②]稍作猜想，或许某位前人把支提山有“代皇帝出家”之僧人说成有僧人是“皇帝出家”，一传十，十传百，以至于三人成虎。

三

关于建文帝被软禁在支提山的提法，除了上文揭示的原因外，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情，就是永乐五年（1407）郑和曾经奉旨护送千尊铁铸天冠菩萨像到此，[③]而明清以来长期传说着郑和借下西洋之名暗中寻找建文帝下落。

李贽《续藏书》上有言：“建文焚宫逊……乐四年……命胡给事中滂以访张邋遢为名，遣太监郑和等下西洋，遍物色之，不得……”。[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一书，在重申上述说法的同时，还多了派使者往西域寻找建文帝下落的说法，其《使西域之赏》一文云：“文皇初平内难，即使给事中胡滢以访仙为名，潜行人间，又遣内臣郑和等将兵航海使东南诸夷，最后则中使李达、吏部郎陈诚使西域……文皇初以逊国伏戎为虑，以故轺车四出，几于上穷碧落下黄泉矣。”[⑤]《明史》上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乐三年六

---

① 袁冰凌编著：《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绪论”第 29 页。
② 袁冰凌编著：《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绪论”第 31 页。
③ 参见袁冰凌编著：《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绪论”第 18–21 页。
④ （明）李贽：《续藏书》卷七《太监吴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4 册，齐鲁书社 1996 年版，第 521 页。
⑤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外国·使西域之赏》，杨万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56 页。

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①]“（永乐）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淡至，急起召入，淡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淡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云云。”[②]这些文献，言之凿凿地认为，郑和下西洋实际是为了寻找建文帝；胡濙寻访仙人张邋遢，同样也是为了寻找建文帝。

关于郑和、胡濙寻找建文帝的说法，明人也有持否定态度的，如吴朴《龙飞纪略》写道：“胡忠安公巡访异人，久处湖广，当时有内臣郑和者，亦赍诏浮海，遍诣南海暹罗诸国，古老相传亦以采宝及访异人为名，俱在丁亥之岁。於戏！我成祖应天顺人，以宁兆庶，严父爱兄，无所不至，岂有命使四出以访异人之事哉？闾阎无知，私相讹传，而李贤为国家大臣，作淡碑铭，亦以是为言，真不知大义者也。但碑文相传广而且远，主人习读致疑，其费说词，是以臣不得已采李贤所铭胡濙行事于先，乃以臣鄙见断之于后。异人为谁？是以懿文太子之子，所谓皇太孙也。”[③]当下的一些明史专家经过严密考证，也认为郑和和胡濙寻找建文帝下落的传闻缺乏足够证据，[④]但见存史料没有直接证据可以完全否定郑和和胡濙寻找建文帝下落的提法，以至今天这个提法依然有不少人相信。

当下有人认为永乐五年郑和到支提山就是为了安抚出家为僧的建文帝，此说法如果成立，可疑点有二：其一，既然永乐五年已经知道建文帝下落并将其软禁了，当年也就不用派胡濙去寻访建文帝了；其二，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几乎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中华书局 1974 年标点本，第 7766—7767 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六九《胡濙传》，中华书局 1974 年标点本，第 4534——4535 页。
③ 转引自吴德义：《明成祖遣臣 寻找建文帝下落诸说之由来》,《史学月刊》2010 年第 5 期，第 131—132
④ 参见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4 期；张显清：《也谈郑和远航的动因——纪念郑和远航 600 周年》，《明史研究》2005 年；万明：《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6 期；张兆裕：《明永 乐年间胡濙行迹考述》：《明史研究》2007 年。

每次远航都在闽江口集结，停留时间短则两三月、长则十月之久，[①]这样的时间足够郑和在出航前到支提山见建文帝，但据现存史料记载可知，郑和到支提山仅此一次。如果按钱谦益宏文说阐发的“文皇帝心事”与“让皇帝至德”，这两个疑点好像也说得通，钱文曰：

……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还，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翦灭此而后即安。张天网以罗之，顿八纮以掩之，闭口捕舌，遁将何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咒，剃染之借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夷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示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

何言乎让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师，祸深喋血，让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凭仗祖德，依倚民怀，散亡可以收合，蛮夷可以煽动，卫世子之焚台，卫太子之诣阙，谁能非之？谁能之基？让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以神州赤县为孤竹之封，以体发坏衣为采药之遁。耄逊遐荒，自此退耕于野；头陀乞食，岂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内治外攘，逾沙轶漠，高皇帝之基业安，四祖宗统绪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宁非让皇帝之所诒乎？让皇帝之至德，媲诸泰伯，其难易尤相……[②]

上文所说，归纳起来就是；永乐皇帝知道建文帝出亡为僧，故意大张旗鼓地去寻找，做出不知道建文帝下落的样子，是为了让建文帝安心终老；建文帝在南京城破之后，大有机会卷土重来夺回帝位，但为了天下苍生和祖宗基业，甘愿让位。钱谦益“一家之言”若是成立，上述疑点也就解释得通了。

行文至此，已将郑和访支提山与建文帝下落关系略作一番考论。靖难之役

① 傅朗：《福建与郑和下西洋的船只》，《东南学术》2006 年第 1 期。
② （清）钱谦益：《有学集》卷十四《建文年谱序》，载《钱牧斋全集》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83-684 页。

中南京城破时，永乐帝安葬的不是建文帝，但建文帝出亡的一些具体细节的厘清，有待更多史料和证据的发现。宁德支提山华严寺千尊天冠菩萨像、永乐北藏、千叶宝莲毗卢佛像等许多珍贵文物，历经千百年岁月沧桑得以存世，十分难得，更该善加保护。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文帝行踪诸说刍议

胡娇阳

摘要：“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行踪成为了600年来的明史第一迷案，至今仍为史学界众说纷纭。历史上关于其行踪大致有阖宫自焚说、剃发出亡说、下西洋说、有僧归来说等诸说，本文就历史上关于建文帝的行踪诸说进行分析，力求用“以文证史”的角度评议诸说之合理性与疑点，并总结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建文帝行踪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建文帝行踪诸说现代意义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行踪成为了600年来的明史第一迷案，至今仍为史学界众说纷纭。现将历史上建文帝的行踪诸说如阖宫自焚说、剃发出亡说、下西洋说、有僧归来说等分析如下：

（一）建文帝行踪诸说及评述

1. 阖宫自焚说

《明太宗实录》中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记载：“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助。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骏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而后，朱棣备礼葬建文君，

“发哀，命有司治丧如仪，遣官致祭”。在《明史・建文纪》中也有这样一段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记载：“谷王穗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由此可发现，首先，“宫中火起”，中使出的是“帝尸”还是“帝后尸”，已经自相矛盾。其次，由《明太宗实录》中的对明成祖朱棣哭泣的描述，可见朱棣本人对于修史的干预甚多，以致太宗实录修撰得都如此失实。再次，朱棣以礼安葬了建文帝，那么自然是天子之礼。而天子之礼非常隆重，黄陵自然会在南京的明孝陵中，但是，朱棣并没有以天子之礼待之，南京的明孝陵里也并没有建文帝的陵寝，朱棣定不会因为不认可建文帝而不以天子之礼葬建文帝，因为这与被篡改的《明实录》中塑造的形像相违背。所以，根据史书中记载的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可见，建文帝自焚后葬身于宫中，此说法疑点颇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信之处。

笔者认为自焚说的唯一合理之处就在于，如果建文帝离开了南京，必是要效仿唐玄宗遭逢“安史之乱”，被迫离开长安城后，以正式官宣招讨朱棣，毕竟朱棣是以下犯上，名不正言不顺，建文帝乃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皇位继承人，在当时的大明天下里，建文帝理应号召天下讨伐朱棣，但是，“靖难之役”后关于建文帝讨伐朱棣的任何史料均未记载。或许建文帝最后确实留在宫中，在李景隆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时，建文帝无法承受近臣背叛带给自己的耻辱感，悲愤交集才走到一国之君、九五之尊以阖宫自焚来逊国的一步。

然而，自焚说仍然是疑点多于可信之处。先从宫中之火谈起，此火为谁所放尚有待商榷，传国玉玺流落何方亦是无人能知，在燕军进入皇宫后，“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明太宗实录》卷 9 下）方孝孺作为誓死效忠建文帝的臣子，“靖难之役”期间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建文帝若真是已自焚而亡，方孝孺只是叩头祈哀，此反应着实太多平静，这不免让人怀疑，也为下文的建文帝去向其他诸说埋下伏笔。

2. 剃发出亡说

根据《明史·建文纪》中说："或云帝由地道而亡"。多数人更采纳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由地道出亡，至于建文帝出亡何处，说法不一。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 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日：" 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 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日："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失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穷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宜各从便。"御史曾凤韶曰：" 愿即以死报陛下！"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之后建文帝就带着这批人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广西、福建到处云游。此作为民间掌故传说，只能做为听听而已，不足为信。但建文帝削发为僧出逃，却在诸多史料中得到印证。

《明史·姚广孝传》中记载：（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基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日："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姚广孝为溥治求情这段话，为后世认可建文帝为僧出亡提供了证据。明朝万历年间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列朝·建文君出亡》中记载：“少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密，以故文皇帝遣胡淡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明成祖派胡淡以托访张三丰为名寻找建文帝，在《明史·胡淡传》中亦得到了印证。“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淡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淡至，急起召入。淡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淡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可见，明成祖朱棣对建文帝及其太子朱文奎的踪迹始终心怀芥蒂，以致在永乐二十一年胡淡半夜来报，朱棣虽已就寝，仍然“急起召入”，具体汇报什么内容，并没有记载下来，但是说朱棣“疑始释”，说明关于朱棣心中最无法释怀的疑问得到了解答。综上可见，关于建文帝为僧出亡说较令人信服。

3. 下西洋说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所以，便有了建文帝出逃南洋的说法。然而，笔者认为，派郑和七次下西洋，只为寻找建文帝，此说法不通，且不说如此大阵仗出南洋耗费人力物力，即使建文帝在南洋，也早已打草惊蛇。笔者以为明成祖之所以有下南洋之举，或许夹杂着寻找建文帝的理由在内，但是这应该不是主要目的。从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朱棣登基后，对外交流的举措，或许，这与其本人长期驻扎边塞、与胡虏往来的经历有所关系，以至于他本人有这种与周边藩属国交流的意识，且其为篡位登基，既需要耀兵扬威展示其治理下的明朝富有强盛，也需要得到周边诸藩属国的认同。《明太宗实录》卷四三：“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于是，便有了大明朝的“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明成祖曾经给西洋各国诏书中记载：“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这表达了明成祖认为自

己身为天子，对于天下应广施大爱的世界观。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明成祖希望通过郑和下西洋将自己的治世之道播于天下，让天下人臣服于自己建立的明王朝。《明史》中记载，明成祖在晚年时已是“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副员之广，远迈汉唐”。可见，明朝的朝贡贸易在－. 定程度上达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政治目的。

4. 有僧归来说

关于建文帝为僧数十载，年近古稀后思归故土之说，在《明英宗实录》和《明史》中均有记载。明英宗正统五年，“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云；“我建文帝也。张天师言我四十年苦，今数满，宜还国。”谒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师。会官鞫之。其姓名为杨应祥，钧州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游两京、云、贵、以至广西。上命锢之锦衣卫而死。同谋僧十二人俱戍边。”（《明英宗实录》）

《明史・恭闵帝纪》载：“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明英宗时期的这位不知是叫杨应详还是叫杨行详的僧人，自称自己是建文帝，但是其年龄已 90 岁，与建文帝实际年龄不符合，后被锢之于锦衣卫处死，同谋的僧人十二人被发配戍边。笔者认为，此事件肯定并非杜撰，但是此僧人年事已高，90 岁的和尚是出于什么目的会去妄称自己是建文帝？实在匪夷所思。但是，此消息不胫而走，于是便有了之后关于建文帝为僧后归来的各种记载。

《明史纪事本末》载：“而帝适有南归之思，白其实，御史密以闻。阉吴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见亮，辄曰：“汝非吴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鹅，弃片肉于地，汝手执壶，据地狗个舌之，乃云非是耶？”亮服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视之，持其

踵，复哭不能仰视，退而自经。于是迎建文帝入西内，程济闻之，叹曰："今日方终臣职矣。"往云南焚庵，散其徒。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不仅《明史纪事本末》中详细记载了建文帝归来后与老太监吴亮的对质，就连明神宗时期的张居正也有了建文帝欲归骨故土的说法。

《万历野获编·列朝·建文君出亡》载："甲戌年（万历二年，1574）今上（明神宗朱翊钧）御日讲，问辅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张居正对曰："此事国史无考，但相传正统间，于云南邮壁题诗，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之句。一御史异而询之，自信建文帝，欲归骨故土。遂驿召入宫养之。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盖江陵（张居正）亦不曾记忆《英录》中有此事也。"

明末清初的查继佐所著《罪惟录》，列举了关于建文帝行踪的23种说法，其中否定了建文帝为僧出逃后再归来的说法。"正统五年，遂有僧自云南至广西，称建文天子，事泄，逮京师会审。供云："俗姓名杨行祥。"然则所為杨应能者，行祥所借也。行祥以洪武十七年度为僧，簿对确，毙狱，本末燎然。"

可见，杨行详假借"应详"之名妄称自己是建文帝的闹剧却有实事，连查继佐也怀疑其中的原因，"行详敢于冒引，实本前疑"，但是建文帝最终是否为僧归来，他也持否定态度。"或云葬西山，不封不树。何不考帝礼葬原处，与皇后合兆，为恪遵太宗初制之洽于礼？"所以，建文帝归来之说有待商榷。

（二）关于建文帝行踪诸说的几点思考

1. 建文帝行踪诸说产生于其不同的历史背景。《明实录》的修撰是为明成祖朱棣正名其继承大统的合理性服务的，所以，在明成祖至明神宗之间，关于建文帝的行踪不敢妄议。而《明史》是清王朝组织编修的，是为了其质疑明成祖朱棣一脉的明王朝的合理性服务的，在《明史》中常见其对建文帝的同情，认为明成祖朱棣是"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就能理解为何《明实录》与《明史》关于建文帝去向记载有所矛盾。在"靖

难之役”事件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阖宫自焚说，昭告了建文帝不知所踪，主动逊国，而明成祖朱棣顺理成章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至万历年间，政治环境稍有宽松，才产生了民间通过各种方式悼念建文忠臣，以建文帝各种出亡诸说来缅怀不知所踪的皇帝，也有官员提出修建文史、复建文年号，这便有了各种关于建文帝去向的说法。

2. 建文帝的出亡诸说都是建文帝出亡后的整个完整历史叙事中的一部分，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鉴于《明英宗实录》中的记载和明神宗时张居正所言，可见建文帝为僧出亡说更有可能性，至于到底出亡到何地，江苏、浙江、四川、贵州、云南、福建等地的地方志和野史中均可发现建文帝遁迹的记载，似乎每一处地点所提供的史料都有所可信度。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待，将建文帝出亡的各地绘制成一个踪迹图稿，似乎可以更鲜活地体现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将故事转变为史事，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无法缺失，都有其存在价值。

3. 从明朝到清朝关于建文帝的行踪诸说的演变是建文帝正统地位的逐步恢复的过程。“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为塑造自身统承明太祖的正统形像，隐去建文年号、建文帝谥庙和不修实录，“革除”了建文帝正统地位。随着明朝中期的政治环境松动，民间此消彼长的建文帝行踪开始逐步体现在野史中，直至明神宗为护纲常，恢复建文年号，部分恢复了建文帝正统地位。明朝后期至南明时期，先有官员以东林党与阉党对抗为契机，提出补建文谥庙、赠谥建文诸臣来彰显忠义，后有南明弘光帝为笼络人心、昭示正统修建文实录，都是为建文帝的正统地位逐步恢复奠定基础。直至清朝为宣誓清接明统，纂修《明史》，为建文帝追谥“恭闵惠皇帝”，完全恢复了建文帝的正统地位。这完整的恢复过程，是一个跨越明清两代的漫长过程，是在当朝朝廷与民间人士之间的不断互动中得以实现的。

（三）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建文帝踪迹的意义与价值

“靖难之役”至今已 600 年，朱棣一脉的明王朝尚对建文帝的去向始终是有闻必报，直至取而代之的清王朝，也对建文帝的去向孜孜不倦，那么，在现如今的新时代里，为什么还有如此高涨的热情，不遗余力地研究建文帝的行踪呢。不得不说，这是饶有志趣去探讨的，笔者认为，近百年来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空里，价值观、世界观并非 - 成不变，以至于不同时代里对事件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变迁，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当今时代下研究建文帝的行踪，不仅应在超越历史时空的环境中重新审视，更应悉知该项研究对于现当代环境的意义与价值。

1. 重新正视“尊尊”“亲亲”的周礼秩序当今时代，我们仍然研究建文帝的踪迹，有助于帮助当代年轻人重新正视“尊尊”“亲亲”的周礼秩序，有力抨击现如今的所谓的伪“民主与公正”下的无礼制秩序感的社会现像，唤醒人们心中的“忠孝节义”的道德价值观。

众所周知，“靖难之役”事变当时，明成祖朱棣以礼葬建文帝，但是并没有给予谥号。所谓盖棺定论，终明一朝，却没有给予建文帝一个名分， 而建文帝的谥号竟然是由取而代之的清王朝给予追认的，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也是对明成祖提倡的“尊尊”“亲亲”祖训的讽刺。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乾隆元年六月上》载：“辛未。命议谥明建文帝。谕。易名以谥。古之制也。自周公定位谥法。后世帝王。未有无谥者。明建文为太祖之嫡孙。继承大统。在位四年。固俨然天下共主矣。及成祖既立。有其天下。并去其年号。而史官所书，则仍称为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此国之所赖有信使也。然不系之以谥。而称曰建文皇帝。此俗称，非史。体也传之后世，殊为阙典。考之太祖有元之天下，而溢元主为顺帝我世祖章皇帝代明之天下，而谥明主为愍皇帝，虽更姓改物之君。尚且追谥，而无所嫌忌，况当其世者乎。弘治以来。如杨循吉诸人。屡以为请，迄寝不行。皆以后世子孙庴有

成祖之业。故不敢变乱旧章。而不虑其贻议来世也。我国家谥崇祯而不谥建文者，以明史未竣。非当时所急，今史书既成，若不及此追谥。良为遗憾。著大学士九卿会议。确拟具奏。候朕亲加以裁定。”

清王朝为明朝不知所踪的皇帝议谥，虽然有安抚天下、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但此举确实应为世人所赞叹。不仅体现清王朝的大度作为，也反讽了明成祖朱棣对于建文帝的不妥当处理。“尊尊”“亲亲”就是以忠君王与小宗服从大宗为基本原则出发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中，朱棣取代建文帝，此为篡位行为，是为世人所诟病的，连《明史》中亦予以批判，认为其“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所谓“以史为鉴”，历史就是明镜台，观历史事件，并非保守的复古，而是让今天的我们有所思考，对自身言行予以道德价值观的约束。

2. 超越历史时空的传统文化的迭新

我们既然将“靖难之役”放在了当时的历史时空中，并对其道德价值予以了正确的评判，不难发现，在现代研究建文帝的踪迹，对于当下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层出迭新的作用。固然，传统文化中有其封建旧制里腐朽落后的糟粕，但我们应该去粗取精，将超越历史时空下的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新的生命。例如，本着“清君侧”名义实为造反夺位的朱棣，对于建文帝的生母胞弟、亲生幼子的处置方式与其在《明实录》中塑造的只为擒奸臣的忠君爱国的形像是自相矛盾。

【故后无讳日】太后吕氏，故懿文太子追崇兴宗康皇帝之继配也。太子娶开平主常遇春女为妃，先薨，以太常卿吕本女为继。建文帝即位，追尊常氏为懿敬孝康皇后，吕为皇太后。及文皇兵入，召后至，告以不得已举兵之意，后出宫复故号为太子妃。…… 惟少子允熙，先封徐王，改封敷惠王，随母吕太妃居懿文陵园。永乐四年，火起于邸中暴卒，追谥哀简。盖以吕后生，不欲显诛之也。经吕后遂不知所终……然吕后竟无讳日可考，亦无谥号追赠。（《万历野获编・卷三》）

惠帝少子文圭。年二岁，成祖入，幽之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英宗复辟，怜庶人无罪久系，欲释之，左右或以为不可。帝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学士李贤赞曰："此尧、舜之心也。"遂请于太后，命内臣牛玉往出之。听居凤阳，婚娶出入使自便。与阍者二十人，婢妾十余人，给使令。文圭孩提被幽，至是年五十七矣。未几卒。（《明史·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六·诸王三》）

吕太后在靖难后，其太后名号被废黜，改称皇嫂懿文太子妃，随后又与幼子允熙被迁往明东陵为懿文太子朱标守陵。而后，幼子允熙在府邸被大火烧死，吕太后不知所踪，没有记录下死亡的时间，所谓"无讳日"，不禁令人感叹明成祖所谓"清君侧"以"法周公辅成王"之名，实属掩人耳目。建文帝长子朱文奎不知所踪，幼子朱文圭的命运更是令人唏嘘。靖难时，少子文圭年仅二岁，被软禁在广安宫，称为"建庶人"，一生被囚，不会说话，不辨牛马，不识男女，明英宗以尧舜之心将其释放，很快便去世。明史中的这两段记载尽显后世的同情怜惜之感。

仁爱精神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和价值。《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 在封建社会里的一国之君尚且言行都受儒家道德观的约束，后世可以予以评判，在当今法制社会里，我们更不能忘却道德约束体系的重要性，在法表儒里的社会里心怀仁爱之心，用爱人之心去对待他人，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3. 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机遇

600 年来，关于建文帝的踪迹始终是谜，永乐皇帝 -- 脉下的明王朝尚且无法证实的史事，清王朝时期说法越来越多，时至今日，可能是更加扑朔迷离，理不清且理还乱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待问题，当今关于建文帝的踪迹研究，结合了现代化的科学考古考证，用史书记载予以佐证，不仅仅具有历史研究的意义，又能将历史研究转化为文化现像研究，这对于地方文化的建设也是一种机遇。

近年来，关于建文帝最后的落处是众说纷纭，全国各地涌现了许多关于建文帝的遗迹。例如，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狮山上，有一座名为正续禅寺的寺庙。在寺庙的大柱子，上有一副楹联，上联是“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信然皇觉旧”，下联为“叔负侄侄不负叔，八百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于是，正续禅寺被认为是建文帝最后的落脚地，该禅寺所在的狮子山，也成为了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如，宁德霍童支提寺云锦袈裟的出现，以及在距离支提寺不远的上金贝古墓的发掘，认定了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而且，在对比和研究关于建文帝的史料，以及对于上金贝古墓的文物考证上，宁德市的地方文史工作者无疑比其他地方关于建文帝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更为领先。以上这些关于建文帝的踪迹的探究对于当地的文化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都应当予以肯定。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

万历皇帝对建文皇帝的平反

郭娇斌

摘要：本文用长时段考察建文皇帝平反的过程，并从中截取其一历史片段作为研究视角，着重探究万历皇帝为建文皇帝平反的原因，认为万历皇帝为建文皇帝平反既有万历皇帝个人原因，也有当时民间层面推动的结果。

关键词：万历皇帝建文皇帝

如果从布罗代尔的时间理论来看，发生在建文元年七月初五（1399 年 8 月 6 日）的靖难之役，是属于短时段的历史。因为在他看来，一场战役、一次政治家的会晤、一篇重要的演说或一封关系重大的信件，这些事件在历史上只是转瞬即逝，它们是一种短时段历史，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而这种短时段的

历史只有在长时段、中时段的基础上才有意义。这也是布罗代尔重视长时段史学作用的原因。所以布罗代尔认为现代史学家必须转移研究方向，改变研究方法，分析历史的深层。因为对于历史学来说，时间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可以琢磨的对像。所以年鉴学派将时间作为历史研究的背景、框架和工具，到最后把历史学和时间几乎等同起来。本文将通过考察对建文皇帝平反一事的长时段历史，着重探讨万历皇帝对建文皇帝平反的原因。

一

当今史学界对于建文皇帝靖难之役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孟森对于建文皇帝已死的说法深感怀疑：如果建文皇帝真的烧死了，明成祖又何必海内海外分途遍访。王崇武认为“然则所谓靖难事变者不仅关系朱氏叔侄之王位继承，抑且为一代制度之改革关键，固读史之人所不容忽视者也。”[1]P7 吴晗认为明成祖和建文皇帝之间的斗争归根究底就是保持还是改变明太祖所定的旧制度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建文皇帝失败了。明成祖做了皇帝以后，把建文皇帝改变了的一些东西又全部恢复过来。一直到明朝灭亡，二百多年都没有变动。以上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建文一事提供思路和线索。而对于靖难之役后建文皇帝下落不明亦是今日史学界、文化界一直关注的问题。

在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从自身利益出发，为自己正名，遂采取隐去建文年号的措施，以达到塑造自身正统形像的目的。朱棣在战后发动的政治整肃及一系列抹杀、扭曲前朝历史的行动，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更使建文朝相关议题在当时成为一种禁忌，困扰着身为成祖子孙的历代统治者及其臣民，也深刻影响了明代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的运作和发展。但是，明成祖以后的各个朝代对建文皇帝一事并不随之烟消云散，反之，建文一朝的话题从靖难之役后经历了明代始终，甚至入清后，常为时人谈起，这是一段长时段的历史。接下来分述之。

其实早在明仁宗时期，明仁宗就开始调整永乐时迫害建文忠臣的政策，为

落难或死亡的建文君臣进行部分平反。明仁宗生性端重沉静，言行适度，喜好读书，他接受了儒家学术的正规教育。因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父朱元璋的喜爱。“上（指洪熙帝）闻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家谪戍边者，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2]P131 虽如此，仁宗朝平反力度可以说是最小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仁宗在位只有短暂十个月，其次继任者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极力维护祖父靖难正当性，还亲自监督《明太宗实录》的修纂工作。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因此抹杀朱高炽开启建文冤狱平反的意义，它化解了大明帝国积存了许久的重重怨气和紧张政治气氛，将一个绝对政治高压的永乐时代转向平和的洪熙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培植了大明的元气，稳固了大明的根基。明仁宗时期调整永乐迫害政策的举动为明英宗朝奠定了基础。明英宗时期，或许由于明英宗经历被囚，感同身受，故欲释放建文皇帝之子朱文圭。“上复位之后，因思建庶人辈无辜淹禁将五六十年，意欲宽之。一日，谓贤曰：“亲亲之意，实所不忍。”贤即对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实临之，太祖在天之灵实略之，尧、舜心不过如此。”上遂决。即日白太后，许之？左右或以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左右闻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于凤阳造房屋。毕日，上召贤曰：“今可送去。”敕军卫有司供给柴米，一应器用悉令其完具，以安其生。听其婚娶，以续其后。自在出入，给与阍者二十人、婢妾十数人。遣太监牛玉入禁谕其意，建庶人闻之，且悲且喜，不意圣恩如此。”[3]P1118

到了万历年间，以万历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兴起了一股为建文皇帝平反的风潮，由此可以说明神宗为建文皇帝平反不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执行力度上都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万历朝初期掀起了革除建文罪臣的大规模赦免运动。如果从时间跨度上，建文朝诸忠烈被杀是十五世纪初，到万历平反时期，已是十六世纪末，将近两百年。但为什么在万历朝对建文一事更为关注并积极推行呢？是出于统治需要，还是万历皇帝本人的兴趣所在？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十月，万历皇帝突然对建文皇帝逃走之事产生了浓厚兴趣。

万历二年十月……戊午，上御文华殿讲读。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辅臣张居正对言；“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南数十秋之句。有一卿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担骨故国。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释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后莫知其所终。”上因命居正诵其诗之全章，慨然兴叹，又命书写进览。居正退而录其诗以进。因奏：“此亡国之事、 失位之辞，可为戒，不足观也。臣谨录《圣祖皇陵碑》及《抑制文集》进览，以见创业之艰难，圣谟之弘远。伏望皇上览而仰法焉。”[4]P728–729 从这段实录，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对于万历皇帝提起建文皇帝一事不是很满意，在呈上“流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的建文皇帝诗作后，认为此事不足为观，并采用忆苦思甜的方式来教育万历皇帝。张居正还将明太祖朱元璋搬出来，并借此教育学生。但是明神宗对此事却大发感慨，对建文朝的忠臣节士方孝孺等人产生了同情之心。因此发布了诏书，公开褒奖了建文朝忠臣节士的忠义，要求全国各地的官员查清出建文忠臣的出生地，为他们建造忠节祠以表纪念，同时提出要祭祀朱允蚊以及建文朝故去的大臣；“革除间被罪诸臣， 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无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我成祖文皇帝当时‘亦有练子宁若在，朕犹当用之’之语。是诸臣罪虽不赦，心实可原。联今仰遵我圣祖遗意，褒表忠魂，激励臣节，诏书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诸臣生长乡邑，或特为建祠，或即附本处名贤忠节祠，岁时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倪有存者，厚加恤录。”[5]P35 当朝廷褒表建文死难忠臣诏书下来，地方官员积极响应皇帝旨意。明神宗下诏豁免革除诸臣亲属、外亲，“革除被罪诸臣，除齐泰、黄子澄外，其方孝孺等连及罪累者，俱令查勘豁免。但明神宗仍认为革除诸臣有罪，豁免的范围也不包括齐泰、黄子澄的外亲。因为齐泰、黄子澄是建文皇帝削藩的主要谋划者，就把齐泰、黄子澄排除在外。”[6]P35 在皇帝的命令下，全国开展了调查、赦免建文诸臣亲属、外亲的运动。到万历

十三年 1585 年 3 月，共释方孝孺等亲属、外亲 1403 人，“释革除年坐忠臣方孝孺等谪戍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7]P2927

从释放的区域上看，这 1403 人主要集中在明朝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区域，还不包括其他经济较为落后地区，所以这应该不是一个确切人数。由此我们也能推测实质上建文朝牵扯到的官员人数远非此数。后万历皇帝又再次下旨，宣布对建文忠臣的家属及后代实行“推恩”政策，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得以享受祖上“福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万历皇帝积极推动建文平反之事。万历十六年（1588 年）二月，国子监司业王祖嫡又一次上疏，“奏：“修缺典，以隆继述，谓建文之革除未复，景泰之附录未正也。”[8]P3673 打着 “修缺典，隆继述”的旗号，请复建文年号、修建文实录。从五个方面论证“建文纪年之不可泯”，“曰：臣之疑革除何也？高皇帝艰难百战，奄有天下，契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经也。文皇帝际时艰危，兴兵靖难，契神器而完之，高庙济变之微权也。钟虡不移，人代顿没，此何说也。臣窃谓建文纪年之不可泯者五；自古无道人君，天人共弃，闻革其命矣，不闻革其年。行师日靖难，明非复仇，胡为追薄海内外已奉之正朔而去之，不可一；靖难宣力诸臣妄希茅，日构建文之过，本非成祖之，事平固已幡然感语，故鄗子实独无封事，谕吏部；可念旧恶，榜条方列，旋即除毁，革除之议起于六月庚午，命府部建文条格悉复旧制，今年称王十五年而已，然皆一时奉迎之臣从谀为此，后世不察，遂谓成祖独断，归过君父，使亲亲之心不白，不可二；或谓成祖定鼎，功同再造，如复革除则师疑无名。夫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视成祖、建文，同一子孙也。今日之亲二祖，同-祖宗也。不革除谓不能仰体成祖之心，必革除其为仰体成祖之乎？书靖难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纪建文在位之实，何悖之有？矧成祖谟烈昭垂，岂以革除显不革除晦乎？不可三；国史、野史上下并传世，往往信野史而疑国史，若谓国史多讳，不若求之野史。夫年既革除，事必散佚，今纪建文者无虑数十家，谬芜相承，至有不忍读者，逞其雌，黄遂淆朱紫，岂细故也哉？不可

四；革除者，不过使天下后世不复知有建文耳，而千万世之后，宁能以建文之实历为洪武之虚年乎？大书特书，固将不免与其纪年，立史与千万祀之后，孰为今日之为地乎？不可五。”[9]P3673-3678 王祖嫡这份奏章喊出了无数个正直之人的心声；恢复建文纪年和建文皇帝号，补修建文朝历史。而此时26岁的万历皇帝，却有些犹豫，毕竟为建文皇帝正名的同时也是否定自己的皇位正统性。到了万历二十三年，后礼科给事中杨天民再次给万历皇帝上书，再次要求恢复建文年号，又有一批人上奏表示附议赞同。这次万历皇帝有些让步了，同时基于护纲常，利统治的需要。他正式下诏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同意恢复建文年号，但同时要求编写国史时，将建文朝的事迹附在朱元璋之后，未能为其单独立个本纪。一直到了南明时期，建文皇帝的庙号才最终被确定下来。所以终万历一朝，我们看到万历皇帝对于建文皇帝的平反热情，似乎在万历十六年始懈怠，虽然臣子们热衷于补建文皇帝谥号、庙号与祀典。而此时的明神宗似乎已经开始淡漠此事。因为恢复建文年号，补建文皇帝谥庙与祀典，也就意味着恢复建文皇帝的正统地位，进而否定成祖 -- 脉的正统性，但从长时段历史角度看，万历皇帝对于建文皇帝的平反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万历之后，到了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廷统治力量逐步削弱，宦官操纵朝政，东林党产生强大的舆论导向，许多为官正直的官员以忠义自许，与建文诸臣忠义产生共鸣。直至南明，陆续又有官员继续请修建文实录、补建文皇帝溢庙与祀典。明亡后，清军入关，很多清朝的史家，如明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皆俗称建文皇帝或建文皇帝。至于建文皇帝的谥号，则一直到了清朝乾隆时期才正式定下来，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简称惠帝。至此完全恢复建文皇帝正统地位。

二

经明英宗、明仁宗两朝的积累，到了万历年间，万历皇帝进一步扩大对建文皇帝及诸臣平反的规模。这是明朝廷的自上所为，特别是皇帝本人的推动。

除此之外，实际上也与当时民间社会的推动有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建文皇帝一事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兴趣，时时涌现关于建文皇帝的传说故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悼念建文忠臣，除了追思，也对建文皇帝下落展开想像，并纷纷著书。如祝允明的《野记》、王鏊的《震泽纪闻》。另外也有一批关于建文朝的大臣在靖难之役后，忠于故主，不仕新朝的事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许相卿《革朝志》、黄佐《革除遗事》、王诏《忠贤奇秘录》等。到了万历时期，有关建文故事的文本就更多了，尤其是大部头的汇总性的文本不断刊布。比如嘉兴人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张朝瑞的《表忠纪》，吴江人朱鹭的《建文书法儗》等。这些都使建文传说演绎到了一个顶峰，也说明当时对建文话题的热衷。

万历年间，明神宗为方孝孺平反后，汤显祖称方孝孺为“天地正气”，并且为方孝孺修墓，立碑，还建祠。“万历十七年（1589），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汪应蛟寻访方孝孺葬处，与时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汤显祖等人立碑为示，供后人凭吊、借鉴。其作记说明缘由；先生死南门外，其葬所竟无人识者，余甚慨焉。因遍询诸土人，数月得二、三黄发为言；“先生死，戚友多蒙难，无为主者。土人或以瓮收遗骨，窃葬于聚宝山之侧，在今永宁寺后。”余惧其久且湮没无传也，因为立石其上，并志岁月于碑阴，俾后有考古君子，得览镜焉。”[10]

关于建文皇帝的传说越来越多，显然与明中期政治环境日益宽松、市民文学的兴起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民间期盼建文忠臣事迹能够永久流传的心情。他们对相关史事的关切，或许亦是促使其投入考察的动力，或通过文字的书写或通过立碑建祠，从中似乎可以管窥到当时万历朝自上而小欲为建文皇帝和建文诸臣争取历史地位与公正评论的氛围，同时也隐含着宣扬忠义、教化地方社会的目的。

三

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家只有借助于长时段的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考察建文皇帝及建文忠臣平反一事，可以为我

们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前辈史学家孟森、胡适、王崇武、吴晗都谈及过这一问题。本文通过考察明成祖以后的部分皇帝对建文皇帝及忠臣平反的过程，看到建文一事经历了永乐时期严禁，英宗、仁宗时期的解禁，万历时期的大规模推进，让我们认识到为建文皇帝平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本人，当然也是因为看到民间的积极所为。对于此种现像，不禁令人思考这是否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有很大关系？《论语·子路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其次，这是否也是受中国自古以来的“天命信仰”的影响。西汉董仲舒认为君权神授，提出“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理论。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从明中后期开始，明朝政治每况愈下，宦官参政，妨碍阁权，甚至控制内阁，导致政治日益黑暗，这不能不让当时民众怀疑这是否与皇位非正统性有很大关系。民间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不满呢？他们追根溯源，通过对建文帝的怀念来表达，并将此付诸文本，使其“复活”于新的社会环境之中。

参考文献：

[1] 王崇武 . 明靖难史事考证稿 [M]. 商务印书馆 .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

[2] 明仁宗实录 [M]. 卷 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 .

[3] 李贤 . 天顺日录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 .

[4][7] [8][9] 明神宗实录 [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 .

[5][6] 李见喜 . 明建文皇帝正统地位恢复研究 [J].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10] 何幸真 . 记忆之地；晚明士人对南京靖难历史纪念地标的营造（1573-1644）[J] . 第十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建文皇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明代的建文问题——从南明政权的几篇诏疏说起

蔡少辉

摘要：自靖难以后，恢复建文君臣地位的呼声便开始产生，到了弘光隆武两朝时，这一重大的政治禁忌最终得到解决。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由文人士大夫累代的努力达成的。本文以南明弘光隆武两朝君臣的奏疏为切入点，分析其中反映的明代历朝君臣对建文问题的态度。

关键词：建文问题；南明；政治禁忌；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崇祯于自缢煤山。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立为监国，旋于南京即帝位，改次年为弘光，是为南明弘光政权。抵达南京后，弘光帝首谒孝陵，祭告祖宗。礼毕，“即问懿文太子陵园，驻瞻良久”[①]，诸臣莫不额手称庆。弘光此举开创了靖难已降两百余年间皇帝亲谒懿文太子陵寝的先例，也唤起了士大夫意图恢复建文帝地位的希望。

六月，太仆寺少卿万元吉上疏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并还懿文追尊故号、谥靖难诸臣。疏曰：

臣闻惟圣达孝，补先人之遗事，始称丕承；群臣协忠，录已往之幽芳，政为作则。仰惟我，皇上大公为怀，善继人志，前者恭谒孝陵，审视几筵，俨对羹墙，徐问懿文园林所在，亲为展拜。臣随诸臣后，莫不手额。斯举实为三百年来未有之盛事也。先臣杨守陈尝议修《建文实录》，有云：“国可废，史不可废。”卓哉两语，可称要言不烦。弘治中，布衣缪恭伏阙上书，请复建文时故号，爵其后裔奉祀。时系恭狱，以闻于上，敬皇帝诏勿罪。夫灭曲直不载，

① （明）文震亨：《福王登极实录》，载（明）冯梦龙编：《甲申纪事》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不若直陈往事，而示之以无可增加也；削庙号不隆，不若引景帝故事，还懿文当日追尊故号，祀之寝园而配以建文君也。二事并系大典，惟我皇上运际中兴，卓识旷怀，同符开辟，伏乞敕下廷臣，广集众议；建文实录作何开局纂修，懿文故号祀典作何厘正？若此举告成，在天列宗之灵，必加阴隅，千秋万世之下，传为美谈，孝莫大焉。抑臣更有请者。靖难死事诸臣，历蒙恩诏褒录，乃谥荫诸典，尚缺有待。羡逊国之君臣何厚，愧此时之节义多亏。良由高皇帝开天立极，首褒余阙而斥危素，风励备至。靖难以后，正气渐就损削，故酿今日狯猾卖国之徒，屈膝拜伪、腼颜见人也。请将靖难死事诸臣，及北京各直省殉难诸臣，敕下诸司，细加采录，酌与谥荫庙祀。[①]

疏文称弘光帝谒孝陵并懿文太子陵实乃“三百年未有之盛事”，而成此盛事之前提系“我皇上大公为怀，善继人志”。又称“惟圣达孝，补先人之遗事，始称丕承。”[②] 前后两番言论一方面阿谀了 皇帝，另一方面也强加道德枷锁于弘光身上，使得“补先人之遗事”成为弘光帝即位之初的首要任务。

弘光帝同意了万元吉的请求。七月初三，弘光帝先后颁布多封追谥诏书；追福先王等谥号、定崇祯帝后谥号、复懿文太子帝后谥号、定建文帝后谥号，并改景泰帝后谥号。

《恭上福先王等尊谥并开示覃恩事宜》诏曰：

顾一本懿亲，既尊隆于敢上；布先朝遗典，岂无待于后人！因思建文君嗣统四年、景皇帝御宇七载，既已君临有日，岂容庙号独遗！敬礼祖宗之心，复正杰尝之位。除另有诏谕颁行外，所有覃恩合行事宜，开示于后：一、建文年号，至今未复；朕甚恻焉！其令史臣填补《实录》，仍议追上皇帝谥号及皇帝谥号如礼。景皇帝庙号尚虚、累朝未有议及者，典礼阙然；其速会拟追上景庙

① （清）李天根著；仓修良，魏德良校点：《爝火录》卷 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31–232 页。
② （清）李天根著；仓修良，魏德良校点：《爝火录》卷 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31 页。

谥号及皇后谥号如礼。一、追谥靖难忠臣方孝孺等，仍录其子孙，酌与优恤。[1]

又，《上建文景帝谥诏》曰：

孝莫大于成先志，礼莫大于顺人心。故列圣旧章虽非后人所能变，而累朝缺典实惟继体之善承。恭惟我懿文皇太子，开国元良，高皇冢嗣，夙着朝三之孝，未终与九之龄；建文君温文成性，恺悌因心，位仅正于四年，德实隆乎三让……溯三朝之令，猷皆百王之圣轨，惟奕世拘牵乎祖制，遂徽称久废乎宗枋。然建文崩逝之年，成祖业命葬以天子之礼……屡议追崇，累代因循未果。今历年滋久，寰宇之歌思愈深，而显号弗彰，祖宗之怨恫奚慰？特于七月初三日祇告天地、宗庙、社稷，上懿文皇太子尊谥曰“兴宗孝康皇帝”，懿文太子妃号谥曰“孝康皇后”；恭上建文君尊谥曰“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觐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庙号“惠宗”，建文后号谥曰“孝愍温贞哲睿肃烈襄天弼圣让皇后”……其革除死事诸臣精忠贯日，苦节可风，分别轻重，并与恤谥。于戏！旷仪既举，先德斯昭。三百年郁勃之人心，从兹丕畅；十五朝未竟之遗志，自此发皇。敢言继述之光，益显祖宗之大。布告天下，咸使闻知。[2]

弘光帝明白追崇懿文太子、建文帝、景泰帝等人虽属“成先志”“顺人心”之举，但在“奕世拘牵乎祖制”的明代，此等变列圣旧章行为并非易事。于是，他标榜自已所作既响应了黎庶之歌思，又宽慰了祖宗之怨恫，将自己包装成笃孝循礼的圣人，进而为追崇三人争取道德支持。同时，他也援引成祖、英宗、仁宗、宪宗等人优待建文、景泰之先例，称自己所作为“善承”，在表明自己继承正统的同时，也公开表露了朝廷对建文帝、靖难之变的态度。

末了，诏书言及靖难死事诸臣优恤问题，以期收拾人心、鼓舞士气。然，追谥诸臣一事却因“人远事湮”，未能及时开展。后，工科都给事中李清、礼科都给事中沈胤培、礼部侍郎管绍宁相继题请。七月丙申，弘光命“速议开国、

① 《南明安宗诏：恭上福先王等尊谥并开示覃恩事宜》，杨亮功等主编：《琉球历代宝案选录》，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75 年，第 79—80 页。
② （明）管绍宁著：《赐诚堂文集》卷 10《代言·上建文景帝诏》，《四库未收书辑刊》6 辑 2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222—223 页。

靖难及正德、天启惨死诸臣谥。”[①]九月庚子，追谥建文诸臣，并于南京立庙祭祀。此间，夺胡广谥、予陈瑛恶谥。[②]此后，又多有诸臣请求、朝廷追谥之举。[③]十一月，追赠建文亲属：允熥为吴悼王、允熞为衡愍王、允火熙为徐哀王、文奎为恭愍太子、文圭为原怀王。[④]因追谥过滥，朝廷于当年十二月庚申停止了赠谥行为。当时有请复建文年号者，弘光亦允之。自此，建文朝历史得到明廷确认。弘光元年二月甲子，命修建文、崇祯两朝实录。[⑤]三月乙巳，因太庙未建，奉先殿又不设位，于是祭惠宗、孝愍皇后及太子于宗陵。[⑥]这是靖难之役两百余年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祭祀建文帝。五月，南京陷落，弘光政权覆灭。同年，朱聿键于福州登基，建立南明隆武政权。次年二月，隆武帝认为靖难之变导致明朝国祚渐衰，下命礼臣追复建文年号，并建方孝孺祠，于阶下设姚广孝跪像。[⑦]可惜，此举并未能挽救隆武岌岌可危的政权。八月，隆武政权覆亡。随后，朱明江山渐失，南明政权再无力挽狂澜的能力和决心，褒建文君臣以砺士气收人心的行为便不曾再提过。

纵观弘光、隆武两朝，君臣为了确认政权的正统性、表明自己正统之主的身份，在追复建文年号、追谥建文君臣等承认建文朝历史的行为上做了不少努力。这些努力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也是他们对这段历史抱持的态度。经由这些举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朱明历朝君臣对靖难一事态度的演变。

---

① 见《南明安宗诏：恭上懿文太子及建文帝等尊谥》,《琉球历代宝案选录》,杨亮功等主编:《琉球历代宝案选录》，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75 年，第 83-84 页；（明）李清撰；黄俶成点校；孟照庚、李昌宪复校：《南渡录》卷 2，《南明史料（八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66-167 页。以上诸书文字略有不同。

② （明）李清撰；黄俶成点校；孟照庚、李昌宪复校：《南渡录》卷 2，《南明史料（八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94 页。

③ （明）李清撰；黄俶成点校；孟照庚、李昌宪复校：《南渡录》卷 2，《南明史料（八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47—249 页。

④ （明）管绍宁：《赐诚堂文集》卷 8《奏疏：开国、靖难诸臣应予应夺谥号疏》，《四库未收书辑刊》6 辑 2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210-212 页

⑤ （明）李清撰；黄俶成点校；孟照庚、李昌宪复校：《南渡录》卷 3，《南明史料（八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73 页。

⑥ （明）李清撰；黄俶成点校；孟照庚、李昌宪复校：《南渡录》卷 5，《南明史料（八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346 页。

⑦ （明）李清撰；黄俶成点校；孟照庚、李昌宪复校：《南渡录》卷 6，《南明史料（八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384 页。

(一)从“靖难革除”到“靖难是而革除过”

南明政权恢复建文帝号、追谥建文君臣亲属谥号等行为，标志着明廷正式解除了延续二三百年的政治禁忌。明代历朝解除建文禁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成祖靖难即位后，展开了一系列合法化政权的举动，焚毁建文史料，篡改《太祖实录》，丑诋建文君臣，并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元年至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太宗去世后，对建文朝君臣的态度，有所放松。仁宗即位后，放归部分建文臣子遗族。仁宣期间，政治氛围有所缓解，原本严禁的建文朝臣诗文重见天日，甚至出现了纪念活动。天顺年间，英宗再次上台后下令释放建文帝之子与兄弟遗属，又将官方的宽宥范围扩及建文帝本人的亲族。这对后世要求修建文实录、恢复建文年号和建文君臣名分的舆论，以及私人修建文朝史的努力，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①]弘治初，詹事杨守陈在史馆曾尝试奏请修建文朝史，其言；“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及今采辑，尚可补国史之缺。”后以病不果。[②]此后，士人和民间开始私自修纂建文史。[③]因了上述书籍的出现，民间对建文君臣的正面记忆逐步上升，万历年间的士人开始客观地评论靖难和建文朝。

朱鹭认为建文主要过错是变祖法、削亲藩，前朝史书将建文惠政删去“是小乃大伤高皇帝传位之明，而俾建文抱冤诟千载下莫昭雪也”[④]，进而提出了“靖难是而革除过”的看法。他认为革除之过主要有二，一是革除建文年号有悖史学传统。“古未有君天下而不得称年者。”成祖革除建文年号，代以洪武

① (清)李天根著;仓修良，魏德良校点:《爝火录》卷1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4页。
② 牛建强:《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反正过程——以明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为视角《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第33页。
③ (明)何乔新:《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谥文懿杨公守陈墓志铭》，载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6，《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
④ 牛建强:《明代中后期建文朝史籍纂修考述》，《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41—45页。

续年，是“孙蒙祖号，死乱生年，失无大于此者”。而且君天下者皆有纪年，即使暴虐无德如桀、纣这样的易代亡国之君都有纪年，是以位可革而年不可革。[1]二是革除妨害了靖难合法性。靖难起于建文君臣改祖制、削亲藩的不孝不亲之行，靖难成功后成祖革除建文年号，追废建文天子之位，这一行为“是异姓仇雠相克之所为，而安在其为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难也？”[2]

朝中大臣也意识到革除之事的不妥之处，提出了“文皇帝本心”说，即革除建文年号并非成祖本意，而是受殉难诸臣抗争过于激烈和靖难诸臣怂恿所致。钦叔阳即认为成祖顺天靖难，而殉国诸臣却矢死抗之，殉难愈是节烈愈加深成祖的疑虑和愤怒，是以“至于革除纪年，亦势或激之”。[3]焦站也认为，“唯是诸臣殉义过激，至于严谴，有革除年号议，要非成祖本心”。[4]进而将革除之罪归于永乐朝臣，“是时靖难诸臣必有挟浅薄之见、肆残刻之说以从臾其间者”，而“革除之举必非文皇意，即有之，必遗恨于在天之灵耳。”[5]

当士人们意识到革除为过后，士大夫越发致力于褒扬建文殉臣、恢复建文地位。万历二十三年，礼科给事中杨天明、御史牛应元先后上疏奏请恢复建文年号。万历皇帝最终同意在新修国史中保留建文年号，附建文事迹于太祖本纪之末。万历末期，神宗对恢复建文地位之事不再上心。天启以后虽有旌表建文殉臣之举，但多属万历朝措施的延伸。到了南明，弘光隆武两朝才真正恢复了建文地位，使建文君臣彻底摆脱政治禁忌。

虽然南明恢复了建文地位，但从《上建文景帝谥诏》及褒崇方孝孺等措施仍然可以看出此时君臣对建文的态度仍属暧昧，他们将追复建文视为成祖遗泽，

---

① （明）朱鹭：《建文书法儗本引》，载氏著《建文书法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页。

② （明）朱鹭：《建文书法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③ （明）朱鹭：《建文书法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④ （明）钦叔阳：《序》，载（明）朱鹭：《建文书法假》，《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页。

⑤ （明）焦站：《序》，载（明）朱鹭：《建文书法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弘光隆武所作仅是克绍箕裘。又将革除之过归结于永乐朝臣，称此非成祖本心。这种“靖难是而革除过”的态度默认靖难无过，其本源仍是为了维护成祖统治的正统性。在此前提下，明廷所作恢复建文君臣名分的举动，都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做出的让步，而非真正解决矛盾。

（二）建文逊国之说

在《上建文景帝谥诏》中，弘光朝君臣称建文“位仅四年，德实隆乎三让”，于是定建文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覲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所谓“三让”即泰伯三让王位之事，孔子曾称此为“至德”。此处称建文为“让皇帝”，言其逊国行为堪与泰伯之德相颉颃，目的在于弥合建文与成祖的本属对立关系，美化成祖皇位的正统性。

关于建文之死，《奉天靖难记》《太宗实录》都书称其自焚于宫中，如《奉天靖难记》载：“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来朝，允蚊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使数人而已。乃叹曰：‘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上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死矣。出其尸于火中，上叹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①]成祖即位后，修改《太祖实录》、烧毁建文朝史料，在建构维护自身政权叙事的同时，也消除人们脑海中与建文朝相关记忆，使得民间对此事的认识

然而，上述诸说皆是野史传说，早期的官方记载并未有此说法。朱棣的诏书记载：“侄允坟以幼冲之资嗣守大业，秉心不孝，更改宪章，戕害诸王，放黜师保，崇信奸回，大兴土木，天变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惧，灾延承天而文其过，煌飞蔽天而不修德，益乃委政宦官，淫泆无度……朕惟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训；朝无政臣，内有奸恶，王得兴兵讨之。朕遵奉条章，举兵以清君侧之恶，盖出于不得已也……联于是驻师畿甸，索其奸回，希周公辅成王之谊，

① （明）朱鹭：《建文书法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0—81页。

而乃不究朕怀，阖宫自焚，以自绝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①]在成祖诏书中，建文是一个荒淫失德的昏君，而成祖则以太祖嫡长子、皇明祖训为由奉天靖难，清君侧之恶，合理化兴兵靖难的动机。可以看出，成祖为了夺取皇位，对建文形像大加诋毁，进而美化自己，将自己塑造成天命所归的正统王位继承人。这样的描述在《奉天靖难记》《太宗实录》中屡见不鲜。正是有了这些言辞，才使得永乐取而代之成为必然。因而此时官方的言论，并未有建文逊国而去的说法。

但民间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传说在此之后却喷薄而出，更因正统年间爆发的杨行祥假冒案而进一步深入人心。正德年间便出现了建文逊国之说。黄佐《革除遗事》首次提到建文"以逊去"，开启了逊国说的先河[②]，而后《革朝志》载有"帝逊""帝逊亡"的字眼，郑晓更著有《建文逊国记》《逊国臣记》，表明逊国之说被广泛接纳。逊国之说的主要核心是建文帝自知不如朱棣，金川门破后趁火逃离，让位于朱棣。如《革除遗事》记载："建文君之生也顶颅颇偏，高皇帝知其必不终。尝匣以髠缁之具，戒之曰：'必婴大难，乃发。'至此是遂为僧，以逊去。[③]该传说以太宗知建文必不得终为核心观点，为逊国说埋下伏笔。又朱鹭《建文书法儗》载建文立太子一事，称："群臣请立太子，诏曰：'有天下者共天下，朕功未报于先王，泽未加于百姓，而急于立嗣，嗣必以子是重，朕不德也，其勿言！'又请曰：'立嗣必子，所由来久矣，早慰天下望，幸甚。'诏曰：'尧舜夏禹皆黄帝之后，更相授受，本出一家，其事可万世通行者。朕诸叔济济多贤，实秉德以陪。朕诸母弟，具有淳德，克襄理道。傥数年之后，幸而神人和谐，朕于诸叔诸弟中择其出类者嗣位，庶于宫天下之中，不失家天下之意，着为例，世世守之。'"[④]由是观之，民间进一步

① 王宗武：《奉天靖难记注》卷4，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208页。
② 吴德义：《明代建文史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4页。
③ （明）黄佐：《革除遗事》卷1《君纪》，载（明）袁袠编：《金声玉振集》甲部，明嘉靖袁氏嘉趣堂刊本。
④ （明）朱鹭：《建文书法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发展了建文逊国的故事，将之塑造成为明君。

逊国之说与早期官方言辞有着极大不同，逊国之说将不再丑诋建文，而是将他塑造成一个不得善终的可怜人或是有自知之明的贤人。经由史官们的春秋笔法，建文帝的逊国成为成祖政权合法性的托词。[①]另一方面，从诋毁建文到为之塑造正面形像，进而生成“建文逊国”的说法，此间的转变亦与明廷意图借此说调和成祖和建文的关系；“无逊国之说调和，则若非成祖有篡位之嫌，即是建文愚弱、错信近臣。逊国之说一出，则成祖与建文种种可能的过失疵议尽去，道德人格高度遽升，成为一禅让美事中的两大主角。此说让成祖与建文在重构的历史想像中，各取得一个正当而互不冲突的位置。”“建文逊国之说免除了成祖篡位之嫌，建文意在逊国，出亡流离道途，最后得全身而归，则更是国朝之幸，两全之事。”[②]

到了南明，弘光朝君臣追谥建文为“让皇帝”，不仅是逊国之说根深蒂固，更有作为成祖后人的弘光帝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做出的政治考量。

（三）靖难与国家元气

万元吉上弘光帝的疏文中将社会风气之萎靡不振归结为永乐朝的整肃：“羡逊国之君臣何厚，愧此时之节义多亏。良由高皇帝开天立极，首褒余阙而斥危素，风励备至。靖难以后，正气渐就损削，故酿今日猃猾卖国之徒，屈膝拜伪、腼颜见人也。”这种观点早在万历年间便已出现。如万历二年（1574）严从简曾言：“建文时节义之士接踵，视死如归。至正统、景泰间，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难，未闻皎然死节如所谓南朝李侍郎者，岂亦建文末年摧抑太过，而士气不无少措邪！”[③]刘宗周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月所上《修正学以淑人心

① 毛佩琦：《序》，载何劲歌著：《建文帝之谜》，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② 刘琼云：《帝王还魂：明代建文帝流亡叙事的衍异》，《新史学》，2012年第4期，第78–79页。
③ （明）严从简撰，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77页。

以培国家元气疏》，亦将明代节义之衰归之靖难：“至正统之世，上下恬熙，号称治平。然识者以为经筵徒侈文具，国家未必无意外之事。未几，果有‘土木之变’。当是时，距文庙不数史年。揆厥所由，‘靖难之役’一籍奸党，而贤人、君子诛夷略尽；三杨徒以容悦，养成王振之乱。”① 明末，孙奇逢亦言：“忆逊国时，文皇以叔代侄，势成于相激，而一时靖节之臣，死者死，遁者遁，不下数百人。逆闯犯顺，至尊龙驭，祸惨于黄巢，而殉义之臣不及逊国一二，岂前此尽忠良，而后此尽顽冥与？盖有所以作之也。”② 甚至民间相传，建文君臣未得到公允对待，积怨从生而祸乱人间；有传李自成为建文后人，崇祯失国乃建文复仇也。有传齐泰、黄子澄“积怨已久，一朝下降，不为巨寇，必为叛臣”，甲申之变皆建文故忠所为。③

谈及土木之变、甲申之变时，明代士人常将国家气运不振归结为靖难整肃过厉，这种行为一方面转移了矛盾， 将问题归咎于过往，美化当权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成祖整肃建文君臣时手段过厉的事实，表达他们的痛心之余也渴望建文君臣得还以公道，以期重振士风，进而挽救社会危机。弘光即位后，万元吉便请速褒靖难死事诸臣及甲申之变殉节臣子，“以作忠义之气”。而弘光的追逸诏书亦言直言褒崇靖难死节之臣可使三百年郁勃之人心得以通畅，“其革除死事诸臣精忠贯日，苦节可风，分别轻重，并与恤谥。于戏！旷仪既举，先德斯昭。三百年郁勃之人心，从兹丕畅；十五朝未竟之遗志，自此发皇。”

除此之外，将士风不振归结为靖难所致亦暴露了他们对明初政局的想像。孙奇逢、万元吉等人将靖难臣子之忠贞节气视为洪武留给后世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朝养士非不厚，革除之际，忠臣义士， 一时之盛，足见我太祖培育人才之恩德”④ 等言论无不反映了这种观点。事实上，洪武朝整饬吏治的规定、手

---

① （明）刘宗周著，吴光主编，丁晓强点校，钟彩钧，陈永革审校：《刘宗周全集》第4册《文编一·奏疏一》，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5-16页。

② （清）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4《大难录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③ （明） 李清撰，顾思点校：《三垣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第245页。

④ （明） 懒道人：《剿闯小史》，转引自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第40页。

段层出不穷。以明初四大案为契机，朱元璋诛杀了数万人。胡蓝之狱更铲除了不少文臣武将，造成靖难之时朝中无人可用，不得不起用老将耿炳文。因而所谓“况值国运初开，未经斫丧”等语皆是虚妄，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这种想像自有其土壤；成祖整肃过厉，招致社会反感。时人则因建文逊国，美化其人其事，将之奉为神圣。顾起元记父老之言，称：“建文四年之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罪，家给人足，外户不阖……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①] 由此可见，后人对靖难前的太平盛世的怀念，尽管这种怀念和想像过于夸张。

更为重要的是，强调靖难削弱国家元气的说辞大多与褒崇靖难死节臣子的请求同时出现，时人希望还建文君臣公道以复国家元气，提振士风，进而挽救社会危机。偏安一隅、急于正名的隆武朝建靖难谋臣姚广孝像跪于方孝孺祠之前的荒唐举动也正是基于此目的。

只不过，一味地将国家元气衰败归结为靖难，并要求褒崇靖难死节诸臣以励士风，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弘光、隆武两朝追复建文朝君臣名分成为了朱明政权最后的微光。

结论

经过明廷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建文君臣的历史地位在弘光隆武两朝时得到恢复。但从弘光追复建文君臣的诏书以及此前历朝褒崇建文殉臣的举动可以看出：这都是明廷以维护统治合法性为出发点而采取的政治措施，并没有直视问题所在——就靖难正义性进行讨论。最终，这一问题只能留待异族统治的清王朝进行定论。[②]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① （明）顾起元撰，孔一校点：《客座赘语》卷1《革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② 参见闫瑞：《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63-171页。

明代私人著述中的建文帝去向蠡测

张金林

（一）引言

明建文元年（1399），明太祖第四子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篡夺帝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激战，朱棣终于在建文四年（1402）攻入南京，推翻了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统治，成功夺得帝位，建立自己的统治，并于次年改元永乐。朱棣夺得帝位之后并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动乱，社会形势总体上仍然较为稳定，然而在一片“形势大好”之外，始终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这就是建文帝的结局问题。明初建文帝的下落因而也成为明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谜案之一。

作为被叔父推翻的当朝皇帝，建文帝的去向在当时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后世也成为人们重要的谈资。在日积月累的论说之下，有关建文帝的记述、传说、民间故事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而在建文帝的所有论说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无疑是其在“靖难之役”后的下落问题。自明代至今，无数人对此进行了讲述，近代以来历史学界亦对此有所研究，[①]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公认可靠的结论。应该说，“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去向仍然是一大谜案。因此，本文将依据明代私人文集、笔记、野史中有关建文帝和“靖难之役”的书写，再次考索“靖难之役”之后建文帝的去向。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可靠的关于建文帝的直接记载，本文的工作只是推测性质的。

---

①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吴德义：《明 成祖遣臣寻找建文帝下落诸说之由来》，《史学月刊》2010 年第 5 期；全伟：《明建文帝去向的历史语境研究》，《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丁修真：《士人交往、地方家族与建文传说—以 < 致身录 > 的出现为中心》，《史林》2011 年第 3 期；胡丹：《“神奇其说”：建文传说的神秘性探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等等。

（二）永乐朝官方对建文朝史事的书写

朱棣是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的，其得位之不正几乎是当时人人皆知而不敢言的事实。因此成功篡夺帝位之后，为树立自己的权威，粉饰其夺位之合法性，巩固其新夺之帝位，朱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迁都北京，清洗洪武朝和建文朝旧臣，严厉镇压反对派，等等。而在建文朝史事的书写方面，朱棣也是不遗余力，想尽一切办法抹杀建文朝历史，重新书写有利于自己的历史。

首先，抹黑建文帝君臣。《奉天靖难记》卷载，“允炆矫遗诏嗣……悉更太祖成法，注意诸王，遂成不轨之谋矣。”[①] 朱棣诬称建文帝乃矫遗诏继位，其帝位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继位之后又不守太祖旧制，实属大逆不道。朱棣又把建文帝描述成一副昏聩淫逸的昏君模样，如《奉天靖难记》卷二载，“时诸王坐废，允炆日益骄纵，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毁后宫，掘地五尺，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作奇技淫巧，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绣”。[②] 对于辅佐建文帝的旧臣，朱棣也一概加以否定，视之为“奸臣”，如《奉天靖难记》载，“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祈哀乞怜，遂命收之”，[③] 把正直刚烈的方孝孺描绘成贪生怕死的可怜小人。

其次，清除建文朝史料。明成祖朱棣非常清楚其帝位得之不正，非常恐惧其篡位的历史流传后世，遭受后世的唾骂，因此在即位之后便迫不及待销毁建文朝的史料。建文四年（1402）七月，朱棣“得群臣建文时所上谋策，悉命焚之。”同年朱棣即位诏云：“建文年间上书陈言有干犯之词者，悉皆勿论。所出一应榜文条例，并皆除毁。”[④] 凡建文朝的档案材料和典章条例一律毁去。

---

① 王崇武注：《奉天靖难记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年，第 16 页。
② 王崇武注：《奉天靖难记注》，第 20–21 页。
③ 王崇武注：《奉天靖难记注》，第 16 页。
④ 《明太宗实录》卷 10 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

另外，诸臣文字亦加以除灭。“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①]“文皇帝入继大统，党禁严迫，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讦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赖有好义之士私识而秘藏之”。[②]永乐三年（1405），“杀庶吉士章朴，朴坐事与序班杨善用圭误，家藏有方孝孺诗文，善借观之，遂密以闻。上怒，逮朴，戮于市。是时诏天下有收藏孝孺诗文者，罪皆至死，故朴及之”。[③]在朱棣的强力清除之下，建文朝的史料已所剩无几。对此明人有清楚的认识，如晚明陈继儒云：“当时执笔者顾怵焉，遂欲以一时之谄心，抹杀千古。诸凡可悲可泣之事，悉辍而不录”，[④]指出当时修史之人由于害怕永乐帝的声威，也由于谄媚之故，许多“靖难之役”中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都删减不录。

再次，重新书写建文朝的历史。堵住悠悠众人之口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重新书写历史，用新的历史去代替旧的历史。在这方面永乐朝最明显的举措莫过于撰写《奉天靖难记》，对起兵篡位进行辩解，重修《明太祖实录》，从源头上对洪武朝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这两部书最终奠定了后人（尤其是明朝）关于建文朝的基本认识，明代后来官方的书写基本上延续两书的基本态度，细节纵然或有不同，然总体基调无大改变。

《奉天靖难记》四卷，不著撰人，专记朱棣起兵至即位之事。据王崇武考证，该书最晚不超过永乐十六年（1418）。[⑤]该书严重歪曲建文朝史实已是明清时人公认，如四库馆臣云：“其于懿文太子及惠帝，皆诬以罪恶，及其丑诋。於王师皆斥为贼。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其语多诬伪，殊不可信。按建文元年十一月，成祖战胜白沟河，上惠帝书，并移檄天下，军中仓卒，语多可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141《方孝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第4020页
② 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序》，屠叔方辑：《建文朝野汇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撰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页。
③ 夏燮：《明通鉴》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6页。
④ 陈继儒：《建文朝野汇编序》，屠叔方辑：《建文朝野汇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1册，第5页。
⑤ 王崇武注：《奉天靖难记注·序》，第1页。

笑。姜氏《秘史》所载，最得其真。是书於《上惠帝书》颇有删润，而《移檄》则置之不录。则其文饰概可见矣。”[①]该书对明代官方建文朝史书写影响很大，其所确立的若干书写原则为后来的官方史著所遵循，例如不用建文年号，而以洪武年号称之；不承认建文帝的皇帝身份，直呼“允炆”“幼冲”“幼主”等；称建文朝官军为贼，视齐泰、黄子澄等一大批建文旧臣为“奸臣”等等。该书总体上是污化、黑化建文帝，美化朱棣，为其篡位开脱，该书确立的书写原则长时间主导着明代建文朝历史的编撰，为永乐以后历代明朝廷所遵循。[②]

实录是指后来者修撰的专记前任皇帝统治时期大事的编年体史书，相比于其他史料，其真实性相对较高，然而《明太祖实录》在中国古代帝王实录中却别具一格，其原因在于《明太祖实录》共经历过三次修撰。如郑晓所云，“太祖实录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总裁。靖难后再修，总裁解缙。缙得罪后三修，总裁杨士奇。”[③]《明太祖实录》的初修时间是建文元年（1399）春正月，三年（1401）十二月修成，是为初修。朱棣起兵攻占南京后，这部《明太祖实录》遭到焚毁，从此再未见任何蛛丝马迹。朱棣即位后，立即责成以李景隆、茹常、解缙为班底的修撰班子重修《太祖实录》，是为二修。迨至永乐九年（1411），朱棣对重修本不满意，命姚广孝、夏原吉、杨荣、杨士奇等再一次重修，是为三修。三修历时漫长，朱棣感到很满意，“批阅梁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少副朕心’”，[④]因而成为定本。

为何《明太祖实录》两次重修？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太祖实录》凡三修……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⑤]笔者认为顾炎武的判断大体是准确的。事实上，稍早的钱谦益曾对重修本《明太祖实录》的作

---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475–476 页。
② 吴德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9–30 页。
③ 郑晓：《今言》卷 1，《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42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286 页。
④ 《明太宗实录》卷 200，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朔。
⑤ 顾炎武：《答汤荆山岘》，《亭林文集》卷 3，《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402 册，第 95 页。

伪之处已有揭示。钱谦益认为，就与建文朝史事有关部分而言；首先，凡有利于建文帝的材料一律不载：其次，宣扬朱棣嫡出，生时有异像，为其夺位当皇帝增加合法性依据；第三，伪造敕文，塑造一种明太祖对朱棣寄予厚望的形象；第四，伪造明太祖有传位朱棣之意。[①] 总之一切都是为其篡位辩护。

以上是永乐朝官方重新书写建文朝历史的两个明显事例。在永乐朝官方的一番描述之下，建文帝成了淫佚悖逆、任用非人的无道昏君，其帝位也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在这样的铺垫之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篡夺帝位也就显得理所应当了。很明显，这样的历史是非常可疑的。因此关于建文朝的一切史事，我们都须十分谨慎，本文所欲探讨的“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行踪问题便是如此。

（三）明代私人著述中的建文帝行踪

在诸多关于建文朝的史事中，朱棣起兵攻占南京后建文帝的去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这也是当时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对于篡位的朱棣而言，就更是如此。朱棣在建文帝无重大过错的情况下篡位实属大逆不道之举，不管史书如何改写，其得帝位之不正乃天下共识，因此建文帝的去向始终是朱棣的心头大患。

如上文所述，朱棣即位后大肆除灭建文朝档案、改写《明太祖实录》、禁绝建文朝诸臣文集。因此当时有关建文朝史事，即便不是没有，也是寥寥无几，想要从这里寻找建文帝行踪的蛛丝马迹，怕是相当不易。揆诸常理，建文帝所居本在常人难以涉足的皇城深宫，在朱棣攻入皇宫的混战时刻，多数外廷诸臣是不知道身处宫廷禁地的建文帝的详情的，最有可能知道、甚至目睹建文帝结局或去向的应是宫女、太监、近臣等人。可是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被流遣，总之不可能有声音发出来，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真实可靠的文字“实录”存留下来。

① 吴德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第 37-40 页。

故此我们只能据后世的材料略作推测。当然，为了断绝建文朝旧臣以及天下臣民的思旧之心，无论事实上建文帝是何种结局，在朱棣那里，建文帝都必须在“靖难之役”中死去。因此，在《奉天靖难记》中，建文帝便是焚死的结局。“允纹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使数人而已，乃叹曰：‘何面目复相见耶？’遂阖宫自焚。上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死矣。出其尸于火中，上叹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①]由于永乐朝大肆焚毁建文朝史料，建文朝史事在永乐朝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言谈书写的禁脔，明成祖在位时，在高压的氛围下，人们不敢书写建文朝史事，这导致直接记录建文朝的当朝史料和永乐朝史料匮乏，以《奉天靖难记》为代表的永乐朝官方历著一开始在建文朝史书写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然而在一片混战之中，人们又未在公开场合目睹建文帝的结局，殊难令人完全相信建文帝在战争中死去，建文帝的去向反倒给人们留下了大量遐想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气氛日渐宽松，个别人士逐渐提出修撰建文朝的史事，而当初劫后幸存的诸臣文集也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关于其在“靖难之役”中并未死去的传闻日益增多，并逐渐成为明人的主流看法。

明代最早记载教文朝事的书籍当属成化时袁杞山所撰《主德篇》，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惜乎没有留存下来。[②]宋端仪著《立斋闲录》是目前可见涉及建文朝史事的最早作品，但该书没有记载建文帝的去向。[③]据目前可知，最早记载“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的，是明中期祝允明（1461—1527）的《野记》，“建庶人国破时削发披缁衣而逸”，[④]谓南京被燕王朱棣攻陷后建文帝没有并未死亡，而是逃出，至于逃往何地，并未言明。祝允明此条本自何处，抑或是其新创之说，今已难详考。此条记载相当简略，显示出建文帝下落的言说中尚属初期阶段。不仅如此，《野记》还记载了建文帝出亡的四种可能情形；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第 208 页。
② 吴德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第 66—67 页。
③ 宋端仪：《立斋闲录》，《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1167 册，第 535—635 页。
④ 祝允明：《野记》卷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40 册，第 22 页。

“闻之 故老…….建庶人国破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间某寺中，（或云武当山。）至正统时，八十余矣”，认为建文帝在朱棣攻破京城时削发穿僧衣而逃，逃至湖湘间，至正统年间尚在人世；“或曰庶人削发乘马，自朝阳门出，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不止知”，认为建文帝逃亡至河南某寺；“或又云在沐黔公府后，乃沐为奏还，非也”，认为建文帝逃亡至云南沐王府，但祝允明否定了这种观点：“或曰其出由地道”，认为建文帝出逃时是从地道逃出的。

四种说法各不相同，显示了建文帝出亡传说尚未形成某种独尊的模式，而显示出丰富性和歧杂性。[①]《野记》并声称建文帝留有逸诗一首：“今世传逸诗一篇，曰：‘寥落东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②]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但透露出一种可能，即认为建文帝出亡后流落到东南，这也是明代著述中首次可以明确表示建文帝有可能出亡于东南的证据。

此后，有关建文帝出亡的记述便越来越多，愈传愈广，而这些记载开始按照传说故事的演变规律，逐渐丰满起来，神奇色彩也愈发浓厚。随着建文帝出亡传说不断发酵，人们也不断对之进行再创作。迨至正德和嘉靖年间，建文帝出亡传说开始变得颇为流行，并开始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黄瑜《双槐岁钞》载：“父老相传，懿文皇太子生皇孙建文，顶颅颇偏，高庙抚之曰：‘半边月儿。’知必不终”。这在建文帝的结局之外增补了某种预言性质的东西，暗示了建文帝不幸的命运早有预告，甚至暗示了“靖难之役”发生的必然性。[③]许相卿《革朝志》在黄瑜的基础上再加以演绎；“相传，帝之生也，顶颅少颇，高皇知其必不终，尝匮髡缁具遗之戒，曰，‘必婴大难 可发。’至是为僧逊去。”[④]这里的说法充满了神秘色彩，谓明太祖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皇太孙朱允炆位

① 祝允明：《野记》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第23页。
② 同上，第23页。
③ 黄瑜：《双槐岁抄》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第448页。
④ 许相卿：《革朝志》卷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7册，第161页。

将不终，便预先准备了逃亡所用的“髡缁之具”。为何明人会认为他是借助于僧人的工具出亡的呢？从民间故事传说的角度看，黄瑜和黄佐二人记载的建文帝出亡故事堪称建文帝出亡故事的母题，后来的许多记述都以此为基础，而有所细化或改变。例如无名氏撰《建文皇帝遗迹》就把明太祖告诫建文帝的情节更加细化了，也更加戏剧化了。“初，太祖临崩，治命密敕一封柜，召太孙曰：‘此柜不可妄启，汝若遇难时，速启视之，即无害也。’至是，靖难师将逼，启视其柜，见一刀、一度牒，上有敕曰：‘汝欲生，可将此牒投往他处为僧，后宫某处有密地可通。汝其不然，将刃自尽。’于是少帝竟削发以逃，天下之人实皆不知其生也”，[①]把建文帝出亡的来龙去脉描绘得绘声绘色，故事性极强。

作为建文帝出亡传说的自然发展，明成祖寻访建文帝的故事也应运而生。明中期王鏊（1450−1524）《震泽纪闻》称“然或传（建文帝）实自火逃……故（永乐帝）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访张仙为名，实为建文也，终莫知之”，认为明成祖派遣胡濙巡行天下的主要目的乃是寻访建文帝的下落。[②]王鏊此说很可能是根据李贤的说法稍加加工的。明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为胡濙所写神道铭有云：“丁亥，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实可托，遂命公巡游天下，以访异人为名，实察人心向背”，[③]此处云胡濙以寻访“异人”为名巡游天下，所谓“实察天下向背”难以确指，但也不排除寻找建文帝的可能。

迨至嘉靖时期，又出现郑和下西洋是为寻访建文帝一说。郑晓《逊国臣事抄·吴亮传》云：“命胡给事中濙以访张邋遢为名，又遣太监郑和等下西洋，遍物色不可得”。[④]其《今言》亦称：“成祖西洋之舟发，不亦劳乎？郑和之泛海与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尔！”[⑤]这些说法影响很大，后亦为清修《明

① 不著撰人：《建文皇帝遗迹》，邓士龙《国朝典故》本，《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 562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56 页。
② 王鏊：《震泽纪闻》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 1167 册，第 471 页。
③ 李贤：《礼部尚书致仕赠 太保谥忠安胡公淡神道碑铭》，载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影印本，第 1364 页。
④ 郑晓：《逊国臣事抄》卷 8《吴亮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55 册，第 57 页。
⑤ 郑晓：《今言》卷 1，《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425 册，第 286 页。

史》所继承。如《明史·胡濙传》称："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永乐）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云云"，[①] 此处明确表示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死去，而是不知所终。《明史·郑和传》亦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②] 郑和下西洋乃实有其事，而且声势浩大，天下皆知，建文帝出亡说的神秘加上郑和下西洋的轰动，其所引发的效应是可以想见的。这种说法一经出现就几乎席卷了人们的头脑，至今不衰。

明中期许相卿（1479—1557）编《革朝志》是建文朝纪传体史。该书的记载有矛盾之处，其云明太祖遗建文帝以髡缁之具，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遂逃去，正统末自滇南归京师禁中，是采出亡之说。可是该书又称"帝阖宫自焚，六月十三日也"，实则认为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遭焚死。[③] 这种诸说并存的方式固然显示了作者的谨慎，但也显示了作者对于建文帝的下落并无把握。陈建《皇明通纪集要》采建文出亡之说，云"（建文帝）剃发从水关出宫中，火烈甚，传言上崩而实遁去"。[④] 高岱《鸿猷录》也采纳出亡之说，谓成祖攻入京师后，"建文君左右惟数人，欲出迎，复叹曰：'我何面目相见？'遂尽闭诸后妃宫内，纵火焚其宫，惟挈三子变服出走，仓卒复弃三子宫门，被执寘师中。""时内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⑤] 可见建文帝出亡之说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出亡之说日渐成为主流的说法。

郑晓《建文逊国记》也记录了建文帝的两种结局，一为"诸内臣哗言不如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169《胡濙传》，第4535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304《郑和传》，第7766—7767页。
③ 许相卿：《革朝志》卷10《李景隆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7册，第212页。
④ 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十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⑤ 高岱：《鸿猷录》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册，106页。

逊色去。须臾，宫中火起，传言帝崩，成祖为发丧治葬”，云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死去；二为“或日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入蜀，或日去蜀，未几入滇南，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①] 则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死去，而是出亡西南。郑晓《逊国臣记》记载了“靖难之役”后诸臣从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如“（程济）立召僧为建文君落发，济从之出，每遇险几不能脱，济以术脱去，相从数十年。后随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识济。至京，莫知所终。”[②] 是书在建文帝出亡传说中增加了臣子相从的情节，可谓开诸臣追随建文帝出亡之先河，为后世史家所效仿。

除此之外，明代还有许多私家著述都提到了建文史，例如不著撰人编《革除编年》黄佐《革除遗事》、姜清《姜氏秘史》、郁衮《革朝遗忠录》、薛应旂《宪章录》、朱睦㮮《革除逸史》、雷礼《皇明大政记》、邓元锡《皇明书》等等，皆云建文帝乃出亡，故事情节大同小异。[③] 由此，建文帝出亡之说成为明代私家著述的主流。限于篇副，此处不再列举。而范围更为广泛的地方性传说关于建文帝的出亡乃至整个建文帝的故事就更多，情节也更加离奇丰富，限于主题，本文不再加以论述。对这众多的传说加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第一，与寺庙、僧人、佛物等佛教因素有关的传说特别多。在建文帝出亡的传说中，明太祖早年的寺庙经历得到了强调，出亡过程中的打扮乃是僧人的装束，携带的器具乃是佛家之物。第二，建文帝装扮成僧人出亡的说法成为主流之说。为何寺僧之说后来能够从众多的传说中脱颖而出，笔者认为有传说演变的规律，也有社会文化情境的原因，但是同样基本的，是这个传说可能离真实的历史更为接近——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历史的真相。传说虽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未必没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因而建文帝流落到寺庙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高的。第三，建文帝出亡东南的言说最多。泛览明代私

---

① 郑晓：《建文逊国记》，载郑晓：《吾学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424 册，第 219 页。

② 郑晓：《逊国臣记》卷五《程济传》，载郑晓：《吾学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425 册，第 8 页。

③ 吴德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帝文史编撰研究》，第 100-125、160-170 页。

家著述中关于建文帝出亡去处的记载，绝大多数去向乃是东南和西南。据此推测，虽不能说建文帝的具体去向在何处，但大致可以推断其往东南方向，而当时海禁甚严，去往海外的可能性并不大。

（四）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的蠡测

宁德位于福建省东北，东临东海，与台湾隔海相望，西邻南平，南接省会福州市，北与浙江相邻。今天这里已是中国大陆东南沟通台湾、岭南、日本、高丽、东南亚的海上要道之一，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回到明清时期，可能就会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明清时期这里仍然是中国东南荒凉的沿海地区，经济并不发达。在国内国际贸易并不兴盛的明代初年，与扮演中心角色的江南相比，这里仍然属于偏僻贫穷的东南海疆。

支提山华严寺，世称支提寺，位于宁德市霍童镇西南的支提山上，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佛教寺院。据《支提山华严寺志》记载，支提寺始建于五代时期，后来历经多次焚毁与重建，可谓命途多舛。客观地说，与福建地区著名的佛教寺院如福州开元寺、泉州开元寺、厦门南普陀寺等等相比，支提寺的知名度并无出类拔萃的优势。然而就是在这里，却出现了不寻常的历史痕迹，流传着不寻常的历史故事，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随着挖掘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支提山华严寺的特别之处。

据《支提山华严寺志》记载，永乐五年（1407），朝廷曾敕命太监周觉成重建支提大殿。[①]“胡元末，寺毁废。皇朝永乐初遣中使周觉成鼎建，敕名华严寺，立田十六顷四十余亩，斋众祝圣”（何乔远《闽书》卷六）。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徐皇后敕赐铁铸天冠菩萨千尊，由郑和船队送往支提寺供奉。为何徐皇后赐这么多铁铸菩萨于此地，其目的是什么？徐皇后远在京城，为何舍弃更熟悉更近的两京乃至江南的寺院不赠，反而恩赐千里迢迢之外的支提寺。当我们发现

---

① 袁冰凌编著：《支提山华严寺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7–18 页。

赐铁铸菩萨并不是徐皇后广施天下寺庙之后，徐皇后的这一举动无论如何是不寻常的。考支提寺历史，在元末明初时期，支提寺与明朝之建立并无深刻的渊源，也未见任何明初功臣宿将或者什么重要人物与这里有所渊源。

不寻常的故事远不止此。明万历元年（1573），神宗生母李太后敕命北京吉祥寺大迁禅师与太监张文远赴支提山重建寺庙。万历八年（1580），大迁禅师到南京大报恩寺请印大藏经（《永乐南藏》）。万历十八年（1590），大迁禅师回京复命，八月还支提山，朝廷敕赐《永乐北藏》，遣近侍张近朝与慈寿寺僧万安护送。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太后遣太监张文送千叶宝莲毗卢佛像等到寺。如果说李太后敕赐佛像并不奇怪的话，那么敕赐卷帙浩繁的《大藏经》（1615 部、6361 卷）就很不寻常了。与在南京的徐皇后相比，在北京的李太后与支提山相隔更为遥远。在交通并不便利的晚明时期，李太后为何对万里之外（以明代方志的记载算）的支提山那么关心呢？诚然，李太后笃信佛教，曾布施过很多寺庙，然而敕赐大藏经的却是屈指可数，其中一次便是支提寺。把这些迹像串联在一起，使人感觉到明皇室似乎始终对支提寺默默关心、念念不忘，而且如，上这些举动主要不是由朝廷出面，而是有太后出面。

由此看来，支提寺必有不寻常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明宗室密不可分。然而考诸历史，在整个明代，支提寺乃至整个宁德并无显赫的历史人物与事迹。明太祖逐鹿天下的主战场并不在这里，轰轰烈烈的开国战争主要不是在这里上演的，与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平原随处可见明初事迹不同的是，这里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天下大乱中显得特别平静。因此，可能的情形就是支提寺乃至宁德曾有某位明朝廷不愿明言、但又确实重要的人物曾与这里有过渊源。上文已经论述，建文帝是有可能出亡到东南的，再结合支提山的历史遗迹和“靖难之役”后明皇室的诸多举动，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建文帝是有可能出亡到宁德，[①] 与支提寺发生关联的。

---

① 学界曾有人提出过建文帝出亡到福建宁德的论述，孙绍旭曾主要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得出了建文帝出亡到宁德的结论，笔者认为孙氏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但还须进一步的论证，参见孙绍旭：《明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考》，《史林》2016

（五）结语

以上，笔者通过对明人文集、笔记、野史等私家著述为中心，对明初“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去向进行了重新猜测。明代私家著述大多认为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死去，而是出亡，至于出亡的方向，则以东南方向为多。在出亡的整个过程中，又与佛教事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联系宁德支提寺的重要遗迹与“靖难之役”后明代朝廷的一系列默默的举动，我们认为，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建文帝驻足于支提寺也是有可能的。不过以上结论纯属推测性质的，尚需更强有力的证据来加以论证。

王培军曾有“训诂须通人情”的说法，[①] 笔者借用其说，认为在考证亦须通人情，整个历史研究亦须通人情。在文字史料缺乏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根据生活常理和人之常情进行一定的推导。这种方法看起来虽然与”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有所偏离，但是实际上仍然是需要的，也是有合理性的。毕竟不论何时何地，人的生活逻辑是有共通之处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续破“天书”觅“建文”

林国恩

2013 年 3 月初，我应福建省宁德市政协郑民生主席和“建文帝研究小组”的邀请，在福建省政协陈杰明处长和福建马尾造船公司林国雄主任的陪同下，来宁德市学习，考察和探寻“建文帝迷踪”。前几年已有众多名人、专家和学者发表了许多高见，因此，我首先是来学习、取经的。

---

① 王培军：《训诂须通人情》，《上海书评》2019 年 6 月 22 日。

2013 年 3 月 8 日，《闽东日报》登载记者林翠慧写的报道《“红崖天书”破译专家林国恩莅宁探寻“建文帝迷踪”》开场白说：“宁德寻访建文帝迷踪再爆惊人发现，在建文帝随从郑洽的‘故居’内偶然发现‘离明继照’四个字样，竟与‘红崖天书’相吻合，疑似与中国史上迷案之一的‘建文帝之死’有关……”

令人惊奇的是宁德发现的“疑似与中国史上迷案之一的‘建文帝迷踪’有关”之处甚多，而且它们竟与“红崖天书”相吻合，这些都是偶然的吗？偶然中是否含有必然？必然性真的寓于偶然性之中吗？

一年多来， 我虽然常处于忙碌又困厄中，但是仍然不忘对宁德之行的回味和思考，继续研究，有所突破。

我的原著《红崖天书》是 2006 年 3 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出版发行的，影响较大，较好，曾引起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的重视。我的续著《破解“红崖天书”是 2006 年由“上海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的，于 2014 年 1 月由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014 年 4 月 11 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中国科学报》上以《“红崖天书”哦真相》的突出报道推荐给读者。略谈这些并非为着自我标榜，而是说明我这些著作或可作为标尺、标准，用来衡量、比对宁德的考古发现是否真是“建文帝及其随从所为”等等，起到验证效用。

（一）破解“郑洽（岐）”故居遗址中的三个牌匾

1. 牌匾内容源自《易经》

“郑洽（岐）”故居遗址中的三个牌匾，引起我的特别关注。我发现它们源自《易经》中的字句，或改编而成匾额四个字的。

《易经）》即《周易》，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奇特的一本书，它由卦画符号和文字共同组成。卦画符号有六十四组，即六十四卦。文字共 4900 多字。《易经》是我国古代先民占卜活动的产物。从卦画符号的产生到《周

易》最后成书，期间大约经历三千来年，是世界上成书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周易》原本是占卜之书，但在注入先哲们的智慧和人生哲理之后，又经作者精心编排设计，性质起了变化，不但成为周王室治国安邦的纲领性文件，而且成为个人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材。此后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所推崇，被誉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从汉代开始，被列为考试的重要科目。从十七世纪以来，《易经》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开始走向世界。（见邵乃读的“《正本清源说易经》自序 2013 年版）

笔者的著作中曾有过论述：

建文帝以行宽仁之政，解民困为要务，无疑会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些维新之政带有复古色彩，有些还属于倒行逆施，比如推行井田制等。这与建文帝本人的素质、秉性有关，他重用文臣，知识分子，性情笃孝，自小聪慧好学……，虽然后来也曾在太祖的精心培养下，学习一些强硬的实际经验，但毕竟少了几分历练。（见原著《红崖天书》第 61–62 页，用代码 Yp61– 62 表示，后同：续著《破解“红崖天书”》第 184 页，用代码 Xp184，后同）。

其中的“井田制”相传是中国殷商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建文帝还要推行周代的井田制，可见他及其随从们必然极其重视、熟读《周易）》，不但将其成为明王朝治国安邦的纲领性文件，而且成为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材。“郑洽（岐）”故居匾额中的内容与《周易》密不可分就理所当然了。

2. 解决《易经》难读、难解的问题

《易经》成书之后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经过历代众人传抄，有不少差错：许多古文字与现代文字也不尽相同，其字义更是差距较大；其中运用许多比喻，包括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代背景等，今人不很了解和理解；《易经》成书时没有标点符号，后人断句加上的标点不尽相同，其文义也大不相同；《易经）》有一套专用符号和专门术语，但在《易经》原文中没有任何说明，开头就是六十四卦，初学者看不懂，更难理解。怎么办？笔者从阅过的十几本《易经》

中选择新近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较易阅读，有注释、译文或点评的二本，摘要相关内容附录其后，供大家参考。但是，其中有许多数字代表什么意思仍难理解，引《正本清源说易经》“基础知识”中作的说明如下：

爻名：排在爻辞的前面，说明该爻是阴是阳，说明该爻排在这卦的第几个位置。用九表示阳爻；用六表示阴爻。每卦有六个爻画，从下往上排列，分别用“初、二、三、四、五，上”来表示位置。例如爻名是“六二”，说明该爻是阴爻，由下往上数，排在第二个位置。爻名是“上九”，说明该爻是阳爻，排在最上的位置，即从下往上数的第六位置。

爻位：该爻在一卦中所处的位置；一卦共有六个位置，从下往上数，“一、三、五”为阳位，“二、四、六”为阴位。阳爻居一、三、五；阴爻居二、四、六的位置，叫当位，也叫位正。位正一般为吉。如果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叫位不正，位不正一般为不吉或凶。

3.“郑洽（岐）” 故居的三个匾额内容的普通释译

1.“视履考祥”（大门口门楣上的匾额）

A. 摘录刘建生主编的《周易精解》（以 A 为代号，下同）

[原文] 上九，视履考祥①，其旋元吉②。

[注释了①视履考祥：回顾自己谨慎走过的道路、认真体会吉凶的预兆。祥，吉凶的预兆。②其旋元吉：以此能返回阴柔，谨守的行事状态可获大的吉祥。旋，转也，意为返回。说明上九居乾板，能转身下应兑三，为刚能返柔、履能守谨之像，故获吉至大。（详见：十、履卦）

B. 摘录邵乃读的《正本清源说易经》（以 B 为代号，下同）

[原文]（同上）

[注释]：视履：审视走过的道路。考，指考察。祥：吉祥。旋：归、回返。爻辞说，审察自己走过的道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沿着正道走，就会大吉大利。

2.“离明继照”（闺阁内的牌匾）

A.[原文]《像》曰：明两作，离①；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②。

[注释]①明两作，离；两，持续；作；兴起。以此释解《离》卦上下“离”均为“明”之像。②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这是指“大人”效法《离》卦光明连继之像，持续不断地彰显恩德普照天下。明：彰显恩德。（详见；三十、离卦）

3.“豹蔚南山”（大门口门楣上的匾额）

A.[原文]《像》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①：“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注释]①蔚：文采华丽。（详见；四十九、革卦）

[译文]《像传》说：“君子像斑豹一样助成变革”，说明上六的美德像豹纹一样文采华丽；“小人纷纷改变旧日倾向”，这是顺从了君主的变革。

（笔者注：“南山”是创作者增加的，待后文解释）

4.“郑洽（岐）”故居的三个匾额内容的特殊破解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数学教授牛实为（1918、9、28－ －2011、3、21）先生，一直研究数学在流体力学、物理学及生态学中的应用，还一直致力于将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对中华古典智慧进行现代化诠释，尤其潜心于研究佛学，弘扬佛法。他写的《易经系统观》说：“易经的基本原理涉及到宇宙万像、人类生命的整体性、互补性、复杂性、相关性。”他的破解内容当然有些特殊，待在专著中引用。笔者结合原著（代号Y）《红崖天书》和续著（代号X）《破解红崖天书”》的解释摘录如下：

1.“视履考祥”

我见到大门口门楣上匾额“视履考祥”四个草书体，就记起上海的光启公园的南春华堂也有此匾额，感到并不奇怪。在继续参观中，我突然忆起“天泽履，凤鸣岐山”的“上上卦”。据宁德“建文帝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等介绍，建文帝的随从郑洽特意改姓名为“郑岐”，此地为“郑岐村”，等等，我顿有所悟已与“红崖天书”中破解出的寓意相吻合；“这分明是意欲仿效历史上著名的‘凤鸣岐山”。……示着周武王伐纣成功，定能兴周灭商的吉兆。同理可证，……也是预示着建文帝伐燕成功，定能灭燕复明的吉兆。”（见Yp203，Xp350——351 ）

我查《易经》“十、履卦”中有 [原文]《像》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我再查陈言编著的插图珍藏版《万事问周公》实用全书，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7 月第一版。该书摘录如下：“天泽履凤鸣岐山（上上）履者蹑也，有所蹑而来进，故有凤阔（鸣——笔者注）岐山之像。夫凤鸣岐山者乃凤凰祥瑞之鸟，人不常见。忽然鸣于岐山之上，随出文王治世。世称圣德，大兴周邦。占此卦者，主国家贞祥之兆也。”

2.“离明继照”

进入闺阁内，我即刻异常关注牌匾上的“离明继照”四个字。我发现其中的“明”字被篡改，顿时犹如触电一名 副其实的触“目”惊心！因为以“目”代替异常关键的“日”成为其左偏旁，与“红崖天书”中的“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的人间地狱”的寓意相吻合，相呼应：

“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这是（明）太祖的圣谕，然而才到二世，朱棣便篡位了，篡改了这个大“明”，使之成为日月不能久照的人间地狱。建文帝认为这是违背太祖祖训的弥天大罪，比“亡夏”“亡商”更为严重的恶果产生了。

明朝国号中的这个“明”字意义非同凡响。它与秘密宗教相关，除了它出于明教之外，……（见 Yp97、Xp225 ）

“明”字的本义含义有：（1）光明；明亮。《易 . 系辞下》；“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诗 · 齐风鸡鸣》“东方明矣。”（2）指人世间。如“幽明”，等等。（见 Yp98，Xp235 ）

千古奇谜，先用千古奇书来考辨。《易》；“离为……. 方之卦也。”《春秋之命苞》；“火离即凤皇。”（见 Yp32， Xp149）

从《易》经看，凤为离为火，在南方：燕为坎为水，在北方。人间正道是：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幽，以南伐北，必能取胜，拯救大明。（见 Yp203，Xp350）

灭燕复明。复辟变天，天上重现像征“朱明”的红日，图文（A）像一轮朝阳普照天下，恢复建文时代。这分明是意欲仿效历史上著名的“凤鸣岐山”。（见 Yp203，Xp350）

从而更加证明“离明继照”的寓意还与“红崖天书”中的“凤鸣丹山”——“凤鸣岐山”的意境相吻合、相呼应！

3.“豹蔚南山”

（1）“豹蔚”源自《易经》中的“四十九革卦”。

A. 该卦中有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B. 邵乃读的《正本清源说易经》中点评；革卦的历史背景是武王伐纣。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非常成功的革命实践。“这又与“红崖天书”中破解出的寓意相吻合、相呼应；

“岐山在陕西省岐山县城东北，…… 族的先祖受威逼迁于峡山下周原，筑城郭居室，作邑以居四方来归之民。相传周初有凤鸣于岐山，根据儒家学说，这凤凰是遵天命而来的，‘凤鸣岐山”预示着周武王伐纣成功，定能兴周灭商的吉兆。同理可证，‘凤鸣丹山”也是预示着建文帝伐燕成功，定能灭燕复明的吉兆。”（见 Yp203，Xp351 ）

因为根据《春秋之命苞》；“火离即凤皇”。而“郑岐村”闺阁中牌匾上的“离”字也喻示“火离凤凰”。因此，可以理解为“凤鸣‘郑岐’，灭燕复明”。

（2）“豹蔚”加上“南山”，首先有“豹隐”的意义。例如；汉，刘向的《列女传 . 陶答子妻）》：“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豹的皮毛纹彩华丽，色彩斑斓，诱人偷猎；为了自卫，它藏而远害，因此雾雨七日而不下山觅食。这个“南山玄豹”的典故常用来比喻隐居。唐 . 骆宾王《秋日别侯四》诗：“我留安豹隐，君去学鹏抟。等等引申之义。宁德市“建文帝研究小组”认为其谐音为“保卫南山”也是引申之义。

原著《红崖天书》早已论述：“由于‘时朝廷侦帝甚密……作者不得不设

法隐穆表述其意。‘天书’露布天下， 其目的是欲使四方速知，讨伐燕冠，但又谨防朝廷速知，以免自我暴露，而被官府缉捕。…… 因此‘天书’才创作得既隐晦玄奥，令人难解，又有章可循，终能被解。这也是‘天书’永恒的魅力所在”。（见 Yp190， Xp333 ）

宁德的考古新发现的许多内容与其何等相似乃尔！值得特别重视和深思！

（二）探寻建文帝迷踪

2003 年，福建电视台领导获悉笔者破解“红崖天书”后，大家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好题材。通过对“红 崖天书”的解读将破解中国历史四大谜案之一的明建文帝失踪之谜。无疑，这将是一个能让世界为之震惊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揭示红崖天书所隐含着的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而且为史学界研究明建文帝失踪之谜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结果，《发现档案》解读《红崖天书》获 2004 年度中国广播电视优秀专题片大奖。（Xp3）

（一）“红崖天书”求真相

2014 年 4 月 11 日《中国科学报》于“读书”栏目重点报道；《“红崖天书”求真相》，介绍笔者运用系统工程学的研究方法，作出诸多推断及其文化与艺术价值等等。在上述著作中，笔者在探求“红崖天书”真相的同时，也附带探求建文帝迷踪的真相。摘要如下：

“（八）金川门破”章节中：

笔者在潜心研究“天书”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建文帝确实在金川门之变中成功逃亡了。理由种种。略举一二：

燕王率兵破南京城是很仓促的，不可能把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建文帝更有条件逃出南京城……更重要的是他早料定“燕兵势将犯阙”，颁下诏书，派出亲信四处募兵勤王，超过半壁江山还在他手里，他没有理由就此绝望、放弃。

虽然金川门之变事发突然，但是建文帝仍有从容逃亡的时间和条件。……建文帝有时间亲手斩杀叛将徐增寿，建文帝对此深恶痛绝，刻骨铭心，特在

惜墨如金的‘天书'中设计了“金川门破”的图文（G），血泪斑斑。（见 Yp7， Xp203、204 ）

“（十八）御驾亲征”章节中：

当时朱棣的出生身世属于皇室内宫秘史、绝密档案，惟建文帝这种人才能览之无余。“天书”的作者“甲凤皇允”实是建文帝及其随从，他人难以伪托。也说明建文帝当年确实成功逃亡在外，永乐帝朱棣确非马皇后嫡出……连环谜案一破解……见 Yp166， Xp305 ）

“（二十）丹山凤鸣”章节中：

但是，这时的西平候已是第三任的沐晟，金川门之变后，他的政治态度如何尚不知悉，因此史彬劝谏建文帝不必盲目投奔，不若往来名胜。非常时期，人心难测，不可不防，这是正常的。“于是更主七家；廖平、王良、郑洽、郭节、王资、史彬、梁良玉。帝曰：‘此可暂不可久，况郊坛所在，明旦必行，何所之？（《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说明建文帝逃亡初期是在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东躲西藏，很不安全，“适有诇其迹”，新朝廷正在刺探他的踪迹，遂决意转向云南避难。（ 见 Yp188， Xp331 ）

“天书”所在的安顺地区，设州于元代，明洪武时沿置，属普定府，洪武十八年（1385）直隶云南布政司，至正统三年（1438）才改隶贵州布政司。建文帝及其随从们当时在该地区隐匿活动，人还在，心不死，还寄希望于屯驻在西南的数十万明军将士，于是就想方设法昭告他们。（见 Yp189，Xp332）

（二）“建文帝迷踪”求真相

1.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重大题材”章节中：

上文述及的这场殊死搏斗，在“红崖天书”中得到了及其简练、隐晦的描述，……史学家们对这段历史向来颇为重视，其中牵涉到建文帝的生死疑踪，永乐帝朱棣的出生身世、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等等重大问题，相关记载可谓汗牛充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当时人们对此事都噤若寒蝉，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有原籍福建莆田的宋端仪（1447−1501）出来搜集史料，编辑建文朝忠臣遗事，始为《革除录》，……诸多野史笔记中也有记载，如明代出现的程济《从亡随笔》、史仲彬《致身录》、王鏊《震泽纪闻》、薛应旗《宪章录）》、郑晓《吾学编》、尹守衡《明史窃》……此后直至近、现代，众多的史学家及关心这段史事的热心人都在不断、不倦地继续探索，但进展不大。……

笔者在破译“天书”时于古籍大海中捞到了金针，发现明代张銓编辑的《建文纪闻》，……该文献记载可信度较高，书中明确、审慎地记载着；建文帝当年化装为僧，从地道成功逃亡，过后才宫中火起，传言上（建文帝）崩。（见Yp27、28， Xp143、 144， 笔者注；该《建文纪闻》对于建文帝逃亡在外的情况却没有续载，更可见其审慎和严谨）

2.“凤”已现形，“龙”隐何处

“（三）凤返舟山”章节中：

建文帝悲愤交集地题诗于壁（贵州罗永庵——笔者注），其第一首：

风尘一夕忽难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像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望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老和尚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皇帝身份和失去的故国，后两句非常直白地表露了他的复辟心态。他以凤、龙自诩。龙可以喻天子，凤也一样，……现在，“凤”已现形，“龙＂隐何处？（见Yp34—37，Xp151—154）

（四）龙归沧海”章节中：

……时人仍不识， 他不得不再写一首诗来注释：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鸟早晚朝。

从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建文帝，他似是自嘲，实则在为反攻复辟、恢复自己真龙天子的本来身份而呐喊。（见 Yp45， Xp163）

3. 龙归沧海碧云深

（二十）丹山凤鸣”章节中：

他（建文帝）把理想和希望寄托于“天书”中，并对此念念不忘，……而“朱明红日”远未再现，离他期望的丹凤朝阳的太平盛世更远着呢！……

这时的他（建文帝），还在哀叹“唯有群鸟早晚朝。”物以类聚，他就像一只悲啼的夜鸟吧！正是：

月落乌啼雨满天，丹山凤火对愁眠。

碧云深处罗永寺，夜半吞声哭漏船。

（见 Yp203—205， Xp351、352）

笔者早在 2006 年 3 月出版的原著中就特地选用唐大历年间才子张继的名诗《枫桥夜泊）》，因步其韵奉和来作为破解的结语，预测“凤返丹山”的建文帝“愁眠”的归隐地是远方的“碧云深处罗永寺”。虽然“龙归沧海”，但是仍处于危难境地，“夜半吞声哭漏船”。引用鲁迅的名诗《自嘲》中的名句“漏船载酒泛中流”；境遇是那样险恶，像漏水的船载着酒在激流中行进，时时有沉没的危险。

（三）探究上金贝古墓塔碑文

1. 两地“天书”寓意吻合因而推断

2013 年 3 月初我应邀考察时，其“建文帝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就希望我着重解读该 20 字的墓塔碑文。当我发现“郑洽”故居的牌匾“离明继照”的寓意等竟与“红崖天书”相吻合后，当晚发表初步见解，告诉记者可以参照我的原著《红崖天书》的具体内容。（见 Yp203、204， Xp351）

记者林翠慧在 . 上述提及的报道摘录如下：

逊国逃亡的建文帝面对国破家亡、退位逃亡、日以远去，……悲愤至极而发出“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的悲鸣。

而更加机缘巧合的是，上金贝古墓葬塔碑上二十字 碑文“御赐金祢佛日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与《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中建文帝朱允蚊留下的“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相吻合。

“天上的凤在丹山，指的就是贵州，而诗词中的‘日’与宁德碑文上的一致。凤凰在丹山，而‘日’及‘沧海’是双关语，对应龙归沧海，那么指的是真正的建文帝隐于海边；‘碧云深'指建文帝所在之处，上金贝古墓正处于当地的碧云峰下”林国恩说。（笔者注；末尾这句话是王道亨当场补充的，指出“正是在碧云崖，又唤‘五云崖’下”。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当地有如此巧合的地名，而心中惊叹很可能破解对路了！ ）

2. 四处“郑氏”宗谱对接进而发现

2012 年 12 月，福建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编印的《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之实地调查与田野考古报告》第一集的第一篇论文《郑洽归宗有力佐证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作者王道亨）。于 2013 年 3 月给我带回这些宝贵的资料继续学习、研究，高山流水遇知音！

我也经过认真执着的探究，通过他们对《郑氏宗谱》的三省四处（或更多处）的对接，我进而发现建文帝不仅出亡福建宁德，而且出亡中国西南等地，闻名中外的贵州“红崖天书”和福建的“福宁天书”等皆是建文帝及其随从所为，确切说来，都是建文帝及其随从郑洽和后代等人所为，难怪两地“天书”内容那么吻合！举例如下：

这四处《郑氏宗谱》是：浙江省浦江县郑义门的、福建省宁德市郑岐村及其下井堂的、厦门市郑坂村的、云南省蒙自县郑营村的。其中厦门市郑坂村《郑氏宗谱》的资料显示，郑洽共生育五子二女。长子郑榛于建文初，曾任职于云南刺史府上；建文三年（1401）迎娶了朱标的二女儿、建文帝朱允玟的亲

妹妹朱谬娘，成为皇家郡马。也难怪建文帝在逃亡的危难之际，会由随从郑洽及其小儿子郑栈（化名郑钱）等人到贵州、云南等地避难，还寄希望于屯驻在西南的数十万明军将士，写下“红崖天书，”想方设法诏告他们等等。（见Yp189，Xp332）

尤其是在明代崇祯年间修的浙江《郑氏宗谱·卷十》中，由郑义门第十五世孙郑崇宏记述：“崇祯年间，云南有郑某，秉铎闽之镇海卫寄书请谱。云其祖泰五府君随驾滇粤流寓。蒙自子孙因家族颇繁盛，方之。”

这段原汁原味的记述，说明他们是郑义门的后人，是当年追随建文帝出亡云南、广东的义门八世祖郑洽的后代。因此，当年追随建文帝及其随从郑洽及小儿子等人出亡云南，写下“红崖天书”等确是史实。建文帝逃亡的“西南说”和“东南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就为破解建文帝迷踪增加了大量的相互佐证的材料，取得了连环的重大突破。

3. 上金贝古墓塔碑文特殊考释

该古墓舍利塔碑刻正面两行有20个字（见上述），其背面的碑文曾被神秘铲除，可能连正面的碑文也曾被再次加工。其历史背景看来不同寻常。因此，具体情况须作具体分析，笔者尝试采用不同寻常的思路和方式来考释，先从历史背景着手研究、分析。

现引用我的著作中原先的相关论述，摘录如下：

朱元璋称帝后为什么取国号“大明”呢？“大明”的意义出于明教。明教本有明王出世的传说，……教徒主要是烧香、诵偈，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大明”国号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大多数人都接受，……他们都是明教徒。……用儒家的看法来理解，明是光明，属火，日月俱有。因此，儒生这一系统也赞成大明国号。（参看吴晗《读史札记明教与明朝》）……朱元璋深知这类秘密组织的巨大潜力，……才能从明教和弥勒教的秘密传播中抓住机会，获得成功，成为新兴的统治者。他要设法保住家天下世袭万代，把自己取得天下的经验教训秘传子孙世代，……他强调明王已经在世，只此一家，其他的全是冒牌，切

不可相信。

……富有洞察力和预见性的朱元璋，留箧遗诏的深意主要还是隐示乃孙，在逢大难无路可走时，可以学他的榜样，走他的老路，……依靠宗教势力和仍忠于自己的旧部，以惟一的明王在世自居，力图东山再起，反攻复辟，拯救大明。（见 Yp186、187，Xp329、330）

笔者原以为儒生出身的建文帝及其随从们怎能领悟太祖朱元璋的良苦用心呢？福建宁德市等地的考古发现证明他们领悟了！

由此推断，碑文中的“佛日圆明大师”是双关语，借元朝皇帝赐给高僧的谥号来作掩护，实则隐喻明太祖是当年惟一在世的明王。其中“佛”"的狭义即指明教信奉的“弥勒佛”；明是光明，属火，日月俱有，明教即火教，以“日”为像征。“佛日重辉，……江天无恙，……”这是南京栖霞寺抱柱上的对联（近代著名书法家林散之书写），“佛日”重叠更是光辉无限。其中“圆”的意义有“圆成、圆满、圆融、圆通”等，此处的“圆”"主要是“圆成；谓圆满成就。”如《楞严经》卷一：“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后 俗语用“圆成”，意为作成，办妥。“圆明”意为建立、建成符合明教制度的“大明”王朝。“大师”隐喻开国第一代惟一的“明王”——帝王、明太祖朱元璋。

前述是定语，其主语是“沧海珠禅师”一墓塔之主，因而推断是继承人、第三代的“明王”一帝王建文帝朱允收。同理可证，“沧海珠”也是双关语。（1）“沧海 遗珠”比喻埋没的人才。《新唐书.狄仁杰传》；“君可谓沧海遗珠矣。”（2）“沧海龙珠”是 1974 年 2 月 7 日郭沫若奉呈毛泽东的《春雷》诗句开头；“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3）“沧海泪珠”是唐 代李商隐的名诗《锦瑟》中“……，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望帝；传说中的古蜀国的一个君主，名杜宇。他失国悲痛，死后化为杜鹃鸟。“这时的他（建文帝），更像一只啼血的杜鹃。‘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辛弃疾《贺新郎》）”（见 Yp205，Xp352）

沧海：大海。珠有泪；美好的理想，像南海外的鲛人的泪珠洒落大海中，

终成泡影。结合记载的建文帝的悲伤诗句；“野老吞声哭未休。”以及“禅杖曾挑沧海月，袈裟又接祖师风。”（见贵州省《广顺州志》）那么，碑文开头的“御赐金斓”怎样贴切解释？斓：古时上下衣相连的服装。有的说是“皇帝赐给的袈裟”，有的说是“皇帝赐给的龙袍”，其实建文帝的诗句中这两种服装都说到了，连碑文也双关语解释了。例如：“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见 Yp34、45、180、 190、 203、 204； Xp151、 163、179、322、 333、 351 ）

再结合“郑岐”村闺阁内碑文“离明继照”前文考释，其中“明”字被特意换成“目”“月”组合，与上述碑文考释相对照，令人豁然贯通；这不是在讨伐篡位者朱棣“偷天换日”“鱼目混珠”吗？由此加深对“佛日圆明……珠"的理解。况且古文中曾有“朱”同“珠”的用法，如；“朱崖”即“珠崖”。这“沧海珠禅师”即是建文帝朱允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甚至可以等同了！

由此加深对匾额“视履考祥”的理解，“十、履卦”原文开门见山说；“履；履虎尾，不哩人，亨。”卦辞说，只要按履道行事，就亨通。比喻小心行走在老虎后面，还不能被老虎所伤，所害（吃掉），可以得到行事的顺利。这是处于劣势的逃亡中的建文帝及其随从们采取的战略战术。因此，即使当时确实存在“佛日圆明……沧海珠”等等，他们加以利用也无妨，甚至这个墓是疑兵冢也无妨（例如；或者可能给密探胡淡、郑和等人将计就计造成假像）。反攻复辟，拯救大明，才是他们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的。

（四）“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唐代诗仙李白的《静夜思》著名诗句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现用来比喻我在故乡福建的奇缘巧遇也颇为合适。

1.“举头望明月”

2013年3月4日上午，在宁德“郑岐村”闺阁牌匾前，我举头望见“离明继照”四个大字，即时触“目”惊心，“明”字的左偏旁被偷天换“日”了；仅仅是

为体现书法美需要吗？还是为寓意暗无天日的所谓“明月”与“月明”呢？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大明已是日月无光了，他（建文帝）连月明也无法忍受，不堪回首了。每当日没月落，他格外地触景伤情，泪如雨下，号啕大哭；忽而惊悟，即时吞声饮泣。真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血泪点点滴滴！（见 Yp204，Xp352）

这与贵州“红崖天书”的寓意相当吻合，从而打开突破口。

2.“低头思故乡”

上述牌匾中的“离”字也寓意深奥。“离为火、为日、为电，……离也者。明也，（《易·说卦》）“火离即凤皇。”（《春秋之命苞》）隐喻“凤鸣岐山”，“郑岐村”是周武王式的建文帝讨伐商纣王式的朱棣的根据地。“离”还通“罹”。“渔网之设，鸿则离之。”（《诗·邶风·新台》）“离”寓意是罗网，布下天罗地网，捕杀燕寇，这与“红崖天书”的寓意又非常吻合。（见 Yp177、178； Xp316- -320）

“离”还是“螭”的古字，这或可化解上金贝古墓两边构件是“闭龙嘴”还是“螭首”之争。不过，有争论是好事，说明故乡福建不像某些“地方保护”严重的那样，因为笔者曾受“地方保护”的阻碍和损害而深有感触，在续著《破解“红崖天书”》中隐晦地倾诉了在贵州和山东受到一些人谣诼和冤枉之苦。（ 见 Xp92、93）

因此，故乡福建的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们能尊重科学，热烈争论，坚持公平正义，克服狭隘的地方保护，是难能可贵、是可爱可敬的。莆田的宋端仪（1447- -1501 年）是第一个敢于写《革除录》编辑建文朝忠臣遗事的人。建文帝及随从们逃亡福建绝非偶然。故乡的知音们，让我们一起续破“天书”觅“建文”吧！

作者单位：上海江南造船厂

卷九　报刊文创类

插图 1：经常报道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消息的各类报纸


4

明史第一谜案

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

宁德晚报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二：

《罪惟录》揭开谜团

提示

浩瀚典籍查出“福建说”

收藏快报

2010年第12期

总第348期

民国政要中央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寻宗栖霞叙族谱

（文见16版）

困扰了史学界600年的“大明第一谜案”正逐步被破解。继2009年明史专家初步认定福建宁德上金贝神秘古墓为明建文帝陵寝之后，近日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再添重要佐证——

护驾近臣郑洽后裔归宗浙江郑文门

郑洽为浙江郑文门八世祖，600年前随驾到闽，其后裔在福建郑岐村繁衍生息，目前超过千人

本报记者

台海军名宿坐轮椅来福州捐文物

04 /A叠 发现新闻

金陵晚报

他们描述的“建文逃亡路线图”

宁德历史学者来宁披露建文帝踪迹——

建文帝归宿福建宁德又添新证据

1、《宁德晚报》《收藏快报》《金陵晚报》


2011年4月28日

探秘档案

三都澳僑報

商传宁德说建文

B2 视点

中外志愿者在古田支教

“红崖天书”破译专家林国恩莅宁探寻

“建文帝迷踪”呼之欲出

寿宁四中：诚信文化进校园

E5 特刊

澳門日報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辛卯年七月廿五日

海西視點

寧德探訪建文帝謎蹤

9

[视点]

支提云锦袈裟提供有力佐证

建文帝陵寝谜底渐现

世代不忘党报情

泉彭少年一家亲

携手共绘友谊图

2、《三都澳侨报》《闽东日报》《澳门日报》《福建日报》

插图 2：经常报道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的各类杂志



插图 3：以宁德市建文史事为背景的各类文创





报纸刊文类

一、《福建日报》刊载文章索引

（一）2008 年 11 月 26 日刊文 上金贝：建文陵寝话玄机

（二）2009 年 1 月 14 日刊文 建文帝陵寝之谜有新说

（三）2009 年 7 月 30 日刊文 建文帝陵寝谜底渐现

（四）2009 年 8 月 28 日刊文 明史专家认证；宁德上金贝古墓为建文帝陵寝

（五）2009 年 10 月 29 日刊文 畲家山寨惊现建文帝陵寝，上金贝舞动蕉城旅游龙头

（六）2009 年 11 月 12 日刊文 建文帝陵寝考证又添新线索

（七）2010 年 5 月 18 日刊文 郑洽归宗佐证建文帝陵寝论断

二、《闽东日报》刊载文章选录

（一）2008 年 2 月 22 日刊文 探访省内规模最大的单人僧塔

（二）2009 年 5 月 22 日刊文 上金贝建文陵寝发现新佐证

（三）2009 年 6 月 26 日刊文 55 万元复制支提寺云锦袈裟

（四）2009 年 8 月 27 日刊文 专家论证上金贝古墓为“明朝第二陵”

（五）2009 年 8 月 31 日刊文 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600 年谜案宣告破解——解密支提寺云锦袈裟主题图饰

（六）2009 年 8 月 31 日刊文 追踪大明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

（七）2009 年 9 月 7 日刊文 从朱元璋【闭嘴】做皇帝——试论闭嘴龙造型为明初皇家规制

（八）2009 年 9 月 14 日刊文 支提寺袈裟图饰透露主人身份非凡 六百年历史谜案告破确切无疑

（九）2009 年 10 月 16 日刊文　明史专家马渭源通过一系列的证据链 进一步确定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

（十）2010 年 3 月 24 日刊文　相隔 600 年，郑洽回归浙江郑义门

（十一）2010 年 7 月 5 日刊文　支提山华严寺明代袈裟在南京复制成功

（十二）2010 年 8 月 26 日刊文　“建文帝出亡宁德说”走进中国社科院

（十三）2010 年 9 月 14 日刊文　明史专家毛佩琦来蕉城考察时指出【建文帝出亡宁德说】研究成果最突出

（十四）2011 年 4 月 23 日刊文　解开建文帝终亡福建宁德的密钥

（十五）2012 年 10 月 29 日刊文　钟洋村的谜团

（十六）2013 年 3 月 8 日刊文　“红崖天书”破译专家林国恩莅宁，“建文帝迷踪”呼之欲出

（十七）2013 年 5 月 6 日刊文　洋中惊现清代“帝”字形古画，或与建文帝出亡宁德有关

三、《宁德晚报》刊载文章索引

（一）2009 年 9 月 4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一；古墓“新生”

（二）2009 年 9 月 9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二；《罪惟录》揭开谜团

（三）2009 年 9 月 12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三；建文帝与“郑义门”

（四）2009 年 9 月 16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四；郑岐村密语

（五）2009 年 9 月 19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五；郑和“雪峰”拜建文

（六）2009 年 9 月 23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

秘六；建文帝入闽奔泉州

（七）2009 年 9 月 26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七；“保皇”失败洁庵遭软禁

（八）2009 年 9 月 30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八；建文帝出亡闽东金邶寺

（九）2009 年 10 月 10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九；胡濙三次入闽捕建文

（十）2009 年 10 月 14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十；上金贝古墓墓主究竟是谁

（十一）2009 年 10 月 17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十一；金贝古墓——缩小版的明孝陵

（十二）2009 年 10 月 21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十二；支提云锦袈裟秘闻

（十三）2009 年 10 月 28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十三；“宁德的学说要由宁德人去完成”

（十四）2009 年 11 月 21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续一；建文帝研究又获新佐证

（十五）2009 年 12 月 14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续二；郑和下西洋确为寻找建文帝

（十六）2010 年 3 月 4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续三；郑岐郑氏竟是皇亲国戚

（十七）2010 年 5 月 27 日刊文 《明史第一谜案——建文帝出亡宁德之谜揭秘》续四；捕建文，燕军入闽毁寺杀僧

（十八）2011 年 4 月 23 日刊文 建文帝陵附近发现神秘坑道

（十九）2011 年 4 月 23 日刊文 “百家讲坛”主讲人、明史专家商传到宁德考察建文帝踪迹；“你们的研究是全国做得最认真、出成果最多的”

（二十）2011 年 5 月 27 日刊文 建文帝出亡宁德再添新佐证，蕉城洋中发现帝师周斌墨迹

四、《海峡都市报》刊载文章索引

（一）2009 年 9 月 4 日刊文 悬案成了旅游卖点，各地争打“建文”牌

（二）2009 年 10 月 31 日刊文 宁德上金贝；明朝第一谜案秀出金贝十景

（三）2010 年 6 月 9 日刊文 “建文帝出亡宁德”解密

（四）2011 年 4 月 27 日刊文 宁德上金贝村 惊现古秘道

（五）2013 年 3 月 20 日刊文 宁德发现地宫秘道，疑与建文帝行踪有关

五、《三都澳侨报》刊载文章索引

（一）2009 年 5 月 6 日刊文 又现建文帝隐匿蕉城踪迹

（二）2010 年 3 月 26 日刊文 建文帝随亡大臣郑洽裔孙归宗郑义门

（三）2010 年 5 月 28 日刊文 《破解 600 年第一谜案》出版，6 月 8 日马渭源将到蕉城举办签售会

（四）2010 年 6 月 3 日刊文 “万岁”神祇牌谜云；一曲家破国亡的长恨歌

（五）2010 年 7 月 8 日刊文 讯一；建文帝陵再度引发关注，潘心诚调研上金贝景区建设 讯二；“建文帝出亡宁德说”南京强势发声，明建文帝踪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六）2010 年 8 月 26 日刊文 “建文出亡宁德说”走进中国社科院

（七）2010 年 9 月 16 日刊文 “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说”研究成果最突出——明史专家毛佩琦莅蕉考察侧记

（八）2011 年 4 月 14 日刊文 六百年的眺望

（九）2011 年 4 月 28 日刊文 商传宁德说建文

（十）2012 年 2 月 16 日刊文 千年古刹金贝寺 和谐盛世待重兴

（十一）2014 年 10 月 31 日刊文 地头田间，梦回大明；一位乡村文化人

追溯600年前历史

（十二）2015年9月9日刊文 石后发现“功参大造”牌匾，建文帝陵寝谁造之谜呼之欲出

（十三）2017年12月13日刊文 漈山古刹够诡异600年密码谁来解?

（十四）2019年6月14日刊文 瑞岩村；两位文武奇才的曲折故事

六、《收藏快报》刊载文章索引

2010年第6期总第342期刊文 建文帝与闽浙“建文井”的民间传说

七、《金陵晚报》刊载文章索引

2010年4月12日刊文 宁德历史学者来宁披露建文帝踪迹——建文帝归宿福建宁德又添新证据

八、《澳门时报》刊载文章索引

2011年8月24日刊文 宁德探访建文帝谜踪

杂志刊文类

一、《南京钟山文化研究》2010年6月增刊刊文选载论福建支提寺“建文袈裟”闭嘴龙纹饰为明初皇家的规制

二、《南京钟山文化研究》2010年6月增刊 试论郑和下西洋与建文帝藏匿福建华藏寺（节选）——兼谈郑和下西洋是两段式航行

三、《南京钟山文化研究》2010年6月增刊刊文选载明建文帝出亡路线图考（节选）

四、《宁德通讯》2010年第11期刊文选载 600年的眺望

五、《东方收藏》2011年第12期（总第27期）刊文选载郑和出洋巨舰是在哪里造的

六、《生活创造》2014年11期/总第404期刊文选载王道亨；600年谜

案的探究者（上）

七、《生活创造》2014年12期/总第405期刊文选载600年谜案的探究者（下）

八、《史林》2016年第6期刊文选载 明建文帝出亡宁德考

九、《宁德方志》2017年第1期（总第1期）刊文选载关于建文帝踪迹研究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王道亨

十、《宁德方志》2018年第1期（总第2期）刊文选刊建文帝出亡福建宁德考暨宁德市建文帝踪迹探索研究综述——王道亨

文创类

一、黄如枢、左夷山·建文帝哭师（闽剧剧本）

二、郑承东·六集历史专题片《龙隐宁川》解说词

三、郑承东·龙隐宁川《画册》目录

四、谢丁宁、郑小芹·建文逸事（闽东乡土传奇剧）目录

五、王道亨·建文逊国演义（中篇小说）目录

六、刘兆玄·王道剑（长篇历史小说）目录

七、王道亨·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成果展示（上金贝明史馆专用）解说词

附　录

一、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成员名录

郑民生	唐　颐	姚智梅	缪耕山	黄家盛	兰秀珍	陶敏辉	陈兴生
雷仕庆	卓晓銮	卢美松	魏福根	刘国平	王道亨	吴泽金	孙绍祥
林丽祥	钟　亮	陈宗森	陈鸿飞	汤万泽	钟宜国	郑　震	邱树添
王　青	张小萍	钟昌华	郑道居	蓝晓平	李烈坤	刘东明	郭尧允
杨良辉	赖文宫	殷延智	陈　颖	陈卫华	黄振溢	陈寿清	黄式斌
王登振	吴剑平	许立峰	林高顺	刘　捷	叶宝元	李　斌	何　钊
王乃化	卢渊同	周乃松	陈元泉	缪建荣	郑承东	庄　严	周华武
焦宁华	吴康成	缪洪通	余永清	林翠慧	刘夏阳	钟泉芳	王明水
甘信先	马忠旺	苏方金	余新汉	余晓榕	余祖荣	陈其生	尤信恩
缪希崇	蓝水禄	阮良忠	李旱雨	徐庆龙	黄岐山	崔向新	孙芳雄
蓝坛秀	黄钲平	陈细灿	郭智明	黄爱星	兰陈平	钟庚真	何宗鸿
陈幼香	郑裕亮	郑成意	刘　捷	刘干成	陈言雕	王和铅	张本超
杨建斌	王中兰	袁　军	林建生	林瑾祥	林琼琨	王小琳	王小妹
周昌启	周康明	林长贵	夏云发	李熙慧	郭成灿	刘开春	林　峰
释悟通	周建东	林　键	黄卫安	包小红	阮建兴	孙绍旭	袁科峰
谢爱国	林尚华	周孝钧	卓斌华	释传弘	余根诚	韦陈生	黄立云
王仕锦	王允斌	叶林生	郭晓妍	陈光华	梅春强	何玲华	金维姿
李贤斌	林道盛	钟碧弟	钟昌发	李朱成	王伟添	黄佑锦	颜　凑
王汉卿	陈丽英	魏明恩	周东升	余深义	黄宗量	周宗辉	龚迪发
刘成杰	刘郑美	张舒同	张东华	陈顺文	陈丽斌	刘婉密	王仕健
陈云明	吴信兴	吴　谨	王春明	郑焕琪	陈明旺	朱祖斌	林茂金
林桂明	叶其芳	陈　华	钟绍冬	王登勇	王华平	杨振旺	郑肖军

陈珠娟	王秋华	王秋铃	缪　政	章芳忠	杨　瑾	李佳长	郭希禄
郭尧邦	郑冠军	姜成福	雷云凌	卢道希	章　鸿	陶　圆	钟绍余
冯作华	刘高栋	马少云	陈圣端	卢　秋	孙影华		

二、宁德市明史研究会会员名录

余根诚	郑裕英	黄卫安	林开良	王冬勇	王道亨	余新汉	马忠旺
吴泽金	林丽祥	孙绍祥	钟　亮	赖文宫	郭尧允	刘夏阳	李　斌
王登振	吴康成	郑承东	许立峰	陈言雕	缪洪通	庄　严	刘干成
郑焕琪	蓝春华	钟绍冬	袁志国	韦陈生	郑成意	陈幼香	郭成灿
周孝钧	黄佑锦	魏明恩	周康明	林瑾祥	林琼琨	周昌启	郑冠军
吴　谨	陈丽斌	叶林生	王仕锦	陈云明	孙绍旭	袁科峰	谢爱国
杨建斌	李声宁	王小琳	余深义	陈其生	林长贵	黄巧雁	王小妹
余永清	卓斌华	包小红	王汉卿	龚迪发	章　鸿	林道盛	刘婉密
王春明	林　芬	孙巧玲	郭智明	张晓群	陈爱兰	黄立云	陈方伟
陈永霄	杨　谨	王秀莺	张舒同	李佳长	冯作华	林智姿	薛国英
郑孟光	卢渊同	缪爱玉	卢道希	刘淑芳	何　钊	胡锦华	林桂明

三、在宁德市蕉城区召开的中国明史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与会学者名录

陈支平	赵笑洁	范金民	高寿仙	张宪博	郭培贵	阿　风	张金奎
何孝荣	博明妹	王　剑	赵连赏	陈时龙	解　扬	吴　锐	廉　敏
秦　博	柏　桦	高春平	田　澍	张民服	刘道胜	吴德义	冯贤亮
张海英	苏　辉	曹江红	杨永康	杨绪敏	钱茂钱	张献忠	刘利平
刘　冻	叶玉杰	邵　磊	沈一民	蔡明伦	田　冰	赵玉田	孙祥宽
原瑞琴	李德楠	丁修真	赖玉芹	赵树国	王雪华	蒋　俊	刘婷玉
郭玉刚	阳正伟	吕　杨	占蓓蓓	赵秀丽	谢　羽	何歌劲	侯官响

谢奉生　牛明铎　芮赵凯　胡开全　郑　宁　周喜峰　刘明鑫　朱皓轩
耿　勇　邓　涛　尚国栋　李鹏飞　纪海龙　时　亮　胡箫白　张　鑫
张婷婷　朱忠文　黄建聪　黄群昂　罗朝蓉　徐晓庄　牛传彪　俞美玉
李　东　何先龙　袁晓春　夏　强　徐嘉露　苏循波　钱　晟　李治军
郑　榕　马海燕　魏宁楠　张婧雅　于　婧　张永钦　张　梅　陈　曦
郭娇斌　鄢　姿　胡娇阳　孟兆鑫　张金林　刘慧钦　庄琳璘　吴晓非
林东杰　蔡少辉　刘桂生　刘川渤　李　昕　张　婉　何振龙　郑焕安

四、中国明史学会第十九届年会邀请参会的宁德地方党政领导与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员名录

郑民生　谢再春　何必良　蓝晓平　邱树添　王道亨　余根诚　赖文宫
郭尧允　吴泽金　郑承东　郑裕英　释传弘　黄卫安　陈言雕　马忠旺
孙绍旭　郑焕安　杨建斌　卓斌华　朱剑敏　王依群　方庆平　林华能
林卫华